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撰著

# 元朝史(上)

韩儒林 主编



人民出版社



人·民·文·庫  
人文科学·撰著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撰著

# 元朝史(上)

(修订本)

韩儒林 主编  
陈得芝 邱树森 丁国范  
施一揆 姚大力 刘迎胜  
高荣盛 著





内蒙古赤峰元墓蒙古墓主对坐图壁画



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





成吉思汗像



元世祖忽必烈像





和林龟趺



元大都广寒殿渎山大玉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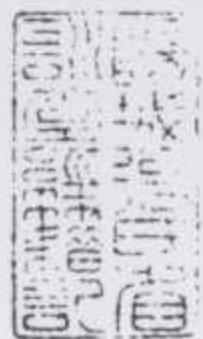


青花红彩盖罐



# 元朝秘史卷一

忙豁倫紐察  
脫察安



名 皇帝的 根源



成吉思罕訥忽札兀兒

上天震命有的

生了的蒼色狼有

迭額列騰格理額扯札牙阿禿

脫列先字兒帖赤那阿禿

妻他的慘白色鹿有來

水名渡着來了

格兒該亦訥豁埃馬闌阿只埃

騰汲思客禿周亦列罷

河名河的源行山名行營盤做着

幹難沐連訥帖里元捏不恤罕哈敦納嫩禿刺周

己必卜一

一

《元朝秘史》书影



## 《人民文库》 出版前言

人民出版社是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始创于1921年9月，重建于1950年12月，伴随着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巨变一路走来，成为新中国出版业的见证和缩影！

“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这十四个大字就赫然写在人民出版社创设通告上，成为办社宗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版宗旨的表述也许有所不同，但宗旨的精髓却始终未变！无论是在传播马列、宣传真理方面，还是在繁荣学术、探索未来方面，人民版图书都秉承这一宗旨。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批为世人所公认的精品力作。有的图书眼光犀利，独具卓识；有的图书取材宏富，考索赅博；有的图书大题小做，简明精悍。它们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一版再版，不仅在当时享誉图书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为挖掘人民出版社蕴藏的丰富出版资源，在广泛征求相关专家学者和老一辈出版家意见的基础上，我社决定从历年出版的2万多种作品中（包括我社副牌东方出版社和曾作为我社副牌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披沙拣金，精选出一批在当时产生过历史作用，在当下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贵史料价值的优秀作品，汇聚成《人民文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需求，积累传承优秀文化。

《人民文库》第一批以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出版的图书为主，



分为以下类别：（1）马克思主义理论，（2）中共党史及党史资料，（3）人文科学（包括撰著、译著），（4）人物，（5）文化。首批出版 100 余种，准备用两年时间出齐。此后，我们还将根据读者需求，精选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优秀作品陆续出版。

由于文库入选作品出版于不同年代，一方面为满足当代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阅读需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我们将原来的繁体字、竖排本改为简体字、横排本；另一方面，为尽可能保留原书风貌，对于有些入选文库作品的版式、编排，姑仍其旧。这样做，也许有“偷懒”之嫌，但却是我们让读者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体味优秀作品恒久价值的一片用心。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作为公益性出版单位，我们深知人民出版社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为人民多出书、出好书所担当的社会责任。我们将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再创人民出版社的辉煌。

《人民文库》编委会



## 前 言

—

自秦始皇并吞六国,中国就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由于众多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几个民族政权同时并存、割据对抗的局面。从公元三〇四年刘渊称王到五八九年隋文帝平陈,南北对峙近三百年。尔后,隋唐的封建大一统局面维持了约一个半世纪。开、天之际,海内富实,唐统治者在穷奢极欲之中迅速腐败下去。七五五年,安禄山起兵叛乱,从那时起,战乱频仍,南北又分裂了五百余年,一直到一二七九年赵宋政权覆灭,全国才归复于统一。所以,要论元朝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就很有必要简单地追溯一下唐朝中叶以后这段充满曲折和祸难的历史。

南诏在安史之乱前已经独立,四川屡遭兵燹,且不去说它。乱后,唐朝国势日蹙。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唐朝戍守西域的精兵几乎全部撤回,丝绸之路中断,阻绝了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吐蕃乘机占领西域,并一度率师东下,攻破长安,立了个傀儡天子。出兵助讨安史叛军的回纥也恃功暴横,把东都抢掠一空,嗣后势力日强,迫使唐政府每年以和市名义“岁赐”绢帛,向他们购买和平。九世纪初,沙陀从新疆东部逐渐东徙到山西北部,其势力在镇压黄巢起义军的战争中发展起来,以后先后在中原建立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短命的王朝。大约与此同时,党项从青海北徙,割据今陕西北部,后来由此发展为西夏。在西北,以喀什噶尔和八剌沙衮为中心,十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个自称



“中国皇帝”的黑汗王朝。在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以东蒙为基地的契丹族亦得以逐渐强大,迫使石敬瑭向他们割地称臣。

从契丹占有燕、云十六州到女真在东北立国,宋、辽、西夏在中原对抗了二百年。宋朝统治者极端怯懦,对西南的吐蕃与大理,但图苟安的赵匡胤,竟卑怯地宣称“大渡河外吾不有也”,而任其割据;对契丹和西夏,亦分别以巨额岁币买得一年苟活偷生的安宁,积贫积弱,坐待亡国的命运。

一一二五年,金灭北宋。从这时起直到南宋亡,民族斗争呈现出更为错综复杂的场面。前一百年来,基本上是宋、女真、西夏间的对抗混战。南宋政府偏安一隅,“直把杭州当汴州”,始终执行“甘弱而幸安”的政策。他们向女真统治者割地、纳币、称侄,根本不图振作。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在漠北建立大蒙古国。从此又开始了蒙古与西夏、女真和南宋之间的生死搏斗。就在成吉思汗立国这一年,南宋韩侂胄抓住金朝北边受蒙古侵逼、国内局势不稳的时机,起兵北伐。爱国诗人辛弃疾曾高兴地歌道:“如今塞北传得真消息。赤地千里无一粒,更五单于争立。熊罴百万堂堂,维师尚父鹰扬。看取黄金假钺,归来异姓真王。”结果却是一场空欢喜。韩侂胄被朝廷割掉脑袋,函首解送女真,作为南宋皇帝向金朝赎罪的物证。由南而北的统一既然不可能实现,蒙古军马便大踏步南下,次第灭掉各个割据政权,重新统一全中国。

纵观这五百年的历史,各族统治者为了争夺权力、财富和土地,残杀不休。土地荒废,人民流离,社会进步受到极大的阻碍。这种情况,对于胜利者或失败者任何一方的人民都是灾难。正是由于元王朝的统一,长达五世纪之久的割据对抗与破坏空前的战乱才得以终止。

蒙古兴起时中国有南宋、金、西夏、西辽、大理、吐蕃等七八个政权并立。为什么蒙古独能统一中国、结束五百年的分裂呢?这须从成吉思汗祖孙父子的主观方面和当时的客观形势两方面来加以考察。

就成吉思汗讲,他的个人才能是出众的。《元史》称他“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他很能团结部下,采取教导和刑罚相辅而行的办法,反映了他的领导



才干。在这方面,读《史集》记载的成吉思汗“训言”,亦可略知梗概。在这里,我还想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民族,如果自己不振作、停滞不前,不能吸收周围其他民族的先进科学技术以济己之短,那就必定要衰败没落。在宋、金日趋没落的时候,蒙古兴起了。他们骑兵虽强,但人口不多,乃进兵西北,招纳或降服了许多民族,如畏兀儿、哈刺鲁、钦察、康里、阿速、斡罗思等,以增加自己的兵力。南方是城郭国家,正如后来阿朮所说,非汉军不能攻夺。于是,一方面尽量利用汉族的各种手工业工人及技术人员,如治弓、矢、甲、胄,造炮、造桥以及卜、医、星、相等人员,以补其缺;另一方面,招纳汉族地主武装及地主官僚知识分子,为其出谋划策,助其扩张土地和进行统治。金哀宗说:“北兵所以常取金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这个亡国之君,把蒙古强大的原因归之于马力与技巧,固然失之片面,但他看到蒙古人能兼收并蓄其他民族的长处,以济己之短,仍不失为从亲身的失败中体验到的真知灼见。

从政治形势分析,当时中国以及西域的许多国家和民族,无一不是处在衰敝的状态。就中国本土来说,女真立国,已经一百多年。它对待北中国人民一向很残酷,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仇恨都很深。蒙古军到河北,腐朽没落的猛安谋克户跟着统治集团逃到河南,被他们丢下的河北、山东地区,赤地千里,人相食。“白骨纵横乱似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女真皇帝依靠在河南重税括粟,维持其庞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通货恶性膨胀,“万贯惟易一饼”,民心涣散,金的统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南宋也是萎靡不振的王朝。统治者过惯了卑躬屈膝的生活。从澶渊之盟起,向来以岁输币帛、称叔称伯的屈辱代价向北朝乞求和平。一二七五年,元朝大将伯颜占领平江,逼近临安,南宋朝廷闻风丧胆,又捧出他们的祖传法宝,遣使向蒙古求和,条件是“尊世祖为伯父,世修子侄之礼,岁币银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匹”。这样使民族蒙辱的腐朽政权,还有存在的价值吗?蒙古统治者以相对强大的力量,实行各个击破,并且不断地从日益广大的被征服地区补充和配备自己各方面的力量,终于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半个亚洲的武装力量,统一了



全中国。这从当时的客观形势来看,是十分自然的。

元朝的皇帝是蒙古人。当中原的皇帝宝座上坐着一个少数民族皇帝时,有些人就不加调查研究,一口咬定说这是黑暗的时代。这是不科学的。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使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无论如何是历史的进步。当时的中国,从各族间互相倾轧厮杀的战场变成了一个民族大熔炉。唐朝以来涌入中原的沙陀、吐谷浑、党项、契丹、渤海、女真以及其他多种色目人,元朝以后都不见了,都与汉人、南人逐渐融合为一体了;从中亚、西亚来到我国内地的许多民族,由于共同信奉伊斯兰教,逐渐形成回族。在中古东亚历史舞台上活动的诸民族,莫不受着“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一永恒的历史规律所支配,从而迅速提高了自己的文明程度。只有极少一部分,如阿速人等,跟随元朝末代皇帝逃到漠北,才又返回到游牧的生活中去。元朝在吐蕃设置了十三个万户府,西藏从此成了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云南也在这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这在前代都是稀有的事。很明显,元朝的统一在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从民族融合的观点看来,此种影响无疑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 二

徐大焯曾在《烬余录》中说到,元时江南二十家为一甲,以蒙古人当甲长,威福自作。人们在研究元代的社会矛盾时,多喜欢引用这一条记载。如果说,某时某地曾发生过此种现象,那可能是正确的。但若说有元一代广大的南方地区都是如此,就根本不是历史事实了。兹举南京、镇江两巨镇为例:集庆路民户凡二十二万五千四百二十四,其中蒙古户只有十四户,溧水、溧阳两县根本没有蒙古人;镇江路十万六十五户,蒙古二十九户:录事司二十三户,丹徒一户,丹阳三户,金坛二户。集庆、镇江地当冲要,蒙古人尚且如此之少,可见在



其他地方,更不会有那么多蒙古人去充当甲长。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是原始史料,仍然要进行内在的分析。史料都有时间性和空间性。这一时代的这种说法,对这个地点来说是真实的,对另一地点、另一时间就不能适用了。如果根据上面提到的这一类史料,不加分析,以偏概全,尽量夸张元朝的黑暗面,那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

元朝的蒙古人不多。他们怎样统治中国呢?

元朝统治阶级所依恃的,当然首先是蒙古族的本族人。成吉思汗在长期的征讨战争中,锻炼出来四骏、四狗和二“先锋”,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十投下”、“十功臣”。可惜关于诸家的史料,除木华黎、速不台等数家后裔尚有史迹可征外,其余的只知其官高爵显,而无史料流传下来。

对于征服和统治这么广大的中国来说,蒙古本族的人数实在是太少了。蒙古军队总共有十多万人;到内地来的蒙古人数无法确考,根据明末努尔哈赤给林丹汗的信,说元时蒙古人到中原来的约有四十万人。这里面的大部分人,显然还不具备统治一个经济、文明都高度发达的封建农业国家所必需的政治经验和文化素养。因而,蒙古统治者在征服和统治中国时,还得大大依赖色目人。西方的民族,不论是投降的,还是被征服的,都被蒙古征发来充作兵员。譬如高加索山地的阿速人,就大批地被迁到中原来,组织成阿速卫。咸海以北的康里,康里西北的钦察,今伊犁一带的哈刺鲁,以及斡罗思、唐兀等族,都分别依其族籍组织成军。忽必烈时代用来打南宋的军队,除了北方汉人外,几乎包括了中亚细亚一带各族的人。统一战争结束后,他们中间很多人都在政府或军队里做了官,对元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回回人,长于运输、储藏,善于理财、搜刮,长期被蒙古贵族用来经营商业,管理财政。

归附蒙古的汉人和南人,也替蒙古统治者出了很大的力气。在北方,很早就有一批“结寨自保”的武装地主投靠蒙古军,替他们扩大势力;忽必烈时帮助他建立制度的读书人,不少是金朝的官僚地主,“亡国大夫”。首先向元廷



提出“先从事襄阳,然后浮汉入江,则宋可平”的平宋方略的,正是南宋降将刘整。当时南宋的襄阳守将是吕文焕,长江流域遍布吕氏弟兄、门婿、儿子、部下。所以吕文焕举襄阳降元以后,元军得以顺流东下,长驱直入,大大加速了南宋守军的溃降。元朝统治者看到汉人、南人不但是可以利用的,而且治理汉地也不能不利用他们,因此除了军权不轻易交出而外,一般行政官员中,汉、南人数目超过了蒙古、色目人。元朝政权,是十足的蒙汉统治阶级联合政权。

元朝国内充满了矛盾。它的前期,在北方主要是蒙古皇族,即成吉思汗兄弟子孙的后裔之间争夺帝位的斗争。这种斗争,不是要推翻蒙古政权,而是依蒙古旧俗,中原皇帝的宝座,孛儿只斤氏的子孙人人有份,所以无论是东道诸王或西道诸王,都不甘心老死沙漠。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论功行赏时,被他视为六弟的失吉忽秃忽不是向他要求“有土墙城子”的人民吗?金亡后,对广大的北中国城市,蒙古贵族谁不垂涎三尺?因此,一旦皇位虚悬,势必有人试贾余勇,争夺这块肥肉。到了元朝中后期,南方的矛盾逐渐上升,日趋严重。其性质是“不平人杀不平者”的斗争,即反压迫的民族斗争和反剥削的阶级斗争,目的是要推翻元朝政权,改朝换代。

根据蒙古可汗的继承制度,可汗生前示意或指定某子孙继位,死后再召集亲王驸马、将相大臣参加的“大聚会”(忽里勒台),共同推举新可汗。然而分析一下所谓的拥立者与被拥立者都是一些什么人,就不难看出,遗嘱、大聚会、推举等等都是形式,兵权在谁手里,才是实质。

成吉思汗留下的军队共有十二万九千人。其中十万一千由幼子拖雷继承;其余二万八千分给了成吉思汗的母亲、三个弟弟和四个儿子,最多的得五千,最少的只得一千。拖雷继承的十万一千人是成吉思汗的亲信部队,其军官都是在成吉思汗麾下出生入死、共创大蒙古国基业的宿将老臣。这些人怎么会甘心情愿自己的总帅交出大权,俯首听命于只有四千兵士的窝阔台?这就是为什么在成吉思汗死后召集的大聚会上,众人“归心拖雷”,集议四十日而不能决定人选的道理。只是经过大胡子耶律楚材和速不台的劝说,大会才勉



强达成协议,推举窝阔台为可汗。但是,窝阔台系和拖雷系之间争夺汗位的斗争仍一直在继续,直到蒙哥即位方告一段落。蒙哥的军队,就是拖雷的旧部。贵由死后,窝阔台系势力微弱,虽有脑忽等起而争位,帝位终于还是转移到拖雷系统的手里。

蒙哥时代,忽必烈受命长期经营中原汉地,在人力与财富方面,都比以漠北为根据地的幼弟阿里不哥强得多。因此,蒙哥死后,阿里不哥在与忽必烈的争位战争中很快失败,就是势所必然的了。阿里不哥失败以后,东、西两道诸王中觊觎汗位的仍大有人在。为了隔断东、西诸王,阻遏其携手联军南下,元初诸帝,一直委派亲王大将驻军和林。他们的目的基本上是达到了。可是同时,元朝皇位也就常常落在坐镇漠北的亲王手中了。如成宗、武宗等人就是如此。他们在漠北的旧部,是他们争夺帝位的工具,随着新帝即位,枢密院之类大权,就成了他们的囊中物了。世祖以后,元朝的蒙古族军队战斗力渐弱,驻扎在漠北防止西北宗王叛乱的军队主力,都是阿速、钦察、康里等部族军。其将领如土土哈、床兀儿、燕铁木儿等祖孙父子,既世代握有重兵,又以拥戴有功,他们的权势,可以想见。所以中叶以后,朝政紊乱,政治腐败,他们是负有很大责任的。

除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元朝统治阶级为处理民族矛盾也煞费了苦心。赵宋政权的军队在襄阳和崖山溃降以后,被元朝整编成为新附军。这十几万将士是有组织、训练有素的军队。他们被迫降元,忽必烈一一接受。但是既不能全部杀掉他们,又不敢叫他们解甲归田,如何处置他们呢?忽必烈不解决这个问题,是放心不下、睡不着觉的。至元中叶,元王朝屡次兴师,征日本、征爪哇,实际是别有用心的做法。征日战争中最活跃的,正是宋末戍守长江沿岸的吕氏军阀集团成员,吕文德的门婿范文虎。范文虎率领十万将士出征,几乎全军覆没,幸存者十仅一二。忽必烈算达到了不杀降而降人自消的目的。

用汉法治汉民是草原游牧民族统治中原的必行之路。契丹不就“以汉制



待汉人”，设立了“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的南衙吗？在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国时代，政治重心在漠北，尚视中原为边地，学习邻族文化也以畏兀儿为师，汉法的需要还不紧迫。所以，后来自称“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早期只能像巫筮一样靠说鬼话混饭吃。随着蒙古势力日益深入中原，汉地的农业经济逐渐成为元朝立国的根本；政治重心也就不能不随之而南移；喇嘛教、伊斯兰教虽颇盛行，亦无法与在全国居主导地位的汉族封建文化相抗衡。政治、经济、文化既然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变化，蒙古人原来“虽得汉人亦无所用”的观念必然也要发生改变。这就大大促进了蒙、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形成和发展。有元一代，各种制度大抵是损益唐宋以来的旧制而成，但同时亦采用了不少其他民族特有的剥削方式。例如“五户丝”，似乎就是袭用辽代的“太后丝蚕户”制度。元初，“北军要讨撒花银，官军行移逼市民”，是对百姓无情的勒索。“撒花”一词，是波斯字 Sauqāt 的音译，意为“礼物”；足证是从西域传来的勒索方法。元时军前掳到的人口称为“驱”，后来在北方亦以买来的人口称为“驱”。金代良人被掠者为“驱”，也有凶年百姓典雇为“驱”者。可见元代的“驱口”，亦应是金代遗制。蒙古贵族自己不会做生意，把金钱交给回回商人，令贸易以纳息，当时称为“斡脱钱”，政府且设有专门机构，号称“斡脱所”。“斡脱”（Ortaq）突厥语为“同行”、“伙伴”，而在花剌子模意为“商人”。这种特别的高利贷剥削，显然也是采用回回地面的剥削方法。所有这些，都加强了元代民族压迫的色彩。

大家都知道，金朝统治者关于兵权、钱谷之事，用人的次第是女真、渤海、契丹、汉儿。元朝袭用这种种族歧视的政策，将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在中央政权和军权方面，蒙、汉之界是严峻的。各地大小政府机关的最高头领达鲁花赤，即“镇压者”，一般由蒙古人担任，赋有监视和控制人民的全权。日本在侵华战争时期出了一部《异民族统治中国史》。日本军阀在沦陷区大小政府机关遍设“日本顾问”，显然就是从研究“异民族统治中国”的经验中学到的心得体会。南人到中央政府中去做官的，始终不多，被北方人看不



起,称为“腊鸡”。在法律以及各种政治待遇方面,四等人都是有差别的。这既是反动的民族防范政策,又是恶毒的分化挑拨政策。

我们时常使用“蒙古统治者”这个词,其意思只是说元朝的中央政权,基本上掌握在几十家蒙古贵族的手里。广大的蒙古人民仍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蒙古穷人的子女,不是也有被卖给回回人、汉人当奴隶,甚至被贩卖到海外去的吗?相反,江南富豪中,不是也有像朱清、张瑄那样田宅遍于吴中、连当日宰相亦垂涎其家资的大地主吗?可见所谓“贫极江南,富称塞北”,虽是元末农民军鼓动起义的宣传口号,其实贫富之别不在南北,与所属民族亦无关。元末农民大起义本身所反对的,也不仅是民族压迫。当时积极起来镇压起义的“义兵万户府”、“义兵千户所”,不正是南方各地的地主武装么?蒙古皇帝面对农民起义军束手无策,不是还向汉族朝臣们讨教“诛捕之法”么?

如上所述,元朝的社会矛盾是多种多样的。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代,这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时代。蒙古统治者在中原依靠汉族地主剥削人民,而汉族地主为维持本阶级的权益,也需要依靠蒙古贵族的统治。他们是相互依赖、相互利用的。元朝的农民起义所以多,就是因为这两种矛盾都可以激起反抗。所以,我们不应当简单地把元代的起义原因都归结为民族矛盾。

### 三

元朝和历史上的其他封建王朝一样,是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各族劳动人民的政权,其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基本上是从前代继承和发展来的。元朝有的大部分弊病,其他朝代也有。因此,特别夸大元朝的黑暗面,是不适当的。

如果我们研究元朝社会的特点,就会发现,尽管在政治、经济领域中,存在着若干落后倒退的因素,但也有一些前代所没有的积极方面。最突出的就是,



各民族文化通过接触,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出现了多种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特色。

有人认为,蒙古人不能汲取汉文化,所以元朝国祚不长。这种说法显然是片面的。对于能加强其统治力量,提高其物质生活的汉族文明,蒙古统治者从不拒绝,总是尽量加以利用。猛火油、震天雷、制甲、造桥等先进技术,不是在蒙古人的征服战争中起了很大作用么?《元史·百官志》列举的手工业官署,不尽是当日精工良匠荟萃之所么?至于农业,本非漠北牧民所娴习,然自成吉思汗时代起,即迁移内地农民北去,种田做工,分布于漠北各地。后来,还让他们“杂教部落”,指导一部分蒙古人种植粮食。阿尔泰山南的称海,以及杭海、和林、五条河,唐努山北的谦谦州、吉儿吉思等处,竟一时成了产粮基地。惟从事此种工农业生产的多是汉人及回回人。蒙古统治者只驱使蒙古人充当镇压各族人民的工具,保护他们的政权,而不引导蒙古人学习先进文化。因此,一旦政权丧失,所有的一切便悉归乌有了。

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后,对儒、道、释、医、卜者是非常重视的。在他们看来,这几类人属于“技术”人才。成吉思汗召见精通卜筮的耶律楚材,带他随军西征,因为卜筮在战争中对于落后迷信的将士能起很大的作用。一二一九年,以医术进用的刘仲禄言道士丘处机有保养长生之术,成吉思汗便命他跋涉万里,到山东莱州召这位道士。同时,他又指令木华黎国王优待海云禅师师徒。僧、道之流善于装神弄鬼,后来西藏的佛教——喇嘛教传来,更适合蒙古贵族的口味,因而极受尊崇。在元代,僧、道的地位很高,郑思肖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是有一定道理的。

蒙古人最初不知道儒者有什么用途,俘虏到儒士,往往让他们去做苦役。后来,耶律楚材等人建议说,儒者学的是周公、孔子治天下的道理,要管理好汉地,没有他们不行。因此,把孔、孟的庙祀恢复了,孔夫子的后裔也封了官。一二三五年打南宋,命姚枢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者等人物,姚枢是儒者,故特别重视儒士,在俘虏中发现了理学家赵复,将他带到北方去传授程朱理学。



一二三八年考试儒士,对合格者准予豁免身役,选用他们做官或让他们教书。忽必烈即位后,正式设立国子学,选蒙古贵族子弟入学,学习儒家学说,培养统治人才。一些人居中原的蒙古贵族,羡慕汉族文化,还请了儒生当家庭教师,来教育子女。这样,元朝也出了一些懂得汉文化的蒙古族文人学士,如朵儿直班等人。

然而,多数蒙古贵族则只知道享用中原的物质财富,役使汉人、回回人为自己服务,而不愿学习比较艰深的汉文化。有位皇太子说,儒家老师说的话,听了昏昏欲睡,而喇嘛说教一听就懂。可见儒家的仁义道德之说在蒙古人中不会有广大的市场。儒虽不是宗教,但有“万世师表”的孔子,又有自己的经书,蒙古人也就把儒生看成与和尚、道士、答失蛮、也里可温等“告天祝寿的人”一样,给予一定的优待。但儒的地位总是居于释、道之下。

元朝幅员广大,民族众多。政府使用三种语言文字。蒙古语是所谓“国语”;汉人、南人使用汉文。色目号称三十一一种,其中以回回的文化为最高,回回商人在朝内拥有很大的权力,所以元朝许多重要机关都设有回回译史、令史、掾史等官职。政府设立的最高学府,除蒙古国子学、国子监、汉文国子学、国子监外,还有回回国子学、国子监,讲授亦思替非文字(即回回文),来造就这方面的人才。当时回教世界通行的语言是波斯语,于是波斯文也就与蒙文、汉文并列,成为元朝官方使用的文字。

元朝,大批回回人人居中国,伊斯兰教亦随之广泛传播于中国各地。因之元朝不仅三种文字并用,喇嘛教、儒教与伊斯兰教三种文化亦并存。此外,元朝皇帝把各种宗教视为手的五指,采取兼容并蓄政策,所以也里可温(景教、天主教)、朮忽(犹太教)也都有一席之地,成为这个时期文化的组成部分。

蒙古统治者的大事有三,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所以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回回地面出产的武器和奢侈品,如回回炮,折叠弩,如牙忽(宝石)、答纳(珍珠)、速夫(毛布)、纳失失(金锦)、阿剌吉酒(蒸酒)、舍儿别(果子露)之类都相继输入中原。而对各民族文化发展具有更重要意义的,则是科学技术的交



流。元朝制造的回回天文仪、地球仪(木制圆球)等科学仪器,所编著的回回历书、医书、地理书等,都是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成就。地理家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天台僧清浚《混一疆理图》的制图法,显然都受到回回地图学的影响。在元人的诗文笔记中,更有许多赞誉回回神医奇药的篇什。

元代文化的多样性是显著的。那么经济上怎么样?是有所发展,还是衰退了呢?这个问题也不能绝对化地看待。北方地区在金朝末年,社会经济残破不堪,很多地方生产衰落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蒙古军队的破坏,有金朝统治者与河北起义人民之间的战争,还有各个地主武装集团的相互争夺残杀。后来,元朝政府在北方恢复农业生产,有的地方还恢复得很好,没有闲田,单位面积产量也提高了,如山西,甚至做到一亩地可养一人。受战争破坏最甚的河南,江淮地区,也是“丛藁灌莽,尽化膏沃”,“荒田耕遍”,生产得到恢复。至于江南地区,破坏得并不太厉害,经济情况与南宋时相差不多。总的说来,在元朝,耕地面积有所扩大,尤其是边疆地区开发了,北宋、南宋还不能和它相比;棉花的种植普及了,中国北方原来是桑麻遍野,到元代,渐被棉花代替了。这在穿衣问题上是个很大的改革,以前穷人穿麻织品,现在可以穿棉布了。

元朝的中外交通特别发达。陆路通波斯、叙利亚、俄罗斯、欧洲,海路通日本、朝鲜、东南亚、印度、波斯湾以至非洲各地。交往的范围扩大了。当时,东西方使臣、商旅的往来非常方便。元朝人形容说:“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同时代的一个欧洲商人也说,从黑海沿岸城市到达中国各地,沿途十分安全。这是因为,陆路交通有严密的驿站系统做保障。海路交通方面,元代的航海技术有很大进步。航海者们善于利用季候风规律出海、返航,“凭针路定向行船,观天象以卜明晦”。他们长期积累的观测潮汛、风信、天象的丰富经验,还被编成歌诀。因为有了这个条件,他们才能航行得更远。明初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只是继承元代航海家的遗业,步其后尘而已。

由于中外交通发达,元朝的对外关系得到了发展,使节、商人往来不绝。中外贸易十分活跃,在中国各大城市,不仅有波斯、阿拉伯商人,而且出现了欧



洲和非洲的商人。元代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也具有重大意义。

总之,我们不能机械地、绝对地看问题,说元朝一团漆黑,什么都糟得很。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元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而且在不少方面有它自己独特的贡献。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元朝统治阶级的残暴和政治的腐败也是相当突出的,元朝的统治也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许多消极的乃至落后的影响。举例说,唐、宋以来以科举取士,元初不行科举,入仕之途或由宿卫,或由儒,或由吏。到仁宗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年)才恢复科举,开始会试进士,可是采用了深受南宋理学家影响的程钜夫等人的意见,“经学当主程颐、朱熹传注”。从此四书五经成了圣经,程、朱成了圣人的代言人。科举考试、学校教学一律用朱子的传注。到了明朝,朱元璋、刘基又制定八股文体,为士子进身的敲门砖。中国的知识分子被这一套思想的枷锁束缚六百多年,一直到了五四运动时代,才得到解放。对于这些方面,当然也是我们所必须看到的。

#### 四

我们很早就有编写一部简明的元朝断代史的愿望。二十多年前,我们在开设元史课时曾编写过一本二十万字的讲义。粉碎“四人帮”后,重新写作的任务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但由于教学任务和其他工作相当繁重,编写本书的工作只能断断续续地进行。

本书是由集体讨论、分头执笔完成的。具体执笔的同志是:第一、二、三、八、十章以陈得芝为主,第四、五、七、九章以邱树森为主,第六章以丁国范为主;施一揆参加第五章,姚大力参加第四、八、九章,刘迎胜参加第六、八、十章部分撰写工作。

本书初稿完成后,曾得到国内元史专家们的热忱帮助和指正。中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蔡美彪、周良霄,历史研究所的陈高华、杨讷、唐宇元,民族研究所的刘荣焌、高文德、蔡志纯、白翠琴,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的周清澍、林沉,杭州大学的黄时鉴等同志,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予以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本书得以出版是与他们的帮助分不开的。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的学术水平和理论水平很低,资料使用也有一定的困难,对国内外研究的成果了解不多,因此,本书的缺点、错误一定很多,我们诚恳地希望元史专家们和史学界的同好们提出批评和指正。

韩儒林 一九八二年秋于南京

附识:本书各章、节的修订,均由原作者承担(除已故施一揆外)。按照人民出版社意见,增《元代的社会生活》一章,由高荣盛撰写。刘迎胜承担全书的选图,杨晓春同志协助。

# Contents

前 言 .....	1
第一章 .....	1
蒙古国家的建立	
第一节 蒙古族的起源 .....	1
一 族源和名称 .....	1
二 室韦—达怛各部的西迁及其分布 .....	8
克烈部 .....	13
札剌亦儿部 .....	17
篾儿乞部 .....	19
斡亦剌部 .....	20
八剌忽诸部 .....	21
塔塔儿部 .....	23
蒙古部 .....	25
乃蛮部 .....	29
汪古部 .....	30
第二节 蒙古各部的社会状况 .....	31
一 经济生活 .....	31
二 社会组织和阶级状况 .....	38



第三节	漠北的统一 .....	51
一	各部的争战 .....	51
二	蒙古部的强盛 .....	56
三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 .....	59
	乞颜氏贵族联盟的建立 .....	59
	十三翼之战 .....	63
	斡里札河之战 .....	65
	东部地区的争夺 .....	67
	克烈部王罕的败亡 .....	70
	乃蛮部的灭亡 .....	72
	札木合的末路 .....	74
第四节	蒙古国家的建立 .....	75
一	一二〇六年大会 .....	75
二	千户的编组 .....	77
三	护卫军的扩建 .....	80
四	蒙古文字的创制 .....	83
五	大断事官的设置 .....	84
六	札撒的制定 .....	85

## 第二章

### 蒙古的征服战争

第一节	灭夏与灭金战争 .....	90
一	蒙古军事力量的强盛 .....	90
二	六征西夏 .....	91
三	蒙金战争 .....	97
	金朝的衰败 .....	97

成吉思汗攻金 .....	101
木华黎经略中原 .....	106
蒙宋联合灭金 .....	110
四 辽东的争夺 .....	112
第二节 西北地区的征服 .....	117
一 征服吉利吉思和“林木中百姓”诸部 .....	117
二 畏兀儿的归附 .....	119
三 哈刺鲁的归附 .....	122
四 西辽(哈刺契丹)的灭亡 .....	123
第三节 蒙古西征 .....	126
一 成吉思汗西征 .....	126
西征前蒙古与花刺子模的关系 .....	126
阿母河北地区的占领 .....	130
花刺子模的灭亡 .....	134
进兵钦察 .....	139
二 长子出征 .....	142
灭钦察、不里阿耳 .....	142
征服斡罗思 .....	143
进兵孛烈儿、马札儿 .....	145
三 绰儿马罕西征和阿姆河行省的治政 .....	147
四 旭烈兀西征 .....	150
灭木剌夷 .....	150
灭黑衣大食 .....	151
进兵叙利亚 .....	153
第四节 侵南宋与灭大理 .....	154
一 金亡前的蒙宋关系 .....	154



二	蒙古侵宋战争 .....	159
	南宋恢复汴洛的失败 .....	159
	窝阔台时期的侵宋战争 .....	161
	蒙哥时期的侵宋战争 .....	163
三	忽必烈灭大理 .....	166

### 第三章

蒙古国的统治	171
--------	-----

第一节	统治集团的内争和蒙古国的分裂 .....	171
一	子弟、贵戚的分封 .....	171
二	汗位的争夺 .....	177
三	各汗国的独立化 .....	183
四	漠北的建设 .....	188
第二节	蒙古对中原汉地剥削方式的演变 .....	193
一	抢掠和要索 .....	193
二	十路课税所的设立 .....	195
三	乙未籍户与分土分民 .....	197
四	制定新税法 .....	203
五	斡脱钱和扑买课税 .....	206
六	宪宗时期的括户、分民和税制演变 .....	208
第三节	蒙古对中原汉地统治方式的演变 .....	213
一	屠杀与迁民 .....	213
二	统治机构的建立 .....	215
三	汉人世侯的势力 .....	218
四	各种宗教的利用 .....	223

## 第四章

元朝的建立	231
第一节 忽必烈夺取政权	231
一 忽必烈联合各族地主阶级	231
二 对中原地区的经营和控制	233
三 汗位的争夺	236
四 中统建元	239
第二节 镇压叛乱,维护统一	241
一 镇压李璘之乱	241
二 平定诸王叛乱	245
第三节 灭亡南宋和建立元朝	251
一 腐败的南宋朝廷	251
二 南宋的灭亡	255
突破襄樊	255
占领临安	257
三 消灭南宋残部	260
四 建立元朝	264
五 元朝统一全国的意义	265
第四节 行政建制和军事制度	268
一 行政机构的设置	268
中央机构	268
地方机构	272
基层行政设施	275
二 军事制度	277
宿卫和镇戍制度	278



	军户和奥鲁 .....	285
第五节	法律、铨选和赋役制度 .....	290
一	法律制度及其特点 .....	290
	立法概况 .....	290
	刑法特点 .....	299
二	铨选制度 .....	306
	铨选制度概述 .....	306
	科举制度 .....	309
三	赋税制度的形成 .....	314
	北方的税粮、科差 .....	314
	南方的夏、秋二税 .....	318
	诸色课程及役法 .....	321

## 第五章

### 元代的社会经济

第一节	统治阶级对土地的占有和兼并 .....	326
一	系官田地的扩大 .....	326
二	贵族、官僚的土地占有 .....	333
三	地主、富豪的土地兼并 .....	335
四	寺院、道观的土地财产 .....	337
第二节	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和衰敝 .....	340
一	元初的重农政策及其贯彻 .....	340
二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	345
	人口不断增加 .....	346
	中原和沿海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	347
	棉花及其他新作物的推广 .....	352

三	元代中后期农业生产的衰敝 .....	354
· 第三节	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	358
一	官手工业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状况 .....	358
	组织机构 .....	358
	生产状况 .....	362
	管理腐败 .....	366
二	民间手工业的生产 .....	369
	概况和特点 .....	369
	生产状况 .....	373
第四节	交通运输业的发达 .....	378
一	河漕 .....	378
二	海运 .....	380
三	驿站 .....	384
第五节	商业经济的活跃 .....	386
一	钞法的实行 .....	386
二	国内贸易的发达 .....	389
	政府对商业的控制 .....	389
	贵族、官僚、色目商人豪夺民利 .....	390
	民间商人的商业活动 .....	392
三	对外贸易的开展 .....	396
四	城市经济的繁荣 .....	399
第六章		
<hr/>		404
元朝社会矛盾的发展		
第一节	统治政策的演变与帝位之争(上) .....	404
一	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的“理财” .....	404



二	真金与权臣的斗争 .....	406
三	成宗之立及其守成 .....	409
第二节	统治政策的演变与帝位之争(下) .....	416
一	武仁授受与英宗之立 .....	416
	武宗登位与财政危机的加剧 .....	416
	仁宗继统和儒术的再利用 .....	420
二	英宗新政与泰定帝即位 .....	424
三	天历之战与明文之争 .....	429
四	顺帝前期的统治 .....	435
	妥懽帖睦尔之立 .....	435
	脱脱“更化” .....	437
第三节	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	438
一	统治集团的腐朽 .....	438
二	对人民的控制和防范 .....	442
三	劳动人民的苦况 .....	447
第四节	元朝的民族压迫 .....	452
一	民族分化政策 .....	452
二	政治上的防制 .....	455
三	民族压迫在法律上的反映 .....	458
第五节	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	460
一	元朝前期的人民反抗斗争 .....	460
	灭宋前后的人民抗元斗争 .....	460
	世祖至元后期的各地起义 .....	466
二	元朝中期各族人民武装起义 .....	471
三	顺帝前期的各地起义 .....	479

## 第七章

### 元末农民大起义

第一节 元末社会矛盾的激化和起义的准备	
活动 .....	485
一 元末社会矛盾的激化 .....	485
二 韩山童、彭莹玉组织起义的秘密活动 .....	488
第二节 元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和暂时挫折 .....	491
一 韩山童、刘福通首义和元朝统治者的疯狂	
镇压 .....	491
二 南方红巾军起义和天完政权的建立 .....	495
三 方国珍、张士诚起兵反元和其他农民	
起义 .....	500
第三节 元末农民起义的发展和失败 .....	505
一 宋政权的建立和失败 .....	505
宋政权的建立 .....	505
李武、崔德等率领的西路军 .....	507
毛贵率领的东路军 .....	508
关先生、破头潘率领的中路军 .....	510
北方红巾军的最后失败 .....	513
二 天完政权的重建和倪文俊、陈友谅的	
篡权 .....	516
天完政权的重建和倪文俊的篡权 .....	516
汉政权的建立和陈友谅的蜕变 .....	518
明玉珍入川和夏政权的建立 .....	520
三 朱元璋队伍的壮大 .....	522



四	张士诚和方国珍的投降活动 .....	526
	投降变节的张士诚 .....	526
	两面三刀的方国珍 .....	529
第四节	朱元璋削平南方割据势力和北伐的胜利 .....	530
一	南方割据势力的消灭 .....	530
	陈友谅的败亡 .....	530
	张士诚被消灭 .....	532
	方国珍和明升投降 .....	535
	陈友定等被削平 .....	536
二	朱元璋的蜕变和明朝的建立 .....	539
三	北伐的胜利和元朝的灭亡 .....	544
	灭亡前夕的元廷 .....	544
	北伐的胜利 .....	546
第五节	元末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 .....	548
一	推翻了元朝的黑暗统治 .....	548
二	打击了元末的地主阶级 .....	550
三	改造了明初的封建统治 .....	552
四	元末农民战争在中国农战史中的地位 .....	553
第八章		
元代的边疆各族		558
第一节	岭北地区 .....	558
一	亲王的出镇 .....	558
二	岭北行省的建置 .....	562
三	经济与文化 .....	568

户口与赋役 .....	568
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	573
宗教与文化 .....	577
第二节 东北地区 .....	581
一 元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 .....	581
二 东北各族及其社会经济 .....	589
第三节 西北地区 .....	599
一 蒙古国时期的中亚 .....	599
窝阔台时期 .....	599
贵由、蒙哥时期 .....	605
二 元朝前期的察合台与窝阔台汗国 .....	607
阿鲁忽、海都与八剌 .....	607
元朝在中亚的活动 .....	610
大德八年约和后西北地区的形势 .....	613
三 元朝后期的察合台汗国 .....	619
四 社会经济 .....	623
阿姆河以北地区经济的恢复 .....	623
畏兀儿及其周围地区的社会经济 .....	625
五 文化和宗教 .....	628
第四节 吐蕃地区 .....	635
一 地方首领和教派的分裂割据 .....	635
二 吐蕃各地统一于元朝 .....	638
三 元朝对吐蕃地区的统治 .....	643
宗王的分封和帝师的统领 .....	643
统治机构的建立 .....	647
籍户口和置驿站 .....	655



四	乌思藏地方统治权的交替 .....	657
	萨斯迦地方政府的统治 .....	657
	伯木古鲁万户的兴盛及其战胜萨斯迦 .....	660
第五节	云南地区 .....	662
一	元朝对云南地区的统治 .....	662
二	云南各族及其社会状况 .....	671
第九章		
元代的文化科学 .....		680
第一节	文学艺术 .....	680
一	元曲 .....	680
	杂剧 .....	680
	南戏 .....	685
	散曲 .....	685
二	小说 .....	687
三	诗词和民歌 .....	690
	诗词 .....	690
	民歌 .....	691
四	书画 .....	694
第二节	史学 .....	698
一	辽、金、宋三史的纂修 .....	698
二	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 .....	701
三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	703
第三节	哲学思想 .....	705
一	理学的继承和传播 .....	705
二	元代理学的特点 .....	709

三	“三教外人”邓牧的“异端”思想 .....	716
四	谢应芳的无神论思想 .....	719
第四节	宗教 .....	722
一	佛教 .....	722
二	道教 .....	726
三	伊斯兰教 .....	731
四	基督教 .....	736
第五节	科学技术 .....	742
一	天文历法 .....	742
	天文仪器的创制 .....	743
	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 .....	745
	《授时历》在历法上的成就 .....	746
二	地理学 .....	748
	《元一统志》的编纂 .....	748
	河源的探索 .....	748
	朱思本的《舆地图》 .....	749
三	农书 .....	751
	《农桑辑要》 .....	751
	王祯《农书》 .....	753
	《农桑衣食撮要》 .....	755
四	水利学和水利技术 .....	755
	水利著作 .....	755
	水利技术 .....	757
五	医药学和营养学 .....	759
	医药学 .....	759
	营养学 .....	761

六	工程技术 .....	762
	印刷术 .....	762
	火炮技术 .....	763
	造船术和航海术 .....	764
第十章		
元朝的对外关系 .....		767
第一节	元朝与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的关系 .....	767
一	元朝与钦察汗国的关系 .....	767
二	元朝与伊利汗国的关系 .....	771
第二节	元朝与亚非各国的关系 .....	783
一	高丽 .....	783
二	日本 .....	786
三	安南、占城 .....	792
四	緬、暹、罗斛 .....	795
五	爪哇及南海诸国 .....	800
六	印度 .....	803
七	非洲 .....	806
第三节	元朝与欧洲国家的关系 .....	809
一	元与欧洲各国关系发展的原因 .....	809
二	普兰诺·卡尔平尼和卢勃鲁克 .....	810
三	马可波罗 .....	813
四	列班扫马出使欧洲 .....	816
五	欧洲传教士在中国 .....	817
六	旅行家鄂多力克 .....	820
七	教皇特使马黎诺里 .....	821



## 第十一章

### 元代社会生活

第一节 服饰 .....	824
一 几种代表性服饰 .....	824
二 官员服饰 .....	827
三 庶人服饰 .....	829
第二节 饮食 .....	831
一 酒与酒海 .....	831
二 宴飨 .....	833
三 民间饮食概况 .....	835
四 日餐制和点心 .....	836
五 饮茶 .....	837
第三节 居住条件与居住状况 .....	839
一 斡耳朵制度 .....	839
二 城乡居住条件 .....	841
第四节 交通与通讯 .....	846
一 交通工具 .....	847
二 交通的管理与维护 .....	849
三 民间交通往来 .....	849
四 邮传 .....	851
第五节 婚姻状况 .....	851
一 收继婚的影响 .....	852
二 守志与元代社会 .....	853
三 赘婿、族际婚与典妻现象 .....	854
四 婚俗 .....	857

第六节	祭祀与丧葬 .....	859
一	蒙古族的祭礼 .....	859
二	其他葬俗与祭俗 .....	862
第七节	四时节令与消闲时光 .....	864
一	蒙古族的被灾迎福活动 .....	864
二	四时节令以及大都等地与经济活动有关的 其他习俗 .....	865
三	城市生活空间的展拓 .....	866
第八节	演艺与元代社会 .....	868
一	演艺在统治阶层和文人学士中的影响 .....	869
二	五彩纷呈的大都演出活动 .....	871
三	遍及南北各地的杂剧演出 .....	872

附录:

人名索引 .....	875
引用书目 .....	923

## 第一章

# 蒙古国家的建立

## 第一节 蒙古族的起源

### 一 族源和名称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中国北部地区先后出现过许多民族或民族政权。由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变动以及因之而引起的民族迁徙和民族混合,各民族的成分、名称、居地和语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民族在经历了盛衰离合之后,逐渐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因此,要完全解决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的族属、族源问题,是十分困难的。在蒙古民族形成以前,漠南北地区先后有匈奴、东胡、鲜卑、乌桓、柔然、高车、突厥、回纥、黠戛斯、契丹、室韦等民族的活动,前人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和语言资料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有些民族的族属问题至今仍有不同看法。例如,匈奴人的族属问题就是歧见最多的问题之一。有人断言匈奴人属于蒙古族。他们根据汉文史籍中保留下来的一些匈奴语资料,拿来和蒙古语比对,据说找到了一些“一致”的词汇和语法现象,于是得出结论,说匈奴应属蒙古语族<sup>①</sup>。通过语言的比较研究来识别古代民族的族属,

---

<sup>①</sup> 见白鸟库吉:《蒙古民族的起源》,《白鸟库吉全集》第四卷,一九七〇年,东京(按:此文原载一九二三年《史学杂志》,何健民译为汉文,改名《匈奴民族考》,中华书局,一九三九年版);纳·伊什札木茨:《匈奴的族属及其社会制度》,蒙古《科学委员会学术论著(历史·语言)》第一辑,一九五七年,乌兰巴托。



无疑是重要的途径,但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如果既不讲究记录匈奴语的汉字古音,又不管蒙古语在历史上的变化,任意地拿来比对,难免要牵强附会,走入歧途。持匈奴即蒙古说者所提出的语言方面的论据,大多有这种情况<sup>①</sup>。至今为止,有关匈奴语言和人种的研究成绩,最多说明它更可能是阿尔泰语系民族,却根本不能证明属于蒙古语族。还有不少人主张匈奴属突厥语族,这种说法得到一些文献资料的支持。史籍记载说,敕勒的语言与匈奴略同(《北史·高车传》),五世纪时,匈奴后裔在今巴尔喀什湖之东所建的悦般国,“风俗、言语与高车同”(《魏书·西域传》);又说铁勒人是匈奴的苗裔(《隋书·铁勒传》),突厥是匈奴之别种(《周书·突厥传》)。当然,匈奴属突厥族说的论据仍是不够充分的。

东胡及其后裔乌桓、鲜卑、契丹、室韦等族的族属问题,也曾引起学者们的争论。20世纪,有些学者提出东胡属于通古斯语族,“东胡”一名就是“通古斯”的译音的说法,某些著作中甚至直接用“东胡”来译写民族学用语“通古斯”(Tungus)。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早已被抛弃了。

东胡的得名,据东汉人服虔说,是因为他们的居地“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公元前三世纪末,东胡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余部保乌桓山,因号乌桓;东胡的另一支依鲜卑山而居,故称鲜卑,其语言、习俗与乌桓同(《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东汉时期,乌桓人大批入居塞内,后渐融合于汉族。鲜卑人则乘北匈奴败逃之机,徙据匈奴故地,复渐南移近塞。没有西迁的一部分匈奴人也自号鲜卑,后来遂融入鲜卑人中。二世纪中叶,鲜卑首领檀石槐曾统一东、中、西三部鲜卑,建立强大政权,但不久便分裂了。三世纪后期,东部鲜卑慕容部、段部和宇文部兴起,后慕容部兼并宇文、段部,建立燕国;慕容部的一支迁到今甘肃、青海地区,后来称吐谷浑。西部鲜卑

---

<sup>①</sup> 对匈奴—蒙古说的批评,参阅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三、四期。

的拓跋部崛起于代郡之北,四世纪末建立强盛的北魏王朝,并统一了中国北方。这时,在东部鲜卑故地今西拉木伦和老哈河流域有契丹部,其北,即古所谓“鲜卑山”地区(大兴安岭北段)有室韦部,先后服属于拓跋鲜卑王朝。室韦与契丹同类,语言也相同,都是鲜卑的后裔。有的学者认为,室韦与鲜卑两个译名所本的原文是相同的,似应为 Serbi, Sirbi 或 Sirvi<sup>①</sup>,这就是说,两者的族名本来是相同的。拓跋鲜卑是从鲜卑山南迁后吸收了匈奴等族人而形成的部落,据《魏书》记载,他们先人的“旧墟石室”在乌洛侯部(室韦之一部)居地之北,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遣人致祭,并刻石纪念。最近,考古工作者在今内蒙古鄂伦春旗西北发现了这个石室<sup>②</sup>,进一步证明了鲜卑与室韦居地的一致。以上的历史概述表明,从东胡到契丹、室韦,是一脉相承的同一系统民族。

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东胡后裔诸族的语言与蒙古语有共同的祖源。例如,《南齐书·魏虏传》记录了拓跋鲜卑语中表示具有某种身份或职务者的十三个单词,其尾字都是“真”,如文书吏为“比德真”,通事人为“乞万真”,作食人为“附真”,乘驿人为“咸真”等,这和原蒙古语表示相同意义的-chin 后缀完全一致。契丹语表示所有格的附加成分有-ə n, -an, -in, -on, -un, 和蒙古语表示所有格的-yin, -un ~ ün, -u ~ ü 应是同源。有若干鲜卑语和契丹语词汇,与蒙古语相同或相近,如鲜卑语“阿干”(兄,蒙古语 aqa),“纥真”(三十,蒙古语 ghuchin)以及上述“比德真”(蒙古语 bitekchin)、“乞万真”(蒙古语 kelemechin)、“附真”(蒙古语 ba'urchin)等;契丹语“陶里”(兔,蒙古语 taulai),“捏褐”(犬,蒙古语 noqai),“讨”(五,蒙古语 tabun)等<sup>③</sup>。历史语言学的研究

---

① 伯希和:《吐火罗语与库车语》,见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一九五七年版,页七九。

②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研究》,《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③ 参阅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关于鲜卑语,参看伯希和:《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中华书局,一九五七年版;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全集》第四卷。关于契丹语,参看清格尔泰等:《关于契丹小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一九七七年第四期,专号。

证明了东胡后裔鲜卑、契丹的语言与蒙古语有密切的亲属关系,这对解决蒙古族族源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蒙古族的直系祖先,是和鲜卑、契丹人属同一语族的室韦各部落。

室韦的名称最早见于《魏书》记载,作“失韦”,隋、唐时代的史籍通常都写做“室韦”(或作“室卑”,见《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二月条)。这是对当时分布在契丹之北、靺鞨之西、突厥之东(约当今洮儿河以北,东起嫩江,西至呼伦贝尔的广大地域)诸部落的统称,其中的大部分应族属相同。史称他们为“契丹之类”、“契丹别种”。六世纪时,室韦人分为五大部: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和大室韦,不相统一。从东魏武定二年(五四四年)起,室韦人就不断遣使到中原“贡献方物”。突厥强盛后,室韦受其统治,突厥设三吐屯总领之。其后室韦各大部又渐分为若干部落,各部落都有自己的酋长,有些部落还出现了酋长世袭的现象<sup>①</sup>。唐贞观三年(六二九年)时突厥势力衰落,室韦人继奚、契丹之后归附唐朝,自此贡使不绝,有些室韦部落酋长还被命为都督、大都督之职<sup>②</sup>。由于关系密切,唐人对室韦诸部的了解就比前人更详细了。

据两《唐书》的记载,室韦人的分布地域西面达到俱轮泊(今呼伦湖——达赉诺尔)。其最西的乌素固部落,居俱轮泊西南,自此迤东有移塞没、塞曷支、和解、乌罗护等部。俱轮泊四周都是室韦人的居地。“大山”(当即今大兴安岭北部)之北的大室韦诸部落,傍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sup>③</sup>而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落俎室韦之南,又东流与那河(今嫩江)、忽汗河(今松花江)合,……

---

① 《北史》卷九四《室韦传》:“南室韦,……渐分为二十五部,每部有余莫弗瞞咄,犹酋长也。死则子弟代之;嗣绝,则择贤豪而立之。……北室韦,分为九部落,绕吐纥山而居。其部落酋帅号乞引莫贺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贰之。”

② 《唐会要》卷八六。

③ 《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传》作室建河,当因形似而误。也有人以为“室建河”是正确的写法,并考订为今石勒喀河。参见田村实造:《蒙古起源传说及其迁徙问题》,载 Acta Asiatica 24, 东京,一九七三年版。



东流注于海”(《旧唐书·北狄传》)。据此知室韦乌素固等部落及西室韦(乌素固等部落似是西室韦的分部)居住在今呼伦湖周围和额尔古纳河上游一带,大室韦部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中下游地区,而蒙兀室韦(似是大室韦的分部)的居地则应在额尔古纳河下游之东,大兴安岭北端。

室韦的西面与突厥紧邻,并曾受到这个强邻的统治,但在突厥文史料中却不见这个名称。唐玄宗开元廿年(七三二年)所立的《阙特勤碑》突厥文部分,载有其四邻部族和国名,称其东邻为“三十姓达怛”(Otuz-Tatar)。据碑文中各部的排列顺序,三十姓达怛的地理位置应在骨利干东南、契丹之北,正与唐书所载室韦诸部相当。达怛既称三十姓,必是大部,唐人应该是知道的。但这个名称到唐朝后期才出现于汉文文献:会昌二年(八四二年)李德裕所撰《赐回鹘唃没斯特勤等诏书》中提到一个回鹘左厢部落叫“黑车子达怛”(见《会昌一品集》卷五)。按黑车子是室韦的一个部落,据王国维考证,即《旧唐书》所载和解室韦<sup>①</sup>。《辽史》中即载有“黑车子室韦部”。但此处却称为“黑车子达怛”,可见达怛与室韦实为同一部族<sup>②</sup>。大抵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汉文文献中把契丹之北的诸部落统称为室韦,而突厥人则把他们统称为达怛——这可能是取自紧邻突厥的一个强大的“室韦”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sup>③</sup>。唐朝后期

① 王国维:《黑车子室韦考》,《观堂集林》卷一四。

② 王国维将李德裕书中的黑车子达怛分为两部,且认为这个达怛即《阙特勤碑》中的三十姓达怛,地与黑车子族相近,故并提(见《鞑靼考》)。此说不确。按《辽史》卷二九《天祚纪》三谓天祚“得阴山室韦谟葛失兵”,《史愿亡辽录》(见《三朝北盟会编》引)则云:“得阴山鞑靼毛割石兵”,是至辽末室韦、达怛尚有互通的用例。黑车子达怛应为一个部落,即黑车子室韦。

③ 拉施都丁《史集》在讲述塔塔儿部一节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说明:“在远古时代的一个长时期中,他们曾是多少部落和土地的征服者和主君。由于他们的极其强大和尊荣,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都以他们的名称为世所知,全被称为塔塔儿。这些部落也以此为荣。”(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〇二)这当是指八世纪上半叶,即突厥碑文中出现“三十姓达怛”那时的情况。可能在此时或以前不久,塔塔儿部曾统一邻近部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后来人们把蒙古族前身室韦各部统称为达怛,都是袭用了突厥人对他们的称呼。

汉文文献中出现的达怛名称,又似乎是从回鹘人那里传来的。回鹘政权崩溃后,其“种族离散”,西迁南移。室韦—达怛人乘虚而入,大批地进入漠南北,从此在这个广阔草原的舞台上扮演历史的主角。而“达怛”的名称,随着突厥、回鹘人的足迹带到中原和西方<sup>①</sup>。人们用它称呼蒙古高原各部,甚至一些突厥部落(如乃蛮)也被称为达怛。至于室韦一名,辽人虽仍用以称呼北方一些部落,但范围已大大缩小。此后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两《唐书》所载室韦诸部中有一部称为“蒙兀室韦”,这是最早见于著录的蒙古名称。“蒙兀”的唐代读音为 *mung-nguat*,唐人用 *t* 尾韵母字译写他族语带 *l*、*r* 尾音的音节,因此“蒙兀”正是蒙古名称 *Mongghol* 的正规译音。在宋、辽、金时期的汉文史籍中,这个名称有“萌古”(《辽史》)、“朦骨”(《松漠纪闻》引《契丹事迹》)、“蒙古里”(《契丹国志》)、“萌古斯”(金《完颜希尹神道碑》)、“萌古子”(《三朝北盟会编》引赵良嗣《燕云奉使录》)、“盲骨子”(《松漠纪闻》)、“萌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蒙古”(这个译名最早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引《炀王江上录》)等等异译。这些译名有一个特点,就是将蒙古原名的第二音节 *ghol* 读成 *go*,语尾失去 *l* 音(除“蒙古里”外),有些还加上复数语尾 *-s*。这显然不是从蒙古语原音译出,而是通过他种语言的中介译出的。按清代满语称蒙古为 *monggo*,语尾无 *l* 音,其复数形式作 *monggoso*。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他们的语言应极相近,满语的 *monggo* 大概可以代表金代女真人对蒙古的称呼。这应该是“蒙古”译名的由来<sup>②</sup>。成吉思汗建国以后,有些金国降人帮他用汉文书写对金、对宋的公文。他们把这个从女真语重译的名称转送给他,将他的国号写成“大蒙古国”。于是“蒙古”又以蒙古人自称的国号

---

① 西方著作中最早记载达怛(Tatar)名称的,是公元九八二年成书的伊斯兰作家所著《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见明诺尔斯基英译本,页四七、九四。

② 参阅韩儒林:《蒙古的名称》,《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页一五一。

而为金、宋人所知<sup>①</sup>,从此就统一用这个译名了。

两部最重要的蒙古史书都记载了关于蒙古人祖先的传说。《元朝秘史》说:“成吉思合罕的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Borte-chino),与一个惨白色的鹿(Qo'ai-maral)相配了,同渡过腾汲思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著,生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第一节总译)狼祖传说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很早就有,早在《史记》中就记载着乌孙王昆莫是狼乳育长大的故事。其后,《北史·高车传》(《魏书·高车传》系从《北史》补)记载了高车人的始祖父是狼的传说,而《周书·突厥传》所载突厥人的祖先传说,则谓其始祖母是狼。故事的情节也越来越详。白鹿传说的起源也很早,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就记载了突厥先人射摩与海神女交往中,海神女以白鹿迎射摩入海相会以及命射摩射金角白鹿的故事。蒙古人的狼鹿祖先神话,与上述各族一样,反映了他们先民时代的图腾观念,毫不足奇。《元朝秘史》又载有成吉思汗十世祖(《元史·宗室世系表》称“始祖”)孛端察儿系其母阿阑豁阿感天光所生的传说,则与畏兀儿人祖先由天光照树长癭、癭裂而生的传说显然有关<sup>②</sup>。

拉施都丁《史集》的记载是这样:

“大约距今二千年前,古昔即被称为蒙古的部落,与其他突厥部落发生了纠纷,终于诉之战争。据值得信任的可尊敬的人们口头转述的一个故事说,其他部落战胜了蒙古人,并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屠杀,活下来的只有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这两家人逃到了一个僻远的地方,那里周围都是山林,除了一条狭窄难行的小径之外,别无他路可通。那些山中间有丰富的青草和良好的草原。

---

① 赵珙《蒙鞑备录》:“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今二年以来,因金国叛亡降附之臣,无地容身,愿为彼用,始教之文书。于金国往来,都用汉字。……又慕蒙为雄国,故以国号曰‘大蒙古国’,亦女真亡臣教之也。”又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一九“鞑靼款塞”条:“蒙人既侵金国,乃自号‘大蒙古国’,边吏因以‘蒙古’称之。”

② 参阅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穹庐集》。



这个地方名为额儿古涅昆(Ergune-kun)。kun的意思是“山坡”,Ergune意为“险峻的”,换句话说,就是“险峻的山岭”的意思。那两个人的名字是:捏古思(Neküs)和乞颜(Kiyan)。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就长久地留居此地,生息繁衍着。……

“当这个民族在那些山林中间繁衍日多,地盘日益狭窄而无法容纳的时候,他们互相商量,用什么好办法能从这个险谷狭路中出去。终于他们找到了一个有铁矿的地方,那里经常熔化出铁来。他们全体集合起来,从树林中弄了很多柴薪和木炭,又宰了七十头牛和马,取下整张皮,制成锻铁风箱。随后将柴薪和木炭堆到那个山脚下安放停当,让七十个风箱一下子扇起火来,直到那个山坡熔化。结果从那里得到无数的铁,并开辟了一条通路。他们全都一起出了那个狭地,到广阔的草原上游牧。”<sup>①</sup>拉施都丁又引述“诚实的历史讲述者”的话说,所有蒙古部落都起源于逃进额儿古涅昆的那两个人的氏族。而孛儿帖·赤那(意为苍色狼)则是那两个人后裔中一些部落的首领<sup>②</sup>。

传说中的额儿古涅昆,是十三世纪蒙古人对祖先所居故土的可贵记忆。它无疑是指今额尔古纳河之东的山地,和《旧唐书》所载蒙兀室韦的居地正相符合。足证蒙古部是从这一支室韦部落发展来的。其实,早在南宋初年,洪皓在所著《松漠纪闻》中就已明确指出了蒙古部与蒙兀室韦的关系。他说:“盲骨子,《契丹事迹》谓之朦骨国,……即唐蒙兀部。”

## 二 室韦—达怛各部的西迁及其分布

七世纪上半叶蒙古高原政治形势的变化,对室韦人非常有利。强大的东突厥政权衰微了,漠北铁勒各部首先起来反抗他们的统治,于公元六二九年建立了以薛延陀部首领为盟主的政权。与此同时,奚、契丹和室韦也相继脱离突

---

① 拉施都丁:《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五三至一五四。

② 同上书,第一卷第二册,页九。

厥统治,归附唐朝。六三〇年,东突厥政权为唐所灭,漠南地区统一于唐。漠北的薛延陀政权只存在了十八年(六二九至六四六年),还没有来得及扩展其势力,就在回纥和唐的攻击下灭亡了。于是铁勒各部也一起归附唐朝,唐朝政府各因其地设置了六都督府、七州,即以各部首领为都督、刺史,置燕然都护府统辖之。其中回纥部的势力最大,据有仙娥河(今色楞格河)和温昆河(今鄂尔浑河)流域;仆骨、同罗、多览葛、拔野古、契苾、浑、阿跌等部,分布在独乐河(今土拉河)以北和以南以及今鄂嫩河、克鲁伦河上游一带;回纥之西则是葛逻禄、拔悉密等部。唐朝采取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回纥等部首领基本上也恪守唐朝的规定,漠北地区在数十年中比较稳定,没有出现足以吞并邻部的强大政权。这使东面的室韦人免除了强邻的压迫,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到七世纪末,当突厥人再度兴起,并企图重新征服四邻的时候,室韦人——“三十姓达怛”就已经是不那么容易征服的对手了<sup>①</sup>。

室韦一达怛人何时开始向西迁移,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由于他们不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去占据漠南北广大地区,因此他们的西迁在最初阶段只是逐步的、分散的过程。两《唐书》记载室韦各部的分布,大致是反映了七八世纪的情况。那时他们仍居住在今呼伦贝尔地区,其西界最多达到克鲁伦河下游和额尔古纳河之西不太远的地方,因为再往西就是铁勒人和突厥人的地盘了。当然,在这个时期,可能有个别室韦一达怛部落,趁着漠北无强敌的机会,逐步地向西面寻求新的牧场。

室韦一达怛部落出现在漠北腹地的最早记录是八世纪初年。据突厥文《毗伽可汗碑》的记载,当毗伽可汗三十二岁时(唐玄宗开元三年,公元七一五年),突厥出兵征讨乌护(铁勒)人,破其汗庭。乌护人与九姓达怛(Tokuz-Tatar)联合起来,在 Aqu 地方与突厥作战。Aqu 之地的确切位置不明,但大致应

---

<sup>①</sup> 《阙特勤碑》叙后突厥兴起事,将三十姓达怛列为敌人。说明此时达怛人已渐强盛。

该在铁勒居地的中心独乐河左近。这说明,一部分室韦—达怛人此时已进入铁勒人的居地,并参与了他们的斗争。这个时期,由于后突厥统治者的压迫,大批铁勒人离开他们的故土,南徙入唐<sup>①</sup>。他们抛下许多良好的牧地,正为室韦—达怛人的西迁提供了好机会。

上述“九姓达怛”可能是最早一批西迁的人数众多而又比较强大的部落。在此后的漠北历史事件中,他们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七四四年(唐玄宗天宝三年),回纥药罗葛氏首领骨力裴罗推翻后突厥汗国,建立了回纥汗国。回纥可汗为征服漠北各部进行了多次战争。据突厥文回纥葛勒可汗磨延啜纪功碑记载,九姓达怛人曾与八姓乌护联合起来,在 Bükägük, Burqu 和仙娥河等地与磨延啜的军队打了几次大仗,他们遭到了失败,一半人归附了回纥,另一半则避入他处,回纥可汗并没有把他们完全征服<sup>②</sup>。从这里可以看出,到八世纪中叶,九姓达怛已经成为漠北一支比较大的力量,而且曾深入到了仙娥河地区。但是,在这以后,有关九姓达怛的活动即无明确记载。王国维推断说,《新唐书·地理志》所引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载,从西受降城至回鹘牙帐的路上有个达旦泊,在噶昆河上游的回鹘牙帐东南,当是九姓达怛的居地<sup>③</sup>。那么,这应当是上述服属于回纥可汗的一部分达怛人了。

八世纪后期,一部分室韦人逐渐向西南迁徙,大约到了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地区,遂与奚人(居今西拉木伦、老哈河和滦河上游一带)接界。七八八年,一队奚和室韦联合的军队袭击了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境,大掠人畜而

---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至则天时,突厥强盛,铁勒诸部在漠北者渐为所并,回纥、契苾、思结、浑部徙于甘、凉二州之地。”同书卷一九五《回纥传》所载略同。又同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开元三年秋,默啜与九姓“战于磧北,九姓大溃,人畜多死,阿布思率众来降。”突厥文《毗伽可汗碑》也记述了九姓乌护南迁事。

② 参阅王静如:《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辅仁学志》卷七,一、二期合刊(一九三八年)。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编:《古代突厥文献选读》(一九七七年油印本)第一分册,《磨延啜碑》译文,第一三至一九行。

③ 王国维:《鞑靼考》,《观堂集林》卷一四。



去,唐振武节度使遣骑兵七百会同正在振武的回纥迎亲使者率领数百骑去追击,结果回纥使者竟为奚、室韦所杀<sup>①</sup>。这一支室韦人可能就是后来活跃在幽州塞外的黑车子室韦(即《旧唐书》所载之和解室韦)。九世纪初,进入漠南的室韦人继续分散地向西移动,出现在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振武塞上,也就是说,到了阴山地区<sup>②</sup>。

唐文宗开成年间(八三六至八四〇年),回鹘汗国<sup>③</sup>内乱,加以岁疫、大雪,羊马多死,国衰,八四〇年被黠戛斯部所灭。回鹘“种族离散”,或西迁,或南奔。黠戛斯人统治回鹘汗国故地的时间似乎不很长,八四八年,他们曾发兵攻打室韦,抢夺了被室韦人瓜分的回鹘余众而去,此后就不见他们在漠北有什么重大的活动。看来黠戛斯的主要力量很快就退回剑水(今叶尼塞河上游)故乡,并没有在噶昆河上游建立强大的游牧政权<sup>④</sup>。九世纪后期的蒙古高原处于无霸主的状态,而原来的主要居民回鹘人又大多数迁走了,这自然是达怛人扩展地盘的良好时机。到十世纪前期,从今克鲁伦河到杭爱山地区,已经到处都是室韦—达怛人的部落了。《辽史·萧韩家奴传》说:“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曩时北至胘胸河(今克鲁伦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一,惟往来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耶律阿保机西征在天赞三年(九二四年),进兵路上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事,三个月内就到达回鹘故都——古回鹘城(又名窝鲁朵城、卜古罕城,今蒙古北杭爱省哈刺八刺哈孙即其故址),征服了这些地区的阻卜各部。“阻卜”是辽人对蒙古高原许多部落的泛称,或写作“朮不姑”,为区别不同部落,《辽史》中还用了“北阻卜”、“西阻卜”、“西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唐纪》四九。

② 《元和郡县志》卷四;《唐会要》卷七三。

③ 唐德宗贞元四年(七八八年),回纥可汗奏准改称回鹘。

④ 巴尔托德推测说:“黠戛斯被逐出蒙古,可能和契丹帝国于十世纪的建立和蒙古族的推进有关”(见《伊斯兰百科全书》Kirghiz条)。《蒙古人民共和国史》更肯定说:“契丹人在十世纪初将黠戛斯逐出蒙古”(俄文本一九五四年版,页七〇)。此说史料依据不足。耶律阿保机西征史料中,未见有与黠戛斯作战的记载。

北阻卜”等名称,有时也记录了某些阻卜分部之名,如“阻卜札刺部”等。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对阻卜这个族名进行过许多研究,现在大体可以肯定,辽人所谓“阻卜”,就是达怛的异称<sup>①</sup>。从《辽史》记载的阻卜部落分布范围看,他们已据有了今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当然,在阻卜(或达怛)的泛称下可能包含有非室韦—达怛系统的部落,但其主体应是达怛即蒙古语族部落当无疑。我们知道,著名的于都斤山(今杭爱山)曾是突厥和回鹘汗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后来畏兀儿人的祖先传说还把这里当做他们先人的兴王圣地<sup>②</sup>。可是十一世纪哈刺汗朝人马哈木·喀什噶里所著的《突厥语大辞典》却说,于都斤山是在达怛人的地域之内<sup>③</sup>。这也反映了漠北草原已经易主的明显事实。

十至十二世纪,蒙古高原各部先后受辽、金王朝的统治。辽置西北路招讨司管辖胪朐河以西阻卜等部。辽圣宗时,西北路招讨使(又称“阻卜都详稳”)萧挞凛镇压了阻卜等部的叛乱,在阻卜之地建立了镇州、防州和维州三城,从此以镇州城(亦称可敦城,即今蒙古布尔根省喀鲁哈河下游南之青托罗盖古城)为西北路招讨使驻地。统和二十九年(一〇一一年),又置阻卜各部节度使,分而治之。由于这些节度使欺压部民,引起了阻卜各部的强烈反抗,此后大概就不再设置节度使,而改任各部酋长管理本部落<sup>④</sup>。辽代居住在今呼伦贝尔地区的主要部落是乌古部(或作于骨里、于厥、于厥里等)和敌烈部(或作迪烈、迪烈得、迭烈德等)。神册四年(九一九年),耶律阿保机北征,征服了乌古部,其后敌烈部也归附辽朝。辽各置节度使或详稳以治之,又于其上置乌古敌烈都详稳。辽道宗时,置乌古敌烈统军司以为管辖二部的最高机构。

---

① 参看余大钧:《阻卜考》(中国蒙古史学会一九八一年年会论文)对本世纪初以来阻卜研究的综合述评。

② 虞集:《高昌王世勋碑》,《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欧阳玄:《高昌偃氏家传》,《圭斋集》卷一一;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波义耳英译本,第一卷,页五四。

③ 转引自巴尔托德:《Tatar》,见《伊斯兰百科全书》。

④ 参阅陈得芝:《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二期,一九七八年。

辽亡之际,宗室耶律大石率部退据镇州(可敦城),建立政权,数年后,征集漠北诸属部军,离开镇州,进征西域。在此前后,今蒙古高原各部相继被金朝征服或降附于金。金置东北、西北、西南三路招讨司以管辖北方属部和防卫边境。与辽代不同,金三路招讨司并未设在属部之地,而是设治于边内州城(东北路治泰州,西北路治燕子城,西南路治丰州)。各属部首领接受金朝封号,每年纳贡,并为金朝守边。遇有属部叛乱或侵掠边境,金朝即发兵征讨;同时又在北境构筑“边墙”,从东北路的达里带石堡子(今内蒙古莫力达瓦旗北)延伸到西南路的天山(今大青山),以防范边部入侵<sup>①</sup>。

《辽史》和《金史》都没有为北境属部立传,散见于二史记、传、表、志及其他文献中的有关资料虽然不少,但毕竟是零乱不清的。同时期宋人对辽、金北边部族也有记述,然而大多得自传闻,不尽准确。关于这个时期蒙古高原各部的情况,学者们主要依据《元朝秘史》和《史集》的记载,并结合辽、金史料进行考察<sup>②</sup>。

《史集》将蒙古高原的所有部落分为三类:一类是源出额儿古涅昆两始祖的蒙古部落,包括蒙古、弘吉剌等部;一类是元时称为蒙古人,但在以前各有自己名称的部落,包括札剌亦儿、塔塔儿、篾儿乞、八剌忽、斡亦剌等部;一类是各有君长,语言和蒙古诸部相近但并无亲族关系的部落,包括乃蛮、克烈、汪古、吉利吉思等部。一般认为,拉施都丁的分类大体反映了各部的族属情况,即上述前二类属于蒙古语族,后一类为非蒙古语族部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以下分别论述其中的主要部落。

### 克烈部

克烈部(Kereyit,又译怯烈、克烈亦惕、凯烈)是辽金时期漠北最大、最强的一部,其分布地域大抵东至怯绿连河(即胪朐河)上游之南,西至杭海岭(今

---

① 参阅王国维:《金界壕考》,《观堂集林》卷一五;贾洲杰:《金代长城初议》,《内蒙古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三、四期。

② 参阅王国维:《辽金时蒙古考》;冯承钧:《辽金北边部族考》。



杭爱山),北至土兀刺河(今土拉河)和斡耳寒河(今鄂尔浑河)下游一带,南临大漠。据《史集》记载,克烈部首领忽儿札胡思杯禄罕(Qurjaqus-Buyirug-qan,时代当在辽末金初)卓帐于窝鲁朵城;后其子王罕(Ong-qan)的夏营地在达兰达葩(Dalan-daba,今鄂尔浑河上源山名)和古泄兀儿湖(Güse'-ür-na'ur,土拉河南),冬营地在汪吉河(Öngin-müren,今翁金河)。<sup>①</sup>这些地方都在斡耳寒河上游附近,是历代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政治中心所在地。即此可见克烈部在当时漠北诸部中所居的重要地位。

克烈部的族属,至今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多数学者认为是突厥族,或倾向于突厥族说<sup>②</sup>。其根据主要有两点:一,拉施都丁将克烈放在乃蛮、汪古等部一类中;二,克烈人的名字几乎都是突厥语。但主张克烈属蒙古族的论据也是有力的:一,元朝人所撰克烈人碑志都称他们是“蒙古人”、“国人”或“蒙古克烈氏”<sup>③</sup>,陶宗仪《辍耕录》“氏族”条,也将克烈部列在“蒙古七十二种”中,而不是归入乃蛮、汪古所属的“色目三十一一种”;二,拉施都丁的部族分类虽如上述,但他在克烈部条的“状况之说明”中却指出:“他们原是蒙古人的族类,他们的居地是斡难河和怯绿连河,即蒙古人之地”<sup>④</sup>。

---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二九,一二六。按:俄译本王罕夏冬营地地名的读法和译写多误,波义耳据波斯文刊本(莫斯科一九六五年版,页二五二——引者)加以订正,见所著《蒙古世界帝国》,伦敦,一九七七年版,页一〇八至一一〇。今从之。

② 伯希和的看法可以作为代表,他在《高地亚洲》中说:“蒙古人的起源传说没有任何一处提到他们(克烈人)。很难说克烈人是受到突厥强烈影响的蒙古人,或是蒙古化的突厥人。无论如何,克烈人更可能是突厥人,而脱斡邻勒,与其说是一个蒙古字,不如说是突厥字。”(转引自格鲁塞:《草原帝国》,页二四五,一九六九年版,巴黎)但在他与韩百诗合著的《圣武亲征录译注》中,伯希和没有重复克烈是突厥人的看法(参见页二〇七至二〇九)。樱井益雄著《怯烈考》(载《东方学报(东京)》第七册,一九三三年版),据克烈诸部中有土伯夷部,遂主张系源出黠戛斯之属部都波。

③ 程钜夫:《炮手军总管克烈君碑铭》,《雪楼集》卷二二;黄潜:《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使凯烈公神道碑》,《金华集》卷二五;许有壬:《拔实彦卿四咏轩诗序》,《至正集》卷三五。又见《元史》《槩直脂鲁华传》,《速哥传》,《也先不花传》。

④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二七。

根据拉施都丁的记载,克烈人有自己尊贵的国王,他们分为许多部落,但全是国王的臣民,他们信奉耶稣。关于克烈名称的起源是这样:“据说,古代有一个国王,他有八个儿子,全都生得皮肤黝黑,因此被称为‘克烈’(Kereit)。其后诸子的子孙和族系都各有自己的名称,‘克烈’本名则被用于称呼出自国王的那一支部落。其余诸子〔之族〕都成了这个当国王的兄弟的臣民,他们没有国王”<sup>①</sup>。这个传说反映了草原贵族势力发展壮大,从而成为许多部落的统治者的过程,如同蒙古部的泰赤乌氏和乞颜氏贵族统治了全蒙古部众的情形一样。因此,克烈的部名应是来源于这一家贵族首领的称号或名字。

从上述传说看来,克烈人的部落应有八部(国王八个儿子的族支)或更多,但见于十三世纪史籍记载的只有克烈、只儿斤(Jirgin)、董哀(Dongqayit)、撒合夷(Saqayit)、土伯夷(Tübeyit)和阿勒巴惕(? 阿里阿惕 Albat 或 Aliat)六部。

克烈人接受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信仰是在十一世纪之初,一〇〇九年马鲁主教给报达总主教若望六世的一封信中报告了此事。据说,克烈部国王在山中打猎时因雪大迷途,得一圣者引导方才出险,遂依其言信奉耶稣基督,召集在该地经商的基督教商人询问教义,并遣使到马鲁主教处,表示其国二十万臣民均愿皈依基督教,要求派传教师为他们授洗<sup>②</sup>。此信所述之事,除其中迷信成分外,大抵可信,因为当时确有不少中亚商人来往于北方游牧民族和定居国家之间,从事获利颇巨的贸易活动,基督教随之传入蒙古高原是

---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二七至一二八。“Kereit”一名的字原当是 Keri'e,意为“乌鸦”。这可能是源于拟声,在蒙古语为 Keri'e,在突厥语为 qargha。见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二〇九。

② 十三世纪叙利亚史家 Bar Hebraeus 所著之《圣教年鉴》引录了这封信(见第三卷页二八〇至二八二,参阅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二章,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版,页四四)。伯希和认为,原信中并未提到“克烈”之名,可能是 Bar Hebraeus 所添补(见《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二〇八;格鲁塞:《草原帝国》,页二四五)。

完全可能的；而且，后来克烈部的确是信奉基督教的。据信中所说，当时的克烈部民竟有二十万人，这当然不是可靠的数字，但也可以想见此部势力之大了。

辽、金汉文史料中没有记载“克烈”这个名称。《辽史》把窝鲁朵城和镇州一带的属部通称为阻卜。见于记载的阻卜酋长名字很多，其中有些显然是官号，如挾刺干、塔里干，即 Tarqan（突厥之达干，蒙古之答剌罕）的译音；有些则可能是部名——在北方民族中，以酋长的名字或官号作为部落名称是常见的。但要把它与克烈或其他部名勘同还很困难<sup>①</sup>。值得注意的是《辽史》提到的“达旦国九部”一名。保宁三年（九七一年），辽廷任命耶律速撒为“九部都详稳”（一作“西北路管押详稳”），出镇西北路。其所征讨招徕的都是阻卜部落，可见所谓“九部”应是“阻卜九部”。速撒死后，西北边仍未绥服，九九四年，又命萧挾凛为“阻卜都详稳”（一作“西北路招讨使”），佐皇太妃“抚定西边”。据当时降宋的辽供奉官李信报告说，萧挾凛与齐妃（即《辽史》所载皇太妃）屯兵于驴驹儿河（今克鲁伦河），“西捍鞑靼，尽降之。”<sup>②</sup>萧挾凛讨平和招服“阻卜”诸部后，奏建三城以镇之，统和二十二年（一〇〇四年）置为镇、防、维三州。三城遗址均在今喀鲁哈河旁，其地正当怯绿连河之西，与李信的报告很符合。在《辽史·圣宗纪》中，有统和二十三年（一〇〇五年）“达旦国九部遣使来聘”的记事，当与镇州的建置有关。这个所谓“达旦国”，实际上就是镇州地区的阻卜部落<sup>③</sup>。那么，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当是阻卜—达旦九部了。这可以使我们联想起唐代后期就活动在这一带的“九姓达怛”。

① 前田直典认为，《辽史》所载阻卜夷离董阿里睹、阻卜阿离底，可能就是《史集》所载克烈分部 Aliat。见所著《十世纪时代的九族达靼》，《元朝史之研究》，页二五五。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五。

③ 《辽史·圣宗纪》载，开泰二年正月，“达旦国兵围镇州，州军坚守，寻引去。”同书《萧图玉传》记此事云：“阻卜复叛，围图玉于可敦城，……图玉使诸军齐射却之。”

开泰元年(一〇一二年),西北路阻卜石烈太师阿里底杀节度使叛乱,“西奔窝鲁朵城”。次年,叛部进攻镇州(可敦城),招讨使萧图玉指挥守军射却之,遂退屯窝鲁朵城(《辽史·萧图玉传》)。据此则窝鲁朵城应是这些“阻卜”(达旦)部落的根据地。大安八年(一〇九二年),被辽朝任命为“阻卜诸部长”的“北阻卜”首领磨古斯反,击杀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挾不也于镇州西南沙磧间。磨古斯的根据地大约也就在镇州西南的窝鲁朵城一带。磨古斯之乱直到一一〇〇年才被镇压,磨古斯被捕送辽廷处死。磨古斯是一个基督教名字(《辽史》中还记有另一个比磨古斯早几年的阻卜酋长余古赧,也是基督教名字)。据后来的史籍记载,当时居住在鄂尔浑上游一带而又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是克烈部。十二世纪下半叶的克烈部首领王罕的祖父,就名叫马儿忽思(Markus)。《史集》记载说,他在与塔塔儿部首领纳兀儿盃禄汗的战争中被俘,并且被献给女真皇帝处死了。这个马儿忽思应该就是《辽史》所载的磨古斯。王罕与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同辈,在成吉思汗出生前后,他就已经是强大的克烈部首领了。因此,他的祖父应是十一世纪末的人物<sup>①</sup>。拉施都丁根据十三世纪末蒙古人的口述追叙各部族历史,很可能将契丹误为女真了。而且,据《史集》记载,王罕之父忽儿扎胡思卓帐于窝鲁朵城,这和辽代阻卜—达旦九部的地域也是一致的。看来,克烈人很可能是最早西迁的室韦—达怛部落——九姓达怛的后裔。他们在几个世纪中与突厥语族部落杂居,因而在风俗、语言等方面受到突厥族的强烈影响,其社会发展水平较其他蒙古部落先进,到十二世纪时已有初具规模的国家机构了。

### 札剌亦儿部

札剌亦儿部(Jalair,又译押剌伊而、札剌儿)就是《辽史》的“阻卜札剌

---

<sup>①</sup> 参阅冯承钧:《辽金北边部族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一九五七年版;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二〇六。



部”。拉施都丁说：“此部在古代是人数众多的，他们的每一支都有官长和首领。……他们的营地一部分在斡难河（今鄂嫩河）地区”<sup>①</sup>。这和《元史·木华黎传》所载其祖先“世居阿难水东”正相符合。拉施都丁在另一处又说到，这些“名为札刺亦儿的蒙古人”居住在怯绿连（今克鲁伦河）之地<sup>②</sup>。那么，确切地说，札刺亦儿部的主要分布地域应在斡难河以南到怯绿连河中上游一带。

札刺亦儿人应是较早西迁的一支室韦—达怛部落，他们有一部分曾服属于回鹘可汗。《史集》记载，札刺亦儿部由十大分支组成，每一支都有很多人民<sup>③</sup>。居住在斡难河和怯绿连河地区的札刺亦儿部落组成为七十“古列延”（güreyen）——据拉施都丁解释，那时每个古列延由一千个车子组成，据此知此部应有七万车。

拉施都丁详细记述了导致札刺亦儿部毁灭的一次重大事件：

“怯绿连河邻近契丹之境，契丹人经常与他们及其他蒙古部落作战。有一次契丹出动大军袭击他们。当札刺亦儿人看到这支军队时——其间隔着怯绿连河，附近无浅滩可涉——，以为契丹人无法过河，就摇手挥帽地以嘲弄的口吻呼喊：‘请过来抢掠我们的牲畜吧！’契丹军队为数极多，他们收集枯枝干柴，即于当夜填成一条坝，渡过了河。契丹人屠杀了如此之多的札刺亦儿人，直到只有鞭子高的儿童；并且抢掠了他们的用具和牲畜。全部札刺亦儿人只有为数七十车的一帮人，因处于敌人未能达到的一侧，才得以脱逃出来，带着妻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九二。

② 同上书，第一卷第二册，页一八。

③ 十支名称：一为 Jāt，似可校正为 Chāt > Chaghat，即《元史·忙哥撒儿传》之“察哈札刺儿氏”；一为 Tūqurāūn，即《元朝秘史》第一二〇节之“脱忽刺温”；一为 Dōlāngqūt，即《圣武亲征录》之“朵郎吉札刺儿部”。其余七支为 Qungqasāūt, Kūmsāūt, ūyāt, Nīlqān, Kūrkin, Tūrī, Shangqūt。见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九三；波斯文刊本页一三二。

儿游牧到了土敦篾年之妻莫挈伦的住地……”<sup>①</sup>。

他接着叙述这些札刺亦儿残部与莫挈伦发生争执,杀死了她和她的一家。后来,幸免于难的莫挈伦幼子海都(据《元史·太祖纪》,海都为莫挈伦长孙)起兵复仇,杀尽札刺亦儿部男人,将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做了奴隶。这就是札刺亦儿人沦为蒙古部奴隶的经过。海都是成吉思汗的六世祖,那么这件事大约发生在十一世纪初。辽圣宗统和年间(九八三至一〇一二年),耶律速撒和萧挾凛相继征伐“阻卜”诸部,屡以捷闻。对札刺亦儿人的残酷屠杀可能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 篾儿乞部

篾儿乞部(Merkit,又译篾里乞,灭里吉)也应属于蒙古语族。这个名称出现于十一世纪末,《辽史》中写作“梅里急”(一作“密儿纪”)。辽道宗大安八年(一〇九二年)北阻卜(克烈部)酋长磨古斯之乱时,此部大约也参与了反辽斗争。寿昌二年(一〇九六年),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斡特刺讨梅里急,破之。次年,其酋长忽鲁八降,请复旧地,仍贡方物。他们的居地在鄂尔浑河、色楞格河下游一带<sup>②</sup>。《元史》卷一三四《阔阔传》说,篾儿乞部族“世居不里罕哈里敦之地。其俗饶勇,善骑射,诸族颇惮之。”不里罕哈里敦即不儿罕山(今肯特山),据此则篾儿乞人在蒙古兴起以前,势力曾达到不儿罕山地区,并且是漠北强部之一。《史集》记载:

“他们(篾儿乞人)也被称为兀都亦惕。虽然有一些蒙古人把篾儿乞惕叫做篾克里惕(Mekrit),但这两个名称意思一样。……

“这个兀都亦惕—篾儿乞惕部落<sup>③</sup>分为四支:兀洼思、麦古丹、脱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八至一九。土敦篾年,《元朝秘史》作篾年土敦,《元史》作咩撚笃敦,为成吉思汗八世祖。

② 见《元朝秘史》第一〇五、一一〇、二一九等节。

③ 《史集》另一处(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一一)谓兀都亦惕系篾儿乞人之一支,与《秘史》同。可能兀都亦惕是篾儿乞人中的统治氏族,故此处将它也看成篾儿乞人的总名称。克拉普罗特(Klaproth)曾提出,此名与色楞格河左支流乌达河(uda)有关,当非虚构,但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参阅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二七四。

脱怜、察浑<sup>①</sup>。这个部拥有人数众多的极为好战而强大的军队。〔篾儿乞人〕——是蒙古人诸部的一部分。”

关于篾儿乞部的古史,除上述资料外,我们就很少知道了。关于此部的族属问题,有人认为他们是留在漠北的回纥小部与其他种族混合而形成的新部,有人则倾向于不肯定他们是突厥语族或是蒙古语族<sup>②</sup>。其实拉施都丁已明确说篾儿乞是蒙古人的一部分,并将他们与扎剌亦儿、塔塔儿等部归为一类,《辍耕录》也将他们列在蒙古七十二种之中。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否定元朝人的说法。当然,从分布的地域看来,他们西迁的时间应当比较早些,因此与克烈部的情况一样,无疑会吸收了更多的突厥族成分。

#### 斡亦剌部

篾儿乞部的西北居住着斡亦剌部(Oirat,又译外剌)。《史集》记载:“这些斡亦剌部落的住地是‘八河’。古代在这些河流域住着秃麻人。诸河从此地流出,汇为谦河,而后再流入昂可剌河。……这些部落自古也是人数众多,并分为若干支,每支都分别有一定的名称……尽管他们的语言是蒙古语,但与其他蒙古部落的语言略有不同。……斡亦剌人向来有国王和首领”<sup>③</sup>。《史集》抄本脱落了斡亦剌各部的名称,仅在一处提到成吉思汗时代的该部首领忽都合别乞出于朵儿边部落<sup>④</sup>。《黄金史》(Altan tobči)说,斡亦剌惕包括 Ögölet, Baghatut, Kholghat (Khoit) 和 Dörben—Tümən。《蒙古源流》中,

---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一四)第一支之名译写为 Yūkyr, 误。伊斯坦布尔抄本此名作 ūhar(见波斯文刊本,页二〇五), r 字脱一音点,应为 z, 此部即《元朝秘史》之兀洼思。第二支 Мудан, 可译为 Megüden, 即《圣武亲征录》之麦古丹。第四支 джиюн, 可校正为 Chāūn, 即《元史·牙忽都传》之察浑篾儿乞氏。《元朝秘史》尚载有一合阿惕篾儿乞氏(Qa'at-Merkit)。

② 佐伯好郎:《再论百灵庙附近的景教遗迹》,《东方学报》(东京)第十一册之一;格鲁塞:《草原帝国》页二四六。但多数学者都肯定其为蒙古族。

③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一八。

④ 同上书,页一三八,朵儿边,蒙古语,译言四。

四卫喇特的名称是 Ögölēt, Baghatut, Khoit 和 Kārgūt。此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说法<sup>①</sup>。但这些都是晚出的记载,反映的大抵是明代瓦剌部的组成。总之,斡亦剌部的组成及其来源问题尚待研究。《史集》记载成吉思汗的军队时说:“由斡亦剌部组成的千户有四个(属右翼),但详情不明。当忽都合别乞投降时,按惯例将全部斡亦剌军队归属于他,各千户那颜唯他所命。他死后,这些千户就传给了他的儿子们”<sup>②</sup>。斡亦剌部四千户可能就是以原来的四部落组成的。

据上引《史集》的记载,斡亦剌部居地应在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之源,即今乌鲁克姆河上游地区。《元朝秘史》称他们的居地之名为失思吉思(一四四节;二三九节作失黑失惕),今乌鲁克姆河上游名锡什吉特河,当即其地<sup>③</sup>。

#### 八剌忽诸部

在篾儿乞部之北,今贝加尔湖东西,分布着八剌忽(Barqut,又译巴儿忽惕、八里灰)、脱额劣思(Tö'eles)、豁里(Qori,又译火里)、秃麻(Tumat,又译秃马惕)等部落。拉施都丁说,这些部落被总称为八剌忽,“是因为他们的居地名为八儿忽真隘(Barqujin-töküm),在薛良格河(即色楞格河)的那一面,蒙古人居地的最边缘。”“在那个地区还居住着许多其他部落,如斡亦剌、不剌合臣(捕貂鼠人)、客列木臣(捕青鼠人);另一个被称为森林兀良合的部落,也邻近那个地区。每部都各有首领”<sup>④</sup>。

拉施都丁把八剌忽诸部与札剌亦儿、塔塔儿等蒙古部族归为一类。在

---

① 参阅伯希和:《卡尔玛克史评注》,页六,六四至六五(注六三至六六);班咱罗夫:《关于斡亦剌惕和畏兀儿》,见《班咱罗夫著作集》,莫斯科,一九五五年版,页一八一至一八四。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六九。

③ 培尔勒:《元秘史地名考》,乌兰巴托,一九五八年版(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白音同志译稿)。

④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二一。



《辍耕录》“蒙古七十二种”氏族中,有“八鲁忽歹”。《元史·俺木海传》称他是“蒙古八刺忽歹氏”。在后来形成的布里雅特蒙古族中,有豁里和八刺忽部落;在我国和阿富汗的蒙古族中,也都有巴尔虎部落。可见,八刺忽部也是蒙古语族部落之一。但是,关于此部的起源问题仍然是复杂难明的。据前人研究,八刺忽可能即隋唐时期的拔野古部(突厥碑文作 Bayirqu);豁里应即唐代的骨利干(突厥碑文作 üč—Quriqan,三姓骨利干)<sup>①</sup>。根据汉文史籍记载,拔野古和骨利干都是铁勒人——突厥语族部落。考古学家在贝加尔湖地区(其范围东至巴尔古津河谷,西至安加拉河谷,南至色楞格河下游,北至列纳河上游)发现了许多处文化类型相同的古代遗迹,其中四处有用古突厥文刻写的铭文。这些遗迹(考古学家定名为“库鲁木臣文化”)的时代大致是公元六至十世纪,可以确认是骨利干人的文化。考古发现物证明了他们是属于突厥语族的<sup>②</sup>。有人推测,拔野古和骨利干可能是古蒙古部落<sup>③</sup>,但没有提出较充分的论据。另一种说法是,在回纥政权崩溃后,蒙古部落大批西迁,占据原突厥人居地。其中有一部分迁移到贝加尔湖地区,并同化了那里的突厥部落(和古蒙古部落),这是形成后来的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基础<sup>④</sup>。考古学家在色楞格河下游和列纳河上游都找到了大约是十一世纪中叶的代表典型蒙古游牧部落文化的古墓葬,证明至迟到这个时期蒙古人就已是该地区居民的一部分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可能是这样:后迁来的蒙古人与当地突厥人杂居,逐渐融合而形成新的部落,并且使用了原来突厥部落的名称——八刺忽(拔野古)和豁里(骨利干)。《元史·太祖纪》记载,当莫挈伦一家遭到押刺伊而(札刺亦儿)

---

① 参阅伯希和:《马可波罗注》第一卷,Barqu条;《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二八八,六三至六四。

② A. 奥克拉德尼可夫:《列纳河上游的古突厥文化》,苏联物质文化研究所简报(КСИМК),第一九号,一九四八年。

③ 库德里雅甫采夫等:《布里雅特蒙古史》,高文德译本,上册,页三五。

④ 同上书,页四八至四九。

人杀害时,其第七子纳真正在八刺忽之地某一部民家为赘婿,故不及难。其后纳真将那次灾难中幸免的幼侄海都(莫拏伦的长孙)带到八刺忽之地养育。海都长大后,纳真率八刺忽怯谷部民共立为君,发兵攻押刺伊而部而臣属之,于是势力渐强。海都“列营帐于八刺合黑河上,跨河为梁,以便往来。由是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史集》也记载了这段故事,但略有不同。在《史集》中,纳真是莫拏伦丈夫土敦篾年的兄弟,而海都则是莫拏伦的幼子(参见世系·氏族表);莫拏伦遇难时,他们两人都在怯谷部落为赘婿;攻灭札刺亦儿部后,海都立营于八儿忽真隘,在那条河上立渡以便往来,纳真则立营于斡难河下游之地<sup>①</sup>。这些歧异之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书都记载了蒙古部不仅很早就与八刺忽部有密切的通婚关系,而且有一个时期(海都是成吉思汗六世祖,时代大约在十一世纪初)还以八刺忽之地为根据地,似乎还与八刺忽的一些部落建立过某种联盟。

### 塔塔儿部

塔塔儿部(Tatar)是蒙古兴起以前蒙古高原上最著名的大部,八世纪时,突厥人就是用他们的名称来统称东面的室韦诸部落。按照拉施都丁的说法,因为塔塔儿在古昔曾经十分强大并统治了许多部落,所以其他部落虽然各有自己的名称,也都被统称为塔塔儿。可惜我们对塔塔儿人的光荣古史所知甚少,只是从《史集》中见到有一支塔塔儿部落名为 Tūtūqlūt,“是塔塔儿诸部中最受尊敬的”<sup>②</sup>。Tutuq 即唐朝授与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号“都督”之译音,这个官号也为北方民族所采用,在突厥文碑刻中就是这样写法。Tūtūqlūt 意为“都督之民”,根据这个名称我们可以推测,唐朝时此部首领或曾被授与都督官

---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七至一九。按:怯谷,俄译本作 канбаут,贝勒津刊本作 KNBUT,他将此字校正为 Kiukit。但各种抄本中,第二音节均有 u,故此字实应校正为 KIKUT,即《元史》之怯谷,系八刺忽部中的一个氏族。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〇三;波斯文刊本页一六四至一六五。

号,使其统辖若干部落,久之竟成了部名<sup>①</sup>。

《史集》记载:“〔塔塔儿部〕分为很多支,全部共有七万家。他们的牧地和屯营地是按氏族按分支分别地确定在契丹国境附近,其主要营地在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地方。”“这些著名而荣耀的塔塔儿部落,每一部都有自己的军队和国王,有六部,依序为:

1、秃秃黑里兀惕塔塔儿(Tütüqlīūt-Tatar)

2、按赤塔塔儿(Ālchī-Tatar)

3、察罕塔塔儿(Chaghān-Tatar)

4、阔亦坛塔塔儿(Kūiten-Tatar)

5、迪列土塔塔儿(Terēt-Tatar)

6、阿鲁孩塔塔儿(Aruqūi-Tatar)”<sup>②</sup>。

《元朝秘史》也记载了塔塔儿六部的名称和居住地,部名与《史集》略有不同,居地则完全一致:

1,阿亦里兀惕塔塔儿(Ayiri'ut-Tatar);2,备鲁兀惕塔塔儿(Buiru'ut-Tatar),此部名称当来源于突厥官号“梅录”。此两部居捕鱼儿海子与阔连海子(今呼伦湖)之间的兀儿失温河(今乌尔逊河)地区;3,察阿安塔塔儿(Chaqa'an-Tatar);4,阿勒赤塔塔儿(Alchi-Tatar);5,都塔兀惕塔塔儿(Duta'ut-

---

① 据记载,唐朝贞元八年(七九二年),有室韦都督和解热素等来朝贡,此人应是和解室韦部首领;大和九年(八三五年),有室韦大都督阿朱等来朝贡;开成元年(八三六年),阿朱等复来,贡马五十四;同年,室韦大都督秩虫等来朝贡;会昌二年(八四二年),室韦大首领都督热论等来朝(均见《唐会要》卷九六)。关于 Tutuqliut 即“都督之民”的解释,参见伯希和等:《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五。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〇一,一〇三;波斯文刊本,页一六四(部名之号码系引者所加)。按俄译本第4部译作 Куин,原文为 Ku? IN 或 KUI? N,伯希和认为应校正为 Kūiten,《元朝秘史》第58节有“塔塔儿的阔湍巴刺合”,《黄金史》引录秘史的相应处作“Kūyiten Bargha Baghdadur”,Kūyiten 即此部之名,意为“冷”(河名)。又第6部,俄译本作 Баркуй,另一抄本此名作 NRQUI,伯希和以为应校正为 ARUQUI,因蒙文 N 与 A 易混淆之故。见《圣武亲征录译注》,页八至九。

Tatar),此部应即《史集》之 Tūtūqlī'ūt-Tatar;6,阿鲁孩塔塔儿(Aruqai-Tatar)。此四部居答兰捏木儿格思(今贝尔湖东南之讷墨尔根河地区)①。

塔塔儿部应是《辽史》统称做“阻卜”的诸部落之一,《金史》中则称之为“阻鞑”②。他们臣服和纳贡于辽、金王朝,但其中一些部落时常起而反对辽、金的统治。由于这个时期塔塔儿各部之间经常相互争战,不能统一,因而无法与强大的辽、金王朝抗衡,每次叛乱总是被镇压下去,而以重新臣服告终。另一方面,辽、金又利用他们去征讨和镇压其他属部,使他们互相制约,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 蒙古部

蒙古部的居地在斡难河中上游和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地区,他们是唐代蒙兀室韦的后裔。这一支室韦部落是何时从额尔古纳河故地西迁的呢?《元朝秘史》一开头就说,始祖孛儿帖赤那一家来到了“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山,立下了营盘”。从始祖至成吉思汗共计二十三代,推算起来大约有五六百年,所以有人据此认为,成吉思汗的始祖早在七世纪就迁到斡难河上游。但这种传说并不能作为信史看待,而且把西迁时间上推到那么早是不可能的,因为两《唐书》记载的蒙兀部还在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之东,而不儿罕山一带那时则是铁勒人的地盘。《史集》记述成吉思汗先世,实际上是从朵奔伯颜和阿兰果火开始的。拉施都丁说,从所有蒙古族系中分出朵奔伯颜和阿兰果火这一支,大约有四百年的历史,在此之前,蒙古各部落是没有信史可言的③。他也追叙了朵奔伯颜以前那无可征证的世系,但又说孛儿帖赤那是从额儿古涅昆

① 见《元朝秘史》第五三节,一五三节。

② 《金史》卷九四,《内族襄传》载,承安元年(一一九六年)金军讨伐阻鞑,败之于龙驹河,追至斡里札河,降其部长,勒石纪功而还。此即《元朝秘史》第一三二至一三四节所载金国王京丞相征讨塔塔儿人,追袭至浯勒札河一役。

③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八、十;第一册,页七七。又同书页一〇三谓阿兰果火时代为近三百年,当误。



迁出的一些蒙古部落的首领,并没有指出他们迁住在什么地方。只是在讲到朵奔伯颜和阿兰果火时,才说“他们的营地在斡难、怯绿连、土兀刺三河〔河谷〕,这三条河源出不儿罕合勒敦”<sup>①</sup>。《元朝秘史》虽然一开头将蒙古人的始祖安置于不儿罕山,但也是在讲到朵奔篾儿干(即朵奔伯颜)的事迹时,才真正有他们在不儿罕山活动的记录。而且据载,那时不儿罕山的“主人”(ejen,额毡)是兀良合人,蒙古人大约还是新来者,到后来他们才取代兀良合人成了这个地区的强部。《元朝秘史》所载朵奔篾儿干诸子征服一支兀良合氏族的故事,或许正是这个事件的带有传说色彩的反映。据此看来,蒙古人的西迁应该不会在朵奔篾儿干时代(公元九〇〇年左右)之前很久。

见于《元朝秘史》记载的蒙古氏族约有三十个,除朵儿边氏(Dörben)外,都出于朵奔篾儿干之后,而其中绝大多数又都是朵奔篾儿干死后他的妻子阿兰果火感天光而生的幼子孛端察儿的后裔。这个系统的诸氏族,构成了蒙古部的同族集团。但根据《史集》的说法,凡源出额儿古涅昆捏古思、乞颜两始祖的所有氏族,都称为蒙古人。拉施都丁把所有蒙古氏族分成两大类,一类称为蒙古一迭列列斤(一般的蒙古人),一类称为蒙古一尼鲁温(纯洁出身的蒙古人)。尼鲁温氏族系指阿兰果火在丈夫死后感受天光所生的三个儿子的后裔。尼鲁温(niru'un)的意思是“腰”,据拉施都丁解释,这表示他们是出自阿兰果火的纯洁的腰和肚,意指系由天光所生<sup>②</sup>。《史集》所载蒙古一尼鲁温氏族,大体上就是《元朝秘史》记载的蒙古氏族;阿兰果火感天光生子的传说,二书也相同。

《史集》所载蒙古一迭列列斤诸氏族,成分则比较复杂。可分为下列几组来说明:

1. 兀良合(Uriangqat)。据说,此部是原始捏古思族的分支,曾参与扇火

<sup>①</sup>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十。

<sup>②</sup>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五二;第二册,页一五。

熔铁打开通路,从额儿古涅昆迁移出来。另外有一个居住在八儿忽真隘的“森林兀良合部”,则不是“本来的”蒙古人,与前者有别。《元朝秘史》中说到兀良合部的一个氏族原是不儿罕山的“主人”,后来被蒙古部征服,成了世袭奴隶<sup>①</sup>。兀良合可能就是《辽史》中的斡朗改部。

2. 弘吉剌(Qonggirat)及其分族亦乞列思、斡勒忽讷兀惕、哈刺讷兀惕、豁罗剌思、燕只斤。《史集》记载,弘吉剌部也源出额儿古涅昆两姓祖先。在迁出额儿古涅昆时,他们抢在前头,踩了别部的灶,因而病脚,为此他们受到其他蒙古人的鄙视。同书还记载了另一种传说,说上述弘吉剌诸氏族都是出于“黄金壶”三兄弟的后裔。“黄金壶”喻其天生聪明,品性完善,仪态端方。这后一种传说似乎又表明他们与蒙古部有不同的起源。

辽末金初,耶律大石在漠北立国,曾征兵于十八属部,其中有王纪剌部,即弘吉剌。这是弘吉剌部名见于记载之始。在《金史》中,写做广吉剌。《史集》记载,弘吉剌诸氏族的居地“在哈刺温只敦(今大兴安岭)的那一面”<sup>②</sup>。据《金史》和《元朝秘史》的资料,此部分布范围大抵北至今海拉尔河和额尔古纳河上游,南边至哈拉哈河、乌拉根果勒一带。其地域与辽代的乌古部相当<sup>③</sup>。据辽代史料,乌古(于厥里)“凡事与蒙古里国并同”(《契丹国志》),说明乌古与蒙古应是族属相同的部落。从地域上看,辽代的乌古部可能包含有后来的弘吉剌、亦乞列思等部落。

3. 许兀慎(Hü'üshin),速勒都思(Suldus)及其分族亦勒都儿斤,伯牙乌(Baya'ut)及其分族札台,轻吉惕等族。《史集》将这些氏族都列在蒙古一迭列

---

① 据《元朝秘史》,兀良合部的札儿赤兀勒氏族是被孛端察儿(成吉思汗十世祖)兄弟所虏的。《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则云:“其先世猎于斡难河上,遇敦必乃皇帝(成吉思汗高祖),因相结纳。至太祖时,已五世矣。”所谓结纳,就是归附或被征服。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六〇。

③ 参阅津田左右吉:《乌古敌烈考》,《满洲朝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第二;箭内互:《鞑靼考》,《满洲朝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第五。

列斤一类,但关于他们的起源却很少记载。我们只知道,早在成吉思汗兴起以前,速勒都思、伯牙乌等氏族的一部分已成为蒙古部贵族的附属民。传说朵奔篾儿干用鹿肉换了一个“马阿里黑巴牙兀惕”氏族的小孩为仆人,后来成吉思汗亲族的奴隶中的大部分伯牙乌人都是这个小孩的后裔。《史集》说,伯牙乌人分为许多支,其著名者有二支,一称草原伯牙乌人;一名札台,这是蒙古之地的一条河谷,系因地得名。他们的居地在薛良格河下游。后来成吉思汗将这个地区封给速勒都思部的宿敦那颜(锁儿罕失刺之孙),于是这两部人遂交错居住在同一地区<sup>①</sup>。

4. 斡罗纳儿(Oronar)及其分族晃豁坛、阿鲁剌、嫩真。《史集》仅谓这些氏族出于三兄弟,但未详其氏族起源。据《元朝秘史》(第四七节)载,海都第三子抄真斡儿帖该的儿子们,成了斡罗纳儿、晃豁坛、阿鲁剌、雪你惕、合卜秃儿合思、格泥格思六氏族。《元史》也说阿鲁剌氏始祖为孛端察儿<sup>②</sup>。据此则这一组氏族应属尼鲁温蒙古,不当列入迭列列斤。

5. 阿兰果火与朵奔伯颜所生的两个儿子——别勒古讷台与不古讷台的后裔,成为别勒古讷惕、不古讷惕氏族。按《史集》说法,他们也属于迭列列斤。

此外,《史集》在叙述札剌亦儿部时,也说此部出于迭列列斤。但在迭列列斤氏族表中,并无札剌亦儿。

上述几组迭列列斤氏族,除弘吉剌人自成一独立而强大的集团外,其他多数是蒙古部贵族的附属民。

总的说,在十至十二世纪的蒙古高原上,从杭海岭以东直到哈刺温山(今大兴安岭),都成了蒙古语族部落的地盘。当然,西迁的蒙古语族各部无疑都

<sup>①</sup>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七五至一七六。

<sup>②</sup> 《元史》卷一一九,《博尔术传》。按:此传本于阎复所撰之《太师广平贞宪王碑》(《元文类》卷二三)。

或多或少吸收了留居当地的突厥语族人口,因而蒙古人自身的语言、习俗、经济生活等方面也受到后者的强烈影响,发生了很大变化。

### 乃蛮部

这个时期,在蒙古高原西部有一个势力强大的游牧部落——乃蛮部(Naiman,又译乃满,奈蛮),即《辽史》中的粘八葛,《金史》中的粘拔恩。辽大安年间,此部首领可能在北阻卜(克烈)酋长磨古斯之乱时,也曾举兵反辽,后来向西北路招讨司归降,“仍贡方物”。金朝前期,乃蛮臣属于西辽。至大定(1161—1189年)年间,其“君长”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长孛古请求归附金朝,“乞纳前大石(西辽——引者)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sup>①</sup>

据《史集》记载,乃蛮人一部分住在山地,一部分住在平原。其居地以按台山为中心,西至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和阿雷、撒刺思河(今鄂毕河上游支流);北与吉利吉思接界;东与克烈部为邻;南面包有今黑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隔沙漠与畏兀儿为邻<sup>②</sup>。

多数学者认为,乃蛮人应属突厥语族。但关于乃蛮人的起源,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仅《元史·地理志》在讲到吉利吉思部的住地(谦河)时插了一句:“相传乃满部始居于此”。据此推测,他们可能是唐后期南下的一支黠戛斯部落<sup>③</sup>。

乃蛮人也分为许多部。拉施都丁提到一个接近乃蛮、壤地毗连的别

---

① 《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韩奴传》。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三六至一三七。

③ 《史集》中有一段说:“在成吉思汗与乃蛮人为敌以前,乃蛮人的国王是亦难赤·必勒格·卜古罕。……卜古罕是古代伟大的皇帝,畏兀儿人和其他部落都以充分的尊敬纪念他。并传说:他是从一棵树上诞生的”(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三九)。有些学者据此认为乃蛮人可能是回纥的分支(植田清二:《乃蛮小考》;村上正二:《蒙古帝国成立以前的各游牧部落》,《东洋史研究》第二三卷第四号,一九六五年)。但《史集》中有关卜古罕一段,显然是拉施都丁将当时畏兀儿人的祖先传说混杂到乃蛮一节中,实际上与乃蛮人的起源无关,不能作为根据。



帖乞部<sup>①</sup>。据说,此部国王合的儿不欲鲁罕及其祖先的王国比王罕、太阳罕及其他克烈、乃蛮诸罕的王国更大,更强。在漠北各部中,乃蛮人比其他部落先进。他们吸收回鹘文化,较早就建立了国家机构。

谦河(叶尼塞河上游)流域,仍然是吉利吉思人的地方。吉利吉思东南的乌思、憾哈纳,西南面的帖良古,客思的音等部,也是突厥语族部落<sup>②</sup>。这些部落住在今东萨彦岭直到额尔齐斯河的森林地区,蒙古人统称之为“林木中百姓”(Hoi-yin irgen)。

### 汪古部

大漠之南也分布着许多突厥、蒙古部落。十世纪前期契丹兴起后,分布在幽州塞外的黑车子室韦部(《契丹国志》卷一太祖纪作“七姓室韦”)即被征服。《辽史》从穆宗以后就不再见有黑车子室韦的记载。辽朝常以被征服各部落人组为部族军,遣戍边境地区,其中以室韦户置者有突吕不室韦部(以大、小二黄室韦置)、涅刺越兀部、室韦部等,黑车子室韦部可能有很多人户被编入,因而逐渐失去原来的名称。又据同时代宋人记载,辽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白塔子古城)之西,奉圣州狗泊(在今内蒙古太仆寺旗南)之北,都分布着鞑靼部落<sup>③</sup>。这一带原是黑车子室韦(七姓室韦)的居地,这些鞑靼部落中当会有他们的余部。

漠南诸部中最著名的是阴山地区的白达达(白鞑靼),即汪古部。白达达的名称最早见于辽末,是辽的属部,其首领官号详稳(辽大部族官),驻在阴山北的黑水(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旗艾不盖河)之地。辽亡后归附金朝,为金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三九至一四〇。俄译本此名作 Тикин,波斯文各种抄本此名前二字母写法不一(见校勘本页三〇五),韩儒林校正为 Betekin,以为即《辍耕录》之“别帖乞乃蛮歹”氏族,见《蒙古氏族札记二则》,《穹庐集》页五三。

② 关于这些部落的住地及其族属,参见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诸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二期,一九七八年。

③ 见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二四,《北蕃地理》。

诸部乱军之一。《史集》记载：“这些汪古部落在成吉思汗时代及其以前，属于中国阿勒坦汗（即金朝皇帝——引者）的军队和臣民之列。此族是独特的一种，〔仅〕与蒙古人相似；他们有四千车帐。中国皇帝阿勒坦汗为了防御蒙古、克烈、乃蛮和这一带游牧民，修了一道长城，蒙古语称为 ANKW(Önggü)，……当初就将这长城委付给汪古部，命其守卫。”<sup>①</sup>汪古部的得名，可能与此有关。成吉思汗攻金时，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献关，引蒙古军入境。“忽里”应即金朝官号“忽鲁”（“总帅”之意），为统领数部的部族长。

关于汪古部的族源，有沙陀突厥说、回鹘说、达怛说、党项说等四种说法<sup>②</sup>。元代汪古部统治家族自称是唐末沙陀贵族李克用的后裔，汪古部在元代被认为是色目的一种，加上近几十年发现的汪古贵族墓碑都是用古叙利亚字写的突厥语，这些都证明汪古部（至少其主体部分）应是突厥语族。但阴山地区居民的种族成分历来很复杂，九世纪前期，在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云州（今山西大同）塞上杂居着党项、室韦、沙陀、吐谷浑诸族人，回鹘汗国被灭后又有大批回鹘人南迁近塞，虽然不久就溃散瓦解，但必有余部留居在阴山地区。唐末五代以至辽金时期，阴山诸部往往被泛称为“鞑靼”，实际上并非纯粹的室韦—达怛人。在各族长期杂居的情况下形成的汪古部，应包含有几种不同的种族成分，不过因为这个地区传统上突厥文化的优势，其他民族人口进入这里后，渐渐地都突厥化了。

## 第二节 蒙古各部的社会状况

### 一 经济生活

关于蒙古各部的前身——室韦—达怛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史书上只有很

---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四〇。

② 参看周清澍：《汪古的族源》，载《文史》第十辑，一九八〇年。

简略的记载。《魏书·失韦传》说他们“颇有粟麦及稌,唯食猪鱼,养牛马,俗又无羊。夏则城居,冬逐水草,亦多貂皮。……用角弓,其箭尤长。……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曲酿酒。”室韦有许多部,这里笼统地说说的情况,大概主要是指“国土下湿”即靠近嫩江的那些部落。《隋书·北狄传》则分部记述,所载南室韦的情况,与《魏书》略同而加详,补充了“乘牛车,簾篠为屋,如突厥毡车之状。渡水则束薪为栈,或以皮为舟者。”以及婚姻以牛马为聘等内容。其所增北室韦一段说,此部“分为九部落,绕吐纥山而居。……气候最寒,雪深没马。冬则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冻死。饶麋鹿,射猎为务,食肉衣皮。……地多积雪,惧陷坑阱,骑木而行。俗皆捕貂为业。冠以狐貉,衣以鱼皮。”又其北之钵室韦,“用桦皮盖屋,其余同北室韦。”西北之大室韦,“径路险阻,……尤多貂及青鼠。”从这些记载看来,室韦人的主要生产活动是狩猎,尤其是西北各部,基本上是森林狩猎部落。两《唐书》对西部室韦各分部的名称及其居住地域有较详细记载,但关于室韦人的经济生活,除《旧唐书》说俱轮泊之东的塞曷支部“出良马”以外,就没有新内容了。不过,今呼伦贝尔湖的周围地区是良好的牧场,从历史上看,东汉时居住在这里的鲜卑人就已经从事游牧业了<sup>①</sup>,唐代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室韦部落不至于完全不从事游牧经济。

九世纪中叶以后,大批室韦—达怛人迁进漠南北各地。无边无际的良好草原,为游牧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而原来突厥居民发达的游牧经济,又可做他们效法的榜样。辽、金时代,大漠南北部落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更加密切。辽代在漠北地区建立城市,开辟屯田,大批汉人、契丹人和女真人迁居漠北,先进的经济、文化影响,无疑会深深渗透到蒙古各部中去。辽统治者曾屡次下令“禁鬻生、熟铁于阻卜等界”,这正可以说明,当时已有为数不少的铁器输入蒙古部落。金初铁禁放松,铁就更大量地北流。这对蒙古各部社会

---

<sup>①</sup> 参阅郑隆:《扎赉诺尔古墓群》,《文物》一九六一年第九期;《考古》一九六一年第一、二期。

经济和武装力量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分布在哈刺温山(今大兴安岭)至按台山(今阿尔泰山)的草原地带诸部落,包括弘吉剌、塔塔儿、札剌亦儿、蒙古、克烈、篾儿乞、乃蛮等部,称为“有毛毡帐裙的百姓”,即游牧民。他们主要从事畜牧业,饲养马、牛、羊和骆驼。牲畜的肉和乳是他们的基本食粮,以羊肉为主,牛次之,马则很少杀以为食,因为马不但是他们生活资料的来源,还是游牧和作战的重要工具。《蒙鞑备录》记载:“其为生涯,只是饮马乳以塞饥渴,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出入只是饮马乳,或宰羊为粮。故彼国中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谓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羊、马两项是游牧经济的主要标志。此外,他们用牛马粪做燃料,用羊油点灯,衣着和居室(毡帐)的原料也主要依靠牲畜的毛皮。

游牧民的生产方式是“逐水草放牧”,“皆以黑车白帐为家”<sup>①</sup>。大群牲畜不可能长年在有限的同一地点放牧,因此他们必须经常迁徙。每年四月草青时,就起移,为各类牲畜寻找适合的牧场:“挨着山住下呵,咱每放马的得帐房住;挨着涧住下呵,咱每放羊的、放羔儿的喉咙里得吃的”<sup>②</sup>。四至八月是他们放牧的黄金季节,由于秋季牧草结实,羊马上膘,所以到秋天便羊马肥壮,即所谓“秋高马肥”。冬季,就必须迁到向阳背风比较暖和的地方下营,即所谓“水北山南好渡冬”。诗人这样描写蒙古人的迁徙活动<sup>③</sup>:

“北方毡车千万辆,健牛服力骆驼壮。

清晨排作雁阵行,落日分屯夹毡帐。

辙分古道辨东西,白雪黄云不可迷。……

两轮奔奔如日月,经年辘轳何日歇?

辗教沙草绿还枯,几过河冰冻仍裂。……”

① 《长春真人西游记》。

② 《元朝秘史》第一一八节。

③ 陈宜甫:《毡车行》,《秋岩诗集》。



迁徙时,他们将拆下的毡帐以及家庭衣着用具置于车上,用牛牵引。草原游牧民大概很早就使用车子了。铁木真与王罕分裂时,派人责备王罕的背信弃义说:“我与你如车的两辕,一辕折了呵,牛拽不得;如车的两轮,一轮坏了呵,车行不得”<sup>①</sup>。可见车子在游牧民生活中有与毡帐一样的重要性。

当他们在宿营地屯驻时,将车子围成一圈,毡帐分布圈内,就是诗中说的“落日分屯夹毡帐”,蒙古语称之为“古列延”(güreyen)。拉施都丁解释说:“古列延的意思是这样:当许多车子在草原上按环形排列成一圈时,就称为古列延”;“古列延意为圈子。古时候,当某一部落在某地停留时,就〔列成〕像圆圈一样,部落酋长住在这圆圈的中心,如同圆心。这就称为古列延。现在,当敌军临近时,他们〔蒙古人〕为了不使敌人和异族人钻进阵内,也列成这样的形式”<sup>②</sup>。《元朝秘史》这个词译为“圈子”,其动词形式则译为“扎营”、“下营”,实际上就是古代蒙古人在游牧或打仗行军时的屯营形式<sup>③</sup>。它存在的时间似乎很长,蒙古国家建立以前,一个氏族或一家贵族率领他的属民迁移,都称为“一圈子”<sup>④</sup>。蒙古国家建立以后,游牧民的这种屯营形式也还存在(如上引诗中所描述的那样)。或者把它作为与个体经济相对立的氏族公有制经济形式来理解,则只是一种推论。看来,“古列延”与所有制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sup>⑤</sup>。

虽然是逐水草而迁徙,但各部、各氏族的牧地也是有一定范围的,即《史记·匈奴传》所谓各有分地,蒙古语称为“农土”(nuntuq),《元朝秘史》译作“营盘”,《元史·特薛禅传》译作“经界”。《史集》记载说,塔塔儿人的牧地和

---

① 《元朝秘史》第一七七节。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八,八六至八七。

③ 《黑鞑事略》载蒙古军队下营时,其哨马之营,“主者中据,环兵四表”,就是记的这种布营方式。

④ 《元朝秘史》第一二〇,一二二节。

⑤ 参阅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内蒙古大学学报》一九六二年第一期,页一一,注③。

“营盘”(突厥语 yurt)是按部落及其分支分别地确定的;札剌亦儿人因进入莫挈伦的营地掘草根而食,破坏了牧场,结果引起一场战争。《史集》《部族志》中,对各部的“营盘”所在地往往有详细的记述。根据《元朝秘史》,兀良合部的哂赤伯颜是不儿罕山的“主人”,好像这里原是兀良合人的“农土”,后来蒙古部迁到这里,占了这块地方。经过若干代到成吉思汗时,便把这“三河之源”视为蒙古人祖先以来的营盘草地,反说“休教他人占了”。

狩猎在蒙古游牧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元朝秘史》记述了许多狩猎活动和集体围猎的故事,说明这也是蒙古人获得生活资料和增加财富的手段。蒙古乞颜氏贵族阿勒坦等人拥戴铁木真为联盟首领时,立下盟誓说:“多敌行俺做前哨,但掳得美女妇人并好马都将来与你;野兽行打围呵,俺首先出去,围将野兽来与你。”<sup>①</sup>铁木真为了笼络照烈部,与泰赤乌氏贵族争夺部众,在与照烈部联合打围时,“使左右驱兽向照烈,照烈得多获以归”,由是感激而来投<sup>②</sup>。狩猎的季节大抵在秋末和冬天,“凡打猎时,常食所猎之物,则少杀羊。”“猎而得者曰兔,曰鹿,曰野彘,曰黄鼠,曰顽羊,曰黄羊,曰野马,曰河源之鱼”。<sup>③</sup>儿童从三岁起就用绳子系在马鞍上“从众驰骋”,四五岁便能挟小弓短矢,长大后时常狩猎,因此都精于骑射。丘处机说蒙古人是“且牧且猎”,即使在游牧经济比较发展的条件下,狩猎也是很重要的补充。

放牧和狩猎是男子的事,妇女的职责则是调整幌车,建立或撤除帐幕,挤牛奶,制造乳酪,剪羊毛,织线,缝制衣服、毛毡等<sup>④</sup>。据赵珙记载,蒙古军出征时多带妻孥,用以管行李、钱物;其妇女“专管张立毡帐,收卸鞍马、辎重、车驮等物事”<sup>⑤</sup>。可见她们在游牧经济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① 《元朝秘史》第一二三节。

②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③ 《黑鞑事略》。

④ 《卢布鲁克行记》,柔克义英译本,页七八。

⑤ 《蒙鞑备录》。

制造畜牧业和狩猎的工具以及生活用品,需要简单的手工业,如木工、车工、铁工等。十二世纪时,蒙古各部中已有专门从事这些行业的人。手工业产品主要是车、马具、弓箭、刀剑、甲冑等等。《史集》记载,兀良合人是善于锻铁的。《元朝秘史》也说到一个兀良合人名叫扎儿赤兀歹老翁,背着锻铁的风箱来到铁木真家,他大概是专干铁匠的行当。由于车在游牧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蒙古人的造车手工业是很发达的。《史集》在讲到蒙古各部的人数时,总是说他们有多少车,如札剌亦儿部有七万车,蒙古部屯必乃的后裔每一支都计达三万车帐。从车数之多,可以想见游牧经济的发展兴旺。铁木真第一次被推举为蒙古乞颜氏的首领时,曾分配一个那可儿专门掌管整治车子,可见在此之前,已有专事造车的工匠。总的说来,蒙古人的手工业虽有发展,但门类还是很有限的。简单的武器<sup>①</sup>和生活用品(如毛毡等),一般是个体家庭的牧民自己制造的,就是说还和畜牧经济结合在一起。因此,在成吉思汗侵略别国时,特别注意搜罗工匠。据东西旅行家的记载,此后在蒙古国内从事手工业的大多数是外族人。

游牧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交换和贸易的进步。《契丹国志》载,当时于厥(乌古)、蒙古里、达打(达旦)诸国经常以“牛、羊、驼、马、皮毳之物与契丹为交易”,《辽史》中也不断有漠北各部入贡牛羊马驼的记录,而且数量很大。这说明,从十世纪以来,蒙古各部已拥有大量剩余牲畜及畜牧业产品,可以作为商品与其他部落和民族进行交换。古代蒙古社会显然还没有出现货币,贸易主要是物物交换。虽然他们在与辽、金的贸易中接触和得到一些铜、铁钱,但并不做货币使用,而为的是熔为金属原料。当时蒙古人不善于经商,游牧民和定居农业人民之间的贸易很多是由中亚商人掌握的。他们不但经常来往于乃蛮、克烈、汪古等部,还深入到额尔古纳河的山林地带从事贸易。直到蒙古国

---

<sup>①</sup> 《元史》卷一二三《布智儿传》说其父纽儿杰“善骑射,能造弓矢。尝道逢太祖前驱骑士别那颜,邀与俱见太祖,视其所挟弓矢甚佳,问谁为造者,对曰:‘臣自为之’”。

建立以后,蒙古人还“无一人理会得贾贩”,诸王、公主们只将银子交给回回人去做生意或放债,坐得利息<sup>①</sup>。

蒙古草原之北,东起大泽(今贝加尔湖)之东,西至也儿的石河岸,属于森林地带。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有森林兀良合、八刺忽、豁里、秃麻、不刺合臣(捕貂鼠者)、克列木臣(捕青鼠者)、斡亦刺、乌斯、帖良古、客失的迷等部落,蒙古人称他们为“槐因亦儿坚”(Hoiyin irgen,林木中百姓)。色楞格河之北的部分篾儿乞人和鄂嫩河之北的部分蒙古人,也属于森林部落。

林木中百姓主要从事狩猎业。拉施都丁描述森林兀良合部的生活状况说,他们居住在森林中,没有屋室和帐篷,住的是用树枝架设、覆盖桦树皮的棚子。穿的是兽皮,吃的是野牛、野羊肉,从不放牧牛羊,并且把牧羊看成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在转移营地时用山牛驮载衣着用具,但终年总是在森林中活动,饥渴时则割开桦树皮,取其汁为饮料。因为其地山多林密,积雪很厚,冬季出猎时,他们使用一种滑雪板,名为“察纳”,系在脚下,在山林中追逐野兽极为快捷。猎获物则置于雪橇上,运送很方便<sup>②</sup>。《元史》所记撼合纳部的生活状况与此类似:“其境……山水木樾,险阻为甚,野兽多而畜字少。贫民无恒产者,皆以桦皮作庐帐,以白鹿负其行装,取鹿乳,采松实,及鬪山丹、芍药等根为食。冬月亦乘木马出猎。”木马就是滑雪板,吉利吉思人也用这种工具雪地逐猎。据上引资料,采集经济在狩猎民的生活中还很重要。

林木中百姓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要比草原游牧民低。他们中也有一部分转向游牧生活,《元朝秘史》记载,豁里、秃麻地面(今贝加尔湖地区)有一支氏族,因捕猎貂鼠、青鼠受到本部的禁约,迁移到了不儿罕山来,从事游牧。这大概是反映了因为野性资源有限,森林民不得不采取某种保护措施,从

① 《黑鞑事略》。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二三至一二四。



而促使一部分人离开森林迁向草原。从历史上看,当草原上兴起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时,他们往往就被置于这个政权的统治之下。

## 二 社会组织 and 阶级状况

蒙古族和其他民族一样,经历过漫长的原始社会时代。从蒙古祖先传说看来,他们在很早的古代就已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阶段,虽然在某些方面仍保存着母权制的残余。

拉施都丁说,传说中蒙古人的两始祖——捏古思和乞颜以及他们的子孙,长期居住在额儿古涅昆山中,生息繁衍着。“他们的每一个分支都有一定的名称,并成为各个斡孛黑(Oboq,姓氏,氏族)。斡孛黑[一词]指的是,那些人是属于一定的骨和氏族。这些斡孛黑又再次生出分支”<sup>①</sup>。《史集》和《元朝秘史》中记载的蒙古诸氏族起源的传说(参见本章末附录《蒙古氏族、世系表》),多少反映了原始氏族的繁衍过程。捏古思和乞颜可能是远古时代的两个氏族名称,从他们一分再分,产生出为数众多的氏族。出于某一个共同父系祖先的若干氏族,称为同骨(牙孙,yasun),彼此算是亲族(兀鲁黑,uruq)。例如,蒙古部各氏族都出于传说的共同祖先孛端察儿,因此他们互为亲族。亲族不能互通婚姻,必须与外族(札惕,jat)通婚。这种族外婚制在蒙古人中保存的时间相当长。拉施都丁还说到,蒙古人自古就有记住自己的出身和家谱的习惯,父母对每一个新生儿童讲述氏族和祖先的故事,用此作为教育的材料。如此代代相传,因而每一个部落都有清楚的谱系,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祖先和部落的来源<sup>②</sup>。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成为最高统治集团后,将自己的家谱追述到二十几代,而且一一列举了出于共同祖先的诸氏族。其他诸部虽然没有保留下像蒙古那样世代相承的世系,但弘吉剌、亦乞列思等氏族有同出“黄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五三至一五四。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三,二九。

金壶”三兄弟的传说,斡罗纳儿、晃豁坛、阿鲁刺等氏族也有同出一家三兄弟的传说。这反映了血缘关系的氏族观念在十二、十三世纪的蒙古人中仍有一定影响。

十三世纪以前蒙古人中保存的古老习惯还有:只有亲族成员才能共同参加祭祀祖先的典礼和推举部落的首领,为亲族复仇,以及长支氏族或长子享有特殊地位等<sup>①</sup>。从上述传说和残存的古老仪式及习俗观念中可以推知,很古时代蒙古人的氏族曾经是全由亲族组成的血缘氏族;那时,财产为氏族所共有,氏族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如同后来被他们鄙视的一个兀良合氏族那样:“无个头脑管来,大小都一般”<sup>②</sup>。

不过,正像符拉基米尔佐夫正确指出的:“十一至十二世纪的蒙古氏族和原始氏族的生活状态是距离得很远的。我们的资料所描写的古代蒙古氏族,和‘氏族’社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sup>③</sup>。变化的契机是蒙古人由狩猎部落转变到游牧部落。随着牲畜的增殖,游牧民提供了越来越多超过自身消费的剩余产品(肉、乳、皮、毛等),可用以和非游牧民族进行交换。日益经常化的交换是私有财产的产婆。游牧经济的发展,首先就冲破了氏族公有制。阿兰果火母亲死后兄弟们分家财的故事告诉我们,牧畜和其他财产已经为个体家庭所私有。家庭——阿寅勒(Ayil,营)成为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父母的财产由子女继承。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富裕家庭的财产日益增长,他们被称为“伯颜”(Bayan,富人)。《史集》记载说,土敦篾年的妻子莫挈伦拥有充足的财富。“每隔几天,她就命令将畜群赶在一起,马和其他牲畜多到不可胜数,从她所坐的山顶到山脚的大河边,都站满了牲畜,以致大地都几乎被畜蹄遮没了”<sup>④</sup>。相反,贫穷的人(yadanggi gü'ün)则往往不得不用自己的子女去换取食物,给

① 参阅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汉译本,页八〇至八六。

② 《元朝秘史》,第三五节。

③ 《蒙古社会制度史》,页一〇〇。

④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八。

富人当奴仆<sup>①</sup>。

强有力的富裕家族很容易控制和奴役其他氏族成员。据《契丹国志》载，辽代漠北的达打(达旦)等部，就是“以部落内最富豪者为酋长”。部落酋长的世袭制早已存在，财富和权力的增长更巩固了这一制度，使他们成为世袭的贵族。辽政府任命这些部落首领为令稳、详稳或太师、大王等官，使他们管辖本部人民，为朝廷征收贡赋，这无疑更加强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这些内、外因素使原来的部落酋长成为统治者——那颜(noyan, 老爷, 官人)，而一般氏族成员则成了他们的属民。通过战争和掠夺，他们又获得了大量财产和奴隶。属民和奴隶就构成为各部落那颜的百姓。以后，他们的子孙每一支都从父祖那里继承了一份财产和百姓，并继续通过掠夺和兼并，扩而大之，形成新的“一圈子百姓”，往往也称为斡孛黑。但这种斡孛黑已不是原始的血缘氏族集团，它的成员包括了统治者家族和被统治的属民和奴隶，而斡孛黑的名称则仅仅是统治者——贵族的“姓氏”。

在这样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原始的血缘氏族瓦解了，代之以由贵族及其百姓——从他族掳来的或投靠来的奴隶和属民以及本族的贫人——组成的新“氏族”。同时也有许多原来有名望的“姓氏”衰微、没落了，依附于另一些强盛的贵族。在不断的分化、改组运动中，出现了几支最强大的贵族集团。我们从蒙古部的传说和历史中可以看出这一幅发展变化的图景。

关于蒙古部各氏族的起源，《史集》和《元朝秘史》的记载不很一致，但大体上，除朵儿边氏、巴阿邻氏和札只刺氏外<sup>②</sup>，都产生于篾年土敦之后。据《元朝秘史》载，篾年土敦(成吉思汗八世祖)有七个儿子，除长子一支外，其余六

---

① 《元朝秘史》第一四节。

② 朵儿边氏，《史集》说是豁里察儿篾儿干的四个兄弟的后人，《元朝秘史》说是朵奔篾儿干之兄的四子的后人；巴阿邻氏，《元朝秘史》说是孛端察儿掳来的妇人所生子的后人，《史集》说他们的起源和朵儿边氏相近；札只刺氏，《元朝秘史》说也是孛端察儿掳来的妇人所生子的后人，《史集》则说他们就是屯必乃第七子的后人。

子的后裔成为十个姓氏<sup>①</sup>，《史集》则说他有九子，除海都一支外，其余诸子史籍缺载，姓名及氏族不详。又《元朝秘史》说海都第三子抄真斡儿帖该的后裔成为斡罗纳儿等六个姓氏，《史集》则将这些姓氏列入迭列列斤蒙古氏族中。根据《史集》，成吉思汗时代还存在的蒙古氏族一半以上是出于屯必乃（成吉思汗四世祖）之后，而在《元朝秘史》中，他们有不少是篾年土敦诸子的后裔。这些记载的歧异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那些消失了的氏族，那些起源不明或甚至被排除在尼鲁温蒙古之外的氏族，已经瓦解分散，沦为别支贵族的属民了。事实上，到十二世纪，蒙古部中最强大的氏族只有泰赤乌氏和乞颜氏。泰赤乌氏（*Tayichi'ut*）<sup>②</sup>的始祖是察剌孩领忽，“领忽”就是辽的部族官名“令稳”；他的儿子名想昆必勒格，“想昆”就是更高一级的辽部族官名“详稳”。看来他们父子世袭担任辽的部族官，因而势力越来越大，成为一支最贵显的姓氏。《史集》记载：另有一种传说，说泰赤乌氏出于纳臣，但据《金册》（*Altan Debter*），他们无疑是察剌孩领忽的后裔。拉施都丁指出：“这个问题之所以混淆，是由于纳臣的氏族和后人也称泰赤乌。我们无须称泰赤乌仅是察剌孩的直系后裔，因为他们是该部的领袖和国王，所以他们的亲族和联合于他们的所有属民，都称泰赤乌，恰如现在所有与蒙古人混合的部落都丧失了他们原来的血统而被统称为蒙古人一样”<sup>③</sup>。

乞颜氏（*Kiyan*）出于屯必乃之子合不勒汗。按拉施都丁的说法，乞颜本是蒙古始祖的氏族，后来氏族分支众多，每一支都有自己的名称，这个古老的名称便消失了。直到合不勒汗时代，“由于他们（合不勒汗家族）全是勇士（把阿秃儿），伟大的、受尊敬的人和国王，因此‘乞牙惕’（*Kiyat, kiyan* 的复数）又重

---

① 篾年土敦幼子纳臣还有两个儿子叫失主兀歹、朵豁刺歹，《元朝秘史》未言其后人成为姓氏，但据《史集》，有失主兀惕、朵豁刺惕二氏族，惟起源与《元朝秘史》所载不同。

② 泰赤乌（*Tayichi'ut*）的名称可能源于汉语“太子”。

③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六，二六。



新成为他们的称号”<sup>①</sup>。从此合不勒汗的子孙便称为乞颜氏。合不勒汗诸子中,长支子孙又形成乞颜·主儿乞氏;次子把儿坛把阿秃儿之子也速该把阿秃儿这一支则称乞颜·孛儿只斤氏。《元朝秘史》记载说:“合不勒合罕的七个儿子中,长子名斡勤巴儿合黑,他的儿子名莎儿合秃主儿乞,成为主儿勤氏。〔因为〕合不勒合罕说:‘是我儿子们中为长的’,就从自己的百姓中选拣有胆量、有气力、刚勇能射弓的汉子给了他。因其有气力有胆量的上头,故名主儿勤。”主儿乞(Jürki,复数为 Jürkin)本来只是合不勒汗长孙的称号,因他拥有从祖父那里继承来的一分最精悍的百姓,才分立出来形成一个单独的姓氏,他的那一“圈子”也就被冠以主人名号的姓氏名称。他的百姓是由出身各氏族的人组成的,例如,有世袭奴隶出身的札剌亦儿人,有一般蒙古氏族出身的许兀慎人等<sup>②</sup>。同样,在也速该(孛儿只斤氏)的百姓中,也有札剌亦儿人、晃豁坛人<sup>③</sup>。

泰赤乌氏和乞颜氏的构成,可以看做是十一、十二世纪蒙古社会组织的典型。《史集》说:“他(屯必乃汗)有九个聪明勇敢有才能的儿子,他们每一个都成为如今享有盛名的各分支部落的族祖;其中每部都有三万车帐,男女总计达到十万人”<sup>④</sup>。这个数字当有夸大,但也多少反映了屯必乃这家贵族的后裔兴盛的情况。从屯必乃到成吉思汗不过五代,无论他们的子孙如何众多,每一支亲族人数至多不过是一二千人,如何能达到那么大的数目呢?我们从上述泰赤乌氏形成的事例中就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了:贵族只是少数,大多数则是属民和奴隶。

其他各部的情况可能与蒙古部大体相同。例如,塔塔儿六部中有秃秃黑里兀惕部(Tutuqli'ut,“都督之民”)和备鲁兀惕部(Buiru'ut,“梅录之民”)。这两部首领(贵族)的先人大概是接受过唐朝的都督官号和突厥的梅录官号,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五五。

② 见《元朝秘史》第一三七节。

③ 《元朝秘史》第六八节;《元史》卷一二四,《忙哥撒儿传》。

④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八至二九。

因而用作姓氏名称。

十二世纪活跃在漠北历史舞台上的许多“氏族”(oboq)或“部落”(irgen),其实质就是这种由贵族家族(贵显姓氏)统治的社会集团<sup>①</sup>。这里,主人“管理”百姓的关系早已取代了氏族成员间的平等关系。“身子要有头呵才好,衣裳要有领呵才好”,已成为一种社会观念。那些“无个头脑管来,大小都一般”的氏族被视为落后、平庸的百姓,而掳掠他们为奴婢则被当做值得传诵的光荣事业<sup>②</sup>。

于是,社会分成了统治阶级——贵族和被统治阶级——属民与奴隶。

贵族们拥有许多尊贵的称号,如把阿秃儿(ba'atur,勇士)、篾儿干(mergen,善射者)、必勒格(bilge,智者)、薛禅(sechen,贤者)等。还有各种官号,如令稳、详稳、太师、大王、梅录、吐屯等。奴隶和属民称他们为“那颜”。他们自认为是“好根脚人的子孙”(huja'ur sayitu gü'ün-ü uruq),是“有福气”的子弟,“有法度”的贤人,而把百姓看成是“凡人”(qara teri'ütü gü'ün,黑头子弟)和“下民”(qarachu)。

若干贵族家族为了对付外敌或进行掠夺战争,往往建立联盟,推举一个首领,赋予他“管理”全部族百姓、统率各支军队的权力。这种联盟的大首领往往称汗。有推举权利和被推举资格的,当然只是贵族成员,属民和奴隶是被排除在外的。《史集》记载,俺巴孩汗死后若干年,泰赤乌氏各支贵族召集大会商议推举国王,议久不决,问计于一出身低微的部属。这个部属回答说:“我能说些什么?我如笼中之鸟,岂能翱翔?我如网中之燕,岂能跃上高枝?我是低贱的哈剌抽,有什么权利说话?您们众主公,请口吐贤明的良言,使我们哈

---

① 亦邻真在《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一文中认为,蒙古人的这种社会组织是牧人比邻公社,如马克思所说,比邻公社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是“由建立在公有制上的社会向建立在私有制上的社会的过渡。”(马克思:《答维拉·查苏里奇的信和草稿》)

② 《元朝秘史》第三三至三九节。

刺抽,如驹得乳,得遂生养足矣……”<sup>①</sup>还有一个事例:乞颜氏各家贵族为了对抗泰赤乌氏和札只刺氏联盟的进攻,带着各自的一圈子人马会集在一起,建立联盟,由阿勒坛、忽察儿、撒察别乞等“共商量着”,推举铁木真为汗。后来铁木真追述这次推举的过程说:“忽察儿,你是捏坤太子的子,当初咱每教你做皇帝,你不曾肯;阿勒坛,你父忽图刺皇帝曾管达达百姓,因此教你做皇帝,你又不肯;在上辈有巴儿坛的子撒察、台出他两个,也不能做。你众人教我做皇帝,我不得已做了”<sup>②</sup>。所谓推举的情况就是如此。

古昔的血族复仇战争,也已转变成为贵族们掠夺财富和奴隶的手段。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因札刺亦儿人进入蒙古部牧地,杀害了莫拏伦一家,她的孙子海都长大后,起兵复仇,攻灭札刺亦儿部,札刺亦儿人的“妻子和儿童全都成了海都的奴隶”<sup>③</sup>,从此他们就世代一直是这一贵族家族的奴隶。这本来是一次血族复仇的战争,结果却以奴役战败部落告终。后来,到十二世纪之末,铁木真对塔塔儿人、篾儿乞人的战争,则更是如此。

通过不断的掠夺和兼并,贵族们拥有越来越多的奴隶和属民。

为了经常进行掠夺战争和维护对奴隶和属民的统治,各部贵族都建立了镇压的工具——护卫军(turqa'ut)<sup>④</sup>。成吉思汗兴起以前,统治蒙古部的泰赤乌氏贵族就拥有护卫军,他们率领护卫军去搜捕幼年的铁木真——这是一次蒙古部内两家贵族之间的斗争。篾儿乞部、克烈部和乃蛮部的贵族,也都有自己的护

---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四五。

② 《元朝秘史》第一七九节。

③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九。

④ 蒙古贵族的护卫军组织始于何时,难于考知。从《史集》记载泰赤乌氏的那颜们拥有很多军队,以及合不勒汗有自己的那可儿随从等事实看,可能很早就产生了。恩格斯指出:“有一种制度促进了王权的产生,这就是扈从队制度。……博得了名誉的军事首领,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贪图掠夺品的青年人,他们对他个人必须效忠,而他对他们亦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页一四一)贵族权力的增长和掠夺战争的经常化,是护卫军产生的基础,而后者一经产生,又推进了前者。

卫军。王罕在与成吉思汗作战中,派了一千护卫军给其子豁里失列门率领,可见护卫军已是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了。护卫军是贵族收集投靠于他们的各部人组成的,其核心是“那可儿”(nökör,伴当)——效劳于某一贵族个人的侍从<sup>①</sup>。这是对外进行掠夺战争,对内镇压属民的暴力手段,而不是氏族内部的人民武装。他们凭借这种暴力手段,掠夺更多的奴隶和财富,控制了为数更多的部落和更广阔的土地。

到十一世纪末和十二世纪初,蒙古草原上出现了一些强大的贵族,如塔塔儿部的纳兀儿·盃禄汗,克烈部的马儿忽思·盃禄汗,乃蛮部的亦难赤·必勒格·卜古汗等。蒙古部的合不勒汗也在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管辖了全蒙古部众”。由于各部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汗们的地位和权力也不尽相同。以蒙古部来说,从合不勒汗到铁木真第一次被推举为汗,都只是贵族联盟的首领,各支贵族对汗虽有服从其指挥的义务,却并无严格的隶属关系,他们的联盟是不稳固的。因此,成吉思汗建国以前的蒙古兀鲁思(ulus,人民,国家),还不是“国家”,他们的汗还不是真正的“皇帝”。但另一些汗,却统治着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百姓(irgen),拥有支配这些土地和人民的权力。如克烈部的忽儿扎胡思·盃禄汗卓帐于窝鲁朵城(政治中心),为了防止子弟们在他死后发生内争,将其弟古儿罕和其子王罕分封到札格-札不罕之地,而封其子台帖木儿等于哈刺思-博罗思之地<sup>②</sup>。乃蛮部的亦难赤汗死后,其子不欲鲁汗

---

① nökör 的原意是“同伴”。但在蒙古贵族势力兴起后,贵族身边拥有的那可儿则具有另一种性质。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他们是“首领们的军事侍从”,但不是主人的属下人或佣仆,而是有责任为他尽义务的“自由战士”,类似古代罗斯诸侯的卫士或古代日耳曼首领的亲兵(《蒙古社会制度史》,页一四〇,一四一)。护雅夫认为,那可儿是“对主人隶属性很强的隶属民”,身份并非自由的;其主要职责是充当主人的亲卫兵(《“伴当”考》,《史学杂志》,六一编八号,一九五二年)。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二九。按:札格—札不罕当指今杭爱山西南扎克河、札布罕河地区;哈刺思-博罗思之名亦见《史集》第一卷第二册(俄译本页一一一),铁木真与篾儿乞战于其地,在怯绿连河与薛凉格河之间,当即今鄂尔浑河中游东支流哈拉河地区。



和台不花(即太阳罕)发生分裂,各据一方为王,他们不但有自己的政治中心——窝鲁朵,而且设官分职,外有守卫边境的将领,内有掌管金印、钱谷的官员。克烈和乃蛮的汗已是名副其实的君主。克烈兀鲁思和乃蛮兀鲁思已具备了“国家”的规模。

奴隶(bō'ol,孛斡勒)的使用早已出现。据《元朝秘史》记载,传说中的成吉思汗十二世祖脱罗豁勒真伯颜家里,就有一个“家奴后生”,和两匹骏马同列为他的财产。十一世祖朵奔篾儿干还用鹿肉换了一个贫穷的伯牙乌小孩为奴。但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掳掠来的人口和被征服的部落或氏族。如孛端察儿兄弟把几十家兀良合部的札儿赤兀惕氏族掳为奴隶;海都征服札剌亦儿部,把该部妇幼都做了奴隶使用;成吉思汗打垮篾儿乞人后,也把他们的妇女儿童“可以做奴婢的做了奴婢”。在十一至十二世纪漠北各部中,这种相互掳掠人口为奴的现象十分普遍。

一旦沦为奴隶,就陷于世代为奴的地位。被孛端察儿掠去为奴的札儿赤兀惕·兀良合人,过了十代,还必须把亲子送到成吉思汗家里去做“备鞍子,看门子”的奴隶;成吉思汗手下最有名的将领木华黎,原是被海都所掳的札剌亦儿人的后裔,幼年时他父亲把他和他的弟弟不合送到成吉思汗家里,说:“教永远做奴婢者。若离了你门户呵,便将脚筋挑了,心肝割了。”木华黎的叔伯兄弟,也被送给成吉思汗,说:“教与你看守金门。若离了时,便将他性命断了者”<sup>①</sup>。不能把这些话看成仅仅是某种表示忠诚的“誓约”<sup>②</sup>,它鲜明地反映了主人对奴隶的人身占有——这是当时蒙古社会中确实存在的阶级关系。

上引《元朝秘史》总译里的“奴婢”一词,原文中作“门限的奴婢”(bosaqa-

---

① 《元朝秘史》第一三七节。

② 符拉基米尔佐夫把这些话解释为那可儿与首领缔结关系的“宣誓”或“誓约”,并认为他们可以自由地离开(《蒙古社会制度史》,页一四三),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yin bo'ol)和“门的梯己奴婢”(e'üden-ü emchu bo'ol)。拉施都丁记载说,在海都征灭札剌亦儿部后,那些“被杀的札剌亦儿人的儿子们,被留下作为俘虏,他们成了他的家庭的奴隶。从那时到现在,这个札剌亦儿部便是斡脱古·孛斡勒(ötög ü-bōghöl),并依据继承权传属于成吉思汗及其亲族”<sup>①</sup>。拉施都丁所用的“家庭奴隶”(波斯文 bande-i khāndān)一词,可能就来源于蒙文的“门户奴婢”。被掳掠或被征服的人成为各个战胜者贵族私有的(emchu,梯己)门户奴隶(或称家庭奴隶),并被作为遗产传给子孙,从而奴隶及其后裔就世代代代与所属的这家贵族保持着主奴关系。从《元朝秘史》的记载看来,这种奴隶长大后可以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并拥有自己的财产,不过仍必须附在主人门下游牧,为主人无偿服役。例如,札剌亦儿人帖列格秃伯颜一家就附属在合不勒汗长子家族主儿乞氏门下。而且,他们还有义务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到主人家里去侍候下一代主人。如此代代相承,遵守着奴隶之子必是主人之子的奴隶的“约孙”(yosun,体例,规矩)。上述札剌亦儿人木华黎一家与乞颜氏贵族的关系,可以看作是这种奴隶占有形式的典型事例。

史籍中还有一条与此有关的典型资料。据载,当成吉思汗与王罕分裂时,他属下的脱斡邻勒离叛而去,投靠了王罕,于是他派人传语谴责这个叛离者,说:“我说你做弟的缘故(yosun):在前屯必乃、察剌孩领忽二人原掳将来的奴婢名斡黑答,他的〔斡黑塔奴婢的〕子名速别该〔奴婢〕,速别该〔奴婢〕子名阔阔出乞儿撒安,阔阔出乞儿撒安子名也该晃脱合儿,也该晃脱合儿的子是你〔脱斡邻勒〕。……你是我祖宗以来的奴婢〔原文:我高祖的门限的奴婢,我曾祖的门的梯己奴婢〕,我唤你做弟的缘故如此”<sup>②</sup>。这段话非常清楚地说明,奴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九。

② 《元朝秘史》第一八〇节,方括号内据原文补。《圣武亲征录》作:“吾弟,我以汝是高祖家奴,曾祖阉仆,故尊汝为弟也。……”《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三〇):“我弟脱斡邻勒,你是我祖先的门槛奴隶,我称你做弟的缘故是,……”二书所载与《元朝秘史》同。成吉思汗对此人家世很清楚,当是因为这一家人祖孙世代都在他的家庭服役之故。

隶(孛斡勒)的身份是世袭的。

上文所引拉施都丁的记载中,有一个与这种世袭奴隶身份有关的蒙古名词:斡脱古·孛斡勒。ötögü 意为“老的”、“古的”,把它和“奴隶”连起来构成一个复合词,表示什么意思呢?拉施都丁解释说:“斡脱古·孛斡勒的意思是,他们是成吉思汗祖先的奴隶和奴隶的后裔。〔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成吉思汗时代〔为他〕立下可嘉的功劳,〔从而因他的恩赏〕确定了〔自己的〕权利。以此之故,称他们为斡脱古·孛斡勒”<sup>①</sup>。根据上述解释,这个名词似有两层含意:其一,指成吉思汗从祖先代代继承下来的奴隶。《史集》总是在讲到伯牙乌人(相传朵奔篾儿干用鹿肉换来的小孩的后裔)、兀良合人(孛端察儿掳来的奴隶的后裔)和札剌亦儿人时,使用这个专门名词。这些族人作为成吉思汗家族的奴隶都已有许多代的历史。在专述札剌亦儿部一节中,拉施都丁说得更清楚些:“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打死了,其他一部分成了海都汗、他的儿子和亲族的俘虏和奴隶,祖祖代代继承下来,最后传到成吉思汗,因此,此部是他的斡脱古·孛斡勒”<sup>②</sup>。《元朝秘史》中没有出现这个复合词,但上引成吉思汗责备脱斡邻勒的话——“你是我祖宗以来的奴婢”,与此有类似的意思。可见,这个词的原意应出自上文所述的世袭奴隶。其二,由于他们世代“坚决地遵守斡脱古·孛斡勒的既定体例”<sup>③</sup>,在成吉思汗时代又立下功劳,做了大官(那颜),于是,斡脱古·孛斡勒遂成为一种荣称。这大概是表示他们曾为成吉思汗皇家数世服勤,屡积勋劳,和主子的君臣关系源远流长,因而享有皇家的殊恩异典。著名的札剌亦儿人木华黎的家族和兀良合人速不台的家族,就是如此。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五。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九二至九三。并参见同书页一七七(伯牙乌部),一五九(兀良合部)。按:俄译本此名或作 Унгу-Богол, Уталу-Богол,并采用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说法(见《蒙古社会制度史》页一〇三,一〇四,一一〇)加注,看成是不同类型的奴隶。实际上,波斯文写本中的不同写法,均应校正为 ö tögü-bōghöl(参见伯希和等:《圣武亲征录译注》,页八五)。

③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五。

后至元四年(一三三八年)所立的鲁国大长公主媵臣竹温台的墓碑,碑文为汉、蒙(畏吾儿字)两种文字,蒙文部分系据汉文译出,其中有 ötogü-boghod (boghod 的复数)-un uruq(斡脱古·孛斡勒的子孙)一词,在汉文碑文中相应的词是“元勋世臣”<sup>①</sup>。用这个词组来翻译汉文的“元勋世臣”,和拉施都丁对这个词的解释非常一致。从蒙古贵族的世袭奴隶到大汗(元朝皇帝)的“世臣”,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就与皇室的关系而言,两者在意义上却是可以相通的。

如上所述,蒙古贵族的奴隶占有是通过征服和掠夺来实现的,并按照世袭的规矩延续下去。主奴关系始终都有强制性。奴隶要为主人放牧,挤奶,宰畜,侍候茶饭以及“备鞍子,看门子”等等,从事各种生产劳动和家内劳动。但是,在当时的游牧经济条件下,各家贵族役使的门户奴隶数量不可能很多;用锁链系着去从事放牧也是不可想象的。门户奴隶往往同时被看做主人的“伴当”,在作战时随从和护卫主人。奴隶虽然担负着主人家庭的主要劳动,但从整个社会来看,主要的生产者还是属民。

随着贵族财富与权力的膨胀,原来的各民族成员的平等地位日益消失,成了贵族的属民。到十二世纪,势力强大的贵族兼并了许多部落和氏族,属民的数量大大增加了。《元朝秘史》所记载的泰赤兀氏贵族统治下的属民的情况,可以作为属民地位的典型。速勒都思人锁儿罕失刺一家是泰赤兀氏贵族的属民,他有自己的牲畜和财产,但必须负担贵族分派的军役和劳役。例如泰赤兀贵族抓到铁木真,命令各家轮流监禁一夜,也派给锁儿罕失刺家负责监禁一夜的任务;他家还“从夜到明”地搅马奶子,可能就是所负担的劳役。泰赤兀贵族被成吉思汗打败后,锁儿罕失刺才带着全家投奔成吉思汗,他解释说:“我

---

<sup>①</sup> 碑在元全宁路城(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乌丹城)附近。碑文为揭傒斯所撰,见《钦定热河志》卷一一九,艺文十三著录。美国柯立夫(F. W. Cleaves)将此碑汉—蒙文碑文译为英文,并做了详细注释,刊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一四期(一九五一年)。

心已自倚仗着你，〔为甚忙？〕若〔忙着〕早来呵，〔我的〕泰亦赤兀惕〔那颜每〕，将我〔落后的〕妻、子、〔马群、喫食〕灭了”<sup>①</sup>。贫穷的巴阿邻氏人失儿古额秃一家也是泰赤兀贵族的属民，在成吉思汗打败泰赤兀贵族时，他们把泰赤兀贵族塔儿忽台抓住，准备献给成吉思汗。但半路上他们父子商量说：“我每若将他拿至铁木真处，必说我每拿了〔自的〕正主，难做伴当，必将咱每杀了。不如放回去”<sup>②</sup>。于是他们把塔儿忽台放了，如实向成吉思汗报告，果然得到了成吉思汗的称赞。照烈氏（《元朝秘史》作沼兀列惕氏）是一支弱小的尼鲁温氏族，附属泰赤兀贵族，实际上降到属民的地位，成吉思汗为了拉拢他们，在围猎时故意将野牲赶到他们的圈子里去，于是照烈氏感恩来投，他们说：“泰赤兀与我虽兄弟，常攘我车马，夺我饮食，无人君之度。有人君之度者，其惟铁木真太子乎？”<sup>③</sup>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属民不但要受到贵族的剥削，而且不能随便离开或背叛自己的“正主”。《元朝秘史》还记载，铁木真为了救济穷蹙来投的克烈部王罕，在部中征敛赋税（忽卜赤儿）供给他。可见属民还必须向统治者交纳赋税。

十二世纪，各部贵族的势力日益强大，兼并之风愈来愈盛，为数众多的部落和氏族被纳入一个强大贵族的统治之下。由于游牧经济的限制，贵族不可能把这么多的人口都变为自己的“门户内的梯己奴隶”。他们除继续掠夺一部分人做奴隶外，大部分被兼并的，或依附的人民，则被作为属民，借以扩大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元朝秘史》记载克烈部的王罕在谋划攻击成吉思汗时说：“不如掳了他百姓，若掳了他百姓，他待如何！”这说明百姓（主要是属民）的多少，是决定某一贵族势力强弱的主要因素。

① 《元朝秘史》第一四六节。方括号内系据原文旁译增补。

② 《元朝秘史》第一四九节。

③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 第三节 漠北的统一

#### 一 各部的争战

十二世纪是漠北各部贵族角逐争雄的时代,势力最强的主要是五大兀鲁思:塔塔儿兀鲁思掌握着呼伦贝尔湖区最富饶的草原,唐以来就一直是强部;蒙古兀鲁思的根据地是鄂嫩河和克鲁伦河中上游,辽金之际开始强盛起来;克烈兀鲁思据有漠北中心地带——斡耳寒河和土兀刺河流域的回鹘汗国故地,势力最大<sup>①</sup>;篾儿乞兀鲁思在薛良格河、斡耳寒河下游,拥有强勇善战的军队;乃蛮兀鲁思控制着阿尔泰山东西的广阔领土,无论经济、文化都比东面的蒙古人先进。

各兀鲁思的统治者为了掠夺更多的财富和奴隶,控制更多的属民和土地,进行着无休止的相互掠夺和兼并战争。

克烈和塔塔儿在整个十二世纪,一直处于激烈的互相争战之中。十一世纪末塔塔儿部的纳兀儿·盃禄汗攻击克烈部,掳其王马儿忽思·盃禄汗,献给辽朝处死了。马儿忽思之妻为了复仇,伪装向纳兀儿·盃禄汗贡献羊一百只,牝马十匹,酸马乳一百大袋,袋中暗藏全副装备的勇士一百人。纳兀儿汗欢宴时,装载马乳的车子运到,袋中勇士跃出,与护送羊、马的人一起动手,杀死了他和塔塔儿部的大部分那颜<sup>②</sup>。后来,塔塔儿部的阿泽汗又攻劫克烈部,十三岁的王罕和他的母亲就在这次被掠去做奴隶<sup>③</sup>。

---

① 克烈部王罕被成吉思汗打败后,逃到乃蛮地面,被乃蛮边将所杀。太阳罕的母亲说:“王罕是在前的老大汗(ötögü yeke qan),将他的头来,果是呵,咱应祭祀。”(《元朝秘史》第一八九节)似乎漠北各部曾尊奉过他大汗的名号。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二九。

③ 《元朝秘史》第一五二节。

《史集》还详细记载了另一次克烈人和塔塔儿人的战争。据说,按赤塔塔儿部的首领豁里台·答亦儿(Qoridai-Dayir)和曲默思(Kümüs-shaijang)出兵与克烈部的撒里黑汗(Sariq-qan)作战。曲默思骁勇善战,率前锋先进,与撒里黑汗遇,虽三次打败后者,但他恃勇孤军深入,仅率三百骑兵追赶撒里黑。撒里黑军发现他并无后卫,于是奋勇进击,将其俘获、杀害。撒里黑既杀曲默思,以为进攻塔塔儿人的时机已到,即命车队布列于斡耳寒河上,夜间秘密集结军队。他的一个战士叛逃到豁里台·答亦儿处报告此事,豁里台·答亦儿于是率军进至斡耳寒河,突然攻击撒里黑军。撒里黑的四万大军全被歼灭,仅带四十人逃跑,投靠乃蛮别部别帖乞部之盍禄汗。盍禄汗以其女脱劣海迷失嫁克烈之忽儿札胡思汗,并命其子合的儿汗与撒里黑汗出兵共攻按赤塔塔儿,夺回克烈部众,还给撒里黑。前此被俘之王罕母子亦于此次获救<sup>①</sup>。

克烈和北面的篾儿乞人也经常相互攻掠。王罕七岁时就被篾儿乞人掳去,做春米的奴隶。后来其父忽儿札胡思打败篾儿乞人,才将他解救出来<sup>②</sup>。十二世纪后期,王罕势力强盛,又两次出兵攻击篾儿乞,掳掠了他们很多牲畜、人口和其他财产。

拉施都丁说,克烈部和乃蛮部境土相邻,他们之间经常争战不休。关于这两部的早期战事,史籍缺载。王罕之父死后,克烈部发生争夺汗位的斗争,王罕杀戮诸弟,夺取汗位。其一弟也力可合剌投靠乃蛮,乃蛮亦难赤汗发兵攻王罕,取其部众归也力可合剌。王罕兵败,逃至畏兀儿、西辽,后归漠北,与蒙古部铁木真、札木合等联合,声势复振,共攻乃蛮部,打到兀流古河(今新疆乌伦

---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一一至一一三。按:伯希和与韩百诗所著《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二四〇至二四七)详细征引这段记载,并对人名、事实作了缜密的考订,认为这次战争就是《元朝秘史》所记塔塔儿部阿泽汗进攻克烈部事,阿泽汗即按赤·塔塔儿部的首领,撒里黑汗就是王罕之父忽儿札胡思。

② 《元朝秘史》第一五二节。

古河),击溃乃蛮不欲鲁汗。但在回军至拜答剌边只儿之地(今蒙古巴彦洪戈尔省拜达里克河上游)时,遭到乃蛮人的伏击,王罕、铁木真各自引兵退却,乃蛮人劫掠了王罕的部众、牛马。其后铁木真又援助王罕,夺回被掠部众,把乃蛮人赶了出去。

蒙古部和塔塔儿部更是世仇<sup>①</sup>,彼此攻战不休。金朝统治者利用他们的矛盾,使其相攻,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这就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敌对关系。蒙古合不勒汗攻击塔塔儿人,杀其首领;其后俺巴孩汗被塔塔儿人抓去,送给金朝,金朝按惩治叛部法,将他钉在木驴上处死。俺巴孩汗继承者忽图剌汗率部攻打塔塔儿人,打了十三次,互有胜败。合不勒汗的长子斡勤巴儿合黑又在某次战争中被塔塔儿人俘获,也是送到金朝如法杀死了。其后也速该路经塔塔儿部地,又被塔塔儿人毒死。可见这两部之间的战事是多么频繁。至十二世纪末,塔塔儿部叛金,金朝遣完颜襄出兵镇压,并征召蒙古、克烈部合兵攻之。铁木真遂与王罕联军,配合金军消灭了败逃到斡里札河(《元朝秘史》作浯勒札河,今蒙古东方省乌里札河)的塔塔儿残部,掳掠了他们的财产和人民。

蒙古部和篾儿乞部也是结怨甚深。据《史集》载,俺巴孩汗之子合丹太石遣使到篾儿乞部首领秃都儿必勒格赤斤处,提议和他结盟,秃都儿不接受,并磨刀霍霍,扬言要剜掉合丹太石的眼睛。于是合丹太石与其兄忽图剌汗,姻族阿里黑赤纳共攻篾儿乞,杀秃都儿,夺取左翼军。三年后,秃都儿之子脱脱起兵复仇,又被合丹太石击败,只带着右翼军溯薛凉格河逃跑,其左翼和中军均被蒙古人所掠<sup>②</sup>。《元朝秘史》记载蒙古人和篾儿乞人结怨的原因

---

① 《史集》记塔塔儿人与蒙古人结怨的起因:一是蒙古合不勒汗杀了金朝使臣,塔塔儿部是金朝臣属,因此与蒙古部发生战争,开始敌对;二是合不勒汗的妻兄弘吉剌人赛因的斤病,请一塔塔儿部珊蛮医治,反被治死了,赛因的斤的族人杀死了珊蛮。因合不勒汗诸子与弘吉剌部是姻族,互相协助,故塔塔儿人与蒙古人也结下仇怨,发生了战争(见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三三,四一;第一卷第一册,页一〇四)。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三七至四〇。

是,也速该把阿秃儿抢了篾儿乞人刚娶的新妇(就是成吉思汗之母月伦),后来三姓篾儿乞人起兵袭击铁木真,包围不儿罕山,将他的妻子孛儿帖及其他家属、财物抢去。当然这也是相互抢掠的战争。铁木真投靠克烈部王罕,并联合札只剌部札木合,共同出动四万军队攻入篾儿乞人的牧地,屠杀了攻打过他的仇敌,抢掠了他们的牲畜和家室,将篾儿乞人的妇女、儿童掳为奴婢。

这些部与部之间的战争,有些还带有血族复仇的性质。铁木真出兵配合金朝攻打塔塔儿人,声称:“在前塔塔儿人将我祖辈、父辈废了的冤仇有么道,如今趁着这机会可以夹攻他”。他责备主儿乞家族的罪状之一就是没有应召参加这次报复父祖之仇的战争<sup>①</sup>。然而,这毕竟已不是原始的血族复仇了,因为战争的结果是贵族从战败者部落那里掠夺了更多的财产和奴隶。铁木真数落王罕背盟负约若干事,其中有一条说他攻打篾儿乞人后,“大获而还,未尝以毫发分我”<sup>②</sup>,这很可以说明他们进行战争的目的虽曰复仇,其实意在掠夺。

不仅是部与部之间,而且在同一部内的各家贵族之间,也展开了极为激烈的争夺。克烈部王罕在父亲死后,杀害了亲兄弟,夺取了他们的封地和属民。其叔古儿罕又将他打败,夺了他的地盘;王罕遂与蒙古部的也速该结成“安答”(anda,契文),联合打败了古儿罕。后来他的弟弟又联结乃蛮贵族,起兵攻他。乃蛮部的亦难赤汗死后,其子太阳汗与不欲鲁汗也各据一方,互为仇敌。蒙古部的泰赤乌氏与乞颜氏的斗争,乞颜氏内部的主儿乞氏与孛儿只斤氏的斗争(下详),更清楚地说明了贵族之间的斗争已完全撕破亲族的面纱,暴露出相互争夺财富、牧地、奴隶和属民的目的。

战争的范围扩大了。从哈刺温山到按台山,各部都被卷了进来。按台山

---

① 《元朝秘史》第一三三节,一三六节。

② 《元史》卷一,《太祖纪》。

的乃蛮人和谦河源头的斡亦剌人参加了也里古纳河地区的札木合联盟,蒙古部和克烈部的军队打到了按台山之外。各个势力集团所控制的此疆彼界,各部落的闭塞状况,都被打破了。

各敌对阵营的组成也变了。已不存在单纯的亲族联盟,只有强有力的贵族们以利害关系为准则结合而成的集团。背叛,投靠,亲族相残……诸如此类的事件层出不穷。在日益激烈的争夺和兼并战争中,没有哪一个贵族可以照原样保有自己的产业,统治自己的属民,不是更多地获得,就是失去一切。克烈部的忽儿札胡思汗和乃蛮部的亦难赤汗在死去以前都担心儿子们守不住自己的产业和“辛苦收集来”的部众,正是这种客观现实的反映。

有星的天  
旋转着  
众百姓反了  
不进自己的卧内  
互相抢掠财物

有草皮的地  
翻转着  
全部百姓反了  
不卧自己被儿里  
互相攻打<sup>①</sup>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画图。这种极度混乱的社会状况,使人民失去了相对安定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他们不但要受到本部贵族的压迫剥削,还不时遭到别部贵族的劫掠屠杀。属民和奴隶利用混战中贵族地位的不稳定,常常逃亡,

---

<sup>①</sup> 《元朝秘史》第二五四节,韩儒林据蒙文译,见《论成吉思汗》,《穹庐集》,页一六二。



或者叛离“正主”(tus-qan),去投靠另一个更强大、更有“帝王气候”的贵族,在他的庇护下确保自己的安全,并跟随着他去冲杀掠夺,借以提高自己的地位。贵族们在利用这种形势,极力争夺别家的属民,扩大自己的力量,他们的欲望已不满足于统治一部之众,各人都想“取天下”,成为众汗之汗。据拉施都丁记载,当成吉思汗还没有做皇帝而每部都有自己的首领和国王时,有一个伯牙乌部有远见的老人锁儿罕说:“企图攫取帝位的人,一个是塔塔儿部的兀剌黑·兀都儿,另一个是乞颜·主儿乞氏的撒察别乞,[第三个]是札只剌部的札木合·薛禅。这些人都野心勃勃,谋取帝位,但结果将是铁木真成为国主,各部都将一致拥戴他登位,因为他有成就这一大业的才能和美质,在他的额前显现着上天的护佑和帝王的英武气概”<sup>①</sup>。当然,争当帝王者还不止这几个,如泰赤乌氏的塔儿忽台,乃蛮部的太阳罕等都是劲敌;克烈部的王罕力量最强,已隐然有大可汗的声势。因此,激烈的纷争又犹如产前的阵痛,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正是这样的历史条件,把“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推上了完成统一大业中的地位。

## 二 蒙古部的强盛

十一世纪中叶以前,蒙古部大概还是一个比较弱小和分散的部落。《契丹国志》说蒙古里“国无君长所管”,“不与契丹争战,惟以牛羊驼马皮毳之物与契丹为交易”;《辽史》中确也不见有征讨蒙古部的记事。

蒙古人自己的历史传说,从孛端察儿以后才逐渐有较具体的事实,据说他曾征服了兀良合人的一个小氏族。但到土敦篾年时,这一支蒙古人几乎被在辽军打击下溃逃的札剌亦儿人所灭,余部避入边远的八儿忽真隘,其牧地自

---

<sup>①</sup>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七七。同书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一九记载着同一段话,与此略异。

然是被札剌亦儿人所占,可见当时他们的力量还不大。经过若干年代,土敦篾年之孙海都与其叔纳真联合八剌忽部,攻灭札剌亦儿,掳其人以为奴隶,才“形势寝盛”。此后纳真一支游牧于斡难河下游,海都先在八剌忽之地,不久以后,“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可能就恢复了斡难河上游和不儿罕山故地<sup>①</sup>。

海都长子拜姓忽儿早死,次子察剌孩领忽为首领,他的时代大概是蒙古部强盛的起点。他是泰赤乌氏的始祖。拉施都丁说:“根据载在《金册》的更近于真实和更可信的传说,泰赤乌人有很多部落,许多本族可尊敬的君主出于他们之中。他们拥有无数军队。此族的每一支都出现有才能的那颜和首领,而且他们全是互相和睦与一致的。长期以来他们都从其中推举出国君和汗,并服从于他。”<sup>②</sup>察剌孩领忽之子名想昆必勒格,父子两人都有辽朝的部族官号。《辽史》道宗太康十年(一〇八四年)首见“萌古国遣使来聘”的记载,大约和他们的时代相当。领忽即令稳,为辽小部族官;想昆即详稳,是辽授与大部族首领的官号,足见此时蒙古部已是一支比较大的势力。

拜姓忽儿之子屯必乃薛禅(成吉思汗四世祖)后裔特盛,形成另一支强大的势力集团,但他们一直与泰赤乌氏联合在一起。屯必乃就曾与察剌孩领忽一道进行掳掠他部的战争<sup>③</sup>。屯必乃子合不勒汗(又译葛不律寒)被推举为首领,“管辖了全蒙古百姓(qamuq-mongqol)”。他是蒙古部第一个称汗的首领<sup>④</sup>。《史集》说:“他的名字在蒙古部中是最光荣和最尊崇的,他是本部和臣民的领袖与皇帝”。蒙古部至此建立起了强盛的兀鲁思,其时代大体相当于

①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九。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一至二二。

③ 《元朝秘史》第一八〇节。

④ 《史集》中,海都、屯必乃都带有“汗”号;《元史》也说海都曾被八剌忽怯谷之民立为“君”,并称屯必乃为“皇帝”(卷一二一,《速不台传》)。但这大概是成吉思汗后人夸耀祖先的说法。根据《元朝秘史》,真正统一了全蒙古部众并开始称汗的,应是合不勒汗。

辽末金初。

金灭辽后,招服了蒙古高原各部落,塔塔儿、弘吉剌等部都已臣服,国境达到龙驹河(今克鲁伦河)以北。金朝君臣闻合不勒汗强盛,欲与通好,遣使招其来朝。合不勒汗至,金朝皇帝待之甚厚。据说在一次宴会上,合不勒汗走到皇帝面前鼓掌舞蹈,并抓了皇帝的胡须,皇帝因他拥有很多部众,不欲为小事引起敌对,因而不但不加责备,且赠以金、玉、衣服,遣归部。但金国臣僚建言此人不应该纵还,于是复遣急使捕之,合不勒汗遂杀了金国使臣<sup>①</sup>。从此蒙古对金的臣属关系破裂。塔塔儿是金的属部,金人使他们进攻蒙古,这两部之间因此相互敌对,争战不休。

合不勒汗死后,汗位由泰赤乌氏想昆必勒格之子俺巴孩汗继承。俺巴孩汗被金朝杀害后,蒙古部又推举合不勒汗之子忽图剌为汗。蒙古兀鲁思的权力就这样一直掌握在泰赤乌氏和乞颜氏两家贵族手里。《史集》说,忽图剌汗骁勇无比,统率蒙古全部军队进攻金朝,打败金军,虏获战利品无数<sup>②</sup>。据汉文史料记载,金天会十三年(一一三五年),“萌古斯扰边”,金熙宗遣宗盘与完颜希尹提兵北伐,大获其畜牲<sup>③</sup>。天眷二年(一一三九年),又遣万户胡沙虎北攻蒙古部,粮尽而还,蒙古追袭之,败其军于海岭(当在今大兴安岭某处)。皇统三年至六年(一一四三至一一四六年),蒙古与金朝连年战争,夺取金边境的二十多个团寨(当指克鲁伦河以北的边堡),金朝不能制,乃不得不与之议和,放弃了西平河(当指克鲁伦河)以北的土地<sup>④</sup>。

与此同时,蒙古部还两次打败篾儿乞人,夺取了他们的许多军队和部众。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中,蒙古就从一个比较弱小的部落,发展成为足与克烈、塔塔儿等争雄的漠北强部。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一一六一年)金国给南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三五至三六。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四三。

③ 《完颜希尹神道碑》,《满洲金石志》卷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六。

④ 参看王国维:《萌古考》,《观堂集林》卷一五。

宋的公文中说,北边蒙古、鞑靼等部“比之以前,保聚尤甚,众至数十万”,这与《史集》所载屯必乃后裔诸支繁盛,每支男女计达十万(当然包括属民在内),正可相互印证,可见并非过分夸张之辞。

### 三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

#### 乞颜氏贵族联盟的建立

公元一一六二年<sup>①</sup>,正当蒙古部与塔塔儿部进行激烈战争的年代,成吉思汗诞生在斡难河旁的跌里温盘陀山(Deli'ün boldaq,意为脾脏[形]山丘)之地<sup>②</sup>。适逢他父亲也速该与塔塔儿人战罢归来,掳掠了大量牲畜、人口,并俘获其首领铁木真兀格等。为了纪念这次重大胜利,给新生儿取名铁木真。

铁木真九岁时,也速该带他到“舅家”——弘吉刺部的斡勒忽讷兀惕氏族去求亲。按照蒙古人古老的习俗,订亲后就把铁木真留在岳父德薛禅家。据说也速该在回家路经塔塔儿人住地时,吃了他们下毒的食物,到家后不久便死了。因此铁木真很快就离开岳父家,回到本部。

自忽图剌汗死后,蒙古各支贵族便开始了争夺兀鲁思可汗权力的斗争,因此长期产生不出新的“管理全蒙古部众”的汗来。泰赤乌氏在同族各支中势力最大,但他们内部矛盾重重,为了推举一个俺巴孩汗的继承人来做本部首领,竟争议了很久不能解决。最后,权力大概是落到阿丹汗之

---

① 参看周清澍:《成吉思汗生年考》,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一九六二年第二期。

② 一八八二年,俄人玉伦斯基报告说,他在鄂嫩河右岸发现一名为 Дэлүүн-Булдак 之地,东北距尼布楚二三〇俄里,南去中国边界八俄里。后此地遂被认为是成吉思汗诞生地,当地蒙古人亦以成吉思汗生此为荣。考古学者于此处发现若干古居民点遗迹,分布于鄂嫩河小支流岸上。遗物中有精致之小瓷器及丝织物等。但捷克学者普哈在一九五七年出版之《蒙古一万三千公里旅行记》中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之鄂嫩河上游也找到一同名地,谓亦与成吉思汗诞生地有关。(参看伯希和:《马可波罗传》Cingiscan 条;Ю·С·格里申:《鄂嫩河中游的古代遗迹》,载《蒙古考古集》,一九六二年,莫斯科)

子塔儿忽台手里<sup>①</sup>。乞颜氏的力量与泰赤乌氏不相上下,尤以也速该战功最著,威望很高。拉施都丁说:“忽图剌汗死后,他的诸兄弟部落都由也速该把阿秃儿治理”,“他(也速该)是多数蒙古部落的国王,长幼各支都奉他为主,服从和接受他的管辖”<sup>②</sup>。虽然实际上也速该并没有当过汗(他的称号仅是“把阿秃儿”),但拥有一支强大力量则是无疑的,因此塔儿忽台、忽邻拔都等泰赤乌氏贵族对他早怀忌恨之心。也速该一死,他们就抛弃了他的寡妻弱子,夺走他的部众。一些乞颜氏贵族也离开铁木真,依附到泰赤乌氏方面。从此,蒙古贵族的联盟,犹如蒙古古语所说:“深水已干,明石已碎”,无可挽回地破裂了。强盛一时的蒙古兀鲁思,也陷入了如同乃蛮部和克烈部那样的内争。

少年铁木真一家暂时陷入困境,月伦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和仅剩的少数部众住在斡难河上游不儿罕山一带。《元朝秘史》用诗歌的笔调描述他们的困苦生活,说他们甚至靠采集野果、打土拨鼠和钓鱼度日,家里的财产只有九匹马。

铁木真渐渐长大了。泰赤乌氏贵族塔儿忽台等率领护卫军来进攻,把他抓走。这次事件的原因,据《元朝秘史》譬喻式的语言推测,大约是铁木真家族的力量正逐渐恢复,使泰赤乌氏感到了威胁,因而用武力来消灭这一支势力。幸得泰赤乌氏的属民速勒都思人锁儿罕失剌的暗中救助,他才脱离罗网,与母弟们会合,迁到桑沽儿小河(今克鲁伦河支流臣赫尔河)附近住下,其后又迁到不儿吉之地(今克鲁伦河上游布尔肯小河

---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四四至四五。又同书页二五也说塔儿忽台是泰赤乌氏国王。阿丹汗出处不明,《史集》有一处说他是合丹太石之兄(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三八);另一处说塔儿忽台系阿丹汗之子,合不勒汗之孙(同上书,页八四),合不勒当系俺巴孩之误。同书又谓塔儿忽台与合丹太石之子秃答为叔伯兄弟(同上书,页二五)。据此,阿丹汗应是俺巴孩之子。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四六,五〇。



旁)。

铁木真知道,要抵抗泰赤乌氏贵族的压迫,重振旧家业,必须寻求一个更强大势力的庇护,于是来到土兀刺河黑林(今蒙古乌兰巴托南)他父亲的“安答”(anda,意为契交)——克烈部首领王罕处,贡献贵重礼品,并尊王罕为父,其实就是表示依附或臣属的意思。在王罕的帮助下,他开始积聚力量,阿鲁剌氏的博尔朮来到他家做伴当(那可儿);兀良合人札儿赤兀歹老人<sup>①</sup>送其子折里麦来做他的门户奴隶,这两件事表明他在收集部众方面获得了初步成功。

但就在他羽毛未丰的时候,又遭到三姓篾儿乞人的袭击,抢走他的妻子和家人。他求援于王罕和札只刺氏贵族札木合,结果王罕起兵二万,札木合起兵一万,并统领铁木真的兵一万,共同袭击篾儿乞人的营盘不兀刺川(今恰克图南布拉河地)。篾儿乞部首领脱脱因为没有预防,部众全被打散,只带着少数随从沿着薛良格河逃入八儿忽真隘。铁木真夺回了妻子和被掠家人,杀了许多仇敌,并将他们的妇女、儿童掳为奴婢<sup>②</sup>。

经过这次战争,铁木真的力量逐渐壮大起来了。一两年后,他就摆脱了对札木合的依附,从斡难河中游的札木合营地迁到怯绿连河上游的桑沽儿小河,独立建营。许多蒙古部众被吸引到他一边,其中有兀良合人速不台兄弟,札刺亦儿人合赤温三兄弟和阿儿孩合撒儿父子,速客客族人速客该者温,以及伯牙

---

① 札儿赤兀歹应是孛端察儿所掳的兀良合氏族人,故其子孙世为成吉思汗家族奴隶。

② 《圣武亲征录》、《史集》和《元史·太祖本纪》都没有记载这次联合攻打篾儿乞的战事。据《史集》载,篾儿乞人其时与王罕关系尚好,故抢到孛儿帖后,即送给王罕,王罕以儿媳待之。铁木真闻讯,遣部属札刺亦儿人撒八往索,王罕遂归之,孛儿帖于回家路上生朮赤(《史集》第一卷第一册,页九七至九八;一一五;第二册页六八至六九;第二卷页六五)。朮赤死于一二二五年,《史集》说他死时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第二卷页七九),似不确。按太祖第三子窝阔台一二四一年死时年五十六,即系生于一一八六年。朮赤是他的同母长兄,其生年应不晚于一一八四年。《蒙古源流》谓成吉思汗与孛儿帖成婚在一一七八年,则篾儿乞人之劫孛儿帖,当在一一七八年之后,一一八四年以前。

乌族人等；有阿鲁剌族人斡歌来兄弟，忙兀族人者台兄弟，晃豁坛族人速亦客秃，速勒都思族人赤勒古台、塔海兄弟，把鲁剌思族人忽必来兄弟，别速惕族人迭该、古出古儿等。这些人大多出于弱小氏族，有不少是地位低微的奴隶或属民，在氏族血缘关系早已瓦解、掠夺和奴役成为社会公则的时代，他们不可能形成单独的力量，而总是处于强大贵族势力的奴役和压迫之下。但急剧的社会动荡，又使他们有可能脱离原来的主人，去投靠新的贵族势力。他们聚集在铁木真周围，拥戴他为领袖，愿为他去“砍断逞气力者的颈项，劈开逞雄勇者的胸膛”，“如老鼠般收拾，老鸦般聚集，盖马毡般盖护，遮马毡般遮拦”<sup>①</sup>。一旦铁木真成就了大业，他们也就可以上升到那颜阶级的地位。因此，这些人都成了铁木真“中倚赖的吉庆伴当”，在后来成吉思汗建国后所封的八十八千户那颜中占了十二名。

一些原来有名望的乞颜氏贵族也向铁木真靠拢，他们是合不勒汗的长支主儿乞氏的撒察别乞、泰出，忽图剌汗之子拙赤汗和阿勒坛，也速该之弟答里台斡赤斤，兄捏坤太子之子忽察儿等人。在旧蒙古兀鲁思的贵族联盟破裂以后，乞颜氏各支也跟着分崩离析，他们虽然仍各自拥有一圈子百姓，但已成不了强大势力，只能依附于更强盛的泰赤乌氏或札只剌氏。这些贵族靠拢铁木真，企图借助他的力量去掠夺更多的财富和奴隶。他们的地位和那些从属于铁木真的那可儿们是不同的。在当时，只有他们有资格参加推举可汗的贵族会议，而且和铁木真一样有资格被推举为可汗。只是因为这时铁木真周围已聚集了强有力的那可儿队伍，所以，尽管他的资望比这些贵族低，他们还是不得不推举他当了可汗，并表示服从他：“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敌行俺做前哨，但掳来的美女妇人并好马，都将来与你；野兽行打围呵，俺首先出去，围将野兽来与你。如厮杀时违了你号令，并无事时坏了你事呵，将我离了

<sup>①</sup> 《元朝秘史》第一二四节。

妻子家财，废撇在无人烟地面里者。”<sup>①</sup>事实上，这只是一种旧式贵族之间的盟约，和那可儿对主人的从属关系全然不同。

铁木真一经贵族会议推举为可汗<sup>②</sup>，就立即建立起一套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制度，他任命最早追随他的亲信那可儿博尔朮和折里麦为那可儿之长，并分设了带弓箭的、管饮膳的、掌管牧羊只的、管修造车辆的、管家内人口的、带刀的、掌驭马的、管牧养马群的、负责远哨近哨的和守卫宫帐的等十种职务。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员，除其弟外，几乎全是他的那可儿。他们不像旧贵族那样拥有显贵族望和属民，全凭铁木真“用人肉养着，用铁索拴着”，随时可以纵放出去搏噬猎物。通过这套制度，铁木真组成了一支以那可儿为核心的精悍队伍，作为自己力量的基础。

当时，新建立的以铁木真为首领的乞颜氏兀鲁思，只控制着怯绿连河上游一带不大的地盘，部众也不很多。铁木真知道，要在激烈的纷争中巩固自己的权力，还必须继续依靠强大的克烈部首领的支持。就任可汗后，他立即派使臣向王罕报告此事，得到了王罕的允准。

### 十三翼之战

札木合和泰赤乌氏贵族自然不能容忍出现一个新的强大势力，来与他们争夺蒙古部众。以札木合部人劫掠铁木真的马群而被射死为导火线，蒙古部贵族之间的一场战争爆发了。

札木合与泰赤乌贵族联合起来，起兵三万进攻铁木真。铁木真得到札木合部下亦乞列思人孛秃的报告，也将自己的部众和各家贵族的兵力，组成十三

---

① 《元朝秘史》第一二三节。

② 据《蒙古源流》的记载，铁木真第一次被推举为可汗是在己酉年，即一一八九年。按蒙文《黄史》载成吉思汗于二十八岁即汗位，《源流》谓成吉思汗生于壬午年（一一六二年），按即位时为二十八岁推算，得出此己酉年即位之说。但元泰定三年（一三二六年）察合台后裔喃答失所立《重修文殊寺碑》谓成吉思汗即位之年，生次子察合台。考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生于一一八六年，则察合台应生于此之前，《黄史》及《源流》所载即位年岁及年代不确。

翼,布列于答兰版朱思之野<sup>①</sup>,准备迎战。十三翼即十三个古列延(营、圈子)。其中第一翼为铁木真之母月伦统领的亲族、属民、养子、奴婢和属于她个人所有的人们;第二翼为铁木真自己统领的诸子、诸那可儿和护卫(怯薛);第三翼到第十一翼是乞颜氏各贵族所率领的族人和属民;第十二、十三两翼是来附的旁支尼鲁温氏族人组成<sup>②</sup>。这就是当时乞颜氏兀鲁思的全部阵营,虽然其首领铁木真和他所统领的那可儿集团居于核心地位,但还不占优势。十三翼的全军兵数,《元朝秘史》说是三万人,《史集》、《圣武亲征录》则未载。

十三翼之战的结局,《史集》、《圣武亲征录》都说是铁木真获胜。“人数众多而强大的泰赤乌部在这次战争中溃散了”,追随他们的兀鲁、忙兀等部因此率先来降<sup>③</sup>。但《元朝秘史》却记载着铁木真被札木合所迫,退入了斡难河的哲列捏狭地。后者可能更近于真实。《圣武亲征录》和《元史》在叙述十三翼之战后,都是紧接着说,当时泰赤乌部“地广民众,号为最强”,和前文不很协调,泄露出了粉饰的痕迹。《元史·畏答儿传》载:“时大畴(即泰赤乌)强盛,畏翼(畏答儿之兄,忙兀氏首领)率其属归之,畏答儿力止之,不听,追之,又不肯还,畏答儿乃还事太祖。”据《元朝秘史》,这正是十三翼之战以后的事。看来札木合和泰赤乌人并未遭到败创,倒是铁木真因羽翼初长,为了避开强敌,可能采取了暂时退却的策略。归附他的捏古思族(第十三翼)因此遭到了札木合的报复。

泰赤乌贵族虽然势力盛强,但“内无统纪”,各强支之间互争雄长,不能统一;对部众的剥削和压迫又十分残暴,常攘其车马,夺其饮食。因此不仅他们

---

① 答兰版朱思(Dalan Baljus),意为“七十沼泽”。其地当在克鲁伦河上游支流臣赫尔河附近。

② 关于十三翼的组成,参看:韩儒林:《成吉思汗十三翼考》,《穹庐集》;伯希和等:《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三五至一三八;本田实信:《论成吉思汗的十三翼》,《东方学》第四辑,一九五二年三月。

③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八八。

的属民日益困苦,依附于他们的弱部首领利益也受到侵害。与他们的骄横态度相反,铁木真则采取了笼络人心的做法。在一次围猎中,故意将野兽驱入泰赤乌属部照烈氏(Je'üret,又译沼兀列惕)的猎场,让他们多获,然后邀与结盟。照烈氏首领本不满于泰赤乌贵族的欺凌盘剥,于是率部来归。他们对铁木真说:“我属将有〔如〕无夫之妇,无牧之马而来,以泰赤乌长母之子讨杀我也。我担当弃亲从义而招之。”<sup>①</sup>铁木真听了大受启发,说:“我方熟寐,猝发而悟之;兀坐,掀髯而起之。你之言,我素心也。汝兵车所至,余悉力而助也。”此后,他对部属更多施仁义,关怀笼络。泰赤乌贵族的属民多苦其主非法,见铁木真宽仁,“时赐人以裘马”,于是兀鲁(朮赤台)、忙兀(畏答儿)、晃豁坛、速勒都思等族人纷纷来附,他的力量壮大了。

紧跟着而来的一次机会,又使铁木真的威望和权力空前提高,这就是配合金朝夹攻塔塔儿人的斡里札河之战。

### 斡里札河之战

塔塔儿是金朝的属部。从金朝初年以来,一直利用他们防卫东北路边墙,使其与别部相互牵制,在金与蒙古诸部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塔塔儿人在金的支持、挑动下,经常攻击蒙古、克烈等部。金章宗明昌六年(一一九五年),蒙古部落山只昆(散只兀)、合底忻(合答斤)联结广吉剌(弘吉剌)等部,侵扰金朝边境,金遣夹谷清臣等率师北伐,并征召诸纥部族军从征。金军进至合勒河(哈拉哈河)、栲栳泊(呼伦湖),攻下许多营寨。塔塔儿部(北阻鞑)趁金军回师时,拦夺其所获羊马,清臣遣人命他们纳还,塔塔儿因此亦叛。承安元年(一一九六年),金遣丞相完颜襄统兵专讨塔塔儿,进至龙驹河(今克鲁伦河),击溃塔塔儿部。余众向斡里札河(又译浯勒札河)逃奔,完颜襄遣完颜安国追

---

<sup>①</sup> 《圣武亲征录》。按《史集》所载的这段话是:“我们如同无夫之妇,无主之马,无牧人之畜群。大合敦之诸子残害我们。我们将全体为你的友谊持剑冲杀,讨灭你之仇敌”(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八九)。



蹶之。

铁木真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报告王罕,要求他出兵共同协助金朝攻打塔塔儿,并以“为父祖复仇”的名义,征集主儿乞等族人参战。主儿乞氏没有出兵,铁木真只率领自己的一营(古列延)人马与王罕军会合,从斡难河上游东进至斡里札河的纳刺秃失秃延、忽速秃失秃延之地<sup>①</sup>。塔塔儿人正筑寨坚守,他们攻破这两个寨子,捕杀其首领篾兀真笑里徒,“尽虏其车马粮饷”,“又获大珠裘、银绷车各一”。在抢掠塔塔儿人的寨子时,还拾得一个带着金圈环儿、穿着貂皮做里儿的金丝红肚兜的孩子,给了月伦做养子,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失吉忽秃忽。

这次战事不仅使铁木真打击了东邻的劲敌,使塔塔儿部从此一蹶不振,而且在蒙古部中赢得了“为父祖复仇”的声望,更重要的是还得到了金朝的封赏。完颜襄因他为金朝立了大功,承制授以“札兀惕忽里”(ǰa'ut-quri, 纥军统领)之职,并表示回朝奏明皇帝,赏他更大的“招讨”官。王罕是大部可汗,此次战争中他是主力,因此得了“王”的封号。他本名脱里(To'oril),在汗号之上再冠以王的头衔,因此被称为王罕。金朝的封赏大大提高了铁木真的政治权力,从此他可以用朝廷命官的身份号令蒙古部众和统辖其他贵族了。

在斡里札战役以前,乞颜氏贵族的内部矛盾已经暴露。主儿乞氏依恃着长支族望和所继承的精悍部众,看不起把儿坛把阿秃儿的子孙。撒察别乞等人虽然推举铁木真为联盟的首领(汗),但并不愿意服从他的管辖,而是一直怀着争夺权位的野心。在一次亲族宴会上,撒察别乞的母亲责打了铁木真方面的司厨;主儿乞氏掌管马匹的不里孛阔,因其随从偷盗铁木真的马缰引起争

---

<sup>①</sup> 失秃延(Sitü'en)意为“寨”。纳刺秃·失秃延(Naratu-Sitü'en, 松树寨)与忽速秃·失秃延(Qusutu-Sitü'en, 枫树寨)两个寨子可能是金朝早期所筑边墙的两座边堡(一说为辽代边墙),地在今蒙古乌勒吉河上游。此处今尚存边墙遗迹。

执,砍伤了铁木真方面掌管马匹的别里古台。两家为此发生了一场争斗。这个小事件虽然很快就平息下去,但铁木真无疑看清了主儿乞氏是他危险的对手。乞颜氏联盟出现了裂痕。

攻打塔塔儿时,他征召主儿乞氏出兵助战,撒察别乞等不仅不听号令,反而乘铁木真率军出战之机,劫掠了他的老营(奥鲁,a'uruq,军队出征时留在后方的家眷辎重)。这样,铁木真就有充分的理由来收拾对手了:第一,宴会上虐待他和砍伤别里古台;第二,不肯出兵“为父祖复仇”;第三,抄了他的老营;第四,违背了推举可汗的盟约。于是,他从斡里札河回军后,就趁新胜之势立即出兵征讨主儿乞氏,主儿乞的营盘在怯绿连河上游曲雕阿兰之地(今克鲁伦河与臣赫尔河合流点之西的巴颜乌兰山南麓),铁木真大军一到,撒察别乞和泰出自然不能抵敌,只带着少数人逃跑了。以前合不勒汗挑选出来授予长子的“有胆有勇的百姓”,遂全被铁木真兼并过来,成了他的“梯己百姓”(amchu irgen),其中就有许兀慎氏人博尔忽、札剌亦儿人孔温窟哇兄弟及其子木华黎等。

不久,逃亡的撒察别乞和泰出两人也被捕获,铁木真责以背弃盟誓言语,将他们处死<sup>①</sup>。果断地消灭了亲族中最有势力的长支贵族,使他的可汗权力大大提高,这是他走向成功道路上跨出的重要一步。从此他不断地削弱旧贵族的权力和地位,迫使他们逐渐降为从属于他的一般那可儿。

### 东部地区的争夺

金朝在镇压塔塔儿叛乱后,又于承安三年(一一九八年)遣宗浩、完颜襄

---

<sup>①</sup> 铁木真消灭主儿乞氏贵族的原因和经过,各书记载不尽一致。《史集》说他在攻打塔塔儿回师后,分战利品与主儿乞氏,主儿乞反杀其十人,褫其五十人之衣,因此出兵征讨(见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九三)。《元史》则说铁木真部众“为乃蛮人所掠,欲讨之,遣六十人征兵于薛彻别吉(即撒察别乞),薛彻别吉以旧怨之故,杀其十人,去五十人之衣而归之”,于是怒而致讨(《圣武亲征录》此处脱落一段文字)。我们这里采取《元朝秘史》的说法。

等出动大军剿讨广吉剌、合底忻、山只昆等部,使这些“桀骜不驯”的部落力量大大削弱。然而,金朝的势力此时也已式微,无力继续控制蒙古草原了。完颜襄等虽然得胜回师,金朝反而将临潢路的界壕边堡大大内移<sup>①</sup>。这无异于为铁木真扫清障碍,让他更方便地去夺取富饶的呼伦贝尔草原。

消灭主儿乞氏后,下一个与他争夺蒙古部众的对手就是泰赤乌氏贵族了。一二〇〇年,他与王罕会于萨里川,共同发兵攻打泰赤乌。泰赤乌贵族则与他们先前的敌人篾儿乞贵族联合起来,篾儿乞首领脱脱遣其子忽都等统兵来助泰赤乌。双方会战于斡难河上,泰赤乌氏败,退至月良兀秃剌思之野,整军再战。在经过激烈战斗后,泰赤乌氏终于被击溃,其首领塔儿忽台等被杀,沕忽阿忽出等遁入八儿忽真隘。

合答斤(合底忻)与散只兀(山只昆)本来也是强大的蒙古部落,牧地在阔连海子(今呼伦湖)之东。根据蒙古祖先传统,他们是阿兰果火感天光所生的不忽合塔吉与不合秃撒勒只二子的后裔,与铁木真具有同样尊贵的血统。《金史》说这两部“皆北方(蒙古)别部,恃强中立,无所羁属,往来阻蹶(塔塔儿)、广吉剌间。连岁扰边,皆二部为之也”<sup>②</sup>。承安三年之役,他们是重点打击对象,所以受损最甚。

据《史集》记载,在此以前铁木真曾遣使通好二部,要求他们与他联合。但他们没有接受,而且粗暴地将使者驱逐回去,其后又依附泰赤乌氏,参与反对铁木真<sup>③</sup>。泰赤乌氏被消灭后,王罕和铁木真的进取目标自然转向东部地区。合答斤、散只兀的首领们遂与朵儿边、塔塔儿、弘吉剌等部联合起来,在阿雷泉(今海拉尔河下游北)举行庄严盟誓,共同与王罕、铁木真对抗。铁木真得到其岳父弘吉剌人特薛禅的密报,即会同王罕军从斡难河附近的忽图泽出

① 《金史》卷九四,《完颜襄传》。

② 《金史》卷九三,《宗浩传》。

③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至一七。

发,进至捕鱼儿海子。合答斤等部的抵抗极其顽强,但终因前此力量已被削弱,遭到了失败,其部众、牲畜多被王罕、铁木真兼并、掠夺而去。随后铁木真就驻军金边墙附近的彻彻儿山,继续收拾这一带的塔塔儿等部。

一二〇一年,札木合搜罗了一批败散的贵族,包括塔塔儿、弘吉剌、合答斤、散只兀、泰赤乌、朵儿边、豁罗剌思等各部首领,在也里古纳河与犍河(今根河)、秃律别儿河(今得尔木尔河)会流处附近的忽兰也儿吉(此言“红岸”)集会,结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推举札木合为“古儿罕”。札木合联盟实际上是一群乌合之众,既无共同的政治、经济基础,又无统一的军事力量;他们的目标只是要维护各自的贵族地位,因此也得不到部众的拥护。这就注定了他们必然失败的命运。

札木合联盟决定汇集诸部之军进攻铁木真,但他们的军马方动,就有豁罗剌思人将其谋告知铁木真的部属召烈台抄兀儿,并帮助他驰还报告。铁木真得报,立即起兵迎战,在海刺儿河(今海拉尔河)的小支流帖尼火罗罕(火鲁罕,意为“小河”)之地,击溃札木合军。参加联盟的诸部首领作鸟兽散。

打败札木合后,铁木真仍把注意力放在巩固新占的东部地区。一二〇二年春,出兵征讨答阑捏木儿格思(今蒙古东方省贝尔湖南讷墨尔根河地)的察罕塔塔儿、按赤塔塔儿等部,穷追至兀鲁回·失连真河(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乌拉根果勒、舍野日机果勒),将塔塔儿部消灭。

此次战役之前,铁木真颁布了一道极重要的命令(札撒, Jasaq):“在战胜时,不许贪财,既定之后均分。若军马退动至原排阵处,再要翻回力战,若至原排阵处不战回者,斩。”<sup>①</sup>立这两条法令,应是针对贵族联盟时代的掠夺战争中那种各自抢掠财物、各自指挥本支人马随意进退的弊病。它实质上是规定了战利品应当由可汗统一分配,论功行赏;战斗时应当服从统一的军令。这是铁木真被推举为汗后的第一次立法,其意义在于进一步提高汗权,限制各氏族贵

<sup>①</sup> 《元朝秘史》第一五三节。《圣武亲征录》、《史集》无后一条。

族。果然,阿勒坛、忽察儿、答里台斡赤斤等贵族不遵从法令,仍按老规矩随意抢掠,铁木真命其那可儿忽必来、哲别二人将他们抢到的牲畜、财物尽数夺来,分配给众军。

同年秋,乃蛮部的不欲鲁汗联合篾儿乞部的脱脱和斡亦剌部的忽都合别乞,进兵东部攻打王罕和铁木真。札木合与泰赤乌、朵儿边、合答斤、散只兀、塔塔儿等部残余势力,都汇集到乃蛮不欲鲁汗旗下,一时声势颇大。王罕、铁木真军从兀鲁回·失连真河地区退入金边墙,乃蛮联军至,大战于阙亦坛之野(阙亦坛,意为“冷”,其地当在今哈拉哈河上源处)。王罕、铁木真凭据有利地形,而乃蛮军则因地势险峻,气候寒冷,不能作战,札木合等诸部军见势不妙,都星散离去,于是不欲鲁汗只得引军退还。经过这次战役,铁木真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 克烈部王罕的败亡

从铁木真被推举为乞颜氏首领以来,一直与王罕结盟,巧妙地凭托克烈部的势力来壮大自己。他对王罕也可说是恪守臣子之职,凡有虏获,必先贡献给这位“汗父”。后来他责备王罕背盟诸款中有一条说:“我征朵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弘吉剌五部,如海东鸷鸟之于鹅雁,见无不获,获则必致于君。”<sup>①</sup>可见在攻取呼伦贝尔地区诸部时,铁木真还处于从属的地位,王罕攫取了所得的多数财富。

当时,王罕的势力无疑是最大的,但他却没有能成为完成统一的人物。《元朝秘史》把他描写得既贪婪残忍,又平庸无能<sup>②</sup>。夺取汗位后,他残杀诸弟,以致克烈部贵族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又不能安抚部众,因而有不少克烈人在他灭亡以前就投归铁木真。当初他支持铁木真,只是把铁木真看做可供

---

① 《元史》卷一,《太祖纪》。《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二九)与《圣武亲征录》记载的这段话略详。

② 见《元朝秘史》第一五二节,一七〇节。



利用的附庸。——一九九年,他征召铁木真、札木合等共同进攻乃蛮部不欲鲁汗,打到乞则里八寺海子(今新疆乌伦古湖),回军路上遭到乃蛮人的截击,损失很重。铁木真派部下将领率军救援,帮他夺回所失部众与牲畜。看到铁木真的力量已逐渐壮大,在一二〇〇年萨里川(今克鲁伦河上游之西)聚会时,他就计划动手除掉铁木真,因这个企图被发觉,才没有实现<sup>①</sup>。

击退乃蛮后,铁木真移军出塞(金长城),驻于阿不只合阙忒哥儿之山(当在今东乌珠穆沁旗西北或蒙古苏赫巴托尔省东南部),与王罕驻地相近。铁木真为长子朮赤向亦剌合·桑昆(王罕之子)的女儿求婚,遭到无礼拒绝。骄横自大的王罕父子并不把对方当作平等的同盟者看待,但此时的铁木真已经羽翼丰满,不再是王罕驯服的海东青了。他已把富饶的东部土地和众多部众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并准备进一步扩展其势力。

札木合与因违令受责的阿勒坛、忽察儿等蒙古贵族都投到王罕一边,力劝他进攻铁木真。桑昆也对其父说:“你如今见存,他(指铁木真)俺行不当数。若罕父你教白的呛着、黑的噎着呵,你父忽儿札胡思不亦鲁黑罕辛苦着收集来的你的百姓,俺行教管么?”于是,一二〇三年春(《元史·耶律阿海传》作岁壬戌),王罕父子和依附他们的蒙古贵族计议:伪许婚约,请铁木真赴宴,乘机杀之。阿勒坛弟也客扯连的两个牧马人(adu'uchi)巴歹和启昔礼探知密谋,连夜驰奔铁木真报告此事。王罕谋泄,发兵来袭,铁木真仓促整军迎敌,大战于合兰真沙陀之地(当在今东乌珠穆沁旗北境)。和“形势盛强”的王罕相比,铁木真当时还处于劣势,虽经苦战,稍却王罕军,但终因众寡不敌,部伍溃散,他只带领少数人从兀鲁回·失连真河退至答兰捏木儿格思,溯河而上,至合勒合河旁的建忒该山(今哈拉哈河中游北),溃军渐集,点视军马,仅四千六百骑。遂分军沿河而下,驻于董哥泽(当在今贝尔湖之东)。至此始脱离险境。

---

<sup>①</sup>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一六。

“合兰真沙陀之战”是成吉思汗一生中最艰苦的战斗，他第一次单独与当时蒙古草原上最强大的贵族势力进行了较量，虽然暂时失败，但并没有被吃掉。他一面遣使历数王罕背盟弃约诸事，并请求媾和，一面利用喘息时机，休养士马，收集部众。当他驻军于班朱尼河（当在今克鲁伦河下游附近）时，处境艰难，至射野马为食，汲浑水以饮。铁木真与追随他的伴当们宣誓：“使我克定大业，当与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sup>①</sup>后来，“同饮班朱尼河水”作为成吉思汗艰苦创业的佳话载入史册。这年秋，他的军事力量就恢复了，遂移驻斡难河上游，准备再与王罕决战。

合兰真之战后，王罕和追随他的蒙古贵族就发生了分裂。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答里台等人密议：“吾等可袭击王罕，自立为王，既不附王罕，亦不附铁木真。”<sup>②</sup>王罕得悉其谋，起兵攻之，答里台和蒙古巴阿邻、嫩真二部、克烈撒合夷部投归铁木真，札木合等奔乃蛮。

铁木真探知王罕正搭起金帐，宴饮欢娱，毫无防备，遂用偷袭战术，秘密包围折折运都山（当在克鲁伦河上游之南）王罕驻地，突然发起进攻。经过三天三夜激战，击溃了王罕主力。王罕狼狈西逃，进入乃蛮边界，被乃蛮守将所杀。其子桑昆逃到西夏，被逐，又辗转至曲先（今新疆库车），亦被杀。

消灭强盛的克烈兀鲁思，尽并其部众，是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部首领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至此，他已三分天下有其二，“帝业”基本上奠定了。

#### 乃蛮部的灭亡

王罕的覆灭震惊了乃蛮统治者。一向被他们视为“歹气息、破衣服”的落后的蒙古人，居然把强大的克烈部王罕打垮，要争夺蒙古高原的霸权了。自恃强大的太阳罕决定出兵攻打蒙古，并遣使联络汪古部，约其夹攻。但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将使者缚送铁木真，报告了乃蛮人要来进攻的

<sup>①</sup> 《元史》卷一二〇，《札八儿火者传》。

<sup>②</sup>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三二。

消息。

此时,乃蛮国势已经衰弱。太阳罕懦弱无能,只知打猎娱乐;兄弟各据一方,不能统一;部将不满,军纪松弛。然而太阳罕仍十分骄横,夸言要将蒙古人“生得好的妇女掳来,将他每的弓箭夺来”(意谓征服)。一二〇四年,他统兵东进,至杭海岭北的合池儿水(今哈瑞河)下营,会合篾儿乞部首领脱脱,斡亦剌部首领忽都合别乞以及札木合所率朵儿边、合答斤、散只兀、泰赤乌等残部,共同进攻铁木真。

铁木真及其那可儿们本来就把“国土广大、百姓众多”的乃蛮作为下一步夺取的目标,且已了解其国势虚弱,不难征服。如今他们先来侵犯,正是攻取的最好机会。他在帖麦该川召集大会商讨对策,经商议分析敌情后,决定起兵迎战。此时各支蒙古氏族贵族已被一一消灭,簇拥在他身边的都是听命于他的那可儿,无人能与他分庭抗礼了;所有部众都是他的臣民,不再分属于各家贵族了。这使他有可能进一步健全军事组织,提高汗权。他把军马集中在合勒合河旁,下令进行整顿:

一、将所有军队按千户、百户、十户统一编组,委派了各级那颜;

二、设立扯儿必官(Cherbi),任命其亲信那可儿六人为扯儿必(《蒙古译语》:宰相,扯儿必);

三、成立护卫军。设八十宿卫(Kebte'ül),七十散班(turqa'ut)<sup>①</sup>;从千户、百户那颜和白身人的子弟中拣选身材好的做护卫;命阿儿孩合撒儿选一千名勇士管领着,“厮杀时我的前面立着教厮杀者,平时做我的散班护卫”。同时还规定了轮番宿卫的制度。

军队的重新编组和护卫军的建立,使铁木真的军队成为一支纪律严格、高度集中的武装力量,与昔日贵族联盟时代那种每家“一圈子”各自为政的松散组织形成鲜明对照。这套制度不仅加强了铁木真的权力,而且使追随他

---

<sup>①</sup> 据《元朝秘史》第二二五节,这一次可能还置有四百箭筒士。

的那可儿们得到了大小官职,从而激励他们更忠诚更勇猛地为他的“帝业”战斗。

整顿毕,铁木真率军逆怯绿连河西行,布列于萨里川,令每人燃五堆篝火以为疑兵。太阳罕原以为蒙古人少马瘦,可以轻取,及得前哨报告,又惊疑畏惧,虽勉强进军,渡过斡耳寒河,然而军心已乱,札木合等又率部离去。这时铁木真军已逼近,双方激战于纳忽昆山,乃蛮军大败,太阳罕受伤被擒,不久死去。太阳罕子屈出律率残部逃奔其叔不欲鲁汗。铁木真乘胜进抵按台山前,征服了太阳罕所属的乃蛮部众。

同年冬,铁木真北攻篾儿乞部,尽服麦古丹、脱脱里、察浑<sup>①</sup>三姓部众,脱脱等也逃奔乃蛮不欲鲁汗。兀洼思篾儿乞部首领带儿兀孙先已献女迎降,既而复叛,很快就被平定了。

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建国后,发兵攻按台山的乃蛮不欲鲁汗,战于莎合水(今科布多河上游索果克河),将其消灭。依附不欲鲁汗的屈出律、脱脱等逃到按台山之西的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不黑都儿麻河(今额尔齐斯河支流布赫塔尔马河)一带。斡亦剌部首领忽都合别乞不久后向成吉思汗投降。于是,哈刺温山以西、按台山以东全归于成吉思汗。

#### 札木合的末路

在克烈、乃蛮、篾儿乞等部相继败亡之后,札木合也完全丧失了部众,狼狈逃窜到倘鲁山(又译唐麓岭,今唐努山)中,被他自己的五个那可儿捕送铁木真,按惩处本部贵族的办法,赐不流血而死<sup>②</sup>。

在当时互争雄长的各部贵族中,札木合是铁木真最强劲的对手。自从他们两人分裂后,他多次纠集各部力量,和铁木真进行了十多年的较量。然而,

① 《圣武亲征录》作“掌斤”,《史集》俄译本作 Раджун,今改正。

② 《史集》载铁木真未处死札木合,而是将他及其部属赐给合赤温子按赤台,按赤台将札木合肢解处死(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九一)。

在战争中,这些贵族竞相抢掠,一遇挫败,便率部离去,完全不能团结一致。札木合却始终热衷于组织此类各怀异志的松散联盟,以对抗不可阻挡的统一趋势,自然难免失败的结局。

铁木真则乘历史潮流而进,充分利用了各部贵族与其属民和奴隶的矛盾和人民对部族林立、争战不休局面的厌恶,毫不犹豫地践踏贵族联盟时代的准则,极力加强汗权,把要与他分庭抗礼的各部贵族(包括乞颜氏亲族在内)一一予以消灭。他将力量的基点放在完全从属于自己的那可儿集团之上。这支那可儿队伍,只要他的桦皮箭筒一动,就毫不迟疑地集合起来,他的柳木弓弦一响,就从不后退地行动起来:“凡教去处,将坚石撞碎,崖子冲破,深水横断”<sup>①</sup>。铁木真正是驾驭着这支“用人肉养着,铁索拴着”,如同猛狗饿鹰般的队伍,扫平了漠北草原上一个个贵族营盘,完成了统一事业。

#### 第四节 蒙古国家的建立

##### 一 一二〇六年大会

铁木真自从被推举为乞颜氏贵族联盟的首领,直到战胜塔塔儿、合答斤等部和札木合联盟,都是作为王罕的附庸,在这位克烈国王的旗帜下东征西讨的<sup>②</sup>。到一二〇三年击灭克烈部,这才真正有了他自己独立的可汗地位。《史集》特书一笔赞颂这次“伟大的胜利”,说由此帝业奠定,四方诸部来附,遂登

---

① 《元朝秘史》第二三〇、二〇九节。

② 《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传》载其祖海蓝伯答成吉思汗曰:“昔与帝同事王可汗,今王可汗既亡,不忍改所事。”又同书卷一五〇《耶律阿海传》载金朝遣阿海使王可汗(王罕),得见太祖。均证明成吉思汗隶属于王罕。



汗位<sup>①</sup>。太阳罕遣使对汪古部首领说：“近闻东方有称王者。”<sup>②</sup>不过，铁木真的正式即位仪式是在三年之后举行的。

一二〇六年春，铁木真召集贵族、那颜们在斡难河源“根本之地”举行忽里台(quriltai, 大聚会)，建九脚白旄纛，即大汗位。有个晃豁坛氏族人阔阔出，常声称能与上天通言，预卜吉凶，被称为“帖卜·腾吉里”(萨满教巫师的称号)。他曾多次向铁木真进言：“上天授你以地上之帝位”。大会之日，他又装神弄鬼一番，声称求得了上天的启示，对铁木真说：“如今地上各称古儿罕之诸国君均为你所服，其领土均归你治下，因此你亦应有普天下之汗，诸王之王的尊号。上天旨意，你的称号应为成吉思汗。”<sup>③</sup>

成吉思汗建立的国家称为“也客·蒙古·兀鲁思”(Yeke Mongghol ulus)即大蒙古国。在此之前，分布在漠南北的大小蒙古部族都各有自己的名称，蒙古部只是其中的一个。到这时，各部都统一在大蒙古国的统治之下，按照“千户”的组织形式编组起来，于是共同使用了“蒙古”作为他们的总名称。一个统一的蒙古民族共同体从此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三四至一三五。

② 《圣武亲征录》。《史集》作：“据说在这境内出现了一个新国王”(第一卷第二册，页一四六)。

③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五三；一五〇；同书第一卷第一册，页一六七。据拉施都丁解释，“成”(ching)是蒙古语“坚强”、“有力”的意思，“成吉思”(chingis)是“成”的多数，其意义和古儿罕即普罕、王中之王相同。而一二二一年出使蒙古的南宋人赵珙则说：“成吉斯者，乃译语‘天赐’二字也。”赵珙的说法当因看到成吉思汗所发的奉使银牌上刻有“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字样而产生的误解。后来有人说它是“伟大”的意思；或谓成吉思汗即位前，有五色鸟鸣云“青吉斯”，因以为号。近人研究这个称号的很多，多数赞同为突厥语 Tengiz(海洋)这个字的颞化形成(参见伯希和：《马可波罗注》第一卷，“成吉思汗”条)。[补注]但 Tengiz 一词见于《元秘史》第一节，译作腾汲思，而此节之首即有成吉思合罕之号，若是同一个词，何以在同一节中出现异读？难以说通。一九八九年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发表《成吉思汗与合罕称号再探》一文(载《鲍培九十寿辰纪念文集》)，据古突厥卢尼字铭文中 Cigiz 一词，意为“强健的”，“凶猛的”，结合近代突厥诸语中此词有凶猛、坚固等义，遂肯定了“成吉思”称号的突厥来源及其意义。

## 二 千户的编组

成吉思汗即位后,就在一二〇四年整顿军马、建立千户制的基础上,将全蒙古百姓划分为九十五千户,分别授予共同建国的贵戚、功臣,任命他们为千户那颜,使世袭管领<sup>①</sup>。各千户的户数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其下分为若干百户,百户之下为十户。

千户的组成,有以下两种情况。一部分千户是由同族结合而成的。如成吉思汗的姻亲弘吉剌部的按陈驸马,亦乞列思部的孛秃驸马,汪古部的阿剌兀思剔吉忽里,都仍旧“统其国族”<sup>②</sup>,按照统一制度分组为若干千户,自任其亲族为千户那颜,但必须向成吉思汗申报批准。后来归附的斡亦剌部忽都合别乞亦统本部四千户,千户那颜得自置<sup>③</sup>。还有一些率部投归成吉思汗的氏族首领,如兀鲁部的朮赤台、忙兀部的畏答儿、巴阿邻部的豁儿赤、格尼格思部的忽难等。他们虽然也出身于蒙古尼鲁温氏族,且领有自己的一圈子人马,但早已降到附庸地位,和那些可与成吉思汗抗衡的大贵族不同。来附以后,又能忠心耿耿地为成吉思汗效力,因此成吉思汗也准予他们管领本部百姓,或收集本族散亡人民,组成千户<sup>④</sup>。这一类由本部人(其实也包括了该部贵族原有的来自不同部族的属民)组成的千户,只占少数,拉施都丁在“关于诸万户、千户那颜和成吉思汗的军队”<sup>⑤</sup>一节中,都特别加以说明。除上述姻族和尼鲁温氏族

---

① 《元朝秘史》记载,建国后将蒙古百姓编组为九十五个千户,封千户那颜八十八人(其中按陈管弘吉剌部三千户,孛秃管亦乞列思二千户,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管汪古部五千户)。但其中有不少是后来封的,最初的千户那颜不足八十八人。《元史》卷一二〇《朮赤台传》载,始封千户六十五人,较近实。

② 《元史》卷一一八,《特薛禅传》。

③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六九。

④ 《元朝秘史》第二〇七,二〇八,二一〇,二一八节;《元史》卷一二〇,《朮赤台传》;卷一二一,《畏答儿传》。

⑤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六六至二八一。

各千户外,他还提到木华黎,“因为他是有势力的那颜,且建立过可赞扬的功勋,成吉思汗授予他全部札刺亦儿部族的军队。他也按千户分组其军队,然后向成吉思汗申报;其总数为三千人。”但木华黎所领札刺亦儿千户军中也包含有出身其他部族的人员。

多数千户是以不同部族的人民混合组成的。在群雄争战之中,蒙古各部残存的氏族组织进一步瓦解了。原来人数众多的大部,如泰赤乌、篾儿乞、塔塔儿、克烈、乃蛮等,在被成吉思汗征服后,其所属人民都被“分与了众伴当”。成吉思汗的将领们战争中也各自“收集”了不少百姓。编组千户以分管百姓时,成吉思汗准许他们即以所得百姓组成千户管辖。还有一些忠勤效力,但不曾在敌前捕掳得百姓的亲信那可儿,也许其收集“无户籍”的百姓组成千户;或命令从各那颜所属百姓中征调一部分合组为千户,授予他们管辖<sup>①</sup>。

千户制度是蒙古国家统治体制中最重要的一环。千户作为统一的基本军事单位和地方行政单位,取代了旧时代的部落或氏族结构。通过编组千户,全蒙古百姓都被纳入严密的组织,由大汗委任的那颜管领着,在指定的牧地范围内居住<sup>②</sup>。各千户所管百姓不许变动。成吉思汗的“札撒”里规定:“任何人不得离开其所属之千户、百户或十户而另投别一单位,亦不得避匿他处。如违此令,擅离者于队前处以极刑,接受其人者,亦严厉惩处之。”<sup>③</sup>国家按千户征派赋役和签调军队,所有民户都应在本管千户内“著籍应役”,负担差发,“贵贱无有一人得免者”<sup>④</sup>。凡十五岁至七十岁的男子都要服兵役,随时根据命

---

① 《元朝秘史》第二一二,二二至二二三节。

② 据一二四六年访问蒙古的教皇使者喀尔平尼记载,各千户驻地皆由其所隶首领指定,即直属大汗的千户由大汗指定,分属诸王和勋贵的千户由本主指定;千户指定所管各百户的驻地,百户指定所管各十户的驻地(《蒙古史》第五章,见道生编:《出使蒙古记》,页二七)。

③ 《世界征服者史》第一卷,页三二。

④ 《黑鞑事略》,“其赋敛”条。

令,自备马匹、兵仗、粮草,由本管那颜率领出征。因此所有蒙古成年的男性牧民,同时也是战士,“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

成吉思汗又任命木华黎为左手万户,管辖东边直到哈刺温山(今大兴安岭)方面的诸千户;博尔术为右手万户,管辖西边直到按台山方面的诸千户;纳牙阿为中军万户;豁儿赤领巴阿邻部三千户,加上塔该、阿失黑二人所管的诸族百姓,合为万户,镇守沿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的林木百姓地面。管领格泥格思千户的忽难,被命为长子朮赤所属百姓的万户。万户只是军事统帅。

蒙古国的最高统治集团是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全蒙古百姓都是他们的臣民。按照分配家产的体例,成吉思汗将百姓分配给诸子、诸弟。各支宗王都可以完全支配分属于自己的百姓和各级那颜,再将他们分配给自己的亲族。那颜们对大汗和诸王则处于绝对从属的地位,他们实际上是被委任管理百姓的地方军政官员,如果不称职或有不忠诚的行为,大汗可以将他们治罪,褫夺其职务,另授予他人<sup>①</sup>。成吉思汗建国后,不允许再出现任何与他的“黄金家族”相抗衡的贵族。《元朝秘史》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晃豁坛氏蒙力克老翁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的儿子阔阔出利用自己萨满巫师的影响,与成吉思汗家族争夺百姓。九种言语的人都投到他那里去了。斡赤斤去向他索取百姓,竟遭到了他的侮辱。成吉思汗的妻子孛儿帖对成吉思汗说:“你今见在,他晃豁坛人尚将你桧柏般长成的弟每残害,久后你老了,如乱麻群马般的百姓如何肯服你小的歹的儿子每管!”结果成吉思汗将阔阔出处死,并责备蒙力克说:“自的子不能教训,要与我齐等,所以将他送了。我若早知您这等德性,只好教你与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每一例废了。”建立千户制度,正是成吉思汗防止旧氏族贵族复辟的重要措施。任何一个万户那颜或千户那颜,不管地位多么尊崇,都是皇室的臣仆。

---

<sup>①</sup>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六〇、二八〇。

不过,那颜们却是高踞于蒙古牧民之上的领主。他们获得了世袭的职位,在本管范围内,掌握着分配牧场,征收赋税,差派徭役和统领军队等权力。高级的那颜还可以参与选举大汗、商议国策和掌管国政。通过赏赐和战争中的掳掠,他们拥有了大量牲畜、财物和奴隶。建立了特殊功勋的那颜,还被授予种种特权。特别是对成吉思汗及其诸子有救命之恩者,则封为“答剌罕”(Darqan,自由自在之意),可以“免除贡纳的义务”,“出征处得的财物,围猎时得的野兽,都自要者。”游牧地区也可以不受限制,“自在放牧”;可以随时去见大汗,不必等待通报;九次犯罪可以不罚;宴享时享受宗王的待遇等,封号和特权都允许世袭<sup>①</sup>。那颜阶级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统治蒙古人民的支柱。

### 三 护卫军的扩建

一二〇四年整顿军马时,成吉思汗就建立了一支护卫军。建国以后,他成为全蒙古的最高专制君主,原来的护卫军建制不能适应了。为了确保至高无上的汗权,需要建立一支更强大的由大汗直接控制的常备武装。

成吉思汗命令将护卫军扩充为一万名<sup>②</sup>,包括一千名宿卫,一千名箭筒士,八千名散班。散班由万户、千户、百户和十户那颜以及白身人的儿子有技能、身体健壮者充当,各级那颜人等都必须遵旨将自己的儿子送到成吉思汗跟前效力,不许躲避或以他人代充其役。千户那颜的儿子许带第一人,伴当十人;百户那颜的儿子许带第一人,伴当五人;十户那颜及白身人的儿子许带第一人,伴当三人。其所需马匹、物品诸项,除以本人所有的财产充用外,并许按规定于本管民户内征敛供给。充当护卫实际上是

---

① 《世界征服者史》第一卷,页三八,《元朝秘史》第二一九节,并参阅韩儒林:《蒙古答剌罕考》,《穹庐集》,页一八至四六。

② 《元朝秘史》第二二四节。



各级那颜和白身人对大汗承担的一种特殊兵役,当了护卫,即可免除其差发杂役<sup>①</sup>。

护卫军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大汗的金帐和分管汗廷的各种事务,同时也是大汗亲自统领的作战部队。成吉思汗规定了严格的护卫制度:(1)宿卫值夜班,箭筒士和散班值日班;各分为四队,轮番入值,每番三昼夜,因此总称为四“怯薛”(Keshig),就是番值护卫的意思,护卫之士则称为“怯薛歹”(Keshigtai,复数为怯薛丹,Keshigtan)。(2)值日班的箭筒士、散班在日落前将所司职责移交给值夜班的宿卫,出外住宿,次日早饭后再入值。(3)入夜后,不许任何人在宫帐前后行走,违者宿卫得捕之;未经允许闯门而入者,宿卫可以立即将其处死;任何人不得杂入宿卫队中,亦不准探问宿卫人数。(4)群臣奏事,都要先经过怯薛歹的通报方可入帐;奏事时值班怯薛歹亦不离开大汗左右。

成吉思汗令其最亲信的那可儿博尔忽、博尔朮、木华黎、赤老温(四杰)四家世袭担任四怯薛之长,博尔忽家族掌第一怯薛(亦称也可怯薛),博尔朮家族掌第二怯薛,木华黎家族掌第三怯薛,赤老温家族掌第四怯薛。怯薛长是大汗的亲信内臣,元朝称为“大根脚”出身,出任朝廷官职一般即为一品官。

诸怯薛之职分为:

火儿赤——Qorchi,佩弓矢(环卫)者;

云都赤——Üldüchi,带刀(环卫)者;

昔宝赤——Siba'uchi,掌鹰隼者;

札里赤——Jarliqchi,书写圣旨者;

必阁赤——Bichikchi,书记,主文史者;

---

<sup>①</sup> 《通制条格》卷三,《怯薛元役》;又《元史》卷三四,《文宗本纪》载裁减宿卫之士,遣归本部著籍应役。按同书卷四〇《顺帝本纪》用了“怯薛役户”这个名词。

博尔赤——Ba'urchi,厨子,“亲烹饪以奉上饮食者”;

阔端赤——Ködölchi,掌从马者;

八剌哈赤——Balaqachi,守城门者;

答剌赤——Darachi,掌酒者;

兀剌赤——Ulachi,典车马者;

速古儿赤——Sükürchi,“掌内府尚供衣服者”;

怯里马赤——Kelemechi,传译者;

帖麦赤——Temegechi,牧骆驼者;

火你赤——Qonichi,牧羊者;

忽剌罕赤——Qulaqachi,捕盗者;

虎儿赤——Qurchi,奏乐者。

成吉思汗为其护卫之士(怯薛歹)规定了优越的地位:位于在外的千户那颜之上,如果他们与千户那颜发生争执,罪在千户那颜。怯薛歹作为大汗的侍从近臣,在蒙古国的政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怯薛“百执事”之官就担任着中央政府的职能。大汗还常常派怯薛歹为使者,出去传达旨意,或处理重大事务。怯薛歹调任外官,多担任重要职务。因此在元代,充当怯薛成为那颜阶级做官的最便捷途径。

护卫军的作用,关键在于“制轻重之势”(《元史·兵志》)。大汗直接掌握着这样一支最强悍的亲信军队,就足以制约任何一个在外的诸王和那颜。同时,各级那颜的子弟都被征入护卫军,等于“质子”,也有助于成吉思汗更牢固地联系和控制分布各地的那颜,使他们效忠于自己<sup>①</sup>。在经历了长时期的

---

<sup>①</sup> 《元史·兵志》:“或取诸侯将校之子弟充军,曰质子军,又曰秃鲁花军。”秃鲁花当即护卫军中由各级那颜和白身人之子组成的“散班”——土儿合兀惕。蒙古语 Turqa'ut 系借用突厥词 Turghaq(哨兵,守兵)变来的多数(参见伯希和等,《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五二;《通报》一九三〇年,页二九至三〇)。《元史》称为“质子军”,或者是当时征取各那颜之子充护卫,本含有以其子为质的意思。后来降蒙的汉地诸侯亦各遣子入质,充宿卫之士。

氏族贵族相互争战之后,建立这么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以维护最高的汗权,对巩固新生的统一国家,防止旧贵族的复活和重新发生内战,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这支武装也成为成吉思汗进行对外掠夺和扩张战争的有力工具。

#### 四 蒙古文字的创制

据目前所知,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中,最早创制文字的是突厥人,可能在公元六世纪,他们就已经有文字了。此后回纥人、贝加尔湖地区的骨利干人和叶尼塞河的黠戛斯人都使用过古突厥文。

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人还没有文字,“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sup>①</sup>。后来逐渐采用畏兀儿文书写蒙古语,创制了畏兀儿字蒙古文<sup>②</sup>。虽然一二六九年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采用藏文字母创制了“蒙古新字”作为官定的蒙古文,但畏兀儿字书并未废弃,后来经过改革,更趋完善,一直沿用到今天。八思巴字蒙古文则在元亡后就基本上不用了。

畏兀儿字蒙古文创制出来以后,成吉思汗就用它来发布命令,登记户口的分配,编集成文法(“大札撒”),记录所办案件等,成为加强统治的有力工具。太宗至宪宗时期编成的历史—文学巨著《元朝秘史》,多数学者认为就是用畏兀儿字蒙古文写成的,可见到这时蒙古人运用这种文字的水平已经相当高了<sup>③</sup>。

---

① 《蒙鞑备录》。

② 《元史》卷一二四《塔塔统阿传》载:成吉思汗灭乃蛮太阳罕时,俘获其掌印官畏兀儿人塔塔统阿,问他怀中藏的印是做什么用的,回答说:“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成吉思汗知道他深通本国文字,命他教子弟学习。其后又有不少畏兀儿人被用为蒙古贵族子弟的教师。他们对蒙古文的创制都作出了贡献。

③ 《元朝秘史》成书年代有几种说法。该书末段说:“大聚会著,鼠儿年七月,于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剌勒地面处驻时写毕了。”或以为此鼠儿年是一二二八年(戊子),或以为是一二四〇年(庚子),一二五二年(壬子),一二六四年(甲子)等等。以一二四〇年说最流行(参阅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的研究》)。近来有学者主张系从元太宗时起,迭次增写而成。书末所云写毕之鼠儿年,以一二五二年说根据较充分(参阅余大钧:《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中国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目前所知的早期畏兀儿字蒙古文资料,最早的是一二二五年立的移相哥碑(即所谓“成吉思汗石”),其次有一二四〇年《济源十方大紫微宫圣旨碑》上的三行蒙文,一二四六年贵由给教皇英诺森四世信件上的蒙文印,一二五七年外刺部驸马八立托所立《释迦院碑》上的三行蒙文等,都是蒙古时代的遗物。

## 五 大断事官的设置

《经世大典序录·官制》说:“国家肇基朔方,……方事征讨,重在军旅之事,故有万户、千户之目,而治政刑则有断事之官,可谓简要者矣。”断事官蒙古语称为札鲁忽赤(Jarquchi)。一二〇二年成吉思汗灭塔塔儿部后,曾命其异母弟别里古台整治外事,审断斗殴、偷盗、诈伪等案件<sup>①</sup>,《元史·别里古台传》说他“尝立为国相,又长札鲁火赤”,即指此。这是蒙古设立断事官的最早记录。

一二〇六年建国时,成吉思汗任命其养弟失吉忽秃忽为“普上断事官”(大断事官),宣旨道:“当〔我〕被长生天护祐着,使天下百姓入轨就范的时候,你要做〔我的〕耳目,把毡帐、板门里的百姓分成份子,作为领民分配给母亲、我们、弟弟和诸子侄,任何人不得违背你的话。”又命失吉忽秃忽惩治众百姓的盗贼,察明诈伪,按体例应处死的处死,应罚的罚,委为普上断事官。又宣旨道:“把一切领民的分配和断了的事宜都造青册写在上面。〔凡是〕失吉忽秃忽向我建议而写在青册白纸上的〔规定〕,直到子孙万代不得更改。更改的人要治罪。”<sup>②</sup>大断事官的职责主要是两项:一是掌管民户的

<sup>①</sup> 《元朝秘史》第一五四节。

<sup>②</sup> 同上书,第二〇三节(据亦邻真译文,见《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元典章》卷四九,刑部一一,《剌豁土居人物依常盗论》条:“根脚里成吉思皇帝时分,立札鲁花赤呵,诸王、驸马、各怯薛歹、各爱马蒙古、色目人每奸盗、诈伪、婚姻、驱良等事,交管来。”)

分配；一是审断刑狱、词讼，掌握司法之权。大断事官是蒙古国的最高行政官，相当于汉族官制的丞相。后来窝阔台派失吉忽秃忽为中州断事官，主持清查汉地户口和征收赋税的工作，汉人就称他为“胡丞相”（忽秃忽一译胡土虎）。忽秃忽到燕京后，下令教学行和乞儿行也要出银作差发，有个教书先生写诗说：“教学行中要纳银，生徒寥落太清贫。……相将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时捺杀因。”捺杀因(nai sayin)，蒙语“很好”的意思。

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初年，大断事官一直保持着“丞相”的地位。窝阔台时任此职的是额勒只吉歹（又译野里知吉带、宴只吉带），窝阔台命令：“众那颜每以额勒只吉歹为长，依着额勒只吉歹的言语里行者。”<sup>①</sup>蒙哥即位后，以忙哥撒儿“为断事官之长，其位在三公之上，犹汉之大将军也。”<sup>②</sup>中统元年设立中书省，其长官忽鲁不花仍带“中书省都断事官”职衔。到至元二年设大宗正府，大断事官始专主宗正府，治蒙古公事并兼理刑名，不再是全国的行政长官了。

在大断事官之下置有若干断事官，为其僚属。此外，诸王、贵戚、功臣有分地者，也各置断事官管治其本部百姓<sup>③</sup>。

## 六 札撒的制定

早在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人中就存在着若干“古来的约孙”<sup>④</sup>。“约孙”(yosun)有“道理”、“规矩”、“缘故”等意义，元代通常译为“体例”，它包含了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种种社会习惯或行为规范。成吉思汗赏赐功臣时，

---

① 《元朝秘史》第二七九节。

② 《元史》卷一二四，《忙哥撒儿传》；姚燧《牧庵集》卷一三，《高昌忠惠王神道碑》：“宪宗立极，诏忙哥撒儿为丞相，昌国(孛鲁合)位其亚，天下庶务，惟决二人。”

③ 《元史》卷一二〇，《亦力撒合传》；卷一二一，《博罗欢传》；一二四，《忙哥撒儿传》。

④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九七。



对巴阿邻氏族的兀孙老人说：“蒙古体例里，以别乞官为重。兀孙，你是巴阿邻为长的子孙，你可做别乞；做别乞时，骑白马，著白衣，坐在众人上面，拣选个好年月议论了，教敬重者。”<sup>①</sup>将享有如此崇高地位的别乞称号授与同血统氏族中的长支长者（巴阿邻氏是孛端察儿长子的子孙，尼鲁温蒙古诸氏族中的长支），这种“体例”应是渊源于父系氏族长老制，虽然到成吉思汗时代，氏族长老的权威早已为强有力的贵族所取代，但尊崇长支长者的习惯仍然长期保留着。《元朝秘史》还常常记载老人们“引证着古语”教训年轻人，或人们相互关系中引用“古语”来赞扬、劝戒或指责对方的行为。这些“古语”中无疑包含有许多湮远年代留传下来的“体例”。

随着社会划分为阶级，必然出现反映贵族压迫奴隶和属民的“体例”。这时，区别上下贵贱的等级观念产生了：“人的身子有头呵好，衣裳有领呵好”，老百姓应该受头领的管束<sup>②</sup>。奴婢不许离开主人的门户，坏了主人的事情；属民不能背叛自己的“正主”。这样一些维护贵族特权的规矩被认为是正常的社会秩序。札木合被他自己的五个伴当抓住送给铁木真，他令人对铁木真说：“黑老鸦竟拿了鸭子，下民奴隶竟擒了自的罕，合罕安答你岂能差了！”铁木真果然下令说：“自的正主敢拿的人如何留得！将这等人并他子孙尽典刑了者。”于是当着札木合的面将捕他的几个伴当杀了。<sup>③</sup>

贵族既获得了统治权，就可以对部众发布命令——札撒（Jasaq）。他们的命令成了人民应当遵奉的法律。

十二世纪是蒙古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氏族贵族的统治秩序在日益激烈的相互争夺和攻劫之中已陷于崩溃。成吉思汗描述当时的情况说：“人民子不从父教，弟不听兄言，夫不信其妻，妻不顺其夫，翁姑不善待其

① 《元朝秘史》第二一六节。

② 《元朝秘史》第三三至三五节。

③ 同上书，第二〇〇节。

媳,媳妇不恭敬翁姑,长不护其幼,幼不养其老,……慢视体例(约孙),不守法规(札撒),以故犯上作乱,欺窃风行,盗贼不宁……”,<sup>①</sup>真是到了“礼崩乐坏”的地步了。在这个干戈纷扰的时代,成吉思汗知道要绥服器器众民,必须用“极严厉的札撒”来“整顿秩序”,使人们各安其位,“智者勇者俾为统将,捷者巧者使掌后营(奥鲁),愚者贱者亦授以执鞭之役,遣就畜牧。”<sup>②</sup>因此,他的军队就具有了更严密的组织和纪律,这是他所以能战胜群雄、完成统一的重要原因之一。

《史集》记载说,一二〇三年成吉思汗消灭了克烈部王罕,大猎于帖麦该川。由于取得了如此伟大的胜利从而奠定了帝业,诸部纷纷来归,于是他召集大会,“制定了优良而稳定的札撒”<sup>③</sup>。此时蒙古人还没有文字,所谓制定札撒大概只是比较系统化地“宣布号令”。

一二一九年,在亲征花剌子模之前,成吉思汗又召集一次大会,“重新确定了训言、札撒和古来的体例”<sup>④</sup>。他命令将这些札撒和训言写在纸卷上,名为《大札撒》,编成后传旨颁布<sup>⑤</sup>,命宗王各领一部藏于金匱宝库之中。每当新汗即位,或有大征伐,或诸王朝会共议国事,即先奉出《大札撒》,遵照那上面的规定行事<sup>⑥</sup>。到元朝建立以后,管辖的地区大了,民族多了,成吉思汗制定的札撒已不能适应统治的需要,但大聚会时诵读大札撒的这套仪式仍旧奉行不辍。元人柯九思有一首《宫词》说:“万国贡珍罗玉陛,九宾传赞卷珠帘,大明前殿筵所秩,勋贵先陈祖训严。”注云:“凡大宴,世臣掌金匱之书,必陈祖宗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五九。

② 同上。

③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三五;又《元史》卷一《太祖纪》云:“帝既灭汪军,大猎于帖麦川,宣布号令,振凯而归。”

④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九七。

⑤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三〇载,一二二五年成吉思汗从西域回蒙古后,“下令颁布札撒和训言”。当是《札撒大全》的编写工作至此时完成。

⑥ 《世界征服者史》第一卷,页二五。

大札撒以为训。”<sup>①</sup>

《大札撒》虽然失传,但在中外各种史籍中片断地记载有它的一部分条款<sup>②</sup>。根据这些不完全的记录,我们还是可以大致了解成吉思汗大札撒的若干内容。例如,札撒规定:那颜们除君主外不得投托他人,违者处死。擅离其职守者亦处死;搆乱皇室,挑拨是非,助此反彼者处死<sup>③</sup>;凡发现及收留逃奴而不交还其主者,处死;盗人马畜者,除归还原马外,另赔偿同样的马九匹,如不能赔偿,即以其子女作抵,如亦无子女,则本人将被处死<sup>④</sup>;“其犯寇者,杀之,没其妻子畜产以入受寇之家”<sup>⑤</sup>;等等。这些条款无疑都是有利于维护“黄金家族”的最高统治权和那颜阶级的利益的。还有一些保护游牧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条款,如“禁草生而薙地者,遗火而薙草者,诛其家;拾遗者,履阈者,箠马之面目者,相与淫奔者,诛其身。”<sup>⑥</sup>说谎诈骗者,以幻术惑人者处死;等等。此外,一些蒙古民族的习惯和迷信禁忌也被订入札撒,如宰畜而食需缚其足,剖其胸,以手紧抓其心直至畜死,方可食其肉,如效回回之宰畜者,将置

---

① 顾嗣立:《元诗选》三集戊集;又《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英宗登极,拜中书平章政事。会诸侯王子大明殿,诏进读太祖金匱宝训,威仪整暇,语音明畅,莫不注目竦听。”

② 俄人梁赞诺夫斯基曾汇集波斯、阿拉伯和欧洲史料中的有关记载,得成吉思汗的札撒条款三十六条,训言(Bilik)二十九条,以及其他有关蒙古法律的记述若干条。其中札撒条款大部分取自埃及史家马克利西(Taqi ad-Din Ahmad al—Maq izi, 1364—1441)的《埃及志》,作者云其友人某曾在报达见到成吉思汗《札撒》文本,遂据其转述著入书中。训言则全取自拉施都丁《史集》。参见梁赞诺夫斯基:《蒙古诸部习惯法》页五七至七〇。汉文史料中保存的札撒和训言也相当多。

③ 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因阿里不哥是成吉思汗子孙,予以赦免,但将他手下的大臣孛鲁合等以“搆祸我家”的罪名,“照依太祖皇帝札撒正典刑讞”(《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④ 亦见《元典章》卷四九,刑部一一,“强窃盗贼通例”条,“达达偷头口一个陪九个”条记载。

⑤ 《黑鞑事略》。

⑥ 同上。

于极刑；禁便溺于水中或灰烬之上，禁洗涤衣服等等。处罚犯人的刑法，一是处死；一是流放或罚充敢死士遣赴阵前效力，三四次后免罪；一是籍没家产、人口。

## 第二章

# 蒙古的征服战争

### 第一节 灭夏与灭金战争

#### 一 蒙古军事力量的强盛

以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为首的大蒙古国的统治层,把掠夺财富看成最光荣的事业。漠北统一以后,蒙古各部的人口和牧地已按照等级分配完毕,不能再互相掠夺了。于是,富饶的邻国就成为他们继续进行掠夺战争的目标。成吉思汗对他的部下说:“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和战胜敌人,将其根绝,夺取其所有的一切,迫使其结发之妻痛哭,骑其骏马,纳其美貌之妻妾以侍寝席”<sup>①</sup>。他把所有国家都看成黄金家族可以占有的财富,勉励他的儿子们:“天下土地广大,河水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去扩大营盘,占领国土”<sup>②</sup>。这种强烈的掠夺和扩张欲望,是蒙古国统治者不断进行对外战争的根本原因。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兵力有很大增加。据《元朝秘史》,除所封九十五千户那颜的军队外,还有一万最精锐的护卫军,总数超过十万人。按照拉施都丁的说法(据说是根据载在《金册》的可信资料),成吉思汗军队的总数是

<sup>①</sup>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六五。

<sup>②</sup> 《元朝秘史》第二五五节。



十二万九千人<sup>①</sup>,包括中军——成吉思汗个人的千户——一千,右翼军三万八千,左翼军六万二千人,分授子弟的军队二万八千人。蒙古军出征远国时,多携妻孥畜产尽室而行,十三四岁的小孩经过几年行军,就长成可以参加打仗的战士<sup>②</sup>。因此实际兵力无疑超过了上述数字。

在征服诸国过程中,蒙古国的兵力又不断得到扩充。契丹、汉、畏兀儿、哈刺鲁等各族军队被签发从征的,为数不少<sup>③</sup>。利用中原地区的先进武器和先进技术,更增强了蒙古军的战斗威力。如善制鸣镝的刘仲禄,善造攻城之具的郭侃、石天应,善造火石炮的薛塔刺海和张荣父子等,被搜罗到部下,在东征西讨中起了很大作用。金哀宗说:“北兵所以常取金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金史》卷一一九《完颜娄室传》)这确是事实。

史称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sup>④</sup>。他在统一漠北的战争中,已经表现了善于使用将领、驾驭军队的才能和一往无前、不惜一切代价克敌制胜的坚韧精神。精锐的蒙古铁骑,在他的统率下,成为威胁各民族生存的可怕力量。

但是,蒙古的武力也并非是无敌于天下的。他们打西夏,前后用了二十二年,灭金用了二十三年,灭南宋的战争,竟长达四十四年之久。只是由于当时各国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内部矛盾重重,国势衰弱,才终于被一一征服。

## 二 六征西夏

党项贵族建立的西夏政权<sup>⑤</sup>,在宋辽、宋金相继南北对峙的形势下,维持

---

① 《史集》俄译本,页二六六至二八一。

② 《黑鞑事略》。

③ 《黑鞑事略》:“霆见鞑人行军只是一个不睹,是蛮逼而已。……然一军中宁有多少鞑人?其余尽是亡国之人。”又据《蒙鞑备录》载,按赤那邪(即按陈那颜)所统军有十万人。按成吉思汗即位时,翁吉剌部仅三千户,可见其中大多数是他族人。

④ 《元史》卷一,《太祖纪》。

⑤ 元昊建国时,定国号为“大夏”,在本国则自称“白上国”,宋、辽、金人或以“河西”称之,蒙古语讹为“合申”(Qashin)。辽、金人称党项族为“唐古”,蒙古语作“唐兀惕”(Tang'ut)。

着西北一隅的割据局面。西夏的疆域自元昊建国时即已“东距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都城兴庆府(即兴州,今宁夏银川市)内阻黄河,外有贺兰山为屏障。濒河诸州自古饶灌溉之利,唐来、汉源等大小渠道七十余条,可溉田九万余顷<sup>①</sup>;河西走廊诸州也适于耕种。河套及河外阴山、河西凉州、黑水(古弱水)一带则宜畜牧,历来有“凉州畜牧甲天下”的说法。因此境土虽不甚大,尚可耕牧立国。西夏拥有军兵六七十万<sup>②</sup>,加上“襟山带河”的有利地形,足以抗衡邻境大国,与宋和辽、金成鼎立之势。西夏统治者利用宋辽、宋金的矛盾,既对双方都称臣,又时而联此击彼或联彼击此,从中获利,所谓“偪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sup>③</sup>。以此在南北两大国的相争中保有自身的特殊地位。

由于境内党项、汉、回鹘、吐蕃、塔塔(达怛)等族人民的劳动,西夏经济得到相当发展。史称“其地饶五谷”;畜牧业尤以盛产骆驼著名,羊马亦多;手工业主要有织毡、兵器、陶瓷、印刷等行业,骆驼毛织成的毡毯质地优良,马可波罗曾誉之为世界最美、最好之毡,是西夏用于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党项贵族的汉文化程度颇高,西夏文化十分繁荣。但是,在经济发展、国力增强的同时,以党项贵族为首的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世禄之家悉以奢侈相高”,又崇尚佛教,到处兴建寺庙,糜费财物,更加重了对各族人民的剥削。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又不时发生。大抵自十二世纪中期以后,西夏国势就渐趋衰落,蒙古的入侵使内外矛盾更趋加剧,腐败现象有增无已,终致灭亡。

西夏北境与克烈、乃蛮两部接界,早有交往。王罕之叔古儿罕被也速该和王罕联军打败时,曾逃入夏境避难。后来王罕为乃蛮亦难赤所逼,跑到畏兀

---

① 齐履谦:《太史令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十。

②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载,西夏十二军之兵计五十余万,另有擒生十万;兴、灵之兵(都城戍卫军)二万五千,辅以“资贍”兵七万。宋神宗时,夏人致书宋将,称其国“提封一万里,带甲数十万。”

③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

儿,又从畏兀儿经西夏返回漠北。一二〇三年,成吉思汗灭克烈部,王罕之子亦剌合·桑昆也逃到西夏,过亦集乃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一路以剽掠为生,被西夏人逐出。后来成吉思汗大举攻夏时,即以西夏曾纳仇人亦剌合作为借口。

成吉思汗经常和金国打交道,而且早在蒙古统一前,就有金国叛臣投奔到他的麾下,因此他对南边金、夏两国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建国以后,他马上就想进攻金国,但不敢轻举妄动。因为金国毕竟是中原上邦,而西夏在金国之西,北与蒙古接境,如果与金合力,或从西面出一偏师北进,就可以成为对蒙古的极大牵制。成吉思汗为免除攻金时西夏可能构成的侧面威胁,采取先攻西夏的战略(《大金国志》卷二一蒙古“恐西夏议其后,乃大举兵攻之”),这是符合他的一贯做法的。

一二〇五年三月,成吉思汗灭乃蛮后,率军第一次侵入西夏,攻破边境城堡力吉里寨,毁其墙垒。从此进至经落思城<sup>①</sup>,复攻破之,并略取旁近诸地,掠其牲畜人口。四月,蒙古军带着大量战利品和无数骆驼、羊、马返回漠北。这只是一次抄掠性的战争。西夏修复了被破坏的诸城堡,庆幸蒙古没有深入,大赦境内,将都城兴庆府改为中兴府。蒙古的这次抄掠,并未引起西夏统治集团对北方强敌的警惕,内部的派系争权斗争再次爆发。一二〇六年,久专国政的镇夷郡王安全与罗太后合谋,废其堂兄桓宗纯佑,自立为帝,是为襄宗。

一二〇七年秋,成吉思汗以西夏不肯纳贡称臣,第二次侵入西夏,攻破斡罗孩城(即兀剌海城),四出掳掠。西夏集右厢诸路军抵抗,蒙古军不敢深入,于次年春退回。

一二〇九年秋,成吉思汗积极作侵金准备,为了防止从侧后来的威胁,必

---

<sup>①</sup> 《圣武亲征录》:“乙丑,征西夏,攻破力吉里寨,经落思城,大掠人民,多获橐驼而还。”一般以“经”为“经过”,“落思”为城名。但《史集》谓城名 Asākīnglūs,或作 kīnglūshī(见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四三,第二册一五〇,二五三),似经落思应连读为一城名。

须先征服西夏。于是发兵第三次侵入西夏,从兀刺海西关口进入河西。夏襄宗安全以太子承祜为主帅,以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率兵五万抵抗。蒙古击败西夏军,俘高逸,高逸不降被害。蒙古军进攻兀刺海城,守将出降,太傅西壁氏率兵巷战,力尽被俘。蒙古军长驱直入,进攻中兴府外卫要冲克夷门(贺兰山的一处关口)。嵬名令公率西夏守军五万拒战,挫败蒙古军,双方相持了两个月。待西夏守军斗志松懈,蒙古军设伏擒嵬名令公,攻下克夷门,进围中兴府。中兴防守坚固,不能攻下,蒙古军遂引河水灌城,居民被淹死无数。后外堤决,蒙古军营反被倒淹,只得撤围。成吉思汗派使者入城谈判,迫使安全纳女请和,每年向蒙古纳贡。西夏经过这次打击,向金求援又遭到拒绝,遂转而采取臣服蒙古、向金国进攻的政策。成吉思汗战略的第一步目的达到了。他不但获得了大量战利品,取得经济上的补给,又可以利用西夏来夹攻金朝。

蒙古军退后不久,西夏统治集团内部又发生了争夺权位的政变。一二一一年,襄宗安全被废,其子承祜也不得立,宗室齐王遵顼(安全的堂侄)被立为帝,是为夏神宗。

在蒙古南侵的形势下,西夏与金国的一些人认识到唇亡齿寒的道理,提出必须互相救援的意见。但两国统治者都鼠目寸光,乘人之危以谋己利。夏金关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坏了。一二〇九年西夏都城被蒙古包围时,遣使向金求援,金卫绍王竟说:“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不肯出兵。蒙古军退后,西夏即遣兵攻金葭州(今陕西佳县),以为报复。一二一一年遵顼即位后,对金关系更加恶化。这年冬天,他得到蒙古军败金军于浚河堡,直逼中都的消息,就派兵侵扰金涇、邠二州,并围攻平凉府。此后乘金国疲于蒙古攻掠之机,多次深入金境,攻占州城,杀掠吏民。金朝也时时进行报复。

一二一六年,一支蒙古军经西夏国境进攻金国关、陕地区,西夏出兵配合蒙古,打下潼关。次年,蒙古征调西夏兵从其攻金,西夏军被金人打败,损失甚重。自降蒙以来,西夏虽借蒙古之势屡屡攻掠金国州县,但金人抗蒙不足,打西夏则绰有余裕,所以西夏获利并不多。而役属蒙古之后,蒙古的征发日多,

使西夏疲于奔命,于是西夏朝内对这种政策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与蒙古的关系逐渐疏淡。

一二一七年,成吉思汗决定进兵西域,又命西夏出兵随征,被西夏拒绝,遂遣一支军队突入。此时西夏毫无边备,列城不能御,蒙古军再次包围中兴府,遵顼逃到西凉,遣人求降。成吉思汗决定暂时放下西夏,专事西征,蒙古军不久就退走了。

此后,木华黎统领蒙古军专征金国,不时遣兵假道夏境,并征召西夏兵从征。遵顼又甘心充当蒙古帮凶,以为金国大势已去,可以乘机取利,因此连年攻掠金国城寨。但西夏兵战斗力薄弱,屡为金兵所败。自遵顼即位以来,奉行附蒙攻金政策,夏金战争“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敝。”<sup>①</sup>由于蒙古军的抄掠、征发,特别是对金用兵,西夏国内人民耕织无时,田野荒废,饥民四散,国家财用困乏,虽妇人女子都知道国势濒于危亡了。但统治集团却仍然清歌夜宴,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宫中的浮费,对勋臣贵戚的赏赐,仍未能加以节制。这时,有些人出来反对遵顼的政策。一二二三年,遵顼遣太子德任统兵攻金,德任认为金国兵势尚强,建议与金约和,固谏不从,遂请避太子位,愿为僧,遵顼大怒,将他囚禁于灵州。御史中丞梁德懿上书切谏,痛陈时弊,并提出同样的和金意见,也被罢职。同年,遵顼遣步骑十万助木华黎攻金凤翔府,金兵坚守,西夏统兵官见不能取胜,士卒厌战,遂不告木华黎,率军退回。蒙古遣使问罪,遵顼畏惧,急让位于次子德旺,自称上皇。

德旺(夏献宗)即位后,改变其父的政策,决定与金国约和,一二二四年,夏、金和议成,称“兄弟之国”。德旺见成吉思汗统兵西征长期未回,以为有机可乘,竟遣使去联络漠北诸部,共抗蒙古。但这些措施都是为时已晚了。

木华黎死后,其子孛鲁奉命继续统军经略中原汉地。孛鲁去西域朝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就以西夏阴蓄异图,密令他伺机征讨。一二二四年秋,孛鲁

<sup>①</sup>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



率大军攻破银州,杀夏军数万,俘其大将塔海,掳掠牲口牛羊马驼数十万。

一二二五年,成吉思汗从西域返回蒙古。一二二六年,大举侵入西夏,兴兵的理由是西夏曾接纳仇人亦剌合·桑昆、不送质子和拒绝征调。发兵之前派了一个使臣到西夏责其不派兵随从西征且出言不逊之罪。此时西夏抗蒙派得势,驳回了成吉思汗的恐吓,宣布准备迎战。蒙古军攻下黑水等城,驻兵肃州之北,四出抄掠。遂进兵攻取沙州、肃州、甘州,诸州军民进行了英勇抵抗。肃州城破,遭到残酷屠杀,幸免者仅一百零六户<sup>①</sup>。甘州守臣曲也怯律之子察罕,十多年前即投奔成吉思汗,被收为养子。此次随征,遣人劝其父献城投降。副将等杀曲也怯律,并杀蒙古使者。城破,成吉思汗欲尽屠之,因察罕进言杀使拒降之事与百姓无干,才免于屠杀。蒙古军攻西凉府,西夏守将力屈投降,遂进至河曲,取应里等县。这时夏献宗德旺忧惧而死,夏人立其侄南平王睨。十一月,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进攻灵州(朵儿篾该),睨遣嵬名令公统率十万军队来援<sup>②</sup>。蒙古军渡河进击,消灭西夏军,杀死无数,尸体堆积如山。随后成吉思汗到盐州川驻冬,蒙古军在盐州一带肆行杀掠,居民有的打土洞、石洞避兵,得免于难者百无一二。

成吉思汗认为经过此次打击,西夏已不再有力量抵抗,因此只留一部分军队攻打中兴,并派察罕入城招谕。他自己则于一二二七年正月率军南下,进入金境,攻陷临洮府和洮、河、西宁、德顺等州,别遣一军攻入宋境掳掠。四月,驻夏于六盘山。六月,继续向南进兵,至秦州清水县。七月,病死。临死前吩咐:秘不发丧,以免被敌人获悉;待西夏国主和居民在指定时刻出城时,立即全部把他们消灭<sup>③</sup>。

---

① 《元史》卷一二二,《昔里钤部传》。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三一)谓夏国主亲率五十万人从额里合牙来战。此据《元史》卷一二〇《察罕传》。嵬名令公于一二〇九年守克夷门时被俘,李安全献女求和后释还。

③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三三。

蒙古军包围中兴半年,中兴军民坚壁拒守,但因城中食尽,兵民皆病,睨被迫投降。蒙古诸将遵照成吉思汗遗命,杀之。中兴居民也遭到杀掠。因察罕力谏,才停止了屠杀。西夏至此国亡。

### 三 蒙金战争

#### 金朝的衰败

金朝在章宗统治时期就已趋向衰落。蒙古攻入后,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经济凋敝,民生困苦,早已存在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同时迸发出来,导致了金朝的灭亡。

金章宗后期,娱情声色,上下偷安,竞尚奢侈,政事多坏。女真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斗争又很激烈,章宗杀其叔郑王永蹈、赵王永中,以“柔弱鲜智能”的卫王永济为继承人。永济卑怯,蒙古军一到,未战先乞和;蒙军攻中都,掠旁近州县,他束手无策,与臣下相对哭泣。朝廷赏罚不明,任人不当,参知政事完颜承裕(胡沙)失野狐岭(在今河北万全膳房堡北),败涔河堡(在今河北怀来东),损兵折将,却复任为元帅右监军,使讨辽东耶律留哥,终于仍是败绩;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胡沙虎)弃城逃跑,遇蒙军不战而逃,又擅取库银,夺官民马,均不加罪,反以其资格老可用,使领军守卫中都城北。一二一三年胡沙虎以怠忽职守受责,竟发兵入都,杀永济,另立完颜珣(宣宗,一二一三至一二二三年在位),自为太师,尚书令。元帅右监军朮虎高琪因兵败惧罪,又先下手杀掉胡沙虎。

金宣宗同样畏敌如虎,即位后向蒙古献公主、金帛求和,蒙军一退,即弃中都南迁汴京,其后又迭次乞降。右丞相朮虎高琪操纵朝政,“妒贤能,树党羽”,排斥异己,祸害忠良,并将重兵集中在京城一带以自固权位,置河北州县于不顾。后宣宗与其他权臣杀掉高琪。直到金哀宗(一二二四至一二三一年在位)时,蒙古军已围逼都城,统治集团内争权夺利的斗争仍未停止。

金宣宗南迁后,统治集团仍继续过着腐朽豪华的生活。宫中供奉与平时

无异,贵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尚,服食车马,惟事纷华,汴京城里买卖明金衣服、珠玉犀象者比过去更多。官僚机构更加腐败,地方官多是贪酷之徒,乘机搜括百姓,侵吞官赋,虽然时加撤换,不过除狼得虎而已。

军队腐败的情况最为严重。猛安、谋克户进入中原后,各占田土,剥削佃民,生活逐渐腐化,军纪败坏。到后期此辈竟成为既不能耕、又不能战的游惰之人,“聚饮赌博,习以成风”。所任将帅大抵先论出身官品,或门阀膏粱之子,或亲故假托之流,这班人平时骄纵不法,勒索士兵,战时则首尾退缩,各保自己的身家性命。进士刘炳向金宣宗上疏说:“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择骁果以自随,委疲懦以临阵,阵势稍动,望尘先奔,士卒从而大溃”<sup>①</sup>。军制也极为混乱,军官设了很多,十羊九牧,号令不一;至以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猛安,每谋克能作战的才十八人,其中壮健者又被军官挑去做私差,以致不成队伍<sup>②</sup>。这样的军队打仗不行,欺压百姓却是能手,军官勒索士兵,士兵就转而掠夺百姓,“排门择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

《金史·食货志》说,历代国家危亡之际,往往出现财政困难,但“国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自章宗时,因对北方诸部战争、修筑界壕边堡以及发生水灾,经费匮乏,就用滥发交钞来填补。由于入不敷出,交钞只发不收,民间称为“老钞”,以至“万贯唯易一饼”<sup>③</sup>。蒙古攻入以后,领土日缩,而军费大增,更倚赖发钞来支撑军用和统治集团的奢侈消费。交钞贬值,又改换名目发行“宝券”、“通宝”之类,钞越发越轻,至“千钱之券仅值数钱”,民间不愿使用。金政府用发钞来搜刮百姓,仍未能解决财政困难,徒为害人而已。与此同时,又加重对人民的赋税剥削。南迁后,皇室、官僚机构和军队的负担都压在

① 《金史》卷一〇六,《刘炳传》。

② 《金史》卷四四,《兵志》;卷一〇九,《陈规传》。

③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河南人民头上,赋役增加到三倍以上,而政府还往往“预借”数年。征收期限严急,不能完纳即捶楚加之,农民至被迫将未成熟的庄稼割掉以补不足。所以人民终不得不弃田庐逃亡。政府因国用乏竭,又迫使未逃者交纳逃户赋税,以致逃亡者越来越多。如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州)原有六万户,自宣宗南迁后不过六年,人民因不胜负担,相继逃亡,剩下的还不到十分之一;砀山县(今安徽砀山)至“野无居民”<sup>①</sup>。农民四散流离,政府的赋入也失去了。

女真贵族和猛安、谋克官兵对汉族人民的剥削压迫,使金朝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尤其是金章宗时的“括田”造成的仇恨最深。当时掌兵者借口军户所给之地不足自赡,因而无斗志,请“括民田之冒税者分给之”,而武夫悍卒倚势肆意占夺民田,山东、河北老百姓有种了几辈子的上好田地,也指为“冒占”括去。汉族人民将这些夺去他们生活之资的女真人视为血仇骨怨,乘金朝在蒙古军打击下节节溃败的机会,纷纷起来反抗压迫,寻踪捕影地搜杀一贯欺压他们的女真人<sup>②</sup>。一二一四年,山东、河北各地的起义者众至数十万,其中力量最大的是山东的红袄军。红袄军领袖杨安儿于一二一二年发动起义,李全、刘二祖等起而响应,攻占山东许多州县,与金朝官军进行了激烈战斗。杨安儿牺牲后,其女杨妙真继续统领起义军,与李全联合起来。李全又合并了其他一些失败的红袄军队伍,并联络南宋,坚持斗争,表示“宁做江淮之鬼,不作金国之臣”。红袄军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金朝的统治。

在蒙古入侵、人民起义、金朝统治陷于崩溃的情况下,各地汉族地主豪室也纷纷组织武装,据地自雄,一时“河北群雄如牛毛”<sup>③</sup>。这些人大都以保全家产、性命,或乘乱“攫取富贵”为目的,只要能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获得更高的官赏,投靠女真统治者或蒙古统治者都可以。因此蒙古军一来,很多人就投

①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

② 元好问:《张万公神道碑》,《遗山集》卷一六;《完颜怀德神道碑》,同书卷二八。

③ 魏初:《重修北岳露台记》,《青崖集》卷三。

拜了,使金朝失去了河北广大地区。

金灭辽后,对契丹人实行民族压迫,特别是镇压耶律窝斡起义以后,对契丹人的防制更为严密,或将他们强迫遣送到东北路边远地屯种,或分散到女真人中居住。到蒙古强盛时,更怕契丹人与之联络,“下令辽民一户,二女真夹居防之”<sup>①</sup>。因此契丹人莫不切齿痛恨,思复旧仇。耶律阿海能通诸国语,金章宗选派他出使克烈部王罕,他一到蒙古,就与铁木真(当时还依附于王罕)结纳,告诉铁木真:“金国不治戎备,俗日侈肆,亡可立待”。次年再出使,即携其弟秃花同往,兄弟俩留北不还,金朝拘其家属,亦不顾惜。后成吉思汗攻金,他们即为向导,为先锋<sup>②</sup>。移剌捏儿闻成吉思汗举兵南略,对亲信说:“为国复仇,此其时也”,即率领族人投奔蒙古军,献攻金十策<sup>③</sup>。石抹也先年幼时听其父说辽亡国故事,即大愤曰:“儿能复之”,后果匹马投成吉思汗,提出取金东京,荡其开基根本之地的建议,并随木华黎攻取东京<sup>④</sup>。

金朝以诸属部军守北方边境,称为乣军,任命节度使或详稳(多为本部首领)统之。他们与金朝统治者间也有矛盾。汪古部就是乣军之一,为金守净州北边墙。其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于一二〇四年即依附铁木真。一二一一年成吉思汗南下时,汪古部首领因怨恨金朝,即献其所守关隘,并引导蒙古军侵入金境<sup>⑤</sup>。金军于浚河堡大败后,金朝召东北路乣军入卫中都。一二一四年,宣宗南迁,乣军乘机杀其主帅,投降蒙古,且助蒙军攻陷中都。

金朝在蒙古入侵时期,与其邻国西夏、南宋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一二一四年宋遣真德秀使金,因蒙古军已入河北、山东,起义军又所在蜂

① 《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传》。

② 同上书,卷一五〇,《耶律阿海传》。

③ 同上书,卷一四九,《移剌捏儿传》。

④ 同上书,卷一五〇,《石抹也先传》。

⑤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四〇;阎复:《高唐忠献王碑》,《元文类》卷二三。



起,故道阻未达。回朝后,他报告了金国危亡在即的情况,建议断绝给予金的岁币,整饬边防。宋宁宗采纳了他的建议。金朝因河北失于蒙古,领土缩小,国用匮乏,金宣宗和权臣朮虎高琪等以南宋软弱可欺,企图向南方扩张,掠夺财物、土地,以为挹彼注此之计。当时有不少金朝官员反对南侵,主张联宋抗蒙,但朮虎高琪一概不采纳,于一二一七年出兵攻入宋境。此时金军兵力已大不如昔时,而南宋也作了准备,金国境内的起义军又多投奔宋朝,协助抗金,宋军受到鼓舞,抗战颇有起色,因此能屡屡挫败金军。双方打了七年,互有胜负,金朝并没有捞到便宜,徒然损伤国力,削弱了抵抗蒙古的力量。对西夏的战争打得更长,前后十余年,结果也是两国俱敝。

在这种形势下,金国必亡的命运是十分明显的了。

### 成吉思汗攻金

蒙古和金朝关系的最早记录是合不勒汗应召入朝,这大概是金太宗时(一一二三至一一三五年在位)的事。随后由于合不勒汗杀了金朝使臣,双方关系就长期处于敌对状态。金朝多次出兵征讨,或令属部塔塔儿进攻蒙古,先后捕杀了蒙古部首领俺巴孩汗、斡勤巴儿合黑、合答安把阿秃儿等。蒙古忽图剌汗也率军攻金,挫败金朝军队,并夺取了一些地方<sup>①</sup>。《蒙鞑备录》记载说,大定年间(一一六一至一一八九年),燕京及契丹地有民谣云:“鞑鞑来,鞑鞑去,赶得官家没去处”,金世宗闻之,“乃下令极于穷荒出兵剿之,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谓之‘减丁’。”出征官兵多掳掠蒙古子女卖为奴婢。又蒙古每年入贡时,金朝只在塞外受之,不许入境。蒙古人因此“怨入骨髓”。“减丁”的传闻虽未必可靠,但金世宗时北方常有边患,因而屡次出兵“经略”,则是事实。后来成吉思汗起兵攻金之前,向上天祈祷,说因为金朝皇帝用酷刑杀死了俺巴孩汗等先祖,所以他此去复仇,求上天给以护助<sup>②</sup>。金朝对属部实行民族压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四二。

② 同上。

迫,引起他们的深刻仇恨,终于被成吉思汗利用作为鼓动部众进攻金朝的理由。

金章宗承安元年(一一九六年),因成吉思汗协助讨平塔塔儿部,封予他“札兀惕忽里”的官号。虽有父祖之仇,金朝毕竟是中原上邦,成吉思汗对这个不大的官职仍然十分看重,喜以官号自称来抬高身份<sup>①</sup>;并且确实保持了对金的臣属关系,直到他统一漠北做了大汗以后,还按例每年亲自到金朝边境上的贡场进奉<sup>②</sup>。但金朝此时国势已衰,虽然压服了属部的叛乱,却不得不把边防线南移,再次役使兵民穿壕筑障,以防范蒙古等部犯境,而听任克烈、蒙古去占领边墙以外的广大地区。就在这时,有些不满金朝统治的契丹和汉族人投奔蒙古,向成吉思汗报告了金章宗“杀戮宗室,荒淫殊甚”和金朝“不治戎备,俗日侈肆”的情况<sup>③</sup>;往来于山东、河北各地经商的回鹘商人也向他具言中原民物繁庶,鼓动他南侵<sup>④</sup>。因此,成吉思汗对金朝的情况早有了解。建国后,他就计划攻金,但还未敢轻动,宁愿先采取攻掠西夏的战略。

成吉思汗曾到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城卜子古城)进贡岁币,金章宗命卫王永济受贡。一二〇八年章宗死,永济即位,遣使传诏蒙古,成吉思汗知道新皇帝是他,就说:“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于是更轻视金朝,不肯按照传统礼节跪拜受诏,乘马北去。永济得使者回报,乃策划等成吉思汗再次入贡时杀之,然后提兵北伐蒙古。成吉思汗得到金乱军的密报<sup>⑤</sup>,决

---

① 《元朝秘史》第一七九节。

② 《元史》卷一,《太祖纪》;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一九“鞑靼款塞”条载:“〔鞑靼〕又有白黑之别,今特默津乃黑鞑靼也。皆臣属于金,每岁其王自至金界贡场亲行进奉。”特默津即铁木真。

③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太师鲁国忠武王》,引元明善撰《东平王世家》;《元史》卷一五〇,《耶律阿海传》;《大金国志》卷二十一。

④ 《蒙鞑备录》。

⑤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九,“金人南迁”条。

定先发制人,于一二一一年春亲统大军南下攻金<sup>①</sup>。

蒙金战争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二一一年至一二一六年,蒙古军由成吉思汗亲临指挥;第二阶段从一二一七年至一二二九年,木华黎奉命经略中原,木华黎死后,由其子孛鲁继续指挥;第三阶段从一二三〇年至一二三四年,窝阔台与拖雷分兵攻金,最后与南宋联合灭亡金朝。

一二一一年春,成吉思汗大军南下,由达里泊进入金境,先锋哲别攻破金西北路边墙上的乌沙堡,取乌月营。金军统帅独吉思忠(千家奴)因失于备御,被解职,由完颜承裕(胡沙)主持军事。承裕见蒙古军势盛,从抚州(今河北张北)退往宣平(今河北张家口西南),于是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西南九连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四郎城)、抚州三州之地尽失。成吉思汗至抚州,金朝以大军三十万(一作四十万)守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膳房堡北),成吉思汗挥师攻之,金兵大败,“死者蔽野塞川”。承裕等慌忙觅路逃跑,蒙古军跟踪追至浍河堡(今河北怀安东),将金军大部分消灭,史称“金人精锐尽没于此”<sup>②</sup>。蒙古军前锋突入居庸关,攻中都不克,退出。

成吉思汗长子朮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率领另一路军队由西南路进入边墙,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献关,且为向导,蒙古军攻下净、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白塔镇)、云内(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古城)、东胜(今托克托县)、武(今山西五寨县北)、朔(今山西朔县)等州,抄掠后退去。金西京(今山西大同)留守纥石烈执中(胡沙虎)弃城逃回中都。

---

① 成吉思汗攻金的决定是一二一〇年作出的。耶律楚材《进西征庚午元历表》(《湛然居士集》卷八)云:“岁在庚午(一二一〇年),天启宸衷,决志南伐。辛未(一二一一年)之春,天兵南渡,不五年而天下略定。”

② 《圣武亲征录》。此次战役是蒙古攻金之初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因此十分有名。蒙古方面的记载强调忽捏坚答巴(Hüneggen-daba,野狐岭)的战斗,金朝方面的记载只提浍河堡的溃败。战役发生的年代诸书记载不一,或谓在辛未年(一二一一年,金大安三年,元太祖六年),或谓在壬申年(一二一二年),《元史·太祖纪》则分为两次。此从《圣武亲征录》及元明善《东平王世家》。

一二一二年,蒙古军乘胜攻陷宣德州(今河北宣化),至德兴府(今河北涿鹿),先为金守军所败,拖雷等奋勇攻城,拔之,抄掠境内诸城村后退出。成吉思汗继续攻取山后诸州县,威宁(今内蒙古兴和北)防城千户刘伯林降;进兵攻西京,歼灭奥屯襄所率来援金军,遂围西京,为流矢所中,撤回。同年,遣先锋哲别往攻东京(今辽宁辽阳),东京军民坚守,哲别佯退五百里,守者以为敌退,不为备,哲别连夜轻骑驰回,攻入城中,大掠而还。

一二一三年,成吉思汗会集大军,再入野狐岭,连下宣德、德兴诸城,进至怀来(今河北怀来东),与完颜纲、朮虎高琪所率虬、汉守军激战,击溃金军,追至居庸北口,“将金国的契丹、女真、主因等勇猛的军每行胜着,直到居庸关(察卜赤牙勒 Chabchiyal),杀的人如烂木般堆着”<sup>①</sup>。这是蒙古攻金的第二次大胜利。因居庸关防守坚固,成吉思汗采取迂回包抄战术,留怯台等攻居庸,自率主力驰向西南,取紫荆口(河北易县西)入关。金朝发觉蒙古军意图,急遣兵赴援,但已经迟了。金军刚到,蒙古军已度关下至平地,遂破金军。哲别奉命率精骑驰攻南口,出其不意,破之,进至北口,与怯台军里外夹攻,取居庸关,逼临中都。成吉思汗攻下涿、易(今河北涿县、易县)二州,命怯台等率一部分军队围中都,其余分兵三路:朮赤、察合台、窝阔台率右军,循太行山东麓而南,直抵黄河北岸卫(今河南汲县)、孟(今河南孟县)诸州,再沿太行西麓向北,掠河东南、北路诸府州而还;哈撒儿、斡赤斤等率左军向东,掠蓟(今天津蓟县)、平(今河北卢龙)、滦(今河北滦县)诸州而还;成吉思汗与拖雷率中军南下,掠河北东路、大名、山东东、西路诸府州而还,另遣木华黎一军攻陷密州(今山东诸城),屠之。

一二一四年春,三路军会合于中都附近,成吉思汗驻中都北郊黄甸(失剌客额儿 Sira-ke'er),向金朝要索贡献。金宣宗献卫绍王女歧国公主(因她是金朝皇帝的女儿,出身高贵,在成吉思汗诸妻中位居第四,称“公主合敦”)及金

<sup>①</sup> 《元朝秘史》第二四七节。

帛、童男女等求和,成吉思汗引军退出居庸,驻夏于鱼儿滦(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泊),并遣木华黎、孛秃攻取辽西、辽东诸州郡。

五月,金宣宗南迁。六月,驻守中都之南的纥军哗变,杀其详稳,投降蒙古,成吉思汗遂遣三模合拔都领契丹人石抹明安(野狐岭战役中降蒙)、汉人王楫(金涿鹿守将,成吉思汗进兵紫荆口时投降)为向导,引蒙古军南下与纥军会合,围攻中都。中都附近州县守将和官员纷纷投降,前来救援的金军均被击溃,留守中都的主帅平章政事抹燃尽忠弃城遁,于是一二一五年五月,蒙古军进占中都。成吉思汗当时驻在桓州,得到报告,即派失吉忽秃忽等籍中都帑藏,尽数运走。留札八儿火者、石抹明安镇守中都。

同时,木华黎军取临潢府(治所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北京路(治所在今内蒙古宁城县大名城)诸州县,大败金军于花道(今内蒙古赤峰东南),进克辽西重镇北京,遣人招降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兴中土豪石天应等杀府官降蒙,义州(今辽宁义县)契丹土豪王恂及附近地区地主、土豪多率所部黑军乡党投降。锦州张鲸先是反金自立,后降蒙古,一二一五年初夏,被派随蒙古军攻打河北、山东地区,因企图叛逃被杀。其弟张致遂据锦州反蒙,攻下辽西许多州县,并占领兴中府,声势很大,坚持到一二一六年秋才失败。

取中都后,成吉思汗又派脱栾扯儿必统蒙古军及投降的契丹、汉军抄掠河北、山东各地,遣三模合拔都由西夏趋关中,出潼关,大掠河南而还。他自己则于一二一六年春回到克鲁伦河的斡耳朵。

这个阶段战争的特点,是蒙古军以掳掠、烧杀为目的。一二一三年秋至一二一四年春,数月之间,“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sup>①</sup>蒙军攻下保州(今河北保定)时,尽驱居民出城,先下令杀老者,“卒闻命,以杀

---

<sup>①</sup>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一九,“鞑靼款塞”条;《两朝纲目备要》卷一四,“金人告迁于南京”条。



为嬉。后二日,命再下,无老幼尽杀”,“尸积数十万,磔首于城,殆与城等”<sup>①</sup>。永清地主史秉直降蒙,命管领所掠降人十余万家,迁之漠北,路上冻饿而死者甚多<sup>②</sup>。兵后田野荒芜,王楫建议留些牛让老百姓种地,派人在卢沟桥索北返军士所驱牛,十取其一,得数千头<sup>③</sup>,可见所掠牛仅经过卢沟桥者就达数万头。截至一二一五年秋,被蒙古军攻破的城邑就有八百六十二处,几乎黄河以北<sup>④</sup>所有土地都遭到蒙古铁骑的蹂躏。但在大部分州县,蒙古军都是杀掠后即离去,金朝又重新派官镇守,而其中一部分则落入当地土豪地主武装的控制中。

### 木华黎经略中原

一二一七年秋,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以中原官号“太师国王”,赐九尾白旗,使承制行事,命统札剌亦儿、弘吉剌、亦乞列思、兀鲁、忙兀、汪古诸部军以及归降的契丹、女真、纥、汉诸军,专征金朝。成吉思汗对木华黎说:“太行以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授予他攻取中原的全权。一二二三年木华黎死后,由其子孛鲁继承他的职务。

这个阶段蒙金战争的特点是:一、蒙古更注重利用汉族地主武装,金朝也用高爵招徕各地土豪,往往是两方面地主武装之间展开了争城夺地的激烈战争。二、蒙古方面除继续进行杀掠外,同时也开始注意占领城邑、安集百姓,为经久之计。一二二二年有人向金宣宗上奏说:“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来春去,今已盛暑,不回,且不嗜杀,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测也。”<sup>⑤</sup>三、战争的进展呈现拉锯形势。

---

① 刘因:《孝子田君墓表》,《静修先生文集》卷四;郝经:《孟升卿墓志铭》,《陵川集》卷三五。

② 《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传》。

③ 同上书,卷一五三,《王楫传》。

④ 一一九四年黄河夺淮入海,这里所说的黄河以北,包括今山东地区。

⑤ 《金史》卷一〇八,《胥鼎传》。

在成吉思汗攻金时期,就有不少契丹族和汉族官僚地主武装投降蒙古,对蒙古攻金起了很大作用。石抹明安和王檣奉命随三模合拔都攻中都,建招降之议,得汉军数万,取中都旁近许多州县,遂占领了中都。河北诸郡民间组织“清乐社”的头目、永清地主史秉直投靠蒙古(一二一三年),其子史天倪选清乐社壮勇万人组成清乐军,随蒙古军攻城略地,大得其力。义州契丹人王珣以“保亲族”为名,招集乡人至十余万,向木华黎投降(一二一五年)。兴中府土豪石天应杀府官献城于木华黎(一二一五年),他善造战攻之具,统所部黑军从木华黎攻金,屡立战功。石抹也先招募精锐之士万二千人,亦号黑军<sup>①</sup>,成为蒙古攻略辽西诸地一支很大的力量。成吉思汗看到了这些地主武装的作用,命木华黎多多“招集豪杰,勘定未下城邑”<sup>②</sup>。凡率部或纳土归降者,都授以统军管民的各种职务,许其世袭,并听其自辟僚属。

木华黎受命专征后,继续奉行这一政策,他手下的契丹、女真、汉族地主武装成为攻金的重要力量。

一二一七年,木华黎军攻河北、山东诸州,刘伯林、石抹也先等所部汉军从,陷蠡州(今河北蠡县)、大名府、益都、密州等城。易州人张柔聚宗族数千家,选壮士组织队伍,结寨自保,金朝授以经略使职。一二一八年兵败降蒙,木华黎命他仍用旧职,统领本部兵马,于是张柔招集部曲,攻下雄、易、安(今河北新安西南)、保等州,军于满城(今河北满城县西)。当时河北地区兵力最强的地主武装是据有真定(今河北正定)的武仙。武仙归附金朝,屡次发兵攻张柔,张柔也攻入武仙控制的地区。一二一九年,先已降蒙的藁城土豪董俊攻入真定,逐走武仙。一二二〇年,金朝封武仙为恒山公,武仙得金朝援兵,打败董俊,复据真定。

---

① 此据黄潜:《石抹继祖神道碑》,《黄金华文集》卷二七;许谦:《库禄满行状》,《许白云集》卷二。《元史》卷一五〇《石抹也先传》谓系灭锦州张致后,“籍其私养敢死之士万二千人号黑军者,上于朝。”未知所据。

② 苏天爵:《郑澧神道碑》,《滋溪文稿》卷二〇。

一二一八年,木华黎统兵攻入山西,史天倪、史天祥兄弟等各领所部汉军从行,打下太原、平阳、绛州等八十余城。一二一九年,金郭文振、张开军收复太原,胡天作军收复平阳。次年,金朝封郭文振为晋阳公,张开为上党公,胡天作为平阳公,让他们分疆守土,与蒙古军作战。

木华黎主力攻山西时,河北有几支地主武装夺据了许多地方,与降蒙派地主武装相互攻战,金朝也封他们为公。一二二〇年,木华黎将攻略的重点转到河北,亲驻满城,遣史天祥攻真定。天祥劝降武仙,于是真定复归蒙古,邢(今河北邢台)、相(今河南安阳)、卫、怀(今河南沁阳)、孟等州相继被蒙古军攻下。

山东是红袄军的活动地区。一二一八年红袄军领袖李全归附南宋,宋授以京东路兵马副都总管之职,遂用宋朝名义招集义军,收复山东南部诸州。益都张林(宋授京东安抚使)、济南严实(宋授济南治中)都相继归宋,一时山东全境均为宋有。但南宋对李全一直不信任,支持不力,而山东各支武装力量名义上虽附宋,实际上则各据地盘,为自己的利益打算,首鼠两端,游移于金、宋、蒙古之间。一二二〇年秋,木华黎军入济南境,严实见蒙古强大而“宋不足恃”,遂以所控制的彰德、大名、磁、洺(今河北永年东南)、恩(今山东武城旧城)、博(今山东聊城)、滑(今河南滑县东)、浚(今河南浚县)等州三十万户降蒙,木华黎承制授以山东西路行尚书省事,使总管本部军民。当时严实“据上流之便,握劲锋之选,威望之重,隐若敌国。人心所以为楚为汉者,皆倚之以为重。”<sup>①</sup>他的投降,使蒙古不战而取得大片土地,攻略山东的力量大大加强了。严实助蒙古军攻下曹(今山东菏泽)、濮(今山东鄄城北)、单三州;一二二一年入据东平,遂于此立行台。同年,益都张林、红袄军石珪等也相继投降了蒙古。

一二二一年秋,木华黎率蒙古军主力及石天应、史天祥等汉军攻山西、陕西。由东胜渡河,征召西夏兵五万从战,取葭州,使石天应守之;攻延安不克,

<sup>①</sup> 元好问:《严实神道碑》,《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六。

破绥德、鄜(今陕西富县)、坊(今陕西黄陵)等州,从丹州(今陕西宜川)东渡黄河,取隰州。一二二二年,蒙古军复取太原、平阳,皆设官置守。冬,木华黎率大军渡河而西,攻下同州(今陕西大荔)、蒲城,径趋长安。金京兆行省完颜合达固守,蒙古军攻不下,遂西攻凤翔,再召西夏兵助战。凤翔军民英勇抵抗,木华黎围攻了一个多月,仍不能克,西夏军帅又率师离去,只得引兵退还,于一二二三年三月死于闻喜。

武仙降蒙后,木华黎命史天倪为河北西路都元帅,治真定,以武仙副之。但两人势力不相上下,武仙对史天倪不服,常闹矛盾。一二二五年,史天倪攻取武仙部下所据山寨,武仙怕他进一步来收拾自己,就设谋请史天倪赴宴,将他杀掉,以真定地投归金朝。一时河北震动,许多州县都随着叛蒙附金。孛鲁命史天泽袭其兄职,招集史氏部曲攻武仙,并遣肖乃台率蒙古军助之,藁城董俊亦出兵会攻,武仙败走汴京,真定及河北诸州又为蒙古占领。

当木华黎率主力进攻山、陕时,原红袄军首领彭义斌(南宋授为大名路总管)于一二二二年出兵攻取山东州县,严实的兵卒和所控制的地区多被他所得。彭义斌又攻败李全,得其降卒,兵势大振,遂于一二二五年围攻东平,严实被迫与他约和。彭义斌提兵西进,并与武仙联合,取真定。孛里海所统蒙古军至,严实率部投归孛里海,合兵攻彭义斌,战于内黄,彭义斌战败被俘,不屈而死。严实与蒙古军复取所失州县。一二二六年,济南土豪张荣降蒙。当时山东东路大部分地区在李全控制下,李全捕张林送于宋,进占益都<sup>①</sup>。带孙(木华黎弟)统蒙古军和严实汉军攻益都,孛鲁亦领兵入山东援助。李全抵抗到一二二七年初夏,力尽出降,于是山东全境尽为蒙古所有。孛鲁以李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

至此,金朝在河北、山东的地盘丧失殆尽,虽然在山西打了几次胜仗,收复了平阳、太原等地(一二二七年),但已难挽回整个败局了。就在这时,成吉思

<sup>①</sup> 据《宋史·李全传》,全逐张林,入据益都,事在嘉定十五年(一二二二年)。

汗亲自率领的大军在击溃西夏主力后,挥师入金,攻陷了临洮等府州。金哀宗赶紧派使臣带了大量珠宝向成吉思汗求和。不久,成吉思汗在清水县附近死去。据载,他临死前定下了这样的灭金方略:

“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 蒙宋联合灭金

成吉思汗死后,在陕西的蒙古军继续向凤翔等地进攻。一二二八年蒙古军八千人入大昌原(今甘肃宁县西),被金完颜陈和尚率领的四百骑击败。金朝与蒙古打了近二十年仗,才第一次得到这么辉煌的胜利,颇起了一点振奋作用。一二二九年窝阔台即位后,决定亲自出征金朝。

一二三〇年秋,窝阔台与拖雷率军渡漠而南,攻拔天成等堡,进入山西,渡过黄河,与陕西蒙古军会合,攻取凤翔。金哀宗命行省完颜合达、移剌蒲阿从閿乡(今河南灵宝西)提兵出关救援,合达等兵至渭北,见蒙古军势盛,慌忙收兵入关。次年春,蒙古军攻破凤翔,金弃京兆,迁民于河南,潼关以西尽为蒙古所据。

一二三一年夏,窝阔台避暑于官山九十九泉(今内蒙古卓资北灰腾梁),大会诸侯王,商议攻金之策。当时,金以重兵把守潼关,不容易攻,猛将速不台在此连连受挫;黄河一线守备亦严,武仙一军屯于北岸卫州,史天泽曾率军攻之,不克。蒙古军进展缓慢。窝阔台采纳拖雷的意见,决定分兵三道进征:窝阔台自统中军,渡河,由洛阳进;斡赤斤以左军由济南进;拖雷总右军,由宝鸡南下,通过宋境,沿汉水达唐、邓,以成包抄之势,期于次年正月会师汴京。据说打下凤翔时,有降人李昌国曾向拖雷建议:“金主迁汴,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若出宝鸡,入汉中,不一月可达唐、邓。金人闻之,宁不谓我师从天而下乎。”拖雷十分赞成,就把这个建议向窝阔台提出,并自领这最关键的一路。

这年秋天,窝阔台军围攻河中府城(在今山西永济西),金兵拼命抵抗,打



了二个月,才将城攻破。遂由白坡渡河,进屯郑州。金卫州节度使弃城逃到汴京,黄河一线的防御瓦解了。

拖雷出宝鸡,遣搠不罕使宋请借道,被宋边将所杀。于是拖雷提兵破大散关,攻入汉中,破凤州、西和(今甘肃西和)、沔州(今陕西略阳)、阶州(今甘肃武都)、兴元(今陕西汉中);前锋还南渡嘉陵江,陷阆州(今四川阆中),大掠而回。蒙古军进而从金州(今陕西安康)东下,取房州、均州,渡过汉水,进入邓州境。前一个月金朝已得到蒙古军由金州东下的报告,急忙调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军自阆乡驰守邓州。合达等以二十万大军据险设伏于邓州西禹山,小却蒙古军,即以大捷奏报。拖雷兵不满四万,遂避开金兵主力,以轻骑“散漫而北”,径趋汴京。合达发觉后,即从邓州率军尾追,路上与杨沃衍、武仙军会合,继续北进,入援汴京。拖雷使骑兵沿途袭击,使金军疲惫不堪。一二三二年春(金正大九年正月),金军进至钧州(今河南禹县)南三峰山,拖雷集精骑阻截。时值大雪,金“军士被甲冑僵立雪中,枪槊结冻如椽,军士有不食至三日者”<sup>①</sup>。蒙古军乘其困惫,发起猛攻,金军大溃,武仙遁走,移剌蒲阿被俘,完颜合达、杨沃衍走入钧州,蒙古军攻钧州,沃衍自杀,合达在城破时被杀。

三峰山一战,金朝的精锐丧失几尽,潼关守将也献关投降,河南十余州均被蒙古攻陷。三月,窝阔台、拖雷北还,留速不台攻汴京。金哀宗及其军政大臣惊恐万状,向蒙古求和,而汴京军民则奋勇抗战,用震天雷、飞火枪等火药武器打击攻城的蒙古军,中炮死者极多,速不台引军暂退。这时周围州县俱遭蒙古军抄掠,难民纷纷逃入汴京,城中人口激增<sup>②</sup>,入夏后瘟疫流行,死者达九十余万人。七月,蒙古遣使者唐庆等人城迫金朝投降,被金将士杀于馆舍,于是“和议”断绝。蒙古军于中牟击溃入援的金军,汴京陷于粮尽援绝的境地。十

<sup>①</sup> 《金史》卷一一二,《移剌蒲阿传》。

<sup>②</sup>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载,汴京投降时,避兵居汴者有百四十七万人(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作户百四十七万)。如加上饥疫死者九十余万人,则当时汴京人口竟达约二百五十万人。

二月,金哀宗带着一部分臣僚和军队出京东走,次年(天兴二年,一三三三年)正月,辗转至归德(今河南商丘)。同月,留守汴京的西面元帅崔立叛,杀留守长官参知政事完颜奴申等,投降蒙古。速不台以汴京军民曾持久抵抗,杀伤蒙古将兵,遣人向窝阔台奏请屠城,耶律楚材谏言城中多能工巧匠和富实之家,杀之则一无所得,遂诏免之,括工匠儒医等迁于河北。

此时,金朝虽大势已去,但尚有归德及南境诸州之地。蒙古撒吉思卜华部追击金哀宗至归德,四月,遭守军夜袭,一军尽没。洛阳于一二三二年春末被破,后金帅复立府事,帅出战死,部将强伸率军民顽强坚守达十个月,蒙军屡攻不克。武仙自三峰山败后,收集溃军得十万,兵势稍振,屯邓州一带。蒙军经长久作战,兵力消耗,病者又多,所占河南各地多荒芜,得粮亦难,要一举灭金并不容易。于是派王檝使宋,议联合攻金,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邹伸之报聘。六月,金哀宗从归德南迁蔡州(今河南汝南)。此前,武仙军犯宋境,京西兵马钤辖孟珙进击败之,邓州总帅降。七月,孟珙再出击,败武仙于邓州淅川。八月,宋取唐州。九月,蒙古都元帅塔察儿(傔盏)与史天泽统蒙、汉诸军攻蔡州。金哀宗遣使向南宋借粮,并请连和,被拒绝。十月<sup>①</sup>,史嵩之命孟珙率军二万,粮三十万石赴蔡州。十一月初,宋军由东南、蒙古军由西北联合围攻蔡州,激战两月余,次年(一二三四年)正月十日破之,金哀宗自杀,金亡。

#### 四 辽东的争夺

大约就在一二一一年蒙古南攻金朝的同时,契丹人耶律留哥在隆安(今吉林农安)、韩州(今吉林梨树八面城)一带发动了反金起义。耶律留哥原是金朝的“北边千户”(可能系东北路乱军军官),金朝统治者见蒙古势盛,恐境

---

<sup>①</sup> 《元史·太宗纪》、《金史·哀宗纪》均作十一月孟珙以兵粮来助蒙古攻蔡,《宋史·理宗纪》作十月。据《汝南遗事》,十一月初五宋军已耀兵蔡州城南。刘克庄《后村文集》卷一四三《孟珙神道碑》称,端平元年正月初“围蔡已逾两月”,与此合。则其出师时间应在十月。

内契丹人乘机叛乱,因而更加紧了对他们的防范,引起契丹人的愤恨和不安,于是留哥逃至隆安等地,纠集壮士造反。他屡次打败前来镇压的州军,并与另一举兵反金的契丹人耶的联合,数月之中,发展队伍至十余万人,被推为都元帅,耶的为副元帅。一二一二年初,留哥率部往投蒙古,适成吉思汗遣按陈等进兵辽东,遇于金山(今大兴安岭东侧),遂与结盟而返。

一二一三年,金朝以完颜承裕为元帅右监军兼咸平路兵马都总管,率军六十万讨伐留哥。成吉思汗得到留哥的求援报告,命按陈率军助之,与金军会战于迪吉脑儿,大败金军。留哥获胜后,即建国称王,国号辽,改元元统。金遣温迪罕青狗招降,青狗见留哥势盛,反投之。次年,金宣宗命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统兵四十万讨留哥,留哥拒战于归仁县(今辽宁昌图西北)北,大败万奴军,万奴收集散兵奔东京,留哥遂进占咸平(今辽宁开原),取旁近州县,以咸平为都城,号中京。金朝又遣左副将军移剌都来攻,复为留哥所败。大约在一二一五年春夏之交<sup>①</sup>,留哥引兵南下,攻破东京,逐蒲鲜万奴,其势大盛,所辖户达到六十余万。于是部属耶厮不等劝留哥称帝,但留哥惧蒙古强大,且先已归附蒙古,不敢自称帝号,却携其子和随从人等奉金币入朝成吉思汗(时在桓州西北按坦孛都罕之地)。成吉思汗遣三百人与留哥随从官员乞奴等同赴辽东受降,耶厮不、乞奴等不愿归降蒙古,合谋尽杀蒙古所遣人员,仅三人逃归。

一二一六年初,耶厮不在澄州(今辽东海城)称帝,国号辽,改元天威;设置百官,以乞奴为丞相,青狗为元帅。但不久就发生了内争,青狗叛投金朝,耶

---

<sup>①</sup> 《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传》记留哥破东京和耶厮不澄州称帝时间,均有年而无月。唯据载耶厮不称帝至被杀计七十余日;后金山杀乞奴称王,约二年;统古与杀金山,喊舍又杀统古与,亦近二年,于己卯年初被灭。按此推算,耶厮不之称帝至迟当在丙子年(一二一六年)初。从留哥破东京至耶厮不称帝,其间有留哥入朝成吉思汗、蒙古遣人到辽东被杀两件事,估计其往返时间,则破东京应在一二一五年的春末夏初。《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载,贞祐三年(一二一五年)三月,谕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选精锐屯沈州、广宁以候进止,似此时东京尚未失。其后即无辽东消息,到十月才有辽东宣抚司败留哥军的奏报。可能这段期间东京为留哥军所占。

厮不为部下所杀,前后仅七十余日。其众推乞奴为监国,鴉儿为行元帅,分兵为左右翼,屯于开州(今辽宁凤城)、保州(今朝鲜义州)一带。据此看来,耶厮不在杀了蒙古人员后,很快就离开咸平、东京南下,澄州称帝后又立即率部向东南进发,似是处于不能立足而匆匆逃窜的状况。其原因可能一是惧怕蒙古起兵报复,二是遭到了金朝军队的进攻,《金史·宣宗纪》载贞祐三年十月“辽东宣抚司报败留哥之捷”,当是指蒲鲜万奴逃出东京后又集结起兵力进攻契丹起义军获胜之事。契丹起义军从澄州退屯开、保州后,金盖州守将完颜众家奴即率兵来攻,耶律留哥也引蒙古军五千前来讨伐。由于同时受到蒙、金两方的攻打,乞奴等只得率其众九万余人退入高丽。

自耶厮不抗蒙自立,耶律留哥在辽东的势力完全丧失,成吉思汗命他暂居广宁府(今辽宁北镇)。后虽借蒙古兵力重入辽东,但原来的部众多随乞奴走高丽,他只夺回妻姚里氏、兄独刺及户二千。此时成吉思汗已率蒙古主力回漠北,木华黎又忙于讨伐锦州张致,无暇顾及辽东,而辽东蒲鲜万奴的势力正盛,金朝还拥有上京路、东京路的很大地盘和相当多兵力,因此留哥无法在那里重振旧业,只好迁居临潢。

蒲鲜万奴本是野心家式人物,一二一四年因讨伐留哥丧师败绩,受到金宣宗的指责。次年,金宣宗严令他屯兵沈州(今辽宁沈阳)、广宁候命,但他却连东京城也没有守住,自然更难向朝廷交代,这可能是促使他叛金自立的一个原因<sup>①</sup>;而宣宗南迁后,对辽东地区的控制削弱,当地人心不稳,又造成了叛乱割据的条件。万奴在失东京后不久,就重新集结兵力,辽东猛安、谋克人多从之,同年秋打败契丹军,遂于同年冬宣布叛金自立,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他夺取咸平、东京、沈州、澄州等地,又发兵攻金婆速府(今辽宁东南部,治所

---

<sup>①</sup>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七二)载:“当阿勒坦汗南迁南京时,命大臣万奴招讨使镇守契丹之国。其后因告密者于阿勒坦汗之前弹劾他(万奴),他遂被撤职。〔既而〕此人归降于成吉思汗。”万奴受弹劾并被撤职之事,金、元史缺载。

在今丹东)近境及上京路地<sup>①</sup>。一二一六年秋,木华黎攻取锦州,灭张致,遂进兵辽东,拔苏(今辽宁金县)、复(今辽宁复县西)、海(今辽宁海城)三州,斩金盖州守将众家奴。是年冬,蒲鲜万奴在蒙古军压境的情况下归降蒙古,以其子帖哥入质,蒙古命耶律阿海之子捏儿哥以右丞行省辽东的名义往监之。然万奴终不自安,不久即杀捏儿哥,率部十余万东徙,据曷懒路(今吉林东部和朝鲜咸镜南北道、两江道地,治所在今朝鲜咸镜北道吉州),不再臣事蒙古<sup>②</sup>。一二一七年,万奴频频发兵侵入高丽,迫使高丽献粮八万石;又攻占金婆速府和上京路许多地方,金上京行省太平与万奴通谋,焚上京宗庙,执领兵元帅,夺其军归万奴,于是势力更大,成为辽东之霸<sup>③</sup>。此时蒙古正全力经略中原,其所取辽东州县随即放弃而复为金有,金在上京、辽东二行省还据守着很大地区,在这种形势下,蒙古只好暂不追究万奴的背叛,甚至承认他的独立地位<sup>④</sup>,

---

① 《金史》卷一〇三《纥石烈桓端传》载万奴取咸平等地在贞祐三年三月以前,似不可能。因为此时咸平应在留哥手中,留哥声势方盛,且于同年南下取东京,逐万奴。箭内互以为桓端传之三年应为四年之误,或是(见《东真国之疆域》,载《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但箭内氏又说万奴自立在前,失东京在后,似不确,盖留哥取东京当在其年夏初。至于万奴是先叛金自立后取咸平、东京等地,抑或反之,史籍没有明确记载,姑存疑。

② 《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载:丙子年“拔苏、复、海三州,斩完颜众家奴。咸平宣抚蒲鲜等率众十余万,遁入海岛。”按木华黎军取辽东三州应在当年九月,据《元史》卷一《太祖纪》,其年十月万奴降蒙,“既而复叛,僭称东夏”,当即指归降后又率部东徙事。《金史》卷一二二《梁持胜传》:“……迁咸平路宣抚司经历官。兴定初(一二一七年),宣抚使蒲鲜万奴有异志,欲弃咸平徙曷懒路,持胜力止之,万奴怒,杖之八十,持胜走上京”。据此,万奴系于一二一七年初自咸平东徙曷懒路。参见箭内互:《东真国之疆域》;《成吉思汗经略满洲之研究》。又,关于蒲鲜万奴国号,箭内互据《高丽史》记载,认为应为“东真”。其年号则仍用天泰,有延吉附近发现之天泰八年铜印可证。按:“东真国”系“大真”的俗称。

③ 郑麟趾:《高丽史》卷二二,《高宗世家》。《金史》卷一〇三,《完颜阿里不孙传》;卷一二二,《梁持胜传》。

④ 《高丽史》卷一〇三,《金就砺传》载,一二一八年蒙古遣哈真等联合蒲鲜万奴军、高丽军共灭契丹起义军残部,哈真遣使谓高丽将领曰:“果与我结好,当先遥礼蒙古皇帝,次则礼万奴皇帝。”知其时蒙古实承认万奴自帝一方的地位。

听任他盘踞东海一隅之地,以牵制金朝的力量。

契丹起义军入高丽后,内讧又起,金山杀乞奴,自称辽东王,改元天德;一年多,统古与杀金山,夺其位;不久,喊舍又杀统古与,亦自立。两年多之中,三易其主,足见这支队伍已陷于混乱,失去约束,蜕变成了流寇。他们四出抄掠,危害高丽人民。一二一七年秋,又取高丽江东城(今朝鲜平壤东之江东)据之。一二一八年冬,蒙古遣哈真、札剌、耶律留哥率军会同蒲鲜万奴军(由其子胡土——《高丽史》作完颜子渊——率领)进入高丽,高丽亦遣西北面元帅赵冲、兵马使金就砺领兵配合,共攻江东城。一二一九年初,城陷,喊舍自杀,其官吏、军卒、妇女五万余人投降,大部分被带回,归耶律留哥统领,居于临潢,小部分交给高丽处理,安置于闲旷之地,给田耕种。

此后,万奴与蒙古仍保持和好关系,蒙古派往高丽受贡的使者均经由万奴辖境进出。但到一二二四年,万奴遣使到高丽说,由于成吉思汗西征未回,生死不明,留守本国的斡赤斤又贪暴不仁,他已断绝了和蒙古的旧交。斡赤斤的封地在蒙古最东境大兴安岭地区,他的贪得无厌又是著名的,很可能因他把势力扩展到辽东,并向蒲鲜万奴索贡,造成了和好关系的破裂。

当时,万奴据有辽东东部,包括曷懒路和上京、速频(今乌苏里江东西地)等路许多地方;辽东南部则仍在金朝辽东行省控制之下。一二二九年,窝阔台即位后,即遣撒礼塔、吾也而、王荣祖等领兵进辽东,取盖州、宣城(今辽宁岫岩)等十余城,金辽东行省葛不哥走死,其元帅等据守石城(今辽宁凤城县东北石城),蒙古军穿穴攻城,拔之。于是辽东南部地尽为蒙古占领<sup>①</sup>。一二三一年,蒙古军侵入高丽,包围王京,高丽王降,至此,辽水之东只剩下万奴的割据势力了。一二三三年二月,窝阔台遣皇子贵由、诸王按赤带(合赤温子)、国王塔思(木华黎孙)统左翼军讨伐万奴。九月,蒙古军攻其都城南京(今吉林

<sup>①</sup> 《元史》卷一四九《王荣祖传》置攻辽东于太宗即位前,误。今从同书卷一二〇《吾也而传》。



延吉市东城子山)①,城坚如立铁,大将萧札刺先登其西南角,杀守军数十人,众军乘势而进,破南京,遂擒万奴。万奴自一二一五年叛金自立至此时,前后十九年。蒙古军继续进兵速频路,取其地。后二年,置南京、开元二万户府镇戍和管辖这个地区。

## 第二节 西北地区的征服

### 一 征服吉利吉思和“林木中百姓”诸部

成吉思汗建国后,就向北方森林地区扩展势力,把“林木中百姓”各部落纳入大蒙古国的统治之下。

一二〇七年,遣使者按弹、不兀剌去招降谦河流域的吉利吉思部。吉利吉思是北方比较发达的强部,其人民很早就知道种植禾、粟、大小麦和青稞,也逐水草放牧,畜养马、牛、羊,冬季则乘“木马”(雪橇)逐猎;盛产名马和白、黑海青、貂鼠、青鼠,人民向统治者交纳貂皮、青鼠为赋税,可见狩猎业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居于很重要的地位。拉施都丁说:“吉利吉思和谦谦州是毗连的两个地区,两地组成为一个国家。……在这些地区有许多城市和村落,游牧民也为数众多”②。九世纪中叶吉利吉思强盛时,兼有今唐努山以北诸部之地,其首领自称可汗③。但到十三世纪之初,吉利吉思汗国似已分裂为若干不相统属的小国(部),各有自己的首领,号“亦难”(Inal),其中较强的可能是两国。

---

① 参见箭内互:《东真国之疆域》。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五〇。按:《世界境域志》说:“除了可汗的居邸之外,吉利吉思人没有任何村庄和城市。”(见米诺尔斯基英译本,页九七)这应是指十一世纪以前的情况。

③ 黠戛斯推翻回鹘汗国后,唐朝曾应其可汗的要求,给予册封。《世界境域志》说:“其王号 Khirkhiz-Khāqān”(页九六),当是黠戛斯强盛时的情况。

成吉思汗的使者先后到达这两个地区,其王斡罗思亦难等均表示臣服,并遣使者随同来见成吉思汗,进献白海青等方物<sup>①</sup>。

居住在“大泽”(今贝加尔湖)之西的秃麻(又译秃马惕)部首领带都刺·莎合儿见成吉思汗强盛,也来降附<sup>②</sup>。其后,巴阿邻部的豁儿赤那颜得到成吉思汗准许,到秃麻部挑选美女,激起秃麻人的反抗,将豁儿赤抓起来。斡亦剌部的忽都合别乞前去救援,也被扣留。一二一七年,成吉思汗回漠北后,派遣“四杰”之一的右翼第二千户博尔忽率军征讨秃麻。这时带都刺·莎合儿已死,其妻孛脱灰·塔儿浑主部事。她率领秃麻人,利用深山密林的地形抗击蒙古军,截断其归路,捕杀博尔忽。成吉思汗再遣朵儿伯·朵黑申去征讨,朵儿伯“于先行把截处虚张声势,却从忽刺安不合(野牛)行的小径行去;又恐军人畏惧不行,命人各背条子十根,若不行的用此惩戒。又各将镑斧锯凿等器,将

---

① 吉利吉思二部及其首领名称,史籍记载互有歧异,且欠明晰。《圣武亲征录》(王国维校注本):“其长斡罗思亦难及阿里替也儿、野牒亦纳里部亦遣亦力哥帖木儿、阿忒黑拉二人偕我使来献白海青为好也。”《元史·太祖纪》略作:“既而野牒亦纳里部,阿里替也儿部皆遣使来献名鹰。”《史集》载:“他们(成吉思汗使臣)先至一地,其名为……(原稿缺),当地官人名……(原稿缺);随后又至一地,其名为野牒斡伦(Idi-ürün),当地官人名斡罗思亦难(Orös-ināl)。这两个官人都对使臣表示了充分的尊敬,并派出自己的两个使者(名略——引者)带着白海青和他们一同回来,向成吉思汗臣服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五一)同书《部族志》“吉利吉思部”条载:“他们国王的称号为亦难(Īnāl),而该地尊贵和有名望的氏族名称是野牒(Idi)。其国王是……(原稿缺)。另一地区之名为野牒斡伦,当地国王名斡罗思亦难。”(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五〇)《元朝秘史》记朮赤征服吉利吉思部,“吉利吉思的那颜也迪亦纳勒、阿勒迪额儿、斡列别克的斤归附了。”也迪亦纳勒即野牒亦纳里,阿勒迪额儿即阿里替也儿,唯《亲征录》、《元史》作部名,而《秘史》作人名。又贾敬颜校本《圣武亲征录》作:“其长斡罗思亦难及按迪也儿部主阿儿波斡赤”遣使来献,按迪也儿应即阿里替也儿,知系部名。

② 《圣武亲征录》仅谓其“既附而叛”,未载降附年代。《史集》记载:“在上述之鼠年(一二一七年)先已归附之秃马惕部首领带都刺·莎合儿,因成吉思汗去征金国,重新起义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七八)同书又说:“他们(秃马惕)的首领带都刺·莎合儿向成吉思汗臣服了。当成吉思汗致力征讨金国,在那里停留了六七年才返回时,他听到秃马惕部复叛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二二)据此知秃马惕部的归附应在出征金国之前。

当路树木除去。行至山顶,下视秃马惕部的地面百姓如天窗上看下面一般,大军直进,彼中不想卒到,就筵席间掳了”<sup>①</sup>。

这次秃麻人起义的规模大概很大。因为他们的居地与吉利吉思相邻,成吉思汗命令吉利吉思首领出兵夹攻,吉利吉思人抗命不从,也发动了起义。一二一八年,成吉思汗遣朮赤率右翼军征讨吉利吉思等林木中百姓。朮赤军涉过封冻的薛良格河,由先已归附的忽都合别乞向导,通过斡亦剌(又译外剌)部居住的失黑失惕之地(今华克穆河上游),招降尚未归附的斡亦剌部落。然后继续北进,降服不里牙惕<sup>②</sup>、巴儿浑、乌斯(又译兀儿速,在今叶尼塞河支流乌斯河)、合卜合纳思(在今贝克穆河流域)、康合思、秃巴思(均在今叶尼塞河东)等部,遂涉谦河而下,攻入吉利吉思部的中心地区(今叶尼塞河与阿巴根河汇流处一带)。先锋不花追赶逃跑的吉利吉思人至亦马儿河(今鄂毕河)而还。于是吉利吉思之西的帖良兀(在今鄂毕河上游西南)、客失的迷(在今鄂毕河上游至克木齐克河之间)、失必儿(在今额尔齐斯河中下游一带)、巴吉只惕(在今乌拉尔河上游)等“林木中百姓”各部都向朮赤臣服<sup>③</sup>。成吉思汗将这些“林木中百姓”授予朮赤。

## 二 畏兀儿的归附

九世纪中叶回鹘汗国灭亡后,回鹘十五部迁到了西域。西迁的回鹘“种落散处”,有一部分投奔碎叶河(今楚河)一带的葛逻禄部,后来成为黑汗王朝的主要民族之一;一部分迁到了忽炭(今新疆和田)一带;大部分回鹘人

---

① 《元朝秘史》第二四〇节。

② 《史集》未载此部名。从朮赤进军路线看,此部居地应在今叶尼塞河之东,靠近东萨彦岭。十七世纪俄人东侵至安哥拉河时,首先接触到的就是布拉特人,他们分布在安哥拉河及其支流奥卡河一带(参见库德里亚甫佐夫:《布里雅特蒙古民族史》一九四〇年版日译本,页七)。《秘史》所载不里牙惕部当是这些地区的部落。

③ 各部的分布参见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二、三、五期。

分布在今天山东部。早在回鹘汗国强盛时期,势力就扩展到这个地区,并有一部分回鹘人迁居到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等地。大批回鹘人西迁后,遂成为该地主要民族,其他民族的居民也逐渐与他们融合起来。他们建立的政权,在辽宋时代的汉文史料中称为高昌回鹘(还有和州回鹘、西州回鹘、阿萨兰回鹘等名称)。其领土东至伊州(哈密),西至龟兹(曲先——库车),北至今准噶尔盆地之边,与乃蛮部为邻;南至鄯阐(今罗布泊附近)与吐蕃为邻;高昌回鹘的国王称亦都护<sup>①</sup>,据汉文史料,他们还有阿萨兰汗(狮子王)的称号。以高昌为都城,北庭(别十八里)则是其夏季驻地<sup>②</sup>。高昌、北庭等城从汉朝以来就是中原王朝设治的地方,当地居民早已从事农业,又处在东西交通路上,商业也很发达,因此回鹘人西迁到这里后,有很大一部分放弃游牧生活而转为从事农业和商业。汉族文化在这个地区的传播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回鹘人迁来后也受到很深的影响。有些回鹘的知识分子能读汉文经史和文学著作,吐鲁番等地出土的高昌回鹘时期佛经、历书,也多译自汉文。回鹘人原来使用古突厥文,由于中亚摩尼教师和商人在回鹘汗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出现了采用粟特字母书写回鹘语的文字。西迁后的回鹘逐渐广泛使用这种文字,学者们称之为古回鹘文。用这种文字书写或印刷的文书大量出土,说明高昌回鹘的文化是很发达的。北庭、高昌一带佛教极盛,许多回鹘人也改信了佛教,但原来的摩尼教还继续存在。此外,道教、景教等东西宗教也传入回鹘人中。与各种文化的接触和融合,使回鹘人具有了“能通诸国语”和善于经商的特点,因而在后来元朝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很重要

---

① 志费尼说,idi-qut意为“幸福之王”(《世界征服者史》第一卷页四四)。这是原来居住在北庭地区的拔悉密部首领的称号,见突厥文《毗伽可汗碑》东二五行。

② 《王延德使高昌记》和《世界境域志》(米诺尔斯基英译本,页九四)都记载高昌(Chīnānkath,中国城)是回鹘(Toghuzghuz)的都城,北庭(Panjikath,五城,即别十八里)是避暑的夏都。

的地位。

契丹初兴,高昌回鹘即遣使人贡。九二四年,耶律阿保机大举西征,尽服漠南北“阻卜”诸部,又“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sup>①</sup>,高昌回鹘也归附了辽朝,其后时常纳贡,颇称“效顺”<sup>②</sup>。一一三〇年耶律大石自漠北率部西迁,先致书高昌回鹘王毕勒哥,通知他要假道其国去大食。耶律大石至北庭,回鹘王“即迎至邸,大宴三日。临行,献马六百,驼百,羊三千,愿质子孙为附庸,送至境外。”<sup>③</sup>西辽立国后,高昌回鹘遂为其藩属之国,西辽派少监常驻高昌,监督国事。

十三世纪初年,西辽派驻高昌的太师僧少监“骄恣用权,奢淫自奉”,专断不公,凌轹亦都护及其臣僚,因此畏兀儿人上下共愤之<sup>④</sup>。一二〇八年冬,成吉思汗出兵攻打盘踞在也儿的石河的乃蛮首领屈出律和蔑儿乞首领脱脱残部,以斡亦剌部忽都合别乞为向导,从阿来岭(今赛留格木岭乌兰达巴山口)越过金山,在不黑都儿麻河(今额尔齐斯河支流布赫塔尔马河)击溃乃蛮、蔑儿乞联军。脱脱被射死,屈出律与脱脱子忽都等渡过也儿的石河南奔。乃蛮的灭亡对其南邻畏兀儿震动很大,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护及其臣僚们见蒙古强盛,决定借助蒙古的声威乘机摆脱西辽统治,转而投靠蒙古。一二〇九年,他们设谋将西辽所置少监杀掉。这时成吉思汗已先遣使至畏兀儿,巴而朮派了两个官员随使者去见成吉思汗,表示臣服。

---

① 即可汗浮图城。该城所在众说不一。岛琦昌认为即新疆之古城奇台。见《可汗浮图城考》,《东洋学报》四六卷二、三号。

② 《辽史》卷九四,《耶律化哥传》载,开泰中(据《部族表》,在开泰二年,即一〇一三年),化哥征讨阻卜至翼只水(额尔齐斯河),“路由白拔烈,遇阿萨兰回鹘,掠之。都监褒里继至,谓化哥曰:‘君误矣!此部实效顺者。’化哥悉还所俘。”白拔烈即海敦行记之 Ber-baliq,《元史·哈剌亦哈赤北鲁传》之独山城,今新疆奇台。

③ 《辽史》卷三〇,《天祚帝本纪》附耶律大石传。

④ 《元史》卷一二四,《岳邻帖穆尔传》;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波义耳英译本第一卷,页四五。

忽都等逃入畏兀儿境,巴而朮杀其所遣使者,并起兵至崂河(今昌吉河),将他们逐出境外,并将此事报告成吉思汗以表忠诚。

一二一一年,巴而朮遵照成吉思汗的命令,带着大量方物珍宝亲至蒙古朝见。成吉思汗因他主动归附,许以女也立安敦嫁之,并让他享有“第五子”的待遇,“使与诸皇子约为兄弟,宠异冠于诸国”<sup>①</sup>。因此,畏兀儿具有与其他被征服国家不同的地位,亦都护是大汗——元朝皇帝的藩臣,必须履行纳质、纳贡、从征等藩属国的义务,但对自己的领地和所属人民则拥有一定的自主权<sup>②</sup>。当然,对畏兀儿人民来说,他们从此要受到蒙古统治者和以亦都护为首的本族统治集团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在蒙古侵略中亚、西夏的战争中,巴而朮征发畏兀儿军从征,就是一项极其沉重的负担。

### 三 哈刺鲁的归附

同年,哈刺鲁的阿儿思兰汗也来蒙古觐见成吉思汗,献国降附。

哈刺鲁即唐代的三姓葛逻禄,原居金山之西(今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地区),在后突厥汗国的压迫下逐渐南徙至北庭附近。八世纪中叶回纥强盛,不断越过金山,攻打葛逻禄。葛逻禄人于是再向西南移徙,进入今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和楚河一带<sup>③</sup>。这个地区的突骑施部此时业已衰落,葛逻禄人遂取而代之,成为该地最强大的势力。黑汗王朝建立后,葛逻禄成为黑汗王朝的属部。

西辽统治时期,哈刺鲁部首领称为阿儿思兰汗,住在海押立,西辽也派一

---

① 赵孟頫:《全公神道碑》,《松雪斋文集》卷七。

② 参阅安部健夫:《西畏兀儿国史的研究》第一章第二节,《作为第五汗国的荣遇》。

③ 回纥多次攻打葛逻禄部,见突厥文回纥可汗磨延啜碑。《新唐书》卷二一七下《葛逻禄传》载,至德(七五六至七五八年)后,葛逻禄浸盛,与回纥争疆,徙十姓可汗(即西突厥)故地,尽据碎叶、怛逻斯诸城。其西徙时代,正在遭受回纥磨延啜可汗攻打之后,两者之间当有关系。



个少监常驻其地进行监督。十三世纪初,西辽统治者对其属国、属部的压迫愈来愈甚,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于阗算端趁西辽国势衰弱之机不再服从,西辽皇帝认为阿儿思兰汗也靠不住,就征召他从讨于阗,企图乘机加害。阿儿思兰汗虽然参加了镇压于阗的战争,但最后还是被迫服毒自杀,西辽皇帝命其子继位,仍遣少监督之。少监专横暴虐,欺压哈刺鲁人民。这时成吉思汗已消灭乃蛮残部,遣忽必来率军征哈刺鲁,阿儿思兰汗之子(亦称阿儿思兰汗)乘机杀掉西辽少监,向蒙古投降,并随忽必来入朝。成吉思汗因他不战而降,十分优待<sup>①</sup>。

当时阿力麻里城控制在另一个哈刺鲁首领斡匝儿手里。斡匝儿是虎牙思人,曾盗人马及进行拦路抢劫等“不法”活动,该地许多劫贼都加入他的队伍,由是力量甚强,遂攻服旁近地区,入据当地首府阿力麻里,并夺取了不刺城。屈出律曾多次发兵攻之,每次都被他打败。斡匝儿派人向成吉思汗报告屈出律的情况,并表示愿意归顺蒙古,不久即应召入朝成吉思汗,极受礼遇。但回国后,他在一次打猎中被屈出律捕获。屈出律将他缚至阿力麻里城下,乘机攻城。阿力麻里人关闭城门,并力抵抗,屈出律等闻蒙古军将至,立即退兵,在路上将斡匝儿杀害。

斡匝儿死后,部属拥立其子昔黑纳黑的斤继位。他和海押立的阿儿思兰汗都与蒙古皇室联婚。在成吉思汗出征花剌子模时,这两个哈刺鲁首领都率军从征<sup>②</sup>。

#### 四 西辽(哈刺契丹)的灭亡

耶律大石于一一二四年退据漠北后,在镇州可敦城大会十八部酋长,取得他们的支持,于是“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建立政权,企图借助漠北属部的

---

① 《世界征服者史》,页七四至七五;《圣武亲征录》。

② 《世界征服者史》,页七五至七七。

力量兴复辽朝。为此,他还联结西夏,约共攻山西,并遣使取道西夏与南宋进行了联络<sup>①</sup>。金朝感到耶律大石漠北政权的存在是很大的威胁,乃于天会八年(一一三〇年)兴师北伐。在金朝的强大压力下,耶律大石难于在漠北立足,于是征集各部人马,倾巢而西。他先在叶迷立(今新疆额敏)之地建立一座城堡,积聚力量,准备继续西进,这时,所部军队已有四万帐。适逢黑汗王朝的大可汗因无力对付境内哈刺鲁、康里等部的叛乱,遣使要求耶律大石入境帮助镇压,并表示情愿让国,于是不费一兵一卒就入据黑汗朝都城八剌沙衮(Balāsāghūn,又名虎思斡耳朵 Ghuz-ordo,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布拉纳古城);早先移居黑汗朝国境的一万帐契丹人乘此时机投归耶律大石<sup>②</sup>,因此兵力更足。文武百官遂奉立耶律大石为帝,上汉语尊号曰天祐皇帝,改元延庆(当在一一三二年)<sup>③</sup>,又取突厥语“葛儿罕”(Ghur-qan,“众汗之汗”,“普汗”)的称号。同时废去黑汗朝大可汗,封之为“突厥蛮王”(Ilik-türkmen)。耶律大石称帝后,即发兵征服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忽炭(又译斡端,今新疆和田);一一三七年,率军西征,于忽毡(今塔吉克斯坦列宁那巴德)打败阿姆河北的西部黑汗朝马哈木汗;一一四一年,又在撒麻耳干(Samarqand,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之北与塞尔柱朝算端辛札儿所率的大军会战,完全击溃辛札儿军,阿姆河北地区遂被并入版图,花刺子模沙亦被迫称臣纳贡。东面的哈刺鲁、畏兀儿、乃蛮等部都先后归附于他或被征服。耶律大石以虎思斡耳朵为都城,其领土(包括属国)东至哈密力,西至花刺子模,北包金山,南有忽炭诸地,成为中亚最强盛的国家。其国家制度基本上仍用辽朝旧制,史称西辽或

---

① 《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韩奴传》;张俊:《上虏中事宜状》(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年),见《永乐大典》卷一〇八七六引《张魏公奏议》。

② 据伊本额梯儿《全史》卷一页五五至五六,转引自巴尔托德:《中亚史四讲》,页一〇一至一〇二。

③ 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耶律大石似是通过禅让方式从黑汗朝大汗那里取得政权。《辽史》卷三〇载,耶律大石称帝时改元延庆,三年又改元康国,至康国十年死。据伊本额梯儿《全史》,他死于一一四三年,依此推算,称帝应在一一三二年。

后辽<sup>①</sup>,伊斯兰作家则称之为哈刺契丹(Qara-khitay),蒙古人也以此称之。黑汗朝的人民多数信奉伊斯兰教,西辽统治者虽崇奉佛教,但对伊斯兰教也采取宽容政策,给予尊重。

耶律大石死后不久,西辽统治集团内部就不断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至十三世纪初,西辽皇帝直鲁古(一一六七至一二一一年在位)昏聩荒淫,挥霍无度,帑藏空竭,国力衰微。这时花刺子模已日益强盛,不愿再臣属西辽;撒麻耳干的斡思蛮汗也脱离西辽统治而归附于花刺子模。一二一〇年花刺子模大举入侵,与西辽军战于塔刺思(Talas,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西辽守将塔阳古兵败被俘,讹迹邗城(Ūzgand,今吉尔吉斯斯坦乌支根)及以西地区均被花刺子模占去。在此前后,畏兀儿亦都护和哈刺鲁汗都叛降了蒙古。一二一一年或一二一二年,直鲁古的帝位被乃蛮屈出律汗所篡,西辽实际上灭亡了。

屈出律在一二〇八年被成吉思汗打败后,仓皇渡过也儿的石河,辗转逃入西辽国境<sup>②</sup>。他骗得了直鲁古的信任,娶其女为妻,又建议收集散处在叶迷立、海押立和别十八里等地的乃蛮、蔑儿乞残部,来帮助西辽作战。等到这批亡命之徒被收集起来,他就利用这支力量来反对直鲁古,企图夺取帝位,并派人与花刺子模沙暗中勾结,密谋共灭西辽,瓜分其国土。一二一〇年,趁直鲁古出兵征讨阿母河北地区时,他劫掠了讹迹邗城的国库,回攻虎思斡鲁朵,结果被直鲁古的军队打败。这时西辽军在塔刺思附近被花刺子模军击败,溃军奔回虎思斡鲁朵,城中人民闭门不纳,溃军围城十六日,攻入城内,大肆屠杀居民,西辽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更尖锐了。后直鲁古下令军队将掳掠之物归还,因此军队发生叛变。屈出律利

---

① 耶律楚材《醉义歌》序中称为西辽,又《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诗:“后辽兴大石,西域统龟兹,万里威声震,百年名教垂”(《湛然居士集》卷八,一二)。

② 据志费尼记载,屈出律带着很多部众觅路去别十八里,又从此至曲先,饥困于一山中,部众尽散,遂为西辽巡兵所捕,带至葛儿罕处。但据另一说法,他不是被捕,而是自己去见葛儿罕(见《世界征服者史》,页六二)。

用这个机会将叛军搜罗到自己旗下，趁直鲁古出猎时，伏兵擒之，遂篡夺了西辽皇位。但表面上仍尊直鲁古为太上皇，用西辽国号。两年后直鲁古病死。

屈出律篡位后，继续倒行逆施。为了镇压可失哈耳的反抗，他趁收获季节，发兵攻入，纵火焚烧庄稼，经过三四年这样的蹂躏，可失哈耳被迫屈服。他竟分兵住宿民家，每户一兵，其残虐百姓的种种暴行可以想见。又进掠忽炭，强迫忽炭居民放弃伊斯兰教信仰，改信聂思脱里教或佛教，并虐杀伊斯兰教教士，因此人民对屈出律的残暴统治极其痛恨。

一二一六年，成吉思汗从中原回到蒙古后，即遣速不台统军讨伐流散在乃蛮界外的蔑儿乞余部。一二一八年，遣哲别统军征屈出律。屈出律当时正在可失哈耳，闻蒙古军来攻，不敢抵敌，慌忙逃跑。哲别军只追袭屈出律，并不侵害百姓，而且宣布允许人民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诵读穆斯林经典。可失哈耳人本来对屈出律就恨之入骨，当他一逃跑，顷刻之间就将他安插在各家的兵士全部消灭。屈出律逃至巴达哈伤境上的撒里桓之地，被当地居民捕获，交给蒙古军<sup>①</sup>。哲别杀屈出律后班师，与成吉思汗会合。西辽境土遂尽归蒙古。

### 第三节 蒙古西征

#### 一 成吉思汗西征

##### 西征前蒙古与花剌子模的关系

当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高原时，中亚花剌子模国的势力也臻于极盛。

---

<sup>①</sup> 《元朝秘史》第237节作 Sariq-qun(黄崖)，但《史集》作 Sariq-köl(黄湖)。应即阿姆河源之同名湖泊。

花刺子模(Khwarazm)<sup>①</sup>是中亚古国之一,位于阿姆河下游,都城玉龙杰赤(Urganch,今土库曼斯坦库尼亚乌尔根奇),其王号花刺子模沙(Shāh,波斯语,意为王)。八世纪以来,花刺子模相继受阿拉伯帝国、萨曼王朝和哥疾宁王朝的统治,十一世纪中期,又被塞尔柱帝国征服。一〇九七年,花刺子模沙被叛乱官员所杀,塞尔柱帝国权力很大的呼罗珊总督遂委任突厥族大臣阿奴思的斤之子护都不丁摩诃末(Muhammad)为花刺子模长官,并让他袭用花刺子模沙的称号。塞尔柱算端辛札儿(Sultān Sinjar)即位后,确认了这项任命,并帮助他平定了前花刺子模沙之子的叛变,统治地位自此更加巩固。

一一四一年,西辽进兵阿母河北地区,大败塞尔柱算端辛札儿,花刺子模沙阿齐思(Atsiz,护都不丁子,一一二六年至一一五六年在位)向西辽称臣纳贡,对算端辛札儿则不再恪守臣职。阿齐思之子伊利阿儿思兰在位期间(Il-Arslan,一一五六年至一一七二年),乘塞尔柱帝国衰敝,进据呼罗珊西部地。一一九四年,花刺子模沙帖乞失(Tekish,阿儿思兰子,一一七二年至一二〇〇年在位)击灭塞尔柱朝最后一个算端,取而代之,势力遂扩展至波斯西部,哈里发授以“首相”之位。一二〇〇年,帖乞失死,子摩诃末继位,在西辽的帮助下,打败了呼罗珊(Khorasan,今阿姆河以南地)东部的古儿(Ghūr)朝算端失哈不丁(Shihab al-Dīn),夺取巴里黑(Balkh,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之西)、也里(Herāt,今阿富汗西北部赫拉特)等许多重要城市,并迫使古儿朝算端臣服。至此,花刺子模沙摩诃末遂成为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统治者,于是他不愿处于臣属西辽的地位。一二〇九年,西辽照例遣使至花刺子模索贡,使者态度倨傲,摩诃末怒杀之,将尸体抛入河中,公开宣布与西辽决裂。同年,他以解放穆斯林的“圣战”名义发兵攻入西辽属境,占领不花刺(Bokhārā,今乌兹别

---

<sup>①</sup> 《魏书》译其名为“忽似密”,《新唐书》作“火辞弥”,或作“火寻”,“货利习弥”等。蒙古人称之为“撒儿塔兀勒”(Sarta'ul),汉译“回回国”。Sarta'ul为Sartaq(突厥语,意为队商)的多数,蒙古人用以称呼穆斯林。

克斯坦布哈拉),进向撒麻耳干。这时撒麻耳干的统治者斡思蛮(Usman)因请婚于西辽皇帝遭到拒绝,正怀怨恨,遂叛附摩诃末。摩诃末遣大臣一人监临,然后继续进兵,越过忽章河(今锡尔河)。一二一〇年,花刺子模军在塔刺思河(Talas,今哈萨克斯坦塔拉斯河)畔打败了西辽守军,俘其统将塔阳古,取讹答剌(Otrar,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西北齐穆耳)、讹迹邨(Özkend)等城。

战胜西辽使摩诃末在穆斯林世界获得了很高声誉,他袭用“算端辛札儿”(一一一六至一一五七年在位的塞尔柱朝算端)之号,自拟于伊斯兰世界的真正统治者。随后,他攻杀斡思蛮,夺取撒麻耳干作为新国都,又吞并了古儿国和忽章河下游的昔格纳黑(Siqnaq,今哈萨克斯坦契伊利东南)等地。他认为自己的势力已超过塞尔柱朝,遂遣使至报达(Baghdād,今伊拉克巴格达),要求哈里发册封他为算端,并同意他在报达置官监治。哈里发不许,于是摩诃末起兵西向,打败了支持哈里发的法儿思(Fārs,今伊朗法尔斯)、阿哲儿拜占(Azerbāijān,今阿塞拜疆)二国王,迫使他们称臣纳贡,然后率军进取报达,但为大雪所阻,又受到沿途人民的攻击,损失很大,只好罢兵。

摩诃末志骄气盛,竟计划向东扩张,征服中国,创建一个世界帝国。但他的狂想还来不及付诸实施,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已在东方兴起,而且势力扩展到了他的门前。

成吉思汗攻入金国的消息传到中亚,摩诃末为了证实这个消息并探听蒙古实际兵力,派出一个使团来东方。约在一二一五年年底,以巴哈丁·刺只(Bahā al-Dīn Rāji)为首的花刺子模使团到达中都,目睹了中都被蒙古军攻占时遭到杀掠的残迹。成吉思汗在驻营地接待了使者,表示愿与花刺子模沙友好,允许双方商人自由往来。当时成吉思汗并无征服西方的计划,只是有意于通过贸易获得异国物品。他曾颁布一道法令(札撒):凡商人至其境者,将保证其安全营业;凡有贵重商品,需先送到他那里由他选购。穆斯林商人则更热衷于从东西贩运贸易,特别是与游牧民族的贸易中获取巨大利益。可能是与



巴哈丁使团同时,三个花刺子模富商率领商队,携带金锦、布匹到蒙古,其中一人索价每匹三铤(bālish),而其原值则不过十到二十底那儿(dinar)<sup>①</sup>,成吉思汗很生气,命将库内所藏金锦缎匹拿给他看,表示此类物品对蒙古人并不新奇,并下令将其货物没收。其他商人见此情形,不敢再要价,只称他们带来的东西都是送给汗的礼物,成吉思汗很高兴,命每匹金锦给值一金铤,每两匹布给值一银铤,对前一个商人也付给同样价钱。

成吉思汗也派出使团携带大量贵重礼品去花刺子模回访,使团首领为花刺子模人马哈木(Mahmūd)、不花刺人阿里·火者(‘Alī Khoja)和讹答刺人玉素甫·坎哈(Yusuf Kanka)<sup>②</sup>。一二一八年春使团到达河中,转达了成吉思汗愿与花刺子模算端缔结和约、建立贸易关系的旨意。摩诃末于夜间单独召见马哈木,询问成吉思汗的虚实,马哈木见他自恃强大并对成吉思汗称他为子十分恼怒,就谎称成吉思汗军队的数量实不能与花刺子模沙的军队相比。这样的回答很符合摩诃末狂妄自大的心理,他表示满意,答应与成吉思汗缔结和约。

在派遣使团的同时,成吉思汗命诸王、大臣各派侍从二三人,给以资金,组成商队去花刺子模贸易。当时来东方各地经商的回回人(穆斯林)很多,蒙古贵族不会做生意,都把掠来的金银交给他们去贸易生利,因此,这次组成的商队共四百五十人,全部是回回人。他们用五百头骆驼驮载金、银、中国丝绸、蒙古毛皮等物,与使团同时出发。大约在蒙古使臣离开花刺子模之后不久(一

---

① 《世界征服者史》第一卷,页七八。据志费尼说,当时一个 bālish 约等于七十五底那儿(dinar)。

② 见奈撒微《札兰丁传》法译本页五七。这些使者名字也见于阿布嘎齐《突厥世系》(法译本,页一〇五),然而他还说到一个使者马哈木·牙刺瓦赤,并说与花刺子模算端夜谈的是他(页一〇二至一〇三)。牙刺瓦赤(Yalavach),突厥语意为“使者”,此人当即上述使团领袖花刺子模人马哈木,后来在蒙古国担任重要职务的牙刺瓦赤当即此人。《元朝秘史》说牙刺瓦赤是在玉龙杰赤陷落后才来为成吉思汗服务,看来是错误的。参见巴尔托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英译本,页三九六,注三。

二一八年春),商队就到达花刺子模边境城市讹答刺。讹答刺长官亦难出(In-alchuq,即《元史·太祖纪》之哈只儿·只兰秃)贪图商队财物,竟诬指他们为间谍,将他们扣押起来,然后写信报告摩诃末。摩诃末命令将商人全部杀掉,货物没收。仅有一名商队的骆驼夫幸免于难,逃回蒙古<sup>①</sup>。

成吉思汗得到讹答刺惨案的报告,愤怒至极,决意兴兵复仇。他先派出三个使臣到花刺子模,指责摩诃末背信弃义的行为,并要求交出凶手亦难出。摩诃末不但拒绝了这个要求,而且下令杀死为首的使臣,将其余二人剃去胡须,逐出境外。于是,这场东西两大强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了。

#### 阿母河北地区的占领

成吉思汗从回回商人提供的报告中,对花刺子模的强大兵力以及国内情况有充分的了解,因此对这次出征做了认真的准备。他派遣先锋哲别率领一支军队,去消灭盘据西辽的屈出律,以扫除进兵路上的障碍,这个目的很快就达到了。大约与此同时,他派去追剿篾儿乞残部的大将速不台等也胜利班师,并报告了与花刺子模军队初次接触的情况。原来速不台在畏兀儿北境的檐河击溃篾儿乞残部后,其余众向钦察逃去,速不台尾追敌人,在咸海之北的草原

---

① 穆斯林史籍关于此事的记载不一致。据奈撒微《札兰丁传》(页五九),讹答刺惨案是因亦难出贪图占夺商队货物造成的,他向摩诃末报告他们是间谍,摩诃末仅指示将他们扣留,而他却擅自决定加以杀害,死者的所有财物均被他侵吞。伊本额梯儿《全史》则谓讹答刺长官只是向算端报告了商队的到达和商品的总数,算端立即命令将他们杀死,没收其财物上交给他。这些商品被卖给了不花刺和撒麻耳干的商人,所得金钱确被算端据为己有。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记载:秃儿罕可敦的亲属(据奈撒微说,系摩诃末母舅之子)拥有哈只儿汗(Ghayir Khan)的称号,蒙古商队中有一个印度人以前认识他,这次竟直呼其名而不称他汗号,因此被激怒;同时,他也觊觎商队的财物。他写信报告算端,说他们是间谍,于是算端下令将他们处死并抢劫其财物。朮札尼书两处提到讹答刺惨案,都说是由于该城总督的贪婪,但指出他得到了算端的准许,有一处还补充说,所没收财物是交给了摩诃末。这些分歧主要是由于有的作者明显地偏袒摩诃末,为他辩护,如奈撒微;有的则着重谴责摩诃末。其实,摩诃末和亦难出两人都应对惨案负责。参见巴尔托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英译本,页三九七至三九九。

上将他们消灭。花刺子模沙闻讯,发兵从毡的(Jand,今哈萨克斯坦克齐尔-奥尔达东南)北进,与蒙古军相遇。蒙古军帅声明:“未奉成吉思汗之命与花刺子模沙作战,此行系为他事。”但摩诃末不顾蒙古人的声明,仍向他们进攻,于是蒙古军被迫应战,一部蒙古军直捣花刺子模中军,摩诃末几乎被擒,幸得其子札兰丁(Jalāl al-Dīn)救援才挽回了败局。至此,花刺子模与蒙古之间的所有缓冲地区都被成吉思汗征服,双方势力直接接触了。一二一九年春,成吉思汗统领大军出发亲征花刺子模,除木华黎率领一部分军队继续攻金外,诸子、诸那颜和大部分蒙古军都参加西征,其规模和一二一一年南征金国差不多一样。此外,还有金国、西夏新归附的契丹军、汉军、河西军以及大批能工巧匠,畏兀儿、哈刺鲁两部首领也奉命率军从征。有的穆斯林史家记载说,成吉思汗的西征军达六十万或七十万人,这当然是过分夸大的数字,当不可信<sup>①</sup>。估计其总数不会超过二十万人。

当时,花刺子模拥有约四十万军队,经济力量也相当雄厚,然而,统治集团的腐败却把这个国家引向了毁灭。其一是摩诃末与其母秃儿罕可敦(Turkān Khatun)以及得到她支持的军事贵族之间的深刻矛盾。花刺子模帝国的建立,主要是依靠了突厥、康里部族的军事力量,因此形成了一个有实力的军事贵族阶层。出身于康里部伯岳吾氏族的秃儿罕可敦操纵朝政,更加亲信外戚,她的许多弟侄都担任了将帅高官。军事贵族和太后势力结合,构成对摩诃末王位的严重威胁。因此,他们之间相互猜忌,争权夺利的斗争很激烈,以致力量分散,不能一致对外。其二,花刺子模统治集团特别是军事贵族,骄横贪暴,任意掠夺被吞并的地区,欺压人民。例如,他们原来是以穆斯林解放者的姿态进入河中的,但后来他们的行径与西辽毫无二致。这就激起了各地上层阶级和普通人民对花刺子模统治者的愤恨。其三,摩诃末既狂妄自大又怯懦无能。最

---

<sup>①</sup> 朮札尼书英译本,页二七三、九六八。此书有二、三种本子作三十万。参见巴尔托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页四〇四。

初,他完全被军事征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心想向外扩张,这种企图与当时穆斯林商人希望通过贸易谋取利益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因而得不到支持。他竟狂妄到闭目塞听,看不见蒙古的强大,干出残害商队、杀辱使臣的乖戾行为。但真正到了大敌压境的时候,又惊慌失措,采取了逃跑的策略。杀使以后,摩诃末召集军事会议商讨对策,有人建议集中军队于忽章河岸,以逸待劳,击败蒙古军;有人则认为应将蒙古军引进来,利用人民的守土之心来消灭敌人;还有人提出弃城退守阿母河渡口;最怯懦的主张则是将军队集中到哥疾宁(Ghazna,今阿富汗加兹尼),如不利即可退入印度。摩诃末拒绝采取第一策,因为他担心军队集中起来后,一旦打败外敌,立刻就会转过来反对自己。结果采用了第二策,即分兵把守城堡,同时他自己则准备退往阿母河以南,随时准备放弃阿母河北地区。这就使蒙古军有可能不必经过激烈的野战,立即包围和攻取各个孤立的城堡。

一二一九年夏,成吉思汗在也儿的石河旁驻营。秋,统全军向花刺子模进发,抵其边城讹答剌。分兵四路:一路由察合台、窝阔台指挥留攻该城;一路由朮赤指挥沿忽章河而下取毡的;另一路由阿剌黑(Alaq)那颜率领南下取别纳客忒(Banākath,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西,锡尔河北岸)、忽毡等地;成吉思汗和拖雷统主力,越过沙漠,直趋不花刺。讹答剌城经过五个月的英勇抵抗,终于被攻破,守将亦难出自知有杀害商队之仇,断难幸免,乃率余部退守内城,继续拼死抵抗了一个月,直到只剩下他一人,才被蒙古军捕获。蒙古军杀掠之后夷平讹答剌城堡,将亦难出押送到正在撒麻耳干的成吉思汗面前处死。朮赤一军攻下昔格纳黑、八儿真(Barchin,即《元史·地理志》之巴耳赤邗,在昔格纳黑西北),逼临毡的,守将弃城逃跑,城民自动组织抵抗,但因缺乏作战经验,很快被蒙古军攻破。朮赤命阿里火者(‘Alī Khoja)为毡的城长官,镇抚降民,另遣一将分兵西进,攻取养吉干(Yanghikant,今哈萨克斯坦卡札林斯克南),于是忽章河下游诸城尽被蒙古占领。朮赤率部驻于忽章河下游以北的哈刺忽木(Qara-Qum)之地。

阿剌黑那颜等率领的蒙古军虽然很快就攻取别纳客忒等城,但进至忽毡时,却遇到顽强抵抗。守将帖木儿灭里(Temür Malik)率领精锐退到忽章河中一个岛上的城堡中,坚持抗战,屡屡杀伤蒙古军。直到成吉思汗攻下撒麻耳干,派兵增援,并驱迫讹答剌、不花剌、撒麻耳干等城降民中的丁壮前来参加攻打,帖木儿灭里才因寡不敌众,率部弃岛登舟,向忽章河下游退却;沿途又遭到两岸蒙古军的追击阻截,乃弃舟登岸,与蒙古军接战,部卒散亡殆尽,单骑逃入玉龙杰赤。蒙古军取忽毡后,即移军攻占今费尔干纳地区。

成吉思汗与拖雷率领人数最多的中军渡忽章河后攻克讷儿(nūr)等城,于一二二〇年二月抵不花剌,守将率领一部分军队逃跑,蒙古军一部尾追至阿母河,把他们消灭。不花剌城的教长、绅士们献城投降,成吉思汗入城后,乘马直入回回礼拜寺,在那里设宴庆功,召城中歌妓舞唱佐饮,又纵使蒙古军用藏经箱当马槽,将古兰经抛掷满地,任马蹄践踏。他还召集城民训话,宣布花剌子模沙背信弃义诸事,声称自己是“上帝之鞭”,降罚于此国之人。当时,还有一部分军民据守内城不降,蒙古军在劫掠、勒索之后,纵火焚烧居民房屋,以孤立内城守军,并用火攻破内城,抵抗者三万多人全部被害。繁荣的不花剌城遂被夷为平地,残存的人民,丁壮被签为军,驱使从征,其余的人也无法在这荒城中安居。蒙古军走后,他们就四散逃往各处乡村。三月,成吉思汗从不花剌进围撒麻耳干(摩诃末在灭斡思蛮后以此为都城),察合台与窝阔台率领的一路军队攻陷讹答剌后也来此会合,各驱降民随军攻城。摩诃末曾下令预征三年赋税来支持战争,拟建长城环绕撒麻耳干及其郊区以为守御计,但筑城开壕之役旋即停罢。一听到蒙古军过忽章河的消息,摩诃末慌忙离开撒麻耳干,退到阿母河之南。撒麻耳干城中守军有五万人(一说四万人,一说六万人,一说十一万人),竟不敢出战。围城第三日,有一部分城民出城突击蒙古军,但中了埋伏,全部被歼。第五日,康里守军和城民决定献城投降。蒙古军入城后,立即拆毁城堞,驱居民出城,然后纵兵大掠,但允许献降的城民代表、法官(Qādi)和掌教(Shaikh al-Islām)得保护其属不受侵害,据说其人数达五万人。

成吉思汗命将投降的康里将卒三万多人包围在一处平野中,全部屠杀;又从居民中签括工匠三万人分赐诸子、亲属,并选同样数量的丁壮随军作战,其余居民则在交纳赎金后许其回城。契丹人耶律阿海受命为达鲁花赤,留此镇守。经这次战祸,撒麻耳干受到很大破坏,一年半以后(一二二一年底),丘处机来到这里,据他记载:“方算端氏之未败也,城中常十余万户,国破以来,存者四分之一。”<sup>①</sup>耶律楚材有诗咏云:“寂莫河中府,声名昔日闻,城隍连畎亩,市井半邱坟。”<sup>②</sup>河中府即撒麻耳干,西辽所名(见耶律楚材《西游录》)。

### 花剌子模的灭亡

成吉思汗在围攻撒麻耳干时,闻花剌子模沙摩诃末已退驻阿母河南,即遣哲别、速不台和脱忽察儿(弘吉剌部人)各领一万精骑渡河追击。取撒麻耳干后,从春末至秋初,成吉思汗先驻撒麻耳干城区,后移军于那黑沙不(Nakhs-hab,今乌兹别克斯坦哈尔希)附近草原,休养士马,准备下一步的进攻<sup>③</sup>。一俟秋高马肥,他就派遣察合台、窝阔台率领右翼军去取玉龙杰赤,命朮赤率本部兵从其驻营地南下会合;自与拖雷统领中军向阿母河挺进,兵锋指向呼罗珊地区。西征的第二阶段战役开始了。

摩诃末自一二二〇年之初屯军于阿母河南岸卡利甫一带,本想守住阿母河一线,但他和母后以及康里将领们的不和使他无法组织有效的抗战。据说成吉思汗采用讹答剌城一个投降者所献的离间计,伪为康里诸将致成吉思汗信,表示愿意反戈投诚,并故意使此信落入摩诃末手中,于是摩诃末更加猜疑

① 《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② 耶律楚材:《西域河中十咏》之九,《湛然居士集》卷六。

③ 《世界征服者史》,页一二九。《史集》谓当年夏季成吉思汗在撒麻耳干之地度过,以便休息和喂肥马匹(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一四);秋初,遣诸王(指察合台等)往攻花剌子模,自己和拖雷从撒麻耳干出发,来就那黑沙不的牧场(同上,页二一七)。按耶律楚材《进征西庚午元历表》(《湛然居士集》卷八)云:“庚辰(一二二〇年),圣驾西征,驻蹕寻斯干(即撒麻耳干)城。是岁五月之望……”似夏历五月中成吉思汗尚在撒麻耳干地区,其移驻那黑沙不应在夏末秋初。



诸将。事实上康里将领的确不服从摩诃末的调遣,而且随时打算搞掉他。不花剌、撒麻耳干相继陷落以后,摩诃末惊慌失措,急忙逃到你沙不儿(Nishapur,今伊朗霍腊散省内沙布尔),路上几乎遭到部下将官的暗算。不久他探得蒙古军已渡过阿母河进入呼罗珊境,又匆匆离开你沙不儿逃向可疾云(Qazvin,今伊朗德黑兰省加兹温)。哲别、速不台奉成吉思汗之命专追花剌子模沙,因此“一路上既不停驻,也不杀掠,只是加快步伐,紧追不舍。”<sup>①</sup>他们渡过阿母河,进抵巴里黑(今阿富汗马札里沙里夫西),城民纳款请降,遂留一将镇守,随即分兵向西追赶,沿途传檄谕降,除非遇到阻拦、反抗,并不攻城略地。一二二〇年六月,哲别军至你沙不儿,城民愿献纳粮草供军,于是蒙古军从城下通过,分几路追踪摩诃末的逃跑方向。速不台军经徒思(Tūs,今伊朗霍腊散省马什哈德北)、哈布商(Khabūshān,今霍腊散省古昌)、担寒(Dāmghān,今伊朗马赞德兰省达姆甘)、西模娘(Simnān,今伊朗德黑兰省塞姆南)至刺夷(Ray,今德黑兰之南);哲别军经志费因(Juvain,今伊朗霍腊散省札哈台),进入祿桺答而(Māzandarān,今伊朗马赞德兰),攻破一些城堡后,也来到刺夷城下,刺夷法官等请降。蒙古军得悉摩诃末已去哈马丹(Hamadān,今伊朗西部哈马丹),又尾追而前。摩诃末在敌军到达之前离开哈马丹,辗转藏匿于可疾云附近诸堡,最后逃到宽田吉思海(今里海)之南的祿桺答而境。蒙古军跟踪而至,摩诃末遁入宽田吉思海中的一个岛上。大约在一二二〇年底,摩诃末病死,死前传位于其子札兰丁。

秃儿罕可敦在得悉摩诃末放弃阿母河防线逃跑时,也立即率领嫔妃、王子和随从离开玉龙杰赤,逃到祿桺答而境内的刺儿占(Lārjān,今伊朗里海南阿谋耳县的一个属区)、伊刺勒(Ilāl,今伊朗杜达干镇的舍里河源处)二堡中。

---

<sup>①</sup> 伊本额梯儿:《全史》第十二卷,页二四一,转引自巴尔托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页四二三。据《世界征服者史》(第一卷,页一四五至一四七)和《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一一至二一三),哲别、速不台军在追击途中经过途思、哈布商、西模娘、阿模里等地时,都有杀掠行为。

追踪摩诃末进入朮剌答而的蒙古军一部包围了这两个堡,围困了四个月,堡中无水,守军出降,秃儿罕可敦等被俘。

秃儿罕可敦逃离玉龙杰赤时,在这个花刺子模旧都的军队尚有九万人。一二二〇年夏,忽毡守将帖木儿灭里来到此城,遂整饬守备,并率军出击忽章河下游的朮赤军,夺取养吉干城,杀蒙古所置“沙黑纳”(即达鲁花赤),但随即弃城退回。大约在一二二〇年底,札兰丁与其弟二人在葬父后从里海岛上回到花刺子模。康里将领素与札兰丁不和,今见他继承算端,内不自安,策划发动政变,将他杀害。札兰丁得报,急离玉龙杰赤去呼罗珊,帖木儿灭里率三百骑从之。札兰丁离开玉龙杰赤三天后,其二弟闻蒙古军来攻,亦弃城遁,路上为蒙古军所包围,与其从者俱战死。三王走后,玉龙杰赤城的康里统将乌马儿(‘Umar)遂僭号算端。

察合台、窝阔台各统本部及右翼诸千户军,经不花刺从东南方面进入花刺子模境,朮赤率本部军从毡的南下,先后抵玉龙杰赤城下。玉龙杰赤城跨阿母河两岸,中有桥梁相连,蒙古军三千人欲夺取桥梁,结果全被守军杀死,于是城内守军胆气更壮,屡屡杀伤攻城的蒙古军。因朮赤与察合台失和,号令不一,连攻数月不能克<sup>①</sup>,成吉思汗遂命窝阔台统一指挥。蒙古军终于攻入城中,用石油纵火烧屋,但他们每占领一个城区都遭到城民的激烈抵抗,最后只剩下三个区,守者力竭请降。蒙古军将居民全部赶出城外,命工匠别聚一处(据载其总数达十万人),押送到蒙古;其余人分配各军,除年轻妇女和儿童掳为奴婢外,尽数屠杀。杀掠之后,又决阿母河堤,放水灌城,藏在城中的人也全被淹死。往昔繁华富庶的花刺子模首都,竟成了一片水乡泽国。

成吉思汗和拖雷率领中军从那黑沙不出发,过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

---

<sup>①</sup> 《史集》谓玉龙杰赤围城达七个多月之久,《全史》则说是五个月。但据《札兰丁传》,玉龙杰赤城从被围至被攻陷是在一二二一年一月至四月(法译本,页一五三)。

沙赫尔夏勃兹南九十公里拜松山中的布兹加勒山口)南下。他从诸军中选拔强悍者组成一支精锐部队,命拖雷率领,先渡阿母河去取呼罗珊诸城<sup>①</sup>;自统大军进攻阿母河北岸要塞忒耳迷(Tirmiz,今乌兹别克斯坦捷尔梅兹)。忒耳迷军民拒绝招降,与蒙古军激战十一日,终被攻破,成吉思汗下令毁其城堡,尽屠其民。其后,分兵攻略附近诸城寨,并派一支军队进入巴达哈伤(Badakhshān)地区抄掠。在阿姆河北岸驻冬之后,一二二一年初,成吉思汗统兵渡河,抵巴里黑城下,城民首领带着大量贡品出城请降<sup>②</sup>。成吉思汗军遂由此进围塔里寒寨(Taliqān,在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上游之北),塔里寒军民凭险据守,蒙古军围攻了七个月,直到拖雷奉召回军与其父会合,才把它攻克,塔里寒守军和人民被屠杀殆尽。

伊斯兰史家把拖雷出征呼罗珊形容为当地人民的末日来临。在哲别、速不台军经过时,呼罗珊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坏。蒙古大军过境后,一些地方相继发生反对蒙古的事件,如途思城的达鲁花赤被杀;摩诃末的一个大臣据有马鲁(Merv,今土库曼斯坦马里),捕杀降蒙的官员;一支蒙古小部队在马鲁城下被消灭;蒙古大将脱忽察儿在进攻你沙不儿时被射死<sup>③</sup>。蒙古军对这些敢于反抗的城市进行了最残暴的报复。一二二一年二月,拖雷军七万(包括沿途驱迫而来的各地降民)围攻马鲁,守军突围失败,马鲁长官出城投降,拖雷伪许不杀。但在蒙古军入城后,即将居民全部赶到城外,选取工匠四百人,然后先杀将卒,继屠居民,据载死者达七十万人(一说一百三十万人),马鲁城被夷为平地。四月,拖雷军进围你沙不儿,城中遣教长、绅士出城请降,拖雷不许,下

---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一八)和《圣武亲征录》都记载成吉思汗度铁门关后即遣拖雷往取呼罗珊诸城,唯《世界征服者史》(页一三一)谓取巴里黑后始命拖雷分兵出征。

② 《世界征服者史》载成吉思汗接受巴里黑城民投降后,又将他们全部屠杀(页一三〇至一三一);《史集》也记载了这次杀降事件(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一八)。但据《全史》,因巴里黑城民自愿归降,成吉思汗宥之。

③ 此据《世界征服者史》,《史集》谓其死于与古尔山民作战中。

令架火炮、抛石机猛攻,将城墙打塌七十余处,蒙古军蜂拥而入,以为脱忽察儿复仇,纵兵肆杀,除工匠四百人获免外,其余兵民屠戮殆尽。途思、奈撒(Nasā,今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东)、志费因诸城都遭到疾风烈火般的扫荡。这时已届盛暑,成吉思汗召拖雷回军塔里寒,拖雷军于回途攻打也里(今阿富汗赫拉特),也里城军民进行了八天的抵抗,长官阵亡,拖雷允许城民投降,免于屠城,但札兰丁的军队一万二千人则尽被杀死。

札兰丁从玉龙杰赤出走后,一些花刺子模将领率领少数军队追随他。一二二一年初,他途经奈撒,击溃了一支屯驻该地的蒙古军,取得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又经过你沙不儿、也里等城,来到他原先的封地哥疾宁。驻扎在这里的康里贵族阿明灭里(Amīn Malik,秃儿罕可敦之侄,《圣武亲征录》作灭里可汗)所统五万军队归附于他,另一大臣赛甫丁(Saif ad-Dīn)亦率四万军队来投,于是其势复振,遂进屯八鲁湾(Parvān,今阿富汗查里卡东北),出击蒙古军,颇获小胜。成吉思汗得到报告,即遣失吉忽秃忽率三万军(一说四万五千)来攻,双方会战于八鲁湾川,失吉忽秃忽大败逃归,蒙古军损失过半。这是从蒙古入侵以来花刺子模军取得的最大胜利,消息传开,已被蒙古占领的一些城市纷纷发动起义,杀死蒙古戍将。但札兰丁部下将领为争夺战利品竟发生争执,一部分将领率部离去,札兰丁势孤,只得退回哥疾宁。这时成吉思汗已取塔里寒诸寨,察合台、窝阔台亦各率所部来会,于是亲统大军进向哥疾宁。札兰丁急弃城撤退到申河(印度河),准备渡河进入印度。成吉思汗军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哥疾宁,随即尾追至申河岸边,札兰丁因渡船缺乏,还没有来得及渡河。十一月二十四日,成吉思汗下令猛攻,经过激烈战斗,札兰丁部下将卒大部分死伤逃散,阿明灭里率残兵逃到白沙瓦,被蒙古军消灭;札兰丁数次奋勇突围均被阻回,危急中乃跃马入河,泅过对岸,将卒过河追随者四千余人,遂入印度。

一二二二年春,成吉思汗命八剌等率领蒙古军二万人入印度追击札兰丁,但一直找不到札兰丁的踪迹,入夏后,蒙古军不耐盛暑,只好退兵。不久后,札兰

丁也因不容于德里算端,离开印度去波斯。

成吉思汗又分遣蒙古军去镇压各城的起义,于是哥疾宁、也里、马鲁、巴里黑等城又遭到一次蹂躏。一二二二年春、夏两季,他都在“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以南活动,先是在印度河附近清剿札兰丁的离散部队,而后避暑于八鲁湾川。九月,渡过阿姆河,回到撒麻耳干地区驻冬,闻西夏有变,决意东归蒙古。任命花刺子模人牙刺瓦赤及其子麻速忽治理西域各城,并置达鲁花赤监临之。一二二三年东归途中,驻夏于忽兰巴失之地;一二二四年夏,至也儿的石河驻夏,次年春回到蒙古。

### 进兵钦察

哲别、速不台奉命追赶花刺子模沙摩诃末时,成吉思汗曾给以三年期限,命他们穷追勿舍,务在必得,然后通过钦察之地,回蒙古会合。摩诃末逃入宽田吉思海后,哲别、速不台军继续抄掠波斯各地,一二二〇年秋进入阿哲儿拜占境。阿哲儿拜占于十一世纪中叶被塞尔柱帝国征服,塞尔柱算端将其地分封给奴隶出身的大臣亦勒迭吉思(İldegiz,钦察人)为世袭领地,授以“阿塔卑”(Atabeg)的称号。其首府为桃里寺(Tabrīz,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大不里士),人民大部分信奉伊斯兰教,上层阶级通用波斯语和波斯文。塞尔柱朝灭亡后,阿哲儿拜占成为独立的小国,仅承认报达的哈里发为教主。一二一七年,第五代阿塔卑月即伯(Öz-beg)出兵援助哈里发攻打花刺子模沙摩诃末,结果遭到失败,于是又臣服于花刺子模。蒙古军逼近桃里寺,月即伯知力不能敌,遣人献纳金钱、牲畜请和,哲别、速不台率军离去,至宽田吉思海西岸的木干草原(Mūghān,今阿塞拜疆阿拉斯河下游南)驻冬。一二二一年初,蒙古军入掠谷儿只(Georgia,今格鲁吉亚共和国),败其守军,但因其境内林密路险,难于通行,旋即退兵,再至桃里寺,城中贵人复以重物贡纳,遂往攻蔑刺哈(Marāghah,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马腊格)。蔑刺哈城民进行了抵抗,城破后遭到残酷屠杀。哲别等统军南下,拟取报达。这时哈马丹城有花刺子模沙家臣纠众造反,杀蒙古所置戍将,于是蒙古军先攻下哈马丹,杀掠之后纵火焚城,时在一二二

一年八九月间。从此回师北进,第三次来到桃里寺,又索取了大量贡物。北攻拜勒寒(Bailaqān)城,城民杀死蒙古派来议和的使者,蒙古军猛攻,陷城后将居民屠杀殆尽。

一二二二年春,蒙古军进至干札(Ganjah,今阿塞拜疆基洛瓦巴德东),索取币帛为赎金,随即攻入谷儿只境。十二世纪初,谷儿只国王大卫(David)统一各地,赶走了入侵的塞尔柱突厥人,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其国都为梯弗利思(Tiflis,今第比利斯),居民大部分信奉基督教。女王塔马儿(Thamar)统治时期(一一八四至一二一三年),谷儿只的国势相当强盛,此后就趋向衰落。蒙古入侵时,谷儿只军三万人防守边境,哲别以五千兵设伏,速不台出战佯败,将谷儿只军引入伏地,歼其大半。其统兵大将军伊万(Ivan)不敢再战,退守梯弗利思。蒙古军因谷儿只地形险阻,也不深入,转向失儿湾(Shirvān),攻破其首府沙马哈(Shamākhā,今阿塞拜疆舍马合),进取打耳班(Darband,今俄罗斯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捷尔本特)。打耳班位于太和岭(高加索山)与宽田吉思海之间的隘口上,为南北往来必经之地,也是一个商业城市。蒙古取打耳班后,伪请失儿湾沙遣使来议和,使者至,即胁为向导,引蒙古军逾太和岭,入阿速(As,即阿兰)、钦察(Qipchaq)部地。

阿速人是伊朗语族部落,分布在太和岭北麓,信奉基督教。钦察人属突厥语族,分布在今咸海、里海、黑海之北的辽阔草原,拜占庭史家称他们为库蛮(Coman),斡罗思编年史一般称之为波洛维赤(Половец),伊斯兰著作家称为钦察。钦察人主要信奉伊斯兰教,也有一部分信基督教。蒙古军入侵时,阿速人与钦察人联合起来进行抵抗,胜负未分,哲别、速不台遣使对钦察人说:“你我系同族,而阿兰人为异类,我们双方应缔约媾和,不相侵害。你等所需金帛我可予之,然你等应弃彼(阿兰人)从我也。”随使还送去了大量礼物<sup>①</sup>。钦察人得物甚喜,率部离去。蒙古军在击败阿速等部后,乘胜攻入钦察,钦察人因

<sup>①</sup>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二九。



轻信和约,各部军队散归本地,毫无防备,结果被蒙古军各个击破。其一部首领玉里吉慌忙集合军队抵抗,也被打败。蒙古军遂驻冬于钦察之地。

逃入斡罗思的钦察一部首领忽滩汗向其婿、斡罗思伽里赤(Галиц)王“勇敢的密赤思老”(Мстислав Мстиславич удалой)求援。密赤思老约集斡罗思诸王公到乞瓦(Киев,今基辅)会商,宣言如不援助钦察,钦察人势必服属蒙古,从而加强了蒙古的力量,这对斡罗思将是更大的危险。斡罗思自乞瓦公国解体后,形成了许多独立的小公国,其中较大的有乞瓦、伽里赤、斯摩棱斯克(Смолинск)、波洛次克(Полоцк)、契尔尼果夫(Чирников)、罗思托夫(Ростов)、也烈赞(Рязань,即今梁赞)、诺伏哥罗德(Новгород)、弗拉基米尔(Владимир)等。诸侯们各为自己的利益,互不团结,因此响应伽里赤王倡议来参加乞瓦会议的只有一部分王公。他们拒绝了蒙古的和议,杀其使者,决定与钦察人联合,于是乞瓦、伽里赤、契尔尼果夫等国出兵钦察草原,迎击蒙古军。斡罗思军队虽然多,但指挥不统一,诸侯各自为战。伽里赤王先击败蒙古军前锋,哲别、速不台引军退却,诱敌深入。一二二三年五月末,斡罗思军渡过阿里吉河(今乌克兰日丹诺夫北卡里奇克河),蒙古军乃整军迎战,伽里赤王以为本部军队即可取胜,不约乞瓦等国王侯,独自与钦察军发起攻击,但很快就被蒙古军打败。败军向后奔逃,又冲垮了诸侯的营盘,斡罗思军遂大溃,诸侯六人阵亡,军队大半被歼,伽里赤王逃归本国。乞瓦王密赤思老屯兵于阿里吉河对岸高岗上,目睹伽里赤军惨败,竟见危不救。蒙古军遂进围乞瓦营,斡罗思军队抵抗了三天,密赤思老见敌军增兵,乃乞降,哲别等先允以不杀,但在斡罗思人投降后,即将密赤思老等王侯并其将卒尽数杀死<sup>①</sup>。蒙古军长驱直入斡罗思南部,烧杀掠夺;又沿黑海北岸进入克里米亚半岛,陷速答黑城(Судак)。

一二二三年底,哲别、速不台率军东返,经亦的勒河(Етил,伏尔加河),攻

<sup>①</sup> 据《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所获斡罗思国主密只思腊系送至朮赤处杀死。

入此河中游的不里阿耳(Bulghar),遇到顽强抵抗,遂沿河南下,经由里海、咸海之北,与成吉思汗会师东归。

## 二 长子出征

### 灭钦察、不里阿耳

一二二一年蒙古军破玉龙杰赤后,朮赤即率本部军回到忽章河下游,根据成吉思汗的原定计划遣兵北进,略取钦察草原东部地。一二二三年成吉思汗起程东归,召他来见,朮赤因与察合台不和,与其父也有矛盾<sup>①</sup>,推病不赴,留在自己的封地。后来有个忙兀部人从西域回来,向成吉思汗报告说,看见朮赤在打猎,没有听说生病。成吉思汗大怒,命察合台、窝阔台带兵去抓朮赤,还打算自己也随后亲征,但不久就得到朮赤病死的消息<sup>②</sup>,乃改命斡赤斤去处理丧事,确定朮赤次子拔都为继承人。当时朮赤的营帐在也儿的石河之西,其兀鲁思西界已达到札牙黑河(Jayaq,今乌拉尔河)。这段时间,蒙古人似乎没有在钦察草原进行大征伐。

一二二九年窝阔台即位后,遣阔客歹、雪你台率三万军队进征钦察、撒哈辛(Saqsin,在今伏尔加河下游)和不里阿耳。拔都弟别儿哥可能也参加了这次出征。亦的勒河下游的撒哈辛人和钦察人在蒙古军攻打下逃入不里阿耳避难,守卫边境的不里阿耳军也在札牙黑河附近遭到蒙古的打击,被迫退却<sup>③</sup>。但钦察、不里阿耳人坚持抗战,使蒙古军未能征服他们的国家。

一二三五年,窝阔台召开诸王大会,决定征讨钦察、斡罗思等未服诸国,命

---

① 据朮札尼书记载,朮赤极喜爱钦察之地,因此决定挽救这个地区免遭破坏。他曾对其随从说,成吉思汗完全是发了疯,以致如此毁灭这个国家和人民;他企图趁其父打猎时将他杀死,并与穆斯林结成联盟(英译本,页一一〇一)。这个记载未必可靠,但朮赤与其父有矛盾当是事实。

② 据朮札尼书,朮赤死在成吉思汗死之前六个月,即一二二七年初。

③ 见格列可夫、雅库鲍夫斯基:《金帐汗国及其灭亡》页二〇七引《拉甫连切夫编年史》一二二九年纪事。

各支宗室均以长子统率出征军,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亦遣长子从征。参加出征的有朮赤子拔都、斡鲁答、别儿哥、昔班,察合台子拜答儿、孙不里,窝阔台子贵由、合丹,拖雷子蒙哥、拨绰以及成吉思汗庶子阔列坚等。出征诸王以拔都为首,实际统兵作战的主将是速不台,出征军的人数约有十五万。一二三六年春,蒙古诸王和速不台等率师出发,秋,抵不里阿耳境,与先已在那里的拔都兄弟会合<sup>①</sup>。速不台统先锋军取不里阿耳。诸王会商后,各率本部兵征进。蒙古军攻破不里阿耳都城,杀掠之后将此城焚毁。<sup>②</sup>

一二三六年冬,蒙哥率军逼临亦的勒河下游的钦察部。居住在扎牙黑、亦的勒两河间玉里伯里山的钦察部首领忽鲁速蛮先已遣使纳款,适蒙古军至,其子班都察即率部归降。另一钦察首领八赤蛮(Bachman)“有胆勇”,不肯投降,率部出没于亦的勒河下游密林中,不时袭击蒙古军队。到一二三七年春,蒙哥大约得到速不台军的增援,才击败八赤蛮,以大军包围森林,入内搜捕,八赤蛮退到亦的勒河口附近的宽田吉思海(里海)中岛上。蒙古军跟踪追至海边,适水浅,遂涉水登岛,尽歼钦察军,擒获八赤蛮。八赤蛮见蒙哥,不肯下跪,说:“我为一国主,岂苟求生。且身非驼,何以跪人为!”坚强不屈,终被杀害。灭八赤蛮后,蒙哥继续征讨附近地区的阿速部。

### 征服斡罗思

一二三七年秋,拔都等诸王召开了一次大会(忽里台),决定共同进兵斡罗思,蒙哥、贵由、阔列坚、合丹、不里等都参加这次出征。蒙古军经过莫尔多瓦(Мордва)境,征服了这个小国。冬,进入也烈赞境,遣使者谕也烈赞侯玉里

---

① 《史集》第二卷,波义耳英译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五六。按,《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六载:“太宗甲午年(一二三四年),命诸王拔都征西域钦叉、阿速、斡罗思等国。岁乙未(一二三五年),亦命宪宗往焉”。据此,拔都前已奉命西征,与《史集》的记载符合。

② 不里阿耳城在伏尔加河与卡玛河汇流点南,今喀山之南一一五公里,其废墟在今不里阿耳-乌斯平斯科依村旁。参见《金帐汗国及其灭亡》,页二四。

吉(犹里·伊戈列维奇),令其贵族、人民各出财产的十分之一为贡。玉里吉拒绝纳贡,准备抵抗外敌,并遣人向弗拉基米尔大公求援,但大公只顾防卫自己的辖境,不肯出兵。蒙古军围攻也烈赞城五日,至第六日(一二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城破,玉里吉等王公并守城兵士尽死,居民也遭到屠杀,也烈赞城被焚毁。

一二三八年初,蒙古军分兵四出,一个多月内连破科罗木纳(Коломна),莫斯科,罗思托夫,速兹答勒(Суздаль)等十余城。二月,进围公国首府弗拉基米尔城,大公先已退守昔迪(Сить)河,等待其弟乞瓦公和诺伏哥罗德公的援兵,城中由其子守卫。蒙古军猛攻五日,并胁迫各地被俘的斡罗思人也参加攻城,城破,纵兵抢掠烧杀,避入教堂的大公家属和城中显贵尽被烧死。三月,拔都遣一支军队进攻昔迪河畔的大公军营,将其歼灭,大公战死。蒙古军自此进向诺伏哥罗德,可能因为前有森林、沼泽,地形不利,旋即退兵南下,抄掠斯摩棱斯克、契尔尼果夫等地。科泽里思哥(Козельск)城军民顽强抗击蒙古军达两月之久,杀敌五千余人,蒙古军称之为“歹城”(ma'u baliq),拔都增兵攻破城池,血洗了此城。

蒙古军继续向南,略取钦察草原西部地。钦察部长忽滩战败,率余部四千家迁入马札儿(匈牙利)境。一二三九年,蒙哥、贵由统兵进入阿速国,攻其都城蔑怯思(Meges),阿速人抵抗了近三个月,才被攻破<sup>①</sup>。阿速国主杭忽思投降,蒙哥命签其丁壮从军。一二四〇年春,蒙哥、贵由等继续在太和岭北用兵,并遣一军往取铁门关。其年秋,窝阔台遣使者至军,召贵由、蒙哥东归。蒙哥东归时,使杭忽思仍守其国,将其子阿塔赤并所部阿速军带回,其后从攻四川,

---

① 《元史》卷二,《太宗纪》;卷一二二,《昔里钤部传》。《元史》所载攻取蔑怯思城的时间为太宗十一年十一月至十二年正月(一二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二四〇年二月),据《史集》,则此城之陷在猪年(己亥,一二三九年)之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六〇)。参阅米诺尔斯基:《高加索研究三:阿兰都城蔑怯思与蒙古的远征》,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校学报》,第十四卷第二期,一九五二年。

灭南宋,镇戍中原,成为元朝很重要的一支色目军队<sup>①</sup>。

拔都率领一军经略亦的勒河以东诸地,并在钦察草原休养士马。一二三九年中,曾遣兵复入斡罗思抄掠。斡罗思王公们在大敌当前时,仍然相互争权夺利,不能团结。乞瓦王雅罗思老(Ярослав)见其兄弗拉基米尔大公一门尽绝,在蒙古兵退后,即赴弗拉基米尔,宣布继承兄位,兼并其地。而契尔尼果夫王米海勒(Михаил)亦乘机进据乞瓦。大约在一二三九年冬,蒙古大军从亦的勒河出发,长驱直入斡罗思南部,攻破别列雅思老勒(Переяславль)、契尔尼果夫二城。攻打契尔尼果夫城时,蒙古军使用了巨型抛石机,用于抛击的石头大至需四人始能抬动。蒙古军进围乞瓦,遣使入城谕降,乞瓦城人杀使者。米海勒惧,逃往孛烈儿(波兰),伽里赤王丹尼勒(Даниил)至乞瓦,命其部将德米特尔(Дмитр)守城。一二四〇年秋,拔都亲统大军至。于是诸路军云集,围攻乞瓦。蒙古兵势极盛,“兵车辚辚,骆驼鸣叫,战马嘶鸣,以致人们说话彼此都听不见。”<sup>②</sup>拔都下令四周架炮,猛烈攻城,昼夜不息。乞瓦城三百年来一直是斡罗思的国都,城墙坚固高峻,德米特尔率领军民顽强守御。十一月十九日,蒙古军打塌一处城墙,攻入城内,纵兵杀掠。德米特尔受伤被捕,拔都赞赏他的忠勇,赦免不杀。取乞瓦后,蒙古军继续西进,攻入伽里赤国,破其都城弗拉基米尔—沃伦(Владимир-Волынский)和境内其他城市,伽里赤王丹尼勒逃入马札儿。

#### 进兵孛烈儿、马札儿

一二四一年春,蒙古军分兵二路,一路由拜答儿、兀良合台等率领侵入孛烈儿,一路由拔都兄弟、速不台等率领侵入马札儿。这时孛烈儿国已分裂为若

---

① 《元史》卷一三二,《杭忽思传》;卷一三五,《阿塔赤传》;卷一二二,《阿儿思兰传》。

② 《俄罗斯编年史》第一卷第二册,页四七〇。转引自《苏联史纲·九至十三世纪》第五章。黄巨兴译本改名《蒙古统治时期的俄国史略》,科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页五四。

干小封国,国王博列思老(Boleslav IV)都于克刺可夫(Cracow),只能管辖直属之地,其余封国都各自为政,不听他的号令。二月,蒙古军涉冰渡过维思秃刺河(Vistula),破散多米儿城(Sandomierz),进至克刺可夫城郊,大掠后退兵。不久,再入其境,三月,败孛烈儿军,博列思老举家逃入莫刺维亚(Moravia),克刺可夫居民亦弃城避兵。蒙古军纵火烧毁克刺可夫后,进入昔烈西亚(Silesia),乘筏渡过了奥得河(Oder),攻其都城弗洛茨拉夫。昔烈西亚侯亨利(Henry)先已退屯里格尼志(Liegnitz)城,集结孛烈儿军、日耳曼十字军与条顿骑士团三万人,准备迎敌。蒙古军遂舍弗洛茨拉夫,进至里格尼志附近。四月九日,亨利率军出战,大败,亨利战死。蒙古军获胜后,南下攻入莫刺维亚境,波希米亚王遣其骁将雅罗思老(Yaroslav)来援,坚守斡勒木志(Olmütz)城,蒙古军久攻不下,在焚掠附近各地后,遂向马札儿,与拔都军会合。

拔都率领的蒙古军主力分三路侵入马札儿:昔班统一路从北面孛烈儿攻入,合丹统一路从东面摩勒达维亚(Moldavia)攻入,拔都亲统一路从伽里赤直趋马札儿国都。当时马札儿国土甚广,北包斯洛伐克,东据特兰西瓦尼亚,南抵亚得里亚海,但实际分裂为许多封建领地,诸侯均不受国王管辖。国王别刺四世(Béla IV)<sup>①</sup>都于佩斯城(Pest,《元史》作马茶城)。他与诸侯、贵族之间矛盾很大,特别是他收容了忽滩汗所部钦察人,这些钦察人在境内为非作歹,更引起了人民的怨恨。蒙古军入侵时,别刺急召主教、贵族们至布达城(Buda,与佩斯城相连,今合称布达佩斯)会商对策,诸人以钦察逃入招来外祸,将忽滩汗等钦察首领拘捕,并遣人四出征集援兵。三月,蒙古军进至佩斯城附近,马札儿兵一部出战大败,人民更迁怒于钦察人,将忽滩汗等杀死,于是钦察人与马札儿人相互仇杀,国中大乱。四月,马札儿援军稍集,至六万人。别刺率

---

<sup>①</sup> 《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作“马札儿部主怯怜”,怯怜(Keler),匈牙利语 Király 之讹,意为“国王”。参阅伯希和:《金帐汗国史评注》,巴黎,一九五〇年版,页一二一至一二二。



军出战,蒙古军退到撒岳河(Sajo,《元史》作潞宁河)之东,马札儿军进至河西岸结营,以重兵把守桥梁。拔都遣兵夺桥,失利;速不台率军从下游结筏潜渡,绕出马札儿军之后,拔都军亦猛攻守桥兵,夺取桥梁,于是合兵包围了马札儿军营。马札儿军接战皆败,别刺突围走,蒙古军追击,杀死马札儿溃军无数。进抵佩斯城,攻拔之,尽杀其居民,纵火烧毁城市。夏、秋两季,蒙古军驻营于秃纳河(多瑙河)以东诸地,一面休养士马,一面分兵抄掠。七月,有一支蒙古军进至维也纳城附近的诺伊施达(Neustadt),遇奥地利公、波希米亚王合兵来御,旋即退走。十二月,拔都亲统一军涉冰渡过秃纳河,攻陷格兰(Gran,一名斯特里戈尼亚)大城。一二四二年初,遣亲王合丹分统一军往追马札儿王别刺。此时蒙古军已是强弩之末,无能力继续攻城略地,不久,窝阔台死讯传来,拔都遂率军东还。

别刺先逃入奥地利,颇受奥地利公欺凌,复走克罗底亚(Croatia),闻蒙古军追至,急避入亚得里亚海岸边的岛上。合丹军追到海边,劫掠了斯帕刺托(Spalato)、卡塔罗(Cattaro)二城,然后取道塞尔维亚,与拔都军会合。蒙古军徐徐东行,经过瓦刺齐亚(Wallachia)、摩勒达维亚等地,于一二四三年初到达亦的勒河下游的拔都营地。

蒙古军于里格尼志大败孛烈儿军并进兵德国边境的消息,使德国上下震恐;马札儿王别刺又遣瓦陈主教分别致书德国皇帝菲烈德里二世和教皇格烈戈里九世求援。但这时德皇与教皇正在互相攻战,仅以虚辞应付别刺,诸如表示同情,勉励他为保卫基督教奋勇作战云云。教皇和基督教国家的统治者们甚至把蒙古的侵略视为“天罚”,无可奈何,只能祈求上帝的怜悯。这也是使蒙古军能够从容地蹂躏欧洲许多地区的原因之一。

### 三 绰儿马罕西征和阿母河行省的治政

成吉思汗东归后,札兰丁从印度回到波斯,图谋兴复。他先得起儿漫(Kerman)、法儿思(Fārs)二州,又从其弟嘉泰丁(Ghiyāth al-Din,时已自立)手

里夺取了亦思法杭(Isfahān,今伊朗伊斯法罕)、伊刺克阿只迷(‘Irāk ‘Ajamī,今札格罗斯山脉以东地区)诸地,迫使嘉泰丁归降,于是花刺子模旧将与波斯各地诸侯皆奉之为主(一二二四年)。一二二五年,札兰丁进取桃里寺城,占领了阿哲儿拜占全境;又侵入谷儿只,于一二二六年三月攻占梯弗利思,尽杀其基督教居民。一二二八年,他镇压了嘉泰丁和其他藩臣的叛乱,打垮了谷儿只、阿美尼亚等国联军,巩固了在波斯西部的统治。先已灭亡的花刺子模帝国竟出现了复兴的景象,亦思法杭和桃里寺成为这个新帝国的都城。但是,札兰丁虽然凭借其旧主的声望和骁勇善战重建了帝国,却完全缺乏起码的政治头脑。他在建国后,不去联合诸伊斯兰国势力,准备抗击必将到来的蒙古入侵,而是为了父祖旧怨发兵进攻报达的哈里发;后来,又一再侵掠起刺特(Khilāt,今土耳其东部凡湖西北),并侵入鲁迷(Rūm,塞尔柱朝封国,都于科尼亚城)。他野心极大而又行为暴戾,残杀和劫掠被征服地区人民,以致引起普遍的愤恨。一二三〇年,起刺特、鲁迷两国算端连兵进攻札兰丁,败之于额儿赞章(Arzinjān,在幼发拉底河上游)。札兰丁退回到桃里寺,元气还没有恢复,蒙古军已逼近国门了。

窝阔台即位后,立即派遣绰儿马罕率领三万军队去征讨重兴的花刺子模国。蒙古军急速进兵,穿过呼罗珊、刺夷,于一二三〇年冬抵阿哲儿拜占,札兰丁闻讯,惊慌失措,弃桃里寺,避入木干草原。其后,他一直在蒙古军的追击下东奔西窜,境况一如其父当年,最后逃到迪牙别乞儿(Dyarbekr,在今土耳其东部)的山中,被当地库尔德族农夫杀死(一二三一年八月)<sup>①</sup>。

灭札兰丁后,蒙古军继续留在波斯西北部,统帅绰儿马罕驻营于水草丰美的木干草原和阿兰(今阿塞拜疆西南部)一带,不时遣兵攻掠阿哲儿拜占、迪牙别乞儿、额儿比勒(Erbil,今伊拉克北部)、谷儿只诸地。一二三三年,蒙古军兵临桃里寺,该城长官、士绅人等送纳大量金银、布匹至营中求降,绰儿马罕

<sup>①</sup> 参阅格鲁塞:《草原帝国》,页三二四至三二六。

又命其献金帐一顶,选择技艺高的织匠若干人,以备送回蒙古献给大汗,这样才免于屠掠。一二三六年,蒙古兵入谷儿只,女王鲁速丹(Rusudani)逃往库塔伊思(Kutaisi,在今格鲁吉亚境),梯弗利思地区诸侯降附于蒙古。一二三九年,绰儿马罕攻入大阿美尼亚(谷儿只的藩属),攻其古都阿尼(Anī)城,因此城人民曾杀蒙古使者,遂下令屠城。哈儿思城虽惧而投降,也遭到屠杀。次年,阿美尼亚王去蒙古朝见大汗,窝阔台授予圣旨,命绰儿马罕将其领地交还给他管治。

一二四一年绰儿马罕死,拜住那颜继统其军。次年,拜住自率蒙古军侵入鲁迷,攻拔额儿哲鲁木城(Erzurum,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二源之间)。一二四三年六月,鲁迷算端凯亦·豁思鲁(Kai Khosrau II)统兵迎战于额儿赞章附近,战斗刚刚开始,鲁迷军就全线崩溃,算端逃回科尼亚,于是拜住进占西瓦思(Sīvās,今土耳其锡瓦思)城,掠其旁近诸地,凯亦·豁思鲁纳币求和称藩。同年,另一支蒙古军侵入叙利亚,马刺提牙(Malatiyah,今土耳其马拉提亚)、阿勒波(Aleppo,在今叙利亚北部)等城献纳金币宝物,才免于被毁。一二四四年,小阿美尼亚(西里西亚)王海屯一世遣使至拜住营请求归附,愿为蒙古藩臣,后于一二五四年亲自入朝蒙哥汗于和林。一二四五年,蒙古军占领了起刺特和阿米德(Amīd,在今土耳其境,底格里斯河上游);毛夕里王、大马士革王均向蒙古纳贡。谷儿只女王鲁速丹则降附于拔都,遣其子大卫为质,拜住另立女王之兄大卫为谷儿只王。一二四六年,两大卫同时入朝和林,参加了贵由的登基大典,贵由命二人分治其国。鲁迷新算端亦朮丁(‘Izzal-Dīn)亦遣其弟鲁克奴丁(Rukn al-Dīn)入朝,其后此兄弟二人争位多年,大汗卒命其分国而治。

札兰丁失败后,起儿漫的统治者博刺克(时已自号忽都鲁 Qutlugh 算端)和法儿思“阿塔卑”阿布别克儿(Abu-bekr)相继归附蒙古,成为藩属。

呼罗珊地区的一些贵族在札兰丁中兴时,叛离蒙古投附了札兰丁,绰儿马罕命花刺子模镇将真帖木儿(朮赤的家臣)平定离贰者并留镇呼罗珊,窝阔台

遂以他为呼罗珊、朮弥答而长官。真帖木儿开始起用波斯文官助理民政,如《世界征服者史》作者志费尼之父即被任为财政官。一二三五年真帖木儿死,窝阔台命畏兀儿人阔里吉思继其职,主户口、赋税事,他人不得干预。阔里吉思颇有治才,他以徒思城为治所,建立官府,整饬吏治,禁诸处军将、官吏任意戕害民命和需索财物,保护人民的生产,因此,受到严重破坏的呼罗珊等地,经济开始逐渐恢复起来。一二四二年,阔里吉思因得罪了察合台之妻而被逮捕,时脱列哥那皇后摄政,阔里吉思的支持者镇海失势逃匿,于是他被处死。继任者斡亦剌人阿儿浑虽能继续实行保护生产、抑制过度剥削的政策,但在脱列哥那、贵由统治时期,政治混乱,各系诸王经常派遣使者到波斯各地征索财物。蒙哥即位后,立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仍以阿儿浑为行省长官,统一管理波斯各州民政,情况才有好转。

#### 四 旭烈兀西征

##### 灭木剌夷

自成吉思汗西征以来,蒙古已相继征服了波斯的大部分地区,并建立了统治机构——驻在木干和阿兰的统帅行营主持军事,设在呼罗珊途思城的行省管理行政。东部伊斯兰世界中尚未征服的只有两支宗教势力——朮弥答而的亦思马因派和报达的哈里发。亦思马因派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支,源于阿里后裔、第五代教长(Imām)的长子亦思马因。十一世纪末,此派传道师哈散萨巴(Hasan-i-sabbāh)据低廉(Dailam)之阿剌模忒堡(Alamūt),渐略取旁近山区及兰巴撒耳(Lammasar)、麦门底司(Maimūndiz)、吉儿都怯(Girdkūh)等堡,又遣门人至库希斯单(Kuhistān)招收信徒,据险设寨,于是势力渐盛,形成一独立的宗教国,所属山城至三百六十所<sup>①</sup>。其教主广蓄敢死之士,灌输以迷信盲从思想,训练成刺客,然后遣赴各地,专门进行暗杀活动。十二世纪中期,教

<sup>①</sup> 刘郁:《常德西使记》,载王恽《秋涧集》卷九四。

主哈散复声称伊斯兰教再兴之日已临,宣布解除若干戒条,且在斋月中饮宴娱乐,于是其他穆斯林遂将他们视为异端,称之为“木剌夷”(mulahid,阿拉伯语“迷途者”)。

蒙哥即位后,决定派遣其弟旭烈兀率大军征讨木剌夷国和报达,命诸王各从所属军队中每十人签调二人,由子弟率领从征,又从汉地签发炮手、火箭手千人,由著名攻城能手郭侃率领,随军出征;镇戍波斯的拜住军、怯失迷儿(今克什米尔)的塔亦儿拔都军亦听旭烈兀调遣,命阿母河行省供应军需。一二五二年七月,先锋怯的不花率一万二千人先发;一二五三年十月,准备工作就绪,旭烈兀遂离其斡耳朵,统兵西行。一路徐徐前进,至一二五五年九月始抵撒麻耳干。次年初,渡过阿母河,驻冬于速不儿罕之地(巴里黑之西),然后继续西进。怯的不花军已围攻吉儿都怯堡<sup>①</sup>二年,堡在担寒山上。“绝高险,仰视之,帽为坠”,矢石不能及,守者又皆精兵悍卒,蒙古军屡攻不克。旭烈兀遣郭侃率炮手军往助之。六月,旭烈兀经途思至你沙不儿附近,亦思马因教主鲁克奴丁忽儿沙(Rukn al-Dīn Khur-Shāh)遣其弟来请降,旭烈兀令鲁克奴丁亲自来见,并毁其所据诸堡。鲁克奴丁被迫下令吉儿都怯守将火者纳失儿出降,但自己不愿出见,于是旭烈兀亲率诸军四路并进,围攻鲁克奴丁所在之麦门底司堡,架炮轰击。十一月,鲁克奴丁出降,旭烈兀命他遣使谕降未下之阿剌模忒等堡,尽毁之,然后派军兵送他去和林朝见蒙哥;与此同时,下令将俘获及归降之木剌夷人屠灭殆尽。鲁克奴丁至和林,蒙哥不见,命他回波斯,于路上被押送军兵所杀。

### 灭黑衣大食

灭木剌夷后,旭烈兀于一二五七年春自可疾云移驻哈马丹,作进兵报达的

---

<sup>①</sup> Chirdkuh,此言“圆山”,当即《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之乞都卜,《西使记》之乞都不,地在担寒(Damghan)城西约十八公里。参阅布莱特施奈德:《中世纪研究》,第一卷,页一一六注二九〇;页一三三注三五五。

准备。这时,统治报达的是黑衣大食(阿拔斯朝,建立于七五〇年)第三十六代哈里发谟斯塔辛(Musta'sim)。自十世纪以来,黑衣大食已渐衰落,哈里发仅保有伊斯兰教领袖和伊斯兰世界名义上的宗主地位,其辖境只限于伊刺克阿刺比(Irak 'Arabi)一地。谟斯塔辛腐败无能,专事游乐,掌握朝政的将帅大臣又争权夺利,当蒙古军逼境时,君臣、将相之间仍在互相倾轧。九月,旭烈兀遣使致书哈里发,命其堕毁报达城防,亲自来营纳款。谟斯塔辛答书意气傲慢,报达城民又折辱蒙古使臣,于是旭烈兀决定攻打报达。十一月,蒙古军三路并进:命拜住军为右翼,从毛夕里(Mosul,今伊拉克摩苏尔)渡达遏水(Tigris,即底格里斯河)进向报达城西,遣不花帖木儿与朮赤系诸王军与拜住所统军会合;怯的不花等统左翼军从罗耳(Luristān)境进兵;旭烈兀自统中军越过伊刺克阿只迷与伊刺克阿刺比间的雪山,毁乞里茫沙杭(Kirmānshāhān)城,进至火勒完(Holwan)。一二五八年一月,哈里发军一部出战,被消灭;蒙古三路军均进抵报达城郊,旭烈兀营于城东,拜住军营于城西达遏水西岸。三十日,合围完成,四面同时发起猛攻,炮石、火箭齐发,报达东门楼橹、城墙相继被击毁,蒙古军遂占领东面城墙。二月五日,哈里发遣其子及官员若干人奉重币至旭烈兀营求降,但已为时太晚,旭烈兀拒绝接见,下令继续攻城。十日,哈里发亲率其三子及赛夷教长、法官、贵人等出城投降,旭烈兀命他派人宣谕城中军民立即弃械出城,可以免死,居民闻命蜂拥出投蒙古军,但立即尽遭杀戮。十三日,蒙古军入城,肆行杀掠,继以纵火,这场灾难延续了十七天,据载居民死者达八十万人。旭烈兀于十五日携同哈里发入城,视察其宫殿,命将所藏金宝献出,然后命人将金宝盛陈于哈里发之前,不予饮食,令他食金,意在讥讽他多蓄金宝而不恤士卒,终致国灭。二十日,旭烈兀留兵三千戍守报达,遂移营于附近之瓦伽夫村,下令将哈里发及其长子处死。立国五百余年之黑衣大食朝至此灭亡。

四月,旭烈兀回驻哈马丹。八月,至蔑刺合,又离此赴桃里寺,确定以此城为其驻地。在这期间,蒙古军分兵攻取了额儿比勒、罗耳及其他地区。



### 进兵叙利亚

报达的陷落在叙利亚引起极大的震恐。此时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在艾育伯朝<sup>①</sup>统治之下；沿海狭长地带则仍为富浪人所据，而分为两国：北部为安都（Antioche）公国——兼辖特利波里（Tripoli）伯国，南部为耶路撒冷王国——耶路撒冷城早已为伊斯兰国家占领（一一八七年），所谓耶路撒冷王国实际上分成了提尔（Tyr）、阿迦（Acre）和雅法（Jaffa）三个小封国。蒙古攻陷报达时，因旭烈兀之妻脱吉思合敦（克烈部人）、先锋怯的不花（乃蛮部人）都是聂思脱里教徒，所以对城中的基督教徒加以保护，这使基督教世界更加相信可以与蒙古人联合起来对付伊斯兰教国，重新夺取“圣地”耶路撒冷。安都公博希蒙六世（Bohemond VI）系小阿美尼亚王海屯一世之婿，遂追随海屯之后与蒙古结盟，并率领军队参加了旭烈兀对叙利亚的进攻。

叙利亚算端纳昔儿（Nāsir）见蒙古灭哈里发后，有进取叙利亚之势，即遣其子与国相到旭烈兀处请求臣服。旭烈兀已决意征服叙利亚、埃及，不满足纳昔儿表示的臣服条件，于是将来人遣归，并致书纳昔儿，令其纳土归降。一二五九年九月，旭烈兀命怯的不花为先锋，拜住统右翼，速浑察统左翼，自统中军，进兵叙利亚。先取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之迪牙别克儿（Diyār-e Bakr）地诸城，抵幼发拉底河，攻下鲁哈等城，遂渡河进向阿勒波。纳昔儿集军于大马士革之北，闻蒙古军逼境，与诸将商议对策，其国相主降，而将领主战。将相发生了冲突，而纳昔儿又怯懦畏敌，慌忙将妻、子、宝藏送往埃及，于是军队瓦解，人民逃散。一二六〇年一月十八日，旭烈兀亲率大军包围阿勒波，架炮攻城，二

---

① 十二世纪后期，埃及法蒂玛朝（亦思马因派所建国家）大将军撒刺丁·亦速甫·伊本·艾育伯（Salāh al-Dīn Yūsuf Ibn Ayub，库尔德族人）发动政变，推翻法蒂玛朝哈里发，自立为算端，建立艾育伯朝，承认报达之哈里发为宗主，随后又战胜了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城、叙利亚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一二五〇年，艾育伯朝的玛木鲁克军队统将艾伯格杀算端撒里黑，取而代之，据有埃及，建立玛木鲁克朝；分封为阿勒波王的撒刺丁之孙纳昔儿发兵南下，兼并大马士革，遂据有叙利亚，亦自称算端，仍为艾育伯朝。

十四日,攻入城内,依例杀掠,历六日,旭烈兀下令停止。小阿美尼亚王海屯纵火焚烧了城中的大礼拜寺,而基督教堂则得到保护。旭烈兀将艾育伯朝所侵据之小阿美尼亚和安都公国土地城寨给还二王,奖励他们从征的功劳。

阿勒波失陷后,叙利亚诸城多不战而降。纳昔儿弃大马士革城逃向埃及,大马士革长官遣人至阿勒波向旭烈兀献城投降。三月一日,怯的不花率一队蒙古军进驻大马士革城,不肯投降的军民退入内城坚守,蒙古军发炮攻之,至四月六日才被占领。纳昔儿本打算投奔埃及算端忽秃思(Qutuz),发觉忽秃思招诱其随从军队,图谋害己,遂不敢入埃及,辗转逃至巴勒哈,被蒙古军捕获。

这时,旭烈兀得到蒙哥死讯,决定班师,留蒙古军二万人<sup>①</sup>,命怯的不花统率,继续攻略叙利亚、巴勒斯坦诸地,自率其余军队回波斯。

埃及算端忽秃思原为玛木鲁克朝之大臣,一二五九年篡位自立,诸将不服。这时叙利亚使者正在开罗求援,忽秃思遂声称蒙古军已入叙利亚,国势危急而算端年幼,自己是权摄算端之位以御外敌,于是军心渐定。不久,蒙古遣使臣至开罗谕降,忽秃思召集臣僚商议,决定出兵抵抗。一二六〇年七月,埃及杀蒙古使臣,进兵巴勒斯坦。九月三日,埃及军进至哲连(Zerin)附近之阿音·札鲁德,与蒙古军会战。蒙古军先胜,后因中伏兵败,统帅怯的不花战死,蒙古全军覆没,生还者甚少。埃及军乘胜占领大马士革、阿勒波等城,杀蒙古所置官吏,于是叙利亚全境直至幼发拉底河尽为埃及所有。

## 第四节 侵南宋与灭大理

### 一 金亡前的蒙宋关系

一二一一年,蒙古大举攻金,突破金国北方防线,前锋抵中都(今北京)。

---

<sup>①</sup> 据阿美尼亚史家乞刺可思(Kirakos)的记载,旭烈兀留给怯的不花的军队为二万人,但据另一史家海屯的记载,则仅一万人。参见《草原帝国》页四三七注四。

一二一三年,蒙军分三道抄掠山西、河北、山东大部分地区。蒙古统治者知道宋与金是世仇,矛盾很尖锐,因此就想利用宋金矛盾攻金。大约在一二一三年底或一二一四年初,蒙古中路军打到济南时,成吉思汗就派使臣主卜罕到南宋边界上要求通好结交。但这次的通好没有成功,宋边境守臣以未奉圣旨,不敢接受,把蒙古使臣遣送回去了<sup>①</sup>。这是宋蒙的第一次接触。

宋人知道新兴的蒙古,是在一二一一年。这年宋派余嵘为国信使使金,值燕京为蒙古所围,余嵘中道折回,即上言金必亡,当趁机以图中原<sup>②</sup>。一二一四年初,真德秀使金道阻折回,据得自传闻的情况,就更清楚地看到金国是一定要灭亡的了,但北边新起的强敌却甚为可虑,认为形势正与政宣中女真攻辽的情况相似,因此,提出应当乘机迅速巩固边防,进可图中原,退可守边境<sup>③</sup>。到金宣宗南迁,金国内部起义军势力大盛。金国不是亡于外之强敌,就是亡于国内之人民起义。新的形势在南宋统治阶级中引起强烈反应,一些人看到随着金人之南迁,蒙古锋镝必将跟着南来,因此主张立即停止给予金的岁币,把这些钱用于巩固自己的边防,并安集金国流民,充实边境力量<sup>④</sup>。但也有人主张仍给金岁币,以金为屏蔽。两种政见争论不决。这时的形势对南宋是有利的,因为金国困于北方强敌和内部的起义,国势衰弱,而最主要的则是中原人心归宋。起义武装都谋求投附南宋,联结南宋力量,推翻金的统治;饥寒交迫的中原人民更多携妻挈子南来求得保护。特别是一二一六年金国发动侵宋战

---

① 参阅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立国”条。《元朝秘史》第二五一节云:“在后成吉思差使臣主卜罕等通好于宋,被金家阻挡了,以此成吉思狗儿年再征金国。”狗儿年即宋宁宗嘉定七年(一二一四年)。按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鞑鞑款塞”条记此年正月九日有鞑鞑使者三人渡淮前来,其中一个蒙古人,或即秘史所说的主卜罕。但朝野杂记谓,此次蒙古使臣乃为濠州守臣遣送回去,而秘史则谓为金国阻挡。李心传系据宋官方报告所写,当比秘史正确,故从之。

② 真德秀:《甲戌二月应诏上封事》,《真西山集》卷一三;刘克庄:《余嵘神道碑》,《后村集》卷一四五。

③ 真德秀:《甲戌二月使还上殿札子》,《真西山集》卷一三。

④ 真德秀:《甲戌七月二十五日直前奏事札子》,《真西山集》卷一三。

争后,襄阳孟宗政出击获大胜,而一二一七年初山东的起义军又大多数投归宋朝,由于这些起义军的英勇作战,东线不但击溃了金人的主力进攻,还打下了不少地方,而山东大部分地区又都控制在起义军手里。在中线,由于孟宗政、赵方等将领能团结中原人民,也英勇地抵抗住了金人的猛烈进攻,并出击了金国许多地方。在西线,最初在北方忠义军协助下,也打了一些胜仗。南宋皇朝若能坚持联合北方起义军,或许有可能消灭金国、收复中原。这一点连金国统治阶级中一些人也看到了<sup>①</sup>。从金国方面来说,情况正相反。这次攻宋之役,除西线稍胜外,都是连遭失败,财政益困,起义日多,故屡欲停战议和,到一二二四年就不得不主动宣布停战了。但是腐朽的南宋统治集团却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有所作为,在蒙古进攻金国时,主要统治集团中大多数人丝毫未知警惕,更不用说作恢复中原之图了。他们以为金国既弱,不会侵扰,可以高枕无忧了,文恬武嬉的亡国现象更加严重起来。到金国入侵时,和、战还是未决。许多守边将领(特别是四川宋将)甚至不敢抵抗衰弱已极的金军,纷纷弃城逃遁。后来主要由于北方起义军和人民的帮助,才打退了金国的最后一次进攻。而最为错误的是南宋统治集团对北方起义军和人民采取了猜忌、排挤和敌对的政策。当中原人民南流时,边境守臣不但不能从事安集,以收中原民心,反多加以拒绝,“至以锋镝驱之”<sup>②</sup>。对起义军则视为盗贼,“戮之焚之”,如四川制置使至“明张大榜:来此即行剿杀”。兰州程彦晖起义后投宋,四川制置使董起谊先则拒不接纳,继则将其全家屠杀,“使秦陇之人,莫不切齿”<sup>③</sup>。李全等起义军在金入侵南宋时,投附南宋,击溃进侵金军,使山东大部分地区复为宋朝所有,为收复中原提供了根据地。但宋朝对他们却一直采取猜忌、削弱、甚至加以消灭的政策,以致使李全等内无可靠的援助,却有时刻受害的危险,

---

① 《金史》卷一〇八,《胥鼎传》。

② 真德秀:《甲戌七月二十五日直前奏事札子》,《真西山集》卷一三。

③ 真德秀:《江东奏论边事状》,《真西山集》卷五。

因而离心叛意,后来竟投降了蒙古。

南宋统治者既然不能依靠人民的力量,甚至与人民为敌,就必然把希望寄托到敌人的纷争上去,终于又走上了宣和联金灭辽的道路。蒙古统治者利用宋、金矛盾来灭金的策略,遂得以实现。大约在一二二一年以前,蒙古曾又一次派遣使臣搠不罕等到南宋通好<sup>①</sup>。因此,一二二一年,宋即派遣苟梦玉到蒙古报谢,当时成吉思汗正在西域作战,苟梦玉到西域见了<sup>②</sup>。一二二三年苟梦玉又第二次出使蒙古。苟梦玉在二次出使中,似曾与蒙古讨论了联兵灭金的秘密协定<sup>③</sup>,这是南宋与蒙古最初的使节往来。而在这时,山东起义军正在为把山东从金和蒙古势力下夺归南宋进行着斗争。彭义斌的一支军队还进入河北作战,但统治阶级却既不看到人民的力量,甚至残害它;又不记取本朝历史的教训,与蒙古进行联络。

一二二七年,蒙古军攻下临洮后,即遣军突入宋四川关外诸隘,至武阶,制置使郑损弃沔州遁,三关不守,五州尽弃<sup>④</sup>。负有独当一面之边防重责的制置使的这种可耻逃跑,已经大损宋国威信,无异于给了蒙古侵略者以南宋软弱可欺的启示。后郑损被撤职时,曾告诉他的后任桂如渊以“时相(史弥远)所谕

---

① 《蒙鞑备录》(作于一二二一年)“立国”条云:“近者入聘于我宋副使速不罕者,乃白鞑靼也。每联轡间,速不罕未尝不以好语相陪奉慰劳,且曰辛苦无管待,千万勿怪。”

② 按此次遣使《宋史》缺载,此据《元史》卷一《太祖纪》,又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二《凯歌凯乐词》注云:“昔我太祖出师问罪西域,辛巳岁夏,驻蹕铁门关,宋主宁宗遣国信使苟梦玉通好乞和,太祖皇帝许之,敕宣差噶哈送还其国。”

③ 上引耶律铸诗又引《蜀边事略》云,绍定元年(一二二八年),制置使郑损与所代官四川制置使桂如渊会于顺庆,以时相所谕和议密旨告之,且畀以朝廷所授苟梦玉《使北录》二册。又《元史》卷一一五《睿宗传》,“遣搠不罕诏宋假道,且约合兵,宋杀使者,拖雷大怒曰,彼昔遣苟梦玉来通好,遽自食言背盟乎?”是苟梦玉确曾使蒙古,并订有某种重要协议。参王国维《蒙鞑备录》跋。

④ 《宋史》卷四一《理宗纪》一;卷四四九,《高稼传》。三关指武休关、仙人关、七方关,五州指阶(今甘肃武都)、成(今甘肃成县)、凤(今陕西凤县东北之凤州)、西和(今甘肃西和)、天水(今甘肃天水),宋人谓“蜀以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宋史·高稼传》)。

和议密旨”。这样看来,郑损的弃守与苟梦玉使蒙古所订密约或许有关。但蒙古在这次抄掠性进攻后,即退出。

成吉思汗临死前,向其子传授了利用宋、金世仇假道四川、包抄汴京的灭金战略。一二三一年,蒙古大举灭金之师,军分三道,拖雷统率的右军即执行乃父遗策,出宝鸡,由大散关进入宋境,遣搠不罕使宋请假道,并约合兵。使者为宋边将所杀,于是拖雷率军长驱侵入汉中,分兵攻宋诸城堡,复南下渡嘉陵江,攻破阆州(今四川阆中),至南部县,大掠后转兵北上。蒙军所至,各地爱国将领与军民都曾进行了英勇抵抗,如凤州忠义军坚守马领堡,以寡敌众,鏖战数日,以援绝而败。西和州知州陈寅散资财,结民兵,自执旗鼓鼓励战,击退十万敌人的猛烈进攻,且俘敌甚多,并一面申文制置司求援,但援兵却久不至,内部叛徒出卖了城池,陈寅一家自杀,城内人民遭到蒙古军的残酷屠杀。由于制置使桂如渊昏庸,以通好为安,边防不修,要隘无防,致使各地陷于仓促应战,又不及时发兵援助,是以多处失陷。拖雷军攻入汉中时,又遣使者李国昌索粮于宋,其先锋按竺迺亦至兴元逼迫借道,桂如渊卑怯依从,“输刍粮,使百人导之东适”<sup>①</sup>。于是拖雷军沿汉水而下,通过饶风关,由金州取房州、均州,渡汉江而进入邓州,完成假道宋境包抄金国的任务。一二三二年春,在三峰山击溃金朝精锐军队。蒙古军分兵攻略河南各地,围逼汴京。一二三三年初,金哀宗东走归德,留守元帅崔立以汴京降蒙。六月,金哀宗又从归德奔蔡州。

蒙古此次攻金之役到这时已历三年,战争激烈,兵力消耗大,且河南各地多荒芜,筹粮困难,于是派王檝持国书使宋通好,约共攻金<sup>②</sup>。自金朝濒临危亡,宋理宗和一些大臣就以为是报仇雪耻、恢复中原的好时机,有主张联蒙灭

<sup>①</sup> 元明善:《雍古公神道碑》,《永乐大典》卷一〇八八九。

<sup>②</sup> 王檝使宋,《宋季三朝政要》和《宋史·理宗纪》载于绍定五年末,《元史·王檝传》及《湛渊静语》、《四库总目提要》摘述之邹伸之《使北日记》作癸巳-绍定六年。应以后者为是。《提要》谓邹伸之“以是岁六月偕王檝启行”,则王檝南来至迟当在六月初。金哀宗于六月二十五日至蔡州,王檝使宋前应不知,故谓其使命为“约共攻蔡”似不确。



金者。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奉朝劄遣参议官邹伸之等六人赴蒙古报聘,六月,偕王檝自襄阳启程。此前,金官民多有避难投宋者,宋边将招唐、邓、蔡壮士组成忠顺军,京湖制置司以孟珙统之。武仙军犯宋境,孟珙出击败之,邓州总帅、顺阳县令等降;七月,再击武仙于邓州西境马蹬等寨,战屡捷,武仙溯淅水北走<sup>①</sup>。十月,史嵩之命孟珙与忠顺军统制江海统兵二万,携粮三十万石赴蔡州,师至真阳,遇金军二万南来,进击败之。蒙古都元帅塔察儿见宋军至,大喜,对孟珙屡败武仙军的战绩连声叫“好”(蒙古语:赛因),并约为兄弟。于是议定宋军攻蔡州东南面,蒙古军攻其西北面,南北军毋相犯。次年(一二三四年)正月初十,攻破蔡州,金朝亡。灭金后,蒙、宋约以陈州(治今河南淮阳)、蔡州为界。宋军还屯本境,史嵩之露布平金,遣官按循故壤,祭扫祖宗诸陵。

## 二 蒙古侵宋战争

### 南宋恢复汴洛的失败

王檝使宋约共攻金的商议内容不得而知。宋使邹伸之于甲午(一二三四年)二月才到达窝阔台行帐,有宋人记载说,他申述通好之意后,“北朝从之,仍许以河南归本国”<sup>②</sup>,其他文献未见有此明确之约,仅真德秀《甲午二月应诏上封事》中提到“或谓人以河南归我,而朝廷因有经略中原之谋”<sup>③</sup>。此时邹伸之还远在蒙古,而宋人已有此传闻,疑出于王檝虚诌之词。灭金后蒙古军主力北撤,南宋朝廷有些人就想乘机出兵收复河南故土,不顾此举与陈、蔡为界之约相违,遂成为蒙古归罪南宋先启兵端的理由。

同时,宋理宗及主张出兵的大臣们对蒙古的扩张政策没有足够认识,对这

---

① 《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金史》卷一一八《武仙传》称孟珙攻顺阳,被仙击败,且不载七月邓州西境诸山寨之战。

②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③ 《真西山文集》卷十三。

次将要面对强敌的重大举动,决定得十分草率。当时正是南宋国虚民贫、边备欠修、军旅不振之时,而且两淮、荆襄地区兵后生产未复,使出师北向缺乏近便的粮饷取给。这些情况都说明出师是有困难的,因此就更需要作充分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的准备。但南宋统治集团却寄托成功于侥幸,幻想蒙古不重视河南地,打算趁蒙古军喜寒苦暑时,轻易取得胜利。因此这次出师政治上的动员不足、粮饷储备不足、军事准备不足,造成以单薄之师深入的形势。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甚深,许多人不仅不支持此举,反而幸其失败、故意阻挠。以上这些情况注定了入洛之师的失败命运。

端平元年(一二三四年)六月,邹伸之使团尚未回到本境,庐州知州全子才就奉诏率军万人至汴,汴京人立即举事响应,杀蒙古所置长官崔立降宋;赵葵统淮东军五万由滁州取泗州,趋汴会合。由于没有严密的计划,粮饷又不继,在汴迁延了半月,才派一部分军队,持五日粮先行西进,洛阳人民也开门迎纳宋师。但当时河南经过数年战乱残破已极,所复州县都是空城荒地,兵食无所因,西进之师军食大竭,士气松懈,毫无警惕。而这时,蒙古却已在诸王大会上决定了大举南侵计划。屯兵黄河的蒙古都元帅塔察儿,闻宋军入汴洛,即遣大将刘亨安进攻洛阳。洛阳宋军虽进行了英勇抗战,但因乏粮,终难坚守,只得弃城而回。在汴京的赵葵等军,也因史嵩之不致饷粮,士兵又多为蒙古军所决黄河水淹死,遂引还。入洛之师宣告失败<sup>①</sup>,而野心勃勃的蒙古大军也立即逼临国境了。入洛之师败后,南宋统治集团不是研究如何从中吸取教训,却交口斥责,从轻敌变成了畏敌,“颓惰废弛,亡复自奋”<sup>②</sup>,于是又把希望寄托于和议,企图以屈辱求和保全了。

一二三四年底,蒙古一面准备着军事上的进攻,一面派遣王楫为使来宋责起兵之端。这次的使节已经不是以前通好请兵的使节,而是持端平入洛为借

① 《宋史》卷四一七,《赵葵传》,《赵范传》,《乔行简传》。

② 真德秀:《十一月癸亥后殿奏已见札子》,《真西山集》卷一四。

口,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怀“嗜利无厌”之心,“挟昔年金使例册自随,欲以取必于我”<sup>①</sup>,向南宋进行威胁要索的使节了。此后双方议和之使虽在往来,而蒙古铁骑却已踏入宋境。

### 窝阔台时期的侵宋战争

一二三五年,蒙古军分两路进攻南宋。东路军由皇子阔出(一作曲出)、诸王口温不花(别里古台子)、国王塔思等统率,汉军万户张柔、史天泽等从征。八月,蒙古军入唐州,宋将全子才弃军遁。十月,阔出亲统大军攻陷枣阳,遂引兵西掠襄阳、邓州等地,取光化(今湖北光化县北);塔思分统一军南下攻郢州(今湖北钟祥),城坚,守军顽强抵抗,蒙古军不能克,乃大掠人民、牛马数万而还。一二三六年,襄阳宋将叛降蒙古,城中所储粮食、军器、金银极多,尽为蒙古所得;张柔军攻下郢州。冬,塔思军至蕲(今湖北蕲春)、黄(今湖北黄冈)二州,蕲州守臣献金帛、牛酒乞免杀掠,遂转掠六安县境后北归。同年,随州、德安(今湖北安陆)、荆门、江陵诸州府都遭到蒙古军的抄掠。一二三七年,张柔奉命进屯郢州东境之曹武,攻破洪山诸寨;冬,口温不花、塔思等复统兵南下围攻光州(今河南潢川),张柔率军来会,与史天泽并力攻城,破之,又进取随州、复州(今湖北天门),略地再至蕲、黄。蒙古军攻黄州,城上矢石射下如雨,守军还乘船出击敌人,复得孟珙引兵来救,蒙古军受挫,撤围走;由此进至安丰(今安徽寿县),使八都鲁军拼死攻城,守将杜杲率军奋勇拒守,且遣兵夜出斫营,池州都统制吕文德亦突围入城增援,蒙古军屡攻不克,引退。一二三八年初,塔思率一军至安庆府(治今安徽潜山),守臣弃城遁,居民多逃避于江东,蒙古军抄掠后北还。秋,察罕、张柔复率蒙古、汉军攻取寿(今安徽凤台)、泗(今江苏盱眙西)等州,时淮东、西宋军屯戍相望,斥候甚严,蒙古军每前进一步,都遇到激烈抵抗;察罕以大军围庐州(今合肥),被宋将杜杲击退,攻滁州亦久不下,张柔在攻城时被飞石击伤,最后虽攻下滁州城,但宋援兵继

<sup>①</sup> 真德秀:《十一月癸亥后殿奏已见札子》,《真西山集》卷一四。

至,出击蒙古军获胜,察罕等被迫领兵退出宋境。同年,宋荆湖制置使孟珙出兵恢复了襄阳等地。

蒙古侵宋的西路军由皇子阔端、都元帅达海绀卜等统率,汉军万户刘黑马等从征,进取四川。一二三五年末,阔端兵至巩昌(今甘肃陇西),归降蒙古的金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率所部军从攻蜀。蒙古军攻下沔州,围四川制置使赵彥呐于青野原,宋将曹友闻率师来救,始解围而还。一二三六年,阔端率主力由大散关南下,取凤州,攻破武休关,入兴元(今陕西汉中),进取大安(今陕西宁强)阳平关,曹友闻率部坚守阳平关,终因救援不至,寡不敌众,全军尽没。另一路蒙古军由宗王穆直、大将按竺迺等率领,取宕昌、阶、文诸州,复陷龙州(今四川江油),遂与阔端军会合,至是年冬,破成都。不久,阔端引兵退回,以按竺迺一军戍沔州、阶州之要地;四川诸州渐次被宋朝收复。一二三八年,达海绀卜、按竺迺等又率军攻入四川,陷隆庆(今四川剑阁)。次年,攻打重庆,继而东下攻万州(今四川万县)、夔州(今四川奉节),孟珙闻报,即分兵屯峡(今湖北宜昌)、归(今湖北秭归)、施(今湖北恩施)诸州以备之,击败东侵的蒙古军,收复夔州。一二四一年,蒙古军复入蜀,破二十余城,进围成都,制置使陈隆之固守十余日,叛将夜开城门献降,隆之出奔被获,蒙古军逼他招降汉州(今四川广汉),隆之反激厉守将王夔坚守,遂被杀;不久汉州城被攻破,兵民惨遭屠掠。其后,遂宁、叙州(今四川宜宾)、泸州、资州(今四川资中)等城也相继失陷。

自一二三五年蒙古大举攻宋以来,荆襄、两淮、四川的许多地区遭到蹂躏。这个阶段蒙古军的南侵,主要在于掠夺财物;同时,在南宋各地军民的抗击下,蒙古军也受到不少损失,多不能在所攻占的地方建立统治。于是,蒙古统治者一面不时遣兵侵掠宋境,一面派使者来宋议和,要索岁币。一二三八年和一二四〇年,王檣又两次奉命出使南宋,但未能达成和议。一二四一年,又遣月里麻思使宋议和,被宋将扣留,囚禁于长沙。这时,南宋以孟珙为京湖安抚制置大使,招兵置军,中原人民多来归,襄樊又恢复了原先的重镇地位;一二四二

年,又以保卫两淮屡立战功的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大使,恢复被占的一部分州县,改革弊政,安抚遗民,招聘贤才,择险要之地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等十余城以为各州治所,移兵戍守,并出兵收复汉中地区,但没有成功。正在南宋边防逐渐趋于完固之时,腐朽的统治集团却又自毁长城,孟珙于一二四六年因朝廷不许他收纳中原降人,忧愤而卒;一二五三年,余玠也因宋理宗听信权臣诽谤,下诏召他回朝,遂被迫自杀。

### 蒙哥时期的侵宋战争

一二五一年蒙哥即位后,命忽必烈统蒙古、汉军镇中原,并负责征服南宋<sup>①</sup>。谋士姚枢向忽必烈献策,总结了自窝阔台遣二太子征宋以来的失计之处,指出虽然年年用兵淮、蜀诸地,但“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所掠人民尽没为私奴,以致南方之人不愿降附,且造成“城无居民,野皆榛莽”的情况。他建议改变策略,将前此秋去春来、专事掳掠之兵分屯要地,以守为主,亦战亦耕,俟粮储广积,边备充实,然后大举攻宋,则宋可灭<sup>②</sup>。忽必烈完全采纳姚枢的建策,奏准置河南经略司于汴,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等主之,营屯田于唐、邓,并修完所占枣阳、光化、均州等城堡,与襄樊对峙,为经久之计。后受关中封地,又立宣抚司于京兆,命张文谦等主之,着力恢复生产,改革弊政。忽必烈向蒙哥提出先取大理以包抄南宋的计策,并亲统大军南征。路经临洮时,复命四川镇将、巩昌便宜都总帅汪德臣修治利州等城,且屯田,以为取蜀的准备,于是蒙古军城利、沔、阆诸州,且耕且守,巩固了所占四川之地。张柔亦奉命自杞县移镇亳州(今安徽亳州),率汉军立城置戍,沟通诸州粮运,遣将分屯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逼两淮。经过这一番经理,攻宋战争有了坚固的后方基地,可取得兵源和粮饷的补给,蒙宋对抗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①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二四六。

② 姚燧:《姚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〇。

一二五六年,诸王移相哥(即亦孙哥,拙赤合撒儿子)、驸马帖里干<sup>①</sup>等一批蒙古贵族出于掠夺的欲望,向蒙哥请求出兵攻宋。蒙哥企图通过征宋建立可与父祖相称的功业,同时可能还带有与忽必烈争夺中原汉地控制权的动机,乃决定亲征。次年春,下诏命诸王、诸将出师征宋;因忌忽必烈在中原的势力,“遂解兵柄”<sup>②</sup>,左翼军改由诸王塔察儿(斡赤斤孙)统率,诸王移相哥、察忽刺(合赤温孙)及札刺亦儿、弘吉刺、亦乞列思、兀鲁、忙兀五投下贵族从之,攻荆襄、两淮;蒙哥自统右翼军,右手诸王及弟末哥、子阿速歹等从之,取四川。汉地诸侯军分属左、右翼从征。九月,蒙哥统兵南下,以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

自蒙哥下诏征宋,四川的蒙古军更积极采取攻势,进逼宋军所守诸城堡。一二五七年,纽璘率一军自利州南下,过大获山,出梁山军(今四川梁平),直抵夔门;次年初复引兵西上,欲与屯兵成都的蒙古军会合,四川制置使蒲择之遣安抚刘整等率军据遂宁截之,为纽璘所败,蒙古军遂长驱至成都。二月,蒲择之命杨大渊守灵泉(在成都东南),自统兵攻成都,纽璘率军出战,击溃宋军;进围云顶山城,守将降,蒙哥遂以纽璘为都元帅。四月,蒙哥驻夏六盘山,时随征军四万,命分三道入蜀。七月,蒙哥统中军由六盘出发,入大散关,至汉中,汪德臣来见,即以为先锋。十月,渡嘉陵江,进驻剑门,遣兵攻下苦竹隘。十一月,破长宁山城;进攻大获山(今阆中县东北),守将杨大渊降。十二月,降青居山(今南充市南)、大良山(今仁寿县境)等城。纽璘在蒙哥入蜀时,即留刘黑马等守成都,率军取马湖,趋重庆;冬,复奉命率步骑五万,战船二百艘从成都东下,水陆并进,蒲择之遣兵拦阻,被打败,遂至涪州(今涪陵),造浮

---

① 《元史》卷三《宪宗纪》载“诸王亦孙哥、驸马也速儿等请伐宋”。也速儿之名不见《元史·公主表》,似有误。据《史集》,建议出兵攻宋的是亦乞列思部驸马帖里干(《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二二三至二二四。波义耳译此名作 Derekei,末字 i 应为 n 之误,帖里干驸马,孛秃之子)。

② 姚燧:《谭澄神道碑》,《牧庵集》卷二四。《史集》记载:因别里古台说,忽必烈刚完成了一次出征(指征大理),且患痛风,应让他回家休养,遂不令忽必烈出征(《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二二五)。但实际上是由于蒙哥和他的矛盾。



梁,封锁江面,以堵截南宋援蜀之兵。一二五九年初,蒙哥遣降人至合州钓鱼山招谕,守将王坚不从,执其人杀于阅武场,激励士卒坚守。二月,蒙哥亲统大军围攻钓鱼山。这时,巴州(今四川巴中)、渠州山城都已被攻破,蓬州(今四川蓬安北)、广安等州军守将投降,诸路蒙古军齐集攻城。王坚率军奋勇拒守,蒙古军连攻五月不克。新任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引兵西上,突破涪州江面浮梁,进入重庆,随即率战船千余溯嘉陵江而上,救援合州,但因遭到史天泽军的阻击退回。合州军民在孤立失援的情况下,仍坚持抗战,汪德臣至城下说降,几为飞石击中,得疾死。七月,蒙哥病死军中(或谓系被飞石击中,不治而死),蒙古军解围北还。

塔察儿率东路军于一二五七年秋进围樊城,连月不克,退回。塔察儿只热衷于掳掠财物,恣情享乐,军纪不严,在此后一年多的战争中,竟一城未取,毫无战功。蒙哥大怒,遣使斥责,诸王亦多不满,责他只忙于吃喝<sup>①</sup>。到一二五八年十月,蒙哥不得不请忽必烈出来统率蒙古、汉军攻宋。忽必烈早有取中原地、建立王霸之业的大志,在遭忌罢兵闲居期间,日日与幕下儒士商议大计,他对郝经说:“时之一字,最当整理”,“可行之时,尔自知之”<sup>②</sup>。现在蒙哥命他再出领兵,正是时机已到,便欣然从开平南下。一二五九年春、夏,他并不急于进取,先会诸王于邢州,将兵权接收过来;接着又征召东平严实幕下的著名儒士宋子贞、商挺、李昶、相州隐士杜瑛等访问得失及取宋之计。秋,率军进发,先以赵璧为江淮荆湖经略使,命杨惟中、郝经等人宣抚江淮,并遣人赴军前整饬军纪,军士有犯法者即斩之,于是诸军凛然,无敢犯令。其亲信幕僚刘秉忠、张文谦等从征,复建言不可嗜杀,忽必烈完全采纳他们的意见。进入宋境后,即下令军中,命诸将毋妄杀,毋焚人室庐,所获人民悉纵还。

八月中旬,忽必烈至汝南(蔡州,今河南汝南),获悉蒙哥之死,仍挥军南

<sup>①</sup>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二二六。

<sup>②</sup> 郝经:《班师议》,《元文类》卷一三。

下,渡过淮河,分兵并进,至黄陂(今湖北黄陂县北),抵江岸。九月初,末哥从合州所遣使者至,报告了蒙哥的死讯,请他北归。忽必烈认为既已南下,不能无功而返,乃决定继续进兵取鄂州(今湖北武汉),遂令诸军三道并进,突破南宋长江防线,强渡至南岸,包围鄂州城。忽必烈亦从阳逻堡渡江,驻南岸浒黄洲,亲自督师。南宋朝野震恐,内侍董宋臣甚至请理宗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避之。鄂州守将张胜、高达等奋勇拒战,吕文德从重庆率师东下援鄂,冲破蒙古军的阻截,乘夜突围入城,于是城守益坚。贾似道屯兵汉阳为援,复移军黄州,扼守长江冲要。蒙古军围鄂二月,不能破。

十一月,忽必烈的妻子遣使急驰至军前,报告阿里不哥已遣阿兰答儿等调兵于漠南北,行将称帝,谋士郝经遂劝忽必烈立即北还争位。这时,贾似道适遣使请和,忽必烈乃决定与宋议和,率军北归。

兀良合台于一二五八年奉命率蒙古军三千、蛮獠军万人从云南北上夹攻,沿途遇到宋军的顽强抵抗,一二五九年十一月才抵潭州(今湖南长沙)。湖南制置使向士璧极力守御,兀良合台军受阻。忽必烈闻报,派兵接应,始与大军会合。

### 三 忽必烈灭大理

公元十世纪初年,南诏国统治者乌蛮(今彝族)蒙氏衰微,统治权为郑氏所取代,随后赵杨二氏相继争夺政权,然皆立国不久。公元九三七年,白蛮(今白族)段氏兴,段思平团结白蛮、乌蛮各部力量,驱逐赵氏,取得政权,建都大理(今云南大理),是为大理国的开始。大理国的统治区域,包括今云南全省、贵州、广西西部和四川南部以及缅甸、泰国、老挝的一些地方。主要民族为乌蛮(又称罗罗、卢鹿等;大体居东部)、白蛮(又称爨人,今白族,大体居西部),观《元史·地理志》所载,乌蛮人数最多、分布最广,乌蛮的统治阶级在大理国占有重要地位。大理境内尚有许多其他少数民族,如麽些(今纳西族),和泥(今哈尼族)、峨昌(今阿昌)、蒲、朴子(今布朗、崩龙族)、金齿、白夷(皆

今傣族)等。还有一些“杂蛮”,人数少,力量弱,多被乌蛮人所征服,沦为被统治种族。此外,还有许多汉人长久生活在大理国内,与各少数民族杂居着。

到十三世纪中叶,大理国主段兴智微弱,国家大权落入大臣高氏手中。高氏党人有恃势攻夺他族地区、奴役其人民者。乌蛮诸部势力强大者,更常侵占其他弱族地区。大理国内部除了固有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外,显然还存在着大族与小族之间的矛盾。到大理国势衰弱时,有些原来处于附属地位的弱族强盛起来,摆脱了大理国的统治。如丽江麽些蛮称强于一隅,自立盟主治本族事;为南诏所征服的金齿人也“渐复故地”,势力逐渐强盛起来。而乌蛮、白蛮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争夺地盘的斗争,产生割据现象,如建昌府原分四部,段氏一部强盛起来,吞并了其他酋长的地区,“自为府主”,大理国也不能制<sup>①</sup>。

蒙哥即位后,积极进行侵略南宋的战争准备。一二五二年,派忽必烈率军南侵大理,以速不台子兀良合台总军事。计划在征服大理后,一方面可以利用西南少数民族军队增强侵宋的兵力,一方面可以从背后包抄夹攻南宋的长江中游<sup>②</sup>。参加忽必烈这次远征的,除了精锐的蒙古军队外,还有投降蒙古的汉族地主武装和色目人的军队<sup>③</sup>。忽必烈还特别选择几个善于谋略,富有政治才能的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如姚枢、刘秉忠、张文谦等人从行参谋。这些参谋们建议忽必烈要采用怀柔政策,而不要多杀人。这年暮秋,忽必烈从蒙古起兵南下。

一二五三年夏,忽必烈驻六盘山,俟诸军齐集,粮饷、器械准备充足,即于

---

① 《元史》卷六一,《地理志》四,金齿等处宣抚司条;建昌路条。

②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二四六至二四七;据《元史》卷一二一,《兀良合台传》,一二五八年蒙哥命兀良合台从大理率军北上,约会师长沙,知征服大理以包抄南宋的计划确已付之实施。

③ 《元史》卷一五四《郑鼎传》;卷一五六《董文炳传》;卷一六五《解诚传》;卷一六七《贾昔刺传》;卷一二八《土土哈传》;卷一三三《叶仙鼎传》。

秋天进至临洮,取道吐蕃向大理进发。蒙古军师次忒刺(今四川松潘),分军三道前进。这次出征的主要目的是征服大理,然后从南面合兵攻宋。只是由于四川这时还在南宋手里,不得不绕过道途艰险的吐蕃境<sup>①</sup>,但这一次的进军吐蕃,在元代历史上却有着重大意义。虽然在战略计划上仅是假道,然而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次与征服大理有同样地位的规模很大的军事行动。这个时代,吐蕃正处在四分五裂状态,忽必烈军所过吐蕃东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地,也是各部首领各自为政,互相争战的地区,藏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都受到极大危害。忽必烈进军其地,攻下许多城寨,穿过了雪山,留下深刻的影响,分裂割据的吐蕃封建主们都不得不陆续投降强有力的蒙古统治者<sup>②</sup>,使这个地区统一到蒙古的统治之下。事实上,元朝有些史料确实是把它与征服大理并提的(如《元史》《叶仙鼎传》、《赵秉温传》都是称他们“从世祖征吐蕃、大理”)。可惜因为在吐蕃境内的征战留下的记载绝无仅有,我们无法了解这个重大事件的详细过程。

一二五三年初冬,兀良合台西道军和忽必烈中道军穿过吐蕃,进入大理,在金沙江分别降服了大理北四百余里的麽些蛮各部,麽些诸部酋长唆火脱因、塔里马(见《元史·兀良合台传》)、麦良(见《元史·地理志》)等向蒙军投降,但也有一些麽些部落坚持抗战。忽必烈从这里遣使到大理招降,但使臣为大理国所杀。忽必烈与兀良合台又分军继进,攻下了大理国西部白蛮诸寨栅。许多白蛮部落都很顽强地抵抗入侵之敌,直到寨栅被攻破。当忽必烈军包围了大理城时,西道兀良合台军亦至,取大理北之龙首关,同攻大理城。大理国王段兴智与权臣高祥、高和兄弟背城出战,大败,忽必烈招之不降,弃城遁去,

---

① 《元史》卷一五四《郑鼎传》:“从宪宗(应作世祖,下同)征大理国,……抵雪山,山径盘屈,舍骑徒步,尝背负宪宗以行。”姚燧《贺仁杰神道碑》:“受诏征云南,……经吐蕃曼陀,涉大泸水,入不毛瘴喘沮泽之乡,深林盲壑,绝崖狭蹊,马相縻以颠死,万里而至大理。”(《牧庵集》卷一七)。

② 《元史》卷一五四《郑鼎传》。

大理城陷。忽必烈入城后始知使者被害，本欲屠城，幸汉人参谋张文谦等劝止，即命姚枢裂帛为旗，写上止杀的命令，传示于城内各街巷，大理人民始得免遭屠杀<sup>①</sup>。又命姚枢等搜访大理国图籍。东道兵这时也到达大理与大军会合。复自大理分军追击高氏兄弟，获之，斩于姚州（今云南姚安）。

一二五四年春，忽必烈留下兀良合台率军戍守大理，并继续征服大理境内未附诸部，又任命刘时中为宣抚使，然后率军北还，复经吐蕃境，回到关中。一二五四年秋，兀良合台领兵继续向东进取附都善阐（又称押赤，今云南昆明。时段兴智已逃至此）。蒙古军以精锐部队攻城，发炮摧陷城门，并纵火攻之，用尽各种办法没有打下。押赤军民坚持了七天的抗战，终因力竭，城陷。段兴智逃至昆泽，被俘。一二五五年，兀良合台遣送段兴智与其季父去蒙古见蒙哥汗，蒙哥用怀柔政策，不杀，并赐金符使归国，协同蒙古所委官员、将领安抚并继续征服未附部族。段兴智归国后，又献地图，统率本族军队帮助蒙古征服国中坚持抗战的各部落。蒙哥重新赐以“摩诃罗嵯”（Mahārāja，梵语“大王”之意，系大理国王原有的称号）的称号，命其管理云南各族。

国王虽然投降，但大理各族人民仍然依阻山谷，坚守城寨，进行抗战。一二五五年，兀良合台在攻下善阐府诸城后，命其子阿朮领兵进取赤秃哥（今贵州西部）、罗罗斯（今四川凉山地区）等地。经过近两年的战争，蒙古才陆续征服了大理五城、八府、四郡之地和大部分乌蛮、白蛮部落。兀良合台在大理境内设置十九万户府，万户下分设千户、百户，分管其地。一二五六年，蒙哥命兀良合台取道北上，与四川蒙古军会合。兀良合台遂领兵出乌蒙（今云南昭通），破秃剌蛮三城（今四川筠连境），抵马湖江（今四川宜宾西南），败宋兵，进至合州，会师后还镇大理。一二五八年蒙哥大举攻宋，复命兀良合台率军北上，约次年正月会师长沙，实施其从云南包抄南宋的原定计划。

大理人民的顽强抵抗，使蒙古军遭到很大损失。《史集》记载说，忽必烈

---

<sup>①</sup> 《元史》卷一五七，《张文谦传》；卷一五八，《姚枢传》。

与兀良合台率十万大军征云南,因为该地气候潮湿恶劣,军中疾病流行,加上大理国“居民极夥、军队众多,因而每日、每至一地,都遇到抵抗。因为这两个原因,十万军队得还者不到二万人。”<sup>①</sup>蒙古用武力征服了大理,但通过征服,统一了大理各部。后来又按照内地制度设置郡县,使云南统一于元朝中央政府管辖之下;并在大理进行屯田,推广先进的汉族生产技术和文化。云南自八世纪中叶南诏割据以来,历五百余年,至此才真正与祖国内地复归于统一。这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对云南地区经济、文化的进步,都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

<sup>①</sup>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五九。



## 第三章

# 蒙古国的统治

### 第一节 统治集团的内争和蒙古国的分裂

#### 一 子弟、贵戚的分封

在成吉思汗和他的“黄金家族”看来,整个蒙古国的人民和土地都是他们的共同家产。成吉思汗统一了漠北诸部,又通过对外战争兼并了许多国土,所占有的百姓和牧场扩大了。“太祖皇帝初建国时,哥哥弟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sup>①</sup>按照游牧贵族的传统,这份家产必须在亲族中进行分配。

大约在成吉思汗建国后不久,就将蒙古百姓分配给诸弟、诸子。《元朝秘史》和《史集》都记录了各人所得的“份子”(蒙语忽必,qubi),但数目不一致,这大概是因为《秘史》记载的是最初的分配,而《史集》反映的是成吉思汗晚期的情况。兹列表如下页。

根据蒙古贵族分配家产的体例,只有长妻所生的儿子才有继承父亲财产的资格。别里古台是成吉思汗的异母弟,但因为忠实地跟随他创业有功,也得到了一份子。朮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都是成吉思汗长妻孛儿帖所生,地位最尊,“他们是成吉思汗王国的四根基柱。他授予他们每人一个王国,称他们

---

<sup>①</sup> 《元典章》卷九,《吏部》三,《改正投下达鲁花赤》。

为四‘曲律’，而被称为‘曲律’的人或马等，都是杰出的，超越于他种的，最优秀的。”<sup>①</sup>据《史集》记载，成吉思汗的后妃约五百，但只有五人具有皇后的地位，即孛儿帖合敦（弘吉剌氏）、忽兰合敦（篾儿乞氏）、也速干合敦（塔塔儿氏）、公主合敦（金卫绍王女）、也速仑合敦（塔塔儿氏）。诸子知名者八人，其中庶出的三个早死，阔列坚是第二皇后忽兰所生，成吉思汗十分宠爱，视同长妻所生四子<sup>②</sup>，因此也给他一份子百姓。

姓 名	与成吉思汗的关系	《元朝秘史》所载分民数	《史 集》所载分军数	附 注
月 额 伦	母	共 10,000 户	3,000 户	
铁 木 哥 斡 赤 斤	同 母 幼 弟		5,000 户	
拙赤合撒儿	同 母 弟	4,000 户。后被成吉思汗夺走，仅留 1,400 户	1,000 户	
按 赤 台	同 母 弟 合 赤 温 之 子	2,000 户	3,000 户	
别 里 古 台	异 母 弟	1,500 户	缺 载	据《元史》本传，得“蒙古百姓” 3,000 户
朮 赤	长妻生长子	9,000 户	4,000 户	
察 合 台	长妻生次子	8,000 户	4,000 户	
窝 阔 台	长妻生三子	5,000 户	4,000 户	
拖 雷	长妻生幼子	5,000 户	继承成吉思汗所统左翼 62 千户，右翼 38 千户，御前 1 千户，计 101,000 户	按：左、右翼及御前千户应皆属大汗直接统辖
阔 列 坚	次妻生子	未 分	4,000 户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六九至七〇。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七一。

在成吉思汗赏赐功臣时,失吉忽秃忽抢先摆功,要求格外赏赐。成吉思汗说:“你不是第六弟么?恩赐与我晚生的弟你,依着[亲]弟每的份子分与;再因你有功的上头,九次犯罪休罚者。”失吉忽秃忽说:“我这般晚生的弟,怎生要同样齐等的份子?若恩赐呵,城子每处有土墙的[百姓]恩赐与者。”<sup>①</sup>失吉忽秃忽是从塔塔儿人营盘里拾来,被月伦收为养子的,并非成吉思汗的亲族,所以不敢企望分“份子”,而只能领取“恩赐”(蒙语莎余儿合勒,soyurqal)。

牧场(蒙语嫩秃黑,Nuntuq,元译营盘草地)是游牧经济的基本条件,蒙古俗语说:“男孩儿要看营盘,女孩儿要看颜色”<sup>②</sup>。对蒙古游牧贵族来说,有了百姓(蒙语亦儿坚,irgen),还必须要有牧场,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兀鲁思。因此,分民与分地是联系在一起的。成吉思汗将蒙古国的土地——牧场——也按份子分配给了诸弟和诸子。

诸弟的分地大约是一二一四年之前分配的<sup>③</sup>。

拙赤合撒儿——在蒙古东北部,也里古纳河、阔连海子和海刺儿河之境,与铁木哥斡赤斤的分地为邻<sup>④</sup>。著名的移相哥(合撒儿幼子)碑就发现在也里古纳河之西的乌鲁伦圭河上游,说明这一带也包括在合撒儿封地之内。

合赤温(分封时已死,由其子按赤台接受分民分地)——在蒙古东部,金

---

① 《元朝秘史》第二〇三节。

② 《元朝秘史》第六五节。

③ 据《元史·特薛禅传》,一二一四年成吉思汗在迭蔑可儿授与弘吉剌部分地时,就指明其北界与按赤台(即合赤温子阿勒赤歹)为邻,可见其时按赤台的分地先已确定。王国维认为,成吉思汗诸弟在西征之前已受封地(见《黑鞑事略笺证》),其说是。

④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五二;又《元史·特薛禅传》载一二一四年成吉思汗的分地圣旨云:“是苦烈儿温都儿斤,以与按陈及哈撒儿为农土。”苦烈儿温都儿斤,即今额尔古纳河与根河会流点附近之黑山头,原为弘吉剌部地,因已给予合撒儿为农土(即嫩秃黑),故另划答儿脑儿(今达里泊)一带为按陈分地。《元史》此处文意不明,从字面上看,似乎该地给与按陈及合撒儿两人同为分地,但实际上不可能这样分配。事实上,自分地划定后,按陈一家就一直在达里泊(应昌路),从未见他们另有额尔古纳河一块领地的记录。额尔古纳河地无疑全部是属于合撒儿家族的。

边墙之外的兀鲁灰河和合兰真沙陀之境。南至胡卢忽儿河(在今内蒙西乌珠穆沁旗)与弘吉剌部分地为邻,东至合剌温山(大兴安岭)。

铁木哥斡赤斤——在蒙古东北最远处,再往东即无蒙古部落。一二二一年丘处机奉召去西域,先往斡赤斤帐拜见,据《长春真人西游记》的记载,他的大帐应在今贝尔湖之东,哈拉哈河北不远处<sup>①</sup>。他的分地范围很大,包括今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东西之地<sup>②</sup>,后来其东境扩展至嫩江、松花江一带<sup>③</sup>。大抵东北地区近一半都在斡赤斤家族控制之下。

别里古台——在斡难河、怯绿连河中游之地,西近成吉思汗大斡耳朵,南与按赤台分地为邻。

以上四家的分地都在东面,合称为“东道诸王”。成吉思汗在西征以前,确定了窝阔台作为他自己的继承人,同时命合撒儿、按赤台、斡赤斤、别里古台四人的位子里,各教其子孙一人承继。这样,成吉思汗四个兄弟的家族就成立了四个兀鲁思,各有自己的最高统治者——汗<sup>④</sup>。它们是大蒙古兀鲁思内的封国,有相对独立的地位。

关于成吉思汗诸子的分地,志费尼有概略的记述。他给予长子朮赤的领地是:从海押立(Qayaligh,在今塔尔迪·库尔干东)和花剌子模地区,扩展至

---

① 《元史》卷一五四,《洪万传》:“〔至元〕二十四年,乃颜叛,率兵征之。……至乃颜之地,奉旨留蒙古、女真、汉军镇哈刺河。”哈刺河即今哈拉哈河。

② 据《元史》卷一三四,《撒吉思传》,撒吉思任斡赤斤必阇赤,斡赤斤嫡孙塔察儿继位时,他与另一个那颜火鲁和孙分治其分地:“黑山以南撒吉思理之,其北火鲁和孙理之”。此黑山即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所谓南、北,应为东西。

③ 《元史》卷一六九,《刘哈剌八都鲁传》:至元三十年(据地理志)帝谕之曰:“自此而北,乃颜故地曰阿八剌忽者,产鱼,吾今立城,而以兀速、憨哈纳思、乞里吉思三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汝往为宣慰使。”肇州故城应在今松花江与嫩江会流处附近。

④ 《黑鞑事略》:“其主初僭皇帝号者,小名曰忒没真,僭号曰成吉思皇帝。今者小名曰兀窟解。其耦僭号者八人。”所谓“僭号”即称汗。当时称汗的八人,王国维以为应是合撒儿子也苦、合赤温子按赤台、斡赤斤、别里古台、拔都(朮赤子)、察合台、蒙哥(拖雷子)(见《黑鞑事略笺证》)。

撒克辛和不里阿耳极远部分,以及鞑靼马蹄在这一方向所至之地。察合台所受领地从畏兀儿国边境伸延至撒麻耳干和不花刺,他的驻地在阿力麻里附近的虎牙思。太子窝阔台的首府当其父在位时系在其叶迷立(Emil,今新疆额敏)和霍博(Qobaq,在今新疆和布克赛尔)地区的分地,及登汗位,即移都于汉地与畏兀儿国之间的故土,而以此分地授予其子贵由。幼子拖雷的领地与它(窝阔台合罕四季行宫)相邻,“这个地点确为帝国之中心,恰如圆圈的中心点一样。”<sup>①</sup>

这里所说的拖雷领地“为帝国之中心”,就是指蒙古本土。拖雷是幼子,按照蒙古的家产继承法,“成吉思汗的营盘、帐幕、财产、国库、百姓、那颜、那可儿、护卫和梯己军队都隶属于他。因为蒙古人和突厥人自古有这样的习惯:父亲在世时,大儿子们就分家出去,授予他们财产、牲畜和羊群,而留下的则属于幼子。幼子被称为‘斡赤斤’,意即关系着火和家灶的儿子,以此表明他是家庭的根基”<sup>②</sup>。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幼子守产”。由此拖雷取得了成吉思汗自领的绝大多数蒙古军队和从克鲁伦河至按台山的“根本之地”。吉利吉思、谦谦州地区也应包括在他的领地之内,后来是他的长妻唆鲁禾帖尼与幼子阿里不哥的封地<sup>③</sup>。成吉思汗在世时,拖雷经常跟随其父身边,参与军机,被称为“大那颜”,成吉思汗事无大小都同他商议,足见权力已经很大了。因此,合罕的位子虽然由窝阔台继承,但拖雷的实际势力却比他大得多。这就伏下了后来汗位从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系的种因。

关于朮赤的分地,拉施都丁有一段更具体的记载:“也儿的石河及按台山

---

① 《世界征服者史》,第一卷,页四二至四三。

② 《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一〇七;拉施都丁接着解释说:“这个名词来源于突厥语,ot(od)意为‘火’,tegin意为‘异密’(官人)。用此表示[他是]‘火的官人和掌管者’。由于蒙古语不能正确表现‘Tegin’这个字,所以说成 Otchigin,有些人则说成 Otchi。但其来源及直接的意义即如上述。”按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又称“斡陈那颜”,即其一例。

③ 《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二〇一。

境内的地方和人民,其周围的驻冬和驻夏牧地,成吉思汗都封给了朮赤,又颁旨让[朮赤]将钦察草原及该地区诸国征服,并包括进他的领地”<sup>①</sup>。又据十四世纪阿拉伯历史家乌玛利(Al-'Umari)的记载,朮赤分地中还包括有失必儿、亦必儿和巴什吉尔等处<sup>②</sup>。

志费尼在专门记述察合台的一节中,也讲到分地的情况:“当河外之地与突厥斯坦被征服后,他(察合台)和他的诸子、军队的驻营地从别十八里之边伸展到撒麻耳干。……春、夏两季,他住在阿力麻里和虎牙思,该地在这两季中宛如伊刺木(Iram)花园。他于此造一大池以为聚集水禽之用,又建一城名曰忽都鲁黑(Qutlugh)。秋、冬两季,他则在亦列河旁度过。”<sup>③</sup>拉施都丁则说,成吉思汗授与察合台的分地是从原乃蛮营盘所在之按台山至只浑河(阿姆河)岸。

综观三兄弟封地的划分,大抵也儿的石河以西,今咸海、里海之北,属于朮赤;畏兀儿与撒麻耳干地区之间,属于察合台;从叶迷立迤北,包括今喀拉额尔齐斯河和阿勒泰山一部分的原乃蛮部地,属于窝阔台。窝阔台死后,没有葬到起辇谷,而是葬在距也儿的石河(应指今喀拉额尔齐斯河)二日程的“也客温都儿”——按台山上<sup>④</sup>,就因为这里是他的分地。可见拉施都丁把按台山也划入察合台封地是不准确的。这三支宗族称西道诸王。

至于畏兀儿之地,因为亦都护率先归附,受到成吉思汗的特别优待,允许保留他的国家和所属人民,直隶于大汗,并没有把它划给哪一个儿子。因此,

---

① 《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七八。

② Al-'Umari(一三〇一至一三四九)是埃及马木鲁克(Mamluk)朝历史家,其书有莱西(Klaus Lech)的刊本和德译《蒙古的世界帝国》。此处作者引述钦察汗国商人别都鲁丁的话,列举该国境内诸地名。失必儿之地是朮赤在西征前征服的,无疑应是最初的封地。参阅格列柯夫等:《金帐汗国及其灭亡》页六一。巴什吉尔在《元朝秘史》中作巴只吉惕(Baijighit),部族名,居地在今乌拉尔河上游。

③ 《世界征服者史》,第一卷,页二七一至二七二。河外,指阿母河以北。

④ 《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四三。参阅波义耳:《大汗窝阔台的葬地》,《蒙古世界帝国》页四五至五〇。《元史·太宗纪》载亦葬于起辇谷。本书从《史集》。



确切地说,察合台分地只是与畏兀儿邻接,而不是包括畏兀儿。拉施都丁有一处提到,似乎察合台住在别十八里管理他的兀鲁思,这大概是搞错了地名<sup>①</sup>。

除了成吉思汗的诸子、诸弟外,受分封还有姻族——弘吉刺、亦乞列思、汪古、斡亦剌等部贵族和勋臣——帮助成吉思汗打天下的最亲信那可儿,即四骏(木华黎、博尔朮、博尔忽、赤老温),四狗(忽必来、者勒蔑、哲别、速不台),加上畏答儿和朮赤台,合称十投下。

姻族可以领有本部的军队和百姓,有自己任命千户长的权力。他们或者统治原有的地盘(如汪古部,斡亦剌部),或者由合罕另赐地盘(如弘吉刺部分封在达里泊和辽河上游,亦乞列思部分封在西辽河中游南北)。在分地内完全由自己设官吏,合罕不干预。这些贵戚也形成了几个半独立性的藩部。勋臣的分封,地位要比贵戚低些。但无论贵戚或勋臣,都不能与黄金家族齐等。成吉思汗的子弟是通过家产的分配,各自成立兀鲁思;贵戚勋臣则是由成吉思汗赏赐民户和牧地,所属军队编在成吉思汗直属军队中,他们的领地应是大汗直辖的区域。受封的贵戚和勋臣都称为投下。

## 二 汗位的争夺

成吉思汗晚年,汗位继承问题就在诸子间引起了争执。《元朝秘史》透露了这次争执的情况。西征之前,成吉思汗与诸子商议继承人事。按照自古以来的习惯,长子有优先的权利,于是他让朮赤先表示态度。朮赤还未说话,察合台就先嚷起来:“父亲问朮赤,莫不是要委付他?他是蔑儿乞种带来的,俺如何教他管?”兄弟二人几乎要发生一场决斗。据《秘史》载,三姓蔑儿乞人袭击铁木真时,将孛儿帖掳去,给了赤勒格儿孛阔,以报复也速该抢夺月伦的宿

---

<sup>①</sup> 《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九六。这段文字不大清楚。多桑书说到阿鲁忽奉阿里不哥命到别十八里接受察合台汗国政权,“别十八里”也是字误。俄译本《史集》即无此地名,参阅安部健夫:《西畏兀儿国史的研究》,第一章第二节。

仇。后来铁木真在王罕、札木合帮助下打败蔑儿乞，夺回了妻子。这里没有提到朮赤的出生事。《史集》说，孛儿帖被掳时，已经怀孕，蔑儿乞人将她送给王罕。王罕因曾与也速该结为合答，遂以儿媳待之，并将她送还铁木真。就在她回家的路上，生下了朮赤。

虽然朮赤的出身是有争议的，但继承人问题上的争执，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成吉思汗分封子弟时，分配的主要是蒙古百姓和可供游牧的营盘草地。随着蒙古国的扩大，所占领的城池和农耕百姓越来越多，这部分人民和土地是黄金家族的公有财产，各支儿都有一份。支配公有财产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大蒙古兀鲁思的合罕手里。中原汉地、阿母河北及阿母河以西诸地，都是由大汗派官治理，编籍民户，征收赋税。大汗将这些地区民户的一部分分配给各支<sup>①</sup>，他们可以派官员来监督和收取自己的一份赋税，但军政大权则由大汗所派的镇戍军将领和行政官员掌握<sup>②</sup>。全国赋税收入除各支宗王应得的份额外，都作为支持大兀鲁思的费用上交国库，由大汗支配。

此外，大汗作为各兀鲁思的共主，有权统领全国军队，可以下令征召各支宗王军队参加大规模的征伐。如长子西征、旭烈兀西征、灭金、攻宋等战争，各兀鲁思都奉命派宗王率军从征。各兀鲁思的汗位继承名义上需经大汗认可，或由大汗指定；如出现争执，大汗也有仲裁的权力<sup>③</sup>。因此，大汗的位子就成了各支贵族争夺的目标。

---

① 《多桑蒙古史》(冯承钧汉译本第四卷第七章)引瓦撒夫书，不花刺城恢复后，大汗遣人编籍民户，得一万六千人，以五千人隶拔都，三千人隶唆鲁禾帖尼，八千人归大汗所有。可见此城并不属察合台系私有。这和中原汉地的分民情况基本相同。一二五三年，元宪宗蒙哥还派必闾赤去“括斡罗思户口”，一二五七年又派达鲁花赤“镇守斡罗思”(见《元史·宪宗纪》)，俄罗斯编年史也记载了大汗的书吏至各城清查户口的事(参阅《蒙古统治时期的俄国史略》，上册，页七八)。据此则斡罗思应是公有财产，并非专属朮赤系一支。

② 参阅《多桑蒙古史》第四卷第三章。

③ 《元史》卷一三四，《撒吉思传》。

因朮赤和察合台的争执,“有宽宏之量、忠恕之心”的窝阔台遂被确定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死,拖雷监国。一二二九年秋,拖雷召集东西道诸王和大臣们在怯绿连河上游的曲雕阿兰(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大会,商议推举大汗。据《史集》载,窝阔台曾推让给拖雷,说:“按照蒙古体例,幼子继承父亲,主其家帐。大那颜,是大行皇帝的幼子,日夜扈从父罕,亲聆教诲,熟稔札撒。今彼尚在,我岂可便即汗位?”<sup>①</sup>窝阔台的顾忌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绝大部分军队在拖雷手里,他的态度是决定性的。从《元史·耶律楚材传》的记事看来,拖雷似乎也在觊觎汗位,因此虽有乃父成命,而“议犹未决”。最后耶律楚材说服了拖雷和察合台,才共奉窝阔台为大汗。

一二三二年窝阔台与拖雷从中原北还,路上窝阔台得病,据说拖雷祷于天地,愿代其死,并在窝阔台帐中饮下巫覡祓除衅涤之水,不久就死于途中。拖雷之死看来是个谜。拖雷死后,窝阔台不经与诸王商议,就以大汗的名义夺取归他统领的军队速勒都思等三千户授予自己的儿子阔端。失吉忽秃忽、速敦那颜,忙哥撒儿等大臣、将领诉之于拖雷之妻唆鲁禾帖尼,请她向窝阔台提出质问。唆鲁禾帖尼以大汗之命理应服从,且所部将士尽足,不予计较<sup>②</sup>。夺军一事,反映了这两系之间的斗争趋向公开化。

一二四一年窝阔台死。贵由、蒙哥先已奉召从西征军中回来,但还没有到达蒙古,皇后脱列哥那(乃马真氏)临朝称制。脱列哥那狡黠多权术,以滥行赏赐取得宗亲和大臣们的拥护,遂专国政达五年之久。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企图乘机夺取汗位,率大军趋向汗庭,朝中大惊,脱列哥那遣使卑词询问斡赤斤起兵的缘故,同时打算西迁以避其锋。斡赤斤对自己的冒失行为颇为后悔,又闻贵由已回至叶迷立,就引兵回自己分地去了。

① 《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一九;《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三〇至三一。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七八。同书第二卷页一一二载,被夺者仅速勒都思两千户,无雪你惕一千户。

窝阔台生前曾指定其孙失烈门(窝阔台第三子阔出之子)为继承人,但脱列哥那摄政后,坚持要让自己的儿子贵由继位。她遣使召集各支宗王和将领来和林开选汗大会,长支宗王拔都因与贵由不和,托辞病足,拒绝赴会。一二四六年,东、西道诸王和各地大臣、将领都已到达,遂于和林附近的夏营地达兰达葩(Dalan dabas,意谓“七十岭”)召开忽里台<sup>①</sup>。与会诸王百官包括唆鲁禾帖尼及其诸子,都被脱列哥那所笼络,同意推举贵由为大汗。

贵由即位后的第二年,任命野里知吉带为征西军统帅,指挥镇戍波斯的绰儿马罕全军(时绰儿马罕已死,军队由拜住统领),并命诸王各于所属军队中每十人签发二人从征。他除了命全军和被征服各国人民均归野里知吉带统辖外,还特别委付野里知吉带以经略鲁迷、谷儿只、阿勒波等地的全权,任何人不得干预其事;该地区之诸算端、统治者均应向野里知吉带纳贡<sup>②</sup>。自蒙古国建立以来,除木华黎而外,那颜中没有第二人被授予这样大的权力,这的确是一个异常的举动。按埃及历史家乌玛利的说法,野里知吉带其实是奉有贵由密命,去逮捕拔都派驻在高加索地区的将领的<sup>③</sup>。

一二四八年初,贵由亲率大军浩浩荡荡地离和林西行。据拉施都丁记载,贵由声称:叶迷立的空气对他的身体更适宜,该地水土有益于他养病。唆鲁禾帖尼认为他之急忙起行当是别有用心,遂密遣人报告拔都,请其预防,于是拔都严饬边备,整军迎战<sup>④</sup>。乌玛利则干脆说贵由此行就是亲统大军去攻打拔都<sup>⑤</sup>。汉文史籍

---

① 《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列举与会有:唆鲁禾帖尼及其诸子,斡赤斤、按赤台等东道诸王,朮赤后王斡鲁答,别儿哥等,察合台后王哈刺旭烈、也速蒙哥等,汉地诸那颜,河中等处以麻速忽为首之诸官员,呼罗珊等处以阿儿浑为首之诸官员,鲁迷算端,谷儿只二王,哈里发及波斯各地使者,拂朗使者等。拂朗使者即普兰诺·喀尔平尼等人,喀尔平尼所写的行记详细记述了这次忽里台的情况。

② 《世界征服者史》,第一卷,页二五六至一二五七。

③ 莱西译本《蒙古世界帝国》页一〇〇至一〇一。

④ 《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一二一。

⑤ 莱西译本,页一〇一。

中也透露了贵由出征拔都的消息<sup>①</sup>,东西史料的记载不谋而合。喀尔平尼在归途中离开俄国前,也听到拔都率军东进反对贵由的消息<sup>②</sup>。贵由与拔都的战争眼看一触即发了。

三月,贵由西行途中驻于横相乙儿(Qum-Sangir,今乌伦古河上游河曲处)之地,突然死去。据卢勃鲁克记载,他听到两种关于贵由之死的谣传,一说贵由系被拔都的奸细毒死,一说贵由与拔都之弟昔班在酒醉后争斗,互相把对方打死<sup>③</sup>。

贵由死后,其妻斡兀立海迷失扶棺回叶迷立之斡耳朵。拔都一面按习惯请斡兀立海迷失摄政,与镇海等诸大臣同理国事,一面遣使召集各支宗王、那颜们到他的驻地阿剌脱忽刺兀开会,商议选举新汗<sup>④</sup>。窝阔台与察合台两系诸王多不参加,斡兀立海迷失也只派代表出席。唆鲁禾帖尼则遣蒙哥率诸弟赴会以示支持。会上,拔都倡议推举蒙哥为大汗,斡兀立海迷失的代表八剌提出,窝阔台曾指定其孙失烈门(阔出之子)为继承人,理应遵守他的遗旨。拖雷子末哥及那颜们群起驳之,谓前此推举贵由,即已违背窝阔台遗旨,并谓窝阔台也曾说过蒙哥可以做大汗的话。其实这些辩驳完全是强词夺理,因为在推举窝阔台为大汗时,诸王曾宣誓在他死后必须拥立他的后人继承汗位。但拖雷系诸王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加上朮赤系诸王的支持,远非其对手所能

---

① 袁楠:《拜住元帅出清事实》,《清容居士集》卷二六。参看杨志玫:《关于定宗征拔都》,《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

② 杰克逊:《蒙古帝国的瓦解》(载《中亚杂志》第二二卷三至四号)引彭特等编译:《The Vinland map and the Tatar relation》,页八三。

③ 柔克义译本,页一六三。《世界征服者史》、《史集》和《元史》对贵由之死的原因均无记载。

④ 《世界征服者史》(第一卷,页二六三;第二卷,页五五七)作 Ala-Qamaq,谓其地距海押立一周程。伯希和认为此即《元史·宪宗纪》“阿剌·脱忽刺兀”(Ala-Toghraq,突厥语“杂色杨树”)之讹(见《蒙古人与教廷》,页一九〇,注二)。巴尔托德认为 Ala-Qamaq 应为伊塞克湖与伊犁河之间的阿拉套山(《伊斯兰百科全书》,“Batu”条)。《史集》没有提到这个地名,但说拔都召集诸王到他的领地内某处开忽里台。

匹敌。因此会上强行通过了拔都的倡议,推举蒙哥为大汗。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以大会不是在成吉思汗根本之地召开的,不予承认。

拔都令其弟别儿哥、脱哈帖木儿率领大军护送蒙哥回蒙古,并再次遣使邀请各支宗王到斡难、怯绿连河故地重开大会。东道诸王应召赴会,而窝阔台系诸王和察合台后王也速蒙哥等仍旧进行抵制,因此大会拖延了两年之久,拔都指示别儿哥等不再等待。一二五一年六月,大会在曲雕阿兰大斡耳朵召开,到会之诸王、诸大臣们承认了阿剌脱忽剌兀大会的既成事实,共奉蒙哥为大汗。

失烈门与贵由之子脑忽、察合台长子抹土干之子也孙脱<sup>①</sup>合谋反对蒙哥。失烈门和脑忽以朝会为名,率部进向大斡耳朵。蒙哥的鹰者克薛杰路遇失烈门的车队,发现车中暗藏兵器,急奔蒙哥处报告。蒙哥遣诸王旭烈与忙哥撒儿率军至撒里川拦截,将他们及其部将带到斡耳朵。他们声称只是来朝贺,并无他意,蒙哥拷问其部将,尽得其谋,遂处死诸部将,将失烈门、脑忽遣发汉地军前从征;也孙脱后至,也被流放远地,其妻被处死<sup>②</sup>。

三王之狱只是蒙哥镇压异己的开端。随后他遣不怜吉剌那颜统十万军队至按台山兀鲁塔黑等地布防,以备也速蒙哥、不里和贵由子忽察;遣不花那颜统二万军队至吉利吉思、谦谦州之境防守。部署既定,遂下令逮捕贵由派驻波斯的统帅野里知吉带(宴只吉带),交给拔都处死,并杀贵由之大臣镇海、合答,同时遣使至中亚、汉地追究窝阔台系党羽。斡兀立海迷失曾责问蒙哥违背了愿奉窝阔台后人为汗的誓言,因被召至蒙古,投入河中溺死,其子忽察被遣送到薛良格河某地拘禁。察合台孙不里被交付拔都处置,察合台长孙合剌旭烈附从蒙哥,被派去处死其叔也速蒙哥,取代他为察合台兀鲁思之主。合剌旭

<sup>①</sup> 此据《世界征服者史》页五六六。《元史》卷三《宪宗纪》作“失烈门及诸弟脑忽等”;《忙哥撒儿传》则作“察合台阿合之孙;太宗之裔定宗、阔出之子”,与此合。

<sup>②</sup> 《世界征服者史》,页五八三,五九一至五九二;《史集》第二卷,页一三六至一三七。又,《史集》载与忙哥撒儿同领兵拦截并逮捕失烈门等叛王者为拖雷庶子末哥,与《元史》不同。



烈死于途中,其妻兀鲁忽乃依旨杀也速蒙哥,自摄国政。

处置了政敌后,蒙哥将窝阔台领地瓜分成数块,分别授予窝阔台后人:合丹——别石八里,灭里——也儿的石河,海都——海押立,脱脱——叶迷立。用这种分而治之的办法,使他们任何人都无力起来夺回失去的汗位。

汗位从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系,是蒙古国建立以来的最大事变。拖雷系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掌管了成吉思汗的最大多数军队,大汗虽然可以指挥这些军队,却不能改变他们的领属关系。拖雷之妻唆鲁禾帖尼在蒙古史上被誉为超过月伦的贤母,她善于笼络部众,培育诸子的势力,并利用拔都与贵由的矛盾争取了朮赤系诸王的支持。政变发生时,窝阔台系竟失了任何反抗的能力,很快就被击败了。

蒙哥的政变使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裂痕无可弥缝地扩大了。此后,各支贵族都着意经营自己的兀鲁思。旭烈兀被派去征服哈里发,就把波斯等地作为自己的禁脔,形成“自帝一方”的局面。忽必烈受命主管漠南汉地,也把力量的重心放在汉地,极力培育自己的势力。大蒙古兀鲁思已接近于分裂了。

### 三 各汗国的独立化

大蒙古兀鲁思是一个极复杂的政治联合体。它的领土东起今日中国的东北,西迄俄罗斯。境内被征服的民族很多,其语言、宗教、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社会发展水平也极不一致。这样一个缺乏统一经济基础的庞大帝国,要维持长久的统一极为困难。

成吉思汗把广阔的领土分封给子弟,于是在大蒙古兀鲁思之下形成了若干小兀鲁思。

东道诸王的四个兀鲁思,被统治者主要是蒙古人。自成吉思汗统一后,蒙古各部就逐渐融合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了,他们仍以从事游牧畜牧业为主,语言也大体相同。因此,无论就地理、民族成分或经济基础来说,东道诸王领地和拖雷领地都是紧密相连,构成一个整体的。在政治上,他们也很大程

度上受大汗的控制,不可能发展成独立的政权。至元二十四年,斡赤斤后王乃颜纠合合撒儿后王势都儿、合赤温后王胜纳哈儿等发动叛乱,与海都勾结,反对忽必烈,结果很快就被平定了。忽必烈将他们的所属军队重新分配<sup>①</sup>,大概就是“国除”的意思。后来,这四个家族虽然仍旧封王,并领有自己的封土分民,但地位已大大下降,要受出镇蒙古的亲王以及岭北行省和辽阳行省的节制了。

西道诸王的情况则不同。

朮赤兀鲁思治下,主要是钦察人和斡罗思人。钦察人说突厥语,主要从事游牧业,部分从事定居农业;斡罗思人则基本上以农业为生,封建关系已很发展,所奉宗教是基督教(东正教)。来到这个地区的蒙古人为数是不多的。成吉思汗分民时授予朮赤系的军队,《史集》说是四千户,《秘史》说是九千户,他们分散在从今额尔齐斯河到黑海的辽阔草原上,与当地居民相比显然是少数。后来钦察汗国的军队中就增加进了斡罗思、钦察、马扎儿及其他民族的军队<sup>②</sup>。迁入钦察草原的蒙古人,与钦察人杂居、通婚,渐渐地“他们几乎全都成了钦察人,好像他们〔与钦察人〕是同一民族一样”<sup>③</sup>。因此,蒙古的征服并不是带来钦察草原的蒙古化,而是蒙古人的突厥化。到十四世纪以后,钦察汗国的蒙古人主要不是说蒙古语,而是说突厥语了。

由于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朮赤家族从朮赤本人开始就表现了离心的倾向。成吉思汗西征回军时,屡次召他来见,他都托辞不来,以致成吉思汗想亲自带兵去征讨他。朮赤营帐在也儿的石河。他死后,次子拔都继承汗位。拔都领导西征军征服了钦察和斡罗思后,主要精力便放到组织自己西方的封国,把营帐设到亦的勒河(伏尔加河)下游今阿斯特拉罕附近,其后就在这里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五三,五五,五六。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七五。

③ 乌玛利书,见提申高辛:《金帐汗国史资料集》卷一,页二三五,转引自《金帐汗国史及其灭亡》,页六五至六六。

建立了萨莱(Sarāi)城,作为本国的首都。朮赤长子斡鲁答也分得其父的一半军队和兀鲁思东部地区(锡尔河以北),与其弟脱哈帖木儿等共居之,自成一封国中之封国,被称为朮赤兀鲁思的左翼诸王,但奉拔都及其继承者为主。到十四世纪初,发展成相对独立的“白帐汗国”(Aq-ordo)。

窝阔台死后,汗位空虚达五六年之久,宗王们各自为政,大蒙古兀鲁思的中央权力开始削弱。拔都在诸王中属籍最尊,他反对贵由当大汗,拒不出席忽里台,表现了不受大汗控制的强烈倾向。贵由企图恢复大汗权威,发兵征讨拔都,结果丢了性命。拔都反对贵由,目的是保护自己在西方的利益,并非有意于夺取大汗的位子。根据成吉思汗分民、分地的安排,蒙古本土和东方诸地是拖雷系的势力范围,这一点他大概是意识到的,与其争一个没有实力基础的大汗座位,不如加强自己封国的地位更为有利。因此他推举了“大那颜”的长子蒙哥。通过拥戴蒙哥,换得大汗对他在西方的权力的确认。如卢勃鲁克所见,当时大蒙古兀鲁思似乎分成两大势力范围,蒙哥大汗控制东部,而拔都控制西部<sup>①</sup>。

一二五五年拔都死,其长子撒里答正在和林朝觐,蒙哥命他回国继承父位,但他死于途中,很可能是被其叔(朮赤第三子)别儿哥所害<sup>②</sup>。蒙哥又命其子乌剌赤嗣位,乌剌赤即位后数月也死了。于是,别儿哥取得了汗位(一二五七至一二六六年)。

在与当地各民族的接触中,钦察汗国的蒙古贵族逐渐重视商业、手工业的经济利益。虽然大多数蒙古人仍从事游牧业,而贵族们则喜爱城市生活,别儿哥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他在亦的勒河下游今伏尔加格勒附近另建一新萨莱城(别儿哥萨莱),不久便发展成为钦察汗国的工商业中心和国际贸易城市,到月即别汗时代(一三一二至一三四一年),就把首都从拔都萨莱迁到这里。别

① 《卢勃鲁克东游记》柔克义英译本,页一三三。

② 参阅斯普勒,《金帐汗国史》,页三一至三三;伯希和《金帐汗国史评注》,页三四。

儿哥继续使钦察汗国朝着地方化和独立化的方向发展。他和他的两兄弟很早就改信了伊斯兰教<sup>①</sup>,后来钦察汗国的上层贵族也跟着多信伊斯兰教。

一二五九年大汗蒙哥死后,其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爆发了争夺汗位的长期战争,海都乘机割据自雄,察合台后王也依违于两者之间,自行其是,钦察汗国与蒙古本土的联系完全被阻隔。别儿哥对大汗谁属之事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此时他正集中注意于和旭烈兀争夺对高加索地区的控制。一二六二年,西方的这两家蒙古统治者也发生了大战。大蒙古兀鲁思就在统治集团的大内讧中分裂了。忽必烈虽然战胜了阿里不哥,完全控制了蒙古本土,但他的力量基础是中原汉地,因此便将首都从和林迁到大都。对遥远的钦察汗国,他除了要求其承认自己的大汗名义外,不可能进行任何控制。至此,钦察汗国完全达到了实际的独立。

蒙古对波斯、阿拉伯地区的征服延续了三十多年。从成吉思汗以来,陆续占领的地方,都是作为黄金家族的共有财产,由大汗掌管。其军事由大汗所派镇戍军统帅负责,行政事务另置官员管理。窝阔台时,以真帖木儿为呼罗珊等处长官,各系宗王派代表协理。真帖木儿死后,以畏兀人阔里吉思代之。脱列哥那皇后摄政时,杀阔里吉思,改命阿儿浑。蒙哥即位后,立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仍以阿儿浑为长官,管理波斯诸地。一二五三年蒙哥遣其弟旭烈兀领导西征,从各支贵族中抽调兵力参加,本是大蒙古兀鲁思的共同事业,并没有将其地授予旭烈兀。

波斯、阿拉伯地区农业发达,商业和手工业也很繁荣,居民说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信奉伊斯兰教。从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上看,与大蒙古兀鲁思的其他区域存在着很大差异,地理上距离中心也较远。因此,要长久维持这个地区与大蒙古兀鲁思东方领土的统一,事实上不可能做到。这是旭烈兀能够据有其

---

<sup>①</sup> 伯希和以为,别儿哥三兄弟改信伊斯兰教当在一二四六至一二五三年之间。见《金帐汗国史评注》,页五一。

地、“自帝一方”的客观条件。

正当旭烈兀消灭了木剌夷、哈里发,继续进兵叙利亚时,传来了蒙哥之死和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的消息。他将征服该地区的军事交付给统将怯的不花,自己从叙利亚东还。但此后他的行止不明。据说在此之前他曾下令将伊朗的国库的财富发运回蒙古,得到上述消息后,立即收回了成命<sup>①</sup>。看来他对两兄弟之争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实意则在于乘机据有波斯诸地。忽必烈正好满足了他的愿望,将阿母河以西地区授予他自主管领,以换取他的支持。于是又一个封国——伊利汗国在波斯、阿拉伯地区建立起来了,而且根据忽必烈大汗的圣旨,自始便拥有实际独立的地位<sup>②</sup>。

察合台封国位于中亚地区,其情况和上述两个封国有些不同。从历史传统和地理位置上看,这个地区与蒙古高原及中原汉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千余年来一直交替地受漠北游牧政权或中原王朝的统治。在蒙古征服时代,中亚地区已基本上突厥化,居民主要说突厥语,大部分都改信了伊斯兰教。按经济区域分,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是良好的牧场,阿母河北和可失哈耳、忽炭一带则是农耕和城市发达地区。

察合台家族及其所属蒙古军主要居住在牧区,汗庭设在伊犁河上。农耕地区和城市则作为黄金家族的共有财产,由大汗委官治理。蒙古统治者看到,与其将这些农商地区变为草场,不如使其兴复,可从源源不断的赋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成吉思汗从中亚回军时,便委任花剌子模人牙刺瓦赤父子管财赋,与蒙古达鲁花赤共同治理河中等地。这两人都善理财,很得蒙古统治者的信任。窝阔台时代,大汗政府命牙刺瓦赤分主西域财赋,制定了按丁征税的办法,后调中原,其子麻速忽继任。蒙哥即位,立别十八里等处行尚书省,管辖范围从畏兀儿直至河中诸地,麻速忽仍任行省事。察合台汗及其继承者并不

① 参阅杰克逊,《蒙古帝国的瓦解》,载《中亚杂志》第二二卷三至四号。

② 《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一六二、一六六。

直接干预这些地区的行政事务,只是满足于从赋税收入中取得自己的一份<sup>①</sup>。

察合台死于一二四二年,汗位本应由其长孙哈刺旭烈继承,但贵由因也速蒙哥(察合台第五子)党于己,立之为汗。贵由死后,也速蒙哥与窝阔台系诸王联合,反对蒙哥当大汗。蒙哥即位后严厉镇压异己,派哈刺旭烈回国处死也速蒙哥。哈刺旭烈死于途中,其妻兀鲁忽乃至国,宣布大汗圣旨,杀也速蒙哥,自专国政。

一二六〇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均自立为大汗,双方都企图控制中亚地区。忽必烈派不里之子阿必失哈回国主事,路上被阿里不哥部将捕获。阿里不哥另遣阿鲁忽(察合台第六子拜答儿之子)为察合台兀鲁思之汗,使他提供军需,并守其东境以抗忽必烈军,守阿母河以防旭烈兀军来助忽必烈<sup>②</sup>。阿鲁忽回国后,根据阿里不哥旨意从兀鲁忽乃手里夺取了权力,并将朮赤系势力逐出阿母河北地区(蒙哥时代该地为拔都所占),控制了察合台封地全境,拥有十五万骑兵,遂不愿再服从阿里不哥。不久,阿里不哥遣使者来征牲畜、兵器 and 钱物,阿鲁忽将他们征集的物资全部扣留,又杀其使者,于是宣布归附于忽必烈。忽必烈命他统治从按台山直到阿母河之兀鲁思和诸部<sup>③</sup>。

消灭阿里不哥势力后,忽必烈力图重新控制原别十八里行省之地,与察合台后王和窝阔台后王展开了长期的斗争(详见第八章)。

#### 四 漠北的建设

从成吉思汗到蒙哥时期,漠北是蒙古国的中心地域。蒙古统治者对邻境的征服,给漠北地区的社会生活也带来深刻的影响。自从蒙古人雄姿勃勃地

---

① 据拉施都丁记载,察合台有一次下令将河中某地交给自己的亲信大臣管理,当时正在河中主持政务的牙刺瓦赤向窝阔台申诉,窝阔台遣使责难,察合台只得称罪道歉(《史集》第二卷,页一〇二)。可见察合台并无任命河中地区长官之权。

②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九二、一六一。

③ 同上书,页一六二。



登上世界历史舞台,这一荒远的亚洲腹地顿时成了世界瞩目的中心。来自各国的国君、使者、商人、教士等种种人物接踵于道,世界各地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源源不断地涌入,使蒙古高原以空前未有的规模与各种文明联系了起来。从各国俘虏来的大量手工业者和农民,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漠北的人口成分和经济结构。同时,与世界的广泛接触也不能不引起蒙古人自身的某些变化。为了适应统治广大帝国的需要,蒙古统治者必须使“根本之地”的政治、经济建设更趋完善。

成吉思汗时代的政治中心在怯绿连河上游的大斡耳朵,这是他初兴时的根据地。漠北统一后,这里作为统治全蒙古的中心,从地理上看过于偏东了,而历来强盛的北方游牧政权都是立国于斡耳寒河上游,居中以制两翼的。但成吉思汗在世时一直忙于对外战争,无暇从事建设。

窝阔台即位后,常驻地就逐渐移至斡耳寒河上游。一二三五年夏五月,他在达兰达葩之地建立了行宫,于此大会诸王百官,宣布宪章。其地应在斡耳寒河上游正源之北的杭海岭山麓,即后来的驻夏地昔刺兀鲁朵(Sira Ordu,译言黄帐)。

这时,中原的夏、金两国和西域城郭诸地已相继征服,汗廷中有许多各族官员,来到蒙古的朝觐者和定居人民越来越多,从各国运来的金银、缯帛、粮食等类物资源源不断。由于迫切的需要,窝阔台一直筹划着“奠定世界强国之根基,建筑繁荣昌盛之基础”,即建造城市和各类建筑物<sup>①</sup>。他从汉地带回各种技能的手工业者和巧匠,命他们在回鹘故都之南、斡耳寒河东岸建造哈刺和林城。高大而富丽的宫殿——万安宫建筑在城的西南部,有宫墙环绕,周约二里。据目击者法国使臣卢布鲁克所记,万安宫中殿辟三门皆南向,殿内圆柱两列,北面置一高台,为御座所在,座前有左右阶梯接地。御座左右两侧均置平台,右侧为诸王座位,左侧为后妃座位。御座前空地为奏事或进贡的臣僚、使节等

<sup>①</sup> 《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四〇。

人站立处。中门之前立一株银树,树顶上装一个吹号的天使,树的根部有四头银狮,每一树枝上绕一条金蛇,各有管子通到树下地窖,窖中预藏若干仆役伺候。开宴时,伺号仆役吹响天使所执号角,其他人则将各种饮料倾入管内,于是银狮、金蛇同时口吐马奶和诸色美酒。这一套巧妙机关是巴黎名匠威廉所造<sup>①</sup>。

窝阔台又命在宫殿周围为诸子及其他宗王们每人造一所漂亮宫室,相互毗连,汇成宏伟壮观的建筑群。还建造了许多仓库,贮藏珍宝、金银和食物等,设仓库官专责看守。城内建有官员们的邸宅,仿照汉制向有功臣僚赐宅居住。有两个市区,一为回回市区,一为汉人市区,是商人、手工业者聚居营业和制作之地。还有各种宗教建筑物,据卢布鲁克记,和林城内的“偶像寺庙”(佛寺道观)有十二所,回回礼拜寺二所,也里可温教堂一所。外城周约十五里,辟四门,东门为谷市,西门为羊市,南门为牛、车市,北门为马市<sup>②</sup>。这样规模的宫室和城市建筑,在漠北历史上是空前的。

和林城的建设,役使了相当多的人力,延续了十几年。一二五一年蒙哥罢筑和林城役者一千五百人,可见到这时还未完全竣工。宣德人刘德柔(刘敏)是建城之役的主要负责人,据载,为窝阔台“立行宫,改新帐殿;城和林,起万安之阁、宫闾司局”,都是由他提出和设计的<sup>③</sup>。刘敏所部山东十路、山西五路的工技之军二总管府和西域工匠五百人,大约就是和林城的主要建设者。考古发掘证明,和林城的宫殿、邸宅等建筑物,完全是汉族式样。

窝阔台又役使西域回回工匠在和林北七十余里的迦坚茶寒湖旁建造一座宫殿,名为扫邻城,作为他春季游猎时的行宫。和林城南三十里处,也建造一座“图苏湖城”(迎驾殿),作为从冬营地汪吉河(今翁金河)回和林途中的驻蹕之所。

① 《卢勃鲁克东游记》柔克义译本,页二〇七至三一〇。

② 同上书,页二二〇至二二一。吉谢列夫:《古代蒙古城市》,页一二三至一三七。

③ 元好问:《刘德柔先莹神道碑》,《遗山集》卷二八。

蒙古人手工业比较落后,因此蒙古统治阶级在征服战争中,每取一城一地,必要搜罗工匠。按成吉思汗命令,凡进行抵抗的城池,攻陷后一律屠杀,但工匠可以免死。从成吉思汗时代起,就陆续将中原汉地和其他国家掳得的大量工匠带到漠北,让他们集中居住,制作武器和其他手工业品,以满足日益扩大的战争和统治阶级奢侈生活的需要。还有不少农民也被掠去,蒙古统治者不可能也不需要把他们全变成牧奴,多数是仍使他们择地耕作,解决一部分食粮问题,作为对游牧经济的补充。一般说被掳去的手工业者既要从事工局的劳动,也要种地自给。于是,漠北地区出现了一批手工业者和农民聚居的城市和居民点。

早在成吉思汗西征前,就命田镇海统领所俘汉民工匠,屯田于兀里羊欢之地,建镇海城(一作称海城)以居之,并设局制作<sup>①</sup>。同时,遣汉人贾塔刺浑率中原各族炮手军驻于谦谦州。还有成千汉匠被迁到谦谦州,织造绫罗绵绮,锻铁、制甲,且种植粟麦<sup>②</sup>。此外,见于记载的工匠聚居之地还有和林东北的毕里乞都,和林西北的忽兰赤斤<sup>③</sup>,秃兀刺河<sup>④</sup>等处。不少气候、土壤适宜的地方被辟为耕地,农民们在那里建屋居住,形成定居的农业居民点。如怯绿连河上游,在辽代曾是屯田地,丘处机(一二二一年)和张德辉(一二四七年)经过那里时,见到蒙古人与汉人杂居,筑土屋居住,从事耕作。和林、镇海城和谦谦州附近也都有这一类居民点。考古工作者还在色楞格河下游发现了十三世纪汉族式样的土屋和耕地遗迹<sup>⑤</sup>,可见农业文化对漠北生活的影响范围相当广。

一些蒙古贵族在与中原汉族接触中,日益羡慕汉族地主阶级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回到漠北后就开始营建城池和宫室。拉施都丁说,成吉思汗的幼弟

---

① 许有壬:《镇海神道碑》,《圭塘小稿》卷一〇。镇海城今地,参见陈得芝:《元称海城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四期。

② 《长春真人西游记》上;《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

③ 《张耀卿纪行》,见《秋涧集》卷一〇〇。

④ 胡祇通:《王德真神道碑》,《紫山先生文集》卷一六。

⑤ 厄·雷格德隆(Э. Рыгдылон):《色楞格河考古发现物上的汉文铭文》,《布里雅特蒙古科学研究所集刊》,一九五七年第二、三期。

铁木哥斡赤斤特别喜好建筑,他到处建起了宫室、别墅和庭园<sup>①</sup>。考古工作者在今额尔古纳河西的乌鲁伦圭河上游(元属合撒儿封地)发现了元代的一座城市遗址和一座宫殿遗址<sup>②</sup>;在今蒙古库苏古尔省德勒格尔河附近也发现了元外刺(斡亦剌部)驸马所建的城市、宫殿遗址和一块一二五七年立的汉、蒙文“释迦院碑”<sup>③</sup>。可见好建宫室的蒙古贵族并不止斡赤斤一人。

此外,历史记载中还提到另一个漠北城市——汪吉昔宝赤城,当是建在汪吉河(翁金河)附近的“鹰者”所居之城,同时又作为贮藏粮食的地方<sup>④</sup>。和林东南的孔古烈仓、杭海岭南的札昆仓也是元代漠北很大的仓库。

上述城市和手工业、农业居民点的出现,使漠北的经济面貌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但这个趋势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窝阔台在位时,为了扩大牧地以适应畜牧经济的发展,命察乃、畏兀儿台踏勘“川勒”(Chül,意为荒漠)地面,选定适合做营盘的地点穿井,以解决水源问题,有了水,牧民才能居住。许多原来只有野兽出没的地方,变成了孳畜生长的牧场,这是窝阔台所做的一大贡献。

漠北地区开辟驿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太宗时代,那时回纥诸部从可汗牙帐起设置一条驿路通到长安,称为“参天可汗道”。成吉思汗时,漠北与中原、西域之间,已有驿路相通<sup>⑤</sup>。但沿途驿站没有普遍设立,无一定制度,使臣

---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五五。

② 吉谢列夫编:《古代蒙古城市》,页三二五至三六九。

③ 参见那木南道尔吉:《关于蒙哥汗石碑和宫殿的发现》,乌兰巴托,一九五六年。

④ 《元史》卷一三五,《明安传》。《经世大典》“仓库官”载和林宣慰司所辖仓库中,有昔宝赤八剌哈孙一处,当即此汪吉昔宝赤城。一九二六年俄人科兹洛夫在翁金河上游南的马涅特小河谷和相通的特仑达班(山口)附近汗-霍克辛山麓,发现有汉文石碑及一元代古城堡废墟。见其所著《蒙古旅行记》三月二十一日记事,一九四九年,莫斯科。[补注:此城堡即至元十五年左右卫亲军都指挥使贾忙古歹所建宣威军城。参见堀江雅明《霍克辛特勒碑与宣威军城址》,《东洋史苑》三十至三十一号,一九八八年。]

⑤ 《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就提到“鱼儿泊驿路”(从今达里泊通到克鲁伦河上游)和“金山南大河驿路”(今乌伦古河上游,北通镇海城,南通别十八里)。

往来多就宿于百姓家,对人民是严重的骚扰,同时又耽误了交通传递。窝阔台进一步完善驿站制度,从和林到汉地、和林到察合台封地和拔都封地也立站相连。命阿剌浅、脱忽察儿掌管全国站赤<sup>①</sup>。

蒙古统治阶级从各个被征服地区搜刮来大量财富,过着极奢华的生活。窝阔台以纵情饮宴、挥霍无度闻名,据说有人献给他一顶帽子,就赏银达六百锭。贵由即位时,取库中所藏金银分赐诸王、贵戚和将校,并想在赏赐方面超过其父,又以七万锭购买货物,尽数花掉。但广大蒙古牧民则和被征服人民一样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一二二九年窝阔台颁布了牲畜抽分法,蒙古人有马、牛、羊一百头,抽分一头,不满一百及三十以上者,也要抽分一头。此外,诸王将领大聚会、设置驿站,都要牧民出牛马车仗人夫和羊肉马奶,稍有短缺,就要受极严厉的处罚。

## 第二节 蒙古对中原汉地剥削方式的演变

### 一 抢掠和要索

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的初期,以直接抢掠为主要手段。成吉思汗攻金阶段,兵分三路,蹂躏河北、河东与山东的大部分州县,都是“大掠而还”。每陷一城,皆纵将卒掳掠子女玉帛。抢掠的方法也有规定:功大的先抢,功小的后抢;先抢的进门后,插一支箭在门口,后来者就不能进去了。任何人抢掠所得,不论多寡都要留一份献给成吉思汗<sup>②</sup>。将帅、大臣而下平时没有俸禄,只是将战争的掳获物按自上及下的程序进行分配,没有参战的大臣也能得到一份,称

---

① 《元朝秘史》第二七九,二八〇节;《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四一。

② 一二二一年朮赤、察合台、窝阔台攻陷花剌子模都城玉龙杰赤,兄弟三人将所掠财物和百姓分了,没有留给成吉思汗一份,成吉思汗大怒,致不许三个儿子来见(《元朝秘史》第二六〇节)。

为俵分。

但一般说来,直接抢掠只是战争中的行动。如果对已投降或已征服的地区继续进行抄掠,人民无法从事生产,就不再有可供掠夺的东西了。这对蒙古统治者和投靠他们的汉族地主都是不利的。于是,有人就建议,对已定之地应禁止抄掠,存恤人民,让他们有可能继续从事生产,否则他日蒙古军再行,还靠谁提供物资呢?① 因此,一二一五年蒙古军退回时,成吉思汗特别命人在卢沟桥拦截,将他们所掠的牛每十头抽留一头,分给近县百姓种地。木华黎攻金时期,还下了禁止剽掠和将所俘百姓遣还田里的命令;占领一地后,也不再抢了就走,而是“恣民耕稼,为久驻之基”。一二三〇年窝阔台经过平阳,见田野不治,召问当地守臣,听说因缺乏耕具,就调拨了一万头牛给他们。这说明蒙古统治者已逐渐认识到,只有让生产继续下去,才有剥削的可能。当然,战争中进行抢掠仍被认为是获得财富的正当手段,但对已征服地区,则不允许肆行抢掠和破坏了。

于是,他们的掠夺手段就改为随意向人民征敛财物,除不时下令要索贡献外,诸王、将领或官吏每到一地都要强逼当地送“人事”,称为“撒花”,这是波斯字 saūghāt 的译音,意为礼物,大约是从西域学来的剥削方法。一直到元朝军队进入临安(今浙江杭州)时,还用这种办法搜刮钱物,汪元量诗中说:“北军要讨扫花银,官府行移逼市民”②。这实在是一种变相的抢掠。而且任何人经过都要来一次“撒花”,人民无法负担这种无止境的要索。同时,“撒花”所得都入了官员、将领们的私人腰包,对蒙古最高统治者也是不利的。另一方面,蒙古所征服和招降的地区,多交给归降的军阀、官僚们去统治,军民钱谷均由他们自行处置,蒙古统治者只责其履行贡纳和率兵从征、贍给军需的义务,并无额定的税赋。各地长官可以任意向管内民户征敛而无须上交汗廷,造成

① 《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卷一四七,《史天倪传》;卷一五〇,《刘亨安传》。

② 汪元量:《湖山类稿》。



“官吏多聚敛自私，资至巨万，而官无储待”<sup>①</sup>的情况。

然而，蒙古游牧贵族除了抢掠和任意要索之外，并不知道如何对农业人民实行稳定的剥削。于是有人就想简单地把漠北的游牧生产方式搬到中原汉地来，有个叫别迭的中使提出：“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集中反映了他们拿不出什么好办法的困惑情绪。事实上，这种开倒车的主张在广土众民的汉地是根本行不通的，强制推行，必然引起人民更激烈的反抗，蒙古统治者将不仅一无所得，而且站不住脚。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规律”<sup>②</sup>。蒙古统治者最终仍不得不采用了适应中原汉地生产方式的原有剥削制度。

## 二 十路课税所的设立

就在他们束手无策的时候，中原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出来献计了。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中原之地，财用所生，如果实行赋税制度，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每年可以征收到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就足够供给军需和各种费用了，怎么能说无用呢？窝阔台采纳他的意见，一二二九年开始规定税制，汉民以户计出赋调，命耶律楚材主持，就按他提出的预算数字作为征税总额；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命牙刺瓦赤主持。一二三〇年，设立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等十路征收课税所，每路置正副课税使二员，多选汉人“儒者”担任，专掌钱谷之事，不受地方长官统摄。一二三一年秋窝阔台到大同时，各路头一年赋税已如数收齐，将所征银币和仓库米谷簿籍呈给他过目。窝阔台尝到了中原剥削制度的甜头，高兴地对耶律楚材说：“你没有离开过我的身边，怎么能搞到这样多的钱

①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七〇页。

谷?”十分赞赏。

耶律楚材制定的第一次税法是：

一、地税——每户科粟二石，后以兵食不足，增为四石<sup>①</sup>。据最初所定十路总额为四十万石，似系按二十万户的估计户数来征收。当时还没有统一编籍户口，所征服的地区多委给投降的汉族地主武装头目管理。他们应向蒙古统治者自报管内户口数目<sup>②</sup>，这大概就是课税所征粮的依据。但十路民户总数决不止二十万，如严实投降时，就以“所统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浚等州户三十万，献之太师（木华黎）之行台”<sup>③</sup>；李全投降时，所控制的人民也有数十万<sup>④</sup>。一二三三年窝阔台命阿同葛括中州户，得户七十三万余，可以代表初行税法时的民户总数。可见，实际征收办法并不是每户平均负担二石（或四石）。从一二三三年诏令（见本页注<sup>①</sup>）看，当是按各州、府户数的一定比例规定出一个总额，由当地官员根据具体情况（如贫富等差）摊派民户交纳<sup>⑤</sup>。彭大雅所记“米则不以耕稼广狭，岁户四石”，说的其实是总的户税制，不是实际征收办法。

二、诸课——以酒醋、盐税、河泊、金、银、铁冶六色取课于民，岁定为银万锭。盐课，每引重四百斤，价银十两；酒醋课，课额验民户多寡定之；酒课按实息十取一，杂税三十取一。这就是耶律楚材预算中五十万两银子的来源。

---

① 《经世大典·仓库官》（见《大元仓库记》）所收太宗五年（一二三三年）诏书中说：“……仰沿河以南府州县达鲁花赤等官，各于濒河州城，置立河仓，差官收纳每岁税石。旋依限次，运赴通州仓。其立仓处，差去人取，辛卯（一二三一年）、壬辰（一二三二年）年元科州府每岁一石，添带一石，并附余者拨燕京。”据此则一二三三年税粮就开始加倍征收。一二三三年南宋使臣彭大雅所见，即是“米则不以耕稼广狭，岁户四石”（《黑鞑事略》）了。

② 《元史》卷一四八，《董俊传》。

③ 元好问：《严实祠堂碑铭》，《遗山集》卷二六。

④ 元好问：《毕叔贤神道碑铭》，《遗山集》卷三〇。

⑤ 爱宕松男认为，当时实行的是“合户制”的征税办法，即若干单户合为一个税户单位。所以单户虽有七十多万，而征税总额则按二十万户计（《元朝税制考》，载《东洋史研究》第二三卷第四号，一九六五年三月）。但这种说法仅是推论，尚缺乏有力证据。

三、调——耶律楚材预算中还有帛八万匹,但具体税则失载。中国传统税法,帛属于户调,据“汉民以户计出赋调”的总税则,应当也是按户征收,这就是后来征丝料的先声。

除上述三项外,中原人民还有一项极沉重的负担。据一二三三年使蒙的南宋使臣彭大雅记载:“其赋敛,谓之差发。……近汉民除工匠外,不以男女,岁课城市丁丝二十五两,牛羊丝五十两(原注:谓借过回回银买给往来使臣食过之数);乡农身丝百两。”两年后出使的徐霆又作了以下补充说明:“至若汉地差发,每户每丁以银折丝绵之外,每使臣经从、调遣军马、粮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sup>①</sup>原来一二三〇年耶律楚材所定税法,是一种临时措施,只包括租、调和杂课,没有把差役(庸)算在内。当时使臣往来和军马粮草调拨等诸项费用,仍随时向人民征敛,所谓城市丁丝、牛羊丝和乡农身丝(折银交纳),就是此类负担的总括。蒙古统治者且借此勒索人民,如一二三五年失吉忽秃忽(即胡丞相)到燕京征敛,“下至教学行及乞儿行亦出银作差发”。真定守臣(即史天泽)因“公需数敛烦民”,干脆将一年所需费用汇总起来,每户征银若干两,作为临时应急措施,这就是包银的滥觞。其后各地守臣都仿效真定的办法,遂形成包银制度<sup>②</sup>。

### 三 乙未籍户与分土分民

自蒙古攻金以来,河北、山西和山东地区的人民或死于兵燹,或颠沛流离,所谓“人不地著”<sup>③</sup>，“四民无所占其籍”<sup>④</sup>,原来的户籍完全散乱了。大量人口

① 《黑鞑事略》。

② 《元朝名臣事略》卷四,《平章鲁国文贞公(不忽木)》。按同书卷一〇,《尚书刘文献公(刘肃)》载,当时“东平岁赋丁丝、包银,而复输蛾茧(绵)十余万两,色绢万匹,民不堪重。”大约丁丝是交纳给政府的差发,包银是仿效史天泽的办法,作为使臣往来、军马调发等项地方公需费用。此外还要征取绵绢实物,可见并无一定制度。

③ 胡祇通:《李隐者墓碑》,《紫山集》卷一五。

④ 虞集:《赵思恭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二。

或奔走他乡,或被蒙古诸王、将校和汉族地主武装头目占为私奴。当时,除蒙古贵族所掠驱口外,各地大小军阀所占的私奴数量也很大,有的数百人,有的则达数千口<sup>①</sup>。

成吉思汗时代,蒙古贵族主要通过直接的抄掠来获得财富和奴隶;所取之地多授予归附的军阀、官僚管领,大汗政府并不对汉民实行直接的赋税剥削。因此,也就没有必要编籍占领区的户口。到窝阔台即位后,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设立十路课税所,对中原汉民实行“以户计出赋调”的征税办法,取得了成效。为了继续推行这种剥削方式,以保证和增加国赋收入,大汗政府就迫切需要掌握中原汉地的民户数目,改变过去那种诸侯将校私役人户,赋敛不入公府的情况。于是,一二三三年,窝阔台即遣阿同葛等充宣差勘事官,检括中原民户,籍得七十三万多户。关于这次括户的具体情况不见记载,仅从一二三八年的一道圣旨中我们知道,严实所管东平府路籍得十一万五千多户<sup>②</sup>,只有一二二〇年严实归降时所献三十万户的三分之一强。看来这次括户还很不彻底,诸侯将校占人民为私奴的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变。

一二三四年灭金之后,户口数及其分布情况又有很大变动。其一是,金宣宗南迁后,黄河以北的人民大批迁往河南避难,到河南受兵时,又四散流徙,当时河北、山东各地的地主武装头目多务招集散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所谓“挈沟壑转徙之民,而置之衽席之上,以劝耕稼,以丰委积”<sup>③</sup>,他们的辖境内相对安定,逃民多归之,户口大增<sup>④</sup>。同时,在攻取汴京之后,蒙古统治者又下令

---

① 《元史》卷一四七,《史天祥传》;卷一五一,《王玉传》,《王善传》;《元朝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王(柔)》;郝经:《贾辅神道碑》,《陵川集》卷三五。

② 圣旨见《大元马政记》著录,文中所谓“旧户”即指一二三三年括户之数。

③ 元好问:《严实神道碑》,《遗山集》卷二六。

④ 如东平府路旧户(一二三三年所籍户)为十一万五千多,新户(一二三五年所籍户)为十一万三千多,增加了近一倍(见《大元马政记》所录太宗十年圣旨),即是一例。

“徙遗民实北边”<sup>①</sup>,将河南民户强制迁往河北,这些民户北迁后,侨居各地,未入户籍。其二是,当时诸王大臣及诸将校多俘虏人民为私属驱口,攻河南时所掳者更不可胜计,“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sup>②</sup>,这对蒙古最高统治者是不利的。因此,有必要重新编籍户口,将大量散居无籍或被私占为奴的民户掌握在大汗政府手中。此时金朝已亡,蒙古对中原汉地的占领已经巩固,进行全面编籍户口的条件也具备了。于是,一二三四年,窝阔台下令再次括户,以失吉忽秃忽(《元史·太宗纪》作胡土虎那颜,《耶律楚材传》作忽都虎)为中州大断事官,总领其事。

这次括户不仅规模比上次大,而且组织得更严密,并作了明确的规定。窝阔台下令:“不论达达(蒙古)、回回、契丹、女真、汉儿人等,如是军前掳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是皇帝民户,应当随处差发,主人见更不得识认。”<sup>③</sup>又严令任何人不得隐瞒户口,“敢隐实者诛,籍其家。”<sup>④</sup>一二三五年(乙未年),分遣官员赴各路括户。随处民户不论侨居土著,均在其所住州县入籍;僧、道、驿站等户分别登记,按规定免除差发<sup>⑤</sup>;应属诸人的驱户,也通行立籍,附于本使户下。在括户中,许多蒙、汉官员、军阀慑

---

① 吴澄:《同知深州事崔君墓表》,《吴文正公集》卷三五。又见苏天爵:《易州李氏角山阡表》,《滋溪文稿》卷二〇;王恽:《高德荣墓碣铭》,《秋涧集》卷六一。

②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③ 《元典章》卷一七,《户部》三,《户口条画》引甲午年(一二三四年)窝阔台圣旨。

④ 《元史》卷一五六,《董文炳传》。

⑤ 《至元辨伪录》载蒙哥时佛、道争论,僧人胜诉,诏命道士交割所占佛产,道士则要求以乙未年户籍为断。据此知乙未括户时僧、道户及其物产系分别著籍。又据苏天爵《易州李氏角山阡表》载:“岁壬辰,天兵克汴,诏徙河南之民实河北郡县,先曾祖挈其家侨易州。岁乙未,始占驿传户版。”知站户亦别立户籍。自成吉思汗攻金时,即括工匠立匠造作,则乙未括户时,匠户当亦别籍。据《元史·郭宝玉传》,似太祖时已有军户名目,唯王恽所撰《史公家传》(《秋涧集》卷四八)则谓乙未籍户之后,兵民尚未分。郭传所载不确。

于严令,不得不交出一部分擅占的私奴,编入民籍,使不少人民因而摆脱了奴隶的身份,这应该说是此次括户的主要成绩。次年六月,编籍中原户口的工作全面完成,忽秃忽奏上所籍诸路民户数一百一十多万户<sup>①</sup>。因为括户系在上一年进行,故称乙未户籍。

按照蒙古体例,所得中原汉地城子百姓,系属“黄金家族”的共有财产,应在宗亲中进行分配,各得一“份子”(忽必);同时,对共同立国的功臣,也应以一部分给予赏赐(莎余儿合勒),使他们分享权益。金朝既亡,蒙古对中原汉地的占领告一段落,就必须进行统一的分配和赏赐了,这也是乙未年籍户的一个重要目的。因此,忽秃忽籍上汉民户数之后,窝阔台即下令实行分土分民。根据成吉思汗的规定,分配民户的事仍由大断事官忽秃忽主持。《元史·畏答儿传》载:“岁丙申,忽都忽大料汉民,分城邑以封功臣,授忙哥(畏答儿子)泰安州民万户。帝讶其少,忽都忽对曰:‘臣今差次,惟视旧数多寡,忙哥旧才八百户。’帝曰:‘不然,畏答儿封户虽少,战功则多,其增封为二万户。与十功臣同为诸侯者,封户皆异其籍。’”据此知分配的原则一般是按成吉思汗时各人原得牧民户数的比例来“差次”应得中原封户的多少。但窝阔台可以按照己意增损其数。据《元史·食货志·岁赐》的记载,当年分拨给诸王、贵戚和功臣的中原诸州民户,总计达七十六万多户(见附表)。这种户计称为位下或投下户,其余则统属大汗政府。分民以后,这两类户口就分别立籍。

---

<sup>①</sup> 《元史》卷二《太宗纪》谓“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似不包括癸巳年所籍之七十三万户。《圣武亲征录》仅言“籍到汉民一百一十一万有奇”,无“续户”字样。唯据《耶律楚材神道碑》、《元史》卷九八《兵志》一及卷一五七《刘秉忠传》,则乙未年“天下户”总数似仅一百余万(碑作一百零四万,兵志作一百万四千多)。又,《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谓乙未籍户,“自燕京、顺天等三十六路,户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七十五。”或以为此系除封户外的系官民户数,若加上封户,则总户数应有一百七十余万(见爱宕松男:《元朝税制考》)。诸书所载户口数之差异较大,尚待进一步研究。



丙申年分土分民一览表：

受 封 者	分 地	分民(户)	受 封 者	分 地	分民(户)
太祖叔答里真位	宁海州	10,000	朮赤台郡王 (兀鲁)	德州	20,000
太祖弟 拙赤哈撒儿位	般阳路	24,493	把带 启昔礼 二答刺罕	顺德	14,087
太祖弟哈赤温位	济南路	55,200			
太祖弟斡赤斤位	益都路等处	62,156	孛罗台万户 (博尔术子)	广平路洺水县	17,333
太祖弟 别里古台位	广宁路、恩州	11,603	忒木台驸马	广平路磁州	9,457
太祖长子朮赤位	平阳	41,302	斡阔烈闾里必	广平路	15,807
太祖次子 察合台位	太原	47,330	合丹太息千户	河间路齐东县	1,023
太祖三子、 太宗子贵由位	大名	68,593	也速不花等四 千户	河间路陵州	1,317
太祖四子拖雷位	真定路	80,000	也速兀儿等三 千户	河间路宁津县	1,775
太祖六子 阔列坚位	河间路	45,930	帖柳兀秃千户	河间路临邑县	1,450
太宗子阔端位	东平路	47,741	和斜温两投下	曹州	10,000
			孛罗先锋	广平等处	100
赵国公主位 (汪古部)	高唐州	20,000	行丑儿	大名	100
鲁国公主位 (弘吉剌部)	济宁路	30,000	乞里歹拔都	东平	100
			笑乃带先锋	东平	100
昌国公主位 (亦乞烈部)	?	12,652	孛鲁古妻佟氏	真定	100
			灭古赤	凤翔府	130
鄂国公主位 (弘吉剌部)	濮州	30,000	塔思火儿赤	东平	?
火雷公主位 (外剌部)	延安府	9,796	折米思拔都儿	怀孟等处	100
			孛哥帖木儿	真定等处	58
木华黎国王 (札剌亦儿)	东平	39,019	迭哥官人	大名清丰县	1,713
			黄兀儿塔海	平阳	144
带孙郡王 (札剌亦儿)	东平东阿县	10,000	添都虎儿	真定	100
愍里答儿薛禅 (忙兀)	泰安州	20,000	总 计		760,809

说明：①据《元史》卷一三《阔阔不花传》，丙申年，以三千户分赐探马赤五部将，阔阔不花得分户六百。《元史》卷九五《食货志》三《岁赐》中阔阔不花先锋名下仅载“壬子年

元查益都等处畸零二百七十五户”，始封之年脱，应补。又据同书卷一二〇《肖乃台传》，丙申年“赐东平户三百，俾食其赋”，与《岁赐》异。又同书卷一二二《按札儿传》：“赐平阳户六百一十有四，驱户三十，猎户四。”《大元马政记》著录之太宗十年圣旨所载诸部将分民数（东平府路内）亦与《岁赐》异。

②《岁赐》中载壬子年元查分民数者三十多人，其中多有丙申年受封者，如镇海（据本传，封恩州一千户），耶律楚材（据《大元马政记》，封东平三百四十五户），忒木台行省（据《元史》卷一三一《奥鲁赤传》，赐户二千），忽秃忽等。据此知，《岁赐》所载丙申分民数有缺漏。

丙申年的分土分民，本是根据成吉思汗与宗亲约定的“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的原则，与以前在漠北等地推行的“忽必”和“莎余儿合勒”分封制度本质上一样。按照这种制度，受封者都可以各治其分邑，自征其分民，势必形成许多大小不同不相统属的领地。这与中原汉地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基础和中央集权制度是不相适应的，同时也不利于加强大汗的皇权和巩固对中原汉地的统治。因此，耶律楚材提醒窝阔台：像这样裂土分民，造成尾大不掉，容易产生嫌隙，不如多多赐予金帛，足以体现朝廷对宗亲大臣的恩典。但分封业已实行，岂易改变？于是耶律楚材又提出折中的建议：“若树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赋外，不令擅自征敛。”窝阔台采纳了这个建议，遂命各投下只在分地设达鲁花赤监临，而由朝廷置官统一征收赋税，按其应得数额颁给他们，非奉诏不得擅征兵赋。根据耶律楚材所定税法中的丝料项，诸投下分民“每二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官；五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本位”<sup>①</sup>。这就是五户丝制，蒙古语称之为“阿合探马儿”，有兄弟们享受之利益的意思。

蒙古的“忽必”、“莎余儿合勒”分封制度推行到中原汉地，演变成为五户丝制，应该说是很大的进步。根据初行时的规定，分户租赋应由政府设官征收，按定额颁给受封者；窝阔台诏令中还明令：“各投下分拨到民户，除五户丝外，不拣什么不交（教）科要”<sup>②</sup>。这都是限制蒙古贵族任意搜刮，保证汗廷的

①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② 《元典章》卷二五，《户部》一一，《投下五户不科要》。

国赋收入,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与蒙古原来的分封制度相对来说,五户丝制是比较适合中原汉地经济基础的剥削方式。但是,由于它是基于分土分民原则下的折中办法,在蒙古贵族的传统观念中,总是顽固地把分地民户视为自己的私产,尽可能地加以横征暴敛。因此,五户丝制一开始就不能严格执行。诸王、投下往往径自设官征赋,或不断派遣使者到分地督索,凡有所需物色,皆科敛本管民户;并经常擅自招收户计,任意拘刷工匠。为了增加自己的领户,还用武力劫夺,如察合台所命管领太原分地的官员率其徒劫夺拔都的平阳分地民户,以致发生械斗<sup>①</sup>。拔都对平阳民户的勒索更甚,其应得五户丝、包银皆逼令纳金,致使人民用土产布卖换白银,又兑成黄金,往往“十倍其费”;他又将所得平阳分地分割成五七十份,授予诸妃、王子,有的一份只有一城或数村,“各差官临督,诛求无已”<sup>②</sup>。分地人民所受的剥削特别沉重,因而转徙逃散。

#### 四 制定新税法

在乙未籍户和丙申分土分民的基础上,由耶律楚材主持制定了新税法。综合《元史·食货志》和《耶律楚材神道碑》的记载分述如下:

税粮——分两种:一为丁税(或称丁粮),每丁科粟一石(应为二石),驱丁五升(应为五斗),新户丁、驱各半之,老幼不征。一为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丁税少而地税多的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的纳丁税(此不确,见注)。工匠、僧、道纳地税,官吏、商贾纳丁税<sup>③</sup>。

科差——由当差民户负担。包括两项:一为丝料,每二户出丝一斤输于朝廷;五户出丝一斤输于投下,每户共纳丝十一两二钱,属于朝廷的民户也按这

① 许有壬:《马显墓碣铭》,《至正集》卷五五。

② 郝经:《河东罪言》,《陵川集》卷三二。

③ 《食货志》所载丁税额,每丁一石疑应为二石,驱丁五升疑应为五斗;又,一般民户当皆纳丁税,其他当役人户超过免税亩数之地纳地税,非以多少定应纳税种。参见陈高华:《元代税粮制度初探》,《文史》第六辑。

个税额交纳。一为银丝杂色。一二三六年税制对税粮、五户丝料之外的其他差发,并未规定征收办法,大概还按旧例,如徐霆所说,一种是“每户每丁以银折纳丝线”,即丁丝;另一种是使臣往来和军马调遣所需粮食器械以及一切公上之用,“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各地长官大抵都仿效史天泽在真定实行的办法,总括征银。《元史·食货志》中说的丝料外的“随路丝线、颜色”,当是指此项剥削,受封的诸王位下也分享一部分。

民户有贫富的差别,事实上不可能按同一税额征税。又当时兵民未分,被签发去当兵的人,仍负担同样赋税,赋役互重。史天泽奏请以中户充军籍,上、下户为当差民户,其赋税按贫富差等为定额。窝阔台接受他的建议,布告诸路,永为定制<sup>①</sup>。史氏在真定实行的办法是:“料民定其等第,赋税之输,豪富者先之,而贫穷者得比末减”。

诸课——商税征三十分之一,盐每银一两四十斤,其他各项仍前。

实际上,人民所受的剥削要比正规赋税更重。乙未籍户时,有的官员为了邀功多报户口,或“以浮客占籍”,到征税时,多逃亡,官吏只好借贷完纳,然后转摊到其他民户头上<sup>②</sup>。乙未籍户后不几年,因灾荒或交纳不起赋税而逃亡的民户就达到三分之一,但赋税仍按旧籍征收,使未逃民户的负担大大加重。后因耶律楚材奏请,才减去三十五万逃户的税额。

耶律楚材实行的税制改革,目的是要维护蒙古统治者的长治久安,为此必须稍稍限制贵族们无止境的需索。但这就触犯了他们的眼前利益,因此常常遭到阻挠,“其见于设施者十不能二三”。十路课税所刚一设立,权贵们就因为分了他们征敛的权,十分不满,怂恿斡赤斤向窝阔台告状。赋税制度虽然推行了,而蒙古贵族则往往不受限制,继续任意要索。特别是在乃马真皇后(脱

<sup>①</sup> 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泽传》;又《通制条格》卷一七,《科差》条。

<sup>②</sup> 《元史》卷一九二,《谭澄传》。

列哥那)和斡兀立海迷失皇后称制期间,汗位空虚,法度不一,诸王、贵戚们更是遣使四出,征求货财,不知餍足。一二五一年刘秉忠向忽必烈上书指出:“天下户过百万,自忽都那演(即失吉忽秃忽)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sup>①</sup>。他把人民的沉重负担概括为这三大项,是很确当的。

蒙古灭金以后,就开始了侵宋战争,军马调拨十分频繁,供应军需成为人民最沉重的负担。仅进攻淮南的东路军路过东平,民间供给就费银达二万锭之巨,接近于当时蒙古统治下汉地全境的一年课税。因东平路官的申诉,这笔费用才折充了赋税<sup>②</sup>,可见必有作为税外负担的情况。蒙古军奥鲁随军进入中原,散处州郡间,仅真定路就有数万口。这么多游牧民来到农业地区,“营帐所在,大致驿骚,伐桑蹂稼,生意悴然”<sup>③</sup>,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破坏。

蒙古时期,使者特多,这是因为中原汉地被分割成数十块分地,每一家领主都派出自己的代表到分地征税。使者们持着金牌、驿券,所过之处,“征求需索,民不堪命”<sup>④</sup>,驿路所经的州县,百姓受到严重骚扰。

当时的州县官吏,一部分是蒙古统治者所派的达鲁花赤等官,大部分是由地主武装头目(世袭诸侯)自命其将校、部属担任。这些人多数出身行伍,不懂得治理民政,甚者专以掊克聚敛为能。由于州县官都是世袭,使他们更可以恃势欺凌人民,非法赋敛<sup>⑤</sup>。

除了蒙古政府、贵族将校和各地军阀、官吏之外,蒙古统治者的剥削助手——西域商人,也加入了对中原汉地人民的搜刮。

① 《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② 《元史》卷一五二,《齐荣显传》。据《耶律楚材神道碑》,灭金后,课税所征收额由一二三〇年所定银一万锭增至二万二千锭。

③ 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④ 李谦:《张文谦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八。

⑤ 《元史》卷一五九,《宋子贞传》。

## 五 斡脱钱和扑买课税

西域商人自古就往来于中亚和中国西北各地,从事贸易活动,在促进东西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他们利用北方游牧民族势力,到中原地区来进行经济掠夺,却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成吉思汗建国以前,就认识了一个贩羊到也里古纳河换易貂鼠、青鼠的回回商人。后来,又有一个田姓回鹘人,“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深悉内地的富庶情况,乃唆使成吉思汗南侵<sup>①</sup>。另一西域人札八儿火者更早就投靠成吉思汗,是与成吉思汗同饮班朱尼水的少数亲信之一。因他熟悉中原道路,引导蒙古军入关,取了中都,成吉思汗让他引弓射之,随箭所落,悉赐为己地,又命为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一二一五年花剌子模沙派使臣来,成吉思汗也派了使者和商队报聘,使团的首领一是花剌子模人马哈木(牙刺瓦赤),一是不花刺人阿里火者,一是讹答刺人玉素甫·坎哈<sup>②</sup>。可见在成吉思汗身边,很早就聚集着不少西域商人了。征服西域以后,有更多的西域商人被吸收到蒙古政权中工作,或来东方经商。蒙古贵族不懂得如何巧妙地剥削定居人民,西域商人凭着“能知城子的体例、道理之故”<sup>③</sup>,充当了他们搜刮财富的帮手,在蒙古国的经济事务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并借着蒙古势力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盘剥,大饱其私囊。

据《黑鞑事略》记载,当时蒙古贵族“只是撒花”,无一人理会得贾贩。从大汗以至诸王、公主等,都将掠夺来的银子交给回回,让他们拿去放高利贷或做买卖,而取其利息。回回贷银于人,每年要收一倍利息,如不能偿还,第二年连利息再加一倍。比如一锭银子,利滚利地辗转十年,就变成一千零二十四

① 《蒙鞑备录》。王国维以为此人即田镇海。

② 巴托尔德:《蒙古侵略时期的突厥斯坦》,页三九六。

③ 《元朝秘史》第二六三节。



錠。当时称这种高利贷为斡脱钱,又称羊羔儿息。斡脱是突厥语 *ortaq* 的译音,意思是“同僚”,“伙伴”,那些经营草原与定居地区之间长途贩运贸易的西域商人,皆组成为商帮,结队而行,或自称“斡脱”。他们投靠蒙古人后,替蒙古大汗、诸王、后妃、公主等经营商业或放债盈利,蒙古人即以斡脱称之<sup>①</sup>。由于代蒙古贵族营商、放债既可以凭借政治势力大获其利,往往又能享受免役等特权,所以许多西域商人投充斡脱,成为一种专门行当。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年)的《户口条画》中说:“诸斡脱户:见赍圣旨、令旨,随处做买卖之人,钦依先帝圣旨,见住处与民一体当差。”徐元瑞《幼习吏学指南》说:“斡脱,谓转运官钱,散本求利之名也。”可见斡脱在元代具有官商的含义,所谓斡脱钱,就是由回回商人经手发放的官债(或诸王、贵戚的私债),故又称斡脱官钱。

从成吉思汗时代起,“斡脱每的勾当”就开始活跃,到一二五二年,蒙古国中央政府还设立了专门机构,命大臣掌斡脱事,这说明他们在蒙古经济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斡脱与一般商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奉旨经营,有强大的政治后盾,因而特别贪暴。其中狡黠无赖之徒甚至“或诈称被劫,而责偿于州县”,或“以物置无人之地,却远远卓望,才有人触着,急来昏赖”<sup>②</sup>。人民交纳不起赋税,州县官吏缴不足税额,就向西域商人借银填补,到期不能偿还,即将息作本,越滚越大,以至人民用蚕麦、妻子作抵,都无法还清债务。一二三八年至一二三九年间,真定路遭蝗旱之灾,乃借贷斡脱钱完纳贡赋,本利积银达一万三千余錠(六十五万多两)<sup>③</sup>。一二四〇年,诸路官民所欠斡脱钱达到七万六千錠(三百八十万两)银子<sup>④</sup>。因汉地官员纷纷吁请,窝阔台下令凡借贷年久,止以一本一息为限。但实际上西域商人仍旧乘人危急,要索羊羔儿息,如蒙

---

① 关于斡脱和斡脱钱的研究,参阅翁独健:《斡脱杂考》,《燕京学报》,第二九期,一九四一年;爱宕松男:《斡脱钱及其背景》,《东洋史研究》,第三二卷,第一、二号。

② 《黑鞑事略》。

③ 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④ 《元史》卷二,《太宗纪》。

哥时代实行包银法,磁州人民无力交纳,而州县迫征不休,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为券出母钱代输,岁责倍偿。不足,则易子为母。不能十年,阖郡委积,数盈百万。令长逃债,多委印去”<sup>①</sup>。其他州县同样存在这种情况。从蒙哥到忽必烈,都一再重申一本一息的命令,正说明这个命令并没有被严格执行。斡脱钱的剥削使中原人民倾家荡产,而大量银子则源源不断地流入西域商人的腰包。

扑买课税是又一种搜刮人民财富的手段。一二三〇年耶律楚材所定的中原课税额为银五十万两,灭金后,逐年增长,一二三八年达到一百一十万两。一二三九年,回回大商人奥都剌合蛮(‘Abd al-Rahmān)通过翻译官安天合和大臣田镇海的引荐,向窝阔台提出愿以二百二十万两扑买中原课税。窝阔台见所得又可以凭空增加一倍,当即欣然批准,并命奥都剌合蛮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耶律楚材苦谏不听。按照当时的税额,从实办榷就已不能足数,奥都剌合蛮既加倍扑买,取得了征税权,自然要凭借蒙古政治势力,尽量搜刮,实征之数必大大超过二百二十万两,方才有利可图。于是征榷之外,又往往额外科取,“科、榷并行,民无所措手足”<sup>②</sup>。

脱列哥那皇后称制期间,奥都剌合蛮因敛财有术,更受重用,常以御宝空纸付之,让他自己填写施行。诸王贵戚们更是滥发牌印授予斡脱商人,纵使肆无忌惮地敲剥百姓。

## 六 宪宗时期的括户、分民和税制演变

自乙未括户之后,中原汉地民户所受的剥削日益沉重,大批人民因无力交纳赋税或偿还斡脱钱债,只得弃家逃亡。一二三八年发生蝗旱灾害,而赋税仍旧,诸路逃亡之民达到十分之四五<sup>③</sup>。邢州一地丙申年分封给启昔礼、

① 姚燧:《高泽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五。

② 《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③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把带两答刺罕家时,有民户一万四千多户,其后日减月削,到宪宗初年只剩下五七百户<sup>①</sup>。足见户口逃亡的情况十分严重。有些人民则因不能还债被抑为奴隶。此外,诸王贵族还擅招民户,拘刷工匠。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乙未年的户籍又陷于混乱,使蒙古政府的赋税剥削受到很大影响。宪宗初年,刘秉忠向受命主管中原汉地的忽必烈建议说:由于人民逃窜者多,“宜比旧减半或三分去一,就见在之民以定差税,招逃者复业,再行定夺”<sup>②</sup>。看来,当时蒙古统治者实际所控制的民户大概只有乙未户籍的一半多了。蒙哥即位后,随即遣旭烈兀西征,忽必烈南征,兵兴之际,军需浩繁,掌握足够的剥削对象,以保证政府的财赋收入和兵源补充,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蒙哥壬子年(一二五二年)下令对民户“从新再行抄数”<sup>③</sup>。大体是:一,就各路、州、县见住民户(包括漏籍及寄居逃户)登记入籍,应当差税,其原籍人户已逃者则削去;二,分间军、站、工匠等诸色户计,依例除差应役;三,查对诸投下户数,禁诸王公主驸马并诸投下不得擅行文字招收户计;四,核实驱户,仍按乙未年规定,寄留各地之另籍驱户便是系官民户,应收系当差,原在本使户下附籍者仍旧;五,地区扩大,包括了河南、陕西、辽东西等太宗时未经抄数或抄数未尽的地区。据《经世大典序录》“版籍”条记载:“壬子,欲验户口登耗,复下诏籍之,视乙未之数增二十余万户。”<sup>④</sup>河南、陕西、辽东西诸府路当年所籍者占十七万七千多户<sup>⑤</sup>。

壬子年括户中,对诸色户计应如何抄籍虽有明文规定,但当时主持其事的燕京行尚书省却“不曾子细分拣”,因而此后“争理户计,往复取勘,不能裁决”<sup>⑥</sup>。括

①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② 《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③ 《元典章》卷一七,户部三,《户口条画》。

④ 《经世大典序录》,《元文类》卷四〇。

⑤ 《元史》卷五九、六〇,《地理志》二、三。

⑥ 《元典章》卷一七,户部三,《户口条画》。

户后,人民因差税繁重,仍不断有逃离本贯躲避隐藏者;权豪势要之家影占民户的现象也继续存在。因此,一二五五年再申严令,禁止隐匿户口:“不拣甚么人底民户,州城子里去了,那田地里种田,盖下房子住坐有呵,只那住底田地里,和那本处民户差发铺马一般当者;根脚千户、百户里有底浑家孩儿人口每,千户、百户里也教依旧体例里当差发者。俺每底圣旨省谕听了呵,不拣差发铺马只应不当,元住处不去,躲避隐藏底人,本人处死,财产没官”<sup>①</sup>。但效果似乎不佳。

蒙哥丁巳年(一二五七年)又编籍了一次户口。当年蒙哥决定大举攻宋,这次籍户似为征敛更多财赋,签补更多军兵,以供给攻宋战争的需要。但关于这次括户内容,史籍绝少记载。据《元史·李昶传》,中统元年(一二六〇年),李昶曾移书燕京行中书省诸相说:“侧闻欲据丁巳户籍科征租税,比之见户或加多十六七,止验见户应输,犹恐不逮,复令包补逃故,必致艰难。”《通制条格·户令》中也提到丁巳年户籍,可见丁巳年确曾编籍过户口,唯所籍户数不详。

遵照“共享”的体例,蒙古统治者每一次检括户口,都在宗亲、贵族中进行一次权益的分配和赏赐。壬子年括户后,也进行了分土分民。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壬子年分拨给太祖第四斡耳朵等三家共一,〇〇二户,尚有“壬子年元查”或“查认过”之岁哥都(拖雷子)、忽都虎、察罕、太祖第三斡耳朵等三十九家分民共一八,一七七户<sup>②</sup>。癸丑年分拨给一家一千户,“查认过”宪宗子阿速台卫辉路分民三,三四二户;同年,以京兆为忽必烈分地,据《元史·地理志》壬子年籍,有三三,九三五户。乙卯年(一二五五年)分拨给太祖大斡耳朵保定路六万户。丁巳年分封的规模更大,总户数计有八万多户。兹据《元史·食货志》所载列表如下:

<sup>①</sup> 《元典章》卷一七,户部三,《户口条画》。

<sup>②</sup> “元查”、“查认过”当是查对确认的意思,故此项之三十九家未必皆是壬子年所封。

受 封 者	分 地	分民数(户)	受 封 者	分 地	分民数(户)
合丹 (太宗子)位	汴梁在城户	(按:壬子 年籍汴梁有 三万余户)	独木干公主 (拖雷女)	平阳	1,100
灭里 (太宗子)位	汴梁在城户		速不台官人	汴梁等处	1,100
合失 (太宗子)位	汴梁在城户		宿敦官人	真定	1,100
阔出 (太宗子)位	汴梁在城户		也苦千户	东平	1,100
真金 (忽必烈子)位	怀孟	11,273	伯八千户	太原	1,100
旭烈兀 (拖雷子)位	彰德路 <sup>①</sup>	25,056	秃薛官人	兴元等处	600
末哥 (拖雷子)位	河南府	5,552	猱虎官人	平阳	1,000
拔绰 (拖雷子)位	真定蠡州	3,347	阿鲁浑察 (?)	广平	30
太祖 第二斡耳朵	河间青城县	2,900	霍里极 (别里古台孙)	广平	150

从宪宗年间的分封中可以明显看出,受益者多是拖雷系诸王,这是汗位从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系后,在权益分配上的反映。

宪宗蒙哥对太宗时所定税制作了一些重要的改变。其一是实行包银制。一二五一年,用燕京行尚书省断事官牙刺瓦赤的创议,将原来各路征收的差发丝银正式定为国赋项目,每户征银六两。次年括户之后,即命各路推行。这个税额比各路原来所征的还要重,且各地土产不同,如果一律责令输银,则“虽破民之产有不能办者”<sup>②</sup>。于是许多地方长官或管民官吏群赴和林,吁请减

① 王恽:《秋涧集》卷四九《田文鼎墓志铭》谓壬子年旭烈兀“定封彰德为分地”。又《元史·高鸣传》的记载亦说明其受封彰德在出发西征之前,似与忽必烈封京兆同时。参见松田孝一:《旭烈兀家之东方领》,《东洋史研究》第三十九卷一号。

② 《元史》卷一五二,《张晋亨传》。

额,且要求允许以物产折纳<sup>①</sup>。鉴于六两的税额实际上无法推行,蒙哥只得采纳他们的意见,减额三分之一,并听以物折。《元史·食货志》说:“包银之法,宪宗乙卯年(一二五五年)始定之。初汉民科纳包银六两,至是止征四两,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原来民户负担的差发丝银既统一合并定为包银,那么,领有份地份民的诸王也应该分享其中的一部分,但《元史·食货志》对此竟无记载。考郝经《河东罪言》云:“平阳一道隶拔都大王,又兼真定、河间道内鼓城等五处,以属籍最尊,故分土独大,户数独多。假使诸道内只纳十户四斤丝,一户包银二两,亦自不困。近岁公赋仍旧,而王赋皆使纳金,不用银绢杂色,是以独困于诸道。”按郝经于中统元年四月即奉命使宋,《河东罪言》应系奉使之前所上,文中“近岁”云云,无疑是指宪宗时代。足证宪宗行包银制时,已规定诸王分户每户四两包银中,二两纳官,二两纳于位下<sup>②</sup>。

其二是将丝料增加一倍。旧制每户纳丝十一两二钱,至此增为二十二两四钱。五户丝户每户纳官丝一斤,五户丝六两四钱,每五户合为二斤,因称“二五户丝”。二五户丝的税法始见于王恽《中堂事记》中统元年十月记事,但并没有说是这一年才开始实行的。根据上引郝经《河东罪言》中“十户四斤丝”等语,丝料增倍也应定于宪宗时代。《经世大典序录》“宗亲岁赐”条说:“国朝诸宗戚勋臣食采分地,……其赋则每五户出丝一斤,……其岁赐则银币各有差。始定于太宗之时,而增于宪宗之日,其文牒可稽也。”《元史·食货志》系据《经世大典》编成,其“岁赐”项内即包括有五户丝数。所谓“增于宪

① 王恽:《史楫神道碑》,《秋涧集》卷五四;《元史》卷一五二,《张晋亨传》;卷一五三,《王玉汝传》。

② 王恽:《中堂事记》载中统二年六月中书省“为诸投下种田户,奉旨逐款施行”,中一款云:“阿朮鲁拔都鲁为首诸探马赤官人每,乙未年皇帝圣旨,为逐官出气力上,拨到种田人户,拟自今后除丝线税粮照依旧例,合纳包银内一半纳官,一半给付本官用度。”其下开列阿朮鲁等十三人。或以为此时始规定政府与投下分享包银。其实,此项规定系特为阿朮鲁等人所领之种田户而发,不足以说明前此诸王未分享包银。且阿朮鲁等只是探马赤军头目,尚能分得一半包银,则诸王当早已享受此项权益。



宗之日”，当是兼指五户丝增额而言。

### 第三节 蒙古对中原汉地统治方式的演变

#### 一 屠杀与迁民

蒙古军进入中原之初，实行残暴的屠杀政策。其攻城略地之法，每攻打一个大城，必先抄掠旁近小镇、村落，驱迫人民充当炮灰，不惜用数万人的性命来攻城。按其军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阬之”<sup>①</sup>。只要是进行过抵抗，城破之日，除工匠外，不问男女老幼、贫富逆顺，一律杀尽，名为屠城。如卫州城破，“悉驱民出泊近甸，无噍类殄歼。”保州被屠，“尸积数十万，磔首于城，殆与城等”<sup>②</sup>。蠡州守城者用炮打死蒙古军统帅石抹也先（契丹人），结果全城被杀，“无噍类遗”<sup>③</sup>；凤翔被攻破后，窝阔台“诏从臣分诛居民，违者以军法论”<sup>④</sup>。杀戮之残酷，为历史上所少见。

除屠杀外，还把大批掳掠的或投降的人民迁往漠北。如河北地主武装头目史秉直投降蒙古后，使管领降人十余万家，不久，命“迁之漠北”，路上受冻挨饿，死者之多可想而知，到漠北后，被安置在土拉河之地，不过二三年，饿死的达到十分之七八。兵燹之后，中原人口锐减。金泰和七年（一二〇七年），全国有七百六十八万多户，四千五百八十万口，至窝阔台一二三三年、一二三五年两次括户，总计不过一百多万户。许多往昔繁庶之区，变成丛藁灌莽、狐兔出没之地，往往“百里无人声”<sup>⑤</sup>。

① 姚燧：《序江汉先生事实》，《牧庵集》卷四。

② 郝经：《孟升卿墓志铭》，《陵川集》卷三五。

③ 姚燧：《王兴秀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一。

④ 刘因：《孙公亮先莹碑》，《静修集》卷一六。

⑤ 柳贯：《王元亮墓表》，《柳待制文集》卷一二。

马克思曾指出,蒙古统治者实行使被征服地区荒芜的政策,是受他们的游牧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因为大块无人居住的空地对于畜牧是主要的条件”<sup>①</sup>。窝阔台初即位时,中使别迭提出,要将汉人全部弄空,将中原变为像蒙古一样的牧地。所以有这样荒谬的想法,原因即在于此。

但是,在民丰物阜的中原地区实行这种灭绝人口的做法,不仅行不通,而且对蒙古统治者也是不利的,因为农业人民所能提供的财富要超过游牧畜牧业,消灭人民就等于断绝了自己的剥削来源。而对那些投靠蒙古的汉族官僚、地主来说,老百姓更是他们财产和兵力的根基,因此极力劝告蒙古统治者停止屠杀的政策。他们有的说: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杀,谁还敢再来投降呢?每打下一个地方就实行屠城,那么没有打下的地方,人民将更加坚决抵抗,金朝到什么时候才能征服呢?有的则建议:留下老百姓,可以让他们源源不断地提供粮草物资,如果都杀掉,就没有人供应军需财物了<sup>②</sup>。蒙古军攻取汴京城后,速不台派人报告说,此城抵抗了很久,杀伤许多士卒,想实行屠城。耶律楚材立即提醒窝阔台:打了几十年战,所争的就是土地和人民,得了地而没有人民,还有什么用呢?而且金玉、弓矢、兵械之匠,富民厚实之家都集中在汴京,如果都杀光了,结果将一无所获<sup>③</sup>。蒙古统治者从实际所获利益中,懂得了“取人家国,在得其土地、人民耳”的道理,于是逐渐地改变其屠杀政策。把人民大量迁往漠北,对蒙古统治者也利益不大,因为游牧经济并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而供应他们的饮食却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于是,就转而采取让被征服人民仍留在当地继续从事生产,以供剥削的政策。这就需要设官置戍,建立对他们的强固统治,以保证剥削的实现。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汉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页一六〇。

② 《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卷一四八,《严实传》;卷一四九,《王珣传》;卷一五〇,《石抹也先传》;王沂:《载德堂记》,《伊滨集》卷一九。

③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九。

## 二 统治机构的建立

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后,统治的对象主要是汉族农民,原来统治游牧民的漠北制度就不能适应了。汉族地主阶级积累了一千多年的统治经验,形成一套严密的统治制度,历史上凡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都必须利用他们的经验,采取这套制度,方能立国。蒙古人也不例外。从成吉思汗时代起,为了适应统治中原人民的需要,就开始参用契丹、女真、汉人官员,并仿照金朝制度,设官命职。经过四五十年的演变过程,到忽必烈时,才比较全面地推行汉法,建立了汉族式的封建王朝。

成吉思汗攻金时期,蒙古军所过抄掠,随得随弃,真正占领的地方只有金中都路、北京路和西京路的部分地区。成吉思汗以西域人札八儿火者为“黄河以北铁门关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使与金降将石抹明安等同留守中都,石抹明安授太保、都元帅、燕京行省(不久明安死,其子咸得不袭职为燕京行省)。耶律秃花授太傅、国公,统领降蒙的契丹、汉军,并使镇守宣德。以吾也而(蒙古人)为北京权兵马都元帅镇守北京,金降将乌古伦寅答虎为留守。以刘伯林为西京留守,兵马副元帅。石抹也先从木华黎取北京、平张致,授为御史大夫、提控诸路元帅府事,“举辽水之西、滦水之东,悉以付之”。以畏兀儿人塔本镇抚平滦等地,号行省、都元帅。

一二一七年,成吉思汗准备亲自统兵西征,乃将经略中原汉地的全权授予木华黎,仿照金朝官号封他为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并赐以代表大汗权威的九旂大旗。木华黎以“权皇帝”的地位“建行省于云、燕”,统辖各部蒙古、汉军和所征服的各地区,故称“都行省”。

木华黎所统蒙古军总数不过二万三千骑,只能用于机动作战和镇戍战略要地。因此所征服的各地区基本上是交给归降的金朝官吏或地主武装头目去管理,大体沿袭金朝的行政区名称和官制授以某处行省或某处元帅、经略使、安抚使等等官职,“盖随事创立,未有定制”;有的地方并置达鲁花赤监督之。

《元朝秘史》记载,成吉思汗从西域回来时,将花剌子模商人马哈木·牙刺瓦赤带回,命他协助达鲁花赤镇守中都,管理中原百姓。但关于他在这时期的活动毫无记载,《秘史》这条记事当有疑问。我们知道,这时主管中都的仍是札八儿火者和石抹咸得不。一二二九年,窝阔台即位后,制定赋税制度,专任耶律楚材主管中原汉民赋调,而命牙刺瓦赤主管西域人的赋调。耶律楚材奏立十路课税所,并建议此后“县吏专理民事,万户府总军政,课税所掌钱谷,各不相统摄。”十路是: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乐平、北京、平州、济南,包括了除李全辖境之外的全部蒙古统治区。实际上,各路的兵民之权都掌握在当地长官(多数是汉人世侯,详后)手里,课税使只有按额验收赋税的权力。

一二三一年,窝阔台至西京,采用汉族官制“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右丞相,镇海为左丞相<sup>①</sup>,史称此时“始立中书省”。但这与后来忽必烈所立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关的中书省不同,它只是大汗侍从官中主行文书的必阁赤(汉语“令史”)班子。蒙古国时期的最高行政官(首相)是大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成吉思汗时代任此职的是失吉忽秃忽,窝阔台时代是按只剌(额勒只吉歹),蒙哥时代是忙哥撒儿。耶律楚材所任“中书令”,大约相当于蒙古官名也可·必阁赤,位在大断事官之下<sup>②</sup>。他具体主管行于汉人、契丹、女真之地的汉字文书,文书后面年月之前,要由镇海亲写畏兀字蒙文(当是给蒙古达鲁花赤验看的指示),方始有效<sup>③</sup>。当然,耶律楚材掌握

① 此据《圣武亲征录》。许有壬《镇海神道碑》亦载镇海先授左丞相,后改右丞相。关于耶律楚材等三人的职衔,史书记载多有歧异,正反映了所谓中书令、丞相等并非当时蒙古国的正式官称,不过是权宜附会中原官名而已。参唐长孺:《蒙古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学原》第二卷第七期,一九四八年;韩儒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穹庐集》。

② 蒙哥时必阁赤长为李鲁合,掌宣发号令、朝覲贡献、内外闻奏诸事,与大断事官忙哥撒儿同理庶事,位次于忙哥撒儿(见姚燧:《达失蛮神道碑》,《牧庵集》卷一三)。

③ 《黑鞑事略》。

着宣发号令、朝觐贡献和敷奏之权,中原各地长官奏事都要先通过他,又以中央大臣身份主持中原财赋(最重要的民政事务)，“总裁都邑”<sup>①</sup>,因此权力还是很大的。东平行台严实先前派人到汗廷奏事,都是托近侍转奏,不经由中书,耶律楚材很不高兴,后来宋子贞劝严实“致礼丞相(耶律楚材),通殷勤,凡奏请,必先咨禀”,这才搞好了关系<sup>②</sup>。

灭金后,蒙古统治者加强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一二三四年,窝阔台命失吉忽秃忽为中州断事官,“主治汉民”<sup>③</sup>,设治于燕京。蒙古制度,以断事官治政、刑,为行政长官,所以汉人也称忽秃忽为“胡丞相”。元人马祖常说:“国初官制未遑立,凡军国机务,悉决于断事官。断事官行治在燕,銮舆尚在和宁,中原数十百州之命系焉,非若今日隶于省院者也。”<sup>④</sup>自断事官行治燕京后,中原各地户口、赋税、刑法诸事,统归其管理。以断事官为长的“燕京行台”<sup>⑤</sup>(燕京行尚书省),遂成为蒙古统治中原汉地的最高行政机构,而下属的各地方“行省”则先后罢去,改为原来的“路”名<sup>⑥</sup>。

一二四一年,牙刺瓦赤自西域调来,窝阔台命他“主管汉民公事”,任大札鲁忽赤(断事官);汉人刘敏授行尚书省,与牙刺瓦赤“同治汉民”。贵由时代,又以包税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奥都剌合蛮同行省事<sup>⑦</sup>。

蒙哥即位后,将大汗直辖地(除蒙古本土外)分为三个大行政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治中原汉地,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治畏兀儿至阿母河北地区,阿

① 《元史》卷一五三,《刘敏传》。

② 《元史》卷一五九,《宋子贞传》。

③ 《圣武亲征录》。按,与忽秃忽同治中原的断事官还有耶律买奴(见王恽《秋涧集》卷四九,《南鄯王氏家传》)、塔鲁虎觥、讹鲁不(见《大元马政记》所载一二三八年圣旨)等。但以忽秃忽为长。

④ 马祖常:《萨法礼碑铭》,《石田集》卷一四。

⑤ 王恽《南鄯王氏家传》,《秋涧集》卷四九;《元史》卷一五三,《杨奂传》;卷一五八,《姚枢传》;卷一二二,《昔里钤部传》;卷一五七,《郝经传》。

⑥ 参阅前田直典:《元朝行省的成立过程》,《元朝史之研究》,页一四五至二〇二。

⑦ 《元史》卷一五三,《刘敏传》。

母河等处行尚书省治阿母河以西波斯之地。以不只儿(布智儿)、牙刺瓦赤、斡鲁不、睹答儿等任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不只儿、牙刺瓦赤二人为长,均任大札鲁忽赤(或称行天下诸路也可札鲁忽赤,以区别于蒙古国中央政府的也可札鲁忽赤)。

蒙古制度,所征服之定居地区,作为“黄金家族”的共有财产,由大汗政府设官统治,各支宗王也派自己的代表协同管理,监督其赋入,以维护各自的权益。燕京行台(行尚书省)建立后,除大汗所命大断事官为长外,诸王亦各遣一家臣“参决尚书事”<sup>①</sup>。

窝阔台在以断事官总管中原汉地的同时,实行“画境之制”,对地方行政区进行了调整。如从严实的统治区中分出大名、彰德二路,而以德、兖、济、单四州归东平路<sup>②</sup>。画境的结果,增设了许多路。一二二九年耶律楚材设立诸路课税所时,仅十路,至窝阔台末年,燕京行台(行尚书省)所统有二十余道(路)<sup>③</sup>。自路以下遍置达鲁花赤监临之<sup>④</sup>。一二三六年,复命探马赤军五部将分镇中原要害之地,阔阔不花镇益都、济南,按察儿镇平阳、太原,孛鲁镇真定,肖乃台镇大名,怯烈台镇东平<sup>⑤</sup>。这些都是加强对汉地的统治和防遏汉人诸侯势力的措施。

### 三 汉人世侯的势力

自金宣宗南迁后,黄河以北的州县官更多委印逃去,金朝的统治机构陷于瘫痪。各地土豪乘机以保乡里为号召,招兵结寨,各据一方,形成许多大大小

① 姚燧:《李恒家庙碑》,《元文类》卷二一。

② 元好问:《严实神道碑》,《遗山集》卷二六。

③ 元好问:《刘德柔(敏)先莹神道碑》,《遗山集》卷二八;又据王恽:《昔里钤部神道碑》,《秋涧集》卷五一,宪宗时燕京行台所统亦二十余道。

④ 遍置达鲁花赤在太宗八年,见胡祇遹:《蒙古神道碑》,《紫山集》卷一五。

⑤ 《元史》卷一二三,《阔阔不花传》。



小的地主武装势力。这些人的目的只在于维护自己的资产和地位,或乘战乱之机图谋富贵,对蒙、金战争的态度多数是看哪一方更强大,对自己更有利,就投靠哪一方。由于战争的复杂形势,他们中有的降蒙,有的附金,有的则徘徊观望,未有定属<sup>①</sup>。

蒙古统治者要征服广土众民的金朝,特别是要在中原地区建立长久的统治,就不能不依靠中原地主阶级的力量。成吉思汗攻金时,就很注意收罗对自己有用的统治人才,并采纳归降的契丹、汉人的意见,稍改滥杀的做法,而采用招降政策。木华黎受命专征后,更注重争取汉人地主武装势力,利用他们去争城略地和巩固所得地盘。实行的办法大体是:一,凡纳土归降者,即命为当地长官,仿照金朝的官制授予官职,如行省、领省、都元帅、副元帅以至州尹县令之类。后来有的还按其势力和所立战功,授予万户、千户、百户等蒙古官职。同时按照漠北制度,所命之官均许世袭。二,蒙古置达鲁花赤对他们进行监督;要求他们送子弟亲属为质,出兵从征和交纳贡赋。

在蒙古统治者的扶植和监督下,汉人地主武装头目掌握着蒙古统治区的地方政权。他们在自己的辖境内,既统军,又管民,可以自己任命下属官吏,征收赋税,处理刑罚,而且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袭相传,专制一方。其中势力最大的几家,如西京刘黑马、真定史天泽、顺天张柔、东平严实、济南张荣、益都李璫等,都各握重兵数万,所治地方二三百里,俨若春秋时各有分邑的诸侯,或唐代专擅兵民财赋的藩镇<sup>②</sup>。当时就通常把他们称为“世侯”。

刘黑马——其父刘伯林为金威宁县守将,一二一二年降蒙,以攻西京功,即命为西京留守副元帅,赐金虎符。一二二二年刘黑马袭父职,窝阔台即位时,立三万户分统汉军,刘黑马居首位。后又使统西京、河东、陕西诸军。宪宗

---

① 参阅到何之:《关于金末元初的汉人武装问题》,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一期。

② 郝经:《上宋主请区处书》,《陵川集》卷三七;魏初:《王汝明神道碑》,《青崖集》卷五。

时率军镇守川、陕,遂转官成都。

史天泽——其父史秉直为永清大地主,一二一三年降蒙,以长女嫁木华黎为妻,故史氏一门特别受到优遇。兄史天倪招集清乐社壮勇万人为兵,号清乐军,从木华黎征战。一二二〇年攻真定,招降武仙,木华黎即命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真定府事,以武仙为副。一二二五年武仙叛蒙附金,杀史天倪,国王孛鲁命天泽袭兄职,收复真定。“于是招流散,拊疮痍,披荆榛,掇瓦砾,数年间,官府民聚,以次完治”<sup>①</sup>。窝阔台立汉军三万户,天泽居其一,分统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兵,仍主真定事。后史天泽以真定长官职让天倪子史楫,遂以史楫为真定兵马都总管。宪宗时,天泽转任河南经略使,以天倪另一子史权代为真定万户。真定路的兵民之权一直掌握在史氏手里。

张柔——易州定兴县地主,金宣宗南迁后,聚族党数千家结寨自保,后投金中都经略使苗道润(也是地主武装头目)部下,官至经略副使。一二一八年兵败被执,投降蒙古,蒙古以原职授之。遂招集部曲,为蒙古取雄、易、安、保诸州,镇守满城。复攻真定武仙,辟地千余里,“威名震河朔”,以功升为河北东西路都元帅。后改授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又将帅府移到保州。保州自一二一三年屠城后,荒空了十五年,张柔着意兴复,招流亡,通商贩,民居官府,截然一新,成为燕南一大都会<sup>②</sup>。张柔所部兵数不在刘、史二万户之下,一二三四年,以灭金之功,又升为军民万户<sup>③</sup>。一二四一年,升保州为顺天路,割雄、易、遂、安肃四州隶之,辖境扩大,遂为顺天军民万户。后张柔从忽必烈攻宋,以其子弘略代理顺天万户。忽必烈即位后,张柔致仕,即命弘略袭职。

① 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② 元好问:《张柔勋德第二碑》,《遗山集》卷二六;《元朝名臣事略》卷六,引张柔墓志。

③ 据《元朝名臣事略》所引张柔墓志,其授万户在甲午(一二三四年)灭金后入朝和林时,但彭大雅《黑鞑事略》(所记为一二三三年情况)已称张柔为汉地四万户(刘黑马、史天泽、严实、张柔)之一,则灭金战争中已授万户,后加以确认。

严实——泰安长清人，原为金东平行台部将，参加镇压红袄军起义，升长清县尉。一二一九年，因东平行台疑其交通南宋（当时李全进山东，州县多降），遂叛金归宋，宋授以济南治中之职。于是用宋朝旗号，分兵四出，所至克复，太行之东，皆受其节制。一二二〇年，严实觉得宋弱蒙强，投靠蒙古更有利，就以所统诸州三十万户献于木华黎之行台，木华黎承制授他山东西路行尚书省事，不久攻取东平，以为治所，故又称东平行省（或东平行台）。严实辖境最广，所统凡五十余城，州县官吏都是他的将校部属，专以搜刮为能。但他也能收罗地主知识分子为己用，如宋子贞、刘肃、李昶等，都被招置幕府，因此东平人才特多。这些人帮严实整顿吏治，招集流移，恢复生产，使东平成为蒙古统治区内比较安定、富庶的地方。一二三〇年，窝阔台召见汉地诸侯，赐严实金虎符。一二三四年，再入朝于和林，授为东平路行军万户<sup>①</sup>。一二四〇年死，子忠济袭职。

张荣——济南历城县土豪，红袄军起义中，他招集乡民，占山为王，势力渐盛，遂略取济南府和淄州诸县，据而有之。一二二六年，籍所统军民五十余万献降于蒙古，授山东行尚书省、都元帅、知济南府事。后从蒙古阿朮鲁军攻金，击灭金京东山东行省国用安（降金的红袄军首领）部，取沛县、徐州、邳州等地。河南受兵时，人民被迫北徙，张荣招徕安集，令民间分屋与地居之，督使耕作，因此济南荒地垦辟者特多。所统兵民与境土可与真定史氏、东平严氏、顺天张氏相匹敌，当时人称他为四诸侯之一，大约也是在灭金之后不久，被授为济南路万户<sup>②</sup>。

---

① 元好问：《严实神道碑》，《遗山集》卷二六；《元史》卷一五九，《宋子贞传》。按《元史·刘黑马传》载，一二三三年攻南京之前，严实已增立为万户。

② 《元史》卷一五〇，《张荣传》；程钜夫：《张荣世德碑》，《雪楼集》卷一六。按本传及碑均未载张荣授万户事，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九七指出，《元史·世祖本纪》载中统二年“封济南路万户张荣为济南公”，是在此之前已授万户而本传缺载。考张荣以五十万军民归附蒙古（见张起岩：《张宏行状》，《元文类》卷五十），即授行省之职，与严实地位相等，又在灭金战争中立功很多，而此后则无特殊功绩可言，因此他的封万户当是在灭金后不久。

李璡——父李全原为山东红袄军领袖，一二一八年投归南宋，授京东路兵马副都总管。遂以宋朝名号联络红袄军余部，攻讨、招谕山东州县，连取海、密、潍、宁海、登、莱诸州，金青州（益都）守将张林以所统滨、棣、淄等州归降。不久李全与张林不和，发兵攻之，张林弃城奔降蒙古，李全遂据有益都。于是，山东东路各州基本上都在他的控制下，成为介于金、宋、蒙之间举足轻重的势力。蒙古军在消灭了彭义斌部后，于一二二六年进取山东，济南张荣投降，木华黎弟带孙统兵围攻益都，国王孛鲁也亲自率军来援。一二二七年，李全力穷出降，于是山东州县均为蒙古所有。孛鲁承制授李全山东淮南楚州行省。一二三一年李全死，妻杨妙真继任其职。不久，李璡袭职，改称益都行省，“仍得专制其地”。李璡“拥强兵至五七万”<sup>①</sup>，控制山东东部数十城之地，在山东三诸侯中势力最强。

除上述诸家外，大名行省王珍，中山万户邸顺，河东（平阳）万户李守贤，太原万户郝和尚拔都，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等，也都是蒙古时期有名的汉人“世侯”。

“世侯”的统治是金末中央集权制破坏后出现的封建割据局面与蒙古世袭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在残酷的战争和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的年代，它起了一种稳定的作用，从锋镝之下保护了一部分社会生产力，使农业生产得以继续进行。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这种统治秩序的建立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世侯”们凭借“尽专兵民之权”和“相传以世”的地位，霸占田宅，奴役人民，非法赋敛，使原来的自耕农变成“为之臣民而服其役，出租赋而禄之”<sup>②</sup>的依附农民。有的地区，世侯部下将校多“占民为部曲户，谓之脚寨，擅其赋役”<sup>③</sup>。因此，中国北方农民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在这个时期有所加强，这又是一种倒

① 张起岩：《张宏行状》，《元文类》卷五〇。

② 刘因：《郭弘敬墓铭》，《静修集》卷一七。

③ 《元史》卷一五九，《宋子贞传》。

退的社会现象。

#### 四 各种宗教的利用

成吉思汗凭借蒙古的良马劲弓和他的“用兵如神”，征服了许多民族。但要统治被征服的各民族，就不能单靠武力镇压，还必须辅以其他手段。他在给中原道教领袖丘处机的诏书中说：“来从去背，实力率之故，然久逸暂劳，冀心服而后已。”宗教，就是征服人心的一种重要武器。

为了适应统治不同民族的需要，蒙古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一律加以护持的政策，大汗圣旨里规定：“和尚根底寺，也立乔大师（即也里可温）根底胡木剌（修道院），先生根底观院，达失蛮根底密昔吉（礼拜寺），那的每引头儿拜天底人，不得俗人骚扰，不拣甚么差发休交出者。破坏了的房舍、旧的寺观修补者。我每名字里，交祝寿念经者。”<sup>①</sup>通过各种宗教的僧侣向各族人民宣扬蒙古大汗的“威德”，为他“告天祝寿”，也就是在善男信女们的心目中为蒙古的统治“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其作用不在兵刃之下。

佛教——由于辽、金两代统治者的尊崇，河朔以至辽东、西各地，佛教十分兴盛。蒙古进入中原后，也很注意笼络佛教僧人为自己服务。当时中原佛教以禅宗势力最大。禅宗曹洞宗高僧万松长老，曾被金章宗请到内庭升座讲法，备受礼敬，后奉命住持燕京仰山栖隐寺。燕京归蒙古以后，他又依附于蒙古统治者，其“声价”依旧“照映南北”。当燕京被围时，耶律楚材弃官学佛，投在万松门下为弟子，后来耶律楚材被蒙古重用，万松教他“以儒治国，以佛治心”<sup>②</sup>，兼用儒、释二道为蒙古统治者效力。万松的另一弟子福裕也很受宠遇，一二四八年被请到和林，住兴国禅寺。蒙哥即位时，又召他去漠北行宫参见<sup>③</sup>。

① 一二三八年凤翔长春观公据碑，见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页五。

② 耶律楚材：《寄万松老人书》，《湛然居士集》卷一三。

③ 程钜夫：《嵩山少林裕和尚塔碑》，《雪楼集》卷八。

禅宗临济宗僧侣海云(印简)投靠蒙古后,历事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四朝,“为天下禅宗之首”,地位更为显赫。他是山西岚谷人,一二一九年木华黎军取岚谷,他和他的师父中观被携北行。至赤城时,成吉思汗派使臣传旨与木华黎:“尔使人来说底老长老、小长老,实是告天的人,好与衣粮养活者,教做头儿,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拣阿谁休欺负,交达里罕里行者。”从此他被称为小长老。一二三五年窝阔台差官选试天下僧道,当时海云住持燕京大庆寿寺,万松等禅宗诸老僧共推他主持此事。这一年蒙古正括中原户口,官府“欲印识人臂”,海云即向断事官忽秃忽进言劝阻,停止了这种将人当做牛马看待的野蛮做法。一二四二年,忽必烈请他去漠北问佛法,在讲论中,他建议忽必烈“宜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并将随他前往的弟子刘秉忠推荐给忽必烈。此后忽必烈不断延请四方文学之士,访问治道,当与海云的启发有关。贵由、蒙哥即位时,都颁旨命海云领佛教事,成为蒙古国的宗教首领之一<sup>①</sup>。

来自迦湿弥罗(克什米尔)的僧人那摩也被蒙哥封为国师,“掌天下释教”<sup>②</sup>。

一二四六年,乌思藏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萨班,奉镇守西凉的窝阔台次子阔端之召,携其侄八思巴来到凉州。次年,萨班与阔端商议定妥,致信乌思藏僧俗首领,号召他们归附蒙古。萨班在凉州曾为阔端治愈重病,更加受到信任。此后,喇嘛教各派首领争相与蒙古统治者建立关系,希图凭借蒙古势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蒙古统治者也乐于利用喇嘛教作为统治藏族人民的工具。

---

① 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程钜夫:《海云塔碑》,《雪楼集》卷六;《元史》卷三,《宪宗本纪》。《佛祖历代通载》谓海云十三岁时(一二一四年),蒙古军陷岚谷,他“于稠人中亲面圣颜”。按此年成吉思汗率中路军徇河北诸地,未至山西。海云所见当是窝阔台。

② 《元史》卷一二五《铁哥传》;《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常山贞石志》卷一五。



一二五二年,忽必烈奉命专征大理,途中需经吐蕃之地,应先行招服吐蕃诸部,于是遣人去凉州召萨班。时萨班已死,八思巴应召于一二五三年谒见忽必烈,后被留在王府。八思巴自幼即学会念咒讲经,号称神童(藏文'phags-pa,意为圣者,犹汉人称神童);又从萨班学习显、密佛法和“五明”诸论,学识渊博。他宣扬的喇嘛教道理,极易为蒙古贵族所接受,因此忽必烈的妻、子“皆秉受戒法(密教灌顶),特加尊礼”<sup>①</sup>。从此喇嘛教逐渐取禅宗而代之,成为最受蒙古统治者尊崇的宗教。

道教————四一年宋金和议以后,南宋朝廷放弃了恢复中原的目标,中原人民抗金斗争高潮也已过去,金朝的统治趋于巩固。经过多年战乱,汉族地主阶级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于是有不少士大夫出仕金朝,与女真统治者结合起来。另一些人虽不愿做金朝的官,但更不愿进行反抗,因此采取了避世出俗的态度,创立宗教团体以为标榜。最有名的是咸阳人王嘉创立的全真教,其次有沧州人刘德仁创立的大道教和卫州人萧抱珍创立的太一教。三派都以老氏为宗,故被目为道家者流。名号虽有不同,宗旨大抵都是劝人“去恶复善”,提倡服辛苦,持忍耐,勿争杀。如全真的修持大要为“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sup>②</sup>;大道的教义要人们“勿萌戕害凶嗔之心”,“忠于君,孝于亲”,“安贱贫,力耕而食”,“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尘”<sup>③</sup>;太一教师干脆说:“做仙佛不难,只依一弱字便是”<sup>④</sup>。这一套以“柔弱为本”的顺民哲学和耕作自养、辛苦俭约、安分守己的修持方法,对那些无能力或不敢反抗残暴压迫的柔弱之民很是适合,因此“翕然从之”。金朝统治者见其有助治化,也给予承认,加以利用,于是“声教大振,门徒增盛”。

在蒙金战争中,人民遭受到严重的摧残,强者或执兵自卫,弱者则依托宗

①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

② 徐琰:《郝宗师道行碑》,《甘水仙源录》卷二。

③ 宋濂:《书刘真人事》,《宋学士文集》卷五五。

④ 王恽:《萧道熙行状》,《秋涧集》卷四七。

教以避难。元好问说：“贞祐丧乱之后，荡然无纪纲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为之教者独是家（全真教）而已。”<sup>①</sup>有人甚至将当时全真教的势力与严实、李全相比：“在金之季，中原板荡，南宋孱弱，天下豪杰之士，无所适从。时则有若东平严公，以文绥鲁；益都李公，以武训齐。而重阳宗师长春真人，超然万物之表，独以无为之教，化有为之士，靖安东华，以待明主，而为天下式”<sup>②</sup>。

蒙古统治者看到道教在中原人民中有很大的影响，就极力拉拢。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特遣侍臣刘仲禄到莱州，邀请全真领袖丘处机去西域相见。一二二二年，丘处机见成吉思汗于西域军中，进讲不嗜杀人才能统一天下，治国之方在于敬天爱民，养生之道要在清心寡欲等一套道理。成吉思汗对他尊礼备至，称之为“神仙”，并赐予诏书，命主道教，蠲免其门人大小差发赋税。丘处机回中原后，于燕京建长春宫，派门徒持牒四出，招徕百姓。“自是玄风大振，道日重明。营建者棋布星罗，参谒者云骈雾集，教门弘阐，古所未闻。”<sup>③</sup>当时在蒙古军的蹂躏下，“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因此投归教门以脱难者甚多，有人说，河朔之人十分之二都成了全真信徒<sup>④</sup>。从一方面看，这使许多人民免于被杀或当奴隶，未尝没有好处。但另一方面，利用道教广事招徕以消弭人民的反抗，也正是成吉思汗的目的所在。丘处机回来后，成吉思汗降旨问安，特别关心“下头百姓得来么？”陪同丘处机回来的宣差阿里鲜，奉命去山东招谕，坚请丘处机派其门徒同往。这两件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丘处机死后，弟子尹志平、李志常相继为教主。蒙哥即位时，诏命李志常掌道教事。大道教五祖酆希成，太一教四祖萧辅道也都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尊礼。

佛、道两教同时得宠，各自恃势扩展势力，为了争夺寺院、田地、财产，矛盾

① 元好问：《紫微观记》，《遗山集》卷三五。

②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二，引山东邹县《重修集仙宫碑》。

③ 姬志真：《长春真人成道碑》，《知常先生云山集》卷四。

④ 元好问：《紫微观记》，《遗山集》卷三五。

日益尖锐。先是丘处机及其门徒凭借成吉思汗护持圣旨,将数百所佛寺改为道观,僧徒早就愤愤不平。耶律楚材党于佛教,为此在所著《西游录》中极力抨击丘处机和道教。其后道士们刊印道藏,广为流布,其中《老子化胡经》等有轻蔑佛教言语,福裕乘机向蒙哥提出控告。一二五五年,蒙哥召集两教代表到和林,在他面前辩论教理,结果佛教占了上风。蒙哥命中原断事官布智儿等与西僧那摩大师(克什米尔人)一同检查道藏伪经,并处理道士占寺争端。道士不服,执定以忽秃忽登记的户籍为准,不肯交割,于是福裕、那摩等再次上章指控。此时佛教在蒙古贵族中的影响已居优势,蒙哥说:“这释、道两路各不相妨,只欲专擅自家,遏他门户,非通论也。今先生言通门最高,秀才人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又举手比喻,以“佛门如掌,余皆如指”,判定了佛教高于其他各教的地位<sup>①</sup>。

一二五七年,蒙哥以僧、道之争主要是汉地事务,应由忽必烈主持解决,遂命忽必烈召集僧、道两家并九流名士,在开平城举行第二次大辩论。出席者僧方面有福裕、那摩、八思巴、刘秉忠等三百余人,道方面以全真教主张志敬为首二百余人。此外,断事官孟速思以及廉希宪、张文谦等官员,窦默、姚枢等儒士共二百多人也出席作证。辩论结果,佛胜道败。忽必烈命按事先约定的处罚办法将参加辩论的道士十七人削发为僧,并下令焚毁道藏伪经四十五部,将道观二百多处改为佛寺。当然,蒙古统治者仍然需要利用道教作为统治中原人民的工具,只是它从此屈居佛教之下,排行第二罢了。

基督教——蒙哥说的“迭屑人”(波斯文 Tarsā,唐代译为“达娑”,意为“信徒”)就是指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徒;“弥失诃”(Missiah,唐代译为“弥施诃”)是希伯来语对耶稣基督的称呼。聂思脱里派唐初传入中国,汉名为景教。元代则通常称为也里可温,或称聂思脱里。唐以后,景教在中原地区几乎绝迹,

<sup>①</sup> 《至元辨伪录》卷三。

但在西北突厥部落中仍然存在。早在成吉思汗统一以前,汪古、乃蛮、克烈等部就信奉聂思脱里教。窝阔台的妻子脱列哥那(乃蛮氏),拖雷的妻子唆鲁禾帖尼(克烈氏),汪古部驸马,以及历事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三朝的大臣田镇海,蒙哥朝的大必阁赤孛鲁合等,都是聂思脱里教徒。因此聂思脱里教在蒙古汗廷中也有强有力的靠山。

蒙古西征中,又与中亚、波斯、西亚等地的聂思脱里教徒有了接触。成吉思汗攻取撒麻耳干城后,拖雷生病,城中有个聂思脱里教徒撒必是医生,可能是用“舍里八”(一种果子露)治好了他的病,被封为答剌罕,充御位下“舍里八赤”。后来他的外孙马薛里吉思也被召入大汗宫廷服役,至元十四年命为镇江路副达鲁花赤<sup>①</sup>。蒙古军攻略西亚时,当地有个聂思脱里教长老列边阿答来到蒙古,向窝阔台陈言免杀基督教徒,随后即奉命回去招谕。大约在一二四六年列边阿答再来蒙古,携其国人爱薛同行。爱薛精通医药、星历等多种学问,被贵由留为侍臣。忽必烈朝,他被命为掌管也里可温的崇福司长官。

伊斯兰教——成吉思汗兴起时,伊斯兰教的势力已扩展到今新疆西部。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昌八剌(今新疆昌吉)以西的突厥诸部落都已信奉伊斯兰教。当时中亚商人多为伊斯兰教徒,他们极善经营,不辞辛劳地出入于中国西北和中原各地,操纵着游牧民族的对外贸易。当时蒙古人就把他们西面的回回人称为撒儿塔兀勒(Sarta'ul),此名来源于古突厥字 Sartaq——商人(源于梵文),演变成为对民族的称呼。

早在成吉思汗建国以前,伊斯兰商人就在蒙古各部落中活动,随着中亚、波斯等地被并入蒙古版图,来到东方的回回人(包括贵族、官员、军队、工匠、学者、商人等)空前增加,成为中国历史上伊斯兰移民最多的时代。蒙古统治者利用回回上层分子和富商大贾作为统治和剥削中原汉民的帮手,如花剌子模人牙剌瓦赤、不花剌贵族赛典赤赡思丁、富商奥都剌合蛮等,都在统治机构

<sup>①</sup> 《至顺镇江志》卷九,“大兴国寺”条所录梁相撰《记》。

中担任很高的职务。移居漠北和中原各地的回回人,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在聚居地建立礼拜寺(密昔吉,波斯文 masjea);伊斯兰教师答失蛮(波斯文 Danishmand),苦行者迭里威失(Derwish),享受与僧、道、也里可温同样的免差待遇。但一般伊斯兰教徒——木速鲁蛮(Musulman)则同于编民,一样应当赋税、差发。

儒教——高深的儒学对蒙古统治者说来要比神佛的道理难懂得多,因此僧道之流很快就得到尊崇和优待,而儒门却长期冷落,儒生和其他老百姓一样要负担赋税差发,有许多人还被掳去当奴隶。成吉思汗时,有个得宠的西夏弓匠傲慢地说:“国家方用武,耶律(楚材)儒者何用!”耶律楚材反驳说:“治弓尚须用弓匠,岂治天下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但实际上,成吉思汗之用耶律楚材,主要是因为他善能占卜,根本谈不上用儒者治天下。

到窝阔台时代,中原地区已经征服,如何更有效地统治汉民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耶律楚材开始发挥他“以儒治国”的才能,并时常给窝阔台讲述孔夫子的学说,以及“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的道理。尽管窝阔台并不很理解这些,但毕竟知道了孔夫子是受到历代帝王崇奉的汉人所信仰的圣人,儒教与释、道一样是中原地区很有影响的教门,也可以利用来为自己服务。于是在取汴京时,就命人到城内将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找来,仿照前代体例封为衍圣公。后又修复孔庙,且使孔、孟、颜等儒教圣人子孙依僧道一体蠲免差发杂役<sup>①</sup>。

一二三七年,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窝阔台下诏给中州断事官忽秃忽等,命派官到各路选试儒士,中选者除种田纳地税,经商纳商税外,其余差发蠲免。次年,各路举行考试,中选者四千多人,依诏免除差发,其中一部分还被命为本

---

<sup>①</sup> 丁酉年(一二三七年)曲阜文庙免差役碑,见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页四二。按此碑系据札鲁火赤也可那演胡都虎(即大断事官忽秃忽)等转奏衍圣公孔元措的报告所发的圣旨,知丁酉年应为一二三七年。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孔元措持严实之信见海云,海云替他向忽都护(即忽秃忽)大官人陈情,始得免其差役之赋。

地议事官。到宪宗蒙哥即位时,又因高智耀奏请,“诏复海内儒士,徭役无有所与。”

然而,儒教的地位终究比佛、道低得多。按蒙古体例:“三教里,释迦牟尼佛系当中间里安置,老君底、孔夫子底像左右安置,自来如此”<sup>①</sup>。儒士也远不如和尚、先生们吃得开。有人发牢骚说:“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sup>②</sup>。

---

① 至元十七年虚仙飞泉观碑,见《元代白话碑集录》页二九。

② 汪元量:《湖山类稿》卷二,《自笑》。



## 第四章

# 元朝的建立

### 第一节 忽必烈夺取政权

#### 一 忽必烈联合各族地主阶级

随着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他们接触的较高文明也越来越多,在汉、契丹、畏兀儿等族封建地主知识分子的帮助下,蒙古统治者逐步地改变着自己的统治方式。这种转化是缓慢的、有阻力的,然而,却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忽必烈是顺应这一历史规律的蒙古统治者,他很早就注意搜罗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研究前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方法,重用各族地主分子,扩大统治阶级的力量。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采取了“附会汉法”的措施以适应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以及政治和文化传统,他自己也成了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总代表。

忽必烈是拖雷的儿子,宪宗蒙哥的弟弟。当他还在漠北“潜邸”的时候,就“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特别赞赏唐太宗统一天下,治理国家的业绩,“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文学四方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sup>①</sup>。海云禅师(宋印简)、刘秉忠、张文谦、张德辉、李冶、王鹗、赵璧等一批信佛崇儒的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应召前往,深受忽必烈的欢迎。一二五一年,蒙哥即位,忽

<sup>①</sup>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引徐世隆《王鹗墓碑》。

必烈受命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从此就以漠南为根据地，更紧密地和汉族及其他各族地主阶级结合起来。

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后，除了原来结识的一批汉族地主分子外，很早就投靠蒙古的杨惟中、姚枢、宋子贞等人，得到忽必烈的重用，郝经、许衡、王文统等也应召而来。其中最亲信的谋士当然是刘秉忠。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论天下事如指掌”，忽必烈在和林时，他就提出了“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的大问题，并以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灌输给忽必烈。刘秉忠进一步论述了旧制度造成的弊害，主张建朝省、立法度、定官制、整饬赋税、采用汉法，对忽必烈有极大的影响。忽必烈进驻漠南汉地后，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因而受到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的欢迎，“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sup>①</sup>在他们看来，忽必烈正是这样做的，因此纷纷前来投靠他。忽必烈对这些汉族地主知识分子也十分信任，诸凡吏治、用兵、理财、屯田等事宜，乃至夺取汗位、“立国规模”，多出自这些人的计谋。

蒙古贵族在灭金的过程中就已经不断吸收和利用北方汉族和其他各族的地主武装。像董俊、严实、史天倪、张柔等人就因率领地主武装投降蒙古贵族而受到重用。忽必烈总管漠南汉地后，继续采取拉拢、利用地主武装头目的方针。如董俊之子董文炳由于在忽必烈进兵西南和灭南宋的战争中拼死效劳，受到忽必烈的嘉奖，并“日亲贵用事”；史天倪的弟弟史天泽在忽必烈即位后官拜中书右丞相，在平阿里不哥和李璘的战争中出力甚多，张柔及其子张弘范也是忽必烈十分信用的，张弘范就是最后在崖山消灭南宋残余势力的元军统帅。这批北方汉族地主武装的头目由于对忽必烈忠心耿耿，所以都成了忽必烈手下的重要统军将领，无论在争夺帝位、铲除政敌，或者是灭亡南宋的战争中，他们都立下了显赫的战功。

忽必烈对李璘也是拉拢利用的。李璘是金末红袄军领袖李全的儿子，一

---

<sup>①</sup> 郝经：《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陵川集》卷三七。

二二七年李全投降蒙古后,这支武装力量已经沦为蒙古政权荫庇下的地方割据势力。一二三一年李全死后,李璡继续据有山东,并袭益都行省。蒙哥即位后,李璡又取涟水等四城,势力不断扩张。深受忽必烈信用的王文统,就是李璡的岳父。忽必烈即位后,立即封李璡为江淮大都督。可见忽必烈对这支割据势力是很重视的。

对于其他各族上层贵族,忽必烈也是把他们争取来加以利用的。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其父苦马鲁丁是布哈拉老赛典赤的儿子,他早在成吉思汗西征时就投靠了成吉思汗,随蒙古军东归,曾任丰、净、云内三州达鲁花赤。蒙哥汗时,赛典赤赡思丁在燕京行省任事,受到了忽必烈的重用;畏兀儿人廉希宪、河西人高智耀,都是接受汉文化很深的少数民族,也受到忽必烈的重用;武将阿里海牙是畏兀儿人,忽必烈在“潜邸”时,即充任宿卫,后来随忽必烈进攻南宋,屡立战功。

忽必烈联合汉族和其他各族地主阶级,其目的:一是学会统治之道,一是扩充军事实力。学会统治之道是势在必行,否则社会就不安定,政权就不巩固。所以,他不仅自己学习汉文化,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sup>①</sup>,还要其他蒙古贵族跟着学。他的儿子真金太子,“少从姚枢、窦默受《孝经》”<sup>②</sup>,后来当中书左丞的阔阔,原是忽必烈在“潜邸”时的近侍,忽必烈让他拜王鹗为师,学习“治道”<sup>③</sup>。就这样,从漠北“潜邸”,到主管漠南汉地,这短短十余年间,忽必烈已经逐渐成为懂得汉法,决心“变易旧章”的新封建统治者,成为蒙汉各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

## 二 对中原地区的经营和控制

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灭了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占领了大江以北的广大

---

① 《元史》卷一六三,《张德辉传》。

② 《元史》卷一一五,《裕宗传》。

③ 《元史》卷一三四,《阔阔传》。

地区,使中国北部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长期的战祸,使人民惨遭杀戮;幸存的百姓,也无法忍受蒙古贵族和蒙汉军阀、官僚、地主的“非法赋敛”,纷纷逃亡,有的进行武装反抗;农业生产残破不堪,水利失修,农田破坏。造成这种情景的根本原因是蒙古统治者的统治方式始终保存着浓厚的草原奴隶制因素。正如忽必烈的谋臣郝经所说:“法度废则纲纪亡,官制废则政事亡,纪律废则军政亡,守令废则民政亡,财赋废则国用亡,天下之器虽存,而其实则无有”<sup>①</sup>。实行这种旧制,不仅给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而且也使蒙古政权的统治陷入危机之中。

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之后,采取了招抚流亡,禁止妄杀,屯田积粮,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措施,初步扭转了这种局面。

长期的战乱和统治者的疯狂掠夺,使广大人民被迫背井离乡,逃匿山林。忽必烈封地内的邢州(今河北邢台),金时八县共有八万二千九百九十二户<sup>②</sup>,由于当地的蒙古贵族“不知抚治,征求百出,民弗堪命”<sup>③</sup>,到忽必烈受封之初,当地百姓已从万余户急遽下降至五七百户<sup>④</sup>。人民群众用逃亡的手段来反抗蒙古政权的统治,这对蒙古统治者来说是极大的威胁。这种状况在当时是极普遍的现象。针对上述情况,刘秉忠上书忽必烈说:“天下户过百万,自忽都那演(即失吉忽秃忽)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宜比旧减半,或三分去一,就见在之民以定差税,招逃者复业,再行定夺”<sup>⑤</sup>。刘秉忠还提出了对于官吏迁降、赏罚的建议。于是忽必烈以治邢作为试点,派了脱兀脱、张耕、李简等人去邢州,“三人至邢,协心为治,洗涤蠹敝,革去贪暴,流亡复归,不期月,户增十倍”<sup>⑥</sup>。忽必烈从治理邢州的

① 郝经:《立政议》,《元文类》卷一四。

② 《续文献通考》卷一二,《户口》一。

③ 《元史》卷一五七,《张文谦传》。

④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⑤ 《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⑥ 《元史》卷一五七,《张文谦传》。

成效中大有感触,由是对儒士更加器重,逐步委以重任。

由于当时“典章未备”,法制不立,贵族、官吏在地方上和战争中随便杀人的现象仍经常发生。宪宗的断事官牙刺瓦赤、不只儿等,一天内判决了二十八人死刑,其中一人因盗马,杖后放释,后又因为要试刀,追回斩了。忽必烈责之曰:“凡死罪必详谳而后行刑,今一日杀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复斩,此何刑也?”<sup>①</sup>在用兵南宋的过程中,忽必烈也一反以往蒙古军队恣意杀戮的做法,屡次“戒诸将毋妄杀”,军士有犯者,“命戮以徇”,使“诸军凜然,无敢犯令者”<sup>②</sup>。对战俘也不用杀戮或掳为奴的办法,而是主张释放。“既入宋境,分命诸将毋妄杀,毋焚人室庐,所获生口悉纵之”<sup>③</sup>。

为了替进攻南宋筹备军粮、军费,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后,十分注意屯田积粮。一二五二年,忽必烈建议在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县)等地屯田,并在邓州立屯田万户府,屯田范围西起襄、邓,东连清口、桃源,敌至则战,敌退则耕。一二五三年,忽必烈又在凤翔(今陕西凤翔)屯田,以盐换取粮食,以供军粮。同年,忽必烈又立京兆交钞提举司,印发纸钞。这样,忽必烈逐步地控制了当时蒙古政权在中原汉地的很大一部分财政权。

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后,用了将近 10 年的时间,使中原一部分地区得到了初步的治理,使过去那种人民逃亡、农田荒芜、典章不立等状况有所克服。同时,通过这段时间的经营,使忽必烈部分地控制了蒙古政权的财政经济,为他以后夺取政权奠定了经济基础。

一二五六年春,忽必烈命刘秉忠相地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东北、滦河北岸的龙冈(今内蒙古多伦西北),营建宫室、房舍,3 年后建成,名为开平。在这里聚集了忽必烈的一批重要谋士,成为忽必烈集团的根据地。

①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②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③ 《元史》卷一五七,《张文谦传》。

### 三 汗位的争夺

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引起了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深刻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用蒙古旧有的统治方式还是用历代中原王朝的封建制统治方式来统治中原汉地。宪宗蒙哥死后的帝位争夺，则是这种分歧的白热化，最后不得不通过武力来加以解决。

一二五九年七月，蒙哥在进攻南宋合州（今四川合川）时，病死于钓鱼山。消息传来，以阿里不哥为代表的一派，和以忽必烈为代表的一派，都积极行动起来，准备夺取汗位。

阿里不哥是拖雷的幼子，驻守和林。在与忽必烈争夺汗位前，他的支持者之一——阿兰答儿，因为在河南、京兆（今陕西西安）等地“鉤考”财赋，曾与忽必烈发生过矛盾。事实上，在蒙哥在位时，阿里不哥和忽必烈都各自形成了自己的集团。蒙哥死后，阿里不哥及其支持者立刻采取夺位措施，阿里不哥一方面发布敕令，命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事于燕都（今北京），按图籍，号令诸道；一方面纠合各地军队，令阿兰答儿、浑都海发兵图据关陇，令刘太平、霍鲁海办集粮饷，图谋秦蜀，企图形成有利局势，逼迫忽必烈就范。

忽必烈也不甘示弱。他那时正率蒙古军队围鄂（今湖北武昌），蒙哥死讯传来后，立即召集诸将、诸谋臣商议，郝经提出“断然班师，亟定大计”之策，主张：“先命劲兵把截江面，与宋议和，许割淮南、汉上、梓、夔两路，定疆界、岁币。置輜重，以轻骑归，渡淮乘驿，直造燕都，则从天而下，彼（指阿里不哥）之奸谋僭志，冰释瓦解。遣一军迎蒙哥罕灵輿，收皇帝玺。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诸王驸马，会丧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凉、东平、西京、北京，抚慰安辑，召真金太子镇燕都，示以形势。则大宝有归，而社稷安矣”<sup>①</sup>。忽必烈采纳了郝经的建议，适宋相贾似道亦遣使请和，遂缔结密约，于一二五

<sup>①</sup> 郝经：《班师议》，《陵川集》卷三二；《元史》卷一五七，《郝经传》。



九年底迅速北归。一二六〇年三月,忽必烈抵达开平,诸王合丹、阿只吉等率西道诸王,塔察儿、移相哥、忽刺忽儿、爪都等率东道诸王,都会集在开平。他们都是忽必烈的支持者,忽必烈单方面召开忽里台,在他们的拥戴下宣布即位,并定当年为中统元年,开始建元纪岁。

四月,阿里不哥在和林城西按坦河另行召集忽里台,宣布为大汗<sup>①</sup>。支持他的除阿兰答儿、脱里赤等外,还有窝阔台后王阿速带、玉龙答失、昔里吉,察合台后王阿鲁忽,旭烈兀子出木哈儿等。宪宗蒙哥留守六盘山的大将浑都海及其驻守成都的部属密里火者、驻青居部属乞台不花也支持阿里不哥。阿里不哥还命霍鲁海、刘太平等到陕、甘去任职。忽必烈则命廉希宪为京兆等路宣抚使,廉希宪到任后,擒霍鲁海,杀刘太平、密里火者、乞台不花等,稳定了关陇局势。

但是阿里不哥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遣阿兰答儿自和林南下联合哈刺不花、浑都海,结集兵骑于甘州(今甘肃张掖)。忽必烈将八春、汪良臣与诸王合丹击败之,杀阿兰答儿、浑都海等于甘州东山丹附近的耀碑谷<sup>②</sup>。

中统元年冬,忽必烈决定亲征和林。阿里不哥自知不敌,逃至谦谦州(今叶尼塞河上游南),忽必烈命宗王移相哥留驻和林,自回开平。

阿里不哥以自己的分地谦谦州和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东南)为根据地,四出骚扰,并控制了察合台和窝阔台后裔的分地。忽必烈即位后,曾派阿必失哈及其弟哈萨儿(察合台孙不里之子)前往察合台分地主持分地事务,但两人途经陕西时被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拘留,阿里不哥另派阿鲁忽(察合台第六子拜答儿之子)往镇,命他提供军需,并守其东境以抗忽必烈军,守阿姆河以防旭

<sup>①</sup>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按,《史集》第二卷载,阿里不哥即位在先,忽必烈称汗在后,见俄译本,页一六〇。

<sup>②</sup> 《元史》卷一五九,《商挺传》;邵循正译:《史集·忽必烈汗纪译释(上)》,《清华学报》,一九四七年,十四卷第一期。

烈兀、别儿哥军来助忽必烈<sup>①</sup>。阿鲁忽至阿力麻里后,根据阿里不哥旨意从兀鲁忽乃(察合台长孙哈刺旭烈之妻)手里夺取了权力,并将朮赤系势力逐出河中地区(蒙哥时代该地为拔都所占),控制了察合台封地全境,拥有十五万骑兵,遂不愿再服从阿里不哥。不久,阿里不哥遣使者来征牲畜、兵器 and 钱物,阿鲁忽将他们征集的物资全部扣留,又杀其使者,于是宣布归附于忽必烈。忽必烈命他统治从按台山直到阿姆河之兀鲁思和诸部<sup>②</sup>。

阿里不哥发兵攻阿鲁忽,其前锋哈刺不花于不刺城附近被阿鲁忽军击溃。阿鲁忽回到亦列河(今伊犁河)后,将军队分散休养,毫无防备,阿里不哥后军突至,夺取阿力麻里和亦列河地,阿鲁忽仓促率右翼军退到忽炭(今新疆和田)和可失哈儿。一个多月后,溃军渐集,又率部移向撒麻儿干。

阿里不哥在亦列河、阿力麻里等地大肆蹂躏,使这一带破坏极其严重,人民恨之入骨,奋起反抗。阿里不哥自己也站不住脚了。中统二年(一二六一年)秋,阿里不哥至和林,伪装愿意归顺,却对移相哥进行突然袭击,占领和林,发兵南下骚扰。

阿里不哥尽管千方百计企图挽救败局,但由于他倒行逆施,支持者越来越少,物力、财力也十分贫乏,日渐孤立。忽必烈则利用中原地区的强大物质基础,兵强马壮,粮草充足,占了优势。当时,“哈喇和林之食粮、饮料皆自汉地转运而至,忽必烈合罕乃下令禁绝粮道,其地困于饥馑”<sup>③</sup>。

当阿里不哥南犯时,忽必烈再次率军迎战。中统二年十一月,双方大战于昔木土脑儿,阿里不哥大败,其部将多降。忽必烈追至和林南面。阿里不哥北遁后处于东西夹击之中,众叛亲离,其支持者纷纷向忽必烈投降,加上连年饥荒,终而不得不于至元元年(一二六四年)向忽必烈投降。经过四年的斗争,

① 《史集》第二卷,波义耳英译本,页九二、一六一。

② 《史集》第二卷,页一六二。

③ 邵循正:《史集·忽必烈汗纪译释(上)》,《清华学报》一九四七年,十四卷第一期。

阿里不哥的势力被消灭了,漠北与中原地区恢复了统一。漠北平定后,忽必烈取消了和林作为都城的地位,而设宣慰司都元帅府直接管辖。

#### 四 中统建元

如何建立一个既能保持“国朝(蒙古)之成法”,又能适应中原地区封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一整套国家机器,这是忽必烈十多年来一直深思熟虑的问题。经过将近十年在漠南汉地的实践,特别是一二六〇年三月即大汗位后,这种设想终于成熟了,于是“一代王法”开始逐步建立,而中统建元可以说是忽必烈意图按中原原有封建格式来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所跨出的第一步。

蒙古人原以十二生肖作纪年。忽必烈即位前,蒙古诸汗也不用年号。忽必烈却来了一个大变革。《中统建元诏》曰:

朕获纘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sup>①</sup>

建立年号一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是为了表示大蒙古国继承了中原封建王朝“前代之定制”,也表示了蒙古统治者统一全国、实现“天下一家”的意志。忽必烈政权的形式正在发生变化,正向中原历代封建王朝模式看齐。

当然,忽必烈采用“汉法”,并没有完全抛弃蒙古旧制。这一点郝经在当时所上的《立政议》中讲得很明白:“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代王法。……下诏蠲苛烦,立新政,去旧污,登进茂异,举用老成,缘饰以文,附会汉法”<sup>②</sup>。然而,忽必烈“附会汉法”的那些重大部署,往往遭到守旧的蒙古贵族们的反对。中统建元后,西北

<sup>①</sup>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sup>②</sup> 郝经:《立政议》,《陵川集》卷三二。

藩王遣使入朝,气势汹汹地责问道:“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sup>①</sup>高智耀认为“儒术有补治道”,主张释放儒士被俘为奴者,“贵臣”们大为反对<sup>②</sup>,总之,推行“汉法”的阻力是很大的。而忽必烈周围的谋臣,总是不断地为他打气,鼓励他坚定不移地推行“汉法”。至元二年(一二六五年)许衡上了著名的《时务五事》,其中有一段说道:

“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以是论之,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然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苟能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宜而常,未有不可变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责近效,不恤流言,则致治之功庶几可成矣。”<sup>③</sup>

忽必烈在这些汉族地主分子和接受汉法的各族上层贵族的支持下,确是“心坚而确”地推行“汉法”的。

中统政权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汉族地主阶级特别重视,使他们在最高行政机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正因为忽必烈在夺取政权前代表着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夺取政权后又充分利用汉族地主分子,因此他的统治基础扩大了;正因为忽必烈主张采用汉法,以适应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现状,因此他的主张是符合历史发展“永恒的规律”的。这样,忽必烈政权的巩固就获得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

① 《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传》。

② 《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传》。

③ 《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中统元年至中统四年宰相表<sup>①</sup>

干支	中统	右丞相	左丞相	平章政事	右丞	左丞	参知政事
庚申	元年	禡禡 (回回)		王文统(汉) 赵璧(汉)	廉希宪 (畏兀儿)	张文谦 (汉)	张启元 (汉)
辛酉	二年	不花 (蒙古) 史天泽 (汉)	忽鲁不花 (蒙古) 耶律铸 (契丹)	塔察儿(蒙古) 王文统 赛典赤 (回回)廉希宪	张启元	张文谦	商挺(汉) 杨果(汉)
壬戌	三年	不花 史天泽	忽鲁不花 耶律铸	塔察儿 王文统 赛典赤 廉希宪	粘合南合 (女真) 张启元	阔阔 (蒙古) 张文谦	商挺杨果
癸亥	四年	不花 线真 (蒙古) 史天泽	忽鲁不花 塔察儿 耶律铸	塔察儿 赵璧 赛典赤 廉希宪	粘合南合 张启元	阔阔 张文谦 姚枢	商挺杨果

第二节 镇压叛乱,维护统一

一 镇压李璿之乱

蒙金战争中,金朝那些据地自雄的大地主军阀纷纷投靠蒙古。蒙古统治者为了笼络他们以加强自己的实力,一律“因其旧而令官”<sup>②</sup>,授予行省、领省、大元帅之类头衔,让他们世袭管辖原来的地盘,军民兼管。这些大地主军阀集团头目“尽专兵民之权”<sup>③</sup>,数十年专制一方,形成了强大的割据势力。李璿之变就是这样酝酿起来的。

红袄军起义最早爆发于一二一一年,后来杨安儿、刘二祖、郝定等领袖先后牺牲,余部由杨安儿妹杨妙真和李全领导,两人结合后队伍逐渐壮大了起

① 此表据《元史》卷一一二,《宰相表》。括号内的所属民族是作者加的。  
② 《元典章》卷九,《改正投下达鲁花赤》。  
③ 《元名臣事略》卷六,《元帅张献武王》。

来。但是,马贩出身的李全在攫取了红袄军领导权后即走上了投降道路。一二一八年,李全降宋,一面火并其他红袄军,大量搜括、积聚财宝,一面在南宋和金朝之间要挟,博取高官厚禄。当强大的蒙古军队进入山东后,李全又于一二二六年投降蒙古,以“岁献金币”的条件换取了“山东淮南行省”的官职。他充当了蒙古官吏后,“服大元衣冠,文移纪甲子而无号(当时元朝尚未建立,故无年号)”<sup>①</sup>,军中有蒙古官员监督。他为了向蒙古贵族表示效忠,迫不急待地进行备战。“全造舟益急,至发冢取黏板,炼铁钱为钉鞠,熬人脂捣油灰,列炬继晷,招沿海亡命为水手”<sup>②</sup>,准备攻宋。而把持南宋朝廷的史弥远“犹粮饷不绝”,滋补这个反复无常之徒。苏北射阳湖地区的人民气愤地说:“养北贼,戕淮民”<sup>③</sup>。果然,一二三〇年十月,李全突然发兵攻扬州,南宋军民奋起反抗。次年正月,李全败死。李全死后,杨妙真逃回山东,养子李璮承袭其父益都行省职。

从那以后,李璮“专制山东者三十余年”,在对宋、对蒙的关系上完全继承了他父亲的故伎,或假名攻宋,向蒙古要钱要粮要官,或假名联宋反蒙。但其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尽专兵民之权”<sup>④</sup>。

李璮为了达到割据山东的目的,牢牢不放自己的兵权,“朝廷(指蒙古)数征兵,辄诡辞不至”<sup>⑤</sup>。一二五八年,李璮攻南宋海州、涟水等城,得涟水相连四城,“大张克捷之功”<sup>⑥</sup>,以图攫取军功。中统元年(一二六〇年),忽必烈即位,李璮果然加封为江淮大都督,又谎报敌情,乘机大修益都城堙,骗取犒赏赐银、兵器等物。李璮发动兵变是处心积虑的,三十余年来,“其前后所奏凡数

① 《宋史》卷四七七,《李全传》下。

② 《宋史》卷四七七,《李全传》下。

③ 《宋史》卷四七七,《李全传》下。

④ 虞集:《元帅张献武王庙碑》,见《元文类》卷二一。

⑤ 《元史》卷二〇六,《李璮传》。

⑥ 《元史》卷二〇六,《李璮传》。



十事,皆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其谋亦深矣。”<sup>①</sup>又与当上中书平章政事的岳丈王文统互为表里,选择时机,发动兵变。

但是,李璮完全错误估计了形势。他以为当时忽必烈正忙于对阿里不哥战争,无力调兵和他交战,不料阿里不哥败得很快,忽必烈迅速抽调主力南下镇压;他以为北方汉族军阀都和他一样,心怀叛志,起兵后即可一呼百应,结果响应者寥寥。中统三年(一二六二年)二月初一,在发动兵变前,他又匆忙与南宋联系,献涟海三城约降,当南宋还在将信将疑之际,他就在初三那天占领益都,发动兵变,不久占领济南。

李璮联宋完全是出于一种策略考虑,并非真心实意,尽管南宋给了他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齐郡王的封号。李璮对南宋有杀父之仇,对南宋的作战他从来是不遗余力的,甚至“杀宋师殆尽”<sup>②</sup>。这次兵变,只是到了事件即将来临时才去约宋,以免受蒙宋夹击,结果南宋只给了一个虚衔,并未真正支援。李璮反蒙后,并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而是“民间璮反,皆入保城郭,或奔窜山谷。由是自益都至临淄数百里,寂无人声”<sup>③</sup>。虽然李璮曾四出联络,远至山西太原,除了太原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戴曲薛等少数几人外,几乎没有什么人响应。忽必烈得知李璮发动兵变后,立即杀了王文统,发蒙古汉军讨李璮,命水军万户解成、张荣实、大名万户王文干及万户严忠范会东平,济南万户张宏、归德万户邸浹、武卫军炮手元帅薛军胜等会滨棣,命济南路军民万户张宏、滨棣路安抚使韩世安,修理城堑,作为应战准备,命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不久又派史天泽增援。前往镇压李璮的许多汉军头目都是李璮以为会响应他的诸侯,结果这批军阀反而成了他的镇压者,因为他们知道忽必烈的统治十分牢固,李璮是不会成功的。五月,蒙古军队筑环城将济南

① 《元史》卷二〇六,《李璮传》。

② 《元史》卷三,《宪宗纪》。

③ 《元史》卷二〇六,《李璮传》。

围困。“璿自是不得复出。犹日夜拒守，取城中子女赏将士，以悦其心；且分军就食民家，发其盖藏以继，不足，则家赋之盐，令以人为食。至是，人情溃散，璿不能制，各什伯相结，缒城以出”<sup>①</sup>。七月，李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大明湖自杀，因水浅未死，“张相公（张宏）差人缚出。严相公（严忠范）首问曰：‘此是何等做作？’李璿答曰：‘你每与我相约，却又不来。’严就肋下刺一刀。史丞相（史天泽）问之曰：‘何不投拜？’李璿不答。又问曰：‘忽必烈又甚亏你处？’李璿曰：‘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唤黄眼回回斫去两臂，次除两足，开食其心肝，割其肉，方斩首”<sup>②</sup>。这是明代祝允明保存的一分“故牒”（李璿的同党留下的记载）中记下的，可见史天泽匆匆杀璿，事出有因。但是归根到底，多数汉族军阀对忽必烈还是忠诚的，满意的，因为忽必烈并没有亏待他们。

至元元年（一二六四年）李璿余党毛璋再次发动兵变，结果兵败被杀。

李璿之变发生后，忽必烈发现王文统有与李璿的交通信，因而立即将王处死。李璿被镇压后，进一步追查王文统的进身之路。于是曾经推荐过王文统的廉希宪、张易、商挺、赵良弼、刘秉忠等都受到怀疑，其中有些人受到控告，有的从中枢被排挤出来。

与此同时，忽必烈也通过李璿事件竭力消弭产生李璿之变的根子，即迫使地方军阀交出实权和军队。史天泽曾擅杀李璿以灭口，忽必烈虽未严加追究，但形势迫使史天泽等以释兵权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罪过和对忽必烈表示忠诚。史天泽带头请求：“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sup>③</sup>。史氏子弟即日解兵权者十七人。史天泽的姻亲、武卫亲军指挥使李伯祐，以及东平严氏、满城张氏、济南张氏等都先后效法。忽必烈对他们既往不咎，继续予

① 《元史》卷二〇六，《李璿传》。

② 祝允明：《前闻记·李璿》，见《纪录汇编》卷二〇二。

③ 《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泽传》。

以优容。但,地方军阀的实权剥夺了,分裂和叛乱的隐患消除了。北方汉族地主武装的头目们受到李璫事件的警告,也更加死心塌地地为新王朝服务了,这就是所谓“李璫死而北人绝归朝之志”<sup>①</sup>。

李璫之变被镇压后,忽必烈抓紧时机、因势利导,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主要措施有:削弱私家权力,除本人为官外,其兄弟子侄之为官者罢;解除地方军阀兵权,真定董氏除外;严格执行地方兵、民分治制度,管民官理民事,管兵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罢诸侯世袭,行迁转法;实行易将制,使将不擅兵;置万户府监战,选宿卫士监汉军;取消汉人官僚的封邑。这些措施连同枢密院的设立和中书省的加强,使中央集权制大大牢固起来。

李璫事件也进一步加深了蒙古统治者对汉人的疑惧心理,色目人作为蒙古统治者帮手的地位进一步加强。至元二年(一二六五年),忽必烈正式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sup>②</sup>。从这以后,回回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中央实权渐渐落入阿合马等人手中<sup>③</sup>。

## 二 平定诸王叛乱

大蒙古兀鲁思内部各个兀鲁思形成后,各兀鲁思的离心倾向,自成吉思汗晚年开始,愈益明显地加剧了。到忽必烈时期,这种矛盾与争夺汗位的斗争交织在一起,表现为海都、乃颜等藩王的武装叛乱。

阿里不哥投降后,忽必烈为了行使大蒙古兀鲁思大汗的职权,于至元元年(一二六四年)以商讨如何处置阿里不哥的名义,邀伊利汗旭烈兀、钦察汗别儿哥、察合台汗阿鲁忽前来参加忽里台大会,三汗答允于至元四年(一二六七年)同

---

① 《宋史纪事本末》卷一〇四,《李璫之纳》。

② 《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③ 参见周良霄:《李璫之乱与元初政治》,《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期,一九八〇年。

时到达,但不久后,三汗先后去世,分别由阿八哈、忙哥帖木儿和木八剌沙继承。

忽必烈对窝阔台后王海都也曾邀请,但海都用“牧马尚瘦”为借口故意拖延<sup>①</sup>,仅表示只愿在领地内“服从大汗的命令”<sup>②</sup>。海都是窝阔台的孙子,汗位被拖雷系夺去后,他一直心怀不满。当阿里不哥在和林称大汗反对忽必烈时,他曾支持过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后,海都即返还叶密立河,联合朮赤后裔诸王,占有窝阔台原来的封地,割据自雄。

忽必烈为了进一步控制中亚,当然不能容忍海都的行为。因而针对海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忽必烈先派察合台系诸王八剌去河中辅佐木八剌沙,执行进攻海都的命令。察合台分地在窝阔台分地之西,这样便可形成对海都的东西夹击之势。八剌到察合台兀鲁思后,发动兵变,废黜木八剌沙,自立为汗。但八剌反过来又不听从大汗的命令,反而与忽必烈的军队发生冲突。忽必烈另派铁连去朮赤分地,联合朮赤后王忙哥帖木儿出击海都。

至元五年(一二六八年),忽必烈军自岭北发兵,击败海都军,追至阿力麻里;忙哥帖木儿和八剌也乘机出兵攻击海都。海都在兵败之时,不得不与忙哥帖木儿议和,迎击八剌,八剌战败。海都请堂兄乞卜察克出面调解,遂与八剌讲和,结为“安答”(义兄弟),未几,双方又不和。至元七年八剌死,海都立察合台孙捏古伯为汗,但八剌诸子及阿鲁忽诸子不服,举兵攻海都,出现了混战局面。

忽必烈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于至元七年命刘好礼任乞儿吉里、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迁去中原地区的农民、军人,进行军垦、民屯,设立人匠局组织管理迁去的各种工匠,并设立传舍,改进道路交通,希图把这里建设成为防御西北叛王的根据地。在占领阿力麻里后,形势对元军更加有利,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年),忽必烈子北平王那木罕建幕庭于阿力麻里,总

① 《史集》第二卷,波义耳英译本,页二六六。

② 《马可孛罗行记》,伯希和、穆勒英译本,页四四七。

辖西北元军。十年,捏古伯与海都相攻,元军乘机进兵察合台兀鲁思,是年十二月,捏古伯兵败被杀。

十一年,元朝政府在天山南北别十八里、忽炭、鸭儿看(今新疆莎车)、沙州(今甘肃敦煌西)等处置水陆驿站,以加强西北与内地的交通往来及对前线的支援。十二年,忽必烈再命皇子北平王那木罕率诸王镇守西北,命右丞相安童辅之,那木罕弟阔阔出,蒙哥子昔里吉,忽必烈弟岁哥都子脱脱木儿,阿里不哥子明里帖木儿、药木忽儿等随行。但蒙哥、阿里不哥诸子因与忽必烈不和,一直在寻找机会发动叛乱。

十三年秋,脱脱木儿首先率部叛乱,昔里吉与元将忽怜奉命征讨,将脱脱木儿击败。但昔里吉暗中却与脱脱木儿勾结,他们又阴结药木忽儿、明里帖木儿等共同叛乱。时元将八鲁浑、粘阔等亦叛,昔里吉等遂乘机发兵拘系那木罕、阔阔出及安童,共推昔里吉为帝。他们又将那木罕等送往海都、忙哥帖木儿处去,希望与之结盟,但没有成功。是年秋,昔里吉等向岭北进犯,占领吉利吉思等地,执刘好礼于军中。

十四年(一二七七年)春,昔里吉等分道东进。四月,驻牧在应昌(今内蒙古阿巴哈纳尔旗东南)附近的弘吉剌部首领折儿瓦台响应,围忽必烈女囊家真于应昌城中。忽必烈急调诸王伯木儿、彻彻都,中书右丞博罗欢等北上平叛。双方在牙里伴朵、坏刺合都、鱼儿泊(今达赉泊)等地激战,叛军大败,折儿瓦台被擒。时昔里吉正率叛军主力越过杭海岭(今杭爱山)北渡斡耳寒河(今鄂尔浑河)进入土兀拉河(今土拉河)一带,被元将土土哈堵截,叛军失利。为加强军事指挥,忽必烈命灭宋主帅伯颜总军北上,伯颜率军直扑叛军集结的土兀拉河一带。六月,双方大战于土兀拉河,叛军败退斡耳寒河。八月,双方对峙于斡耳寒河,时叛军内部分化,昔里吉仓促应战,被元军击溃<sup>①</sup>。

<sup>①</sup> 见阎复:《土土哈纪绩碑》,《元朝名臣事略》卷三《枢密句容武毅王》引;元明善:《伯颜神道碑》,《国朝文类》卷二四。

是年冬,陕西行省的六盘地区(今宁夏固原东南)也发生了叛乱。六盘原是忽必烈子安西王忙哥剌的驻夏地,忙哥剌奉诏出征昔里吉,该地由南平王秃鲁主管。至元十三年春,秃鲁之父诸王禾忽曾在沙州叛乱,失败后奔海都。秃鲁趁关内空虚之机,结诸王拜答寒、伯颜起兵,安西王相商挺、赵炳率军平叛,秃鲁被擒。

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年)初,元军继续追击昔里吉叛军,土土哈率兵过按台山,击败与叛军联结的外剌、宽彻哥思两部。昔里吉败走也儿的石河,脱脱木儿逃至吉利吉思。是年冬,元将刘国杰领侍卫军万人,到达和林附近屯守<sup>①</sup>。元朝政府又牢牢地控制了岭北地区。

十六年四月,脱脱木儿领兵南下,进袭杭海山东。元军主帅别吉里迷失采纳刘国杰的建议,趁其“全军而来,巢穴空虚”,直捣谦河<sup>②</sup>。元军迅速占领谦州,追其众至乌斯,脱脱木儿慌忙回军,叛军在谦河大败,元军“俘获生口畜牧万计”<sup>③</sup>。次年春,脱脱不花、昔里吉等又拥众东来,被别吉里迷失、刘国杰等击败。

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年)叛王内部发生内乱。脱脱木儿由于屡被元政府军击败,不得不求援于昔里吉,昔里吉不应;脱脱木儿又奉撒里蛮为帝,药木忽儿不从,双方激战,脱脱木儿战败,药木忽儿将其俘送至昔里吉处,被杀。撒里蛮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不得不投奔昔里吉,昔里吉将其送至朮赤后王火赤斡兀立处,途中被撒里蛮旧部劫获。后来,撒里蛮重整军队,战败并俘获昔里吉、药木忽儿等,撒里蛮将两人押送至大都。但药木忽儿在途中以贿得释,昔里吉则于至元十九年被忽必烈流放至海南岛,后来死于该地。

昔里吉等的叛乱,破坏了元朝在西北地区的经营和控制。海都利用昔里

① 见阎复:《刘氏先莹碑》,《静轩集》卷五。

② 黄潜:《刘国杰神道碑》,《金华集》卷二五。

③ 同上。



吉叛乱,乘机占领阿力麻里,骚扰天山南北。对此,忽必烈也作了一系列部署。至元十五年初即遣阿老瓦丁部率士兵戍守忽炭(今新疆和田),八月,又在畏兀儿设提刑按察司<sup>①</sup>;同年,遣八撒察里、朵鲁知等掌管别十八里、彰八里(今新疆昌吉)军站<sup>②</sup>。次年,从内地抽调大批军士充实忽炭等地。十七年,忽必烈命万户綦公直戍守别十八里,在别十八里、哈刺火州置北庭都护府及交钞提举司。十八年,綦公直等进入天山南北,进驻别十八里。时元军兵力大增,达十余万人,由诸王阿只吉节制。二十年四月,又置别十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

元军在天山南北的活动引起了海都、笃哇等的不安。至元十八年,元将刘恩进兵忽炭,海都、笃哇遣将玉伦亦撒迎战,被刘恩击败;海都又遣八把率众三万攻忽炭,刘恩寡不敌众,率军退回<sup>③</sup>。十九年,海都见元军已平定昔里吉,乃遣回那木罕等,以谋求和解,但同时又继续进犯忽炭等地。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年),笃哇率兵十二万围和州,对畏兀儿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扬言曰:“阿只吉、奥鲁赤诸王以三十万之众犹不能抗我而自溃,尔敢以孤城撓吾锋乎?”亦都护坚守,城被围六月,后笃哇索亦都护之女撤围而去<sup>④</sup>。时忽必烈已命伯颜代阿吉只总制西北元军,故笃哇不得不撤围退走。

至元二十三年,海都再次发动进攻,与元军相遇于马纳思河(今玛纳斯河),海都设伏于洪水山(今新疆呼图壁县西南),元军中计,綦公直、李进等将领被俘。海都乘胜越彰八里,进入哈密力,畏兀儿亦都护火赤哈兀的斤战死。元军增兵畏兀儿,海都退去。乃再置别十八里、哈密力两地元帅府<sup>⑤</sup>。

西北藩王的叛乱,使忽必烈深深感到必须对东北地区也加以控制。东北

① 《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

② 《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六。

③ 《元史》卷一六六,《刘恩传》。

④ 虞集:《高昌王世勋碑》,《道园学古录》卷二四。按:笃哇攻畏兀儿事,《世勋碑》作至元十二年,屠寄考为二十二年(见《蒙兀儿史记·海都传》)。

⑤ 《元史》卷一四,《世祖纪》一一。

地区原来只置山北辽东道宣慰司,权轻不足以镇摄,至元二十三年改置为东京行省,省治设在咸平府(今辽宁开原北)。忽必烈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的措施,使“东路诸王多不自安”。早与海都有勾结的帖木格斡赤斤的后裔乃颜,纠合合撒儿后王势都儿、合赤温后裔哈丹等于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年)三月,发动叛乱,海都答应率十万军队前来会合。针对东西叛军企图联合的形势,忽必烈一面让伯颜驻守和林,阻止海都军东来,一面亲率政府军镇压乃颜。五月,遣大将博罗欢总探马赤军三千及忙兀、兀鲁、扎刺兀、弘吉剌、亦乞烈思五投下部众先行,又发玉昔帖木儿之蒙古军、李庭之汉军随行。六月,忽必烈与乃颜党塔不台、金家奴军相遇,击退之。元军进至哈刺河,塔不台北逃。时乃颜叛军主力集结那兀江(今嫩江)一带,元军再进,双方激战于不里古都伯塔哈之地(在哈尔哈河与讷墨尔根河交汇处的三角地带),乃颜败绩,元军追至失列门林,俘乃颜,旋处死之。忽必烈返回大都,留玉昔帖木儿消灭残余叛军,势都儿投降,塔不台和哈丹等亦先后投降。

至元二十五年(一二八八年),驻地在哈刺温山(今大兴安岭)附近的诸王火鲁火孙又发动叛乱,哈丹乘机与之联合再叛。四月,忽必烈命皇孙铁木耳率玉昔帖木儿、土土哈、李庭、博罗欢等再往征讨。八月,铁木耳抵达兀鲁回河(今乌拉根河)督师,接着李庭等大败哈丹于贵烈河(今归流河)、托吾儿河(今洮儿河)之间,哈丹逃至边境。后来虽曾多次南犯,终于势孤力单,不能得逞。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年)逃窜高丽。哈丹在高丽胡作非为,给高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苦难,高丽王逃至江华岛。是年底,元将薛彻干、闾里帖木儿等进入高丽镇压叛军。至元二十八年元军在高丽军民的支持下,大败哈丹,哈丹子老的在鸭绿江源战死,哈丹兵败自杀。

忽必烈在平定东北叛王取得基本胜利之后,置辽阳行省统辖诸路,并在叛王封地内设置万户府。这些措施削弱了藩王的权力,巩固了东北地区的统一。

正当乃颜和哈丹在东北发动叛乱时,海都和笃哇的叛乱活动也进一步加紧了。由于伯颜扼守和林,阻止了东西叛王的联结,海都便向西扩张。至元二

十六年(一二八九年)海都与忽必烈孙甘麻剌大战于杭海山,甘麻剌失利,幸土土哈力战,救出甘麻剌。叛军乘胜占领和林。鉴于形势的严重化,是年七月,七十四岁高龄的忽必烈决定调集安童、伯颜、玉昔帖木儿、李庭等各路蒙、汉军再次亲征,海都得知忽必烈亲征,急忙远遁。忽必烈回都后仍由伯颜负责西北军事,镇守和林。至元二十九年(一二九二年)以玉昔帖木儿代伯颜总兵西北,政府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土土哈在按台山俘获海都部民三千余户,进取吉利吉思。至元三十年,政府军进入谦河流域,占领益兰州等地,海都虽多次来争夺,均被击败。到忽必烈去世时,海都的势力已被逐出按台山之外,日益衰弱,平定西北诸王的叛乱基本上已经取得胜利。后来,叛军内部再度分裂,药木忽儿等投降元朝,海都虽多方挣扎,但大势已去,终于在大德六年(一三〇二年)败死,笃哇被迫于大德七年投降。大德十年(一三〇六年)海都子察八儿投降。西北诸王的叛乱到此结束。

忽必烈在位三十多年中,与分裂割据势力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斗争,通过在军事上对叛乱势力的坚决镇压,使得在政治上不断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藩王和割据势力,确实做到了“总揽纲权,则藩镇之祸销矣”<sup>①</sup>。忽必烈镇压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措施,对保持元朝一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了很大作用。

### 第三节 灭亡南宋和建立元朝

#### 一 腐败的南宋朝廷

宋高宗赵构南渡后,南宋统治集团建立了苟安江南的小朝廷。但他们并没有从惨痛的失败中接受教训,而是继续采取对外屈膝求和,对广大人民加紧剥削和镇压的方针,过着纸醉金迷、奢侈浪费的生活。

---

<sup>①</sup> 陈祐:《三本书》,见《元文类》卷一四。

登上皇帝宝座达四十年之久的宋理宗赵昀,是一个昏庸无能、荒淫无耻的君主,“由其中年嗜欲既多,怠于政事,权移奸臣。”<sup>①</sup>朝政先后掌握在史弥远、郑清之、史嵩之、董宋臣、丁大全、贾似道等人手里,其中史弥远执政达二十六年(一二〇七年至一二三三年)之久;内侍董宋臣,人称“董阎罗”;以吹牛拍马受宠的丁大全,与陈大方、胡大昌“人目为三不吠犬”;外戚贾似道,为相十六年(一二五九年至一二七五年)。这一伙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的权臣,置国家和民族存亡于不顾,只知结党营私、招权纳贿、腐化享乐,因此,时人称宦官、外戚、小人为天下之三大患<sup>②</sup>。贾似道执政时,“专恣日甚,畏人议己,务以权术驾驭,不爱官爵,牢笼一时名士。……由是言路断绝,威福肆行。”<sup>③</sup>他不择手段地迫使董宋臣、丁大全的“余党慑伏,惴惴无敢为矣”<sup>④</sup>,对稍有民族气节,主张抗战的官吏,则以最阴险毒辣的手段加以排挤、打击,甚至加以谋害。到度宗赵禔即位后,贾似道更加大权独揽,群臣称他为“周公”,度宗自己也尊称贾似道为“师臣”。

这些权臣都是一些专事搜括民脂民膏、讲求吃喝玩乐的能手。史弥远和他的爪牙们对民间财富的掠夺,简直像豺狼一样贪得无厌,“以服食器用为未足而责之以宝玉珠玕,以宝玉珠玕为不足而责之以田宅契券”。真是“廉耻道绝,货赂公行”<sup>⑤</sup>。贾似道更是过着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生活。他“起楼阁亭榭,取臣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居然“与群妾踞地斗蟋蟀”,连同党也讽刺他不理军国重事<sup>⑥</sup>。甚至为了攫取余玠的玉带,竟发其冢取之。在贾似道的统治下,“吏争纳赂求美职”,“一时贪风大肆”<sup>⑦</sup>。所以,南宋末

① 《宋史》卷四五,《理宗纪》五。

② 《宋史》卷四二四,《洪天锡传》。

③ 《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

④ 同上。

⑤ 真德秀:《召除户书内引札子》,《真文忠公集》卷一三。

⑥ 《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

⑦ 同上。

年,上至皇帝、宰相,下至州县官吏,统治集团的腐败、堕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南宋统治集团为了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同时,为了维持庞大的统治机构和军队,搜括向金国纳贡的巨额“岁币”,对劳动人民进行了极其残酷的剥削。

南宋末年,随着统治集团的政治腐败和日益奢侈浪费,对广大人民的剥削与压榨也日益加紧。南渡初时,东南地区的岁入还不满一千万缗,到了宁宗(一一九五年至一二二五年)时,已岁入六千余万缗,出现了“境土蹙而赋敛日繁”的局面。尽管统治集团加紧剥削,却仍然无法满足他们的挥霍,于是还要向人民“预借”来年两税,“预借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年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有的地方在淳祐八年(一二四八年)就已经“预借”到十四年(一二五四年)的赋税了<sup>①</sup>。

除了正税之外,南宋统治集团还通过各种途径搜括民脂民膏。例如,大量发行会子就是搜括的方式之一。史弥远当政之后,大量印造新会子来兑换旧会子,规定新会子一贯兑换旧会子两贯,而会子的印数愈来愈多,政府向民间籴买粮食、支付茶盐本钱等都是一色的会子,会子充斥于社会之上,而政府却不予兑换,造成了通货膨胀的严重情况。此外,南宋政府和大小官吏还立了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如经总制钱、月桩钱、身丁钱、免丁钱等等,“苛征横敛,无所不有,严刑峻罚,靡所不施,和籴则科抑以取赢,军需则并缘而规利,逃亡强令代纳,蠲放忍至重催;……逋官课者不恤无有,动辄监系。……如此则民安得不怨”<sup>②</sup>。

在南宋统治集团贪婪的压榨下,深受其苦的当然是无地少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地主政权支柱的大地主阶级却乘机大肆兼并土地,大地主阶级通过与大小官吏的勾结,或将大量田税转嫁给“下户”,或以数倍之息的高利贷

① 《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二。

② 《宋史》卷四一九,《徐荣叟传》。

借给农民,或仗势强占,造成小农大量破产。有的大地主“租米有及百万石者”,以至连谢方叔也不得不惊呼:“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当时的情况是:“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民遂无以为生。”<sup>①</sup>

贾似道执政的时候,为了解决财政的困窘,从景定四年(一二六三年)开始制定“公田法”,按官品规定占田限额,以官方名义对土地进行掠夺。按照规定,浙江东西路和江南东西路内官户民户的逾限之田,一律由政府抽买三分之一,每亩收租满一石的给四十贯,不满一石的按比例递减。结果,“稔怨召祸,十有余年”<sup>②</sup>。大地主依然“田连阡陌,亡虑数千万计,皆巧立名色,尽蠲二税”,广大贫苦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鬻妻卖子”<sup>③</sup>。

宋蒙联合灭金后,蒙古的铁蹄开始南下。面临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南宋统治集团的当权者,他们没有也不可能采取积极的抗战措施,而贪求奢侈豪华的生活,却“无异平时”,对于“治兵足食之方,修车备马之事,乃缺略不讲”<sup>④</sup>。“甘弱而幸存”<sup>⑤</sup>,这就是南宋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只要小朝廷还能苟安于一时,只要他们还能过着“无异平时”的奢侈生活,无论什么丧权辱国的事都是干得出来的。因此,长期以来,妥协投降的气氛始终笼罩着南宋小朝廷。在四川坚持钓鱼城抗战的余玠被谢方叔等人逼迫自杀,前线一大批将领投敌,董宋臣主张放弃临安、迁都四明,这一类事件相继发生,就是南宋统治集团主张妥协投降的必然产物。贾似道上台后则完全继承他前任的衣钵,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开庆元年(一二五九年)十月,贾似道任右丞相。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私

①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一。

②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一。

③ 《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二。

④ 《宋史》卷四〇八,《吴昌裔传》。

⑤ 《宋史》卷四三六,《陈亮传》。

与蒙古议和,先是遭到忽必烈的拒绝,他仍不甘心,后因蒙哥死于合州钓鱼城,忽必烈急于北上争权汗位,和议遂成。根据这项秘密协议,南宋称臣,割江南为界,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蒙古军退兵后,贾似道以“再造之功”班师回朝。为了掩盖他那见不得人的可耻条约,他把忽必烈派来践约的使臣郝经长期拘留于真州(今江苏仪征)。

贾似道为了继续推行民族投降政策,接着就对主战的官吏、将领加以打击和迫害。左丞相吴潜被贬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南),曾在潭州、鄂州等地与蒙古军浴血奋战过的将领向士璧、曹世雄以“侵盗官钱”的罪名下狱死。相反,他们对能秉承他们意旨的人却十分重用。

南宋统治集团当权者的昏庸无能、内部倾轧,造成了政治上的极端腐败,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荒淫无耻的私欲,对广大人民贪婪地搜括,造成“人无粒食,万家萧条”的悲惨景象;对外来的强敌,则奴颜卑膝,妄图换得一个苟安的局面。正是由于南宋统治集团本身的腐败,特别是贾似道之流的倒行逆施,大大地加速了南宋的覆亡。

## 二 南宋的灭亡

### 突破襄樊

至元四年(一二六七年),忽必烈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作了长期的备战之后,以宋廷拘囚郝经为借口,举兵南下灭宋。首先攻击的目标就是南宋防御蒙古的最重要据点——襄阳。

襄阳地处汉水中游南岸,与北岸樊城相对,是扼守长江的屏障。金亡后,宋蒙多次争夺襄阳,但自一二三九年孟珙收复襄阳以来,蒙古军一直未能得手。中统三年忽必烈采用南宋降将刘整重贿襄阳守将吕文德、开榷场于樊城的计策,筑土城堡垒于鹿门山,遏制了宋军南北之援。至元四年开始的灭宋战争,也是采用刘整“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如覆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的献策。



至元四年八月,忽必烈命阿朮、刘整攻襄樊,揭开了长达六年之久的襄樊保卫战的战幕。当时,襄樊号称城坚池深,兵储可支十年,两城相为固守,唇齿相依,广大军民以大无畏的气概,决心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所以在战斗的头几年,虽然蒙古军用了筑堡垒、造舰船、练水军、绝援襄粮道等方法,使宋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但始终未能攻下。

至元五年(一二六八年)春,蒙古军以破襄必先破樊,发兵围攻樊城。宋将张世杰与围城蒙古军战于赤滩圃,失败。七月,守将夏贵率舟师来援,袭阿朮军于新郢,又败。秋,贾似道命范文虎来援,至灌子滩,再败。范文虎轻舟脱逃。是年底,襄阳守将吕文德病死,弟吕文焕继为襄阳守将。

至元七年(一二七〇年)春,宋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襄樊。范文虎忌李庭芝战功,致书贾似道:“吾将兵数万人襄阳,一战可平,但愿无使听命于京阕(指李庭芝),事成则功归恩相矣。”贾似道命范文虎从中牵制李庭芝,李庭芝多次要进兵,范文虎却“日携美妾走马击毬军中为乐”<sup>①</sup>,以朝廷命令未到拒不发兵。南宋统治集团竟是如此腐败!

是年底,忽必烈增派史天泽至前线,他采用张弘范计,“城万山以断其西,栅灌子滩以绝其东”<sup>②</sup>,由以堵塞襄阳与外界的联系。于是襄阳的粮援中断。

至元八年夏,各路元军同时包围襄阳。六月,范文虎军抵鹿门,大败,他乘夜逃遁,战舰及辎重全部被元军俘获。

至元九年,襄樊已被困五年,城中特别缺少盐薪布帛。李庭芝屯郢州(今湖北钟祥),知襄阳西北有清泥河,源于均州、房州,于是造轻舟百艘,装载货物,募民兵三千,由民兵部辖张顺、张贵率领,准备冒死突破元军防线,支援襄阳。这是一次极大的冒险,所去者必是九死一生,但三千民兵,人人感奋。至夜,顺流入江,元舟封锁江口,无隙可入,张顺等斩断元军所设铁链,转战一百

① 《宋史》卷四二一,《李庭芝传》。

② 《元史》卷一五六,《张弘范传》。

二十里,元军不敢交锋,黎明抵达襄阳城下,城中军民得知张顺等来到,踊跃过望,勇气百倍。可惜,张顺中箭牺牲。张贵又遣二民兵,泅水去范文虎处,约定郢州发兵夹击。至约定日,张贵率军突破元军防线,不料范文虎失约,张贵中创数十处,被元军俘获,不屈而死。张顺、张贵援襄事迹,十分悲壮,他们虽然牺牲了,但这种斗争精神却一直激励着南宋军民的抗元斗争。

至元十年(一二七三年)正月,元军采用了张弘范绝断襄樊水上联系的策略,又用西域“回回炮”攻樊城,于是樊城陷。守将范天顺战死,牛富率兵百余巷战,兵败投火自尽。二月,吕文焕以襄阳投降元朝。至是,可歌可泣的襄阳保卫战宣告结束。

襄阳保卫战的失败是贾似道妥协投降政策的必然结果。没有广大军民的浴血奋战,襄阳战役是不可能坚持六年之久的。

#### 占领临安

元军占领襄阳后,等于打开了南宋的大门,南宋王朝的崩溃已是无可挽回了。

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年)六月,元世祖忽必烈命伯颜率师伐宋。伯颜分军为二道:一道进犯淮西淮东,指向扬州;一道由他自己率领,沿汉水入长江,并沿江南下,直趋临安。

自襄阳失守后,贾似道继续推行民族投降政策,包庇重用在襄樊战役中怯懦逃遁的范文虎和叛将吕文焕的亲属。面对敌人强大的攻势,他们毫无积极的备战措施。因此,在蒙古铁蹄面前,不是一触即溃,就是叛变投降。只有饱受蒙古铁蹄蹂躏的广大劳动人民,才是抗元斗争的主力军,一部分爱国领袖,在民族矛盾激烈的时代条件和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推动下,也投入了保卫民族生存的反元斗争中去。

由伯颜亲率的一路元军,以吕文焕为前锋,由襄阳顺汉水而下,随即包围郢州,宋守将张世杰在汉水设防坚守,元军由旁近水道绕过郢州,复入汉水,进至沙洋。沙洋守将王虎臣、王大用坚决抵抗,元军用金汁炮焚民房,城破被屠,

于是进围新城。新城守将居谊拒不投降,并射伤前来劝降的吕文焕,后终因寡不敌众,居谊与三千战士全部殉职。

元军入长江后,攻下要塞阳逻堡,宋汉鄂舟师统帅夏贵仓皇逃遁,汉阳、鄂州相继失陷。伯颜派阿里海涯守鄂,并进攻湖南,自率军队沿江东下。黄州(今湖北黄冈)奕喜、蕲州(今湖北蕲春东南)管景模、江州(今江西九江)吕师夔和安庆的范文虎全都不战而降。沿江诸郡都是吕氏的亲属或旧部,也是贾似道重用、包庇过的将领,他们望风而降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许多州郡的人民,仍奋起抗敌,如池州知事逃跑,军民在通判赵卯发率领下,缮壁聚粮以固守,最后壮烈牺牲。

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年)七月,度宗死,全后4岁幼子赵㮮为帝。朝政仍为贾似道控制。十二月,鄂州失陷后,贾似道在朝野舆论压力下,不得已出兵应战。第二年二月,贾似道率诸路精兵13万,“金帛辎重之舟,舳舻衔接百余里”,驻燕湖,与夏贵兵合。同时又遣宋京与伯颜议和,与一二六〇年密约一样,许以输岁币称臣,被伯颜拒绝。贾似道不得不命孙虎臣统领步兵七万驻丁家洲,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自率后军驻鲁港。于是双方发生交战。伯颜分步骑夹岸而进,又用战舰巨炮轰击孙虎臣军,孙虎臣军大溃,逃到鲁港。夏贵见孙虎臣军败,竟不战而逃,元军乘胜追击,宋军大溃,军资器械尽为元军所获。贾似道自鲁港逃到扬州。这次战役后,宋军水陆两军的主力几乎全部丧失了。

贾似道逃到扬州后,上书请迁都逃跑。谢太后(理宗后)不许。元遣使向贾似道索要郝经,贾似道大恐,将郝经遣还。宋廷谢太后命陈宜中为相,陈上书请斩贾似道。谢太后罢贾似道官,贬循州。押解途中贾似道被杀。

元军在丁家洲大捷后,乘胜沿江而下。太平、和州、无为等宋守将纷纷投降。元军直抵建康,宋沿江制置大使、建康守臣赵潛逃跑,建康失守。元兵连取镇江、江阴、无锡、常州、西海州、广德等地。但各地军民仍然英勇抵抗。在无锡,元军遭到当地军民的英勇抗击,抗战军民惨遭杀害;在金坛,金坛人民组

织义勇兵与元军奋战；在常州，元军占领后不久，张世杰即遣刘师勇等攻复，附近诸城纷纷起义，与张世杰会合，直到这年十一月，常州才被元军攻破，守将姚嵩、陈炤、王安节、刘师勇等继续率领军民抵抗，他们坚持巷战，宁死不屈，最后仅刘师勇等八人逃出虎口，全城惨遭屠杀。元军攻占常州后，由阿兰人杭忽思、玉也烈拔都儿等率阿速军驻戍。“民不堪命，宋降将洪福以计乘醉而杀之。”<sup>①</sup>马可·波罗在其《行纪》中也记载此事：“诸阿兰皆是基督教徒，取此城人据之，在城中见有美酒，饮之醉，酣睡如同猪豚，及夜，居民尽杀之，无能脱者。”<sup>②</sup>常州人民杀死元军后，元军统帅伯颜命党项人昂吉儿重新占领常州，擒洪福及董统制、谭正将等宋降将。

临安危急。宋廷不得不发出勤王号召。但响应者甚少，只有张世杰和文天祥等少数宋臣起兵响应。

张世杰，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原是金将张柔部下，张柔降蒙，他投宋，为吕文德部属。在历次战斗中作战勇猛，抗元坚决。鄂州失陷后，他领兵入卫，途中收复饶州。

文天祥，名云孙，字宋端，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以状元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勤王诏下后，他“尽以家资为军费”，领兵至临安，宋廷命其驻平江。时元军已破常州，入独松关，前锋抵达皋亭山（今杭州东北30里）。陈宜中命文天祥弃平江、守余杭。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正月，他被命为临安知府。他建议组织临安城内外二十万军民，由张世杰率领，背城一战，帝后入海逃难。但南宋朝廷无心抵抗，不从。未久，陈宜中逃奔温州，张世杰领兵南下。

至元十三年正月十八日，宋廷遣宗室赵尹甫、赵吉甫等携传国玉玺及降表赴元营，降表称：“痛自贬损，削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北、二广、四

<sup>①</sup> 《元史》卷一三二，《杭忽思传》。

<sup>②</sup> 《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本，上海书店出版社，第三四六页。

川见在州郡,谨悉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不忍臣祖宗三百年宗社遽至殒绝,曲赐裁处,特与存全,大元皇帝再生之德,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志”<sup>①</sup>。伯颜接受了南宋降表,谢后命文天祥以右丞相兼枢密使衔赴元营请和。文天祥与伯颜“抗论皋亭山”,伯颜“怒拘之”,押解至镇江。二月,赵昀正式上表投降,元改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范文虎等人进城接管,元世祖发布文告。至此,南宋灭亡。三月,伯颜入临安,赵昀及全太后,稍后谢太后病愈后都被押送至大都。

### 三 消灭南宋残部

在伯颜占领临安的同时,江东、江西、湖南诸路也多半被元军占领,但是各地的抗元斗争仍在继续进行,其中特别是扬州、潭州、台州等地军民的抗元斗争更是英勇不屈、悲惨壮烈。

守卫扬州的抗元英雄李庭芝,早年曾是孟珙的部下,孟珙死后,在扬州驻守多年。襄阳失守前,蒙古军队曾企图攻占扬州,但李庭芝一面坚壁固堡,招收流民,组织防御,一面修筑民房,免除税役,恢复盐业等生产;襄阳危急时,他曾率军前往支援,却遭范文虎等人排挤、拒绝;襄阳失陷后,元军大举围攻扬州,当时贾似道兵败如山倒,沿江诸郡,或降或遁,独李庭芝坚守的扬州,依旧巍然屹立,元朝派南宋降人前来招降,他一概杀叛焚书,态度十分坚决。临安失陷后,谢太后和赵昀曾两次以诏书命他投降,并无耻地声称:“今吾(指谢太后)与嗣君,既已臣伏,卿尚为谁守之?”<sup>②</sup>李庭芝以射杀来使作为回答。

李庭芝在扬州人民的支持下毫不动摇。当时高邮、宝应、通、泰、真州也都是继续坚守着,并以粮援扬。元军在扬州周围设南北两营,早晚合哨,死死围困,但各地人民仍不顾危险,趁哨过之时,以物资支援守扬军民。元军攻扬主

<sup>①</sup> 《元史》卷九,《世祖纪》六。

<sup>②</sup> 《宋史》卷四二一,《李庭芝传》。

帅阿朮,驱使夏贵的降兵到扬州城下以示夏贵已降,又派使者来招降,被李庭芝杀了;阿朮又奉诏赦他杀使、焚诏之“罪”,劝他投降,又遭拒绝。由于扬州周围州县相继失陷,城内粮尽,“兵有烹子而食者,犹日出苦战”,斗志仍然十分昂扬。

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七月,益王赵昀诏李庭芝南下会合。李庭芝命朱焕守扬州,自率七千军队经泰州入海。不料,朱焕以城投敌,李庭芝等被围于泰州,被捕牺牲于扬州。

其他各地人民的抗元斗争也在继续坚持着,并给予元军以沉重的打击。

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年)三月,元军阿里海涯攻占岳州(今湖南岳阳)后,沙市人民死守小城,城破被屠。次年正月,潭州守将李芾率领军民奋起抗敌,经过激烈搏斗后,城被陷,李芾等英勇牺牲。

在广西,当地汉族和少数民族军民团结起来,保卫家乡。邕州(今广西南宁)知州马瑱率所部及诸峒兵守静江(今广西桂林),元兵攻了三个月,前后百余战,守卫的将士“死伤相籍,迄无降意”,阿里海涯、忽必烈前后以高官厚禄引诱马瑱,均遭拒绝。外城破,马瑱又率战士守内城;再破,巷战而死。其部将娄玘辖还死守月城十余日,最后自燃火,二百五十名战士与月城同归于尽。静江人民也遭到残酷屠杀。

在两淮,自从夏贵投敌后,两淮人民奋起抵抗。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年)四月,淮人张德兴等起兵反元,据野人原、司空山(均在今安徽潜山县),收复黄州、寿昌军,势力波及湖北,并打死了镇压起义的叛将郑鼎。起义一直坚持到是年九月才失败。

四川军民从一二三四年蒙古入境,到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年)合州失守,进行了四十多年的艰苦斗争。一二五九年,蒙古合诸道兵攻要塞合州,被击退。中统四年至至元元年(一二六三年至一二六四年),合州守将张珪组织了多次反攻,痛击敌人。至元四年(一二六七年),蒙古军数万人进攻合州,也为守军击退。以后又长期牵制了一部分蒙古军队,支援了襄阳的保卫战。到

至元十二年之后,元军在击败了南宋主力之后开始大举进兵四川,并包围重庆。张珏等率兵支援,并重创敌军。到至元十四年后,四川许多州郡在顽强抵抗之后,相继失陷。至元十五年,元军攻陷重庆,张珏率军巷战,不支,以小舟走涪州,不幸被捕,在解送元京途中自缢殉职。

临安投降前夕,恭帝赵昀异母兄益王赵昰、异母弟广王赵昺逃到温州。至元十三年五月,陈宜中、陆秀夫等拥赵昰在福州即位,建元景炎,是为端宗。文天祥在被元军押送至真州途中脱逃,经高邮航海至温州,旋即赶去福州,被赵昰任命为右丞相,与张世杰、陆秀夫等抗元将领会合在一起。当时,元军已占领广州,李庭芝等所固守的两淮地区已经沦陷,四川张珏等所固守的重庆地区也陷入重围,元军对南宋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但文天祥仍抱着“但今身未死,随力保乾坤”的决心,竭尽全力以图收复失地。

这年冬,文天祥率军入赣,相继收复宁都(今江西宁都)、雩都(今江西于都),江西许多地方起兵响应,一时军心大振。但是浙江与福建方面的战事却十分不利。十一月,宋福建招捕使王积翁叛于福州,赵昰由海道欲走泉州,泉州为宋朝重要外贸港口,设市舶司,回回商人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sup>①</sup>宋授以闽广招讨使,但他早存降元之意。赵昰欲入泉州,寿庚闭门三日,不予接纳,张世杰又以船只不够,夺蒲氏船舶及资财,寿庚被激怒,杀泉州赵氏宗室、士大夫及淮兵数千人,陈宜中、张世杰只得奉赵昰离福州后去潮州(今属广东)。十二月,蒲寿庚与知泉州田子真正式以城降元。

至元十四年,文天祥、张世杰等在江西、广东等地与元军激战。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人民纷纷起兵配合。前述淮人张德兴等起兵克服黄州、寿昌军,衡山赵璠、抚州何时等也起兵响应,特别是福建的农民起义领袖陈吊眼、许夫人等,率领汉、畬各族人民,也投入了反元斗争,使南宋的兵势稍有振作,给元军以不小的打击。许多抗元军民,继续写下了壮烈的诗篇。例如至元十

<sup>①</sup> 《宋史》卷四七,《瀛国公附二王纪》。



二年(一二七五年)元军破饶州(今江西波阳),宋前左丞相赵万里被执,声言“吾宋臣,宜当死于宋土”,<sup>①</sup>与子镐等赴水死。福建兴化(今福建莆田)的军民在守吏陈文龙率领下,拒绝元军招降,斥责劝降的叛徒,发动民兵固守小城,城破被捕,不食而死。他的儿子陈瓚又召集义兵 500 人响应张世杰,攻复兴化,坚持了七个月之久,在重创来犯的敌人之后,又进行了巷战,最后壮烈牺牲。是年底,赵昀自潮州逃至陆丰甲子门时宋军与元军争夺广州。次年,赵昀等移驻今香港的官富、古墟、浅湾等地,因无法入广州,故在香港驻蹕达 10 个月之久。十二月,赵昀逃至香山井澳(今珠海大横琴岛),在谢女峡(今珠海小横琴岛)败元军。

陈宜中力主走占城,为诸臣所反对,宜中遂独走占城。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年)初,赵昀逃至硃州(今广东湛江硃州岛)。四月,赵昀死,赵昀即位,及至翌月,改年号为祥兴元年。六月,移驻广东新会海中厓山,元遣张弘范率水陆之师 2 万南下,沿海漳、潮、惠、潭、广、琼诸州相继被陷。十二月,文天祥被捕于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张弘范等千方百计要使文天祥投降,均遭文天祥严词拒绝,并在招降书上留下了不朽的诗篇——《过零丁洋》,最后两句曰: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后来张弘范不得不把他押送至大都,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年)正月,文天祥被杀,死时仅四十七岁。他在临刑前作赞词一首:“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sup>②</sup>

至元十五年底,元江东宣慰使张弘范率舟师自漳、潮,江西行省参政李恒以步骑出梅岭向南宋残余势力发动进攻。十六年初,元军抵厓山,张世杰联结战船千余作水砦,为死守计。元军封锁海口,宋军被困,士兵舀海水解渴,纷纷呕吐。元军用火攻,被宋军击退。二月初六,元军发起总攻,突破宋军阵角,宋

<sup>①</sup> 王天策:《宋丞相江文忠公墓碑记》,载《同治都昌县志》卷一二,《文录》。

<sup>②</sup> 《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

军大败。陆秀夫见不可逃脱,抱卫王赵昺投海死。宋将士家属纷纷投海殉难。张世杰拥杨妃冲出重围,准备招集旧部,找寻赵氏后裔,再图恢复。不幸遇飓风,战船覆没,溺死在平章山下。南宋的残余部队最后被元军消灭。

#### 四 建立元朝

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年)十一月,在进攻南宋取得不断胜利的形势下,忽必烈在谋士刘秉忠、王鹗等人协助下,宣布建“大元”国号。

忽必烈夺取汗位后,即以中统为年号,这是他沿着“汉法”的道路前进的重要标志。使蒙古政权逐步改造为采用中原地区固有统治方式的封建政权,这是有很多阻力的。忽必烈平定阿里不哥的叛乱,不理睬西北藩王的指责,击败海都叛乱,都是对这种阻力的清除;镇压李璫之叛,则避免了北方地区的再一次分裂,巩固了蒙古统治者和北方汉族地主的联合。这些,都为忽必烈按照中原地区的封建王朝的标准建立一个新王朝奠定了基础。

忽必烈在他发布的《建国号诏》中宣称:

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为国,不以义而制称。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

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国,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輿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sup>①</sup>

---

<sup>①</sup>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这份诏书是说明元朝政权性质的非常重要的文件。它明确地把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看作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继承,尧舜禹汤、秦汉隋唐的继续,所谓“绍百王而纪统”即是;它又把从元太祖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自己的统一事业看作是“历古所无”的“大业”,这些业迹是古代任何一个君主无法比拟的,因而用“蒙古”这个民族的名称已经不足以表示新王朝的含义,“昔之为有国者,或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之封,为不足法也,故谓之‘元’焉。元谓之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因此,“大元”国号的建立是全国大统一的重要标志。

元朝的建号不仅使忽必烈推行“汉法”更加坚定不移,而且也为忽必烈统一全国减少了民族隔阂的阻力。忽必烈对南宋的战争,不再是成吉思汗初起时那种血肉复仇战争和“各分地土,共享富贵”的掠夺性民族战争了,而是封建统一战争。

忽必烈在建立元朝过程中,政治中心逐步南移。至元元年(一二六四年)时,忽必烈将开平称为上都,燕京为中都;四年(一二六七年)于中都之东北重建新城,并迁都于此。九年(一二七二年),中都改称为大都,从此,大都真正成为全国各民族的政治中心。

## 五 元朝统一全国的意义

蒙古灭金后,经过长达四十年的蒙宋战争,终于由忽必烈最后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实现全国统一,这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当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腐败无能的南宋统治集团根本不可能担负起统一全国这一历史任务。忽必烈作为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在政治上主张改革,抛弃蒙古旧制,坚持统一,是比较有力量、有生气的,因此得以最后完成统一全国的重任。实现国家的统一,这是历史前进的需要。元朝统一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证明由元代宋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历史的倒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我国这个民族大家庭里,除了汉族以外,还有

其他许多少数民族。因此,在漫长的历史时代里,不能认为汉族才可以成为全国的统治民族。然而,忽必烈既是一个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又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者,他不可能用平等联合的办法来使全国统一,而只能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政策,通过战争的手段,去实现和巩固这种统一。所以,我们肯定元朝统一对祖国历史发展的作用,并不是肯定蒙古统治者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政策。同样,“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sup>①</sup>。各族人民反对蒙古统治者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反对蒙古和元朝军队的军事占领,都是正义的。文天祥等南宋将领的抗元斗争也是正义的,因为在反对外来民族压迫上,文天祥维护了民族利益。但是,我们肯定他反元斗争,并不是肯定他忠于腐朽的南宋小朝廷和地主阶级的忠君思想。元朝统一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必须辩证地加以说明。

元朝的大统一虽然是蒙古贵族通过军事征服来完成的,但是,它在中国历史上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元朝的大统一使我国历史上较长时期的分裂割据局面结束了,并为元朝以后的历史发展及统一主流奠定了基础。

自从唐末藩镇割据以来,我国先后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分裂,辽、宋和金、宋的对峙,西夏、蒙古、高昌、哈刺汗朝、西辽、大理、吐蕃等民族政权的并存,这种分裂的局面达三四百年之久。这种状况是不符合历史发展需要和各族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的,也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继续发展。到了忽必烈统治时期,各地分裂政权先后被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元朝所消灭,这是与当时全国各族人民联系日益紧密的客观趋势相适应的。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sup>②</sup>,为祖国今天辽阔的版图奠定了基础。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七页。

②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

元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十分巩固,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地区的联系非常密切,这就使祖国统一的历史发展主流在今后六百年中起了主导作用。

第二,元朝的统一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发展,祖国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文化的创造,都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斗争的结果。毛泽东同志说:“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sup>①</sup>。元朝的统一,为各族人民之间更大规模的融合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使他们在共同的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共同的生产斗争中,进一步密切了原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

元朝时,由于在全国范围内打破了此疆彼界,居住在北方的契丹人、女真人与汉族的融合进一步得到加强,不少蒙古人和色目人(包括畏兀儿人和西域各部人)由于留居中原地区,生活、风俗习惯,有的甚至连姓名也与汉人相同,还出现了一批用汉文从事著作的文学家、艺术家、历史家、科学家;许多著名的汉文著作被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少数民族的著作也被介绍到内地来,徙往蒙古、河西、云南、东北等地的汉族军民,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对于祖国边疆的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少数民族的许多生产技术,如蒙古族的毡罽术(织造地毯),畏兀儿族的丝织术、酿酒术,藏族的建筑艺术,都传到了内地,促进和提高了中原地区这些行业的技术水平。

第三,元朝的统一为祖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由于元朝实现了全国统一,因此,元代辽阔的疆域、中央集权的有效统治、遍布全国的驿站制度,都成了元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天文、地理、水利等学科,如果没有上述条件,要取得高度发展是有困难的。杰出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利用这些条件,开展了世界天文史上规模空前的实测活动,从北

---

<sup>①</sup> 《论十大关系》。

纬65°的北极圈附近到北纬15°附近的占城,每隔10°设一个观测站,共设立了二十七个观星站,终于编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也是最科学的《授时历》。河流的探索、《元一统志》的编纂,以及航海、气象、水利等方面成就的取得,都是与元朝实现全国大统一的条件分不开的。

第四,元朝的统一还大大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外交通。

蒙古贵族向外扩张和各汗国的建立,客观上打通了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交通,元朝与各汗国的往来十分频繁,与欧洲、中亚、东南亚各国的联系也很多,中国的航船一直到达非洲,我国的印刷术、火药、造纸术、指南针,大都是在这个时期传入欧洲的。中国的商品远销世界各地。来自欧洲、非洲、亚洲各国的客人,在中国长期居住,回国后又把中国的情况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外国的许多科学文化也传到了中国。中国人民在元代时对世界的了解比过去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 第四节 行政建制和军事制度

### 一 行政机构的设置

大蒙古国据有中原之后,由于实际统治的需要和汉文化的影响,陆续在那里创置了若干行政机构和有关制度。但是总的说来,它对该地区的统治方式,基本上是保持着游牧国家对被征服的定居农耕区实行间接统治的格局。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这种局面才获得根本的改变。他借鉴金代制度,在以“藩邸旧臣”为核心的中原知识分子参议下推行“汉法”,同时又部分地保留能充分保障蒙古贵族特权地位的种种制度,在北中国恢复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官僚制统治体系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中统、至元间的创置,奠定了有元一代之制。

#### 中央机构

元朝中央一级的机构,主要是由“总政务”的中书省、“秉兵柄”的枢密院

和“司黜陟”的御史台组成的。

唐代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共掌天下军国大计。宋承唐制，仍立三省，但门下、尚书二省几为虚设，即使中书省，其权限亦已止于政务而已，军权和财权分别归枢密院、三司辖理。金正隆元年（一一五六年）罢中书、门下二省，止置尚书省，领六部，以全国政务悉归之<sup>①</sup>。元代的中书省，从性质上说，相当于金尚书省。

按《元史》记载，窝阔台三年（一二三一年），“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sup>②</sup>。根据同时代人彭大雅的北使记录，窝阔台时“其相四人，曰按只觶，曰移刺楚材，曰粘合重山，……曰镇海”<sup>③</sup>。按只觶被窝阔台封为“众官人每”之长<sup>④</sup>，当即成吉思汗时代失吉忽秃忽及蒙哥时代忙哥撒儿所担任的大断事官，所以彭大雅称之为“相”；至于耶律楚材和镇海的职务，则是协助按只觶处理国事，分别主持行于汉人和行于回回人的文书事宜，他们的真正身份，是必阁赤<sup>⑤</sup>。蒙哥汗时协助忙哥撒儿、专掌“宣发号令、朝觐贡献及内外闻奏诸事”的必阁赤长孛鲁合<sup>⑥</sup>，在《元史·也先不花传》中也被称为中书右丞相。可见蒙古国时期所谓中书省，不过是汉人以必阁赤机构的职能比照古代中原官制而给予的汉称而已<sup>⑦</sup>。而这时大蒙古国真正的行政中枢即大断事官府署，似被汉人参照金制而比拟为尚书省。

① 《金史》卷一五五，《百官志》一。

② 《元史》卷二，《太宗纪》。

③ 《黑鞑事略》。

④ 《元朝秘史》第二七八节。

⑤ 《黑鞑事略》。

⑥ 《元史》卷三，《宪宗纪》。孛鲁合子也先不花袭父职为必阁赤长。卢布鲁克亦称孛鲁合为“大书记官”，见《卢布鲁克行纪》，柔克义英译本，页一六八。

⑦ 如《通典》卷二一，《职官三》“中书省”条，魏晋时中书监令之职为“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典作文书”。



中统元年(一二六〇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即汗位。次月即立中书省<sup>①</sup>,以吏、户、礼合为一部,称左三部;以兵、刑、工称右三部。七月,又立燕京行中书省,以禡禡为丞相,以省官王文统、赵璧等兼职行省<sup>②</sup>。这时,总领汉地政事的实际责任,主要是由燕京行省担负。中统二年,燕京省官奉诏率诸路宣抚使赴开平申报钱谷大计,并得预议朝政。该年在充实中枢同时,分定了中、行两省各自人选。大约中统三年前后,燕京行省遂合并于中书省而不复存在<sup>③</sup>。

据后来的定制,中书省以皇太子行中书令,设右丞相、左丞相各一员,平章政事四员,右、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蒙古之俗尚右,故以右丞相、右丞居上。自中书令至参知政事都称为宰执。中书省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设尚书三员、侍郎二员。

枢密院是在平定李璫之乱后设立的。忽必烈鉴于诸侯尽专兵民之权的弊害,采取断然措施,罢世侯、置牧守、军民分职。中统三年末,诏“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sup>④</sup>。明年五月,即立枢密院以统兵,除四怯薛由天子或其亲任大臣节制外,“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凡宫禁宿卫、边庭军翼、征讨戍守、简阅差遣、举功转官、节制调度,无不由之”<sup>⑤</sup>。置院之初,设有院使(由皇太子兼任)、副使、佾书枢密事等职,后来在副使之上设知院、同知,佾枢之下设同佾枢、院判,名额不定。自置院之始,四怯薛即各出代表一名,参与院议,中书省自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年)后亦派平章政事二人参决院事。

---

① 唐宋时代的三省至金而仅余尚书一省。元代亦止置一省,惟其名称改易为中书省。恐怕这正是因为尚书省在这之前业已成为大断事府署的汉语对译专名。所以忽必烈要为其中枢机构另择名称,以示其更新制度之意。

② 据王恽《中堂事记》,禡禡最初“越用行六部于燕,至是(指燕京行省设立时)就用为行省长官”。据《元史》卷五《世祖纪》二,他在中统三年曾任中书平章政事。但卷一一二《宰相年表》将禡禡著录为中统元年中书省右丞相,似以其任行省丞相故误置。

③ 前田直典:《元朝行省的成立过程》。

④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⑤ 《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

督察机构御史台建于至元五年。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二员,其下为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各二员。御史台直属机构有殿中司、察院,还有内八道肃政廉访司。殿中司掌朝仪、殿中纪律及在京百官到任假告等事故。察院置监察御史三十二员,“做贼说慌见的眼、听的耳朵么道有来”<sup>①</sup>。肃政廉访司元初称为提刑按察司,这个名称来源于金代审察刑狱、监督吏治、兼管劝农的各路按察司(原称提刑司)。作为地方上的督察机构,肃政廉访司自元代起始被纳入御史台系统,其巡视地区划分为跨路分甚至跨行省的诸“道”,分别隶属于中央御史台或者行台,由此构成全国范围的垂直监察系统。明代以十三道监察御史直隶都察院,实际上就是对元御史台(行台)——肃政廉访司督察体系的因袭变通<sup>②</sup>。内八道的督察地区主要是腹里、辽东以及两淮。诸道肃政廉访司均设廉访使、副使、佥事等职。各道留正使二员守司,其余以每年八月为始,分行本道各地区,至次年四月还司,分类综合当奏言诸事,遣正官一员赴台会议闻奏<sup>③</sup>。廉访司的职责是纠察百官非违、政治得失,照刷案牘文卷,并负责复按各路已结案件。凡遇重刑,必须当面复审查实,方能移文本路总管府结案,申部待报;如有冤情,则须重新审理<sup>④</sup>。凡有诉讼,先从本管官司自下而上依理陈告,如不服判决,亦许赴廉访司陈诉<sup>⑤</sup>。对于违错、犯罪官吏,轻者罚俸,重者断罪罢官。对五品以上官员的处理须经御史台闻奏,六品至九品官由御史台(或行台,详下文)断决,受省劄人员则由廉访司区处<sup>⑥</sup>。

① 《元典章》卷五三,《刑部》一五,《称冤赴台陈告》。

② 明代在各省另设提刑按察司,主管一省司法。从继承关系中可以更明确地看出,由宋、金到明清,地方监察机构是怎样从提刑司、按察司或提刑按察司中独立出来,而后者又是怎样逐步发展为以监察刑名之事为主的司法机构的。

③ 《元典章》卷六,《台纲》二《察司巡按事理》。

④ 《元典章》卷六,《台纲》二《察司体察等例》。

⑤ 《元典章》卷四,《朝纲》一《省部减繁格例》。

⑥ 《元典章》卷五,《台纲》一《行台体察等例》;卷六,《台纲》二《违错轻的罚俸、重要罪过》。

元世祖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把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时人叶子奇在《草木子》中引用忽必烈的话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sup>①</sup>

此外元廷以“理财助国”<sup>②</sup>为施政中心,曾于至元七年至九年、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至大二年(一三〇九年)至三年三次设立尚书省综理财用,以六部及天下行省归隶之。置尚书省期间,虽然在中央仍保留中书省建置,但政柄悉归尚书省、中书省臣备员而已。

元代比较特殊的中央机构,还包括蒙古翰林院及其所属蒙古国子监、掌管回回历法的回回司天监、管也里可温的崇福司等。主持全国释教及吐蕃地区军、民之政的宣政院,由于职掌的特殊性,从用人等方面而言,成为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并列的四大军政系统之一。蒙古国时期置札鲁忽赤治天下刑政,随着元朝国家机器的完备,又设大宗正府为札鲁忽赤官署,但它与其他朝代以专掌皇族事务为基本职能的宗正机构不同,主要治理诸王、驸马投下的蒙古、色目人刑名词讼等事,时而兼理汉人刑名。蒙古统治者在对宗亲的奉养等方面,制度与汉俗不尽相同。因此,元代管理皇室和贵族供奉等事的官衙,亦包括许多特殊机构。如掌营盘纳钵、标拨投下草地并治理有关词讼的经正监,如为中宫从事织染、杂造的管理诸路怯怜口民匠都总管府,掌成吉思汗大斡耳朵位下怯怜口诸务及内府供亿的中尚监,掌武宗五斡耳朵户口、钱粮、营缮诸事的长秋寺,等等。

#### 地方机构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是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元人说:“国制,中书总庶政,是为都省。幅员际天,机务日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若稽古制,魏晋有行台,齐隋所管置外州称行台尚书省,唐以诸道事繁,准齐分置,今行

①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

② 语见郑元祐:《岳铉行状》,《侨吴集》卷一二。

省,其遗制也”<sup>①</sup>。不过元代的行省,毋宁说是金朝遗制的变更。

金代尚书省宰相或执政官<sup>②</sup>被派到地方上行使尚书省职权时所设立的临时建置叫行尚书省。金代后期出于抵御蒙古的军事需要,曾遍置行省于各地,但它始终属于权宜建置。自成吉思汗南下侵金起,蒙古人也采用金的行省官称,授之于降附他们的中原地主武装头目。故凡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往往称行省或行台。但当时未有定制,迭为废置。忽必烈即位时,置十路宣抚司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同时以都省官行某处省事系衔,派到各地行使中书省的职权,设立了不少行省机构。但这时的行省仍属于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大约在至元二十年前后,由于以宰执行某处省事系衔嫌于外重,因此改为某处行中书省平章或右丞、左丞、参知政事,而不再以都省官系衔。于是,行省就从都省派出机构逐渐演变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sup>③</sup>。每省置丞相一员(例不常设),平章二员,品秩比中书省低一等;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品秩与都省官相同。各省的政务需要通过中书省进行协调统一或向皇帝报告。因此行省与都省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从属关系。

至元二十七年,元廷在全国范围调整行省建制,除中书省直辖山东、山西、河北等地以外,全国分置十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sup>④</sup>。中书省直辖地区称为腹里。管理腹里地区有关事务的许多专门机构,如负责掌管腹里各种制作业的局、所、场,都直接由中书省下属的六部隶领。

中书省和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依次为路、府、州、县。路设总管府。有达

---

① 许有壬:《河南省左右赞治堂记》,《圭塘小稿》卷八。

② 金制以尚书令、左丞相、右丞相、平章政事为宰相,左、右丞、参知政事为执政官。

③ 《元史》卷九一,《百官志》七。

④ 此外还有高丽行省。高丽行省情况比较特殊,与其他作为中央直辖行政区划的行省性质不同。

鲁花赤、总管,是为长官;有同知、治中、判官、推官,是为正官;还有总领六曹、职掌案牘的首领官(经历、知事、照磨)<sup>①</sup>。府有达鲁花赤、知府或府尹;有同知、判官、推官;有知事等。有的府隶诸路,也有的直接隶于行省;有的统州县,也有的不统州县。州有达鲁花赤、州尹或知州,以及同知、判官等官。有些州直隶于路或行省,有的州不统县。县有达鲁花赤、县尹等官,有些县直隶于路或府。边远地区还有“军”的建制,品秩及设官置吏皆如下州。路治所在的都市,设一个或几个录事司(大都、上都设警巡院),管理市镇居民。司置达鲁花赤、录事、录判等。各级行政官员的任命权都在中央,只有属于投下的州县,其达鲁花赤一职,由领有该地的诸王、贵戚或勋臣任命。

在远离行省中心的地区,又分道设立宣慰司,就便处理军民之务。“其与职民者省治之,职军者院临之”<sup>②</sup>,兼有行省派出机构和介乎省、路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的职能。因此,《事林广记》在列举天下路府州县时,将它们分为直隶某行省“所辖”或由某道宣慰司“所管”两种情况,以此区别这两类略有不同的隶属关系<sup>③</sup>。边陲民族地区的宣慰司、宣慰司都元帅府及其所属的路府州县或安抚司等机构,往往参用当地的土官任职。

枢密院和御史台在地方上也各有自己相应的分设机构。行枢密院简称行院,是专为征伐之事而设置的,有时虽亦掌管民事,但主要以征伐或镇抚为目的。元朝进攻南宋时设立过不少行院,以后或废,或并于行省。武宗后,元廷曾先后设立过甘肃、河南、岭北等行院。行御史台简称行台。忽必烈时先后立江南行台(简称南台)和云南行台,成宗时徙云南行台于陕西(简称西台)。南台辖察院和十道肃政廉访司,其监察地区主要是江南、湖广;西台辖察院和四道肃政廉访司,监察地区主要是陕甘、四川、云南。南台和西台品秩与中央御

① 关于首领官,见郑玉:《送郑照磨之南安序》,《师山集》卷三。

② 姚燧:《奎章阁记》,《牧庵集》卷七。

③ 参见《事林广记》前集卷四,“天下城邑”条。

史台(内台)同。

### 基层行政设施

元代社会的基层行政设施,是通过社制和坊、里制的推行而确立起来的。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社一方面具有以自然村落为基础而结成的民间乡村组织的性质,同时也长期被封建国家利用,成为农村中的基层行政设施。隋开皇五年下令在各地建立义仓,因为它设在村社中,由当地选人管理,所以名为社仓<sup>①</sup>。至元七年初,元朝在北方各地农村推行社制<sup>②</sup>,几乎与此同时,在真定等路分的城镇也建立了社制。半年多之后,又下诏在华北各路“州县在城关厢见住诸色户计”中全面实行社制<sup>③</sup>。灭南宋、统一全国后,元政府又进一步将社制推行到江南一些地区的城乡。

根据至元时候颁布的立社条例规定,以五十家为一社,一村五十家以上者,只为一社;增至百家者,则增设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附近村落相并为一社;地远人稀无法相并者,亦许各村自为一社。立社之初,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劝农,并戒饬游荡、防察奸非,所以规定应推选“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为社长。条例并规定每社立义仓,以社长主之。南方农村的社,可能比北方大一些。如镇江路所属丹徒、丹阳、金坛三县,每社约合一百二十户。江南城关的社又比农村更大。镇江路录事司治下,每社约合四百五十户<sup>④</sup>。

除社以外,另一个系统的社会基层组织,是按农村中的乡、都以及城关中的隅、坊来编制的,可以合称为坊(指隅坊)里(指乡都)制。

在农村,许多地方以乡统都。“每乡所辖都分不等,其中为里、为村、为保、为坊,皆据土俗之所呼以书。”<sup>⑤</sup>其初,“乡设里正,而都设主首。后以繁剧

①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② 《元典章》卷二三,《户部》九,《社长不管余事》引至元七年二月《劝农条画》。

③ 《通志条格》卷一六,《田令》,《立社巷长》。

④ 杨讷:《元代农村社制研究》,《历史研究》一九六五年第四期。

⑤ 《至顺镇江志》卷二。

难任,每都设一里正,主首则随其事之难易而多寡之”<sup>①</sup>。有些地方甚至只设里正,未设主首<sup>②</sup>。事实上,不见得在各地都存在以乡统都这样两种层次,可以认为乡、都基本上是属于同一个层次的基层行政设施。

隅、坊之间的关系与乡、都相似。有的城关隅下分若干坊<sup>③</sup>,有的城关仅分为若干隅或若干坊<sup>④</sup>。也有的城关不称隅、坊而称乡、里,如嘉兴路录事司治下分为五乡,共管十七里<sup>⑤</sup>。隅、坊设隅正或坊正。

元代坊、里的规模究竟有多大,由于资料缺乏,无从确切知晓。惟各地具体情况不同,差异也一定不小。据《至顺镇江志》载,丹徒、丹阳、金坛三县土著户共九〇、〇〇二户,三县都、里、村、保凡四百七十个,则平均每里(都、村、保)有一九〇户<sup>⑥</sup>。

充任里正、坊正和主首,属于当役性质。其人选产生的原则是按田地资产的多寡而摊派。据皇庆元年(一三一二年)规定:“粮多极等上户殷富者充里正,次等户充主首,斫力挨次,周而复始”<sup>⑦</sup>。《永乐大典》所录《古藤志》称,至正八年(一三四八年)左右,广西藤州一带规定,有田一千亩的民户,“应当里正一季,自上而下,周而复始”<sup>⑧</sup>。同书又录《吴兴续志》说,元代里正、主首“以田及顷者充”<sup>⑨</sup>。又据《至元新格》,里正等“从各路总管府拟定合设人数,其令司县选留廉干无过之人,多者罢去”<sup>⑩</sup>。可见各地里正人选的确定与摊

---

① 《正德兰溪县志》卷二。转引自梅原郁:《元代差役法小论》,《东洋史研究》卷二三,第四号(一九六五年)。

② 见《永乐大典》卷二二七七引《吴兴续志》。

③ 例如四明城,见《至正四明续志》卷三。

④ 例如镇江路治及三县县城,见《至顺镇江志》卷二。

⑤ 《至元嘉禾志》卷三。

⑥ 未将客户计入。

⑦ 《元典章》卷二六,《户部》一二,《编排里正主首例》。

⑧ 《永乐大典》卷二三四三。

⑨ 《永乐大典》卷二二七七。

⑩ 《通制条格》卷一六,《田令》,《理民》。



派,还受到路、县地方官的干预,并不完全是“令人户自行共同推唱供认”的<sup>①</sup>。里正、坊正和主首的责职,主要是催输税粮、科差,督促徭役,追会公事;同时他们还有责任维持地方的道德教化,监督、防范和压制人民的反抗。

坊里制和社制推行之初,属于两种不同系统的基层设施。但在实行的过程中逐渐合二而一了,社长常常变成里正的助手。元政府虽然三令五申:“社长近年多以差科干扰,今后催督办集,自有里正、主首,使专劝农,官司妨废者从肃政廉访司纠弹”<sup>②</sup>。不过从此类规定看来仅是具文。因此,明代人在追溯元朝的坊里制和社制时,便已经将它们合称为“里社制”了<sup>③</sup>。

元代社会基层,除实行坊里制和社制外,偶然还有甲制的存在。至元十三年,陈天祥在兴国(今湖北阳新)“命以十家为甲,十甲有长,弛兵禁以从民便”<sup>④</sup>。元兵入吴县后,“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为甲主”,当时不隶于甲下的仅为舟人(船户)以及娼优、隶卒、僧道等<sup>⑤</sup>。这大概是在局部地区按十进制的军队(军户)编制方式组织民户的临时性措施。成宗时曾有人建议每社立保甲,但这个主张并没有被元廷采纳<sup>⑥</sup>。

## 二 军事制度

关于元朝的兵制,当时人胡祇遹曾经评论说:“本朝最偏重者无若军政,最纷乱者无若军政”,“大无纲统,细无纪目。……分隶频碎,源委隔绝,棼丝沸羹,互相争夺。内立枢府兵部,无簿籍之可寻,外设行省、统军万户府,无一定之行伍”<sup>⑦</sup>。足见其繁复和混乱。蒙古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对军权

① 《元典章》卷二六,《户部》一二,《编排里正主首例》。

② 《元典章》卷二三,《户部》九,《社长不管余事》。

③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④ 《元史》卷一六八,《陈天祥传》。

⑤ 徐大焯:《烬余录》乙编。

⑥ 《元典章》卷五一,《刑部》一三,《社长觉察非违》。

⑦ 胡祇遹:《军政》,《紫山集》卷二二。

尤其重视,控制最为严密。凡涉及军机重务,汉人往往不能与闻。“天下军马总数目,皇帝知道,院官(指枢密院官)里头为头儿的蒙古官人知道;外处行省里头军马数目,为头的蒙古省官每知道。”“更这边关机密,不合交多人每知道”<sup>①</sup>。制度本身的混乱加上人为保密所造成的材料限制,对于后人研究元代兵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有许多问题目前还无法澄清。本节着重介绍元代的宿卫和镇戍诸军、军户和奥鲁制度。至于与兵制有关的站赤、屯田和马政等问题,将在元朝经济等章节中另述。

### 宿卫和镇戍制度

元代的军事防卫可以分为两大系统,即保卫皇帝和京畿(大都及上都)的宿卫系统和镇守全国各地的镇戍系统。

宿卫军队由怯薛军和侍卫亲军构成。

从成吉思汗时代起,怯薛军就不仅是大汗的护卫军,同时又是侍奉大汗日常生活的役属机构,还兼有协助大断事官听断公事的国务处理机构的职能。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基本上保留了成吉思汗以来四怯薛三日一更、轮番入卫的制度。惟领第一怯薛的博尔忽早逝,子嗣尚幼,成吉思汗即以自己的名义领之,称“也可怯薛(译言大怯薛)”。博尔忽后人在元代改领第四怯薛。第四怯薛原来由赤老温掌领。《元史·兵制》说“赤老温后绝”,但据虞集《孙都思氏世勋碑》,赤老温有子纳图尔、阿剌罕,阿剌罕后人为阔端子只必帖木儿王府怯薛官。未详赤老温家族何以未得世领第四怯薛。《元史·兵制》所载四怯薛番值日支,乃至元后期的定制<sup>②</sup>。

怯薛成员称为怯薛歹。怯薛歹不仅是指环卫宫禁的武装卫队,还包括在内廷执役的亲信侍从,同样领属于怯薛之长。董文忠居于禁中,“凡乘舆、衣

<sup>①</sup> 《宪台通纪·照刷枢密院文卷》,《永乐大典》卷二六〇八引。

<sup>②</sup> 参见萧启庆:《元代军事制度》页四〇、二一三至二一四;片山共夫:《元朝四怯薛的轮番制度》,《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六(一九七七年)。

服、鞶带、药餌，大小无虑数十橐，靡不司之。中夜有需，不须烛索，可立至前”。他尝“长直，四十日不至家。夜杂妃嫔候侍，休寝榻下。上呼之，方惫，熟寐不应，命妃蹴兴之”<sup>①</sup>。这段材料生动地反映了怯薛歹执役内廷的状况。因此郑介夫援引古制来比附怯薛歹的各种名目：“《周礼·天官·冢宰》曰膳夫，曰庖人，曰内饔，曰外饔，曰浆人，曰烹人，曰籩人，今之博儿赤（厨子）也；曰幕人，曰司服，曰司丧，曰内宰，今之速古儿赤（Sügürchi, sügür 此云伞，速古儿赤元代直译为“伞人”）也；曰掌舍，曰掌次，今之阿察赤（Achachi, acha 此云叉子棍，叉股事）也；曰阍人，今之哈刺哈赤（Qaghalghachi, qaghalgha 此云关口）也；曰缝人，曰屨人，曰典妇功，今之玉烈赤（Üilechi, üile 此云勾当）也；曰宫人，今之烛刺赤（Julachi, jula 此云灯）也”<sup>②</sup>。此外，根据怯薛歹们所担负的具体职役，他们还有火儿赤、昔宝赤、扎里赤等十几种名称<sup>③</sup>。

随着元朝统治机构的健全和完善，元政府设立了许多专门机构管理内廷供奉诸色事宜，如尚食局、尚舍寺、侍正府、太仆寺、尚乘寺等。专司各色职役的怯薛歹，很可能陆续被纳入规模多少有所扩大的相应机构中去了。如侍正府领速古儿赤 400 人、奉御 24 员。400 名速古儿赤未必出自怯薛，但 24 员奉御，确实皆“以四怯薛之速古儿赤为之”<sup>④</sup>。

怯薛制在元朝军制乃至官僚体制中都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它不归枢密院节制，而由皇帝直接控制。怯薛歹没有法定品秩，但是却享有非常优厚的政治待遇。元朝皇帝与省院官员在禁廷商决国策，必有掌领当值宿卫的怯薛之长预闻其事。亦力撒合为宿卫时，“甚见亲幸，有大政时以访之”<sup>⑤</sup>。怯薛成员

① 姚燧：《董文忠神道碑》，《牧庵集》卷一五。按同书卷一七《贺仁杰神道碑》，仁杰“入备宿卫”，“他人满直，三日而更，独公与董文忠为长”。据此，则董文忠之为宿卫，当无可怀疑。

② 《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引郑介夫奏议。

③ 《元史》卷九九，《兵志》一；参见《元代军事制度》，页二一六至二一九。

④ 《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

⑤ 《元史》卷一二〇，《亦力撒合传》。

还有权在大宗正府与皇亲国戚所担任的札鲁忽赤一起听政署事。至于怯薛歹利用自己久居禁中、“密近天光”的机会,隔越中书省奏事、自内降旨,干预军国大政及官员黜陟的事例,在有元一代亦累见不鲜。元代用人,很重视所谓“根脚”。而由怯薛出仕,则被目为“好根脚出身”。皇帝不断地对怯薛成员委以各种重要的军政职务。平时在衙署供职,遇轮番之日,仍入侍禁廷。入备宿卫成了做大官的捷径。尤其是四个怯薛长,年劳既久,出官辄为一品,被时人称为“大根脚”<sup>①</sup>。怯薛成员多世袭其职。怯薛军常额保持在一万人以上,最多时曾达15000人。

除天子之怯薛以外,累朝皇帝斡耳朵宿卫未尝废置,故还有隶属于已死的皇帝行帐的怯薛歹。有的诸王亦拥有怯薛。

侍卫亲军主要用于防卫以两京为中心的京畿腹地。中统元年四月,即忽必烈称汗次月,“谕随路管军万户,有旧从万户三哥西征军人,悉遣至京师(开平)充防城军”<sup>②</sup>。同月又“征诸道兵六千五百人赴京师宿卫”<sup>③</sup>。这两段记载,似为元朝创建侍卫亲军的最早史料。翌年五月,以出守大都的亲卫董文炳为山东路宣慰使,中途召还,改授侍卫亲军都指挥使<sup>④</sup>。至少从这时起当已正式有了侍卫亲军的建制。中统三年李璫之乱平定后,元廷又命董文炳共领武卫军事,这支军队原来是由塔察儿率领的。直到至元元年,武卫军才正式改为侍卫亲军,并于至元八年被扩充为左、右、中三卫。

有元一代侍卫亲军不断地在扩大。忽必烈朝前后共置十二卫。至元朝末年总共设置过三十余卫。卫设都指挥使或率使,品秩与万户(正三品)相当,

① 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杂俎篇》。

② 《元史》卷九九,《兵志》二。三哥指史天泽。

③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④ 王磐:《董文炳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七一。又王恽《中堂事记》中统二年正月十日,“亲卫董文炳……来自北庭,知我军大捷,中外称庆。”是知董文炳为亲卫,且曾随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与王磐碑文相合。

隶属于枢密院。编入侍卫亲军的,有蒙古军、汉军、新附军等。进入内地的色目人军队,由于战斗力较强,后来有相当一部分都被编入侍卫亲军。

元朝军队按照种族差异和征发地区的不同,主要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四种。它们除了被抽调到宿卫军中以外,还用于全国的镇戍,称为镇戍军。四种军队所重点屯防的地区也不完全相同。

蒙古军是以蒙古人为主体的编制而成的军队。镇戍于各地的色目人军队,亦多被列入蒙古军编制。只有抽入侍卫亲军的那部分色目军队,才以其族属为名分别单独建制。

探马赤军的问题比较复杂。根据现存史料,蒙古最早组编探马赤军,似在一二一七年木华黎受命率军经略华北之时。当时的探马赤军,应由从属于兀鲁、忙兀、弘吉剌、亦乞烈思、札剌亦儿五蒙古部落的降附人马中编成,与五部合为“十军”。《史集》称探马赤军是“从千户和万户中抽出”、“派到某地长期屯戍”的军队<sup>①</sup>,其地位似低于一般蒙古军,故专用作远征和远戍的头哨部队、重役部队。据伯希和的意见,探马赤(Tamachi)一名当即唐代“答摩支”、辽代“挹马”的异译,由扈从而转意为前锋<sup>②</sup>。随着探马赤军的扩大,后来还包括了畏兀人、北方汉人等民族成分。

蒙古、探马赤军的防卫重点,主要是腹里地区,南至河南淮北,北至辽东,还有西北、四川等地。灭宋以后,元廷下令收聚征宋以来散处南北的诸蒙古军,在北方置山东河北蒙古军都万户府(驻沂州,即今山东临沂,文宗时改为大都督府,徙濮州,今山东濮县)、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后来又先后在东

<sup>①</sup>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页九九。

<sup>②</sup> 冯承钧汉译:《中亚史地丛考》,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关于探马赤军问题的研究,可参见杨志玖:《探马赤军问题三探》,《南开大学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二期;黄时鉴:《木华黎麾下诸军考》,《元史论丛》第一辑等。并见护雅夫:《探马赤部族考序说》,《史学杂志》第五五编(一九四四年),同氏《元初探马赤部族考》,《北亚细亚学报》第三辑(一九四四年);让·欧班:《哈拉那兀人的族源》,《突厥研究杂志》,第一期(一九六九年)等。

北置东路蒙古军上万户府、东路蒙古军都万户府等。在凤翔和成都也分别设置了蒙古军都万户府管领屯戍当地的蒙古军<sup>①</sup>。所有这些都万户府,都归枢密院调遣节制。

元统治者将全国居民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原属金朝统治的北部中国以及较早归附蒙古的四川、云南居民,包括契丹、女真等族在内,都被划为汉人。由汉人组编的军队,就是所谓汉军。

此外还有新附军,即由南宋降军改编而成的军队。

淮河以南广大地区,主要由汉军和新附军来镇戍,同时仍有少数蒙古、探马赤军与汉军、新附军相参,留戍其地。平宋以后,忽必烈即命令主持攻宋军事的伯颜和阿朮、阿塔海、阿里海牙等将领审度兵机之要、地理之宜,在江浙、江西和湖广三行省选定六十三处战略要地,屯聚重兵<sup>②</sup>。再从这六十三处分兵,四出镇守。南方戍守的重点,在临江沿淮地区,其原因不难理解,因为这里是联结位于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经济重心的关键地带。在江淮和江西地区,以蒙古、汉人、新附诸军相参作三十七翼,每翼相当于一个万户<sup>③</sup>。此处所谓江淮、江西地区,指南宋淮南东、西道旧地及其以南的江西、江浙两省北部。元代在上述地区所置路和直辖府州的总数,不过三十余个。叶子奇说:“元各路立万户府”<sup>④</sup>,郑玉也说“各路设总管府以治民、万户府以统军”<sup>⑤</sup>。就大江南北的重点防御地区而言,基本上是正确的。江西行省的南部即岭南地区,最初也遣军镇戍,“率二年而代。遭犯瘴疠,十无一还。公(张珪)曰:‘是徙置之死地耳。’奏请屯置近边,其岭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不幸前死者,官

---

① 关于这几个都万户府,见《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卷三三《文宗纪》二、卷一二八《土土哈传》、卷一三一《伯帖木儿传》、卷九二《百官志》八、卷三四《文宗纪》三、卷一六《成宗纪》二、卷一六《世祖纪》一三等。参见《元代军事制度》页五五及有关注文。

② 《经世大典序录·屯戍》,《国朝文类》卷四一。

③ 《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卷一三,《世祖纪》一〇。

④ 《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

⑤ 《徽泰万户府达鲁花赤珊竹公遗爱碑铭》,《师山集》卷六。

给槽榧还其家。从之”<sup>①</sup>。这是仁宗年间的事。不过此后有关官军戍守岭南或邻近地区的记载,仍时有所见。湖广行省平宋战争时由阿里海牙负责经略。这个地区分兵镇戍凡七十余所,其具体布局还不甚清楚<sup>②</sup>。

元世祖末年终划南方镇戍事宜时,江南各地区尚置有若干行枢密院。因此,各翼镇戍军马,均归隶于所在行院<sup>③</sup>。后来,“行院悉并归行省”<sup>④</sup>。镇戍诸军的日常军务一般为所在行省掌领,军权控制在行省蒙古官员手中。但是镇戍诸军的调遣更防等重要军务仍受枢密院节制。

镇守各地的军队,一般都屯戍在城外。马可·波罗曾经这样描写元朝在各地的屯军:

要知道,在契丹(指北部中国)、蛮子田地(指南方南宋故地)和大汗统治下其余地区的各个省份里,都发现了许多不忠诚的人,只要一有可能,他们就起而反对他们的君主。所以必须在每一个拥有诸多城镇和居民的地区设置军队,他们驻扎在离城池四五英里远的乡村中。那些城市都没有城门或城墙可以阻止戍军进入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大汗每两年命令军队换一次防,对于指挥军队的将领们也是如此。在这样的桎梏之下,人民太平无事,不可能有什么变乱。除了大汗经常从各地收入中支付给他们的经费外,这些军队的生活还依靠属于他们所有的数量不等的羊群,靠到城里去出卖羊奶,然后买回他们需要的那些物品。他们散布在相距三十、四十乃至六十日程的各个地方。大汗只要召集他的一半军队,他就可以得到尽其所需的那么多的骑士,其数量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使人觉得难以置信<sup>⑤</sup>。

① 虞集:《张珪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一八。

② 《元史》卷二〇九,《安南传》。

③ 《元史》卷九九,《兵志》二。

④ 《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

⑤ 《马可波罗行纪》页一九五。



边疆地区的诸部族土军,驻守本地而不出戍他方,因称乡军。在云南有寸白军(即爨僰军,指白族土军)、白衣(百夷,此指傣族)军、罗罗斯(彝族)军、和泥(哈尼)军等,在广西有“号为兵官、守隘通道,于官有用”的撞摇(壮族)土兵<sup>①</sup>,在福建有畬军,在辽东有女直(女真)军、高丽军和纥军。女真人乃至高丽人的军队,一部分属于元朝正规军编制,应是汉军的一部分。此处所指,乃留戍本乡的部族军。纥军的情况也差不多。

纥军最早出现于辽代。金仍辽制,把在北方守边的诸游牧部众编为诸纥和纥军,称他们为“生蕃”,为“杂人”<sup>②</sup>。铁木真助金攻塔塔儿人有功,被封为札兀惕忽里<sup>③</sup>。忽里意谓统数部之将领<sup>④</sup>。札兀惕当即纥字复数形式的蒙语读音。金把蒙古乃至它的邻近诸部作为一支纥军看待,以铁木真为这支纥军统领,这在当时是十分可能的。札兀惕一词后来被蒙古人专用来指金以及旧金故土的居民(即所谓“汉人”),它的转义,应当是经过了一个历史过程的<sup>⑤</sup>。蒙古势力壮大后,由替金守边的一支纥军变成了漠北的统治部族。金北边诸纥纷纷归附蒙古,并被征发到华北攻打金国。到元朝,诸纥大都融合到其他军队中去了;只在辽东若干地区,作为乡兵的一种,仍然保留着纥军这一专名<sup>⑥</sup>。

元朝军队中的比较特殊的军种,有水军以及由回回炮手军匠和火炮军匠组成的专门部队等。灭南宋以后,以一部分水军专营漕运和海运,其中大部分是汉人和南人。担任军事任务的水军,仍以蒙古回回水军为核心和骨干。这

① 见《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国朝文类》卷四一。

② 见《大金国志》卷二一,《章宗纪》;《金史》卷四四,《兵志》。

③ 《元朝秘史》第一三四节。

④ 札兀惕忽里《亲征录》作察兀忽鲁。《金史》卷五五《百官志》一:“统数部者曰忽鲁”。

⑤ 参见《马可波罗注》,页二二七至二二九。

⑥ 关于纥军问题的较新研究,并见刘凤翥:《关于混入汉字中的契丹文字“纥”的读音》,《民族语文》一九七九年第四期;贾敬颜:《纥军问题争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〇年第一期,蔡美彪:《纥和纥军的演变》,《元史论丛》第二辑。

些特殊军种,亦归枢密院直接辖制。兵器制作部门大都归属于武备寺等专门机构管理,惟炮匠编制为军,听命于枢密院。可见元政府对回回炮和火炮的重视。

### 军户和奥鲁

元朝政府把全国居民按照不同职业以及其它某些标准(例如民族)划分成若干种户计,统称诸色户计。他们所承担的专门义务有所不同,隶属和管理系统也有所不同;而且一经入籍,往往世代相守,不许随意更动。诸色户计包括:在站赤系统服役的人户即站户,为国家和皇室从事各种工艺造作的人户即匠户,在国家经营管理下以煎盐为生的人户即灶户或盐户,专为皇室猎兽及捕养行猎时所用鹰隼等动物的人户即打捕户、鹰房户,一般的种田户即民户,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读书授徒的儒生等亦分别著入专门户籍。诸王、勋戚和功臣还拥有一部分私属人户,他们不承当国家赋役,完全供其所隶属者役使。这种私属人户中也包括了一部分匠人、打捕户、鹰房户、金银铁冶户等。

除上面已经列举的以外,出军当役的人户即军户,因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所以在诸色户计中尤其受到元朝政府的重视。按蒙古、探马赤、汉、新附诸军之分,军户也有蒙古军户、探马赤军户、汉军户、新附军户等名目。

最初,在草原游牧的蒙古人,“其军即民之年十五以上者”<sup>①</sup>,“人自习战”<sup>②</sup>,所以《元史》称“无众寡尽签为兵”<sup>③</sup>。到元朝,留在漠北的蒙古人除了在驿站系统当役的人户外,基本上仍按万户、千户的编制在一定的区域中屯聚牧养,有事时就从他们中间起军出征。至于进入内地的蒙古人,绝大部分都以军户著籍,这就是蒙古军户。每一军户出军当役的人数,依军事需要和军户的丁力等具体情况而不等。如至元四年规定每户二丁、三丁者出一人,四丁、五

① 《黑鞑事略》。

② 《蒙鞑备录》。

③ 《元史》卷九八,《兵志》一。

丁者出二人,六丁、七丁者出三人。至元十九年又规定“遵旧制,家止一丁者不作数,凡二丁至五丁、六丁之家,止存一人,余皆充军”<sup>①</sup>。所谓蒙古军户,当然也包括编入蒙古军中的色目人户。漠南蒙古五部中一部分隶属人口以及后来被编入探马赤军的其他各族军士的家庭,则以探马赤军户著籍。

汉军军户的来源有二。一是经过改编的金朝军队和华北地主武装。这一部分军人家庭在军民分别立籍时,自然以军户著籍;二是蒙古政权和元政府在北方新签发的军队。一二三二年,“河南北始伍民为军”。这是现在所知蒙古在汉地签军的最早记载<sup>②</sup>。其后便屡屡在北方征兵。窝阔台末年,北方随路签军总数已达十万左右。这时有史天泽中户充军之议<sup>③</sup>,所征发的军人虽被列入专籍,但似乎还没有正式确立军户制度。至迟到蒙哥初,军户制度已正式确立了。“壬子年(一二五二年)元籍除差军、站户”是后来确定军户、站户并准予豁免差役的重要依据之一<sup>④</sup>。在此之后,所谓签军,常指签发军户而言。从军户中起征丁男当役,又叫作起军。

蒙哥汗自壬子年下令“签诸路军籍”<sup>⑤</sup>之后,又于甲寅年(一二五四年)“初籍新军”,即增签汉军<sup>⑥</sup>。这次签军大约进行了好几年才完成,所以后来元政府规定,核实军户时,“西路凭乙卯年(一二五五年)军籍,山后凭丁巳年(一二五七年)籍,山前凭己未年(一二五九年),查定军册,揭照归断”<sup>⑦</sup>。据胡祇遹说,“自壬子至至元十一年,前后五次签军”<sup>⑧</sup>。据王恽说,从元军围攻襄阳

① 《元史》卷九八,《兵志》一。

② 柳贯:《靳忠墓碑铭》,《柳待制文集》卷一一,参见陈高华:《论元代的军户》,《元史论丛》第一辑。

③ 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④ 参见《元典章》卷一七,《户部》三,《户口条画》。

⑤ 《元史》卷一三四,《阔阔传》。

⑥ 《元史》卷三,《宪宗纪》。

⑦ 《通制条格》卷二,《户令》,《以籍为定》。

⑧ 胡祇遹:《军政》,《紫山集》卷二二。《元史·兵志》:“其名数,则有宪宗二年(即壬子年)之籍、世祖至元八年之籍、十一年之籍。”可能这三次签军,规模最大。

(至元五年)至忽必烈末年,“签取军役盖四举矣”<sup>①</sup>。他们指的,当然是大规模的签军,局部地区的小规模签军还不包括在内。至元六年至七年,北方“诸色军数”(包括蒙古、探马赤军户和汉军正军户、贴军户等)已达七十二万户<sup>②</sup>。到忽必烈末年,在汉军中当役的军人,总数至少应在三十万人<sup>③</sup>。

元政府将全国居民按财产、丁力的不同分成三等九甲<sup>④</sup>。签发汉军时,一般都取中户。凡户出一人者,称为独军户<sup>⑤</sup>。合二、三而出一人,则出丁男应征的那一户为正军户,余为贴军户,共同资助应役者的鞍马、器仗、盘缠等费用<sup>⑥</sup>。一个正军户往往带有一至二个贴军户。中统五年,规定军、站户减半交纳地税<sup>⑦</sup>。后来定制,他们可以占有四顷免税的赡军地,并且一般得以免除各种杂泛差役。

南宋灭亡后,其军队有相当部分放罢为民,四散在外。即使曾经收编的亡宋军人,也有不少重新逃窜,流落各地,“做贼说慌”<sup>⑧</sup>。让这样一批知晓武艺的兵痞散处民间,元政府自然十分放心不下。因此,元廷三令五申,命令他们赴官出首,然后对他们“通行分拣。堪以当军者收系充军,……不堪当军者给牛具粮食,屯田种养”<sup>⑨</sup>。这样作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和管束。元政府收编新附军之举直到成宗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年)尚未完全结束<sup>⑩</sup>。新附军

① 王恽:《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秋涧集》卷三五。

② 参见《元典章》卷三四,《兵部》一,《查照军籍当役》、《蒙古军驱条画》等。

③ 参见《论元代的军户》。

④ 参见陈高华:《元代户等制略论》,《中国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⑤ 《元史》卷九八《兵志》一作“独户军”。此据拉契内夫斯基《元史刑法志译注》(巴黎,一九三七年)页二五〇注五改。参见《元代军事制度》页七三、页一七二注三九。

⑥ 《经世大典序录·军制》,《国朝文类》卷四一。《元史·兵志》相应文字为:“合二三而出一人,则为正军户,余为贴军户。”

⑦ 《元典章》卷二四,《户部》十,《种田纳税》。

⑧ 《元典章》卷三四,《兵部》一,《招诱新附军人》。

⑨ 《元典章》卷三四,《兵部》一,《招诱新附军人》。

⑩ 参见《元典章》卷三四,《兵部》一,《拟定新附军籍》、《拘刷军人弟男》。

户亦以专籍登录。甚至当军户主身死之后抛下的寡妻,也由政府配对,仍然嫁给新附军之“孤寒者”,使“所生儿男,继世为军”<sup>①</sup>。新附军户没有所谓“封装贴户”即贴军户。

诸色户计的分立,目的是为便于按各专门系统集中管理。对于军户的管理,就是通过奥鲁系统实现的。

蒙古人出征时,所携带的家口、辎重屯驻在距离前线不十分遥远的地方,作为兵站基地和给养补给地,称为奥鲁(Aghuruq),《元朝秘史》译作“老小营”、“家每”、“老营”<sup>②</sup>。成吉思汗南征时,曾命随行的曷思麦里“领奥鲁事”<sup>③</sup>。一二五九年,常德奉命从和林驰驿,西觐旭烈兀。他在阿姆河西曾经过征西奥鲁的驻扎地<sup>④</sup>。足见奥鲁制在蒙古国时期就已存在。不过到忽必烈时代,元朝军队中的奥鲁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起来了。蒙古、探马赤军均在各万户、千户下设奥鲁官,管辖当役军士族属,隶领于本万户或千户之长。汉军“军出征戍,家在乡里”,也设立奥鲁;据后来定制,“由州县长官结衔,兼奥鲁官以蒞之”<sup>⑤</sup>。

奥鲁的职责,主要有两项。

一是配合军前派来的起军官,选择“踏弩挽弓、负甲执殳、视死如归、勇健张猛之人”<sup>⑥</sup>当军应役。在役军人如果开小差,所属奥鲁官司必须与本管军官等约会,一同“根捉”。在逃军人很可能与自己家属取得联系,甚至就隐匿在家中。因此政府对奥鲁官缉拿逃军督责尤严。“如奥鲁官、坊里正、乡司邻佑人等知情推调,不拿元逃正身者,依已定罪名断遣。”<sup>⑦</sup>应役军人身死后,必须通过奥鲁从其“哥哥兄弟、孩儿每替头里补有”,以弥补缺员,使军队“数目不

① 《元典章》卷三四,《兵部》一,《无夫军妻配无妇军》。

② 见《元朝秘史》第一三六节,第一九八节旁译、总译等。

③ 《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

④ 刘郁:《常德西使记》,载王恽:《秋涧集》卷九四。

⑤ 《经世大典序录·军制》,《国朝文类》卷四一。

⑥ 胡祇通:《军政》,《紫山集》卷二二。

⑦ 《元典章》卷三四,《兵部》一,《省谕军人条画二十三款》。

少有”<sup>①</sup>。如上所述,奥鲁官与军前统兵官相配合,“军前明有军籍、奥鲁官有奥鲁籍。军前发遣,奥鲁即知其来家;奥鲁发起应役,把军官即知其军在军。替换有时,交代有法。死亡患难,有所存恤;诈伪逃窜,有所拘执防闲”<sup>②</sup>。从军籍的管理来说,奥鲁系统的建立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奥鲁的第二项职责是征集出军当役者的鞍马、器仗、盘缠等。我们知道,军户(正军户和贴军户)必须负担当役军人的“军需气力”,每年都由军前派遣千户、百户等头目到所属奥鲁来支取<sup>③</sup>。凡遇远戍、进征,所征集的钱物就更多。由于各地差来的军官“不以恤军为务,反以贿赂为心”,往往“遍诣军户,取要赍发”,对军户骚扰极大,所以元政府三令五申,取要军需,必须通过奥鲁官。军前派来的专人,只能“守等点视”;至于向军户按家派征,应由奥鲁官负责<sup>④</sup>。

这里发生一个问题。所谓“军需气力”,是否包括军粮在内?看来元初和后来的做法不完全一样。

忽必烈前期,军户所供给的军需中要包括部分军粮。至元七年,枢密院与中书省官奏:“蒙古、汉军同岁出征去呵,自备气力去底也有,请官粮吃著去底也有”<sup>⑤</sup>。这时候,甚至怯薛军士大概也需要由其家属供给部分饷粮。至元十八年八月,“给怯薛丹粮,拘其所占田为屯田”<sup>⑥</sup>。此后这部分宿卫军就应当全部由国家供饷了。至元十九年,“以隆兴、西京军士代上都戍卒,还西川。先是,上都屯戍士卒,其奥鲁皆在西川,而戍西川者,多隆兴、西京军士。每岁转饷,不胜劳费,至是更之”<sup>⑦</sup>。原来戍守上都的军士,他们的奥鲁在西川,转输

① 《元典章》卷三四,《兵部》一,《正军兄弟孩儿替补》。

② 胡祇通:《军政》,《紫山集》卷二二。

③ 参见《元典章》卷三四,《兵部》一,《禁军齐领钱物》等。

④ 《元典章》卷三四,《兵部》一,《禁起军官骚扰》。

⑤ 《元典章》卷三四,《兵部》一,《回军米药》。

⑥ 《元史》卷一一,《世祖纪》八。

⑦ 《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参见岩村忍:《元朝奥鲁考》,《蒙古史杂考》,页一一九至一四六。

军饷所费甚多,所以要将他们调还奥鲁附近,就便给养。由此可知,这批军士的“饷”,无疑是从奥鲁征集来的;而且它应当包括军粮在内,否则恐怕不至于会因为转饷而“不胜劳费”。这就是说,直到至元中叶,奥鲁仍必须承担一部分军粮。至元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中书省奏过事内一件,节该如今俺商量得:新附军人无贴户,有依在先体例,正身六斗米、一觔盐,家口四斗米。蒙古、汉军每根底五斗米、一觔盐与呵,怎么,么道奏呵。是有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sup>①</sup>。大概从这以后,军粮就全部由国家负担了。

除上述职责外,蒙古、探马赤奥鲁还兼管所属军户婚姻、负债、斗殴、私奸、杂犯等“不系官军捕捉”的民事诉讼。“其余干碍人命重刑、利害公事、强窃盗贼、印造伪钞”等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则由军官与有关行政官约会,共同审理。<sup>②</sup>

新附军自建立时起即为“请粮官军”,亦未设奥鲁。新附军军户的管理体制不详,大概是由当地管民官与本军管军官协同治理的。

## 第五节 法律、铨选和赋役制度

### 一 法律制度及其特点

#### 立法概况

元朝在建立各种制度时,常效法金制。但在立法方面,则与金不同,始终没有编成类似唐代或金代那样形式完备的法典。修订元律的努力一直没有结果,因此,有元一代断狱量刑基本上以断例为依据。与此相应,民事、行政等各部类的立法,亦完全是以因时立制、临事制宜的形式颁布的。这是元朝法制的重要特点之一。

<sup>①</sup> 《元典章》卷三四,《兵部》一,《军粮·军人支盐粮例》。

<sup>②</sup> 《元典章》卷三九,《刑部》一,《刑名·蒙古人相犯重刑有司约会》。



忽必烈开国之初,凡治理北方汉人的刑名之事,大体参用旧金《泰和律》以定罪,再按一定的折代关系量刑(详下)。至元八年十一月,在建“大元”国号的同时,下令禁行《泰和律》<sup>①</sup>。翌月,监察御史魏初即上奏,要求将史天泽等人修成且已“积有岁月”的《大元新律》略加增删,颁行天下<sup>②</sup>,此议未果。以后,忽必烈曾“令老臣通法律者,参酌古今,从新定制”<sup>③</sup>。至元中,王恽又请求“将奉敕删定到律令,颁为至元新法,使天下更始、永为成宪”<sup>④</sup>。至元末,王恽再次在奏文中提出应“将已定律令,颁为新法”<sup>⑤</sup>。可见忽必烈一朝,修订律令之事一直在进行,但都未能告竣,只有何荣祖奉命编纂的《至元新格》在至元二十八年五月奏准颁行。

《至元新格》在元代法制史上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它以当时陆续颁行的各种法规为依据,按照一般法典所通行的行文格式和体裁重新撰写,并加以系统的分类编次而成书。全书共分为公规、选格、治民、理财、赋役、课程、仓库、造作、防盗、察狱等十目<sup>⑥</sup>,每目之下分列十数条,这些条文都具有行政法或其他有关门类的法规的性质。《至元新格》完书今虽不存,但其条文被著录于《通制条格》、《元典章》等书者即达近百条<sup>⑦</sup>。由于它的全书原文仅“不数千言”<sup>⑧</sup>,所以这近百条引文当已基本反映该书全貌。从形式上来讲,《至元新格》确实是

① 《元史》卷七,《世祖纪》一。

② 魏初:至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奏议》,《青崖集》卷四。

③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④ 王恽:《便民三十五事·立法》,《秋涧集》卷九。

⑤ 王恽:《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秋涧集》卷三五。

⑥ 此据《习吏幼学指南》所立子目。按防盗据《元史》卷一六《世祖纪》三作御盗。参见安部健夫:《关于〈元史·刑法志〉与“元律”的关系》,《东方学报》京都版,第二册(一九三一年),注五。

⑦ 参见植松正:《汇辑〈至元新格〉及解说》,《东洋史研究》第三十卷第四号(一九七二年);陈恒昭(Paul Heng-chao Ch'en):《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制传统——一二九一年法典的复原》。

⑧ 苏天爵:《至元新格序》,《滋溪文稿》卷六。按苏氏所作,为重刊本序。

按照一般法典规格编写而成的,这在整个元代法制史上属于仅见之例。但是从内容上讲,它又过于单薄,非但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刑法,其规模距离一部真正的行政法、民法或财政法的法典亦仍相当遥远。因此《至元新格》的成书和颁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元代法无定制的问题。

成宗时,复命何荣祖更定律令。他共择取三百八十条,“一条有该三、四事者”<sup>①</sup>,名为《大德律令》。成宗曾诏“元老大臣聚听之”<sup>②</sup>。但郑介夫在大德七年奏章中指出,《大德律》“讹舛甚多”<sup>③</sup>。大概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终于没有颁行。成宗之后,按传统形式修订律令格式的活动,似乎消沉了相当一个时期。

直到顺帝时,元政府又重倡修律之议。至正十年(一三五〇年)冬,欧阳玄“奉敕撰定国律,撰选格序”<sup>④</sup>。这里所说的国律,当不仅指刑法典,因为欧阳玄为之作序的,分明是构成行政法典一部分的“选格”。参与修订国律的还有陈思谦<sup>⑤</sup>。又据《元史》卷一八七《乌古孙良桢传》,他“尝论《至正条格》轻重不伦,吏得并缘为奸,举明律者数人,参酌古今,重定律书,书成而罢”。乌古孙良桢至少到至正十八年仍然在朝为宦。是知顺帝朝“重定”律书,至少在至正十八年之前尚未罢役。如果乌古孙良桢与欧阳玄、陈思谦等人所参与的是同一项工作,那么元末的修律活动,可以说从至正十年冬一直进行到十八年,延续将近十年。

国外有些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曾经根据欧阳玄、陈思谦修“国律”的史料,断言《元史·刑法制》的史源,就是至正时经欧阳玄、陈思谦等人之手而修成的法典《元律》。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记载可以证明顺帝朝曾经颁行过

① 《元史》卷二十,《成宗纪》三。

② 《元史》卷一六八,《何荣祖传》。

③ 《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引郑介夫奏。郑介夫所说的《大德律》,当即何荣祖奏上的《大德律令》。

④ 危素:《欧阳玄行状》,《危太朴集》续集卷七。

⑤ 《元史》卷一八四,《陈思谦传》。参见浅见伦太郎:《元朝的〈经世大典〉与〈元律〉》,《法学协会杂志》第十一卷第七、八号(一九二三年)。安部健夫在:《关于〈元史·刑法志〉与“元律”的关系》中全面介绍了浅见此文的主要观点。

《元律》。元末人孔齐曾遍举重要的“国朝文典”，他只提到《至正条格》而根本没有说到还有一部什么《元律》<sup>①</sup>。明初高丽人郑梦周为本国修撰新律时，“取《大明律》、《至正条格》、本朝（指高丽）法令，参酌删定”<sup>②</sup>，如果元朝曾颁行过《元律》，他是不可能弃而不用的。明人追述元朝立法形式，也只说“元制取所行一时之例为条格而已”<sup>③</sup>。总之，顺帝朝修订“国律”之役，看来仍然是无功而罢，根本就没有成书。

历代对于法典的编纂，最重视的往往是刑法典。元朝从未编成唐律式的刑法典，当然就更谈不上编纂有关民法、行政法等方面的相应形式的法典了。

如上所述，元代立法行政、断狱量刑，都以因时临事而陆续颁发的有关文书为依据。这些文书，一部分以诏制的形式，绝大部分以条格和断例的形式颁行全国。条格中经过皇帝亲自裁定、作为圣旨或圣旨附件中的条文而公布的法令，叫做圣旨条画；此外它还包括了中央各主管部门颁发的各式训令<sup>④</sup>。条格中有不少是属于具体处置各种个别事件的指令性文书，在形式上与划一的法规面目大异。兹举例如下：

至元五年十月中书户部来申，该：平阳路民户郭从训告河南府宜阳县石付（按：付字恐系村字之讹）韩阿巩不令弟妻赵奴与弟郭四守服，乞照验事。送法司披详得：韩赵奴既于至元三年七月与夫郭四过门，兼二次父母受讫财物，依理已成婚娉及拜讫伊夫尊属。其父身亡，合行依例于夫家守服，以全妇道，激劝风俗，似为相应。省部仰令韩赵奴依例于夫家守服施行<sup>⑤</sup>。

① 孔齐：《至正直记》卷一。

② 《高丽史》卷一一七，《郑梦周传》。

③ 《明史》卷九三，《刑法志》一；卷一三八，《周桢传》。

④ “格”作为法规的一种形式，似产生于两晋时期，当时它亦称为“条格”。在唐的法典体系中，格与令属于两类。元代的条格，则大体上接近于唐、金两代法典体系中的令，详下。

⑤ 《元典章》卷一八，《户部》四，《夫亡夫家守服》。

还有相当部分的条格形式上属于记录公文书,记录了皇帝对有关事件所作的决断。例如:

至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通政院官等奏:我从女真田地里来的时分,信州站户每我行文字与著告有来(按:其意谓“信州站户们向我上书陈告”):“□里住的打捕鹰的忽都鲁回还家去的时分,白日经过时,见在(按:即现有)的羊肉与呵,不肯吃,俺行嗔责(按:此谓“对我们逞凶责骂”)道:‘不是要讠活羊吃了也?’俺每忽都鲁根底攀着说有:‘若别个的似这般行的,见有的肉与呵不吃,要活羊吃的多有,似这般呵,俺生受有。’您使臣每根底告有?怎生上位奏知的您识者么道来。”么道,奏呵(按:以上是通政院官的陈奏,以下是皇帝关于此事的指示)。“呆站家与来也者(此谓“告诉呆站家们”),如今见在肉有呵,与见在肉者。若见在肉与呵不吃的人每根底,水也休与着。”么道,圣旨了也,钦此。<sup>①</sup>

以上所引的公文书,在元代与划一的法规等效,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遇到类似的公事,可以据以比拟,参照施行。断案的成例即断例,也具有相同的法律效能。因此,元政府早在至元时期就下令,“中书省为头一切随朝衙门,各各编类中统建元至今圣旨条画及朝廷已行格例(条格和断例),置簿编写检举,仍令监察御史及各道提刑按察司体究成否,庶官吏有所持循,政令不至废弛”<sup>②</sup>。当时,“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条格,至数十册”,称为“格例簿”,“遇事有难决,则搜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施行比拟”<sup>③</sup>。著名的《元典章》,似即江西行省下属文书机构汇辑的一部文书集。甚至民间亦“自以耳目所得

<sup>①</sup> 《元典章》卷一六,《户部》二,《站赤使臣分例》。关于元代公牍文体所使用的奇特语辞,参见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元史论丛》第一辑。

<sup>②</sup> 见《元典章》纲目前言。

<sup>③</sup> 《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引郑介夫奏议。“格例簿”之称,见《元典章》卷四五,《刑部》七,《指奸革拨》。

之敕旨条令,杂采类编,刊行成帙,曰《断例条章》,曰《仕民要览》,家置一本,以为准绳”<sup>①</sup>。由于这时候吏学盛行,这一类书籍往往还成为研习吏学的教本,所以销路颇广,以致欧阳玄发出“条令哀于书肆,官不遍睹”的慨叹<sup>②</sup>。由上面的叙述可知,元朝的法制体系,主要就是以条格和断例形式颁降的单行法构成的。

这样的立法形式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随着岁增月积,颁降的格例越来越多,必然出现繁杂重出、罪同罚异的情况,这就使各级官吏得以任情挟私,高下其手<sup>③</sup>。对此,元政府采取了两种措施。

一是随着有关方面处理同一类型问题的经验的积累,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加以适当的概括。因此,元政府有时将历年所颁降的某一方面的条例重加“分拣”、“斟酌”,厘定“等第”,形成新的法律文字,作为“通例”公布,例如大德七年的“赃罪条例十二章”(又称“十二个体例”)<sup>④</sup>、大德六年的“强窃盗贼通例”<sup>⑤</sup>等。这一类采取划一的法规形式而且较为系统的单行法,证明元代立法确实在逐渐地从因时立制、临事制宜向法典化过渡。不过这一过渡始终未能完成。

第二个措施,就是召集老臣,从以往颁发的各方面的法律文书中选出“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sup>⑥</sup>以期从整体上对国家的政制法程作某种程度的统一或协调。这方面最显著的成果,是英宗时颁定的《大元通制》和顺帝朝的《至正条格》。

---

① 《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引郑介夫奏议。“格例簿”之称,见《元典章》卷四五,《刑部》七,《指奸革拨》。

② 欧阳玄:《策问》,《圭斋集》卷二〇。

③ 到至大二年为止,“自太祖以来所行政令”已达九千余条。见《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

④ 《元典章》卷四六,《刑部》八,《赃罪条例》。

⑤ 《元典章》卷四九,《刑部》一一,《强窃盗贼通例》。

⑥ 孛朮鲁朮:《大元通制序》,《国朝文类》卷三六。

关于纂修《大元通制》之动议,最早可追溯到武宗即位时。大德十一年十二月中书省臣奏:“律令者治国之急务,当以时损益。世祖尝有旨,金《泰和律》勿用,令老臣通法律者,参酌古今,从新定制,至今尚未行。臣等谓律令重事,未可轻议,请自世祖即位以来所行条格,校讎归一,遵而行之”<sup>①</sup>。由于经历世祖、成宗两朝,修订类似唐代或者金代法典的努力长期没有结果,元廷终于决定改变方式,转而采取折中的办法,就便对现行格例加以整理增删,重加颁行,以利有司遵行。武宗对于廷臣此议表示赞同。但至大年间是否已付诸实施,现在没有确切材料。仁宗即位后,立即下令进行这项工作,从至大四年(一三一一年)起到延祐二年(一三一六年),书成,又命廷臣复审,终仁宗之世仍未能公布。英宗临朝后命增删审核,于至治三年(一三二三年)告竣,遂以《大元通制》为名,颁行全国。《大元通制》全书共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分为制诏(九十四条)、条格(一千一百五十一条)、断例(七百七十七条)三纲,此外尚有别类(五百七十七条)一目。据明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全书分为八十八卷。这部书的细目,与泰和法典体系的篇目基本一致;其篇目设计全系因袭泰和法典,是十分明显的。兹将《大元通制》、泰和法典及其所上承之唐代法典的详细篇目并列于下,使读者便于参照比较。

《唐律》 <sup>②</sup>	名例	卫禁	职制	户婚	厩库	擅兴	贼盗	斗讼	诈伪	杂律	捕亡	断狱
《泰和律》 <sup>③</sup>	名例	卫禁	职制	户婚	厩库	擅兴	贼盗	斗讼	诈伪	杂律	捕亡	断狱
《大元通制·断例》 <sup>④</sup>		卫禁	职制	户婚	厩库	擅兴	贼盗	斗讼	诈伪	杂律	捕亡	断狱

①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② 参见《故唐律疏议》。

③ 见《金史》卷四五,《刑志》,《泰和令》篇目亦见于此书。

④ 《大元通制》的断例和条格部分篇目,俱见沈仲纬:《刑统赋疏》引“通例”。其厩牧以下假宁以上篇目错简,已据《通制条格》残本篇目纠正。参见安部健夫:《大元通制解说》,《东方学报》京都版,第一册(一九三一年)。

唐《令》①	《泰和令》	《大元通制·条格》	唐《令》	《泰和令》	《大元通制·条格》
<sup>1</sup> 官品	官品		<sup>15</sup> 仪制	仪制	仪制
<sup>2</sup> 三师三公台省职员 <sup>3</sup> 寺监职员 <sup>4</sup> 卫府职员 <sup>5</sup> 东宫王府职员 <sup>6</sup> 州县镇戍嶽渎关津职员 <sup>7</sup> 内外命妇职员	职员		<sup>14</sup> 衣服	衣服	衣服
			<sup>16</sup> 卤簿		
			<sup>17</sup> 公式	公式	公式
				禄令	禄令
			<sup>20</sup> 仓库	仓库	仓库
<sup>8</sup> 祠	祠令	祭祀	<sup>21</sup> 厩牧	厩牧	厩牧
<sup>9</sup> 户	户令	户令	<sup>18</sup> 田	田令	田令
	学令	学令	<sup>19</sup> 赋役	赋役	赋役
<sup>10</sup> 选举	选举	选举	<sup>22</sup> 关市	关市	关市
<sup>11</sup> 考课				捕亡	捕亡
	封爵			赏令	赏令
	封赠		<sup>23</sup> 医疾	医疾	医药
<sup>12</sup> 官卫	官卫	官卫		假宁	假宁
<sup>13</sup> 军防	军防	军防	<sup>24</sup> 狱官	狱官	狱官
<sup>27</sup> 杂令	杂令	杂令	<sup>26</sup> 丧葬	服制	服制
	释道	僧道		律令	
<sup>25</sup> 管缮	管缮	管缮			站赤
	河防	河防			榷货

以上比较清楚地告诉我们,《大元通制》断例和条格部分的内容和性质,基本上与泰和律、令相当。其制诏部分,也大约与泰和法典体系中《新定敕条》的制敕部分(共九十五条)相当。所不同的,是构成其条格、断例的法律文

① 《大唐六典》卷六,《刑部》。唐《令》篇目二十七,其原来次第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唐代法典,除律、令外,还包括《格》(七卷)、《式》(二十卷)等。



书在格式、体裁上很不统一,缺乏一般法典所具有的那种系统而划一的形式。所以我们称它为具有法典性质的政书或法律文书汇编集。《大元通制》完书今已不存,今天尚能见到的,只是它的条格部分即明写本《通制条格》残卷,凡六百五十多条,占原书条格部分的一半强。

《至正条格》的性质与《大元通制》同。它包括制诏(一百五十条)、条格(一千七百余条)、断例(一千五百零九条)三部分<sup>①</sup>。关于这部书的名称,参与纂集之役的朵尔直班曾经提出过异议。他说:“是书上有祖宗制诰,安得独称今日年号(指至正)。又律中条格乃其一门耳,安可独以为书名。”但是“时相不能从,唯除制诰而已”<sup>②</sup>。所以这部书只有条格和断例两部分颁行天下。《至正条格》全书已经佚失。

关于元代法制的另一部极其重要的史料,是文宗时修成的《经世大典》。自天历三年(一三三〇年)四月起设局编修此书,到至顺二年(一三三一年)五月告竣,先由赵世延、继由虞集实际主持纂修。全书分帝号、帝训、帝制、帝系、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等十篇。编纂原则,是“仿六典之制”,“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粹国朝故实之文”,即将各部门档案文书收集起来,分类编次并从文字上略微加以修饰润色,使之“通国语于尔雅,去吏牒之繁辞”而已<sup>③</sup>。事实上,要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这部八百八十卷的巨著,不这样做也是不可想象的。

《经世大典》十篇中除记载“君事”的前四篇以外,其余六篇实际上大致相当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典制集录<sup>④</sup>。这就给后来编写《元史》各志带来很大的方便。《元史》各志,基本上是从《经世大典》有关部分摘录下来,拼

① 欧阳玄:《至正条格序》,《圭斋集》卷七。

② 《元史》卷一三九,《朵尔直班传》。

③ 虞集:《经世大典序录》,《国朝文类》卷四〇。

④ 这个比拟有一个地方需加以修正,即元代征伐镇戍之事,职权并不属兵部。因此载录征伐、招捕、宿卫、屯戍诸事的政典并不完全与兵部的职司相符。

缀成章的。

现在我们要回到《元史·刑法志》的史源问题上来了。检查一下《经世大典·宪典》所列二十二篇目,可以发现其中有二十个篇目为《元史·刑法志》所采录。最后两篇即赦宥、狱空之所以没有被采录,可能是由于它们不属于刑法法规的缘故。这一点进一步证明《元史·刑法志》的来源,主要是《经世大典·宪典》<sup>①</sup>。但是,在《宪典》中基本保留的格例原文,被《元史·刑法志》编者用非常机械的方法删简概括。其结果,就使《刑法志》中某些条文与原来判决或规定的意思相差甚远。这是我们使用《元史·刑法志》的有关材料时必须十分注意的<sup>②</sup>。

《经世大典》原书今已佚失。流传到现在的,只是保留在《永乐大典》残卷中的一小部分、著录于《国朝文类》的各篇序言和其他少数零碎材料,以及清代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大元毡罽工物记》、《大元海运记》、《大元马政记》、《大元仓库记》、《大元官制杂记》等。

刑法特点

据《元史》卷一〇二《刑法志》一,以及其他有关史料,元代的五刑体制如下:

笞刑	杖刑	徒刑	流	处死
七下 十七下 二十七下 三十七下 四十七下 五十七下	六十七下 七十七下 八十七下 九十七下 一百七下	一年,决徒年杖六十七下 一年半,决徒年杖七十七下 二年,决徒年杖八十七下 二年半,决徒年杖九十七下 三年,决徒年杖一百七下	汉人、南人发付辽阳、迤北;蒙古、色目发付湖广	(绞) 斩 凌迟

① 参见安部健夫:《大元通制解说》。

② 参见岩村忍:《校定本〈元典章·刑部〉序》,《校定本〈元典章·刑部〉》,第一册,京都,一九六四年。

蒙古国时期华北官员在断刑时,笞、杖刑大概是沿用金制,自十下至一百下,每等加十,凡十等。忽必烈即位建元后,为了体现“用刑宽恕”的意旨,笞、杖之制起了两个变化。一是沿蒙古旧制各减免三下,即所谓“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sup>①</sup>。元代杖、笞都以七为尾数由是定制。当然也不是说全部笞、杖之数都以七为尾数。直到元朝后期,“匿税者笞五十,犯私盐、茶者杖七十,私宰牛马者杖一百,旧法犹有存者”<sup>②</sup>。二是对于照金律当断笞三十下以上的罪人降等执行刑法,结果就在实际上以笞刑取代了金杖刑。具体的折代关系如下:

金	笞刑			杖刑		
	10	20、30	40、50	60、70	80、90	100
元(笞刑)	(10—3)7	(20—3)17	(30—3)27	(40—3)37	(50—3)47	(60—3)57

五十七下按原制应属于杖刑,现在改为折代杖刑的笞刑。这样,剩下的杖刑只有四等了,于是又往上加一等,就是杖一百七下。大德时有人建议取消最后一等杖刑,“议者惮于变更,其事遂寝”<sup>③</sup>。由于金代的杖刑在元代已被减省为笞刑,所以元初的杖刑实际上又成了金代徒刑的减省和折代。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大致如下<sup>④</sup>:

金	徒一年、一年半	徒二年、二年半	徒三年	徒四年	徒五年
元	杖六十七下	杖七十七下	杖八十七下	杖九十七下	杖一百七下

①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

② 《经世大典序录·五刑》,《国朝文类》卷四二。

③ 《经世大典序录·五刑》,《国朝文类》卷四二。

④ 参见《元典章》卷三九,《刑部》一所列《五刑之制》表。

元初曾经取消了流刑<sup>①</sup>。不过,当时以杖刑折代金徒刑,并不等于说把徒刑也完全取消了。至元年间对于窃贼以及聚众闹事的“泼皮厮打”,断罪“配役”或发付“著役”,对私藏军器者处以三年至一年徒刑,证明了徒刑依然存在<sup>②</sup>。至元二十三年四月,中书省上奏:“比奉旨,凡为盗者毋释。今窃钞数贯及佩刀微物,与童幼窃物者,悉令配役。臣等议,一犯者杖释,再犯依法配役为宜”<sup>③</sup>。这时,当已根据配役时间的长短将徒刑分等。元贞元年(一二九五年)七月颁布的《侵盗钱粮罪例》,明确将徒刑分为五等:“徒一年,杖六十七,每半年加杖一十,三年杖一百七,皆决讞居役”<sup>④</sup>。徒刑之制至此已比较完备了。

迄今所知,最早反映出元朝五刑之制系统化的立法文书,是大德六年的《强窃盗贼通例》。如上所述,虽然元初的笞、杖等刑与金代笞、杖、徒等刑之间具有某种对应折代关系,但在元代刑制经过三十年时间的发展变化而自成系统之后,我们就很难再在两朝刑制之间进行机械的比附,或寻求简单的折代关系了。

关于死刑,元初时定为绞、斩二等。以后又正式在刑制中增加凌迟处死一项,限于惩治属于“大恶”的若干种罪行。据《经世大典序录·五刑》,后来死刑“有斩无绞”。元人沈仲纬编著的律学教本《刑统赋疏》仍有“死刑二等,绞、斩”之说<sup>⑤</sup>,当为元代前期的情况。正如叶子奇说世祖定天下之刑,时有绞刑;但他接着叙述元末对死囚的处置,提到的却是斩刑<sup>⑥</sup>。

---

① 《颁降中统权宜条理诏》:“据五刑之中,流罪一条,似未可用。”见王恽:《中堂事记》下。

② 《元典章》卷五,《刑部》一二,《奴拐主财不刺配》;卷五七,《刑部》一九,《禁跳神师婆》;卷三五,《兵部》二,《隐藏军器罪名》。

③ 《元史》卷一四,《世祖纪》一一。

④ 见《元典章》卷四七。

⑤ 《刑统赋疏》。

⑥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

各级官府对于犯人的定刑权限为：“诸杖罪，五十七以下，司（录事司）、县断决；八十七以下，散府、州、军断决；一百七以下，宣慰司、总管府断决。配、流、死罪，依例勘审完备，申关刑部待报。”<sup>①</sup>

元制，各级地方政权机构处理一切公事，都必须有长官与正官集体与议、共同署押，称为“圆署”制度。只有路、府所置推官，由于是专门董理刑名，其余诸色事务，可以不参加会议通署。凡有罪囚，先由推官鞠问，问明案情后，再由全体行政官员“通审圆署”。所隶州、县发生的刑案，如超出当地官府决断权限，也由路、府推官负责审理<sup>②</sup>。

由于诸色户计的隶属和管理系统互不相同，凡遇到不同户计之间发生刑名词讼，就得采取“约会”制度，即由政府将有关户计的直属上司约到后共同归断。《元典章》卷五三列举的有关约会规定，包括与管军官，投下并探马赤官人，儒、道、僧官，医户头目，都护府官人及腹里、江南等地畏兀儿、哈迷里人头目的约会等。约会归断的案件范围，属于一般的争讼纠纷之类。重大案件，由有司鞠问，不须约会。

从五代至北宋，法医学逐渐形成发展起来，到南宋末年产生了法医学名著《洗冤录》。《洗冤录》知识在元代广泛使用的证据，就是大德八年颁布的《检尸法式》。元政府明文规定对尸体的检验点达七十余处。其方位、名称、顺序与《洗冤录》所著相近。验尸作为立案追勘的官定手续之一，而且其方式大略完备。这也是元代裁判制度的特点之一<sup>③</sup>。

法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除了这个共性之外，元朝的刑法还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出于推行民族防范政策的需要，元朝的蒙古、色目人可以

---

① 《元典章》卷三九，《刑部》一，《罪名府县断隶》。

② 参见《元典章》卷四〇，《刑部》二，《推官专管刑狱》。

③ 参见有高岩：《元代的诉讼裁判制度》，《蒙古学报》第一册（一九四〇年）。

享有许多法律上的特权、优待。反映到刑法上,就使它带上了十分浓厚的民族压迫的色彩。关于这一点,留待第六章另述。这里着重讨论元代刑法的第二个特点。按照“成吉思皇帝降生,日出至没,尽收诸国,各依风俗”<sup>①</sup>的原则,元朝刑法中包含有蒙古法、回回法等成分,而其最主要的部分即施于汉族居民的刑法,则基本上是金《泰和律》,或者也可以说就是历代中原王朝传统刑法的继承和发展。

施于蒙古人的蒙古法,大体上是由从部落时代沿用下来的若干习惯法以及自成吉思汗起陆续颁发的札撒(札撒中有一部分条文就是以法令的形式对于习惯法的重新宣布)构成的。对进入汉地及江南的蒙古人来说,随着他们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由此必然会引起的意识形态的某些变化,札撒的效能不可能一成不变。比如,札撒禁止蒙古人洗濯身上的衣服,直至它们完全破损;禁止人们说某物是不洁净的,而应当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清洁的,不存在洁净与否的区别<sup>②</sup>,这一类习惯法的产生,显然与蒙古人生活在水源珍贵的草原地带有关。入居内地的蒙古人似乎不可能亦无必要继续遵守这样的札撒。蒙古刑法的适用范围一般是受到限制的。但它对于在汉族居民中施行的刑法仍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对偷盗牛马羊畜的蒙古人处以盗一赔九之罚。后来,汉、南人偷盗头口,也“依著蒙古体例教赔九个”;盗猪亦依偷盗牛马羊畜例处断<sup>③</sup>。蒙古人屠宰牲口时,都将牲口四肢缚住,剖开胸腹,用手按住牲畜心脏至其死去。他们严禁抹喉放血的屠宰法,并将这条禁令强加给汉族及回回居民。从成吉思汗到元朝历代皇帝都一再强调上述法令,元朝和伊利汗国曾有不少回回人为违反这条禁令而被处死<sup>④</sup>。以上两个例子,都是

①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

② 梁赞诺夫斯基:《蒙古各部习惯法》,页五八。

③ 《元典章》卷四九,《刑部》一一,《汉儿人偷头口一个也赔九个》、《盗猪依例追赔》等。

④ 《蒙古各部习惯法》,页五七。

将蒙古法通过明文规定而施行于汉族或其他民族。还有一种情况,是在断罪量刑的实际过程中,将原来只适用于蒙古人的刑法施用于他族。例如对“剗房豁车”(割破营幕或车帐)而入盗者“以重法绳之”,无疑是产生于游牧社会的蒙古法。后来同一刑罚又可适用于偷盗“怯薛歹、诸色人等随从车驾及野处行营之家”的罪犯。最后,这种处罚扩大到一般“剗豁土居”人家的“常盗”罪犯,以致于元政府不得不行文各地制止上述刑罚的滥用<sup>①</sup>。

回回人之间的民事诉讼及轻罪,往往由元政府任命的回回法官哈的大师依回回法归断。回回法对元代刑法也有一定的影响。

元朝统治的中心地区是汉族地区,它所统治的人口绝大多数是汉族居民。从这个前提出发,再加上“各从本俗法”的原则,元朝刑法的最主要部分就不能不是中原历代封建王朝传统刑法体制的继承和发展。在这方面,较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元代法律文书中的“旧例”问题<sup>②</sup>。

“旧例”作为一个公牍语辞,在元代以前就已经常见于文献。元人沿用的“旧例”一词,相当于从蒙语“硬译”的公牍语辞“在先体例”,并不一定具有某种特定的含义。不过,元政府在至元八年前公布的断例中经常出现的“旧例”,除有极小部分系指蒙古或元廷颁定的成法外,其绝大多数,作为法司断狱量刑的直接依据,所指显然不是一般意义的旧例。这一点,只要举出两三个例子,并且将它们与《唐律》有关律文稍作比较,就很清楚了:

《元典章》卷四二,《刑部》四,《船边作戏渰死》:“旧例:戏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二等,谓力共戏而致死伤者。虽和以刃,若乘高履危,及入水中,以故杀伤者,准减一等。”

《故唐律疏议》卷二三,《斗讼》:“诸戏杀人者,减斗杀伤二

---

① 《元典章》卷四九,《刑部》一一,《剗豁土居人物依常盗论》。

② 可参见牧田巽、仁井田陞:《故唐律疏议成书年代考》下篇,《东方学报》东京版第二册(一九三〇年);仁井田陞:《金代刑法考》,《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卷;小林高四郎:《关于元代法制史上的旧例》,《江上波夫教授古稀纪念论集》历史篇。



等谓以力共戏，虽和以刃，若乘高履危，入水中，以故相杀伤者，唯减至死和同者一等。”

又《元典章》卷四二，《刑部》四，《走马撞死人》：“旧例：于城内街巷无故走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

《故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

仅从《元典章·刑部》及《刑统赋疏》载录的断例来看，至元八年前由法司援引的“旧例”，其文字与《唐律》相近者，即达近百条。但是这时候作为断罪的法律依据而加以称引的“旧例”，又不可能是《唐律》本身，因而只能是《泰和律》。其理由不难说明。首先，蒙古占领中原汉地以后，大量利用金朝降官旧吏治理旧金臣民。他们沿用此前一直有效的《泰和律》处断当地居民的刑名之事，是很自然的。从忽必烈即位到至元八年，元朝在刑法施行方面，除对五刑体制作了某些折代调整外，基本上维持着原来的状况。其次，至元八年十一月废《泰和律》后，大量征引“旧例”作为量刑直接根据的情况不再出现，这可以从反面证明过去循用的“旧例”确系《泰和律》律文。最后，《元典章》卷一七《户部》三《父母在许令支析》引“唐律：祖父母、父母不得令子孙分另别籍”，同时又引“旧例：女真人其祖父母、父母在日支析及令子孙别籍者听”。这是元人以“旧例”特指金律的有力证据。

中统、至元之初，有关刑狱之事，除重刑结案申部上报外，一般案件亦许有司“酌古准今”，“就便量情断遣”<sup>①</sup>。因此，今天所能看到的至元八年以前经省部裁决的案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对重刑的处断。另一类是在量刑方面对《泰和律》规定加以折代更动的案例，这是各地量刑处断时对《泰和律》规定的刑罚作相应减省折代的依据。

至元八年以后，元廷废《泰和律》。但在有关立法文书中，仍有援引“旧

<sup>①</sup> 《元典章》卷四，《朝纲》一，《体例酌古准今》。

例”律文的情况出现。这时候,不过是在制定新律令时参考“旧例”中所体现的传统法度,而不是以“旧例”作为处理公事的直接法律依据,因此它与至元八年以前的情况是不相同的。

## 二 铨选制度

### 铨选制度概述

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元廷新立条格,省并州县,定官吏员数及官职品从官职。十二月,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sup>①</sup>。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基本上收归中央。至元十四年八月,中书省又奏准《循行选法体例》,颁行有司,由是对内外官员铨注、迁转、升等的规定,更加详瞻、系统<sup>②</sup>。

根据忽必烈制定的“成宪”,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三大系统用人得自选闻奏。此外,百官的任免进退,一般都须经过中书省<sup>③</sup>。职官升迁,从七品以下属吏部,正七品以上属中书省,三品以上不拘常调,不由政府决定。六品至九品之职,由中书省牒署拟授,称为“敕授”,一品至五品由皇帝下制书任命,称为“宣授”<sup>④</sup>。

官员的迁转升等,分为三个系统,随朝诸衙门及行省、宣慰司官,常例三十个月为一考,一考升一等;外任地方官,常例三年为一考,一般需要二至三考升一等,蒙古、色目官员不在此限;匠官只在管匠官范围内流转。随朝官员的升迁速度最快,所以在当时尤其被视为“热选”。一般汉人、特别是南人,能得一官半职者,大都也不过是州县卑秩,要想升到从四以上的品秩是十分困难的。

①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② 《元典章》卷八,《吏部》二。

③ 参见《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卷二二,《武宗纪》一。管理宫廷或诸王私人事务的机构如中政院等,用人亦曾“依枢密院、御史台等例行之”,见《元史》卷八二,《选举志》二。

④ 《元史》卷八三,《选举志》三。

因此,高级官僚阶层基本上为半世袭化的蒙古色目贵族和极少数汉族官僚所垄断。从怯薛中不断地选拔人员担任各种军政要职是保持这种垄断的重要途径之一。姚燧在大德年间评论当日入仕之途,首举宿卫,谓“由宿卫者,言出中禁,中书奉行制敕而已”<sup>①</sup>。直到元末,朱德润论用人时仍说“凡入官者,首以宿卫近侍,……盖近侍多世勋子孙”<sup>②</sup>。而且这一部分人一旦入仕,皆居于要津。所以叶子奇慨叹“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sup>③</sup>。

与其他封建王朝相类似,元朝官员的来源,有科举、荫叙、推举三方面。但科举制度直到元代中期方始恢复,规模也很小。荫叙制度初定于至元四年,改定于大德四年。按大德规定,正、从一品官员之子许承荫正、从五品官,正、从二品官之子许承荫正、从六品官,以下依例递减,正、从五品官之子许承荫正、从九品官。六品、七品官之子只能承荫不入流品的吏职。品官子孙承荫,以一人为限<sup>④</sup>。很明显,承荫为宦的人数也不是很多的。除此之外,官员主要来源于推举。推举的情况比较复杂。由宿卫出职,担任高级官僚,实际上就是推举的一种;皇帝对不属于宿卫的人员,亦经常颁特旨授职委任,因为区别于常选,所以称为“别里哥选”(蒙语 belge,译言符验),也属于推举的一种;此外,中下层官僚,大部分由掾史书吏入流出职,占了由推举入官者的大部分。这是元代铨选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

吏的势力至少从北宋起就逐渐抬头。这种趋势在南宋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但在金统治下的北方却不断加强着。金室南渡,蒙古自北而下,控制半个中国,“郡县往往荷毡被毳之人,捐弓下马,使为守令。其于法意之低昂、

① 姚燧:《送李茂卿序》,《牧庵集》卷四。

② 朱德润:《送强仲贤之京师序》,《存复斋集》卷四。

③ 叶子奇:《克谨篇》,《草木子》卷三上。

④ 《元史》卷八三,《选举志》三。

民情之幽隐,不能周知而悉究。是以取尝为胥曹者,命具之文书上,又详指说焉”<sup>①</sup>。“司县或三员或四员,而有俱不识字者。一县之政,求不出于胥吏之手亦难矣”<sup>②</sup>。其结果,“事之然不然、可不可,长贰不得独决于上,必于吏目折衷焉”<sup>③</sup>。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吏甚至擅断了行政公事。“钱谷、转输、期会、工作、计最、刑赏、伐阅、道里、名物,非刀笔简牍无以记载施行,而吏始见用。……事定,军将有定秩,而为政者,吏或专之”<sup>④</sup>。吏的势力急剧膨胀,以至后来在北方,“曰官曰吏,靡有轻贱贵重之殊。今之官即昔之吏,今之吏即后之官。官之与吏,……每以字呼,不以势分相临也”<sup>⑤</sup>。元初由吏入流的途径便在这样的形势下自然畅通了。甚至一部分吏员,适应着铨选制度未定而客观上又有补注阙员的需要,以惊人的速度获得晋升,“才离州府司县,即入省部;才入省部,不满一考,即为州府司县官。”<sup>⑥</sup>

元统一全国后,官员日渐冗滥,对吏员入仕的规定就比较严格了。他们的晋升途径大致如下:从县吏历六十月经府州司吏而至路吏,然后经过公选,入廉访司作书吏(也有从儒人直接被推举为廉访司书吏的),历六十月可经行台书吏而升至御史台书吏,再历三十月为省部令史。自省部令史,或历九十月出职为从七品官;或历三十月而为行省、院、台令史,再经九十月出职,为正七品官;或历六十月而为省掾(行省、院、台令史历三十月亦可为省掾),再九十月出职,则为从六品官。其他机构中的吏员晋升状况,大致与此相似<sup>⑦</sup>。由县吏出职为七品官,需要捱蹭二十年以上的漫长岁月。虽然如此,吏业循资毕竟是一条相当稳妥的进身之路。因此,吏学成为社会上最风行的学问。自北而南,

① 危素:《送陈子嘉序》,《危太朴集》卷六。

② 胡祇通:《铨词》,《紫山集》卷二一。

③ 任士林:《送徐春野兰溪吏目序》,《松乡集》卷四。

④ 虞集:《苏志道墓碑》,《道园学古录》卷一五。

⑤ 吴澄:《赠何仲德序》,《吴文正公集》卷一四。

⑥ 胡祇通:《时政》,《紫山集》卷二二。

⑦ 参见牧野修二:《元代勾当官体系的研究》。

人皆以吏为师。“民家子弟才及十四五岁,托吏投充”<sup>①</sup>,争当贴、书之类的见习吏员,“学习吏文,以求速进”<sup>②</sup>。

由六部令史、行省掾或者都省掾出仕居七品之职,比从九品或八品职官依例迁调要快得多。做吏虽然其位卑而其役重,然而“盈考优升,俾为捷径,人亦忘其重劳焉”。所以元代有许多人宁可已官而复至省、部为掾,以是“六部宣司史外,已官复掾者,又居其半”<sup>③</sup>。究其原因,不外乎“为掾则一跃可至”七品,而“他官非十年不可其志,亦可悯也”<sup>④</sup>。

### 科举制度

窝阔台九年(一二三七年)八月,诏中原诸路以策论、经义、词赋三科考试儒生。诏令宣布,“其中选儒生,若有种田者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行例供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与各住处达鲁噶齐、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者。随后依照先降条例开辟举场,精选入仕,续听朝命。”<sup>⑤</sup>诸路考试,均于次年(戊戌年)举行,故称“戊戌选试”。

戊戌选试是在耶律楚材、郭德海等人鼓动下举行的。按照他们原来的打算,此后准备再辟举场,“精选入仕”,证明戊戌选试确实是科举取士的步骤之一。对戊戌中试者,除免其赋役外,原规定授以地方性的议事官之职,这更使它带有传统的科举考试的性质。但是,到窝阔台十年四月,又下诏举行汰选僧道的考试<sup>⑥</sup>。于是对僧道和对儒生的考试被一并施行,主持诸道考试的试官如赵仁、田师颜等,都是“三教试官”<sup>⑦</sup>。中试儒生除议事官、同署地方政事的

① 《元典章》卷一二,《吏部》六,《试补司吏》。

② 同上。

③ 许有壬:《送蔡子华序》,《至正集》卷三二。

④ 许有壬:《送刘光远赴江西省掾序》,《至正集》卷三二。

⑤ 《庙学典礼》卷一,《选试儒人免差》。

⑥ 杨奂:《于真人碑》,《还山遗稿》卷上。

⑦ 参见傅若金:《赵思恭行状》,《傅与砺文集》卷十,虞集:《赵思恭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二。

规定,也基本上没有实行,而仅仅得到了与僧道相同的豁免差发的优惠<sup>①</sup>。因此,戊戌选试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被蒙古统治者纳入了“考试三教”的范围。

忽必烈即位以后,元廷围绕科举行废问题曾展开反复讨论。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至元十年之议。这次拟定的程式,曾于次年十一月间呈闻太子真金<sup>②</sup>,其“条目之详,具载于策书”<sup>③</sup>。《元史·选举志》谓世祖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当即指此而言。但是终忽必烈之世,科举制度始终没有实行。成宗、武宗时,也一再议贡举“法度”,但仍然没有结果。

元朝前期科举长期停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忽必烈立国之前,蒙古对中原的统治已长达半世纪之久。在这个时期中,无论是担任方面之寄的蒙古军政长官或汉人世侯,都通过“承制宣署”及自行辟署两途除授了大量军政官员。忽必烈更定官制时,“先帝朝廷旧人,圣上潜邸至龙飞以来凡沾一命之人,随路州府乡曾历任司县无大过之人,暨亡金曾入仕及到殿举人”,都成了既定官员人选<sup>④</sup>。因此,元朝开国之初,另辟取士途径的客观需要不像其他新王朝那么紧迫。其次,中统、至元之际,国家多事,“渡鄂渚,平内乱,讨贼璫,取江南,破襄汉,驾洋海,下占城,定高丽,问罪交州,扫清辽甸”<sup>⑤</sup>,大量的军费开支使元政府面对严重的财政问题。忽必烈信用阿合马、桑哥等人以“理财助国”,遭到朝中许多儒臣的反对。这就进一步加深了蒙古统治者对儒臣的隔阂,因此对于遴选“真儒”的科举制度十分冷淡。再者,在忽必烈疏远儒臣、科举制度沮泥不行的同时,由吏入仕逐渐制度化。由吏出身的官员往往精于簿书期会,比较符合理财之臣用以督责百姓、聚敛掊克的需要。这种用吏制度

① 参见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识人与科举》,《史林》四二卷第六号(一九五九年)。

② 《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

③ 苏天爵:《陕西乡贡进士题名记》,《滋溪文稿》卷三。

④ 胡祇通:《论选举法上执政书》,《紫山集》卷一二。

⑤ 王恽:《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秋涧集》卷三四。

在形成的过程中,以越来越大的力量排挤了实行科举的可能性。最后,科举在长期推行过程中,其自身流弊日甚。元灭南宋后,一部分儒生甚至痛呼“以学术误天下者,皆科举程文之士。儒亦无辞以自解矣!”<sup>①</sup>元初接近忽必烈的一部分理学家如许衡等人由于忌恶宋金科场遗风,所以着重强调举办学校,作新人才,对立即恢复科举也不感兴趣。社会对以章句注疏、声律对偶之学取士的严厉批评,也加深了蒙古统治者对科举制本身的不信任。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自忽必烈开国算起,元朝前期科举停废长达半世纪之久。直到主张以儒治国的元仁宗即位,为了整顿吏治,改革由吏人仕制度带来的某些弊端,才重新提出“求贤取士,何法为上”<sup>②</sup>的问题。皇庆二年(一三一三年)末,元廷以行科举诏颁布天下,决定恢复科举制度。第一次考试,在延祐时举行,故以延祐首科见诸史文。

元代科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

“乡试”之名始于金。元地方一级考试沿用“乡试”之名,于八月举行。其科目,蒙古、色目人试二场。第一场经问五条,第二场策一道。至正时改经问五条为三条,另增本经义一道。经问只在四书内出题,增本经义一道,须在《诗经》、《尚书》、《周易》、《春秋》、《礼记》内明一经,难度增大了。汉、南人试三场。第一场明经,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至正时改古赋外于诏诰、章表内又科一道,第三场策问一道。答题时四书、《诗经》采朱注,《周易》主程、朱之说,《尚书》用朱熹门人蔡沈之说,《春秋》用程颐私淑胡安国作的传。这样,除《礼记》尚用古注疏,《春秋》许并用左传、公羊、谷梁三传外,其他儒家经典一律以程朱理学的阐发附会为本。所以袁桷曾惊叹“师友授受宗于一门、会于一郡,……何其盛也!”<sup>③</sup>

① 谢枋得:《程汉翁诗序》,《叠山集》卷六。

② 黄潜:《柏铁木儿家传》,《黄金华集》卷四三。

③ 袁桷:《送朱君美序》,《清容居士集》卷二四。



乡试科场,全国共设十七处,从赴试者中选合格者三百名到大都会试。其名额分配见下页表。

至正十九年(一三五九年),又定寓试解额,依原额减半;此年并在福建初设乡试,定额七人<sup>①</sup>。

“会试”之名亦始见于金。元朝会试定于乡试次年二月举行,科目与乡试同。会试共取录一百人,内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二十五名,参加殿试,

		蒙古	色目	汉	南	小计
行省十一	辽阳	5	2	2	—	9
	河南	5	5	9	7	26
	陕西	5	3	5	—	13
	甘肃	3	2	2	—	7
	岭北	3	2	1	—	6
	江浙	5	10	—	28	43
	江西	3	6	—	22	31
	湖广	3	7	—	18	28
	四川	1	3	5	—	9
	云南	1	2	2	—	5
	征东	1	1	1	—	3
宣司慰二	河东	5	4	7	—	16
	山东	4	5	7	—	16
直隶省部四	大都	15	10	10	—	35
	上都	6	4	4	—	14
	真定等	5	5	11	—	21
	东平等	5	4	9	—	18
合计		75	75	75	75	300

<sup>①</sup> 《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选举附录》。

其内容为试策一道。殿试诸生不再被黜落,只是以所对策第其高下,重新厘定等次,以“国人暨诸部”(即蒙古、色目人)为右榜,以汉、南人为左榜,唱名公布。两榜各分三甲。第一甲各一人,赐进士及第,秩从六品;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秩正七品;第三甲同进士出身,正八品。元统元年(一三三三年)殿试曾稍异其制,右、左榜第一甲各三人,皆赐进士及第。

元代科举考试,从延祐首科至元末,共举行过九次。其间由于伯颜擅权、执意废科,还曾停科两次。科举规模,无论就取录人数或进士的地位前途而言,与唐、宋相比都是很不足道的。

唐朝文职官员,出身科举者约占百分之三十八。两宋科举取士在铨选体制中所占的比重,曾分别达到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十六。比例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时(尤其是南宋)武官员数,所以在计算时无法从职官总数中扣除武官人数。南宋偏安东南一隅,一代(以三十五年计算)取士人数仍高达六千左右,是元代的七至八倍。元代后期五十多年,科举取士(包括国子监生员会试中选者)共一千二百余人。这个数字,占相应时期中文职官员总数的百分之四。从比例来说,只相当于唐代和北宋的十分之一强。

唐代科举入仕者,“位极人臣常有十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sup>①</sup>。在整个官僚构成中占有极优越的地位。初唐以后,凡入相者几乎都出身进士。宋代进士科也被时人视为“将相科”<sup>②</sup>。一旦及第,“指日金马玉堂”<sup>③</sup>，“十年可至辅相”<sup>④</sup>。元朝复科后五十四年间,可以确定以科举进身的参相者共九人,其入相年数总和,占同时期参相官员在职总年数的百分之三强。进士中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行省宰相及路总管的,现在所知,亦不出过百

① 王定保:《唐摭言》卷二。

② 王恽:《论明经保举等科目状》,《秋涧集》卷八六。

③ 王义山:《周均焱四书衍义序》,《稼村类稿》卷六。

④ 刘将孙:《题陈文二相翰墨》,《养吾斋集》卷二六。

人。此外大部分“例不过七品官，浮湛常调，远者或二十年，近者犹十余年，然后改官。其改官而历华要者十不能四五；淹于常调，不改官以没身者十八九”<sup>①</sup>。

如上所述，元朝科举制度的规模极其狭隘，因此，它对有元一代的既定用人格局，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不过，元王朝最先把程朱理学规定为考试取士的标准，此后中经明代直至晚清改革科举制度，以理学科士，维持了将近六百年。从这一点来说，它对后代的影响，又不可谓不大。

### 三 赋税制度的形成

#### 北方的税粮、科差

早在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游牧部落的统治者就已开始对属民征收“科敛”，称为 Qubchiri<sup>②</sup>。元代蒙、汉文合璧的圣旨碑或其他有关文献，则多把 Alba qubchiri（或作 Alban qubchirin）合译为“差发”<sup>③</sup>。窝阔台初年，它分为在蒙古本部征收的“草地差发”和在华北征收的“汉地差发”两种<sup>④</sup>。窝阔台八年丙申（一二三六年）更定税制，在华北确立丁、地税、丝料、商税等税目<sup>⑤</sup>，

① 苏伯衡：《送楼用章赴国学序》，《苏平仲集》卷六。

② 见《元朝秘史》第一五一等节。在波斯语中，qubjūr 译言从畜群中百头抽一的贡赋或折纳的货币。黑尼士认为蒙古语词 qubchiri 的原型应是 qubchir，-i 是它的直接宾格后缀，但是伯希和不同意他的看法。参见伯希和：《忽卜赤儿考》，《通报》卷三七（一九四四年），页一五三至一六四。

③ alba 在现代蒙古语中译言租税、当差、国库。有些学者认为，蒙古国最早的赋役有两类：即 Alba 和 Qubchiri。随着蒙古版图的扩大，这两类赋役的征收对象也扩大到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同时它从形式（包括名称本身）到内容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见舒尔曼：《十三世纪的蒙古贡赋制度》，《哈佛亚洲研究》卷十九（一九五六年）页三〇四至三八九；约翰·麦逊·史密施：《蒙古和游牧税制》，《哈佛亚洲研究》卷三十（一九七〇年），页四六至八五。

④ 《黑鞑事略》。

⑤ 《元典章》卷二四《户部》十，《种田纳税》追述成吉思汗圣旨，已有地税、商税等目。这时蒙古政权对华北未规定统一税制，此当为各地依旧制自行征收的税目。

后来又加上包银一项。此后,“差发”一词经常成为上述各种课赋的总称;但有时候它也被当作科差(即丝料和包银)的代称在当时的公文书中使用<sup>①</sup>。

丙申税制基本上奠定了有元一代在北方的赋税体制;忽必烈即位之后,不过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了“送纳之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会计之法”等有关规定而已<sup>②</sup>。按至元间的定制,北方赋税,主要有两项,即税粮和科差(其他课程另述)。

税粮分为丁税和地税两种。丁税每丁粟二石<sup>③</sup>,地税每亩粟三升。诸色户计按照各种规定分别交纳地税和丁税中的一种。作为对儒户、僧道等的优待,规定他们种地纳地税,不纳丁税。军、站户也不纳丁税,并且可免四顷地税,其余每亩课征。对河西中兴路(治今宁夏银川)、西宁州(青海西宁)等三处人户也征地税。除此之外,对大多数民户究竟是征取丁税还是地税呢?《元史·食货志》说:“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元末人危素评论南、北赋役原则的差别说:“大抵江、淮之北,赋役求诸户口,其南则取诸土田”<sup>④</sup>。“国朝既定中原,制赋役之法,不取诸土田而取诸户口,故富者愈富,贫者愈贫”<sup>⑤</sup>。泰定年间的张珪也提到淮北、内地的“旧制”是“止征丁税”<sup>⑥</sup>。大约一般民户所当丁税额往往超过地税额,故而实际上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民户都交丁税<sup>⑦</sup>。唐代前期的租庸调,实际上就是在计丁授田

---

① 见《元典章》卷二五《户部》一一《差发从实科征》。《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天历元年包银差发:钞九百八十九锭、貳一百一十三万三千一百一十九索……”或谓此处差发为丝料代称,不确。

② 《经世大典序录·赋税》,《国朝文类》卷四〇。

③ 据《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丁税额“每丁粟三石”,此当为二石之误。参见爱宕松男:《元朝税制考》,《东洋史研究》卷二三第四号(一九六五年)。

④ 危素:《休宁县尹唐君覈田纪》,《危太朴集》卷二。

⑤ 危素:《书张承基传后》,《危太朴集》续集卷九。

⑥ 《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此处“内地”指腹里言。

⑦ 参见陈高华:《元代税粮制度初探》,《文史》第六辑(一九七九年)。

基础上建立的计丁课税制度。就计丁课税的原则而言,元代北方的税粮制度与唐代租庸调制确有某种相似之处<sup>①</sup>。但由于诸色户计之间相互买卖土地以及其它一些原因,在征收税粮时经常出现混乱和纠纷,往往有一户并纳二税的现象发生。

每丁二石是指全额丁税的纳粮数。然而纳丁粮的人户并不都是交纳全额的。中统元年,将天下人户分为元管户(过去业已登入户籍而在政府重新括户时情况没有变化的人户)、交参户(过去括户时曾经入籍,后来迁徙他乡因而在当地重新登录著籍的人户)、协济户(没有成年人丁的人户)、漏籍户(过去从未著籍的人户)等几类,他们交纳丁税的数额有些不同,兹列表如下页:

元管户	全科户	每丁粟二石
	减半科户	每丁粟一石
协济户	准减半科户	每丁粟一石
新收交参户	经六年全科	第一年五斗,[第二年一石,]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税(即二石)。

如前所述,科差包括丝料和包银二项。科差的征收对象,主要是一般民户。所得丝料大部分归政府所有;历年分拨给诸王、贵戚或勋臣的民户所完纳的丝料中,有一部分经过政府转交给封主,其数额以每五户二斤为率,这部分丝料称为五户丝,所以这部分民户也被称为“系官五户丝户”,以别于其他“系官户”。科差征收额也按元管、交参、漏籍、协济四类户别而不同,兹列表如下:

<sup>①</sup> 因此《元史·食货志·税粮》说丁税、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看来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丝料		包银
			系官丝	五户丝	
元管户	系官户	丝银全科系官户	一斤六两四钱		四两
		止纳系官丝户	上都、隆兴、西京等路,户纳一斤;大都以南等路户纳一斤六两四钱。		
	系五户丝官户	全科系官五户丝户	一斤	六两四钱	四两
		减半科户	八两	三两二钱	二两
		止纳系官五户丝户	一斤	六两四钱	
交参户①	系官户	丝银全科户	一斤六两四钱		四两
漏籍户		止纳丝户	一斤六两四钱		
		止纳钞户			初年一两五钱;二年二两;递增至六年科四两,并科丝料,与丝银全科户同
		丝银户	十一两二钱②		四两③
协济户		止纳丝户	十一两二钱④		

包银在蒙哥时代已定为四两,惟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到中统四年,全部以钞输纳<sup>⑤</sup>。至元四年五月,又下令按缴纳包银的数额,每四两增纳一两,以给诸路官吏俸禄,是为俸钞<sup>⑥</sup>。

① 交参户中恐不止丝银全科户一种,可惜史料不详。

② 从丁税的征收额看,协济户准减半科户。因此他们交纳的丝线,当为全科户(二十二两四钱)的一半,即十一两二钱;交纳的包银,恐怕也是全科户之半,即二两。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⑥ 《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必须指出,上述各类户别的科差征收额,是政府在计算各地应纳科差总额时的依据。实际上,各地在向民间直接征收科差时,常常是根据政府规定的总额重新摊分,“各验贫富品答均科”<sup>①</sup>,而不是完全按照上表所列出的平均额向各户征取的。魏初在评论新签军户所带来的骚扰时曾说:“今体察得随路新签军户多系各处近上户计,止依额除讷包、俸钞5两(按军户不纳科差)外,其余趯兑下数目,却于近下户计验正额科拨”,因此造成民间负担过重<sup>②</sup>。这段史料证明实际征取科差时,是要依民户贫富、户等高下“品答均科”的。

### 南方的夏、秋二税

北方税粮制度的最终确立是在至元十七年,当时元政府已经灭宋、统一江南。元朝统治者没有将北方的赋役制度引入新征服的南宋故地,而沿用南宋旧制,以减轻改朝换代在江南社会及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引起的震动或干扰。因此,元代江南赋税,与南宋相同,即继续征收秋税和夏税。两税之中,以秋税为主。

秋税征取主要是粮食,南方若干地区也有以部分税米折钞征收的。其税额大体上是因旧例而定,没有统一的标准,出现了“田地有高低,纳粮底则例有三、二十等,不均匀一般”的情况<sup>③</sup>。从现有材料看来,秋税高的地方,每亩苗米达三斗三升多<sup>④</sup>,一般的亩科四升五合或五升<sup>⑤</sup>,低的在二升左右<sup>⑥</sup>。

征科江南夏税之制,定于成宗元贞二年(一二九六年):“元贞二年九月十

① 魏初:至元九年七月奏议,《青崖集》卷四。

② 同上注。又,参见王恽:《上世祖皇帝论时政书》,《秋涧集》卷三五;胡祇通:《论逃户》,《紫山集》卷二二。

③ 《元典章》卷二四,《户部》一〇,《科添二分税粮》。

④ 《嘉靖徽州府志》卷七,《食货·元岁征之式》。

⑤ 《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

⑥ 胡翰:《吴季可墓志铭》,《胡仲子文集》卷九。



八日奏过事内一件,节该,江南百姓每的差税,亡宋时秋、夏税两遍纳有。夏税木棉、布、绢、丝绵等各处城子里出产的物折做差发斟酌教送有来,秋税止纳粮。如今江浙省所管江东、浙西这两处城子里,依著亡宋例纳有,除那的外,别个城子里依例纳秋税,不曾纳夏税。江西的多一半城子里百姓每比亡宋时分纳的,如今纳税重有,谓如今收粮的斛比亡宋文思院收粮的斛,抵一个半大有。若再科夏税呵,莫不百姓根底重复么!两广这几年被草贼作耗,百姓失散了有,那百姓每根底要呵,不宜也者。浙东、福建、湖广百姓每夏税,依亡宋体例交纳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着,钦此”<sup>①</sup>。

根据这个文件,我们可以知道,江南科征夏税的地区,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世祖年间就开始科取的地区,即江东和浙西。所以《元史·食货志》说“世祖平宋时,除江东、浙西,其余独征秋税而已”,另一类地区包括浙东、福建和湖广行省的北部。江西行省(包括今广东省部分地区)和湖广行省南部则向未征收夏税。

夏税的征收办法和数额,一般也以南宋旧例为据,各地不尽统一。有的地方以土地等级摊派实物,或者再折收价钞<sup>②</sup>。大部分地区,看来是以秋税征粮额为基数,再按一定的比率折收实物或钞币。凡秋税一石者,输夏税一贯,或一贯半,或一贯七百文,或二贯、三贯乃至三贯四钱之上,要皆“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众,酌其中数而取之”<sup>③</sup>。

上面说的是两税。除此而外,江南也有科差。一曰江南户钞。它相当于北方的五户丝。灭宋后,以江南民户增拨诸王、贵戚、功臣名下。当时科差未定,元廷考虑到“既各投下分拨与了民户,多少阿合探马儿(指五户丝料)不与呵,不宜的一般”,因此,在至元二十年八月决定暂从“系

① 《元典章》卷二四,《户部》一〇,《起征夏税》。

② 参阅陈高华:《元代税粮制度初探》。

③ 《经世大典序录·赋税·夏税》,《国朝文类》卷四〇。

官钱内一万户,阿合探马儿且与一百定钞者,已后定体[例?]了呵,那时分恁要者”<sup>①</sup>。据《经世大典序录·赋税·科差》,纳差名目,在北方曰丝料、包银,“及得江南,其制益广”<sup>②</sup>,是知江南户钞,后来亦成为定制,在江南民户中征取。成宗时,复增至户二贯。这个数额,直到修《经世大典》时,没有再改变。江南科差的另一项也是包银。不过,江南征收包银的范围很有限,时间也相当短。

不论南方、北方,除了正额税粮外,都还要征收附加税粮,其名目繁多,如“鼠耗”、“分例”等,这一类追加剥削,数量是很惊人的,甚至经常超过正额。

除了征收税赋的民田以外,元政府还掌握着一批“许民佃种输租”的土地,属于官田的一部分<sup>③</sup>。这种系官田,在北方主要集中在江北、两淮地区,在南方数量更多,主要是继承南宋官田以及通过没收罪人资产或从民间强征来的。元政府既是主权者,又是这部分土地的所有者,因此它从这部分土地上所获得的收入,包含着地租和地税的两种性质。官田有的直接租给直接生产者,有的由豪强承佃,再转租给农民。其纳租办法,“江北、两淮等处荒闲之地,第三年始输。大德四年,又以地广人稀,更优一年,令第四年纳税”<sup>④</sup>。这是说的北方,南方情况稍有不同。

忽必烈平宋后,对开垦南方公田和荒闲地的富户和一般百姓,由官府提供“工本”,税率(实际上是租率)依南宋旧额酌减三分之一。后来逐渐取消了“工本”,但对“有心种田的百姓每”,仍规定初年免税,次年纳半,第三年“三停

---

① 《元典章》卷二四,《户部》一〇,《租税·投下税粮许折钞》。《元史·食货志·岁赐》谓“时科差未定,每户折支中统钞五钱”,当即得之于一万户与钞百锭的比率。

② 《经世大典序录·赋税·科差》,《国朝文类》卷四〇。

③ 为解决军储、充实边境、防止人民反抗及处置犯人而设的军屯和民屯,其田土从性质上说也是官田,此不俱论。

④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内交纳二停”，并且蠲免其他杂泛差役<sup>①</sup>。大德年间，又诏令各处官司优抚不能还业的流民，“有官田愿种者，从便给之，并免差税五年”<sup>②</sup>。在对官田佃民给予某些优惠的同时，元初官田的租额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轻的。约从成宗末年起，逐渐形成“官田租重”的趋势<sup>③</sup>，元代中后期官田剥削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sup>④</sup>，有的地区甚至亩岁输谷二石二斗<sup>⑤</sup>。不仅如此，这个时期，国家对于官田佃民的剥削，具有更加明显的超经济强制的性质，以至浙西地区“言及公田，孰不怨恨！言及公田，谁肯耕作！”<sup>⑥</sup>

#### 诸色课程及役法

除了北方的丁、地税和包银、丝料，南方的秋、夏二税之外，元政府的收入，还来自于各色税课，包括盐税、茶税、酒醋税、商税、市舶抽分、额外课，以及金银铜铁等课。《元典章》把上述各种名目，全部著录于“课程”之下。

北宋由政府经营盐业生产的制度，为其后历朝所承袭，元代也不例外。盐课收入成为国家最重要的财赋来源之一，所以元人说：“经国之费，盐税为重”<sup>⑦</sup>。甚至有人估计“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sup>⑧</sup>。这大概是随着盐课激增直到延祐年间的状况，如果以为元初以来一向如此，自然有些夸张。但至元后期盐课总额在200万锭左右，相当于国家一岁钱币所入（税粮未计入）的一半以上，是没有问题的<sup>⑨</sup>。

盐法之立，始于窝阔台时期。世祖时，先后在南北主要产盐区设都转运使

① 《元典章》卷一九，《户部》五，《种佃·开种公田》。

② 《元典章》卷三，《圣政》二，《恤流民》。

③ 《江浙行省所委检校官王艮议乞增科田粮案》，见《松江府志》卷二〇，《田赋》上。

④ 吴澄：《题进贤县学增租碑阴》，《吴文正公集》卷二八。

⑤ 贡师泰：《上虞县核田记》，《玩斋集》卷七。

⑥ 《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

⑦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法通例》。

⑧ 《元史》卷一七〇，《郝彬传》。

⑨ 见舒尔曼：《元朝经济制度》，页一七〇。

司管理盐政,隶属于户部,其他地区,则设立盐课提举司或茶盐提举司,以保证盐课收入。

除辽阳和晋北等某些地区以外,元政府对盐的生产严加控制。它由一种专门的人户即灶户来生产,而且要受到国家的严格监督。由政府规定产盐数额,定期向灶户发放工本钱,所生产的盐必须全数上缴国家。灶户所得的工本钱,只相当于国家发卖食盐价格的五分之一至七分之一<sup>①</sup>。

在盐的销售方面,元政府采取与宋、金相同的办法,即实行“行盐法”和“食盐法”。除产盐地以外的大部分地区是“行盐区”,由盐商向政府纳课,换取盐引,到盐场支盐,再运到规定地区贩卖。盐货的行销仅限于同一“行盐区”之内,夹带“犯界盐货”要按比私盐轻一等的刑法治罪。按照这个制度在一定的行盐区内投入市场的盐货,实际上已被政府预先科取了食盐税,不过这种税赋,包含在盐引的发售价中,而没有独立的形态<sup>②</sup>。产盐地区的居民,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未曾科征食盐税的盐货,所以行盐法在这里是很难奏效的。于是将盐场附近百里之内(有些地方后来又改为附场十里之内)划为“食盐区”,由政府设局,按户口预收盐价,“桩配”食盐,也就是迫使这些地区的居民同样交纳食盐税。当逃税私盐泛滥无法禁止时,政府有时也采取改行盐区为食盐区的办法来保证盐课收入。刘敏中《益都路总管李公去思记》:“初,司盐铁者以青地多鹵,盐所易出,乃比屋计口配盐,入其直以防民私,谓之食盐。久则吏缘为奸,口岁至五十斤。盐賸而食弗尽,诬之以私鬻,直多而偿不足,罪之以欠课。敲榜禁系,求索百端,往往破产而后已。”<sup>③</sup>。像这样改行盐为食盐、桩配勒索的状况,到元代后期更加严重。

按政府规定,“官定袋法”,每袋四百斤,带席索通秤四百十斤<sup>④</sup>,称为一

① 见舒尔曼:《元朝经济制度》,页一七一。

② 盐引价格中包括政府对食盐的批发价和食盐税两部分。

③ 《中庵集》卷二。

④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新降盐法事理》。

引。文宗朝以前盐引价格变化如下：

至元十三年	九贯(中统钞,其价十分之一折银交纳,下同)
至元二十一年	十五贯
至元二十五年	三十贯
至元二十六年	五十贯
元贞二年	六十五贯
延祐七年	一百五十贯
泰定二年	一百二十五贯
天历二年	一百五十贯

茶课的征收,也在窝阔台时代就开始了。由于茶叶生产主要是在南方,所以茶课制度是在灭南宋后趋于完善的。茶课与盐课不同,完全属于税收性质。元代榷茶之制与宋颇不相同。茶商先向茶司缴纳茶税,领取公据,然后到产茶地区按公据载明的数量向茶户买茶,再回到茶司缴回公据,换取茶引,凭茶引发卖茶货<sup>①</sup>。茶货在江淮以北行销,须另缴茶税<sup>②</sup>。产茶地面的茶户,平时食用茶货也要缴税,那是“验多寡物力贫富均办”,随地租、门摊一并征收的<sup>③</sup>。在西南地区,曾一度由官府统一收购民间茶货,再置局发卖<sup>④</sup>。至元十七年卢世荣主持全国财政时,曾采取“一概桩配”、“创立门摊食茶课程”的办法直接向百姓征收茶税<sup>⑤</sup>,但不久就废止了。

与生产盐、茶不同,酒醋之货几乎处处可制、户户可醞。窝阔台时曾在各地设酒醋务坊场官,隶属于征收课税所。入元后,“始立榷沽之时,官设酒库,

---

① 参见《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茶课》有关诸条。按宋代的榷茶之制,是由政府向茶园民户买下所有茶货,官为发卖,见《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第五。

② 成宗时因此命江南通增茶课三千锭,抵北方另征的税额。

③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茶课》。

④ 参见《元史》卷一六七,《张庭瑞传》。

⑤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恢办茶课》。

出备米曲工本,造酒发卖,诸人皆不得私自酿造。……故犯酒禁者与犯盐之法同。”但禁私酒比禁私盐、私茶更为困难,所以后来“废榷沽之法,酒醋课程散入民间恢办,诸人皆得造酒。有地之家纳门摊酒课者,许令造酒食用;造酒发卖者,止验米数赴务投税。”<sup>①</sup>是知酒税有门摊和验米数赴纳两种形式,醋课大概也是按照同样的办法征收的。

商税也是国家的重要财源之一。至元七年,定国内商税,三十分取一。海外贸易的税收即市舶税,定制于灭宋之后。至元期间,元政府曾先后在泉州、上海、澈浦(在今浙江海盐县)、温州、广东、杭州、庆元(今浙江宁波)设置市舶提举司凡七所,管理临海诸郡与外国往还互易。市舶税率,细物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称为抽分。抽分比率以后不断增加。先有单抽、双抽之制,土货单抽,蕃货增一倍,称为双抽。后来又定制,凡商旅贩泉、福等处已抽之物于本省有市舶提举司之地卖者,复加抽分,细物二十五分之一,粗物三十分之一。至元末,省并温州、杭州等司,并命诸市舶提举司如泉州例,于抽分之外,又取三十分之一“以为税”。英宗至治年间,定于庆元、广东、泉州三地设市舶提举司。

除上述各种税目外,还有所谓“额外课”,即在岁课定额以外的赋税收入,如历日、池塘、蒲苇、鱼苗、柴、姜、白药等数十种,大概有很多属于常额之外因地而异的税入。

金、银、珠、玉、铜、铁、水银、朱砂、铅、锡、矾、硝、碱、竹、木之类山林川泽特产的生产,由官府经营,称为系官拨户兴煽洞冶,或由民间自行开采生产,称为自备工本洞冶。国家对自备工本洞冶所出产品,采取抽分制,银一般为十抽三,铁十抽二,抽分率分别比宋代提高百分之十,磁窑二八抽分。这部分收入,属于税赋性质,有时折钞交纳。系官拨户兴煽洞冶所得,由国家支配。这部分收入,从性质上分析主要属于生产所得,在元代也将它与前者一同归入“岁

<sup>①</sup>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私造酒曲以匿税例科断》。

课”所入。不过,《元史·食货志·岁课》“天历元年岁课之数”所著录的,实际上恐怕还是抽分所得,政府经营的洞冶,产量相对地要高得多。例如至大二年(一三〇九年),上都、中都银冶提举司输银八十五锭,次年输银七十锭。而天历元年腹里银课总额一共只有一锭半。官营产量不在其中是十分明显的<sup>①</sup>。

人民所承担的税粮(包括丁、地税,秋、夏税)、科差和课程都属于赋,此外还有役。元代的役法也相当复杂。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政府为兴役造作、治河、运输等需要而定期征发的“杂泛之劳”,包括人夫、牛车等;二是“差役”,即担任封建国家基层行政设施的职事(里正、主首、隅正、坊正),以及为官府保管财物的仓官(实际不是官职)、库子等。社长、弓手等在部分元、明方志中也被列为差役。元代前期,当役的主要是民户。成宗大德年间改革役法,此后关于诸色户计的当役规定时有变更,总的说来,当役面有所扩大。按元政府的规定,分配杂泛差役时,应根据当役户的丁产,先尽富实,次及下户。在实行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项目的差充办法并不相同。元代的杂泛差役,对人民群众都是十分沉重的负担<sup>②</sup>。

---

①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参阅舒尔曼:《元朝经济制度》,页一四八。

② 参见陈高华:《元代役法简论》,《文史》第十一辑(一九八一年)。



## 第五章

# 元代的社会经济

### 第一节 统治阶级对土地的占有和兼并

#### 一 系官田地的扩大

元朝统一全国后,封建剥削制度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封建统治者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占有大量的土地。他们通过土地占有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剥削,而依靠政治暴力保证这种剥削的进行和实现。所以他们在不择手段地掠夺劳动人民的土地的同时,不断地强化封建地主阶级的专政,巩固和扩大其统治基础。元灭南宋,对于蒙古、色目统治阶级和投靠蒙古统治者的北方各族官僚地主来说,便是他们掠夺范围的扩大;对于一般汉族地主来说,正是趁火打劫,兼并土地的好机会。所以元朝统一全中国后,大土地所有制在宋、金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占有的土地愈来愈多,自耕农民则愈来愈少,或沦为封建地主的佃户,或流离失所,短短的数十年内,便出现了比宋、金更为严重的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

元朝的土地,从占有形式上看,可分为官田和民田两类。官田(《元史》称为“系官田”)是以封建皇帝为代表的封建政府直接占有的土地,包括屯田(军屯、民屯)、职田、学田、草场、牧地以及封建皇帝给予贵族、官僚、寺院的大批赐田;民田是指官僚地主、一般富户地主、寺院以及自耕农民占有的民间土地。

元朝的官田,在宋、金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扩大。五代以前,封建政府占有的官田主要是屯田,且在边疆,为数还不多。五代时,封建政府的官田的占有形式增多了,如南方小国闽的统治者王审知,在福建“八州皆有官庄”<sup>①</sup>。北宋官田承五代之后,续有发展,营田(军屯)和庄田估计约在六万顷左右。南宋因军费浩繁多次出卖官田,其官田总数不可确知,大致比北宋增加了三倍,约在二十万顷左右,占全国耕地十五分之一弱。金接收北宋北部地区官田之后,又不断拘刷民田为官田,分配给移入淮水以北、燕山以南各地的女真人、契丹人、奚人。金世宗完颜雍时,在河北、山东括民田三十多万顷<sup>②</sup>。金统治者还到处占民田为牧地、草场,金的官田,也远远超过了北宋。宋、金亡后,除这些官田转为元朝封建政府所有外,宋、金两朝的贵族、官僚、军阀们所掠夺的土地也成了元朝的官田。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元朝官田的另一来源,是没官田和利用各种借口直接括自广大农民's私田。

元朝在灭南宋的过程中,凡遇到南宋守土官员坚决抵抗的,城下之后,其田产全部没官;支持南宋政权抗元的一些江南地主的田产也没为官田。曾为元朝开辟长江口至北方直沽间海运的朱清、张瑄被杀后,其分布在八路十五州的田产全部没官,立江浙财赋提举司以供中宫<sup>③</sup>。元世祖忽必烈时阿合马为尚书省平章,权倾朝野,声势煊赫,“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他于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年)被杀,其田拨充屯田<sup>④</sup>。白云宗总摄沈明仁,交通官府,勾结乡绅土豪,依仗徒众势大,占有土地二万顷,其徒也都夺民田宅,仁宗时失败,所有土地全部没官<sup>⑤</sup>。元朝蒙古统治者进入汉族农业地区后,尽管也认识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志》一之二,《农田杂录》。

② 《大金国志》卷一二;《金史》卷九三,《兵志》;卷九八,《食货志》二等。

③ 《至正金陵新志》卷六,《历代官制》。

④ 《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

⑤ 《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

到使百姓安业力农对于他们的好处,可是那种游牧社会中的生活习惯,到了全国统一后仍然不能完全摆脱,加以为了防止和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需要大批战马,所以牧场、草地继续扩大,遍于全国,“东越耽罗,北逾火里秃麻,西至甘肃,南暨云南等地,凡一十四处,自上都、大都,以至玉你伯牙(今内蒙古奈曼旗东北)、折连怯呆儿(今内蒙古通辽东北大林东南),周回万里,无非牧地”<sup>①</sup>。在分布全国的军队驻地周围,又无不辟有牧场孳养马匹。内地和南方的牧场和草地主要圈自民田,在安西王领地内,农田被占作牧场的竟达30万顷之多<sup>②</sup>。元朝屯田,“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或“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制兵屯旅以控扼之”<sup>③</sup>,布列于全国各个角落,自中原到边疆,无地不屯。屯田既广,官田不足,便夺民田。那些前代没有屯田的地方,更是如此。至元二十五年(一二八八年),“时欲夺民田为屯田”,大司农董文用“固执不可”,结果作为绊脚石被排挤,调为无足轻重的翰林学士承旨<sup>④</sup>。军屯或民屯,在官田不足时,又常以被签民户自备“己业田”充数,而屯户世袭,于是连这部分田地也成为“官田”。这种现象最为残酷,自由农民一旦被签为屯户,既失土地,又失自由,世代被强制附着在屯田上,沦为封建国家的佃户。

元朝政府不止一次地夺民田为官田、职田、学田,手段恶劣,无孔不入。在蒙金、宋元战争中农民抛下的所谓“荒闲”土地,农民开垦的河湖退滩地、沿海海涨涂田等,都收为官有。世祖时江南立营田司,以荒地属官例,夺宋代以来农民开垦荒地的世业田<sup>⑤</sup>。英宗时宣政院派人到浙西,借口是二百年前宋高宗吴皇后的汤沐田,夺民十万户恒产为官田,赐给普庆寺为业<sup>⑥</sup>。各路官吏职

①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马政》。

② 袁桷:《郑制宜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③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

④ 《元史》卷一四八,《董文用传》。

⑤ 吴澄:《题李氏世业田碑后》,《吴文正公全集》卷三二。

⑥ 刘基:《前江淮转运盐使宋公政绩记》,《诚意伯文集》卷六。

田,元朝定例除断没地、营盘草地外,“依本处系官并户绝地及冒占荒闲地内,依数标拨”<sup>①</sup>。所谓“冒占荒闲地”,实是农民开垦的荒闲田,这是夺民田为职田。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年),世祖诏令,没有学田的地方,“量拨荒闲田给赡生徒”<sup>②</sup>,这是夺民田为学田。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些豪强恶棍强指民田为无主田土,连同人户献给封建政府,希图邀功俸进。武宗时河南有人“冒献河汴官民田为无主”,尚书省立田粮府收取田租,“岁输数万石”,仅此一次所献田土即达十万亩以上。

有元一代究竟有多少官田?现在无法统计出一个正确数字来。据《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篇的不完全记载,当时枢密院、宣徽院、大司农司、各行省所辖军民屯田就有十七万五千二百九十六顷二亩。至于以职田形式出现的官田,从元朝所定各行省诸司官吏的职田数中,也可以窥见其数量之大。《元史》卷九六《食货》四《俸秩·职田数》载,至元三年(一二六六年)、十四年(一二七七年)定北方路府州县官吏职田:

路:	上路	下路
达鲁花赤	16 顷	14 顷
总 管	16 顷	14 顷
同 知	8 顷	7 顷
治 中	6 顷	
府 判	5 顷	5 顷
散府:		
达鲁花赤	12 顷	
知 府	12 顷	
同 知	6 顷	

① 《元典章新集》《户部》,《官员职田依乡原例分取》。

② 《元典章》卷二,《圣政》一,《兴学校》。

府 判	4 顷		
州:	上州	中州	下州
达鲁花赤	10 顷	8 顷	6 顷
州 尹	10 顷	8 顷	6 顷
同 知	5 顷	4 顷	
州 判	4 顷	3 顷	3 顷
警巡院:			
达鲁花赤	5 顷		
警 使	5 顷		
警 副	4 顷		
警 判	3 顷		
录事司:			
达鲁花赤	3 顷		
录 事	3 顷		
录 判	2 顷		
按察司:			
按 察 使	16 顷		
副 使	8 顷		
金 事	6 顷		
经 历	4 顷		
县:			
达鲁花赤	4 顷		
县 尹	4 顷		
县 丞	3 顷		
主簿(兼尉)	2 顷		
县 尉	2 顷		

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年)定江南各行省诸司官吏职田:

路:	上路	下路	
达鲁花赤	8 顷	7 顷	
总 管	8 顷	7 顷	
同 知	4 顷	3 顷 50 亩	
治 中	3 顷		
府 判	2 顷 50 亩	2 顷 50 亩	
经 历		2 顷	
提控案牒		1 顷	
知 事		1 顷	
散府:			
达鲁花赤	6 顷		
知 府	6 顷		
同 知	3 顷		
府 判	2 顷		
提控案牒	1 顷		
州:	上州	中州	下州
达鲁花赤	5 顷	4 顷	3 顷
知 州	5 顷	4 顷	3 顷
同 知	2.5 顷	2 顷	2 顷
州 判	2 顷	1 顷 50 亩	1 顷 50 亩
提控案牒	1 顷	都目 50 亩	
县:	上县	中县	下县
达鲁花赤	2 顷	2 顷	1 顷 50 亩
县 尹	2 顷	2 顷	1 顷 50 亩
县 丞	1 顷 50 亩		

主 簿	1 顷	1 顷	(兼尉)1 顷
县 尉	1 顷	1 顷	
录事司:			
达鲁花赤	1 顷 50 亩	司 狱	1 顷
录 事	1 顷 50 亩	巡 检	1 顷
录 判	1 顷		
按察司:			
按 察 使	8 顷		
副 使	4 顷		
金 事	3 顷		
经 历	2 顷		
知 事	1 顷		
运司官:			
运 使	8 顷		
同 知	4 顷		
运 副	3 顷		
运 判	2.5 顷		
经 历	2 顷		
知 事	1 顷		
提控察牍	1 顷		
盐司官:			
盐 使	2 顷		
盐 副	2 顷		
盐 判	1 顷		
场 正	1 顷		
管 勾	1 顷		



上面仅是政府规定的职田数,全国数以万计的官吏所拥有的职田总数,那肯定是十分惊人的。至于官吏侵吞豪夺的土地更是无法统计了。官吏职田的佃户数量如下:“诸职官三品(路一级)职田佃户有五七百户,下至九品(县级以下巡检司一类),亦不下三五十户”<sup>①</sup>。其数字同样十分惊人。

## 二 贵族、官僚的土地占有

元朝统治者将一部分官田赐给贵族、官僚,数量之多、滥赐之盛,为历史上所罕见。如文宗天历元年(一三二八年)赐燕铁木儿平江官田五百顷,以故平章黑驴平江田三百顷及嘉兴芦地赐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二年(一三二九年),还旧赐笃麟帖木儿平江田百顷;至顺元年(一三三〇年),以平江等处官田五百顷赐鲁国大长公主。

蒙古、色目贵族和各族官僚,除从政府那里收得大量职田和从皇帝那里取得赐田外,还通过战争掠夺和其他种种非法手段占有大片田地。

贵族占田的情况十分严重。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云:“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sup>②</sup>;世祖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占领大量田地进行牧马,“牧人利旷远”,又扩占“旁近世业”民田三十万顷,“民数诉理求地,持轧不下”,多年后元政府派人清理,才得归还<sup>③</sup>。忙哥剌扩占牧场旁近民田尚且达三十万顷,可见原有的牧场当比这更多。指挥元军灭宋的伯颜曾经对人自夸说:“诸将渡江,无不荒贪,唯我与国宝(张庭珍字)始终自守”。可是在成宗元贞二年(一二九六年),他与征宋将领阿朮、阿里海牙等因占有江南田土不输赋税,受到元政府派人调查稽核<sup>④</sup>;

① 《元典章》卷二五,《户部》五,《禁职田佃户规避差役》。

② 《续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引。

③ 袁桷:《郑制宜行状》,《清容集》卷三二。

④ 《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

阿里海牙在潭州占夺民户柑橘园,他儿子时仍不肯交还原主<sup>①</sup>;山西藩王小薛自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年)至皇庆元年(一三一二年)侵占上党学田、襄垣县民田<sup>②</sup>;权臣燕铁木儿于至顺三年(一三三二年)乘总佃平江、松江、淀山湖圩田五百顷有奇的人死去,以增加纳官粮的手段夺取上述圩田,然后招人佃耕,从中营利<sup>③</sup>。更严重的是,有的蒙古、色目贵族官僚,“虚钱实契”典买民田,“干要租钱”<sup>④</sup>;有的强勒拘收漏籍户、放良户、析居户、僧道还俗户及其田土;一些邀功好利的歹徒将有主之田诈称荒地呈献给皇子、驸马、投下贵族;一些无权势的民户,为了逃避杂泛差役,不得已把自己田土呈献给贵族豪门,充当他们的佃户。这些贵族官僚不仅掠夺土地,连山场河泊都要霸占,与劳动人民争夺渔樵之利。一般蒙古军将在驻地与权势勾结,侵占细民田宅的事例,多得不胜枚举。

至于汉族军阀,在宋元更替过程中,依仗新朝的政治势力也无不扩大了封建权益。南宋降元军阀范文虎所有湖州、南浔、庆元、慈溪等处田土,“皆以势豪夺之者”<sup>⑤</sup>。宋亡后,江南所在路府州县管军官、南宋降元官吏等等“有势力人每,强占百姓田宅产业”,而且“占住以后,接踵相承,视为传舍,上下蒙蔽,多不理问”<sup>⑥</sup>。蒙古、色目、汉族的贵族、官僚、军阀们无限止的影占人户田土,影响了最高统治者的利益,两者间产生了争夺利益的矛盾。最高统治者运用政治力量屡下禁令,限制这些贵族官僚地主的兼并,可是禁止之令尽管十分严格,影占兼并之风仍是滋长不已。而且位居显要的大贵族、大官僚倡行于上,州县级中小贵族、官僚效尤于下,上行下效,相率成风,终元之世,未尝有一日稍戢。

① 《元典章》卷一九,《户部》五,《赵若震争种园》。

② 《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

③ 《元史》卷三六,《文宗纪》五。

④ 《元典章》卷一九,《户部》五,《虚钱实契田土》。

⑤ 孔齐:《至正直记》。

⑥ 《元典章》卷一九,《户部》五,《强占民田回付本主》。

### 三 地主、富豪的土地兼并

在蒙古灭金和元灭南宋的过程中,蒙古和元朝统治者对汉族地主阶级采取了利用和保护的政策,因此,汉族地主阶级在金元和宋元之际,虽然有一部分因改朝换代衰落了,但另一部分降蒙降元的地主不但维持了原有经济地位,而且扩大了私有经济,集中了更多的土地,即所谓“江山易”而“其势不衰”。有的则依靠新的政治势力成为暴发的新兴地主。

一般非官僚地主通过夺取有主民田、伪券夺人田土,趁战乱灾荒贱价收买、霸占战时农民丢下的“荒闲”地、陷害乡邻夺其田宅、恃势收农民为佃等方法,疯狂夺取土地。如:蒙古攻金时期,易州(今河北易县)赵柔“度田数千亩,分赐诸子以给衣食”<sup>①</sup>。这种趁兵荒马乱之际,“积粟、帛、金具、子女以为己有者,断阡陌、占屋宅、跨连州郡以为己业者”,数以万计<sup>②</sup>。南方也是如此,“亡宋各项系官田土,……归附以来多被权豪势要之家影占以为己业,佃种或卖与他人作主”<sup>③</sup>。富豪围江湖为田的情况也很严重,如黄河“涸露旧水泊汙池,多为势家所据”,吴松江被势家豪强“租占为荡、为田”,淀山湖“为势家绝水筑堤,绕湖为田”,练湖周围亦为豪势之家筑堤,“围田耕种”<sup>④</sup>,虹县东朗湖被“淮东富民,涸泽为田。”<sup>⑤</sup>甚至芍陂、洪泽等屯田也为豪右占据<sup>⑥</sup>。这种强取土地的现象在元代是始终的。

江南大地主“每一年有收三二十万石租子的、占着三二千户佃户”<sup>⑦</sup>的不在少数。松江的大地主,青龙有任仁发家,小贞有曹梦炎家,下沙有瞿霆发家,

① 苏天爵:《赵柔墓碑铭》,《滋溪文稿》卷一五。

② 郝经:《万卷楼记》,《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六。

③ 《元典章》卷一九,《户部》五,《影占系官田土》。

④ 以上均见《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

⑤ 赵汭:《李君生墓志铭》,《东山存稿》卷七。

⑥ 《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

⑦ 《元典章新集》,《户部》,《赋役》,《差发》。

他如张堰杨家,陶宅陶家,吕巷吕家,祥泽张家,干巷侯家等。其中曹梦炎占有淀山湖湖田九十三围,共数万亩,“积粟百万,豪横甲一方,郡邑官又为之驱使”,“北人目之曰‘富蛮子’”<sup>①</sup>。至元二十五年(一二八八年),曹梦炎还“愿岁以米万石输官,乞免他徭,且求官职”<sup>②</sup>。可见其资产之雄厚。瞿霆发与之不相上下,“有当役民田二千七百顷,并佃官田共及万顷。浙西有田之家,无出其右者”,人称“多田翁”<sup>③</sup>。昆山大地主有筛谷浜曾家,界溪顾家。曾家收租非常苛刻,农民必须在曾宅河畔把谷子筛净,农民愤怒地把这条河称为筛谷浜;顾家则以园林馆阁之盛闻名<sup>④</sup>。常熟有芝溪虞家、福山曹家、半州徐家。曹家盛时岁收租谷三十六万石<sup>⑤</sup>。无锡有江、虞、强、邵四姓,“富甲一郡”;而倪瓚与松江曹梦炎、昆山界溪顾仲瑛三家“声华文物,可以并称”<sup>⑥</sup>。平江富户最多,有张、吴、顾、陆四大姓,又有钟、朱、郭、袁等豪民,元末有沈万三,“为江南富族之甲”<sup>⑦</sup>。

全国其他地方处处有富豪。山西繁峙王家,“田园沃壤,水陆之利甲一州”<sup>⑧</sup>;河北真定关家,“于乡有田千亩,岁收万钟”<sup>⑨</sup>;河南洛阳董氏,占田千亩,“积粟万钟”<sup>⑩</sup>;山东东平王家,在大德七年(一三〇三年)时一次出米千余石、布五百匹赈济关中贫民<sup>⑪</sup>。南方浙江兰溪姜氏,“以资雄于乡,环其居五

① 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上。

② 《元史》卷一五,《世祖纪》一二。

③ 杨瑀:《山居新话》。

④ 《昆新两县合志》。

⑤ 《常昭合志稿》。

⑥ 《锡金识小录》引《毗陵漫录》。

⑦ 《明朝小史》卷二,《洪武纪》。

⑧ 《山右石刻丛编》卷三〇,《繁峙王氏世德之碑》。

⑨ 苏天爵:《关德聚墓碑铭》,《滋溪文稿》卷二〇。

⑩ 苏天爵:《董清墓碑铭》,《滋溪文稿》卷二〇。

⑪ 刘敏中:《王泽歌序》,《中庵集》卷二〇。

里,所凡山若田皆克有之。”<sup>①</sup>福建崇安“大家之田连跨数都,而细民之粮或仅升合”,“大家”与“细民”户口之比为一比八,占有土地面积之比却为五比一<sup>②</sup>。

南北各地的大地主不仅占有着广大土地,而且还仗势经营着邸店、商铺、作坊、质库、船舶运贩等,席卷“水陆之利”。元人郑廷玉在元曲《看钱奴》中描写这些大地主时说:“有万贯家财,鸦飞不过的田产物业,油磨坊、解典库,金银珠翠、绫罗缎匹,不知其数”<sup>③</sup>。这是对当时社会上富豪地主极其真实的描写。

汉族大地主与新进入中原地区的蒙古、色目权贵又不同,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地头蛇”,“割裂自霸”,横行乡里,“持吏短长”,“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恣纵妄为,靡所不至”,人莫能何!俨然是称霸一方的“土皇帝”。有的世代互为姻嫁,如上举山西繁峙王家,“联姻引戚,莫非乡土大姓”;又如浙东鄞县袁桷家与杨、任三家,“姻娅亦十余传”<sup>④</sup>,彼此攀援庇护,封建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外来的地方小官吏还要仰他们的鼻息,动辄受到他们的掣肘。

#### 四 寺院、道观的土地财产

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烟,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都要用它来麻痹欺骗人民,作为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蒙古统治者自成吉思汗开始即利用各种宗教作为统治人民的辅助手段。忽必烈建立元朝,封八思巴为帝师,统领全国佛教;灭南宋之前,即派人潜往江西龙虎山与南宋道教首领张天师(名宗演)联络,通过张天师刺探南宋军情,统一全国后命张天师总领江南道教。此外,伊斯兰教、基督教、白云宗、头陀教、犹太教等,各种宗教兼容并蓄。

① 宋濂:《姜泽墓碣铭》,《宋学士文集》卷一四,《翰苑后集》四。

② 《元史》卷一九二,《邹伯颜传》。

③ 《元曲选》癸集上。

④ 袁桷:《任天祺墓志铭》,《清容居士集》卷三〇。

各种宗教在统治者的利用和保护下,不但比宋朝时大有发展,而且元末比元初也有很大发展。北宋天禧五年(一〇二一年),全国僧尼,四五八八五四人<sup>①</sup>,元朝仅道教就有男女三十万人<sup>②</sup>;元顺帝时全国佛寺比五十年前的成宗大德初年增加十倍<sup>③</sup>。

元代寺观的土地财产是通过封建国家的赏赐、私人捐赠和种种巧取豪夺的办法获得的。元朝统治者对寺观的赏赐其数量之大十分惊人。如:元世祖时,赐大圣万安寺“京畿良田亩万五千,耕夫指千,牛百,什器备”<sup>④</sup>。元仁宗至大四年(一三一一年)赐大普庆寺金千两,银五千两,钞万锭,西锦、彩缎、纱罗、布帛万端,田八万亩,邸舍四百间<sup>⑤</sup>。延祐四年(一三一六年),该寺又得益都田八万顷。上都开平的开元寺得江浙田二百顷,华严寺得百顷<sup>⑥</sup>。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年),市宋全太后田为大承天护圣寺永业,以平江官田百五十顷赐大龙翔集庆寺及大崇禧万寿寺。至顺元年(一三三〇年),市宋恭帝赵暴田为大龙翔集庆寺永业,以所籍张珪诸子田四百顷,括山东益都、般阳、宁海闲田十六万二千九十顷赐大承天护圣寺。至顺二年(一三三一年),以晋邸部民二万四千余户归寿安山大昭孝寺为永业,以龙庆州之流杯园地、水碓土田赐大承天护圣寺<sup>⑦</sup>。等等。大地主捐赠的也很多,松江大地主瞿霆发就为天目山的大觉正等寺“割巨庄,先后凡二百顷有奇,及买田若干”<sup>⑧</sup>。也有一部分寺院田产来源于豪夺民田或经营致富后购买所得。

元代的寺观通过上述手段一般都拥有大量土地、竹苇、园林、碾硃、船只、

① 千文传:《道释志》,见《永乐大典》卷八〇七六。

② 胡祇遹:《集真观碑》,《紫山集》卷一七。

③ 《江苏通志稿》卷二三,《金石》,《梅岩瞿先生作兴学校记》。

④ 程钜夫:《阿尼哥神道碑》,《雪楼集》卷七。

⑤ 《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

⑥ 《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

⑦ 均见《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卷三四,《文宗纪》四。

⑧ 赵孟頫:《天目山大觉正等禅寺记》,《松雪斋文集》外集。

解典库、浴塘、店舍、铺席、醋坊、山场、坑冶、湖泊、津渡等。大都城西高良河滨的大护国仁王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寺在至大元年(一三〇八年)统计,有水地二万八千余顷,陆地三万四千余顷,山林、河泊、湖渡、陂塘、柴苇、鱼、竹等场二十九,玉、石、银、铁、铜、盐、硝、碱、白土、煤炭等坑冶十五,栗万九千余株,酒馆一;在河间、襄阳、江淮等地还有水地万三千余顷,陆地二万九千余顷,江淮酒馆百四十,湖泊、津渡六十一,税务、闸坝各一。殿宇为间百七十五,灵星门十,房舍为间二千六十五,牛具六百二十八,江淮牛之隶官者百三十三<sup>①</sup>。昌国州(今浙江定海)寺院道观的田地约占全州耕地的一半<sup>②</sup>。镇江路平均每人土地六亩左右,而僧尼平均每人达五十亩左右<sup>③</sup>。由于寺观拥有大片田地,因而佃户也很多,大德年间仅江南诸寺观的佃户即达五十万余户<sup>④</sup>。元朝统治者对寺观的财产十分庇护,规定:“但属寺家的田地、水土、园林、碾磨、店铺、解典库、浴堂、人口、头匹等物,不拣是谁,休倚气力夺要者,休漫昧欺付者,休推是故取问要东西者”<sup>⑤</sup>。这样,“天下之田一入僧业,遂固不移”<sup>⑥</sup>。永远为寺观所有,规模越来越大,财产越来越多。

一些宗教首领,也依仗政治势力,夺民田宅产业。江南道教首领张天师,就是一个江南大恶霸;佛教江南总统杨琏真加占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不输公赋的二万三千户;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占田二万顷。有些寺院中的僧人也有私人田土。这些寺院道观及僧尼道士的田土,都享有免役免税特权。史称泰定帝时“江南民贫僧富”<sup>⑦</sup>,充分反映了元时寺院道观经济势力的恶性膨胀和农民群众在寺院地主残酷剥削下的贫困景况。

① 程钜夫:《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雪楼集》卷九。

② 《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三,《田粮》。

③ 据《至顺镇江志》卷三,《户口》;卷五,《田土》。

④ 《元史》卷二〇,《成宗纪》三。

⑤ 《一三〇五年长清灵岩寺令旨碑》,《元代白话碑集录》页二五。

⑥ 吴师道:《金华县慈济寺修造舍田记》,《吴礼部文集》卷一二。

⑦ 《元史》二九,《泰定帝纪》一。



## 第二节 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和衰敝

### 一 元初的重农政策及其贯彻

元朝初年,以忽必烈为首的统治者,比较重视农业生产,贯彻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推行是当时社会客观实际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长期反抗斗争的结果。同时,忽必烈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也是他推行“汉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蒙古军队在进兵北方地区时,使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民遭到杀戮,耕地变为牧场。一二一三年到一二一四年,成吉思汗率兵南下,使得“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大批汉族人民被徙北去,河北地区“田野久荒”,民无耕牛,河东地区也几乎“杀掠殆尽”。窝阔台时期虽然稍有改变,但杀伤劳动力的现象仍很严重,在灭金过程中,像考县、许州、汝南、凤翔等地都曾出现过大批居民被屠杀的现象。关中地区在宪宗蒙哥时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四川、两淮、河南、襄樊地区,由于蒙宋战争很激烈,亦人口锐减,如四川地区的“土著之民”在兵燹中“十亡七八”;抗元诗人汪元量随宋幼帝、全太后等北上时,看到了“淮南兵后人烟绝”的景象。除了杀戮人口外,蒙古贵族不断把人民“强抑为奴”也是户口减少的重要原因。率领蒙古军队灭宋的将领阿里海牙,就曾把南宋两湖地区的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为家奴”<sup>①</sup>,有的蒙古贵族还把大量农民括充为工匠及其他差役,到忽必烈登位时,“诸色占役者”竟达五十余万户,占到民户总数的一半以上<sup>②</sup>。

---

① 《元史》卷一六三,《张雄飞传》。

② 王磐:《史天泽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八;《元朝名臣事略》卷七,《丞相史忠武王》。

在人民被杀戮,或者被强抑为奴的同时,耕地也遭受严重破坏。蒙古贵族在这大片大片荒芜的土地上,带进了游牧生产方式,将昔日的耕地变为牧场,专放孳畜。在农业地区强行推行游牧生产方式,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

蒙古统治地区的各族人民,由于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加上沉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不得不用武装斗争或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在忽必烈执政以前,社会是动荡不安的。

这种残破的局面,严重地威胁着忽必烈的统治,这就迫使忽必烈等统治者,不得不改变以前那种变农田为牧地的游牧生产方式,改变那种破坏生产力的残暴行为,转而采取重视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忽必烈深知,农业生产的破坏对他的统治很不利,他对蒙古贵族们说:“司农非细事,朕深谕此”<sup>①</sup>。他认识到,维持农民从事生产的条件,把他们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才能保证封建政府的赋税,才能维护封建政权。从此,元朝统治者转而采取重农政策,正如《元史·食货志》所说:“农桑,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初无所事焉。世祖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sup>②</sup>。这一转变,完全符合恩格斯所揭示的下述规律:“在长时间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sup>③</sup>。因而它在客观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忽必烈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设立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中统元年(一二六〇年)忽必烈刚即位后不久,即设十路宣抚司,命各路宣抚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二年,设劝农司,以姚燧为大司农,以陈邃、崔斌等八名精于农事的官员为使,命他们分道考

①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②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农桑》。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二二二页。

察农业生产情况,并发布诏书规定:“今后有能安集百姓、招诱逃户、比之上年增添户口、差发辨集,各道宣抚司关部申省,别加迁赏;如不能安集百姓,招诱逃户,比之上年户口减损,差发不办,定加罪黜”<sup>①</sup>。至元元年(一二六四年)立迁转法,进一步把“户口增、田野辟”作为考课官吏五事中为首的两项标准。至元七年二月立司农司,以左丞张文谦为大司农卿,分设四道巡行劝农司。十二月改为大司农司,以孛罗领之。各道提刑按察司兼管农事,县达鲁花赤或县令兼劝农事。“司农司之设,专掌农桑水利。仍分布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举勤惰。所在牧民长官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秩满之日,注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又令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其法可谓至矣”<sup>②</sup>。司农司还奉命遍求古今农家之书,删繁撮要,结合实际,编成《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全国,指导农业生产。

保护农业生产,限制抑良为奴。忽必烈即位后,多次下诏禁止占民田为牧地,并派官清理被豪贵侵占为牧地的民田,按籍“悉归于民”或“听民耕垦”。一再“申严畜牧损坏禾稼桑果之禁”,通令“诸军马营寨及达鲁花赤、管民官、权豪势要人等,不得恣纵头匹损坏桑枣,踏践田禾,骚扰百姓”<sup>③</sup>。如至元元年(一二六四年)四月,御苑官南家带请修驻蹕凉楼并广牧地,忽必烈下令“凉楼俟农隙,牧地分给农之无田者”<sup>④</sup>。至元十一年三月,蒙古贵族亦乞里带强取民租产、桑园、庐舍、坟墓,分为探马赤军牧地,忽必烈下令“还其民”<sup>⑤</sup>。这些措施对于保护耕地、恢复农业是有利的。同时,忽必烈对抑良为奴的行为也三令五申加以禁止。至元八年颁布了《户口条画》<sup>⑥</sup>,对户籍进行了一次较大规

① 《元典章》卷一九,《户部》五,《荒闲田地给还招收佃户》。

②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农桑》。

③ 《通制条格》卷一六,《农桑》。

④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⑤ 《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⑥ 见《元典章》卷一七,《户部》三,《户口条画》。

模的整顿,将被诸王贵族、权豪势要之家非法占为奴隶的人民按籍追出,编籍为民。但是,这一措施在执行时是很不彻底的,占有奴隶的状况在整个元朝一代是很严重的。

招集逃亡,鼓励开荒。中统二年,忽必烈颁布了流民还业免税一年、第二年减半的诏书。诏书规定:凡“逃户复业者,将原抛事产不以是何人种佃者,即便吩咐本主户下,合着差税一年全免,次年减半,然后依例验等第科征”<sup>①</sup>。又规定:“凡有开荒作熟地土,限五年验地科差”。栽种桑树限八年、杂果限十五年后科差。“若有勤务农桑增置家业,本处官司并不得添加差发”<sup>②</sup>。中统三年,忽必烈命行中书省、宣慰司、诸路达鲁花赤、管民官,“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不得擅兴不急之役,妨夺农时”<sup>③</sup>。

大力开展军民屯田。蒙古统治者在向外扩张过程中,由于被征服国家多是农耕区,因而成吉思汗、窝阔台时期就有屯田措施,如镇海屯田于阿鲁欢,立镇海城。忽必烈在即位前,即用姚枢“布屯田,以实边戍”的建议,在唐、邓、亳、颍诸州及四川利州、陕西凤翔等地开展屯田,在邓州专门设立了屯田万户府。全国统一后,“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sup>④</sup>枢密院所辖各卫屯田为军屯;大司农宣徽院所辖屯田为民屯;腹里及其他行省辖有军民屯。这些屯田,主要是招募无业农民开耕荒地。如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年)开办涟海屯田,募民耕种荒田,官给牛、种,税其半,种者有牛,官给种,税十之四,并免其徭役,屯田达一万二千顷<sup>⑤</sup>。至元二十一年又“以江淮间自襄阳至东海多荒田,令司农司立屯田法,募人开耕,免其元年租税并一切杂役”<sup>⑥</sup>。江

① 《元典章》卷一九,《户部》五,《荒闲田地给还招收逃户》。

② 《元典章》卷二三,《户部》九,《开田栽桑年限》。

③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④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

⑤ 许有壬:《两淮屯田打捕总管府记》,《至正集》卷三七。

⑥ 《元史》卷一三,《世祖纪》一〇。

淮之间广大地区经过数十年战争后,人口锐减,土地荒废,开办屯田后,流民得以复业,田地得到耕种。辽阳、岭北、甘肃、云南等地的屯田,对边疆地区的开发更起了很大作用,如岭北行省开垦田亩达六千四百多顷,边远地区如谦谦州、益兰州(今俄罗斯土瓦自治州境)等地也发展了农业,漠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出现空前的盛况。所以《元史》说:“大抵芍陂、洪泽、甘、肃、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盖不减于旧;和林、陕西、四川等地,则因地之宜而肇为之,亦未尝遗其利焉。至于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sup>①</sup>到至大时,全国屯田达百二十余所<sup>②</sup>。全国屯田面积达十七万五千多顷。

减免租税。为了防止“人心离散”,至元十三年南宋投降、元朝占领江南地区后,即下令免去南宋经制、总制等苛捐杂税一百多项。当时,姚枢曾指出:“盐铁酒酤榷始于汉代,其后因之不废。今方新附,若复征之,人心必离散”<sup>③</sup>。废除南宋苛税虽出于害怕江南人民的激烈反抗,但客观上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是有利的。至元和大德年间,元朝政府曾多次下令减免全国或地方的地税和地租。

设置粮仓、常平仓。太宗己丑年(一二二九年)蒙古始置仓廩,宪宗丁巳年(一二五七年)设常平仓。忽必烈即位后,粮仓制度逐步完善。按其所在地区及用途,大致可分为在京诸仓(包括大都城内外千斯、相因等仓)、通州河西务和沿河诸仓、迤北诸仓(大都以北中书省所属上都诸路及岭北、辽阳、甘肃等行省的诸仓)、中原诸仓、江南诸仓、义仓(即社仓)、供亿仓(中央各院、司、府的仓房)七大类;按其性质,则可分为供养贵族官僚、军队之用和赈济灾民、发展生产之用两大类。

①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

②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③ 姚燧:《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一五。

赈济灾民和发展生产之用的粮仓主要是常平仓和义仓。常平仓始立于至元六年,其法:“丰年米贱,官为增价籴之;歉年米贵,官为减价粜之。”义仓亦是年立,其法:“社置一仓,以社长主之,丰年每亲丁纳粟五斗,驱丁二斗,无粟听纳杂色,歉年就给社民”<sup>①</sup>。这两种粮仓的建立对农业生产是直接有利的。

兴修水利。元朝前期的统治者对兴修水利是很重视的。中央设都水监,地方置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sup>②</sup>。有时为了某一工程的需要,专门设了行都水司、都水庸田司等临时机构。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曾主持过都水监工作。至元初,他在宁夏地区任职时,修复了唐来、汉延等大小八十多条河渠,使九万余顷田地重新得到灌溉<sup>③</sup>。元代最大的水利工程是凿通南北大运河。此外,元朝政府为了加强漕运,于至元三十年修了白河、榆河;大德六年(一三〇二年)整治了坝河。为了防治水患,开渠灌田,元朝政府在全国各地兴举了许多水利建设。在北方,曾多次疏浚和整治了滦河、卢沟河、浑河、滹沱河;在西北,曾两次修筑洪口渠,整修了关中地区的泾渠;在江南,曾疏导了吴松江、淀山湖、练湖,修筑了浙东海塘坝。元朝前期,黄河常常泛滥,当时基本上做到随坏随修。

元朝前期统治者的这些措施,总的来说,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有利的。但是,这些措施有的并没有真正贯彻,如农官劝农,有的变成了扰民;赋税减轻,有的不久就恢复到原有的标准。

## 二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蒙古统治者在用武力统一全国过程中,对各地的农业生产破坏是十分严重的。随着战争的逐渐结束,社会秩序的安定,元朝统治者对农业生产越来越

① 《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常平义仓》。

② 《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

③ 齐履谦:《郭守敬行状》;见《元文类》卷五〇。

重视,特别是各族劳动人民辛勤的生产斗争,使元朝的农业生产从战争的破坏中开始有所恢复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人口的不断增加、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中原地区和边远地区农业产量的增加和棉花等新农作物的推广上。

### 人口不断增加

马克思说:“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sup>①</sup>。元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与劳动力的不断增加有关的。

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大量人口被杀戮或饥寒致死,或逃亡流徙,造成人口严重锐减。中统三年时,蒙古政权所辖土地大体与金朝相当,但当时户只有一百四十七万六千一百四十六,以一户五口计,只有七百多万口,比金泰和七年(一二〇七年)户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六千零七十九<sup>②</sup>,要差得远。至元十三年南宋灭亡后,江南得户九百三十七万零四百七十二,加上至元十一年的北方户数一百九十六万七千八百九十八,合计为户一千一百三十三万八千三百七十,以平均每户五口计,全国有口约五千多万。这个数字比一二〇〇年前后金和南宋户口数的总和户二千零七十一万六千零三十七,口八千一百三十七万七千二百三十六<sup>③</sup>要少得多。以地区而论,历经兵燹后,人口减少得最多的地区是北方的陕西、甘肃和河南北部,如陕西的京兆、延安、巩昌、凤翔等三路一府,宪宗壬子年(一二五二年)时,仅有户八万七千九百六十,河南的汴梁、河南、南阳等二路一府,仅有人户四万零二百一十二,均不到金朝时同一地区人户数的六分之一。

忽必烈即位后,一再发布命令,禁止军队杀戮百姓,灭宋时江南人口的损耗就要小得多。但在南宋臣民反抗的局部地区,人口减少仍相当惊人。如潮州被元军占领时只存七万零七十户,而南宋时有十一万六千七百四十三户,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一六〇页。

②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户口》。

③ 《文献通考》卷一二,《户口》二。宋光宗绍熙四年,户一千二百三十万二千八百七十三,口二千七百八十四万五千零八十五。



少了三分之一以上<sup>①</sup>。全国统一后,由于元朝统治者执行了招集流亡等重农政策,人口开始逐年增加。到至元二十八年时,全国有户一千三百四十三万零三百二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四万八千九百六十四,至元三十年户数更达一千四百万零二千七百六十。至元三十年的户数和至元二十八年的口数是见于记载的元代最高户口数。但这个数字与实际户口仍有许多差距,因为有些人户(如军户、驱户)不在统计之列,相当一部分区域户口数缺漏,诸王、贵族隐占了大量户口。

元成宗以后,由于社会相对安定,生产仍处于上升时期,人口有了进一步增加。这一持续上升的趋势,除至大、天历前后全国范围内发生过较大的水旱灾害和帝位争夺的战乱外,一直保持到元顺帝后至元初。估计元代人口最多的年代在元顺帝初期,当超过八千万以上,与金和南宋最高数字的总和差不多。

以某些地方为例,也可证明元代户口数已大致与宋金相等。如镇江,“润为东南重镇。晋宋隋唐,地大民鲜,至宋嘉定间,所统惟三县,而户口之繁视前代为最。北南混一,兹郡实先内附。兵不血刃,市不辍肆,故至元庚寅(一二九〇年)籍民之数与嘉定等。”南宋嘉定年间,镇江有户一十万八千四百,口六十四万四千一百,元文宗至顺年间达户一十一万四千余,口六十五万余(原缺客户人口数,据户数推算补上)<sup>②</sup>。

#### 中原和沿海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元代的农业生产总的来说,不是倒退而是有所前进。当然,有的地区,由于战争的破坏,发展缓慢,有的地区进步较快,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进步最显著。从时间上来说,元朝前期较好,中后期有衰敝的趋势。

蒙古、元与金、南宋长期的战争,使元朝前期农业生产的水平很不一致。北方黄河流域战争破坏最严重,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直到至元年间尚有不少

<sup>①</sup> 《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五,册五九。

<sup>②</sup> 《至顺镇江志》卷三,《户口》。

荒地；四川、湖北等长江上、中游及两淮地区，是宋元长期争夺之地，在全国统一后还不及黄河流域恢复得快；南方广大地区原来农业基础较好，又没有经过激烈的战争破坏，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一直是农业最发达的地方，继续保持了原来的发展趋势；福建沿海地区、广东南部地区，战争破坏比较严重。这个基础不一致的情况，是元代农业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附：《元史》中关于元代户口的统计

元 纪 年	公元	户	口	备 注
太宗七年	1235	八七三,七八一	四,七五四,九七五	燕京、顺天等三十六路统计数
宪宗二年	1252	一,〇七三,七八一		
中统二年	1261	一,四一八,四九九		
中统三年	1262	一,四七六,一四六		
中统四年	1263	一,五七九,一一〇		
至元元年	1264	一,五八八,一九五		
至元二年	1265	一,五九七,六〇一		
至元三年	1266	一,六〇九,九〇三		
至元四年	1267	一,六四四,〇三〇		
至元五年	1268	一,六五〇,二八六		
至元六年	1269	一,六八四,一五七		
至元七年	1270	一,九二九,四四九		
至元八年	1271	一,九四六,二七〇		
至元九年	1272	一,九五五,八八〇		
至元十年	1273	一,九六二,七九五		
至元十一年	1274	一,九六七,八九八		
至元十二年	1275	四,七六四,〇七七		五八,八三四,七一一
至元十三年	1276	九,五六七,二六一		
至元二十七年	1290	一三,一九六,二〇五		
至元二十八年	1291	一三,四三〇,三二二		
至元三十年	1293	一四,〇〇二,七六〇		
至顺元年	1330	一三,四〇〇,六九九		

北方黄河流域在金朝统治的一个世纪内,农业生产已经大大落后于南方,后来又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蒙古灭夏灭金战争,农业生产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但是,随着战争地区的向南推移,由于忽必烈等元朝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重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至元十年(一二七三年)王磐说:司农司成立后,“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sup>①</sup>。王恽也说,成立司农司之后,“凡先农之遗功,陂泽之伏利,崇山翳野,前人所未尽者,靡不兴举”<sup>②</sup>。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的三十多年内,黄河流域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水、虫蝗等灾厄<sup>③</sup>。农业生产在今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黄河流域地区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在陕西行省的关中、京兆(今西安)地区,元初安插的大批南驱放良、归顺等户几乎占了原有居民的一半,使这里的劳动力大大增加<sup>④</sup>。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年),元朝把泾水沿岸的牧地数千顷分给贫民屯种,官给牛种田具,岁入粟麦十万石,粳稷百万束。后来又把盩厔、泾、邠、乾及安西王属县的闲田设官屯种,使荒地相率利用<sup>⑤</sup>。据《元史·地理志》及《元史·兵志·屯田》的记载,元代在陕西行省奉元路(今陕西西安)的临潼、泾阳、盩厔、渭南等县,延安路凤翔府的风翔县,平凉府的平凉县,定西州和镇原州等地,共屯田六千多顷。由于大量荒地、牧场被开垦为耕地,元世祖时关中麦已“盛于天下”,关、陇、陕、洛则“年谷丰衍,民庶康乐”<sup>⑥</sup>。

中书省所属山西地区,由于水利建设较好,农业也是增产的。平阳地区原

① 王磐:《农桑辑要序》。

② 王恽:《絳州正平县新开溥润渠记》,《秋涧集》卷三七。

③ 见胡祇遹:《论积贮》,《紫山集》卷二二。

④ 见王恽:《论关陕事宜状》,《秋涧集》卷八五。

⑤ 见姚燧:《李德辉行状》,《牧庵集》卷三〇;卷二三,《高公神道碑》;《元史》卷一四,《世祖纪》;《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

⑥ 王恽:《论范阳种麦事状》,《秋涧集》卷八六;苏天爵:《韩永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一七。

来“地狭人众,常乏食”。至元三年(一二六六年),总管郑鼎领导平阳人民“导汾水,溉民田千余顷”<sup>①</sup>。至元十一年,绛州(今山西新绛)人民导浍河入汾水,灌田二千多亩,使产量提高,亩收达到一钟<sup>②</sup>(每钟合六斛四斗)。所以,成宗时汾晋人民“居常积谷”,间有饥欠年成,亦可避免“流离之患”<sup>③</sup>。余阙也说:“晋地土厚而气深,田凡一岁三艺而三熟,少施以粪力,恒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岁可以无旱,其地之上者,亩可以食一人。民又勤生力业,当耕之时,虚里无闲人,野树禾,墙下树桑,庭有隙地,即以树菜茹麻枲,无尺寸废者。故其民皆足于衣食,无甚贫乏之家”<sup>④</sup>。中书省邢州(今河北邢台),原是忽必烈的封地,当时只有民万余户,到中统三年(一二六二年)时因人口增加升为府,至元元年又升为路,居民已增加到三万五百户。河北地区为五卫军主要驻地,军屯很兴旺,据《元史·兵志·屯田》,枢密院所辖军屯主要在今河北地区,垦田达一万四千余顷。其中新城县于至元十年至十三年垦田数万亩,收效甚大,“仓庾委积,坻如京矣”<sup>⑤</sup>。山东为元代农业生产成绩比较显著的地区,登州(今山东蓬莱)农民“垦辟有方”,附近州郡皆以登州为榜样,使“地利毕兴”<sup>⑥</sup>。

中书省怀庆路(今河南沁阳)于中统二年开凿了长达六百七十七里,流经济源、河内、河阳、温、武陟等五县四百六十三处村坊的广济渠,该渠修建后,“居民深得其利”<sup>⑦</sup>,到大德年间时,仍“利泽一方,永无旱暵”<sup>⑧</sup>。中统元年,怀

① 《元史》卷一五四,《郑鼎传》。

② 王恽:《绛州正平县新开溥润渠记》,《秋涧集》卷三七。

③ 王桢:《农书》卷四,《蓄积篇》第一二。

④ 余阙:《梯云庄记》,《青阳集》卷三。

⑤ 苏天爵:《东平路总管李注神道碑》,《滋溪文稿》卷一六。

⑥ 虞集:《董文用行状》,《道园学古录》卷二〇。

⑦ 《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

⑧ 王桢:《农书》卷一八,《浚渠》。

庆路总管谭澄“令民凿唐温渠，引沁水以溉田，民用不饥。教之种植，地无遗利”<sup>①</sup>。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年）一年内就开垦了七百余顷荒地<sup>②</sup>。河南地区由于“民日生集，丛蓁灌莽，尽化膏沃”，使地价上涨十百倍<sup>③</sup>。河南行省所属两淮地区办了不少屯田、水利等事业，洪泽万户府所辖屯田达三万五千余顷，安丰之芍陂可溉田万余顷，至元二十一年仅芍陂屯田收获粳糯二万五千石，至元二十五年以两淮荒闲田给贫民耕种，岁得粟数十万斛，所以“屯田之利，无过两淮”<sup>④</sup>。汉、沔、淮、颍诸水流域的许多农家，由于在新开荒地上“当年多种脂麻等种，有收至盈溢仓箱速富者”<sup>⑤</sup>。

长江以南地区，总的来说，在南宋的基础上得到了继续发展，但各地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

元代的江浙省主要包括今天的苏南和浙江、福建等地区，元末以前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一直是上升的。元代每年岁入粮总计一千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七百八十石，而江浙一省就达四百四十九万四千七百八十三石，占三分之一强；夏税钞数以天历元年（一三二八年）计，达五万七千八百三十锭四十贯，为江南三省之冠<sup>⑥</sup>。可见当时江浙地区田亩之多和产量之高。湖州乌程，至元二十七年统计，民户比南宋时增加二万多；大德时，其地“土膏稻粱，岁无乏食，树墙下桑，志足衣食，蒸哉人民，各安一业”<sup>⑦</sup>。浙西地区，至元十四年至十九年连续丰收。浙东海宁州，至元中，新辟四百四十三顷，出现了“桑柘榆柳，交荫境内”<sup>⑧</sup>的景象。温州路平阳县，元初“生齿益庶”，故于元贞元年（一二九

① 《元史》卷一九一，《谭澄传》。

② 程钜夫：《靳用墓碑》，《雪楼集》卷六。

③ 李朮鲁翀：《知许州刘侯爱民铭》，《国朝文类》卷一七。

④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元史》卷一六六，《罗璧传》。

⑤ 王桢：《农书》卷二，《垦耕篇》第四。

⑥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税粮》。

⑦ 《元一统志》，见《永乐大典》卷二二七七。

⑧ 《元史》卷一七七，《臧梦解传》。

五年)升为州<sup>①</sup>。福建的荔枝,“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且“水浮陆转,贩鬻南北”,甚至远销到新罗(在今朝鲜)、日本、大食等地。

湖广地区的农业生产,经过战争的破坏后也渐次恢复。元朝政府在琼州(今广东海口东南)、雷州(今广东海康)、高州(今广东茂名北)、化州(今广东化县)、廉州(今广西合浦)、衡州(今湖南衡阳)等地设立军、民屯,总计达九百顷<sup>②</sup>。湖广是元代重要的产粮区之一,每年北运的米粮仅次于江南地区。

元代的江西行省主要包括今江西和广东东部,它是元代主要的产粮区之一。元灭南宋时,这里曾遭到战争破坏,但恢复也很快。如潮州,元军占领时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至元二十一年后,由于“翦棘夷道,招集流离”逐渐得到恢复<sup>③</sup>。元朝政府每年从江西行省征粮达一百一十五万七千四百四十八石,占全国各省的第三位;以天历元年(一三二八年)计,夏税钞数达五万二千八百九十五锭一十一贯,仅次于江浙省<sup>④</sup>。

四川的农业生产由于受到长期战争的破坏,发展是比较缓慢的。至元十九年在籍民户只有十二万,许多州府因“户口凋零,更不设官”<sup>⑤</sup>。由于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元朝政府在四川行省所设的军民屯田机构达二十九个之多,仅军屯就有二千多顷<sup>⑥</sup>。

#### 棉花及其他新作物的推广

中国古代的衣着,全靠丝麻,自木棉从外国输入后,部分地代替了丝麻。这是中国古代在穿衣问题上的重大改革。元朝时正在逐步实现着这一改革。

① 林景熙:《平阳县治记》,《霁山集》卷四。

②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

③ 《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五,中华书局影印本册五九,页二三。

④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税粮》。

⑤ 《永乐大典》二二一七,册一六,页一〇。

⑥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

木棉古称吉贝(由马来语转译)或白叠(由波斯语转译),分别由陆路和东南海道传入中国。南北朝时,西域的高昌境内已种植“白叠子”,并织成棉布;东汉时,永昌郡(今云南境)的哀牢人,也种植“花柔如丝”的木棉,并织成“白叠花布”。到宋代时,棉花种植已推广至闽广及陕西地区<sup>①</sup>。

入元以来,棉花的种植进入了发展时期。元初颁行的《农桑辑要》说:“近岁以来,苧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西,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二方之民,深荷其利。遂即已试之效,令所在种之”<sup>②</sup>。该书还专门总结了木棉栽种法,以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至元二十六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地设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sup>③</sup>;元贞二年(一二九六年)规定江南夏税输木棉、布绢等物<sup>④</sup>,可见元初江南地区木棉不仅普遍种植,而且产量不断提高。全国统一后,江南的植棉技术逐渐传到北方,出现了“江东木棉树,移向淮南去”<sup>⑤</sup>和“诸种艺制作之法,駸駸北来”<sup>⑥</sup>的情景。所以到元朝中后期,木棉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种植了。

此外,西瓜、红花、蚕豆、亚麻等作物也在元朝广泛种植。西瓜“一说契丹破回纥得此种归,……北方种者甚多,以供岁计。今南方江淮、闽、广、浙间,亦效种”<sup>⑦</sup>。“广州自至元归附后,方有此种。其实圆碧而外坚,其子有三色:黄、红、黑。北客云:瓜凉可止烦渴,过食不为害。其仁甘温。今岭南在在有之,遂为土产。”<sup>⑧</sup>红花系张骞通西域带回,到元朝时“处处有之”<sup>⑨</sup>。

① 参见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一九五七年版,页三六至四三。

② 《农桑辑要》卷二,《论苧麻木棉》。

③ 《元史》卷一五,《世祖纪》一二。

④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⑤ 马祖常:《淮南田歌十首》,《石田集》卷五。

⑥ 王桢:《农书》卷二一,《农器图谱》一七,《木棉序》。

⑦ 王桢:《农书》卷八,《百谷谱》三,《西瓜》。

⑧ 《大德南海志残本》卷七,《物产》。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

⑨ 王桢:《农书》卷一〇,《百谷谱》一〇,《红花》。



### 三 元代中后期农业生产的衰敝

元代中后期,由于统治机构的腐败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农业呈现了发展停滞、生产衰敝的情景。

元初推行的一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如劝农机构、水利建设、屯田设施都随着统治机构的腐朽,越来越贯彻不下去,有的竟成了害民的赘瘤。如以“五事”为考绩地方官的标准,到至元二十二年之后,变得“徒有虚文,竟无实效”<sup>①</sup>,不合“五事”标准的官员照常供职。为推动与组织农业生产而设置的劝农官吏,不以劝农为务,反而乘下乡之机进行搜刮。他们未出衙门,先通告行期,乡社准备酒食,及至,“赂遗征取,下及鸡豚”。至元二十八年就因江南官吏下乡劝农时勒索及骚扰百姓,不得不停止官吏“巡行”劝课,改为“依时节行文书”督导<sup>②</sup>。这种状况,王桢在《农书》里曾加以揭露:“今长官皆以劝农署衔,农作之事,已犹未知,安能劝人。借曰‘劝农’,比及命驾出郊,先为文移,使各社各乡,预相告报,期会赍敛,只为烦扰耳”<sup>③</sup>。原有的村社组织也逐渐废弛,江西有的地方,至元三十年立的社长,不到数年“多有逃亡事故”,“各处社长多不见年高德昭、通晓农事、为众信服之人,大失原立社长初意”<sup>④</sup>。海门、通州两县的社长,大德六年(一三〇二年)也因“近年多以差科干扰”,不能专职劝农<sup>⑤</sup>。所以到大德七年时大小劝农官司已“率多废弛”<sup>⑥</sup>。农桑文册也因不起作用,反而扰民,在大德二年时被迫取消<sup>⑦</sup>。延祐时,由于“各处农事正

① 《元典章》卷二,《圣政》一,《饬官吏》。

② 《通制条格》卷一六,《田令》。

③ 《农书》卷四,《劝助篇》第一〇。

④ 《元典章》卷二三,《户部》九,《更替社长》。

⑤ 同上书,《社长不管余事》。

⑥ 《元典章》卷二,《圣政》一,《劝农桑》。

⑦ 《通制条格》卷一六,《农桑》。

官,失于劝课,致有荒废,甚失农本之意”<sup>①</sup>。又如水利建设,在世祖忽必烈时期全国各地都得到广泛开展,到仁宗延祐以后水利建设就非常少,因此常常遭受自然灾害。特别是由于权豪势家占据池泊,造成“非河犯人,人自犯之”的人为破坏,如“黄河涸露,旧水泊污池多为豪家所据,忽遇泛滥,水无所归,遂致为害”<sup>②</sup>。元朝政府经营的军民屯田,也越来越不景气,到武宗至大年间已因“所用者多非其人,以致废弛”。后来屯田地区因蝗、旱、水灾等造成歉收的记载不绝史书。

元朝政府的苛捐杂税和繁重的徭役是农业生产衰敝的又一重要原因。除了明文规定的税粮和科差外,各种苛捐杂税是很重的。北方中原地区在南宋灭亡后,各种苛捐已二十倍于包银,按包银每户四两计,竟达八十两之多。因此,至元十五年时崔彧说:“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已十五万户。去家就旅,岂人之情,赋重政繁,驱之致此”<sup>③</sup>。南方的情况同样如此。元朝统一江南后,曾废除南宋一百多种杂税,但到至元二十八年时大部分又恢复了。由于长期用兵,需要大量劳动力从事转运、造船,加上拘刷水手、括壮丁等等,严重妨碍了农业生产。特别是徭役不均,使大批农民破产。衢州(今浙江衢县)“为郡者于民间徭役,不尽校田亩以为则,吏得并缘高下其手,富民或优有余力,而贫弱不能胜者,多至破产失业”<sup>④</sup>。崇安五十余户“大家”所占的田地为全县的六分之五,但他们在官府的庇护下,把一切差役都转嫁在四百余户“细民”身上,“故贫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sup>⑤</sup>。

除此以外,元朝政府还有许多直接破坏农业生产的措施。如元朝统治者为了防止汉人造反,多次括马,连耕马、马驹也括走,北方连拽犁拉磨也不准用

① 《元典章》卷二,《圣政》一,《劝农桑》。

② 《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黄河》。

③ 《元史》卷一七三,《崔彧传》。

④ 《元史》卷一九二,《白景亮传》。

⑤ 《元史》卷一九二,《邹伯颜传》。

马。元顺帝初年,丞相伯颜竟禁止江南汉人农家使用铁禾叉<sup>①</sup>。世祖以后军队破坏农田也很严重。“军马营寨,飞放围猎,喂养马驼人等纵放头匹,食践田禾,损坏树木,以致农桑堕废”<sup>②</sup>。

元代农业发展停滞的原因,还因为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兼并和对农民的残酷剥削。

忽必烈以后的元朝统治者,为了制止土地兼并和改变赋税不均的状况,延祐年间曾推行过“经理法”,泰定年间曾实行过“助役法”,但都失败了。

仁宗延祐元年(一三一四年),平章章闰提出:“经理大事,世祖已尝行之,但其间欺隐尚多,未能尽实。以熟田为荒地者有之,惧差而析户者有之,富民买贫民田而仍其旧名输税者亦有之。由是岁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经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观、学校、财赋等田,一切从实自首,庶几税入无隐,差徭亦均。”仁宗根据这一建议,遣章闰等往江浙,尚书你咱马丁等往江西,左丞陈士英等往河南,施行经理之法。规定:限四十日内,各民户以其家所有田,如实报告官府;对于“或以熟为荒,以田为荡,或隐占逃亡之产,或盗官田为民田,指民田为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并许告发,违法者据其情节或杖或徒,所隐田没官。但在政治败坏的情况下,此法根本无法推行,“贪刻用事,富民黠吏,并缘为奸,以无为有,虚具于籍者,往往有之。于是人不聊生,盗贼并起,其弊反有甚于前者”<sup>③</sup>。经理法终于被迫停止。

泰定初,又在江南地区创行助役法。“其法:命江南民户有田一顷之上者,于所输税外,每顷量出助役之田,具书于册,里正以次掌之,岁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费。凡寺观田,除宋旧额,其余亦验其多寡令出田助役”<sup>④</sup>。其具体数

① 长谷真逸:《农田余话》。

② 《元典章》卷二,《圣政》二,《劝农桑》。

③ 以上均见《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经理》。

④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税粮》。

额则为：“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sup>①</sup>。助役法推行后虽然在局部地区使“中人之家，自是不病于役”<sup>②</sup>，但一般自耕农和佃户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赋役不均的情况依然如故。余阙说：“余尝行郡以观民风，其庶人之役于官者，往往闾左之民也，而富人则有田而无役，甚者或不以征，岁终保正称贷而输之，至破产者无算。此其田虽近于均，而役则不均也”<sup>③</sup>。

正因为元朝政治的腐败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这些人为的原因，遇到水旱灾荒时就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从而使农业生产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大德末年，江南遭遇饥歉之年，“卖田者非止一家”<sup>④</sup>。浙东绍兴（今浙江绍兴）在大德年间发生“三饥”之后，直到泰定三年（一三二六年），即经过了二十余年，还是“民力犹未甦”<sup>⑤</sup>。至大元年（一三〇八年）“夏秋之间，巩昌地震，归德暴风雨，泰安、济宁、真定大水，庐舍荡析，人畜俱被其灾。江浙饥荒之余，疫病大作，死者相枕籍，父卖其子，夫鬻其妻，哭声震野，有不忍闻”<sup>⑥</sup>。二年，益都、东平、东昌、济宁、河间、顺德、广平、大名、汴梁、卫辉、泰安、高唐、曹、濮、德、扬、滁、高邮等地“蝗蝻遍野，百姓艰食”<sup>⑦</sup>。天历时，山东、河南、陕西、江浙发生大面积旱、疫、蝗、水等灾害，陕西饥民达一百二十三万四千余口，河南府路饥民有二万七千四百余口，江浙北部诸路有饥民六十余万户，山东益都、莒密二州有饥民三万一千多户。至正四年（一三四四年）黄河决白茅，沿河数十郡县遭到严重水灾。次年河南大疫，“民之死者半”。出现了“田莱尽荒，蒿藜没人，狐兔之迹满道”<sup>⑧</sup>的悲惨景象。到了元末，农业生产

① 《元史》卷一八五，《干文传传》。

② 同上。

③ 余阙：《宪使董公均役之记》，《青阳集》卷九。

④ 《元典章》卷一九，《户部》五，《远年卖田告称卑幼收赎》。

⑤ 黄潜：《于九思行状》，《黄金华文集》卷二三。

⑥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⑦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

⑧ 余阙：《书合鲁易之作颍川老翁歌后续集》，《青阳集》卷八。

受到的破坏更是十分严重了。

### 第三节 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 一 官手工业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状况

##### 组织机构

元代的官办手工业空前发达,其规模和产量远在宋金之上。官营的手工业作坊,有的属于封建政府管辖的,有的属于皇亲贵族经营的。皇亲贵族经营的手工业是官手工业的补充。

蒙古统治集团在发动对外战争时,曾俘掠了大量的各族工匠,让他们从事军需和日用品生产,当时在中国北方已经设立了许多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局院。后来在进攻南宋过程中,蒙古军队在江南各地又俘掠了无数的工匠,官手工业的局院设置得越来越多。全国统一后,官手工业的局院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这样,庞大的官手工业各系统就进一步完备了。

政府直接控制的官手工业,主要有工部系统、将作院系统、大都留守司系统、武备寺系统和地方政府系统。

工部“掌天下营造百工之政令。凡城池之修濬,土木之缮葺,材物之给受,工匠之程式,铨注局院司匠之官,悉以任之”<sup>①</sup>。其所属生产性机构主要有:

诸色人匠总管府。“掌百工之技艺”。其下有专门从事绘画塑造佛像、制蜡、铸铜、制金银器皿、镂铁、琢磨玛瑙玉器、石、木、油漆等司局。

诸司局人匠总管府。“掌毡毯等事”。其下有大都、上都、隆兴

---

<sup>①</sup>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

等毡局、染局。

提举右八作司。“掌出纳内府漆器、红甕、捎只等，并在都局院造作镔铁、铜、钢、铦石，东南筒铁，两都支持皮毛、杂色羊毛、生熟斜皮、马牛等皮、驢尾、杂行沙里陀等物。”

诸路杂造局总管府。有帘网局。

大都人匠总管府。其下属有绣局、纹锦总院、涿州罗局。专门织造纱、罗，绣造段匹。

提举都城所。“掌修缮都城内外仓库等事。”

受给库。“掌京城内外营造木石等事。”

符牌局。“掌造虎符”。

撒答刺欺提举司。始由回回人札马刺丁负责织造撒答刺欺。

此外，还在全国设司、局、场几十所，进行织造御用纳失失（如别失八里局）、烧窑（如平则门窑场）、制皮（如通州皮货所）、织染（如大同织染局）等生产。弘州（今河北阳原）、荨麻林（今河北万全西北）两地，有三千三百余户西域回回工匠在纳失失局中生产一种用金线混织成、上贴大小明珠的金绮。

将作院“掌成造金玉、珠翠、犀象、宝贝、冠佩、器皿，织造刺绣段匹纱罗，异样百色造作”<sup>①</sup>。其下属机构有：

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掌造宝贝、金玉、冠帽、系腰束带、金银器皿，并总诸司局事”。有制造玉、金银器皿、玛瑙、金丝、鞵带、烧瓷、粧钉、雕木、玳瑁、漆纱冠冕、采砂等司局十余所。

大都留守司“兼理营缮内府诸邸、都宫原庙、尚方车服、殿庑供帐、内苑花木，及行幸汤沐宴游之所”<sup>②</sup>。其属下有木、泥厦、车、粧钉、竹作、绳等局。又有：

① 《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

② 《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

祇应司：有油漆、画、销金、裱褙、烧红等局。

器物局：有铁、减铁、盒钵、成鞍、网、刀子、旋、银、轿子、采石等局。

犀象牙局：有雕木、牙等局。

还有窑场、木场等。

武备寺“掌缮治戎器，兼典受给”<sup>①</sup>。在北方太原、辽州、济南等地设军器局司三十余所，制造各式兵器、军用品。

地方各路、府、州、县均设有手工业局院。诸路总管府下有织造局、杂造局。织造局主要织造、印染纺织品，杂造局制造兵器及其他杂物。有些地方织造局的规模是很大的，如庆元（治今浙江宁波）织染局，拥有土库三间、库前轩屋三间、厅屋三间，前轩厅后屋一间，染房四间，吏舍三间，络丝堂十四间，机房二十五间，打线场屋四十一间，土祠一间，计九十八间<sup>②</sup>。

皇太子、后妃、驸马、诸王等贵族所控制的官手工业，主要有皇太子名下的储政院所属各机构，后妃名下的中政院、长信寺、长秋寺、承徽寺、长宁寺等所属各机构，诸王驸马的各局院。

属于皇太子位下的有：

储政院系统所属机构中有不少是从事手工业生产的。计有：

织染局。

管领怯怜口诸色民匠都总管府属下的杂造人匠提举司、杂造局等。

昭功万户都总使司属下的织染杂造人匠都总管府，领织染局、绫织局、纹绵局等机构。

属于后妃位下的有：

---

① 《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

② 王允恭：《至正四明续志》卷三，《城邑》，《公宇》。



中政院所属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机构:其中江浙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下设平江、松江、建康等处提举司三处,各有织染局。所辖建康织染局有东西织染局各一,东织染局拥有“人匠三千六户,机一百五十四张,额造段匹四千五百二十七段,丝一万一千五百二斤八两”<sup>①</sup>,它隶资政院管领,规模是不小的。此外,还拥有金银场提领所、铁冶管勾所若干。

长信寺、长秋寺、承徽寺、长宁寺等所属的官手工业机构,从事冶铁、营缮、制造鞍辔輿辇等事务。

诸王驸马也有局院;贵族官僚则利用其投下家奴从事手工业生产。如功臣博罗欢,中统三年(一二六二年)利用其投下匠户包采“宣德州、德兴府等处银冶”,“岁收银及石绿、丹粉输官”<sup>②</sup>;礼部尚书马月合乃于中统四年(一二六三年)领已括户三千,在颍州一带“兴煽铁冶”,所得“易粟四万石输官”<sup>③</sup>;元顺帝时,丞相马札儿台“于通州置榻坊,开酒馆、糟坊”,所费原料“日至万石”<sup>④</sup>。武将吕德的夫人刘氏经营蚕织业,利用家僮数十人,“以故资用丰裕”<sup>⑤</sup>。这些贵族官僚经营的手工业,有的是为官府服务的,也有的供应市场,获利归己。寺院也有经营手工业的,如著名的大护国仁王寺,就拥有玉石、银、铁、铜、盐、煤炭等坑冶十五处。这些手工业其性质都是封建性的。

元代官手工业种类繁多,机构庞大。其名称一般称局、院、提举司、所、库等,设院长、大使、副使、提举、同提举、副提举、提点、提领等官员,其下有管勾、作头、头目、堂长等。据《元典章》,工匠在五百户以上者称提举、副提举、同提举;三百至五百户者称院长、提领、提点;一百至三百户者称大使、副使<sup>⑥</sup>。政

① 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六,《历代官职》。按:资政院系至元六年(一三四〇年)为完者忽都皇后所置,见《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

②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③ 同上。

④ 权衡:《庚申外史》。

⑤ 陆文圭:《吕德基志铭》,《墙东类稿》卷一二。

⑥ 《元典章》卷八,《吏部》二,《循行选法体则》。

府另设覈实司,对官手工业的产品质量、原料使用状况进行检查核实。

### 生产状况

元代的官手工业都是为了封建政府统治人民和皇帝贵族挥霍浪费的需要而设置的,因此,其种类十分繁多。据《经世大典序录·工典总叙》记载,其大类即有:宫苑、官府、仓库、城郭、桥梁、河渠、郊庙、僧寺、道宫、庐帐、兵器、卤簿、玉工、金工、木工、埴埴、石工、丝枲、皮工、毡罽、画塑、诸匠等二十二类<sup>①</sup>。其中建筑九项,手工业生产及工艺品生产十二项,徭役一项。

官手工业是官府、贵族直接经办的,因而拥有充足的人力和物力,有无数工匠供其驱使,有以和雇和买的名义搜括来的廉价原料,虽然官手工业的生产效率不高,但由于能手巧匠多,物资原料充沛,因而生产出了许多精美的产品。

兹将官手工业的主要行业的生产情况简述如下。

毡罽业。我国北方的蒙古等少数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发展了毡罽业生产。蒙古入主中原后,宫廷、贵族对毡罽的需要量越来越大,诸凡铺设、屏障、庐帐、蒙车、装饰等均需要毡罽,因而官府和贵族所控制的诸司、寺、监都生产毡罽。

官手工业的毡罽产量很高。以大都毡局为例,中统三年(一二六二年)立局的当年就织造了羊毛毡三千二百五十段,以后三年内又织成白毡八百一十片,梢白毡一百八十段,大糝白毡六百二十五段,熏毡一百段,染青小哥车毡十段,大黑毡三百段。另外还染毡一千二百二十五斤<sup>②</sup>。又如随路诸色民匠打捕鹰房都总管府属下的察迭儿局,泰定元年(一三二四年)一次送纳入库的就有白厚毡二千七百七十二尺,青毡八千一百十二尺,四六尺青毡一百七十九斤<sup>③</sup>。

① 《经世大典序录·工典总叙》,见《元文类》卷四二。

② 《大元毡罽工物记》。

③ 同上。

毡罽的花式品种也很多。从大德二年(一二九八年)到泰定五年(一三二八年)止,随路诸色人匠总管府为上都皇后宫殿、斡耳朵、皇帝影堂织造的地毯,就有剪绒花毡、脱罗毡、人药白毡、半入白矾毡、无矾白毡、雀白毡、半青红芽毡、红毡、染青毡、白袜毡、白毡胎、回回剪绒毡等十三种。其中至治三年(一三二二年)所造的一条地毯长五十尺,阔二十二尺五寸<sup>①</sup>。

丝织业。丝织业是元代官手工业的重要行业,产品主要供宫殿王府装饰和皇室、贵族、官僚穿着之用。从事丝织品生产的大小不等的织染局遍布全国。主要产地在建康(天历二年改集庆,今江苏南京)、平江、杭州、庆元、泉州等地。四川、中原地区也有很多官办局院。官手工业的丝织品产量高,花色品种多,质量精美。

元代的赋税,税粮为谷粟,科差则以丝料代替绢帛,另有五户丝输于当地的封主。因此,官府和诸王贵族和局院丝织坊有极其充足的原料,加上局院多,规模大,产量是十分惊人的。镇江府岁造缎五千九百零一匹,建康仅东织造局一处岁造缎四千五百二十七匹。

花色品种也很多。镇江府岁造的丝织品中有纒丝、暗花、丝绸、胸背花、斜纹等,分枯竹褐、秆草褐、明绿、鸦青、驼褐等颜色。织金纒丝在官办丝织业中占有相当地位,这是一种在绸缎上织金的产品,从宋代的缂丝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花样颜色一段之间深浅各不同,此工人之巧妙者”,在元代还用它织佛像、御容;纒丝的花样颜色虽不及缂丝,但繁华细密却超过缂丝<sup>②</sup>。一九五九年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南盐湖出土了一件元代青花粉花缂丝,使用了熟练的披梭戗色法,以增强花朵的晕感;还使用单双子母经,使断纬和经线结合更牢固,并突出了绘画上的勾勒效果,这在宋缂中是罕见的技法<sup>③</sup>。再从一九六四年

---

① 《大元毡罽工物记》。

② 孔齐:《至正直记》卷一,《宋缂》。

③ 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绵和刺绣》,《考古学报》一九六三年第一期。

张士诚母曹氏墓中出土的袍、袄、裙等丝织品来看,更足以证明元代官手工业纺织技术的高超<sup>①</sup>。其质地有缎、绫、绸等,图案异常精美。有一件薄丝棉袄,缎纹为五枚经缎纹心,花五枚纬纹组织,以连续曲尺云杂纹饰,间以如意、珊瑚、玉钏、银锭等八宝图案纹<sup>②</sup>。实为当时的佳品。一九七五年山东邹县李裕庵墓出土的一幅绛色绸方巾,上部有一老寿星,左侧有小鹿,右侧有仙鹤,中间有六行四十二字。这幅方巾上下人物、鸟兽、花纹、文字,同时织成,显示了元代纺织技术的高度发展<sup>③</sup>。李裕庵是元代锦州同知,至正十年(一三五〇年)葬于邹县,出土丝织品估计是官手工业的产品。此外,集庆官纱也极闻名,“集庆官纱,诸处所无,虽杭人多慧,犹不能效之。……近又作一色素净者尤妙,暑月之雅服也。”<sup>④</sup>

兵器业。至元初,兵器主要由统军司制造,损坏后则由诸万户府行营选工匠自行修理。后来置武备寺专制兵器,各地方置杂造局,以制造军用物资为主。

元代制造的兵器,除常用的刀枪弓箭之外,还有西域传入的抛石器械。“其西域炮、折叠弩皆前世所未闻”<sup>⑤</sup>。所谓西域炮,又称回回炮。它在至元十年(一二七三年)元军攻破襄阳时发挥过巨大的威力。当时,“亦思马因相地势,置炮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sup>⑥</sup>。中国古代原有抛石机,传入西域并加以改进后其射程和威力更大,此时重新传入中国。当时人说:“其回回炮,本出回回国,甚于常炮,至大之木就

---

① 张士诚母曹氏死于至正二十五年(一三六五年)。元代有平江织染局,张士诚占领平江后据为己有。估计曹氏墓出土的丝织品为官手工业所造。

② 《苏州吴张士诚母曹氏墓清理简报》,《考古》一九六五年第六期。

③ 《邹县元代李裕庵墓清理简报》,《文物》一九七八年第四期。

④ 孔齐:《至正直记》卷一,《集庆官纱》。

⑤ 《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军器》,见《元文类》卷四一。

⑥ 《元史》卷二〇三,《亦思马因传》。

地立井,炮石大数尺,堕地陷三四尺,欲击远,则退后,增重发之;欲近,反迫前”<sup>①</sup>。回回炮在元代前期是大量制造的。

到元朝统一全国后,火炮技术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金属管火炮——火铳,它是利用火药在金属管里爆炸产生的气体压力,把弹丸发射出去,与今天枪炮的原理是一致的。现存世界上最早的铜火铳,一门是至顺三年(一三三二年)铸造的,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重六·九四公斤,长三五·三厘米,铳口直径一〇·五厘米;另一门是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年)铸造的,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重四·七五公斤,长四三·五厘米,铳口直径三厘米。关于火铳的技术分析本书第九章还要谈到。

各地的杂造局主要制造军需物品,诸如铁制刀箭等兵器、马上用品,披毡、布制品等等。

矿冶业。矿冶业与兵器、生产工具等的制造和国家的财政收入有直接关系,元朝政府对此非常重视,政府直接控制的矿山、炼炉遍于全国各地。

各种矿藏的开采和冶炼由政府控制,其经营方式一般是:或派政府官员组织人匠开采,或包给私人募人开采。如前面提到中统三年时博罗欢利用其投下包采和冶炼宣德州、德兴府的银矿,产品缴给政府;绝大多数的采矿、冶炼都是政府派官员设提举司进行开采、冶炼,如上都中都银冶提举司,至大二年(一三〇九年)输银四千二百五十两,至大三年(一三一〇年)输银三千五百两;<sup>②</sup>世祖时,江西蒙山银冶岁输银达三万五千两<sup>③</sup>。

冶炼业往往与兵器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解放后在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土城子村发现了元集宁路古城遗址。就发现的遗物来看,这里是冶炼铜铁与兵器生产的重要基地。古城分内外两重:外城西北部遍布焦结的大块煤

① 郑所南:《心史》下,《大义略叙》。

②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

③ 揭傒斯:《董守中神道碑》,《揭傒斯集》卷一二。

渣,出土有风箱炉灶上用的多孔盘残片和风箱上隔灰用的砖球,以及铁勺和铁鏊;内城南部也有冶炼遗址,出土有铜铁渣和坩埚片<sup>①</sup>。

制盐业。自汉朝以来,我国历代封建政府都是直接经营盐业生产的。元朝政府为对盐业生产和销售进行管理,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整个生产和销售过程制度严密,生产规模很大,地区广泛,产量远远超过前代。

管理盐业的专门机构叫盐运司(有的地方叫转运司、提举司),其职责是“掌场灶,榷办盐货”<sup>②</sup>,计两淮、两浙、山东、福建、河间、河东、四川、广东、广海九处,大都、辽阳、兴和等地设后或并或废。两淮、两浙、山东等处盐运司之下又设若干分司。每个盐运司(或分司)分别管辖若干所盐场,全国共设盐场一百数十所。盐场下分若干团,团下有灶,每灶由若干盐户组成。盐户固定在盐场上劳动,子孙世袭,他们对政府缴纳额盐,还要负担科差、税粮和差役。主要生产资料及工具由政府供应。

元代的盐有海盐、池盐、井盐之分。海盐产于沿海地区,由煮或晒海水而成;池盐主要产于河东解州(今山西运城西南)盐池,每年五月池盐晒结而成;井盐产于四川,从井中汲水煮成。产盐之地遍于全国。至天历年间,盐的总产量达二百五十六万四千余引,每引重四百斤,当合十亿多斤<sup>③</sup>。

#### 管理腐败

元朝的官手工业虽然生产了一些优秀产品,但这都是在严格封建控制下通过驱使工匠进行强制劳动才取得的。这些优秀产品从质和量方面来说,与当时所投入的巨大人力物力、人数众多技术高超的能手巧匠比较起来,是很不相称的。这是因为元朝手工业生产中管理十分腐败,封建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官手工业的腐败表现如下:

---

① 《元代集宁路遗址清理记》,《文物》一九六一年第九期。

②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

③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第一,工匠受到严格控制,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元代的“系官匠户”多是战争过程中掳掠的工匠,另有从金朝官手工业中接收和强行拘括来的。在蒙古国时期,他们的地位与驱口差不多,等于是工奴。元朝建立后,工匠的地位逐渐有所改变,大部分有了自己的家庭和财产,定期入局承担造作任务。身份逐渐与民户相等。但元朝政府为了保证其对各种各样的手工业产品的需要,便对工匠进行了严格的控制,既不允许匠户随意脱籍,也不许其他人户窜入匠籍。法律还规定了匠户的世袭应役制度<sup>①</sup>。对工匠的严格控制和沉重的课役,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工匠的技术水平是参差不齐的。由于工匠在蒙古军队屠城时往往能免于遭难,以致有许多人为求得免死混入在工匠中;也有为逃避税役混入工匠中的,富户冒籍入匠的,江南军驱逃亡佣于官手工业局院的,这样,工匠的人数越来越多,许多人无艺、无器,也无役可干,政府不得不多次进行淘汰。如中统三年(一二六二年)汰少府监工匠,存其良者一千二百户;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年)三月放福州、泉州无役工匠为民;同年六月放保定工匠楚通等三百四十一户为民;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年)五月择上都工匠二千九百九十九户中不切用者,俾就食大都。有些工匠虽未淘汰,却“名隶工匠,而无一器”<sup>②</sup>,也只是滥竽充数罢了。

第二,匠官贪污,营私中饱。

官手工业中的各级官吏利用他们手中的职权克扣原料,冒支工匠工粮、夹带私造的情况十分严重,官府虽屡屡下令禁止,根本无法制止。

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年)发生了中都甲局官玉鲁、杨三合用低质皮货承造衣甲、从中贪污的事件<sup>③</sup>;大德四年(一三〇〇年)发生了和买丝货时各处

① 参见李景林:《元代的工匠》,《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五期。

② 分见《元史》卷五、一六、一七,《世祖纪》二、一三、一四。

③ 王恽:《弹甲局官玉鲁等抵搪造甲皮货》,《秋涧集》卷九〇。



“官府上下权豪势要之家私下贱买不堪丝料,逼勒交收,高抬时估,取要厚利”<sup>①</sup>的事件;延祐七年(一三二〇年)因各局院头目克落织造段匹丝料价钱,政府下令禁止<sup>②</sup>。这种以劣充好、克扣原料的事件,见于记载还有好多起。

官吏通过冒支工粮从中渔利的也很严重。兴和路(治今河北张北)二十六个局的官员,在延祐元年(一三一四年)前每年多支工粮二万零三百余石,按规定应支四千零八十石,而实支了二万四千三百余石,竟是应支数的六倍<sup>③</sup>。

利用职权夹带私造的情况也经常发生。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年)曾有禁止管诸监的官吏和工匠带造私活的禁令<sup>④</sup>;至元二十五年(一二八八年)又有禁止杂造局官员私下与诸人带造军器的命令<sup>⑤</sup>。可见,在官手工业中私下带造的情况是严重的。

### 第三,缺乏会计核算,成本过高。

由于官手工业有廉价的劳动力,有充足的原料来源,产品又多是供统治者和官府、军队使用的,因而根本不按价值规律办事,核算不严,贪污浪费严重,成本昂贵。

产品没有统一规格,验收不严:如至元六年(一二六九年)时各地上缴的皮甲,规格差异很大,每件甲轻则三十五斤,重则四十二斤;原料使用缺乏核算: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年)集庆二十名工匠造箭,按规定日用翎一千六百根,岁用翎五十七万六千根,可是他们却从杭州运来四百八十万根<sup>⑥</sup>。所以胡

① 《元典章》卷五,《工部》一,《选买细丝事理》。

② 《元典章》新集,《户部》,《延祐七年革后稟到钱粮》。

③ 《通制条格》卷一三,《工粮》。

④ 《元典章》卷五八,《工部》一,《不得带造生活》。

⑤ 《通制条格》卷三〇,《私下带造》。

⑥ 杨瑀:《山居新话》。

祗通说：“诸局织造杂作或妨夺工役，或本官侵欺，造作不时，一岁会计无量人为出之效。”<sup>①</sup>因而官手工业的产品造价极高，大大超过了民间手工业的产品，杭州官办砂糖局的造价比民货费有数十倍之远，只好停办<sup>②</sup>。

## 二 民间手工业的生产

### 概况和特点

元代的民间手工业是在宋金时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其基本概况和特点如下：

第一，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家庭手工业具有普遍性。

中国封建社会里，“男耕女织”是一种普遍现象。家庭手工业是农民自给的生活必需品和完纳赋税的重要来源。到了元代，这种状况并没有改变。诗人王冕写道：

江南妇，何辛苦！  
田家澹泊时将雨，  
敝衣零落面如土。  
馐彼南亩随夫郎，  
夜间绩麻不上床。  
绩麻成布抵官税，  
力田得米归官仓。<sup>③</sup>

所以，生产生活必需品和供赋税之用的家庭手工业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丝织、棉织、麻织等行业更便于这种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松江乌泥泾，宋元之际时，“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棉）种于彼。

① 胡祗通：《杂著·时政》，《紫山集》卷二二。

② 杨瑀：《山居新话》。

③ 王冕：《江南妇》，《竹斋诗集》卷二。

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sup>①</sup>从事棉纺生产的还不甚普遍。到元贞年间,著名女纺织家黄道婆自崖州返回家乡乌泥泾后,“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教他妇不少倦。未几,被更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sup>②</sup>可见该地棉纺生产发展很快。正因为江南普遍植棉产布,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元朝政府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sup>③</sup>,后来,元朝政府又规定南方某些地区用木棉布代替地税,并在南方一些省大量和买木棉布。这样又反过来促使江南地区家家户户必须生产木棉和棉布。各王公贵族从五户丝中获得很多丝料,他们不仅利用投下匠户从事生产,还将五户丝料俵散民户去织造,也促使家庭手工业中从事丝织生产的增多起来。

第二,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在手工作坊中出现了雇佣劳动。

唐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已经有了发展,在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上出现了小规模的手工作坊,并开始使用雇佣劳动。这种状况,到元代时有所发展。

以松江棉布生产为例。宋元之际由于生产技术低下,多是农妇家庭操作。黄道婆回来后,推广了先进技术,“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sup>④</sup>就是说,在生产技术提高的基础上,为市场生产了大量商品——棉布。

其他手工业行业发展也很快。唐宋以来,苏杭等地就逐渐形成了全国手工业中心。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苏州城内“居民……有丝织物甚饶,恃工商为生,……城中有许多富商大贾和富裕的市民。”<sup>⑤</sup>他又说,杭州“城中

---

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四,《黄道婆》。

② 同上。

③ 王逢:《黄道婆祠序》,《梧溪集》卷三。

④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四,《黄道婆》。

⑤ 《马可波罗行记》,页三二四。

有十二种职业,各业有一万二千户,每户至少有十人,中有若干户多至二十人四十人不等。其人非尽主人,亦有不少为供主人指使之人。”<sup>①</sup>这说明早在元初时,杭州已有不少手工业作坊,并使用雇佣劳动。到元末时,徐一夔在《织工对》中所记载的情况就更详细了:

余僦居钱塘之相安里,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每夜至二鼓,一唱众和,其声欢然,盖织工也。余叹曰:“乐哉!”旦过其处,见老屋将压,杼机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进工问之曰:“以余观若所为,其劳也亦甚矣,而乐何也?”工对曰:“此在人心。心苟无贪,虽贫,乐也;苟贪,虽日进千金,只戚戚尔。吾业虽贱,日佣为钱二百缗,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养吾父母妻子,虽食无甘美,而亦不甚饥寒。余自度以为常,以故无他思。于凡织作,咸极精致,为时所尚,故主人聚易以售,而佣之直亦易以入。所图如此,是以发乎情者,出口而成声,同然而一音,不自知其为劳也。顷见有业同吾者,佣于他家,受直略相似。久之,乃曰:‘吾艺固过于人,而受直与众工等,当求倍直者而为之佣。’已而,他家果倍其直佣之。主者阅其织,果异于人;他工见其艺精,亦颇推之。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胜十工,倍其直不吝也。’”<sup>②</sup>

这条材料真实而典型地描写了元末杭州手工业作坊的规模、生产状况和雇佣关系,说明了当时像这样规模的手工作坊是较多的。工人的劳动条件差、强度大;产品由作坊主作为商品向市场出售;作坊主和工人之间除了雇佣关系外,没有其他关系,工人可以自由选择作坊;工人的工资根据技术高低“受值”。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如恩格斯所说:“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

① 《马可波罗行记》,页三二九。

② 徐一夔:《织工对》,《始丰稿》卷一。

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sup>①</sup>。在元代当然还不具备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

还值得注意的是元代丝织业中产生了绢庄,说明商业资本已渗入手工业生产,绢主、机户分工明确。归安县的东林镇(又称商林镇,明代改称双林镇)就设有十所绢庄,专门收购四方农民所产丝绢。《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三《輿地略·物产下》:“绢。《双林志》:‘杜生绢以粗丝为之,有冬生绢、夏生绢二种。又有灯绢、裱绢,俱付别工小机造之。元时有绢庄十座,在普光桥东。凡收绢,黎明入市,曰上庄,辰刻散市,曰收庄。主其事者有司岁,有司月。收绢者曰绢主,售绢者曰机户。’”

第三,民间手工业在元朝政府的控制和压制下,不能充分发展。

元代民间手工业虽有若干发展,但由于封建官府的控制、压制和摧残,始终处在得不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封建政府通过法律和豪取巧夺,在行业上、生产上、人力物力上作了种种限制。

首先,在行业上,民间手工业主要范围是纺织、陶瓷、酿酒等业,其他行业受到政府的限制,又缺少人力物力,因此很少有人经营。如开采、冶炼业,政府严禁私人开采铜矿,对金、银、铁矿也严加控制,只有少数开采条件极差的矿山,才容许私人开采或包采,但却课以重税或由政府抽分,如银矿大抵以十分之三输官。

其次,在生产上受到种种限制,产品受到政府控制。在产金之地,“有司岁征金课,正官监视人户,自执权衡,两平收受。”<sup>②</sup>铁产品则全由政府控制,凭铁引贩运,“江南铁货及生熟铁器,不得于淮、汉以北贩卖,违者以私铁论。”<sup>③</sup>酿酒有定额,不准私造,“诸私造唆鲁麻酒者,同私酒法,杖七十,徒二年,财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页三一—一注。

② 《元史》卷一〇四,《刑法志》三。

③ 《元史》卷一〇四,《刑法志》三。

一半没官。”<sup>①</sup>对纺织业,也百般摧残:一是通过和买、赋税强征民间产品,如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年)万亿赋源库每年收受各地木棉布五十余万匹<sup>②</sup>,至大三年(一三一〇年)规定每年从江西和买木棉布额定十二万匹<sup>③</sup>,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是限制产品的规格,如元代民间织金纴丝很普遍,有的织造销金日月龙凤缎匹纱罗,却受到了政府的禁止<sup>④</sup>。

第三,封建政府的掠夺。民间工匠是“不系大数民匠”,按理不属官府控制,不入官手工业局院受役。但实际情况却是他们常被官府差役或受诸贵族官僚投下“拘刷”。如元朝进攻南宋时,伯颜“以甲冑不足,诏诸路集匠民分制”<sup>⑤</sup>;江南平定后,“置机房,白役机匠,鞭撻别色技艺人,亦学攀花织造缎匹,期限甚严。”<sup>⑥</sup>延祐四年(一三一七年)经刑部、兵部约会,议得,如果制造军器的军匠不敷使用,就要“管民官司差倩民匠置局成造军器”<sup>⑦</sup>。投下“不经由本路官司,径直于州县开读。拘刷民户人匠,便行拘收起移及取索钱债骚扰”<sup>⑧</sup>的事也是不断发生的。

第四,富民依靠官府势力,垄断手工业产销。如杭州就出现了富民垄断当地酿酒业,获得专利,攫取暴利的情况。“杭之豪民十家,入赂于官,大为酿务,高其估而专其利,酒日醺恶。”<sup>⑨</sup>

#### 生产状况

尽管民间手工业在政府的压制和限制下,规模较小,条件很差,但由于一

① 《元史》卷一〇四,《刑法志》三。

② 《元典章》卷二六,《户部》一二,《体察和买诸物》。

③ 同上书,《和买诸物对物估体支价》。

④ 《元典章》卷五八,《工部》一,《禁军民段匹服色等第》、《金箔等物断例》。

⑤ 《元史》卷二〇三,《孙威传》。

⑥ 《心史》下,《大义略叙》。

⑦ 《元典章》卷三五,《兵部》二,《军匠自造军器》。

⑧ 《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投下收户》。

⑨ 姚燧:《蒙古神道碑》,《牧庵集》卷一四。

般作坊中封建压迫较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较高,因此反而较官手工业效率高、成本低,有些部门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技术超过了官手工业。

兹将民间手工业的主要行业的生产情况简述如下。

棉纺织业。棉纺织业是元代从民间开始新兴的一项手工业。它与棉花的种植密切相关。海南黎族地区比内地种植棉花早,纺织技术比内地先进。早在南宋时,黎族妇女已生产出黎幕、黎单、黎饰、鞍搭、花被、縵布之类,运销内地。元贞年间,黄道婆从海南岛回到家乡乌泥泾后,“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挹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手巾),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sup>①</sup>这样精美的棉布是靠黄道婆引进并加以改进的纺织工具织成的。根据王桢《农书》的记载,元代中期的织棉工具已粗具规模了。这些工具主要有:搅车——轧棉子工具,“四木作框,上立二小柱,高约尺五,上以方木管之;立柱各通一轴,轴端具作掉拐,轴末柱窍不透。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英,二轴相轧。则子落于内,棉出于外。比用辗轴,功利数倍”。弹弓——弹棉花工具,“长可四尺许,上一截颇长而弯,下一截稍短而劲,控以绳弦,用弹棉英”。元末发明檀木椎子,击弦时更有力。卷筵——卷棉工具,“淮民用蜀黍梢茎,取其长而滑,今他处多用无节竹条代之”。纺车——纺纱工具,“夫轮动弦转,筭维(锭子)随之。纺人左手握其棉筒,不过二三续于筭维,牵引渐长,右手均撚,具成紧缕,就绕维上”。这种纺车可能是用足踏发动的。拨车——将纱锭上的棉纱拨到拨车上变成棉缕的工具,“以竹为之,方圆不等,特更轻便。按旧说先将纺讫棉维于稀糊盆内,度过稍干,然后将棉维头缕拨于车上,遂成棉缕”。轩床——作用同拨车,“其制如所坐交椅,但下控三轩,四股轩轴之末,置一掉枝,上椅竖列八维,下引棉丝转动掉枝,分络轩上,丝缕既成,次第脱卸”。线架——并纱成线的工具,“以木为之,下作方座,长阔尺余,卧列四维,座

<sup>①</sup> 《辍耕录》卷二四,《黄道婆》。



上凿置独柱,高可二尺余,柱上横木长可二尺,用竹篾均列,四弯内引下座,四维纺于车上,即成棉线”。织机——最后织成棉布的工具,黄道婆时已发明提花织机<sup>①</sup>。

棉布的印染技术也有了很大发展,到元末时,“松江能染青花布,宛如一轴院画,或芦雁花草尤妙。此出于海外倭国,而吴人巧而效之,以木棉布染盖印也。青久浣亦不脱”<sup>②</sup>。

丝织业。丝织业是元代民间手工业中最普遍的一个行业,而且绝大多数是家庭手工业。这种家庭手工业城乡都有,有的已经形成了手工作坊,上引《织工对》所述杭州相安里手工作坊即是。当时,成都城中“千家万户夜灯起,机器轧轧满城市”<sup>③</sup>,郊区都江堰两岸,所置“碓硙纺绩之处以千万计,四时流转而无穷”<sup>④</sup>。杭州“民籍手业以供衣食”,常常通宵达旦干活<sup>⑤</sup>。民间手工业中,织金纴丝很普遍,品种很多,如嘉兴路所产丝绸品种有:绡、绫、罗、纱、水锦、剡丝、绸、绋、绮、绣、绐等<sup>⑥</sup>。马可·波罗在中国时,也看到中原和南方各城乡居民从事丝织业的相当多,如京兆(今陕西西安)居民织制“种种金锦丝绢”,成都郊区农村,“其中纺织数种丝织”,东平“产丝之饶竟至不可思议”,宝应、开封、镇江、苏州、吴兴、吴江等地的居民多是“恃商工为活,有丝甚饶”,生产各种金锦丝绢。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目睹了泉州、广州等地盛产丝织品的情况。

麻织业。麻布产于南方,元代北方种麻颇多,种植和收割技术比南方强,产量也较高,因而纺麻工具也比全国其他地区先进。

① 以上引文均见王桢:《农书》卷二一。

② 孔齐:《至正直记》卷一,《松江花布》。

③ 戴良:《赋廉范五袴送马太守》,《九灵山房集》卷九。

④ 揭傒斯:《大元赐修堰碑》,《揭傒斯集》卷一二。

⑤ 杨瑀:《山居新话》。

⑥ 《至元嘉禾志》卷六,《物产》。

据王桢《农书》所引詹云卿《造布之法》记载,当时织麻布的方法有毛绳布法、铁勒布法、麻铁黎布法,分别采用一色白苧麻、拣下杂色苧麻、杂色老灰麻作原料,采用不同的方法,得到品种不同的麻布,质量很好,“比之南布,或有价高数倍者”<sup>①</sup>。河南陈州、蔡州地区,善织者麻一斤织布一匹,次者一斤半一匹,又次者二斤、三斤一匹,其布“柔韧洁白,比之常布又价高一二倍。”<sup>②</sup>山西地方出产的麻布品种有大布、卷布、板布等。

织麻工具也有很大进步。中原地区用水转大纺车纺织,“昼夜纺绩百斤”<sup>③</sup>,工效很高。山西一带使用的布机有立机子、罗机子、小布卧机子,打纴丝线经上使用的有掉簏座等<sup>④</sup>。

制瓷业。元代的制瓷业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在北方,山西南部的蒲州、潞安和霍州等地,出现了许多新瓷窑,河北南部的漳水设立了官窑,继承了宋代定州、磁州的白瓷和钧窑的青瓷制作法。南方以江西景德镇和浙江龙泉、福建德化的建窑最著名,龙泉出产青瓷,德化制造的碗及瓷器既多且美<sup>⑤</sup>。此外,饶州(今江西波阳)有御土窑,“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sup>⑥</sup>

景德镇的瓷业在宋元之际已有相当发展,入元后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制瓷业中心。蒋祁《陶纪略》说:“景德镇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sup>⑦</sup>元朝政府特设浮梁瓷局加以监督。虽然御器供给于此,但御器烧造仍由民窑承担(其制作御器之底有“枢府”字样),有命则烧,无命则止。民间产品,由政府课以赋税。其产品“商争取售”,远销“浙之

① 王桢:《农书》卷二二,《苧麻门》。

② 《农桑辑要》卷二,《苧麻》。

③ 王桢:《农书》卷二二,《苧麻门》。

④ 薛景石:《梓人遗制》。见《永乐大典》卷一八二四五。

⑤ 《马可波罗行记》页三五二。

⑥ 孔齐:《至正直记》卷二,《饶州御土》。

⑦ 蒋祁:《陶纪略》,见《江西通志》卷九三,《经政略》一一,《陶政》。

东西,江湖川广,荆襄两淮。”<sup>①</sup>制作技术大有改进,其分工有陶工、匣工、土工,其坯有利坯、车坯,其花样有印花、画花、雕花、青花等。青花瓷是元代景德镇的新产品,它的问世标志着元代瓷器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产品运销全国各地及东南亚、阿拉伯各国,受到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这些产品都是民窑生产的。

元代青白瓷的生产出现停滞状态,制作方式沿袭宋代,造型端重雅致,胚体厚实粗率。

冶炼业。元代的冶炼业主要是官办的。但除铜矿外,也有民办的。民办的形式,主要是缴纳岁课,产品由政府抽分。如至元十年(一二七三年),听李德仁龙山县(今辽宁喀喇沁左翼南)胡碧峪淘金,每岁纳课金三两;十一年(一二七四年),听王庭璧于檀州(今北京密云)奉先等洞采铜;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年)韶州路曲江县(今属广东韶关)银场听民煽炼,每年输银三千两;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年),李允直包罗山县(今河南罗山)银场,课银三錠;四年(一三一七年),李珪等包霍丘县(今安徽霍丘)豹子崖银洞,课银三十錠,其所得矿,大抵以十分之三输官;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年),听民煽炼铁炉,官为抽分<sup>②</sup>。由于官办冶炼业成本高,也有由官冶改为民冶的,如元世祖时河北沙河綦阳镇附近四个铁矿,由九千九百五十户冶炼匠户生产,但全部产品价值却比不上改为匠户纳课的收入,因此王恽建议“罢去当差,许从诸人自治窑冶煽炼,据官用铁货,给价和买,深是官民两便”<sup>③</sup>。

民间冶炼业中大量使用了雇佣劳动,许多经营矿业的也因此发财致富。庐陵安福(今江西安福)人刘宗福“尤善生殖,尝业铁炉于金牛(今安徽庐江西北)大冶,煽役者常千人,由是高资厚积。”<sup>④</sup>林虑(今河南林县)人李玉,“鼓铸

① 蒋祁:《陶纪略》。

② 以上均见《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

③ 王恽:《论革罢拨户兴扇炉冶事》,《秋涧集》卷八九。

④ 王礼:《刘宗海行状》,《麟原集》前集卷三。

煮硃,所居城市,凡能佣力而无恒产者,……相率来归,寒者得衣,饥者得食,穷殍者得生活。”<sup>①</sup>

## 第四节 交通运输业的发达

### 一 河漕

元代的交通运输业,包括陆上运输、内河运输和海上运输。本节所述主要是沟通南北的运河漕运和海运。

唐宋以来,我国的经济中心已经逐渐南移。元朝灭亡南宋统一全国后,南北之间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大都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sup>②</sup>在海运开拓之前,北方(主要是大都)所需的江南粮食及其他物资,主要是通过运河北运的。但元朝以前,南北运河基本上还是隋炀帝时所凿通的那条迂回曲折的运河。它由杭州至镇江,过江北上入淮,西逆黄河至中滦(今河南封丘南,黄河北岸),然后陆运至淇门(今河南淇县东南,卫河南岸),入御河(今卫河),经直沽(今天津南)转入白河,达通州(今北京通州),再陆运至大都。元朝政府分置京畿、江淮二都漕运司,分别负责中滦至大都和江南至中滦的纲运。这条路线,曲折绕道,水陆并用,劳民伤财,极其不便。因此,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是当务之急。

元朝政府一方面用开辟海运航线的办法来解决运粮的困难,另一方面则试用各种途径来解决南北河漕的畅通。

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年),元朝政府议开济州河,其中沟通汶水至泗

---

① 胡祇通:《李玉墓志铭》,《紫山集》卷一八。

② 危素:《元海运志》。

水一段由阿八失所开,以南一段由奥鲁赤所开。这条运河开凿后正好衔接扬州至淮河的扬州运河(此河系隋之山阴渚,宋代重修过,后河渐壅塞,仁宗延祐年间开阔疏通)。这样,江南运河与大清河(今黄河下游)就连接在一起了。于是便试行开辟西去的海路与运河联运的新路线。这条路线是:从淮安入淮河,至徐州转入新开济州河,再入大清河,顺流至利津(今山东利津)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再水陆联运至大都。但因利津入海后,发现“海口沙壅”<sup>①</sup>,又不得不放弃海道,改从东阿(今山东东阿南)旱站运至临清(今山东临清),入御河,由旧道去大都。元政府又曾开凿贯穿山东半岛的胶、莱河道,改由淮河入海以穿行北上直达直沽,结果“劳费不貲,卒无成效”<sup>②</sup>。

经过多次试验失败后,元朝政府决心凿通一条沟通南北的大运河。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寿张(今山东梁山西北)县尹韩仲晖等建议:“开河置牐,引汶水达舟于御河,以便公私漕贩”<sup>③</sup>。是役于年内开工,凿成后定名会通河。这条运河起东平路须城县(今山东东平)西南之安山,经寿张西北至东昌路(今山东聊城),又西北至临清,达于御河,全长二百五十余里。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年),都水监郭守敬建议修凿通惠河。这条运河引大都西北之白浮、甕山诸泉水,起自昌平县白浮村,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全长一百六十四里许。至此,南北大运河全线凿成,我国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四大流域通过这条运河连接在一起了。

元代新运河的开凿为南北交通的发达和物资交流提供了重要条件。会通河修成后经加固堤岸,修筑闸牐,大大方便了全国商旅的运输。“江淮、湖广、

①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

② 同上。

③ 《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会通河》。

四川、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sup>①</sup>。“江南行省起运诸物，皆由会通河以达于都”。该河始通时止许行百五十料船，后来富商大贾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在河中行驶<sup>②</sup>，这一方面反映了商人“贪嗜货利”，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运河中商旅运输的繁忙。所以到元末时，两淮运使宋文瓚说：“世皇开会通河千有余里，岁运米至京者五百万石”<sup>③</sup>。可见这条运河在整个元代都是十分繁忙的。通惠河虽然距离不长，却大大减轻了脚夫、船夫的劳动强度，“船既通行，公私两便。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挽官粮，岁若千万，民不胜其悴，至是皆罢之”<sup>④</sup>，千百条漕船可以一直驶到积水潭（今北京什刹海一带）。原来在河西务、通州所建粮仓也移到大都城郊，“东城红门内近新河有隙地，复迁红门稍入五十余，广展基址，期数年间，尽建仓宇，移致河西务、通州粮甚便”<sup>⑤</sup>。

## 二 海运

我国沿海有漫长的海岸线，为发展近海运输与外洋通航提供了有利条件。这里所说的“海运”是指国内近海运输。

自秦汉以来，已有海运，但多为临时性的短途运输，“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sup>⑥</sup>。元代海运在路线上、管理上、运输量上都是前代不能比拟的。

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伯颜下临安，取南宋库藏图籍，准备北运大都，由于两淮地区尚为宋有，不能北上，于是招朱清、张瑄由崇明洲（今上海崇明）入海道运往直沽，转至大都。“朱清、张瑄者，海上亡命也。久为

① 《元名臣事略》卷二，《淮安忠武王（伯颜）》引《野斋李公文集》。

② 《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会通河》。

③ 《元史》卷四二，《顺帝纪》五。

④ 《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通惠河》。

⑤ 《大元仓库记》。

⑥ 丘叟：《大学衍义补》。

盗魁,出没险阻,若风与鬼,劫略商贩,人甚苦之。”<sup>①</sup>这是元代有海运之始。

元朝统一全国后,每年需从江南运粮至大都,最初这条运输线主要是运河漕运。当时漕渠时常败坏,特别是中滦到淇门这段旱站转运,劳民伤财;后又改为运河、海路联运,也卒无成效。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年),伯颜追忆海道载宋图籍之事,提出海运粮食的建议。于是命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从海道至京师。他们入海后,正遇风信失时,只得在山东刘家岛(今山东蓬莱县境)停留,明年始至直沽。这次运粮至大都,虽仅四万六千余石,但比起漕运“船多损坏,民亦苦之”的情况好多了,于是海运渐被重视。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年),立万户府二,以朱清为中万户,张瑄为千户,忙兀斛为万户府达鲁花赤。以后海道运粮数逐年增加。

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年),始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设万户府二,合至元二十年所置共为四府。二十五年(一二八八年)设漕运司二:其一在直沽河西务,负责接运南来粮食物资;其二即京畿都漕运司,负责将直沽的粮食运往大都。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年),又以朱清、张瑄之请,并四府为都漕运万户府二,由朱、张专门督运海粮。

海运的粮食,起初来自江东宁国、池、饶、建康等处,湖广、江西及江浙、江淮等地,由于转辗运输,粮船多有损坏。至大四年(一三一一年)后规定以嘉兴、松江秋粮并江淮、江浙财赋府岁办粮充运,而将江西、湖广等处准备海运的粮米变钞或折价,与江浙一带兑换,这种“弃远就近装粮,以图民便”<sup>②</sup>的措施,促进了海运粮的增加。“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sup>③</sup>

① 罗洪先:《广舆图》。

② 《经世大典》。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中华书局影印本册一六七。

③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



元代历年海运粮统计表<sup>①</sup>

元 纪 年	公 元	海运粮数(运出数,单位:石)
至元二十年	1283 年	四六,〇五〇
二十五年	1288 年	四〇〇,〇〇〇
三十一年	1294 年	五一四,五三三
大德元年	1297 年	六五八,三〇〇
至大元年	1308 年	一,二四〇,一四八
皇庆元年	1312 年	二,〇八三,五〇五
延祐元年	1314 年	二,四〇三,二六四
至治元年	1321 年	三,二六九,四五一
泰定元年	1324 年	二,〇八七,二三一
天历二年	1329 年	三,五二二,一六三
至正元年	1341 年	二,八〇〇,〇〇〇
二十年	1360 年	一一〇,〇〇〇
二十三年	1363 年	一三〇,〇〇〇

元代海运路线,前后开辟过三条。第一条航线是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年)朱清、张瑄所辟,自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北经崇明州入海,沿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和万里长滩(今江苏海门东浅沙)开洋,靠近沿海山屿北行,抵淮安路盐城县(今江苏盐城),历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今江苏连云港)、密州(今山东诸城)、胶州(今山东胶县)海面;放灵山洋(今山东青岛以南海面),再东北行,沿途多浅沙,行月余,始抵成山(今山东半岛东端),然后西航,进入渤海,沿界河(今海河)至杨村码头(今河北武清),航程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sup>②</sup>;第二条航线是至元二十九年(一二九二年)朱清、张瑄因旧道“其路险恶”重新开辟的。自刘家港至撑脚沙、沙嘴(今刘家港西北甘草沙一带),再至

① 资料来源:《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卷九七,《食货志》五,《海运》。

② 危素:《元海运志》;《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

三沙、洋子江(均在长江北口),过匾担沙、大洪(均在今崇明北),又过万里长滩,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经黑水洋至成山、刘岛(今山东威海东刘公岛),至芝罘、沙门二岛(今山东烟台北),放莱州(今山东掖县)大洋,抵界河口(今天津大沽)。这条航线“差为径直”<sup>①</sup>,顺风时半月可达,“如风水不便,迂回盘折,或一月四十日之上,方能到彼”<sup>②</sup>。由于这条航线绕过了沿岸的沙滩,放洋航行多,因而时间短;第三条航线是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年)海运千户殷明略所开辟,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东行,入黑水洋,至成山转西,经刘家岛、登州(今山东蓬莱)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sup>③</sup>。这条航线比前二条更为便捷,主要是沿海岸线较远,取道较直,航期又大大缩短了。

元代海运的开辟是中国海运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对于商业的发展、大都的供给和繁荣、南北交通的畅通、官民造船业的扩大、航海技术的提高,都具有重大的作用。元朝时南北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陆路、河漕和海运三条途径,而“河漕视陆运之费,省计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计七八”<sup>④</sup>。海运是最经济合算的。因此,每年总是有上百成千只海船往返于南北海道。叶子奇说:“元京军国之资,久倚海运”。可知从海运送到大都去的物资恐不止粮食一项。他又说:元末农民起义后,“及失苏州,江浙运不通;失湖广,江西运不通。元京饥穷,人相食,遂不能师矣”<sup>⑤</sup>。可见大都的繁荣是与海运和漕运的畅通分不开的。江南粮食北运固然是海运的主要内容,但海船运粮及其他物资至北方后总不会空船返航,势必也有大量北方货物通过海运南下,至少客商也可利用海船往返南北。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凡京师信史下江南者率由海上

① 危素:《元海运志》;《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

② 《经世大典》。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五〇,册一六七。

③ 同上。

④ 丘叟:《大学衍义补》。

⑤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浮桴以达”<sup>①</sup>,可证这条航线也是运客的。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到元末时,福建至大都的航线也开辟了,“赖福建滨海,又为王土,[陈友定]独能运粮至京师,由是京师民始再活”<sup>②</sup>。

当然,海运的开辟,得利的首先是元朝统治者,宫廷挥霍所需的物资,大都的军国之资,很多是靠江南供应的。许多元朝管理海运的官员也乘机大发其财。朱清、张瑄,“父子致位宰相,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輿骑塞隘门巷,左右仆从皆佩于菟金符,为万户千户,累爵积资,气意自得”<sup>③</sup>。除了官船以外,政府还和雇民船运粮,付“脚价钱”。由于成本低,商人多愿承包,因此一般商人得利也多。“然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间亦有船坏而弃其米者”<sup>④</sup>。当然,葬身大洋的主要是船户、水手了。

### 三 驿站

元代疆域辽阔,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因此驿站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由于战争中运输粮食和军队的需要,就有通到中原和西域的驿路和相应的驿站设备<sup>⑤</sup>。窝阔台建都和林后,正式建立了驿站制度,设置了和林到中原地区的驿道,每七十里左右置一站,由一个千户负担站役,共设三十七站<sup>⑥</sup>;又设置从和林到察合台封地,再从察合台封地到拔都封地的驿道<sup>⑦</sup>。

---

① 刘仁本:《钱长信寺经历曹德辅序》,《羽庭集》卷二。

② 权衡:《庚申外史》。

③ 陶宗仪:《辍耕录》卷五,《朱张》。

④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

⑤ 见《长春真人西游记》;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页三四。

⑥ 《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四一。

⑦ 《元朝秘史》第二七九节。

元朝建立后,驿站制度进一步完善,规模进一步扩大。当时,以大都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东连高丽,东北至奴儿干,北达吉利吉思,西通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西南抵乌斯藏,南接安南、缅甸。如通往岭北行省的驿道就有帖里干道五十七站,木怜道三十八站,纳怜道二十四站,计一百十九站。另有吉利吉思至外刺、和林至察合台封地的驿道<sup>①</sup>。全国共设有驿站(元代文书中通常称为站赤)约一千五百处。驿站有陆站和水站之分。陆站用马、牛、驴、车;水站用船,在辽东还设有狗站。漠北和漠南设有蒙古站赤(又称达达站),中原和江南地区的驿站称汉站。大站置驿令,小站置提领,交通枢纽之地置脱脱禾孙以检查乘驿人员。各地驿站由路或散府、散州长官提调;有时将离路城较远的驿站委当地州县长官提调。中央行政机构分管驿站的,初为兵部,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立通政院专掌驿站,武宗至大四年至仁宗延祐七年又以汉站归兵部掌管。

与驿站相辅而行的有急递铺。元制每十里、十五里或二十里设一急递铺,铺设铺兵五人,十铺设一邮长,京师则设总急递铺提领所。急递铺的主要任务是转送朝廷和地方州郡的紧急文书。

由于驿站和急递铺的普遍设置,形成了“星罗棋布,脉络通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的局面,因而大大有利于国内交通的发展,加强了中央与地方各地区的政治联系,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诸王、贵戚的朝会,使臣的往来,文书的传递,军队的调动,物资的转运,都要经过驿道。所以元代的驿站制度对当时的政治经济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担负着驿站繁重徭役的广大站户,负担是很沉重的。元朝政府从民户中签发大批人户,组成与民户不同的特殊户籍,即站户户籍,使他们供役于驿站。站户受到严格的管制,每一百户站户设百户一名。他们要负责供应来往使臣

---

<sup>①</sup> 《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参阅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一期。

的饮食(汉语称“祇应”,蒙古语称“首思”)和向驿站提供铺马等交通工具,还要提供劳动力,负责马匹的饲养,充任马夫、车夫、船夫、搬运夫、馆夫等。站户的私有田地规定要入站,作为站田。所以,一般来说,元代站户的经济负担和徭役负担比民户要重,因而出现了站户日益贫困化和逃亡现象<sup>①</sup>。

随着元朝统治的腐败,驿站也出现了许多弊病。如按照驿站制度规定,凡应用驿站者,给以玺书,遇有军务等紧急大事者,凭金字圆符为信,银字次之。但有些王公贵族、官员,不遵守制度,不用牌符,滥用驿站设施,任意增乘驿马,多索饮食,造成驿站负担过重,这是出现站户贫困化和逃亡的重要原因。

## 第五节 商业经济的活跃

### 一 钞法的实行

中国纸币的发展,到元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朝曾发行过汇票性质的“飞券”。两宋局部地区使用过“交子”、“会子”。元代却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了纸币——钞。

蒙古进入中原后、忽必烈即位前,曾发行过丝会和银钞。丁亥年(一二二七年),元帅左监军何实在山东博州(今山东聊城)以丝数印置会子,权行一方<sup>②</sup>。窝阔台丙申年(一二三六年)和庚子年(一二四〇年),都曾在局部地区发行过交钞。后来史辑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立银钞相权法,忽必烈在京兆(今陕西西安)立交钞提举司发行交钞。总之,蒙古统治下的北方地区许多地方发行了交钞,“诸路所行交钞,亦名诸路行用钞”<sup>③</sup>。大体上是沿用金制发行

---

① 参阅叶新民:《元代统治者对站户的剥削和压迫》,《内蒙古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三、四期;羽田亨:《元朝驿传杂考》,《东洋文库丛刊》。

② 《元史》卷一五〇,《何实传》。

③ 《经典大典序录·赋典》。

地区性交钞。

忽必烈即位后,开始由政府统一发行纸钞。中统元年(一二六〇年)七月,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以丝为本。十月,始行“中统元宝钞”,钞面以文贯为识,共分九种: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一贯、二贯。钞本以银为主,间亦用金。开始发行时钞本比较充足,发行额也有所控制。到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年)南宋灭亡后,元政府即以中统钞易宋交会,至元十七年(一二八〇年)又废宋铜钱,于是上自政府的财政收支,下至民间贸易,都以元宝钞为准,全国货币实现了统一,这对于全国各地的经济交流和商业贸易的活跃,客观上起了推动作用。

但是,元朝的钞法很快就开始败坏。南宋灭亡以后,由于元朝统治集团的挥霍浪费,财政开支日益增大,自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后出现了“据各处平准行用库倒到金银,并元发下钞本课银,节次尽行起迄”的现象。纸钞的准备金逐渐被抽空,等于“自废相权大法”<sup>①</sup>。甚至为了赏赐帮助元朝灭南宋的张瑄、朱清等,竟将钞印送交他们,听其自印交钞。这样,流通的货币都成了不可兑现的废币,终于造成了“无本钞数民间既多而易得,物因踊而难买”<sup>②</sup>的严重局面。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年)时的物价比中统元年时上涨了十倍以上。

为了挽救财政危机,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年)开始发行“至元宝钞”。至元钞原则上与中统宝钞是一致的,钞面仍以文贯为识,自二贯至五文,共分十一等,亦以金银为本位。至元钞发行后中统钞并不废,至元钞一贯值中统钞五贯,二者相权而行。但是,至元钞的发行并不能解决元朝财政危机这一不治之症。不久,旧病又发,平准基金被挪用,纸币发行日滥,钞价大落,至元二十九年(一二九二年)一年的财政赤字达六十六万二百三十八锭,至元三十一年

① 王恽:《便民三十五事论·钞法》,《秋涧集》卷九〇。

② 同上。

(一二九四年),成宗铁木耳将诸路平准交钞库所贮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外,其余调至京师供统治者挥霍。大德二年(一二九八年),又于至元钞本中调用二十万锭。至大二年(一三〇九年)又调用七百一十余万锭。于是,至元钞的准备金几乎被动用得精光,成了无法兑现的废币。至大二年(一三〇九年),因“帑藏空竭”,又重新发行了“至大银钞”,钞面改成银两为文,故曰银钞,同时废中统钞,使至元钞与至大钞相权而行。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凡十三等,至大银钞一两值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至此,中统元宝钞一贯,不到五十年,只值二十五分之一,白银则涨价十四倍半,赤金一两涨价十六倍半。到仁宗即位时(一三一一年),又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为由废至大银钞,仍以中统、至元钞流通。顺帝至正十年(一三五〇年)又发行了“至正交钞”,与“至元宝钞”并行使用,并铸“至正通宝钱”作为钞本,结果钞法大乱。详见本书第七章第一节。

元代从中央到地方均设置印制、发行、管理交钞的交钞提举司,远至畏兀儿等边远地区都有这种机构的设置;设平准库,准许金银与交钞互换;设回易库,准许用昏钞换新钞。政府严禁伪造纸币,违者及同情者处死,分用者减死杖之<sup>①</sup>。

元代交钞发行情况表

钞 名	发行年代	钞 本	单 位	与银之比例	与旧钞之比例
中统元宝交钞	1260 年	丝	两、钱	两值银五分	
中统元宝钞	1260 年	银	贯、文	贯值银五钱	
至元宝钞	1286 年	银	贯、文	贯值银五钱	贯当中统钞五贯
至大银钞	1309 年	银	两、钱	两值银一两	两准至元钞五贯
至正交钞	1350 年	钱	贯、文	贯值钱千	贯准至元钞二贯

① 《元史》卷九,《世祖纪》六。



元代的交钞发行量自数十万锭至数百万锭不等,中统钞以至元二十三年发行二,一八一,六〇〇锭为最高,至元钞以皇庆元年(一三一二年)二,二二二,三三六锭为最高,至大钞以至大三年(一三一〇年)一,四五〇,三六八锭为最高,至正钞以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年)六,〇〇〇,〇〇〇锭为最高<sup>①</sup>。

## 二 国内贸易的发达

### 政府对商业的控制

随着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恢复和发展,统一的纸币在全国范围内的使用,元代的商业经济也逐渐活跃起来。但是,元代的商业主要控制在政府和贵族、官僚、色目商人的手里。

政府对国内许多商品采取了专利垄断政策。金、银、铜、铁、盐、茶、水银、矾、铅、锡、酒、醋,以至农具、竹木等等,都由政府专卖。其形式则各不相同:或由政府直接经营,如金、银、铜、铁等矿产,部分铁器、盐等;或由政府卖给商人,由商人运往市场出售,如茶、盐、铅、锡等;或由商人、手工业主经营,政府抽分其利,如部分金、银、铁等矿产。其中最重要、最典型的是盐的销售。

政府不仅完全控制了盐的生产,而且控制了盐的销售。盐课的收入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据天历年间的统计,一年的盐课钞达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余锭<sup>②</sup>。当白盐收纳入仓后,政府通过两种渠道换取货币。一种是商运商销,分别为“行盐法”和“市采法”:行盐法是商人购买盐引,凭引收盐,运销各地(有规定界限);市采法是商人按指定地点纳粮,换取盐引,凭引取盐,然后运销。引票的价格随着货币贬值不断提高,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时每引值中统钞九贯,到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年)时暴涨到一百五十贯。另一种是官运官销,分别为“食盐法”和“常平盐局法”:食盐法是政府按居民数分摊

<sup>①</sup> 参见吴晗:《元代之钞法》,载《读史札记》。

<sup>②</sup>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盐额,按额征收盐价,此法兴废无常;常平盐局法是政府设局、司,直接发售,此法只在少数地区施行过<sup>①</sup>。政府规定的盐法极严,法律规定:凡伪造盐引者斩,籍其家产;私盐者徒二年,杖七十,籍其财产之半;行盐犯界者减私盐罪一等,盐没收<sup>②</sup>。

茶法大体与盐法同,有茶引。铁、铅、锡等也发售引票。其余专卖物资,大体岁入之课有定额。

民间贸易则收商税,大体三十取一。但随着封建剥削的加重和商业的繁荣,税额不断上升。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比至元七年(一二七〇年)增加十倍,达四十五万锭,至天历年间,更增至九十三万余锭。

#### 贵族、官僚、色目商人豪夺民利

除了政府控制商业外,蒙古贵族、大小官吏、色目商人、寺院僧侣也依仗着他们的权势,从事经商,排挤民间商人,豪夺民利。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年)的诏书中承认:“数年以来,所在商买,多为有势之家占据行市,豪夺民利,以致商贾不敢往来,物价因而踊贵”<sup>③</sup>。

从成吉思汗时代起,蒙古大汗和后妃、诸王、公主、驸马等贵族就开始进行商业和高利贷活动,由色目商人代为经营,他们则坐收其利。元世祖时,北方诸投下人户常到江南经营商贩<sup>④</sup>;武宗时,中政院所需食羊,是通过阿老瓦丁贩运浙盐盈利后供应的<sup>⑤</sup>;顺帝时,元世祖的孙子宽彻普化在湖广地方“多萃名倡巨贾,以网大利,有司莫敢忤”<sup>⑥</sup>;丞相马札儿台在通州置榻坊,开酒馆、糟房,又贩运长芦、淮南盐<sup>⑦</sup>。

① 参看陈高华:《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历史论丛》第一辑。

②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③ 《通制条格》卷一二,《关市》,《牙保欺蔽》。

④ 《元典章》卷五九,《工部》二,《海道运粮船户免杂泛差役》。

⑤ 《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

⑥ 《元史》卷一四四,《星吉传》。

⑦ 权衡:《庚申外史》。

各级官僚也从事商业活动。至元年间,阿合马擅权,与中书左丞张惠等“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之利,厚毒黎民,因无所诉。”<sup>①</sup>另一权臣桑哥公然与汉人官吏争夺贩油权利,扬言:“与其使汉人侵盗,曷若与僧寺及官府营利息乎?”<sup>②</sup>文宗时,丞相燕铁木儿经营邸舍商货,而且享受免税权利<sup>③</sup>。有的官员还兼营海外贸易。

色目商人特别善于经商,他们利用民族等级划分的有利地位,定居中原江南地方,深入各行各业,攫取巨额利润。仅据中统年间燕京(今北京)一路统计,有回回人户二千九百五十三户,“于内多系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其兴贩营运百色,侵夺民利,并无分毫差役。”<sup>④</sup>南方的回回商人尤多,杭州、泉州、扬州、镇江都有富甲当地的回回商人,泉州至今尚留有許多色目商人的墓和住址遗迹。这些色目商人有不少专门经营珠宝,元贞年间,有西域商人奉珍宝进售,名押忽大珠,售价高达六十万锭<sup>⑤</sup>;大德年间,“回回富商以红刺一块重一两三钱,中之于官,估值十四万锭。”<sup>⑥</sup>可见这些回回商人的资本是何等雄厚。

寺院僧人也经营商业。以大都的大护国仁王寺为例,其在河间、襄阳、江淮各处的酒馆就有一百四十所<sup>⑦</sup>。不少寺院拥有浴室、铺席(商店)、药店、旅舍、解库(当铺)等,从事商业活动。寺院里的上层僧侣财富惊人,他们“十年积蓄多财资,寺傍买地作外宅”,无视法门清规戒律,公然茹荤饮酒,玩弄妇女。嫁给这些僧人的妇女,“金珠翠玉堆满头,又有肥臃充口腹”<sup>⑧</sup>。

贵族、官僚、色目商人和寺院,他们得到封建政府的特殊保护,有的持有圣

---

① 《元史》卷二〇五,《阿合马传》。

② 《元史》卷二〇五,《桑哥传》。

③ 《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

④ 王恽:《为在都回回户不纳差税事状》,《秋涧集》卷八八。

⑤ 《元史》卷一七〇,《尚文传》。

⑥ 杨瑀:《山居新话》。

⑦ 程钜夫:《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雪楼集》卷九。

⑧ 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一〇。

旨、令旨、懿旨乘驿，依仗特权占据行市，获取暴利。有的色目商人因善于经商，竟成了高官，阿合马、桑哥就是由色目商人入为宰相的，乌马儿则以商人得为甘肃行省左丞。

### 民间商人的商业活动

元代的民间商人绝大多数是小商小贩，他们受到官府和大商人的压制，处境艰难，少数大商人则拥有雄厚的资金，甚至勾结官府，牟取暴利。

元朝统一全国后，由于版图辽阔，南北物资交流畅通无阻，经商的人逐渐增多，“舍本农、趋商贾”<sup>①</sup>的风气很盛。所以，张之翰说：“观南方归附以来，负贩之商，游手之辈，朝无担石之储，暮获千金之利”<sup>②</sup>。这样，除了色目大商人外，还出现了一批汉族民间大商人。扬州人李椿“国初北渡，客云、朔间，转徙至真定藁城之西管镇，以陶为业，器不苦窳，有约必信，远近化之。中年以后，买田力穡，不二十年，为里巨族”<sup>③</sup>。河南人姚仲实，元初徙居大都，去各地行商，“累资巨万”<sup>④</sup>。扬州大商人张文盛，“家僮数百指，北出燕齐，南抵闽广，懋迁络绎，资用丰沛”<sup>⑤</sup>。扬州泰兴商人陈杰“从计然丹圭之术，观时取予，积粟如坻，家累千金。”<sup>⑥</sup>江阴商人王德秀“尤喜陶朱丹圭之术，研精其奥。”“辛勤三十年……以货雄州里”。<sup>⑦</sup>

元代的江右商资本雄厚，隆兴、清江、新淦、抚州、吉安、鄱阳等地的商人广泛地活跃在浙闽、荆湖、岭南、陕蜀、云南等地的市场上。元明之际江西清江板城商人多远赴西安、云南从事商业贸易。<sup>⑧</sup> 新淦的儒商越汉、沔，由襄樊道秦

① 《农桑辑要》卷一，《先贤务农》。

② 张之翰：《仪盗》，《西岩集》卷一三。

③ 安熙：《寿李翁八十诗三首并序》，《安默庵文集》卷二。

④ 程钜夫：《姚仲实碑》，《雪楼集》卷七。

⑤ 陆文圭：《张文盛墓志铭》，《墙东类稿》卷一三。

⑥ 陆文圭：《榕山君墓志铭》，《墙东类稿》卷一三。

⑦ 陆文圭：《王德秀(1251—1312)墓志铭》，《墙东类稿》卷一三。

⑧ 梁寅：《黎逸士伯谅墓志铭》，《新喻梁石门先生集》卷三。

关远抵雍、凉一带,活动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新淦沂滨商人周孟辉“致远以服贾,懋迁以赡生,……尝越汉沔由襄樊道秦关抵雍凉”<sup>①</sup>。元明之际新淦商人吴伯让祖孙三代经商,活跃在汉沔、襄阳、岭南各地,活动范围亦十分广泛<sup>②</sup>。永丰(今江西永丰)商人韩蒙“家本江东大姓,擅贾,至蒙益畜善田,逾数万亩。”<sup>③</sup>吉水(今江西吉水)的萧雷龙,“家多赀,至宋季而贫,乃折节治货区,不数年间,竟倍加昔。”<sup>④</sup>庐陵(今吉安市)商人欧阳某,长期往来于广州与庐陵之间<sup>⑤</sup>。另有庐陵赵姓商人从事长途商业贸易,远至山东滨州利津县一带<sup>⑥</sup>。鄱阳(今江西波阳)商人刘谦,“善积居之术,以赀雄乡里。”<sup>⑦</sup>抚州路金溪(今江西金溪)商人王善,“操奇赢之术,游七闽,家乃大穰。”<sup>⑧</sup>金溪吴泰亦从事长途商贩,后死于途中:“发远贾溺死”<sup>⑨</sup>。

元代徽州商人的足迹遍及两浙、江西、京师、川蜀,商业资本雄厚。金如山是休宁瑯溪极其活跃的富有商人,经常到杭州贸易且贸易量很大。“连云大筏泛东吴”<sup>⑩</sup>。江西、金华等地都是他经常光顾的贸易点<sup>⑪</sup>。

就是在边远地区经商致富的各族也不少。在蒙古国的都城和林,据一二五三年底到达漠北的法国传教士卢布鲁克记载,当时和林有一个回回人区,许

① 梁寅:《赠周孟辉序》,《新喻梁石门先生集》卷二。

② 邓雅:《邓伯言玉笥集》卷六《奉饯外舅之襄阳》;卷三《忆外舅》;《哭兄伯让生至治丙寅(1326)以甲午(1354)岁饥困商,遇寇害》;卷一《外甥吴缉字克熙洪武十二年(1379)二月客死景陵时年二十八,余哭之恸,赋此以志余哀》。

③ 吴莱:《韩蒙传》,《渊颖集》卷九。

④ 宋濂:《元故秘书著作郎芳洲先生萧府君阡表》,《翰苑续集》卷七。

⑤ 宋濂:《元故从仕郎兴化路总管府经历李公墓志铭》,《芝园前集》卷八。

⑥ 揭傒斯:《赵孝子》,《揭文安公文集》卷三。

⑦ 宋濂:《故鄱阳刘府君墓志铭》,《奎坡前集》卷四。

⑧ 宋濂:《元故静江路大墟务税使王府君墓志铭》,《奎坡前集》卷四。

⑨ 吴澄:《题金溪吴节妇黄氏训子诗后》,《吴文正公集》卷二八。

⑩ 黄枢:《送人之杭州》,《后圃黄先生存集》卷二。

⑪ 黄枢:《送金如山往婺州》,《后圃黄先生存集》卷三。

多商人聚集在这里<sup>①</sup>。在乃马真氏称制时很有权势的麦什特(今属伊朗)女人法迪玛就是在和林经商致富的。至正初,周伯琦在上都看到“诸部与汉人杂处,颇类市井,因商而致富者甚多。有市酒家资至巨万”<sup>②</sup>。

盐商致富的相当多。大盐商通过贿赂手段与官吏勾结,或“诡名儿教人买出盐来,把柄着行市,措勒百姓,多要利钱”<sup>③</sup>;或每引多取至七百斤(南北盐均以四百斤为引)<sup>④</sup>;或夹带私盐,谋取暴利。于是,一批富甲天下的大盐商出现了。杨维桢的《盐商行》写道:

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

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

.....

盐商本是贼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

亭丁焦头烧海樵,盐商洗手筹运幄。

大席一囊三百斤,漕津牛马千蹄角。

司纲改法开新河,盐商添力莫谁何。

大艘镇鼓顺流下,检制孰敢悬官铎。<sup>⑤</sup>

元代的盐商把持盐政、富比王侯,这首《盐商行》写出了元代富有盐商优越的社会地位与巨大的社会能量。食盐贩运给他们带来了惊人的商业利润,“舆马之华,宫庐之侈,封君莫之过也。”<sup>⑥</sup>扬州盐商贩淮盐循长江西上,赢利颇丰。马祖常有诗写活跃在洞庭湖一带的扬州盐商:“江田稻花露始零,浦中莲子青复青。楚船祠龙来买酒,十幅蒲帆上洞庭。罗衣熏香钱满篋,身是扬州贩

① [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二〇三页。

② 周伯琦:《扈从诗后序》,《近光集》。

③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设立常平盐局》。

④ 《元史》卷一五,《世祖纪》一二。

⑤ 杨维桢:《盐商行》,《铁崖古乐府》。

⑥ 余阙:《两伍张氏阡表》,《青阳集》卷十。

盐客。明年载米入长安,妻封县君身有官。<sup>①</sup>”这些从事长途贩运的盐商往往都是资本雄厚的富商大贾。“十幅蒲帆”,浩浩荡荡自扬州沿长江西上。江陵路盐商在元代的社会舞台上也极端活跃,元末明初人高启有诗描写江陵一带的盐商活跃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踽踽花红鹧鸪飞,黄牛庙下见郎稀。大艚摊钱卖盐去,短钁簪叶负薪归。<sup>②</sup>”“上客荆州商,小妇扬州娼。金多随处乐,不是不思乡。<sup>③</sup>”江陵盐商活跃于扬州至川东一带,其行踪向西一直抵达四川东部:“枫林树树有猿啼,若个听来不惨凄!今夜郎舟宿何处,巴东不在定巴西。<sup>④</sup>”

但是,小私盐贩子的日子却很不好过。元末在泰州(今江苏泰州)起义的张士诚就是一个盐贩子,“贩盐诸富家,富家多凌侮之,或弗酬其直,弓兵丘义屡窘辱之。<sup>⑤</sup>”其他小商小贩的处境大体也是如此。

民间商人的商业活动对沟通全国的物资交流起了很大作用。元朝没有统一全国前,出现过中原所产土货“弃掷腐朽而不为用”、北方缺南货而“价增数倍”的现象,造成商贾无业、舟车留停、道路萧条、物价涌贵的局面<sup>⑥</sup>。所以元朝统一全国后,虽禁止北方人民迁居南方,而商人则可南下贸易,南方商人来京师的亦不禁。除政府专卖的物资外,许多重要的物资还要依赖商人解决,如通惠河凿通之前,大都城里百姓每年食用的粮食多半是商人从御河运来的<sup>⑦</sup>。运河开通后,大宗的粮食、绸缎、棉布、陶瓷器、海外特产等物资由商人源源北运,北方的许多物产也由商人南运。

① 马祖常:《湖北驿中偶成》,《石田先生文集》卷二。

② 高启:《竹枝歌六首之四》,《高青丘集》卷二。

③ 高启:《估客词》,《高青丘集》卷一。

④ 高启:《竹枝歌六首之六》,《高青丘集》卷二。

⑤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

⑥ 胡祇通:《论聚敛》,《紫山集》卷二二。

⑦ 《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拘滞车船》。



### 三 对外贸易的开展

元代对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通过海陆两路与亚非各国展开国际贸易。

海外贸易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沿袭宋旧制,称市舶提举司。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年)元军占领泉州后,忽必烈下令立泉州、庆元、上海、澈浦四市舶提举司,由忙古斛领泉州市舶提举司,杨发督庆元等三市舶提举司;十五年八月,忽必烈对福建行省唆都、蒲寿庚说:“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其欲。”<sup>①</sup>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年)设泉州、上海、澈浦、温州、广东、杭州、庆元七市舶提举司,后经多次归并和废立,到至治二年(一三二二年)复立泉州、庆元、广东三处市舶提举司后,就没有再变动过。

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年)政府专门制订了市舶法则二十二条,延祐元年(一三一四年)修订后又重新颁发。规定市舶抽分,粗货十五分取一、细货十分取一(延祐元年各增一倍),另纳舶税三十分取一,“如违并以漏泊治罪,物货没官”;出海贸易的船只、人员、货物,均需经市舶司审核批准,发给公验、公凭,始能成行,不请验凭、擅发船舶者断罪,船物没官;开船时,由市舶司官员检视各大小船内有无违禁之物(金银钱铁货、男女人口等)<sup>②</sup>,如无夹带,即时开洋;船舶出海,只许在原申请前往的国家和地区贸易,如确“因风水打往别国”,经调查属实后,“就泊到别国物货”,依例抽分;出海船舶均需于规定时间返回,返航时去原请验凭船舶司抽分。外国商船(番船)所载货物和中国船舶“夹带南番人将带舶货者”,也依例抽分,然后由市舶司差人发卖其货物;番船回国时,也由市舶司发给公凭、公验<sup>③</sup>。

① 《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

② 据《元史》卷一〇四,《刑法志》三,《食货》载:违禁物品还有丝绵缎匹、销金綾罗、米粮军器等物。

③ 以上均见《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市舶则法二十三》。

为了垄断海外贸易,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年)起还实行了“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的办法,“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sup>①</sup>这是一种官本商办的外贸活动。

海外贸易给政府带来了巨额收入,为“军国之所资”<sup>②</sup>,因此总的来说是受到政府保护的。但由于国际关系和其他原因,从至元末以后,有多次禁海令,到至治二年(一三二二年)后就一直正常了。

从事海外贸易的,除政府和民间海商外,还有蒙古色目贵族、官僚、僧道等。如元统二年(一三三四年)时,由中书省臣出面,请发两艘海船,下海贸易,替皇后营利<sup>③</sup>。政府官员兼营海舶获利以朱清、张瑄最著名,他们分别充任万户、千户后,专掌海运,又利用掌握海船的特权,从事海外贸易,因而获得厚利。民间商人因海外贸易致富者亦不少,嘉定沈氏、朱氏、管氏,澈浦杨氏,杭州张氏均是,“嘉定州大场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sup>④</sup>

当时和中国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地区和国家很多,早在大德年间,与广州有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就达到一百四十六个<sup>⑤</sup>,据元末汪大渊《岛夷志略》的记载,仅菲律宾以南、以西各沿海国家和地区即达九十七个之多,比南宋赵汝适《诸蕃志》所载多了三十八个。汪大渊先后两次入海,所记都是耳闻目见,十分可靠。这九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今菲律宾诸岛,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各岛屿,印度半岛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各岛及沿海地区,波斯湾沿岸及阿拉伯半岛,非洲北部及东岸沿海地区。最远的到达层摇罗(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据伊本·白图泰记载,当时从印度到中国的航行,只能乘坐中国商船。他在印度港口古里佛(今加尔各答)曾看到同时停泊着十三艘中

①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市舶》。

② 《元史》卷一六九,《贾昔刺传》。

③ 《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

④ 《辍耕录》卷二七,《金甲》。

⑤ 《大德南海志残本》卷七,《舶货》。

国商船。

自庆元到高丽、日本之间的航路也是畅通的。自庆元港出发,三五天可到高丽,七八天可到日本,一般是夏季出航,秋末冬初返航。一九七十七年在南朝鲜木浦附近海底发现的元代中国海船,装有瓷器、铜器、铁器达几千件之多,钱币达七万枚,足以证明当时中国与高丽、日本海上贸易的规模。

在海外贸易中,中国出口的物资颇多,主要有生丝、花绸、缎绢、金锦以及麻布、棉布等纺织品,青白花碗、花瓶、瓦盘、瓦罐等陶瓷器,金、银、铁器,真州锡镞、温州漆盘、明州席、雨伞、木梳、针等日用手工制品,水银、硫黄等矿产品,檀香、白芷、麝香等药材。其中有些虽然是政府的违禁商品,但仍有大宗出口。中国商品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文老古(今摩鹿加群岛)人“每岁望唐舶贩其地”<sup>①</sup>,真腊(今柬埔寨)人欲得“唐货”甚多,“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镞、温州之漆器、泉州之青瓷器,……”,“盛饭用中国瓦盘或铜盘”,“地下所铺者,明州之草席”,“近又用矮床者,往往皆唐人制作也”<sup>②</sup>。

亚非各国进口的商品,以珍宝、香料、药材为主,如珍珠、象牙、犀角、玳瑁、钻石、铜器、珙瑯、荳蔻、沉香、檀香、木材、漆器等。

中国商人与亚非各国商人在贸易过程中,一般都是平等交易的。有的是以物易物,如灵山(今越南燕子岬)所产藤杖,每条可易一花斗锡,粗大而纹疏粗的,三条换一斗;有的以金银作货币,换取当地土产;有的以元代纸币与当地通用的钱币、贝子(海贝)进行兑换。在交换贸易过程中也恪守信约,如麻逸(今菲律宾明多罗岛)的商人将中国商人的货物“议价领去,博易土货,然后准价[偿]舶商,守信终始,不爽约也”<sup>③</sup>。由于中国舶商与亚非各国人民关系良

① 汪大渊:《岛夷志略》。

②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

③ 《岛夷志略》。

好,受到各国人民的信任,三岛(今菲律宾吕宋岛南岸)的男子“常附舶至泉州经纪”<sup>①</sup>,马里八儿(今印度半岛西岸)输出之粗货香料,多运往蛮子大州;另一部分则由商船西运至阿丹(今南也门亚丁),复由阿丹转运至埃及亚历山大,然其额不及运往极东者十分之一<sup>②</sup>。

元代陆上与国外的贸易也很发达。主要是通过钦察汗国与今克里米亚和欧洲各国建立联系,通过伊利汗国与各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系。本书第十章将专门叙述。

#### 四 城市经济的繁荣

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宋金时期的一些大城市有了进一步发展,内地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边疆地区也有一些新兴的城镇,沿海地区一批对外贸易的城市规模更大了。

号称“人烟百万”<sup>③</sup>的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的文化和经济中心之一。马可·波罗说:“应知汗八里城(即大都)城内外人户繁多,……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此汗八里大城之周围,有城市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sup>④</sup>马可·波罗所记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前引王恽所记,中统年间时,燕京路已有回回商人二千九百余户。来自欧洲、中亚、非洲沿海、南亚、日本、朝鲜的使团和商队确是络绎不绝的。国内商人到大都的更多,通过海运和运河到大都的货物确是不计

① 《岛夷志略》。

② 《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汉译本,第三卷第一七七章。

③ 权衡:《庚申外史》。

④ 《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汉译本,第二卷第九四章。

其数。大都城内有米市、铁市、皮毛市、马牛市、骆驼市、珠子市、沙刺(珊瑚)市等,商品相当丰富。大都“民物繁伙,若非商旅懋迁,无以为日月之资。<sup>①</sup>”西藏喇嘛每次到京也有商队跟随。至于来自全国各地的宝玩贡品更是异彩夺目了。

一些有悠久历史的工商业城市,如北方和中原地区的涿州、真州、太原、平阳、奉元(今陕西西安)、开封、济南,西南的成都,两湖的江陵、潭州,江西的九江,南方的扬州、集庆、镇江、平江、杭州等地继续有所发展。其中济南“水陆辐辏,商贾所通,倡优游食颇多,皆非土人”<sup>②</sup>。扬州“介江南北,而以其南隶浙西,其北隶河南,壤地千里,鱼盐稻米之利擅于东南,为天下府库盖将百年矣”<sup>③</sup>。其地“商贾云集,舟楫溯江,远及长沙”<sup>④</sup>。九江“为交、广、荆、湖、闽、浙之会”<sup>⑤</sup>。平江(今江苏苏州)“为东南都会,富庶甲于天下。其列肆大贾,皆靡衣甘食”<sup>⑥</sup>。苏州城阊关一带,是商人的聚居之处。“阊关之居,皆货财之亭。而其人皆五方商贾之伍也。日出而蚤营,日入而未息。所与言者皆锥刀之末、干没之计也。与之语身修则曰衣被文绣耳;与之语家齐则曰峻宇雕墙耳。”<sup>⑦</sup>马可·波罗笔下的平江,则是“人烟稠密,至不知其数。……为商贾与工于一切技艺之人。……此城统辖十六大城,并商业繁盛之良城也”<sup>⑧</sup>。

南宋旧都杭州,到元朝时仍然是全国有数的大都会。当时“城宽地阔,人烟稠集”<sup>⑨</sup>，“五方之民所聚,货物之所出,工巧之所萃,征输之所入,实他郡所

① 《元典章》卷二〇,《户部》六,《体察钞库停闭》。

② 于钦:《齐乘》卷五,《风土》。

③ 孙大雅:《送淮南省掾梅择之序》,《沧溟集》卷二。

④ 姚燧:《吕郁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三。

⑤ 《永乐大典》卷六六九七,九江府。

⑥ 徐显:《稗史集传·陆友》。

⑦ 杨维桢:《修齐堂记》,《东维子集》卷一四。

⑧ 《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汉译本,第二卷第一五〇章。

⑨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札忽儿歹陈言二件》。

不及”<sup>①</sup>。马可·波罗说它是“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又说城中有商贾甚众，他们是如此富足，其贸易如此之巨，以致无人能言其数。城中有大市十所，沿街小市无数，……每星期有三日为市集之日，有四五万人挈各种食物等来此贸易<sup>②</sup>。杭州城里的回回商人也很多，荐桥旁边的八间楼是回回富商聚居的地方，聚景园是回回人丛冢的所在地<sup>③</sup>。江西省会隆兴，“缘江而为城”，“受江右诸江之水，而衍迤宽广，安而有容”。城内市场的规模很大，“入龙兴路城，经市井者五里出北门”。<sup>④</sup> 濒江之地，“闾閻阊闾，列肆成市，居货充斥”，人称“舸舰迷津，富商大贾之会”，真正“东南一会城”<sup>⑤</sup>。优越的商业交通中心地位使龙兴城四方百货云集，商贾汇萃，“官盐法茗有饶乏，市利商功无算筹”<sup>⑥</sup>，商品交易量相当可观。

随着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元代还出现了一些新兴的工商业城镇和手工业城镇。太仓是随着海运业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此地“旧本墟落，居民鲜少，海道朱氏翦荆榛，立第宅，招徕番舶，屯聚粮艘，不数年间，凑集成市，番汉间处，闽广混居，各循土风，习俗不一”<sup>⑦</sup>。“市民漕户云集雾滃，烟火数里，久而外夷珍货棋置，户满万室”<sup>⑧</sup>。此地外通琉球、日本等六国，时人称为“六国马头”。运河的通航使沿河出现了许多繁华的城镇，如淮安、济宁、东昌、临清、长芦、直沽等，济宁的情景是：“高堰北行舟，市杂荆吴客，……人烟多似簇，聒耳厌喧啾”<sup>⑨</sup>。临清的情景是：“每届漕运时期，帆樯如林，百货山集，

① 徐一夔：《思政堂记》，《始丰稿》卷一〇。

② 《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汉译本，第二卷第一五一章。

③ 《辍耕录》卷二八，《嘲回回》。

④ 虞集：《马清献公墓记》，《道园类稿》卷二五。

⑤ 虞集：《龙兴路新作南浦驿记》，《道园类稿》卷二六。

⑥ 柳贯：《洪州歌》，《柳待制集》卷六。

⑦ 《昆山郡志》卷一，《风俗》。

⑧ 《太仓州志》卷一〇下，《新建苏州府太仓州治碑》。

⑨ 《济宁直隶州志》卷三三，《济州》。

……当其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牐,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sup>①</sup>。松江及其附近小镇正逐渐发展为棉纺业专业城镇;景德镇的居民绝大多数从事烧瓷生产,这里商贾云集,一俟瓷器出窑,商人争相购买,这里已是瓷器的生产和销售的专业城镇。

上海、澈浦、庆元、温州、福州、泉州、潮州、广州等地则是对外贸易的沿海城市。澈浦在杭州附近,船舶很多,是与印度等国贸易的重要港口,因而也促进了杭州的繁荣。庆元是与高丽、日本贸易的重要商埠,由于来往货物很多,市舶库房既大又多,用“天开瀛海藏珍府,今日规模复鼎新,货脉流通来万宝,福基绵远庆千春”二十八字加以编号<sup>②</sup>。潮州“舶通瓯吴及诸蕃国,人物辐集”<sup>③</sup>。广州是个有悠久历史的对外贸易港口,这里的船舶出虎头门,远航世界各地,到东洋的往返需一年,去西洋的往返需二年,还与日本、高丽等国通航<sup>④</sup>。元代广州由于外贸十分发达,遂成为国内外货物集散之地,“广为蕃舶凑集之所,宝货最聚,实为外府。……圣朝奄有四海,尽日月出入之地,无不奉珍效贡,稽顙称臣。故海人山兽之奇,龙珠犀贝之异,莫不充储于内府,畜玩于上林,其来者视昔有加焉。”<sup>⑤</sup>伊本·白图泰说,“广州是世界上拥有最优美市场的大城市之一。陶器场为其间最大的市场之一。中国瓷由此转运到该国各省和印度、也门。”<sup>⑥</sup>来自世界各地和中国自己的海船在这里停泊,真是一派“万舶集奇货”<sup>⑦</sup>的景象。泉州是元代中国的最大港口,这里的镇南门外,“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sup>⑧</sup>“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藪,殊方别域

① 《临清县志》《商业》引杨效曾:《临清小纪》。

②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学校考》下。

③ 周伯琦:《肃政箴》。

④ 熊太古:《冀越集》《广州船舶》。

⑤ 《南海志残本》卷七《舶货》。

⑥ 《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页四八八。

⑦ 吴师道:《送王正善提举广东市舶司》,《吴礼部集》卷三。

⑧ 《泉州府志》卷一一,《城池》。



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sup>①</sup>。马可·波罗说:“应知刺桐港(即泉州)即在此城,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蒞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指中国南方)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言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sup>②</sup>。伊本·白图泰也说:“刺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虚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sup>③</sup>。当时中外人士的这些记载,把泉州的繁荣景象又重新展示在我们面前。

温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贸易港,元朝设市舶提举司,有专供商船使用的码头。黄潜《永嘉县重修海堤记》:“温为郡俯瞰大海,江出郡城之后,东与海合。直拱北门枕江为亭,榜其颜曰‘四时万象’,候馆在焉。……亭之西为市区,百货所萃,麇氓贾竖咸附趋之。江浒故有大石堤,延袤数千尺,舍舟登陆者阻泥淖不得前,其俗率于堤之旁为石路,外出以属于舟次。谓之马头。凡为马头者二,一以俟官舸,一以达商舶云。”商舶泊岸后,商旅、物货可沿石头砌成的码头直抵“四明万象”亭西边的市场。市场上百货萃集,市民商贾争相奔走,是国内外商品的荟萃之地。在外贸经济的推动之下,温州的城市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时人称温州城周围“城环十八里,居者一万家。薨连栋接,簇簇若蜂房。只尺空隙地不易得,故各为重屋以处”<sup>④</sup>。在广大的海外市场的拉动下,宋元时期沿龙泉溪、瓯江一线的龙泉窑系各色瓷器生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峰,这些瓷器通过温州运至日、朝等国家和地区,销量非常可观。

① 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集》卷一六。

② 《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本,第二卷第一五十六章。

③ 《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页四八六。

④ 陈高:《清芬阁记》,《不系舟渔集》卷一二。

## 第六章

# 元朝社会矛盾的发展

### 第一节 统治政策的演变与帝位之争(上)

#### 一 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的“理财”

忽必烈夺取政权后,在“藩府旧臣”的帮助下初步奠定了立国规模法度,对汉族士大夫是比较信任的。中统三年李璫之乱发生后,当时主持中书政务的王文统,因与李璫有牵连而被杀,大臣廉希宪、商挺等人因推荐过王文统,受到忽必烈的猜疑,握有兵权的史天泽等被迫交出兵权,虽然刘秉忠、姚枢等仍受到重用,但忽必烈对汉人的不信任感渐渐地体现在他的用人和政策中。这样,以色目人为主的一批理财之臣开始受到重用,并影响了忽必烈时期的统治政策。

从至元四年以后,忽必烈屡次出兵对付西北藩王的叛乱,灭宋战争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加之根据蒙古惯例,大汗每年需对诸王勋戚进行赏赐,造成财政开支急剧增加。为了迎合忽必烈敛财心切的心理,像阿合马这些“以功利成效自负”的理财之臣屡上“巧言”,忽必烈“授以政柄,言无不从”<sup>①</sup>,从此,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三个“理财”之臣相继执掌全国财政大权达二十一年之久。

阿合马,花剌子模费纳客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西南)人,早先投靠

---

<sup>①</sup> 《元史》卷二〇五,《阿合马传》。

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生父按陈那颜,后为察必皇后斡耳朵的侍臣<sup>①</sup>。中统三年(一二六二年)始命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委以财赋之任。至元三年(一二六六年)立制国用使司,他又以中书平章政事兼领使职。七年正月,立尚书省,罢制国用使司,又以他平章尚书省事。他以兴铁冶、铸农器以易粟输官以及增盐课、理算钱谷等手法,大肆进行搜刮,来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取信于忽必烈,故忽必烈称道他“才任宰相”。在他为官期间,任用私人、诬杀异己,“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年)三月,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合谋,乘忽必烈在察罕脑儿行宫之机,伪装皇太子真金入大都,诱杀阿合马于东宫前。

阿合马死后,忽必烈又任用卢世荣“理财”。卢世荣,河北大名人,在阿合马专政期间,他以贿赂进为江西榷茶运使。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年)十一月,忽必烈任用他为右丞。他奏准整治钞法,实行盐、酒部分官卖,官营海外贸易,立炉鼓铸农器官卖;又请设立“规措所”经营钱谷,以善贾者任事。卢世荣自谓“其法当赋倍增而民不扰”。“裁抑权势所侵”可增岁课三百万锭。实际上他的许多办法行不通。他又“恃委任之专,肆无忌惮”,轻慢丞相安童,下僚意稍不合,即“奏而杀之,朝中凛凛”,怨者甚多。加上他是个汉人,更处于不利地位,任职才四个多月,监察御史陈天祥就上书弹劾他过去有贪赃劣迹,执政后所奏行者多无成效,请贬其职。在对质审问中,给他加上的罪名越来越大,终于被处死。

卢世荣死,忽必烈又任用桑哥“理财”。他是吐蕃人<sup>②</sup>,系胆巴国师的弟子,能通诸国语,又“好言财利事,世祖喜之”。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复置尚书省,以桑哥与铁木儿为平章政事,不久,又升桑哥为尚书右丞相。桑哥上任

<sup>①</sup> 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二八八。

<sup>②</sup> 桑哥,《史集》波义耳英译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二九三称其为“畏兀”人。毕达克据藏文《汉藏史集》记载考定为藏族。参见 L. Petech:《元朝的藏族宰相桑哥》,《匈牙利东方学报》34,一九八〇年。

后,厉行钩考(即核查钱谷),先从中书省查起,以“违惰耗失”的罪名毆辱中书省臣或置之死地,“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分毫缕析,入仓库者,无不破产”。继而扩展到各行省,遣官四出“理算”钱谷,追征积年逋赋,“已征数百万,未征犹数千万,名曰理算,其实暴敛无艺”<sup>①</sup>。增加税课,亦是其生财之法。在他专政期间,任用内外官员皆由己意,但宣敕需经中书降下,桑哥以为不便,忽必烈命宣敕并付尚书省,于是桑哥得“以刑爵为货而贩之”,“贵价入,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sup>②</sup>。至元二十八年,近臣彻里、不忽木等劾其紊乱朝政,使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忽必烈命御史台勘验辩论,桑哥伏罪,乃命诛之。

## 二 真金与权臣的斗争

在忽必烈任用阿合马等“理财”期间,皇太子真金却崇信儒术,对其父实行的聚敛政策颇不以为然。于是,在真金与“理财”权臣之间,展开了一场微妙的斗争。

真金是忽必烈的次子,生于一二四三年,少时即从汉儒姚枢、窦默学习,后来忽必烈又命他受学于另一汉人名儒王恂。所以,真金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儒家的一套学说。中统三年(一二六二年)十二月,封为燕王,并守中书令。中统四年五月,又兼判枢密院事。忽必烈采纳汉族臣僚的建议,鉴于前代大汗没有确定继承人以致造成帝位继承争端的教训,决定遵用汉制建立皇储<sup>③</sup>。至元十年(一二七三年)三月,正式立真金为皇太子,授玉册和皇太子宝,并为他设立了“宫师府”,择儒臣为官属。这年,他已三十一岁,其周围有王恂、白栋、李谦、宋衢等一批儒臣。到了至元十八年,这支儒臣队伍更有所扩大,先后增加了何玮、徐琰、杨仁风、马绍等人。儒士们不断地向真金讲述儒家的主张

① 欧阳玄:《赵孟頫神道碑》,《圭斋集》卷九。

② 《元史》卷二〇五,《桑哥传》。

③ 至元三年,汉人张雄飞即建议忽必烈建储(《元史》卷一六三,《张雄飞传》);五年,陈祐上《三本书》(《元文类》卷一四),又详细陈述了立太子的必要性。

和历代帝王的统治之术,如至元十八年,太子左谕德李谦曾向真金陈十事:正心、睦亲、崇俭、几谏、戢兵、亲贤、尚文、定律、正名、革弊<sup>①</sup>。后按察副使王恽又向真金进《承华事略》二十目:广孝、立爱、端本、进学、择术、谨习、听政、达聪、抚军、明分、崇儒、亲贤、去邪、纳海、几谏、从谏、推恩、尚俭、戒逸、审官<sup>②</sup>。汉族儒臣们的这些言论,与专以“理财”为务的阿合马等人的措施是背道而驰的,其中有些言论,如亲贤、革弊、去邪、崇儒等实际上就是针对阿合马等人而发的。真金赞同汉儒们的一套主张,对阿合马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素“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据拉施都丁《史集》记载,真金厌恶阿合马至极,以致有一天用弓击其头,并划破他的脸,朝见时,忽必烈问阿合马脸上何以如此,他不敢明对,乃诡言为马踢伤。适真金在侧,当即责他羞言系被太子所打,并当着忽必烈的面,拳殴阿合马多时<sup>③</sup>。因此,阿合马最畏惧真金。不过,凭着忽必烈对他的信任,仍得专擅政务。在敛财这一点上,忽必烈和他是一致的,因而真金与他的斗争就变得微妙复杂。

至元十七年,礼部尚书南人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以封驳制敕,这正符合忽必烈使臣下相互检察以防奸欺的想法,因而决意实行,并有意让廉希宪任侍中。希宪系畏兀人,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以“廉孟子”知名。真金从防止阿合马专权的角度,也支持设门下省,他派人对照廉希宪说:“上命卿领门下省,无惮群小,吾为卿除之。”表明对廉希宪大力支持的决心。但阿合马觉得这样于己“不利”,极力阻挠,恰好当时也有汉族臣僚主张不必多设机构,朝中意见不一,事遂作罢<sup>④</sup>。不久,阿合马诬陷曾弹劾过他专权的江淮行省左丞(前御史中丞)崔斌,取旨杀之,真金要想挽救,也无能为力。

总之,真金虽反对阿合马,屡次与他斗争,但都未能成功。究其失败之因

① 《元史》卷一六〇,《李谦传》。

② 王恽:《承华事略》,《秋涧集》卷七八至七九;《元史》卷一一五,《裕宗传》。

③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二八八。

④ 《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卷一四八,《董文忠传》;卷一六〇,《高鸣传》。

是,真金虽以中书令参预政事,“然十有余年,终守谦退”,不敢“可否君父之命”,“惟有唯默避逊而已”<sup>①</sup>;而阿合马却能恃忽必烈之信任,飞扬跋扈,关键是阿合马的聚敛政策正符合了忽必烈的需要。

至元十九年阿合马被杀之后,由和礼霍孙入任中书右丞相,真金对他说:“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或阻挠,我当力持之”。大力支持和礼霍孙改变阿合马时的政策。他又对何玮和徐琰说:“汝等所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sup>②</sup>。然而,真金实际上并无左右朝政的权力,大权始终掌握在精明专断的忽必烈手中。不久,他又起用了卢世荣。真金对卢世荣的政策也持反对态度,他说:“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通过对“理财”之臣的反感,表明了他与其父在治国政策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终于导致这一矛盾的激化。

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年)春,阿合马余党答即归阿散<sup>③</sup>等找到了一个搞垮皇太子真金的机会。在此之前,南台御史曾封章上言:“帝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外预。”真金闻知此事甚为恐惧,御史台因秘其章不发。但此事为答即归阿散等得知,遂于忽必烈前请收内外百司吏案,以大索天下埋没钱粮为名,而实欲揭露此事,乃悉拘封御史台吏案。御史台都事尚文将事情原委告知中书右丞相安童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决定留秘章不与;次日,答即归阿散乃上告忽必烈,命大宗正薛尺珣取其章。在这万分危急时刻,尚文乃献计于安童及玉昔帖木儿,以“先计夺谋”法抢先至忽必烈前陈述事情经过。忽必烈听得居然有人要他提前让位给太子,大发雷霆,厉声责问道:“汝等无罪耶?”丞相安童带头认罪说:“臣等无所逃罪,但此辈名载刑书,此举动摇人

① 《元史》卷一四八,《董文忠传》。

② 以上均见《元史》卷一一五,《裕宗传》。

③ 答即归阿散,《元史·尚文传》作答即古阿散。

心,宜选重臣为之长,庶靖纷扰”。忽必烈怒气稍解,形势遂趋缓和。后答即归阿散等坐奸赃论死,其同伙分别被诛杀、流放或没为奴<sup>①</sup>。虽然如此,真金竟因此而忧惧成疾,于同年十二月死。

禅位风波及真金之死,对忽必烈后来的政策,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在事隔两年之后,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四年,一方面为了财政经济的需要,任吐蕃人桑哥为平章政事,继续从事“理财”,另一方面,他似乎意识到完全不用汉儒进行统治也不行,于是又下诏以南人儒士程钜夫为御史中丞。当时御史台臣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说:“钜夫南人,且年少”。结果遭到忽必烈的严厉训斥,并说:“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sup>②</sup>。程钜夫遂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忽必烈命程钜夫求贤于江南,并指名必得赵孟頫、叶李二人。程钜夫奉命到江南求贤结果,又向忽必烈推荐了赵孟頫等二十余名儒士,皆被忽必烈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这表明忽必烈在中辍了一段时间的重儒政策之后,又重新开始网罗汉族中的儒士人才了。

### 三 成宗之立及其守成

有元一代,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明争暗斗始终不断,集中表现在帝位的争夺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种争斗愈演愈烈。自元世祖忽必烈死(一二九四年)至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立(一三三三年),短短三十年间,元朝最高封建统治集团内部走马灯似的先后更换了十个皇帝,其中在位最长的不过十数年,而统治最短的仅一个多月。为了夺取封建皇帝的宝座,元朝统治集团在兄弟之间、叔侄之间,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而每一次帝位的更迭,又几乎都与拥有实权的漠北镇边亲王或大将有关。

---

① 李昉鲁翀:《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载《元文类》卷六八;《元史》卷一七〇,《尚文传》。

② 《元史》卷一七二,《程钜夫传》。



真金死时,忽必烈已年逾古稀,重新确定继承人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不少臣僚上章请求立储,但忽必烈却长久犹豫,定不下人选。直到至元三十年,才选定真金第三子铁穆耳。据载,他征询畏兀儿族大臣阿鲁浑萨里的意见,答言铁穆耳“仁孝恭俭宜立,于是大计乃决”<sup>①</sup>。当年,他派遣铁穆耳“总兵北边”,并以重臣玉昔帖木儿辅行。玉昔帖木儿于受命之际,“请授皇孙以储闾旧玺”,忽必烈乃以真金之“皇太子宝”授之<sup>②</sup>。这使他后来争得帝位,至少在名分上已占先一着。

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年)忽必烈死,宗室诸王会集上都,议立新君,经三个多月,还是不得解决。当时最有资格争位的当然是真金长子晋王甘麻剌和铁穆耳兄弟两人,两人都镇守漠北。甘麻剌为长孙,继承帝位有相当充分的理由。然而,如上所说,铁穆耳在至元三十年出镇北边时已取得了法定继承人的资格,加上他所统率的军队较甘麻剌为强;另有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之下有两个重臣为他撑腰:一个是伯颜,此人曾为忽必烈灭南宋,又有军功于漠北;另一个即上述之玉昔帖木儿,此人是成吉思汗的“四杰”之一——博尔朮之孙,深受忽必烈的重用,在平定诸王之叛中屡立战功,在至元二十九年之时,已是“宗王帅臣咸禀命”、“位望之崇,廷臣无出其右”<sup>③</sup>的人物。伯颜和玉昔帖木儿两人,当时军权在手,所以当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年)四月,蒙古诸王大臣集会上都最后立铁穆耳为帝的时候,为排斥诸王中持不同意见者,伯颜、玉昔帖木儿乃相为表里,“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使“诸王股栗”,不敢反对,只好“趋殿下拜”<sup>④</sup>。玉昔帖木儿则针对有争位资格的甘麻剌,采取先发制人,对他施加压力说:“宫车晏驾,

① 《元史》卷一三〇,《阿鲁浑萨里传》。

② 《元史》卷一一九,《玉昔帖木儿传》;阎复:《太师广平贞宪王碑》,《元文类》卷二三。

③ 同上。

④ 《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

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不言”<sup>①</sup>。特别是最后两句话,使甘麻剌大为震动。他受此压力,无可奈何,只得急忙表态说:“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sup>②</sup>。于是宗亲大臣合辞劝进,铁穆耳遂即帝位,是为元成宗。

《元史》谓“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后,垂拱而治”,“善于守成”。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评价。于其在位期间,有一二事值得称道,但总的说来,无多大作为,而政治弊端,却已有显露。

成宗朝的治国政策,基本上是世祖晚年政治的延续。至元二十八年杀桑哥之后,忽必烈起用了“小心畏慎”的原太子詹事完泽为中书右丞相,以国子生出身、深受儒学熏陶的康里人不忽木为平章政事,革新桑哥的弊政,蠲免中统以来积年逋负钱谷,谏止复立尚书省和征江南包银,采取了安民的稳妥政策,社会矛盾有所缓和。成宗即位以后,总理国务的中书省宰执官,与至元三十、三十一年相较,除个别成员外,基本保留原班人马<sup>③</sup>。中书省右丞相完泽、平章不忽木等佐成宗“恪守成宪”,“数下宽大之诏”,减免赋役,赈济灾荒,维持了政治、经济上的相对稳定局面<sup>④</sup>。

忽必烈时,屡次用兵海外,尤以侵安南之役劳费最甚,至元三十年,以安南王不亲朝,又议征之。成宗即位后,立即宣布停罢征安南之役,遣所拘安南使臣归国,并遣使“抚绥”,敦睦国交,从而结束了长期的对外战争。大德二年(一二九八年),江浙省臣请复用兵日本,成宗不从。次年,遣僧人宁一山出使日本,此后元日之间无战事,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特别是元朝与西北诸王海都、笃哇之间的长期战争,到成宗时双方已打得精疲力竭,从而出现了诸

① 《元史》卷一一九,《玉昔帖木儿传》。铁穆耳与其兄甘麻剌争位的情节,拉施都丁《史集》也有记载,与《元史》颇异。

② 同上。

③ 《元史》卷一一二,《宰相年表》。

④ 《元名臣事略》卷四,《丞相兴元忠宪王》;《平章鲁国文贞公》。

蒙古兀鲁思间的约和,这对西北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定等起了积极的作用,可算是值得称道的一件事。

成宗前期,元朝与海都、笃哇之间的敌对状况仍未结束,双方军队一再发生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德五年(一三〇一年)的铁坚古之战。在此战中,元军方面损失惨重,叛王集团也受重创,笃哇在战斗中受伤致残,海都在战后不久死去。海都之死改变了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间的力量平衡。次年(一三〇二年),笃哇在海都诸子中择立较易于控制的察八儿。持续四十余年的蒙古贵族之间的内战给予中亚的经济文化造成了巨大破坏,给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马木路克史家乌马里<sup>①</sup>这样描述当日中亚地区的萧条景象:

“一位曾周游突厥斯坦诸州并通过其地村庄而来的人告诉我说:‘村落所留下的只是被掩埋的残迹和倒塌的废墟。当人们在远处看见一所建筑完好的、坐落在绿丛中的村庄时,会高兴地[想到]在那里可能会碰到人。但是行至村前时,却是这样一番景象:房屋依然屹立,然无人烟,无人居住’”<sup>②</sup>。

海都的去世和长期的战乱造成的破坏使笃哇等人认识到和平的可贵,于是主动与元朝岭北驻军接触。汉文史料与穆斯林史料均有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句容郡王世绩碑》提到,大德七年(一三〇三年),

“笃哇、察八儿、明里铁木儿等诸王相聚而谋曰:‘昔太祖艰难以成帝业,奄有天下。我子孙乃弗克靖以安享其成,连年动兵以相残杀,是自伤祖宗之业也。今抚军镇边者,吾世祖之嫡孙也,吾与谁家争战?……不若遣使请命罢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其

---

<sup>①</sup> 乌马里(Al-'Umari),马木路克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其书记事始于回历五四一年,迄七四四年,是研究蒙古史的重要史料。

<sup>②</sup> 乌马里:《眼历诸国纪行》,来西(Lech)德译本,页一二三。

养，少者得其长，伤残疲惫者得其休息焉，则亦无负太祖之所望于子孙者矣’”<sup>①</sup>。

据波斯史家哈沙尼记载，笃哇首先同元军驻守于漠北的大将安西王阿难答建立联系，要求实现和平。据汉文史料记载，笃哇、察八儿的请和使臣于大德七年秋到达元廷。元成宗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命置驿以通往来。次年笃哇、察八儿再度向元廷遣使，元政府以币帛六百匹赐之<sup>②</sup>。

大约在此前后，笃哇向察八儿建议，在和林与哈刺火州之间举行忽里勒台，以讨论和平问题。最后，和约终于达成<sup>③</sup>。元成宗的使臣偕同笃哇之使一同前往波斯，向新即位伊利汗完者都（合儿班答）谕告恢复和平的消息。笃哇的和平建议得到术赤后王的响应。伊利汗完者都为此大受鼓舞，认为这是蒙古帝国复归统一的象征。一三〇五年五月，他将此事郑重通知了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和英吉利国王爱德华一世。信中说：

“我辈兄弟因信恶臣之谗言，以致失和。乃今铁穆耳合罕（按，即元成宗）、脱脱（按，即当时的钦察汗）、察八儿、笃哇与吾等其他成吉思汗诸后裔，皆赖长生天之感格与福荫，结束迄今已有四十年之久之争纷，复和好如初。由是东起日出地南家思（Nangkiyass）之国，西抵 talu 之海，已使驿路交会合一，我辈之国皆相沟通。吾人相与而约曰：苟有离心，则为叛者，必共击之”<sup>④</sup>。

---

① 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道园学古录》卷二三。上述史料中之大德九年，据《元史·成宗纪》（见下），应为大德七年之误。明里铁木儿（Melik Temur），阿里不哥子。

② 《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

③ 哈沙尼（Hashani）：《完者都使》（Tarikh-i Uljaitu），1969年德黑兰 M. Hambly 刊本，页三四。哈沙尼所记笃哇所提议的这次忽里台大会，最后是否举行，史无明文。不过哈沙尼提到了元成宗、笃哇和察八儿三方使臣到达波斯的消息。

④ 此信影印件及德译见黑尼士：《关于蒙古伊利汗阿鲁浑和完者都致法国国王美腓力的信件（一二八九年和一三〇五年）》，载《东方》，II，一九四九年。本段汉译据黑尼士德译，并参照《多桑蒙古史》有关段落。

上述完者都信中的这些话显然与和谈达成的协议有关。元人袁桷《拜住元帅出使事实》中有“拜住尝闻成宗时,先王(按,指笃哇)有盟,兴灭国,开关塞以安百姓”等语<sup>①</sup>,也应是和约的内容。

成宗承世祖府库充盈,即位后对诸王、公主、驸马、勋臣大加赏赐,“赐金一者加四为五,银者加二为三”。这种赏赐,发展到了国家财力无法承受的地步,元贞二年(一二九六年)二月,中书省臣就说:“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今继请者尚多,臣等乞甄别贫匮及赴边者赐之,其余宜悉止”。这表明在成宗即位一年多就将国库的积蓄用于赏赐上快用光了。次年五月,安西王阿难答又“遣使来告贫乏”,要求赈济和赏赐。成宗为此曾训斥阿难答说:“若言贫乏,岂独汝也?去岁赐钞二十万锭,又给以粮,今与,则诸王以为不均;不与,则汝言人多饿死。其给粮万石,择贫者赈之”。这反映出贪得无厌的诸王与中央存在着矛盾。尽管如此,对宗亲的赏赐仍动辄以万计。以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年)为例,即赐晋王甘麻剌钞七万锭,安西王阿难答钞三万锭。大德二年二月,中书右丞相完泽称:“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sup>②</sup>。报告了财政的赤字数。到了大德三年正月,元廷的财政状况更坏,据中书省臣言:“比年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载,自余皆借及钞本。臣恐理财失宜,钞法亦坏”。于是成宗下令:“自今一切赐与皆勿奏”<sup>③</sup>。但实际上这是办不到的。比较起来,忽必烈对宗亲的赏赐是有节制的,甚至被讥为“吝于财”,成宗在这方面就大不如其祖了。泛滥赏赐自成宗起,到武宗时发展得更严重,终于成为元朝一代最沉重的一项财政负担。

成宗即位之初,政府机构已经庞杂,当时御史台臣言:“内外官府增置愈

① 《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② 以上均见《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

③ 均见《元史》卷二〇,《成宗纪》三。

多,在京食禄者万人,在外尤众,理宜减并”。成宗只是“命与中书议之”。但中书省本身的情况就不景气,完泽、不忽木等当政的指导思想是恪守成宪,这对保持稳定有好的作用,但同时却导致无所事事的作风弥漫于朝中,中书省成为人怀怠心、政令不行、办事拖拉的官僚机构,致使成宗反而追念桑哥当政时“政事无不立决”的情景<sup>①</sup>。成宗本人也不如忽必烈,他甚至即位五年,尚未知六部官员其人为谁,皇帝如此,臣下办事当然可以拖拉,故“事多稽误”<sup>②</sup>。成宗一朝,大贪污案时有发生,如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年)三月,发生了两起巨大的贪污案件:当时行御史台弹劾平章教化受财三万余锭;教化复言平章的里不花领财赋时盗钞三十万锭,及行台中丞张闾受李元善钞百锭。贪官污吏拼命攀牵,妄图开脱自己罪责。对于如此重大的贪污案件,成宗竟采取“俱敕不问”<sup>③</sup>的态度,最后不了了之。大德六年,朱清、张瑄案发,查明自丞相完泽以下宰执官几乎都受过他们的贿赂,成宗一怒之下,将这些大臣全免职,但不久又都官复原职<sup>④</sup>。又有回回商人中卖宝石,贿赂诸大臣,以值三十万锭之宝石骗取六十万锭,被人告发,成宗下令要将受贿诸大臣处死;这些人的家属恳请胆巴国师说情,胆巴遂以“做好事”奏释重囚,结果将他们全部释放,并恢复其官职<sup>⑤</sup>。朝廷大臣贪污受贿问题如此严重而不受惩办,可见政治的腐败程度已不轻了。

成宗晚年多病,不亲政务,“凡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壶,外则委于宰臣”<sup>⑥</sup>,皇后卜鲁罕和中书右丞相哈刺哈孙分别掌握了朝廷大权。以卜鲁罕和左丞相阿忽台为一方,以哈刺哈孙为另一方,形成对立的两个集团,明争暗斗。成宗一死,这两个集团围绕帝位继承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流血斗争。

① 均见《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

② 《元史》卷二〇,《成宗纪》三。

③ 同上。

④ 《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

⑤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三三〇。

⑥ 《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

## 第二节 统治政策的演变与帝位之争(下)

### 一 武仁授受与英宗之立

#### 武宗登位与财政危机的加剧

元成宗曾立其子德寿为皇太子,但德寿早死,帝位的继承人显然也成了问题。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年),由于原来镇守漠北的宁远王阔阔出“怠于备御”,元成宗乃命其侄海山(答刺麻八剌子)去阔阔出军中代领其职,于是海山就成了漠北镇边亲王,取得了军权,为其后来的争夺帝位打下了基础。

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年)春正月,成宗死,立刻又爆发了帝位之争。争夺帝位的一方是安西王阿难答,支持者为皇后卜鲁罕、左丞相阿忽台等人;另一方是怀宁王海山及其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支持者有右丞相哈刺哈孙等人。

元成宗死后,安西王阿难答、左丞相阿忽台等力图以成宗晚年即“居中用事”的卜鲁罕皇后“垂帘听政”,进而推阿难答即帝位,并定于三月三日发难<sup>①</sup>。时右丞相哈刺哈孙密遣使北迎海山于漠北,南迎爱育黎拔力八达于怀州(今河南沁阳),并“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库,称病卧阙下”,“内旨日数至,不听,文书皆不署”<sup>②</sup>,“守宿掖门凡三月,密持其机,阳许之”<sup>③</sup>。适值海山自漠北遣使脱脱计事京师,哈刺哈孙乃令其急还漠北,报告海山,然卜鲁罕皇后已密谕通政使止其驿马。幸脱脱之兄阿沙不花与通政院事察乃相商,更改文书日期,“作先日署文书给驿马去”。这样通政使查问也无话可说,脱脱因

① 《元史》卷一三六,《哈刺哈孙传》。

② 《元史》卷一三六,《哈刺哈孙传》;刘敏中:《丞相顺德忠宪王碑》,《元文类》卷二五。

③ 《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



得乘驿回至海山处<sup>①</sup>。海山在漠北,距大都路远,爱育黎拔力八达先到大都,哈刺哈孙乃夜遣人以告:“怀宁王远,不能猝至,恐变生不测,当事先而发”。于是比阿难答等预定发难的日期提前一天,爱育黎拔力八达率卫士入内,执左丞相阿忽台及安西王阿难答等,“责以乱祖宗家法”,杀之<sup>②</sup>。这时,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劝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帝位,但他因其兄海山掌军镇漠北,不敢造次,于是先以监国名义掌握政权,遣使去迎接海山。海山已做好南还夺取帝位的准备,他在和林就召集诸王驸马等商议此事。其母答己信阴阳家之说,谓海山即位运祚不长,遣近臣将此语告海山,海山大为不满,对其亲信康里脱脱说:“今太后以星命休咎为言,天道茫昧,谁能豫知?设使我即位之后,所设施者上合天心,下符民望,则虽一日之短,亦足垂名万年,何可以阴阳之言而乖祖宗之托哉”<sup>③</sup>。当即遣使以此意告其母,并率部下精兵分三路南下。答己大惊,急遣使者回报,请他速来。前所遣使者阿沙不花从京师至漠北,也向海山说明了安西王谋变始末和仁宗监国“以备他变,以待陛下”的情况。海山觉得情况确切,乃于大德十一年五月到达上都<sup>④</sup>。爱育黎拔力八达及其母亦至上都,母子三人相会后,大会诸王。废成宗后卜鲁罕,将她出居东安州,赐死,执阿难答同伙诸王明里铁木儿,送上都,亦赐死。海山即皇帝位,是为武宗。

武宗即位后,对“平定内难”有功的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当然也不能亏待,于是在同年六月,就将其弟立为皇太子,以确定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法定继承人的身份。

武宗的奢侈、挥霍更超过成宗,即位之初,下令对诸王、宗亲、勋臣的赏赐遵成宗即位时“所赐之数赐之”。根据当时的财政状况,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成宗即位之初,“承世祖府库充富”,故能大加赏赐,尚且引起财政困难;

① 《元史》卷一三六,《阿沙不花传》。

② 参见《元史》卷一三六,《哈刺哈孙传》;卷二四,《仁宗纪》一。

③ 《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卷一一六,《后妃传》二。

④ 《元史》卷一三六,《阿沙不花传》。

而当他即位之时,府库充富的条件早已不存在了。武宗朝会赏赐的结果,搞得“两都所储已虚”,而已给者尚不及总数之半<sup>①</sup>。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山仍是挥金如土,如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年)九月,他为买怯来木丁所献宝货,无现钞,乃“敕以盐万引与之,仍许市引九万”。中书省臣认为如此做法是“徒坏盐法”,他却说“此朕自言,其给之,余勿视为例”。中书省见他这样不顾一切的崇尚奢侈,不得不于同年十二月奏请他说:“经费浩大,其收售宝货,权宜停罢”。实际上,在武宗即位后的第四个月(大德十一年九月),中书省臣就说“帑藏空竭,常赋……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常年所支二百七十万锭。自陛下即位以来,已支四百二十万锭,又应求而未支者一百万锭”。指出了严重的不敷出。

至大元年(一三〇八年)正月,江南有绍兴、台州、庆元、广德、建康、镇江六路大饥,“死者甚众,饥户达四十六万有奇”;中书省当时指出:“近百姓艰食,盗贼充斥”,说明老百姓到了无法活命而起来造反的地步。灾荒之余,随之而来的是疫病大作,同年九月江浙一带的情况就是这样,“死者相枕籍。父卖其子,夫鬻其妻,哭声震野,有不忍闻”。至大元年的财政状况更为困难,这年二月就出现了严重危机,中书“计无所出”,只得奏请动用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以周急用”。造成财政困难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大兴土木,诸如“中都建城、大都建寺及为诸贵人营私第”等等,搞得军民不得休息。同年十一月,中书省臣又一次惊呼“廩藏空虚”<sup>②</sup>。

武宗为首的元廷为了寻找摆脱财政困境的办法,乃重新采用忽必烈时的老办法:立尚书省以经理财用。早在大德十一年九月,武宗就下诏立尚书省,“以脱虎脱、教化、法忽鲁丁任尚书省,仍俾其自举官属。命铸尚书省印”。当时御史台臣提出不同意见说:“至元中阿合马综理财用,立尚书省,三载并入

<sup>①</sup>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载,大德十一年八月,中书省臣言:“以朝会应赐者,为钞总三百五十万锭已给者百七十万,未给者犹百八十万,两都所储已虚”。可证。

<sup>②</sup> 均见《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中书。其后桑哥用事,复立尚书省,事败又并入中书”。“顷又闻为总理财用立尚书省,如是必增置所司,滥设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也,且综理财用,在人为之,若止命中书整饬,未见不可”。武宗说:“此三臣愿任其事,姑听其行焉”<sup>①</sup>。表明了这一诏令未得到充分的实施。到了至大二年(一三〇九年)八月,在乐实等人的策划下,尚书省正式开张,搭起了一套班底,“以乞台普济为太傅、右丞相,脱虎脱为左丞相,三宝奴、乐实为平章政事,保八为右丞,忙哥铁木儿为左丞,商议尚书省事,诏告天下”。尚书省所用的六十四名官员,“其中宿卫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历仕者有之”。可谓五花八门,这套用人政策,完全是袭阿合马、桑哥之法。尚书省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变更钞法,于同年九月发行“至大银钞”,以“至大银钞一两準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这样就使至元钞大为贬值<sup>②</sup>,蒙受损失的却是广大老百姓。第三次尚书省的设立及其变更钞法并未能医好武宗朝的不治之症,财政赤字更加严重!就在行至大钞以后的二十天,尚书省臣就说:“今国用需中统钞五百万锭,前者尝借支钞本至千六十万三千一百余锭,今乞罢中统钞……仍拨至元钞本百万锭,以给国用”。财政赤字数,创元朝建立以来的纪录。尽管这样,主持尚书省的脱虎脱、三宝奴等人,还是备受武宗恩宠,如至大三年二月,赐三宝奴“答刺罕”之号,封乐实为齐国公;同年六月,脱虎脱和三宝奴成了“总治百司庶务”、独揽尚书省大权的显赫人物,并获得了武宗赐予他们“珠衣”的崇高恩遇。这批人凭着武宗的信任,进而干预宫廷内政,至大三年,三宝奴劝武宗重新立己子为皇太子,后经右丞相康里脱脱反对,始维持原状,“三宝奴虽不以为然,而莫能夺其议”<sup>③</sup>。三宝奴等的所作所为,直接触犯皇太子爱育黎拔

①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② 据《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载,至元二十四年所行之至元钞,每二贯準花银入库价一两、赤金入库价一钱(二十贯準一两)。如今按至大银钞之法,则五贯至元钞方能準白银一两、赤金一钱。

③ 《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

力八达的利益,且后者信奉儒术,视三宝奴等为异端,相互间的矛盾必然加深。

### 仁宗继统和儒术的再利用

元武宗在位不足五年(一三〇七年至一三一一年),至大四年正月死,爱育黎拔力八达继承皇位,是为仁宗。

爱育黎拔力八达与武宗有着不同的经历,他自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年)三月出生以后,先是居住大都,在其未出阁前,与其兄海山同以“通贯经史,善论古今治乱”的汉族名儒李孟为师,接受儒术的熏陶。大德九年(一三〇五年)十月,成宗后卜鲁罕居中用事,令与其母答己一同出居怀州(今河南沁阳)。在他谪居怀州的数年中,汉儒李孟仍随从,为之讲述“尧、舜之道”、“古先帝王得失成败”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意。这对爱育黎拔力八达有深刻的影响。后来他曾握拳对群臣说:“所重乎儒者,为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sup>①</sup>。表明了他对儒术的重视。爱育黎拔力八达被认为是既“通达儒术”,又“妙悟释典”的封建帝王,他曾说:“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sup>②</sup>。当他出居怀州之初,就对吏弊深恶痛绝,“欲痛铲除之”<sup>③</sup>。在其为太子时,就重视人才的培养,曾于至大元年(一三〇八年)五月,请将成宗始建而一直未成的国子监学建成,得到武宗的同意。

至大四年正月十日,武宗死后二日,爱育黎拔力八达立即宣布罢尚书省,其班底中的主要成员,如:丞相脱虎脱、三宝奴,平章乐实,右丞保八,左丞忙哥铁木儿,参政王罽等,均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罪,命中书右丞相塔思不花、知枢密院事铁木儿不花等参鞫。十四日,脱虎脱、三宝奴、乐实、保八、王罽均被诛杀,忙哥铁木儿被杖流海南。短短几天中,尚书省的主要成员就被爱育黎拔力八达一网打尽,动作之快是少见的。时人刘埙有七律一首,专讥三宝奴被

① 《元史》卷一七五,《李孟传》。

② 《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

③ 《元史》卷一七五,《李孟传》。

杀,其前四句是:“受尽君恩弄尽权,富倾御府贵熏天;奴才自许齐三宝,主寿谁能保万年”<sup>①</sup>。

武宗时的尚书省及其骨干被铲除后,爱育黎拔力八达接着就召世祖朝谙知政务素有声望的老臣平章程鹏飞、董士选,太子少傅李谦,少保张驴,右丞陈天祥、尚文、刘正,左丞郝天挺,中丞董士珍,太子宾客萧颢,参政刘敏中、王思廉、韩从益,侍御赵君信,廉访使程钜夫,杭州路达鲁花赤阿合马等人来到京师,“同议庶务”,初步组成中书省班子,这些人中的李谦、尚文、萧颢、王思廉、程钜夫等又均系当时知名的儒臣。又任命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以太子詹事完泽和李孟并为中书平章政事<sup>②</sup>。在完成了对中央政府机构人员的重大更换之后,爱育黎拔力八达才于同年三月正式即皇帝位。

仁宗即位后,首先重视人才的选拔。皇庆二年(一三一三年)夏,他常与中书平章政事李孟讨论用人之方,李孟说:“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汉、唐、宋、金,科举得人为盛。今欲兴天下之贤能,如以科举取之,犹胜于多门而进;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真材也”。仁宗深然其言,决意实行科举<sup>③</sup>。同年十一月,颁《行科举诏》,规定了考试的重点和录取的标准,诏书说:“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诏书又明确规定科举的目的是:“经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风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sup>④</sup>。表明他决心利用儒术进行统治。在他统治期间,曾分别于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年)和五年(一三一八年),通过廷试,共得进士一〇六人<sup>⑤</sup>。有关延祐科举的详细情况,见本书第四章。

① 刘壎:《水云村吟稿》卷八,《三宝奴伏诛》。

② 参见《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

③ 《元史》卷一七五,《李孟传》。

④ 程钜夫:《行科举诏》,《元文类》卷九;《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科目》。

⑤ 《元史·选举志·科目》载,“延祐二年春三月,廷试进士,赐护都答儿、张起岩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五年春三月,廷试进士护都达儿、霍希贤等五十人”。

仁宗朝的另一建树是纂修《风宪宏纲》，此即《大元通制》的前身。据《元史·武宗纪》载，大德十一年十二月，中书省臣就向武宗上言：“请自世祖即位以来所行条格，校讎归一，遵而行之”。并说，世祖时就曾有过相应的诏旨，但至今尚未实行。至大二年九月，尚书省臣又奏请将太祖以来所行政令九千余条，“删除繁冗，使归于一，编为定制”。武宗对这两次奏请均表同意，但并未付诸实行。仁宗即位之初，即允中书所奏，择“耆旧之贤、明练之士”，“若中书右丞伯杭、平章政事商议中书事刘正等，由开创以来政制法程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大纲有三：一、《制诏》，二、《条格》，三、《断例》；另将错居于《条格》、《断例》之间的亦汇辑成《别类》。书成于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年）夏五月，名为《风宪宏纲》，命监察御史马祖常作序。书成之后，又命“枢密、御史、翰林、国史、集贤之臣相与正是，凡经八年事未克果”，到英宗至治二年，才审定颁行，题名《大元通制》<sup>①</sup>。

仁宗一朝的政事，受到其母答己太后及右丞相铁木迭儿的严重干扰，特别在对待铁木迭儿的态度上，仁宗越来越表现得软弱无能，反映了他本身的局限性。铁木迭儿与答己太后相勾结，处处受答己的庇护。早在武宗至大年间，他任云南行省左丞相时，因擅离职守，本有旨诘问，结果由答己出面，将他庇护过关，改为“得贷罪还职”。在元武宗死而仁宗尚未及即位之际，太后答己就从兴圣宫下旨召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过了一个月，仁宗即位，对母后旨只能照此办理，于是，上年还是“贷罪还职”的铁木迭儿就一下平步青云，跃上了中书右丞相的宝座，也是在仁宗所组的中书省班子中掺入了一名异端分子。铁木迭儿居相位两年，即“得罪斥罢”，乃“更自结徽政近臣，复再入相，恃势贪虐，凶秽愈甚，中外切齿”<sup>②</sup>，元仁宗乃以御史中丞萧拜住为中书右丞，“寻拜平章政事、稍牵制之”<sup>③</sup>。而仁宗本人，“亦素恶铁木迭儿，欲诛之。”<sup>④</sup>由于铁木

① 李昉鲁翀：《大元通制序》，《元文类》卷三六。

② 《元史》卷一七九《杨朵儿只传》。

③ 《元史》卷二〇五《奸臣传》。

④ 《元史》卷一七九《贺胜传》。

迭儿的“奸贪不法”，导致了延祐四年六月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联合对他进行弹劾，当时以中书平章政事萧拜住、御史中丞杨朵儿只和上都留守贺伯颜（贺胜）三人为首，列举铁木迭儿罪恶：“取杀人囚张弼钞五万贯”，“取晋王田千余亩”，“受诸王合儿班答使人钞十四万贯”，“受杭州永兴寺僧章自福赂金一百五十两”，其“诸子无功于国，尽居显贵，纵家奴陵虐官府，为害百端”等等<sup>①</sup>。元仁宗见了奏章后，大为震怒，下诏逮问。“铁木迭儿走匿太后宫中”，“有司不得捕，仁宗不乐者数日”，最后还是太后答己出面，使仁宗对铁木迭儿无可奈何而仅夺其印绶，罢其相位而已<sup>②</sup>。这实际上是一次仁宗与权臣两个派系之间的较量，其结果实质上仍然有利于权臣一方。所以仅仅事隔两年，到了延祐六年四月，铁木迭儿又改头换面，以太子太师的身份重新登台。于是又引起了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对他的联名弹劾，认为他“逞私蠹政，难居师保之任”，但结果仍“以太后故，终不能明正其罪”<sup>③</sup>。这是仁宗一方的又一次失利，也是仁宗的愈益软弱所致。

元仁宗时统治集团内部的另一个斗争，表现在皇太子的人选问题上。如上所说，元武宗在立其母弟仁宗为皇太子时，曾经约定“兄终弟及，叔侄相承”，就是说，仁宗之后，仍当以次传位于武宗的儿子<sup>④</sup>。可是等到武宗死，仁宗即位之后，于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年）春，议建东宫时，表面上说是丞相铁木迭儿“欲固位取宠”而主立仁宗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sup>⑤</sup>，实际上，仁宗及其皇后弘吉剌氏也有意立己子硕德八剌<sup>⑥</sup>而不立武宗之后，又加之仁宗之母答己太后认为硕德八剌比武宗长子和世琜更为柔懦，易于控制，也力赞此举；事

① 参见《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又《元史》卷二〇五，《奸臣传》。

② 参见《元史》卷一七九，《贺胜传》；同书卷二〇五，《奸臣传》。

③ 《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同书卷二〇五，《奸臣传》。

④ 《元史》卷三一，《明宗纪》。

⑤ 同上。

⑥ 《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



情经过了将近一年的周折,终于在延祐三年冬十二月,年仅十三岁的硕德八剌被立为皇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授以金宝”<sup>①</sup>。这是仁宗、太后与铁木迭儿三股势力暂时利益一致所造成的结果。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且不使武宗之后将来起而争夺帝位,于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年)十一月,乃先将武宗长子和世琜封为周王<sup>②</sup>,并令其出镇云南。在和世琜赴云南的途中,行至陕西延安附近,当年武宗时的一些旧臣皆来会,商量对策,结果和世琜率领部属自河中西行,逃至北边金山,他得到察合台后王的支持,居金山之西十余年,积聚了一些军事力量。<sup>③</sup>

延祐七年(一三二〇年)正月,仁宗死。三月,其子硕德八剌即位,是为英宗。

## 二 英宗新政与泰定帝即位

与元朝前辈帝皇相比,英宗硕德八剌处于最易接受汉族封建文化的社会环境中,他自幼生活在怀州,习惯于地主士大夫式的生活,又受其父直接影响,被立为太子后,进一步接受儒臣的影响,具有汉族封建文化的素养。

如前所说,当年硕德八剌之所以被立为太子,是由仁宗、太后和铁木迭儿三股势力暂时的利益一致所造成的结果,可是到仁宗死后,这一基础已经消失。仅仅在仁宗死后的第四天,屡遭仁宗斥罢的铁木迭儿,又在其后盾答己的支持下,凭着太后的懿旨,重新爬上中书右丞相的宝座。铁木迭儿乘英宗尚未正式即位之机,先杀中书平章萧拜住、御史中丞杨朵儿只;又乘英宗居丧期间,杀上都留守贺伯颜,并屡诬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赵世延,欲将其置于死地,赖英宗从中保护,赵才得免于死。仁宗生前所亲信的大臣多受排斥,甚至连

① 《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

② 同上。

③ 《元史》卷三一,《明宗纪》。

仁宗最信任的儒臣李孟,也被夺去“所受秦国公制命,仍仆其先墓碑”,本人降职任用<sup>①</sup>。与此同时,铁木迭儿大树己党,与他和答己太后关系密切的黑驴、赵世荣、木八刺等人,先后从地方进入中书,分别担任平章政事、右丞等要职。

英宗与其祖母太皇太后答己之间本来就有矛盾<sup>②</sup>,所以在他即位后的两个月,于延祐七年五月,就对答己的党羽进行大规模诛杀,当时岭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中书平章政事黑驴及御史大夫脱忒哈、徽政使失列门等,与要束谋妻亦列失八,皆以“谋废立”罪而尽加诛戮,并籍其家<sup>③</sup>。答己之党“势焰顿息焉”<sup>④</sup>。英宗不悦铁木迭儿的所作所为,为牵制铁木迭儿,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乃任拜住为左丞相,委以心腹。拜住系成吉思汗的开国元勋木华黎之后、世祖忽必烈时名相安童之孙,在元朝最高统治者的心目中是个“大根脚”人物,在蒙古贵族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他与儒臣又交往甚密,“每退食必延儒士咨访古今礼乐刑政、治乱得失,尽日不倦”<sup>⑤</sup>。是蒙古贵族中积极主张“行汉法”的代表人物。

至治初年,元廷内部的两大势力已经形成,一方是“威临三朝”的太皇太后答己,和“布置爪牙、威慑朝野”的右丞相铁木迭儿;另一方则是年少气盛的英宗,和有志于“以儒道治天下”的左丞相拜住。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由于英宗对拜住的信任,铁木迭儿一直到死,“以拜住故不得大肆其奸,虽百计倾之,终不能遂”<sup>⑥</sup>。

① 《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同书卷一七五,《李孟传》。

② 《元史》卷一一六《后妃传》二载:“太后见明宗少时有英气。而英宗稍柔懦,诸群小以立明宗必不利于己,遂拥立英宗,及既即位,太后来贺,英宗即毅然见于色,后退而悔曰:‘我不拟养此儿耶!’遂饮恨成疾。”可为证。

③ 参见《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同书卷一三六,《拜住传》。

④ 《元史》卷一一六,《后妃传》二。

⑤ 《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

⑥ 同上。

至治二年(一三二二年)八月和九月,铁木迭儿和答己相继病死,这为英宗与拜住实行政治改革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但是,铁木迭儿一派以铁失为代表的势力,仍然布列朝中。促使英宗实行改革的根本原因是当时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至治二年一至九月,全国各地水旱频仍,加之霜、雹、蝗灾,遍及山东、河北、四川、湖北、江南十余省的广大地区。起义时有发生,英宗为维护其统治,乃决心进行改革。从至治二年十月起,以拜住为中书右丞相,且不设左丞相,以示信任之专。此后数月间,进行一系列改革,新政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大规模起用汉族地主官僚及儒臣,拜住“首荐张珪,复平章政事,召用致仕老臣,优其禄秩,议事中书。不次用才,唯恐少后,日以进贤退不肖为重务”<sup>①</sup>。吴元珪、王约、韩从益、赵居信、吴澄、王结等人,都在短短数月内被擢任为集贤、翰林院及中书官职。英宗还说“更当搜访山林隐逸之士”<sup>②</sup>。

(二)罢汰冗员。英宗自至治二年十一月起,罢世祖以后冗置官,“锐然减罢崇祥、福寿院之属十有三署,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sup>③</sup>。但因被刺而未能完成机构改革。

(三)行助役法。元代农民劳役繁多,负担沉重。至治三年四月,英宗下诏“行助役法,遣使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sup>④</sup>。《元史·干文传传》载此法较具体:“会创行助役法,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文传谕豪家大姓,以腴田来归,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于役”。可见此法对广大农民是有利的。

(四)审定颁行《大元通制》。至治二年正月,英宗命将仁宗时未最后审定完毕的法令编纂工作继续进行,乃令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判宗

① 《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

②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③ 同上;又《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

④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正府普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以二月朔会集中书平章政事张珪暨议政元老,率其属众共同审定,并加以补充,书成,“堂议题其书曰《大元通制》”<sup>①</sup>。凡二五三九条:内断例七一七,条格一一五一,诏赦九四,令类五七七<sup>②</sup>。全书共八八卷<sup>③</sup>。此书是元朝“政制法程”的汇编。

英宗新政的各项措施,特别是大规模任用儒臣和罢汰冗员,势必引起大批蒙古、色目贵族的反对,因为这直接触犯了他们的世袭特权。元代儒臣袁桷曾称拜住“选贤与能,奸党滋惧”<sup>④</sup>。英宗又曾对其大臣说:“今山林之下,遗逸良多,卿等不能尽心求访,惟以亲戚故旧更相引用耶?”<sup>⑤</sup>这些言论和行动,都使蒙古、色目贵族感到是对他们既得特权的莫大威胁。加之铁木迭儿死后,英宗说他“贪蠹无厌”,下令“宜籍其家,以惩后也”<sup>⑥</sup>;并“毁所立碑,追夺其官爵及封赠制书”<sup>⑦</sup>。至治二年十二月,铁木迭儿子宣政院使八思吉思,又坐刘夔冒献田地案伏诛,仍籍其家。次年二月,刘夔及参与此冒献田地案的同佥宣政院事囊加台也被诛杀<sup>⑧</sup>。这就必然引起铁木迭儿的义子铁失<sup>⑨</sup>等人及其党羽的更加恐惧。一场宫廷流血政变就迫在眉睫了。

至治三年(一三二三年),铁失等为发动宫廷政变,需要物色新的靠山,乃与晋王也孙铁木儿的心腹、王府内史倒刺沙“深相要结”。八月二日,铁失等遣使至也孙铁木儿处,告以准备发动政变之谋,并说事成之后,推立也孙铁木儿为帝<sup>⑩</sup>。五日,铁失等人乘英宗自上都南返到离上都三十里的南坡之时,与

① 李杲鲁翀:《大元通制序》,《元文类》卷三六。

②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③ 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三,《史类·故事》。

④ 袁桷:《丞相拜住赠谥制》,《元文类》卷一二。

⑤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⑥ 《元史》卷二〇七,《逆臣·铁失传》。

⑦ 《元史》卷二〇五,《奸臣·铁木迭儿传》。

⑧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⑨ 《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

⑩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大司农失秃儿、前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前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铁木迭儿子前治书侍御史锁南、铁失弟宣徽使锁南等以及按梯不花等五个蒙古诸王,共十六人,利用了铁失自己所统辖的阿速卫兵为外应,发动政变,先杀右丞相拜住,然后杀英宗于卧所<sup>①</sup>。早已觊觎皇位的晋王也孙铁木儿在这幕宫廷政变中,用顺水推舟之法,八月政变得逞不久,他就在九月初四日即皇帝位于龙居河(即怯绿连河)<sup>②</sup>。是为泰定帝。

泰定帝即位之初,对策划和参与谋杀英宗的铁失等人一一封官,以也先帖木儿为中书右丞相、铁失知枢密院事,等等。但是到了同年十月,泰定帝在尚未到达大都之时,就对这批发动政变的人采取了果断措施:杀也先帖木儿、完者、锁南、秃满等于行在所;改以旭迈杰为中书右丞相,并遣他和御史大夫纽泽为使,前往大都诛铁失、失秃儿、赤斤铁木儿、脱火赤、章台等人,并戮其子孙,籍没家产。又对曾经参与宫廷政变的阿速卫加强控制,以旭迈杰兼阿速卫达鲁花赤<sup>③</sup>。

同年十二月,泰定帝对铁失余党继续进行清洗:杀月鲁、秃秃哈、速敦等人;流放诸王月鲁铁木儿于云南,按梯不花于海南,曲吕不花于奴儿干,孛罗及兀鲁思不花于海岛。他这样做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另一方面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洗刷和表白他自己,当时臣下对他建议,“不除元凶,则陛下美名不著,天下后世何从而知”<sup>④</sup>。便是有力的佐证。

无疑,泰定帝在铁失等人图谋发动宫廷政变的这一事件中,是个有直接牵连的人物,后来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即位诏中就说他“具有盟书,愿守藩服,而与贼臣铁失、也先铁木儿等潜通阴谋,冒干宝位,使英宗不幸罹于大故”<sup>⑤</sup>。至

①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卷二〇七,《铁失传》。

②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卷二〇七,《铁失传》。

③ 均见《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④ 同上。

⑤ 《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

于《元史·泰定帝纪》和《拜住传》记载他下令将铁失派来报告政变密谋的使者囚禁并遣使赴上都告变一事,显然是开脱责任的官样文章,因为他明知路远,使者“未至”而政变就会发生的。泰定帝夺得帝位后杀政变策划者铁失等人,而对亦曾参与策划的主要人物、他自己的心腹、晋王府内史倒刺沙,不但不加惩处,反而连续升官:九月升平章政事,十二月升中书左丞相,百般重用。这就间接证明,泰定帝本人在这次政变中并非完全被动的角色。

### 三 天历之战与明文之争

泰定帝虽然自幼生长漠北,且借政变之力取得帝位,但通过对铁失一党迅速果断的处置,既维护了蒙古札撒的原则(臣仆不准杀害黄金家族),又赢得了站在英宗一边的大批臣僚的拥护。他在位期间(一三二三至一三二八年),标榜行事一遵世祖成宪,仍任用英宗时的一批儒臣,保留仁、英两朝的改革成果,基本上是顺应进一步行汉法的历史趋势的。这个时期,水旱蝗灾连年不断,并发生了几次规模不大的社会动乱,不过总的说来统治还比较稳定。只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系的争权夺利的矛盾日益加深,进而导致大规模的争夺帝位的内战,才将元朝推向崩溃的边缘。

泰定帝倚信王府旧臣、回回人倒刺沙,升之为中书左丞相,而掌握兵权的钦察大臣燕铁木儿(床兀儿之子)却怀有贰心。早在武宗镇北边时,他就充任宿卫十余年,武宗“特爱幸之”。及武宗即位,燕铁木儿拜正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在仁宗及泰定年间,他又历任左卫亲军都指挥使、太仆卿、同金枢密院事、金书枢密院事等职。燕铁木儿“自以身受武宗宠拔之恩”,当然是一心向着武宗后代的人物<sup>①</sup>。

致和元年(一三二八年)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倒刺沙专权自用,宗室诸王辽王脱脱、梁王王禅趋附于他。时金枢密院事燕铁木儿留守大都,实掌枢密

<sup>①</sup> 《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符印,乃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等谋立武宗之子,准备发难。同年八月甲午(初四)“黎明,百官集兴圣宫,燕铁木儿率阿速铁木儿、孛伦赤等十七人,兵皆露刃”,号令于众,主立武宗之子为帝,声言“有不顺者斩”。当即手缚平章政事乌伯都剌、伯颜察儿;分别命勇士执中书左丞朵朵、参知政事王士熙,参议中书省事脱脱、吴秉道,侍御史铁木哥、丘世杰,治书侍御史脱欢,太子詹事丞王桓等,统统投入监狱。燕铁木儿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共守内庭,分处腹心于枢密,“籍纳库,录符印,召百官入内听命”。同时派前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明里董阿、前宣政使答里麻失里,驰驿迎怀王图帖睦尔于江陵<sup>①</sup>。图帖睦尔,武宗次子,明宗和世琜的异母弟,英宗至治元年(一三二一年)五月被出居海南,泰定元年(一三二四年)召还,至潭州(今湖南长沙),复命止之,居数月,乃还京师。同年十月封怀王。二年,又命他出居建康(今江苏南京)。致和元年(一三二八年)三月,泰定帝病况日重,倒剌沙等将图帖睦尔迁居江陵,以防止武宗后人起来争夺帝位。

燕铁木儿在遣使迎图帖睦尔的同时,又密谕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颜,领兵扈从。伯颜亦是武宗旧部,从十五岁起,即侍武宗于藩邸,武宗即位之后,又历任吏部尚书、御史中丞、尚书平章政事;仁宗年间,任周王(和世琜)常侍府常侍,官至御史大夫;泰定年间,历任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等职。他自认“夙荷武皇世恩,委以心膺”,因此,当燕铁木儿将谋立武宗子图帖睦尔的意图密告于他时,伯颜立即表示全力支持。并遣使报燕铁木儿说:“公尽力京师,河南事我当自效”。伯颜召集同僚及其属下,说明情况并“会计仓廩、府库、谷粟、金帛之数,乘輿供御、牢饩膳羞、徒旅委积、士马刍糒供亿之须以及赏赉犒劳之用,靡不备至。”不足之数则令州县征收明年田租,及向商人借贷,“约倍息以偿”。再有不足,则邀截经过河南的东南常赋,“辄止之以给其费”。又征发民丁,增置驿马,修补城池及武器,严巡逻及侦察,做军事上的

<sup>①</sup> 《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准备,并招募勇士五千人以迎怀王图帖睦尔,而亲自勒兵迎候。所以当图帖睦尔由江陵北上途经河南时,伯颜全副武装,与百官父老引导怀王入内,明日又护送北行<sup>①</sup>。图帖睦尔于八月至大都,“人居大内”。此时,倒刺沙已派兵进攻燕铁木儿集团的大都防线,内战爆发。

九月,燕铁木儿率诸王、大臣请图帖睦尔“早正大位,以安天下”,图帖睦尔因其兄周王和世㻋在漠北,且拥有相当实力,不敢接受。燕铁木儿对他说:“人心向背之机,间不容发,一或失之,噬脐无及”。图帖睦尔领悟了其中的奥妙,乃表示“必不得已,当明诏天下,以著予退让之意而后可”<sup>②</sup>。于是在九月十三日即皇帝位于大都大明殿,是为文宗,改元天历。在文宗即位前夕,先处理了一批政敌,其中:乌伯都剌、铁木哥弃市,朵朵、王士熙、伯颜察儿、脱欢等各流于远州,并籍没其家<sup>③</sup>。

在上都的倒刺沙和梁王王禅等人也在同月立泰定帝皇太子阿剌吉八为帝,改元天顺。并加紧进攻大都。燕铁木儿与其弟撒敦、子唐其势等人,率军与战,屡败上都兵,最后上都兵全面崩溃,加上齐王月鲁帖木儿和东路蒙古元帅不花帖木儿<sup>④</sup>的合军围攻上都,倒刺沙在和大都燕铁木儿集团较量了两个多月之后,于十月十四日,只得“肉袒奉皇帝宝出请死”,表示投降,文宗将他投入监狱<sup>⑤</sup>。十一月,倒刺沙、王禅及其党羽皆被处死。

在天顺帝与文宗兄弟的帝位争夺中,天顺帝的失败是必然的。就经济实力而言,据有大都的燕铁木儿控制了较多的积储和经济来源,这从伯颜在河南邀截国家钱粮以充文宗争位费用一事就可证明这点;就军事而论,燕铁木儿掌

① 《元史》卷一三八,《伯颜传》。

② 《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③ 《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

④ 东路蒙古元帅不花帖木儿系权臣燕铁木儿之叔父,见《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

⑤ 《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握军权,加上文宗长兄周王和世璠远在漠北,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这是为当时一般人所瞩目的。虽然在这场争夺中和世璠的兵力未来得及发挥作用,但客观上却形成了一股威慑力量。燕铁木儿在发难之初也是充分利用了这一因素,他在遣使南迎怀王图帖睦尔的同时,宣言已遣使北迎周王和世璠“以安众心”,复假称“周王从诸王兵整驾南辕,旦夕即至矣”<sup>①</sup>。起了“中外乃安”<sup>②</sup>的镇定作用。

在天顺帝与文宗兄弟的帝位争夺战中,陕西、四川等地是站在上都天顺帝一边的。从致和元年八月燕铁木儿等十七人于大都发难,直至九月文宗即位大都后,陕西行省和行台的官员们纷纷拒大都之命而不奉召,且屡次涂毁文宗所下诏书,将使者械送上都或投之于狱。是年九月,陕西行台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公开起兵反对文宗,引兵从大庆关(今陕西大荔东近黄河处)东渡黄河,擒杀河中府(治今山西蒲州)官员,河东官吏闻其军至,纷纷弃城逃走,也先帖木儿悉以己人代之,接着他率军经晋宁(今山西临汾)、潞州(今山西长治),当地官员纷纷逃窜,但当他于同年十一月抵达武安(今河北武安)时,上都天顺帝早已大势已去,乃以军投降大都,河东州县得知消息后,“尽杀其所署官吏”,也先帖木儿本人与倒剌沙等一同被诛杀。与也先帖木儿起兵反对文宗的同时,陕西的南路一支军队,曾至巩县(今河南巩县东北)黑石渡,并攻克虎牢、武关两要隘,使原有守军纷纷溃退,军储亦全为陕西军所有,但后为文宗一方以软硬兼施之法而归于失败<sup>③</sup>。

天历元年十一月,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自称镇西王,起兵反对文宗,杀本省平章宽彻等官,以其亲信杨静等人另置官属,并烧绝栈道;文宗方面同样对他采用软硬兼施之法,大约经过半年的时间,囊加台终于在天历二年四月,听

① 《元史》卷三一,《明宗纪》。

② 《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③ 均见《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卷一三七,《阿礼海牙传》。

从了文宗的赦罪诏,四川全归文宗所有,而囊加台却于同年八月,“以指斥乘輿,坐大不道弃市”,其亲信杨静等人则被籍没家产,杖流辽东<sup>①</sup>。

天历元年(一三二八年)九月十三日元文宗图帖睦尔于大都即位之时,已领悟了权臣燕铁木儿的意思,虽口称是“姑从”宗王、将相、百僚、耆老之请,“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sup>②</sup>。但在燕铁木儿等人的唆使下进一步争夺帝位的决心也大致已定。同年十月,倒刺沙兵败上都,宣告投降,两京道路始通。十一月,文宗遣使奉迎其异母兄周王和世㻋于漠北,和世㻋先命孛罗为使至大都。

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年)正月,文宗又数次遣使迎和世㻋。后者信以为真,于当月即皇帝位于和宁之北,是为明宗。二月二十一日,当文宗所遣之使撒迪从明宗处回到大都,文宗方知明宗已即位,于是在三月派权臣燕铁木儿奉皇帝宝玺于明宗途中。明宗接得皇帝大印后,乃立其弟文宗为皇太子。这一切动作,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而毫无破绽。同年五月,文宗从大都出发,北迎明宗,如此兄弟二人,一个自北向南,一个自南向北,相向而行。至八月初一日,明宗到达王忽察都(今河北张北北)之地。初二日,文宗入见,明文兄弟二人相会,明宗举行宴会,表面欢天喜地,但至初六日,突然宣布明宗“暴崩”<sup>③</sup>。

明宗突然死亡之后,燕铁木儿带了皇帝大印及文宗从明宗死地“疾驱而还”,一路上他白天率宿卫士以跟随保护,夜间亲自披甲执坚对文宗巡逻保护,如临大敌,在路上疾驱了二天,于八月初八回到上都。八月十五日,文宗再即皇帝位于上都。

明宗暴死于王忽察都之地,完全是权臣燕铁木儿和文宗事先精心策划的结果<sup>④</sup>。后至元六年(一三四〇年)六月,明宗子元顺帝翻起老账,说其叔图帖

① 《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卷三三,《文宗纪》二。

② 《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

③ 《元史》卷三一,《明宗纪》;《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

④ 《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睦尔曾“谋为不轨,使明宗饮恨而崩”,于是下诏“除其庙主”<sup>①</sup>。

文宗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他懂得一点诗文,流传至今的诗有《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一首:“穿了毳衫便著鞭,一钩残月柳梢边;二三点露滴如雨,六七个星犹在天。犬吠竹篱人过语,鸡声茅店客惊眠;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sup>②</sup>。这在元代封建皇帝中是罕见的。在他统治期间,文治方面亦有所建树:其一,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年),立奎章阁学士院,命儒臣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初设大学士二员,正二品;侍书学士,从二品;承制学士,正三品;供奉学士,正四品;参书,从五品等等官职。至顺元年,上述人员又均有增加<sup>③</sup>。这是他以儒治政的基础。其二,命编《经世大典》。天历二年九月,文宗“敕翰林国史院官同奎章阁学士采辑本期典故,準唐、宋会要,著为经世大典”<sup>④</sup>。书成于至顺二年(一三三一年),前后用了三年的时间,这是元代官修的一部政书,共八八〇卷,另有目录一二卷,公牘一卷,纂修通议一卷<sup>⑤</sup>。

元文宗在帝位争夺中所以能够战胜天顺帝及其异母兄明宗和世璠,主要是靠了燕铁木儿及伯颜这两个权臣的拥戴,而尤以钦察贵族燕铁木儿的汗马功劳为多。文宗以燕铁木儿任中书右丞相。伯颜任知枢密院事。后又授燕铁木儿本人以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太平王、答剌罕、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提调燕王宫相府事、大都督、领龙翔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总裁。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职位。在文宗、宁宗二朝,燕铁木儿“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直到他荒淫身亡为止,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变。与此同时,由于钦察贵族的得势,元文宗也就失去了原有的蒙古贵族(如木华黎家族)的支持,这是不同于

① 《元史》卷三六,《文宗纪》五。

② 见顾嗣立编:《元诗选》卷一。

③ 《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

④ 《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⑤ 欧阳玄:《进经世大典表》,《元文类》卷一六。

前朝的情况。

#### 四 顺帝前期的统治

##### 妥懽帖睦尔之立

元文宗图帖睦尔统治了五年,于至顺三年(一三三二年)八月死。当他病危之际,遗诏立明宗之子。这是由于他原先夺了他哥哥的皇位,试图在死后留下一个好的名声。文宗死后,权臣燕铁木儿为便于控制,乃立明宗次子懿璘质班,在至顺三年十月初四日即皇帝位于大都,是为宁宗。

宁宗仅做了四十三天短命皇帝,就死了,时年仅七岁。于是由文宗后临朝,权臣燕铁木儿与群臣议立文宗子燕帖古思。文宗后不同意,主立明宗长子妥懽帖睦尔。妥懽帖睦尔时年仅十三岁,至顺元年(一三三〇年)其母被害后,他曾被流放于高丽一海岛中,第二年又被迁居广西静江(今桂林)。燕铁木儿乃派人迎妥懽帖睦尔于静江,并亲至良乡迎接。但当相见之后,妥懽帖睦尔因年幼且畏惧燕铁木儿。故对燕铁木儿“一无所答”,燕铁木儿心怀鬼胎;想起当年谋害明宗之事,深恐妥懽帖睦尔即位之后“追举前事”,所以迁延数月,妥懽帖睦尔一直不得立。后适值燕铁木儿荒淫过度身死,乃由文宗后与大臣议,由妥懽帖睦尔于至顺四年(一三三三年)六月即皇帝位于上都,是为顺帝。当时文宗后规定,妥懽帖睦尔之后,“其传位于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sup>①</sup>。然事与愿违,元顺帝于后至元六年(一三四〇年)六月追发前文宗谋害明宗之事,下诏“撤文宗庙主”,徙文宗后不答失里东安州安置,流放燕帖古思于高丽,未至而中道加以杀害<sup>②</sup>。应当说,这是明宗、文宗两系争夺帝位的继续。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即位之后,蒙古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帝位之争虽已告

<sup>①</sup> 《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

<sup>②</sup> 《元史》卷三六,《文宗纪》五;卷四〇,《顺帝纪》三。

一段落,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并没有减退,它突出地表现在权臣与权臣之间、权臣与皇帝之间、皇帝与皇后之间以及军阀互相之间的斗争上,这是顺帝时期的政治特点之一。

妥懽帖睦尔即位后,以燕铁木儿弟撒敦为左丞相、子唐其势为御史大夫。后至元元年(一三三五年)三月,又立燕铁木儿之女伯牙吾氏为皇后。可见在顺帝初年燕铁木儿一家的权势仍是颇为显赫的。但是,此权臣家族很快受到另一权臣伯颜的挑战。

就伯颜的经历及拥立文宗之功劳而言,他是唯一可与燕铁木儿相匹敌的人,故在拥戴事成之后,文宗于天历三年正月任他为知枢密院事。至顺二年,进封浚宁王;至顺三年,又拜太傅,加徽政使。顺帝即位后,为嘉奖伯颜翊戴之功,乃任他为中书右丞相。元统二年,进为太师。同年十一月,又进封为秦王。显然,伯颜的权势已跃居于燕铁木儿的后裔之上,于是身为中书左丞相的唐其势,当然不甘心失去其父燕铁木儿在世的天堂,发出了“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颜何人而位居吾上”<sup>①</sup>的怨言,并进而付诸行动,与其叔撒敦弟答里、其弟答刺海,勾结所亲诸王晃火帖木儿,暗中谋废立,结果被伯颜于后至元元年(一三三五年)六、七月间一网打尽,连同皇后伯牙吾氏在内,无一逃脱。元朝统治集团内部一场又一场流血的派系斗争,至此以一胜一负而暂告一段落。

伯颜诛杀唐其势之后,“专权自恣”,“益无所忌”。他“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杀无辜,诸卫精兵收为己用,府库钱帛听其出纳。”“势焰薰灼,天下之人唯知有伯颜而已”<sup>②</sup>,他的各种封号、官衔加起来足足有二百四十六字之多<sup>③</sup>。这就必然引起元顺帝本人的不满。当时伯颜之侄脱脱,出于自家利益的考虑,

① 《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② 《元史》卷一三八,《伯颜传》。

③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权臣擅权》。

见其伯父骄纵已甚,挟震主之威,深恐一旦败亡,同遭灭族之祸,乃暗中向元顺帝“自陈忘家徇国之意”<sup>①</sup>,终于取得了元顺帝的信任,并与元顺帝心腹世杰班、阿鲁深相结纳,谋逐伯颜。后至元六年二月,乘伯颜请太子猎于柳林之机,脱脱与世杰班、阿鲁共同策划,以所掌兵及宿卫士拒伯颜。由元顺帝下诏黜伯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当伯颜知道不妙而遣使问故时,已无能为力,只得俯首就范。同年三月,伯颜被远徙而病死于龙兴路驿舍<sup>②</sup>。

### 脱脱“更化”

脱脱,字大用,蒙古蔑儿乞部人。他自幼养于伯父伯颜家,稍长,就学于老儒吴直方,立下“日记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终身”<sup>③</sup>的志向。十五岁时,脱脱充任泰定帝皇太子阿剌吉八怯怜口怯薛官;文宗图帖睦尔登位后,曾任内宰司丞兼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顺帝即位后,曾升任同知枢密院事,击败唐其势后,拜御史中丞、虎符亲军都指挥使,进为御史大夫。

后至元六年(一三四〇年),脱脱逐走伯颜后,其父马札儿台即起用为中书右丞相,马札儿台“于通州置榻坊,开酒馆、糟坊,日至万石,又使广贩长芦淮南盐”<sup>④</sup>,脱脱让参政佛嘉问向顺帝告了一状,迫使马札儿台辞职,自己继为右丞相。脱脱一上台,即废伯颜旧政,史称“更化”<sup>⑤</sup>。

脱脱“更化”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一,恢复科举取士制。元朝科举始于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年),以后每三年一科从无中断过,但在后至元元年(一三三五年)被伯颜宣布废除。脱脱采纳吴直方的意见,于后至元六年十二月重新恢复科举<sup>⑥</sup>。这一措施对于笼络汉族士大夫,引导他们走读书入仕的道路,对

① 《元史》卷一三八,《脱脱传》。

② 《元史》卷一三八,《伯颜传》。

③ 《元史》卷一三八,《脱脱传》。

④ 《庚申外史》。

⑤ 黄溍:《史公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六。

⑥ 宋濂:《吴直方行状》,《宋文宪公全集》卷二六。



于消除由于伯颜推行排儒政策而带来的隔阂心理,具有一定的作用。二,大兴国子监,遴选儒臣劝讲。当时,蒙古、回回、汉人三监生员达到三千余人<sup>①</sup>,又动员顺帝读圣贤书,选儒臣欧阳玄、李好文、黄潜、许有壬等四人,“五月一进讲,读五经四书,写大字,操琴弹古调,常御宣文阁用心前言往行,欣欣然有向慕之志焉”<sup>②</sup>。三,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逋。这是稍稍减轻剥削以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四,修三史和《至正新格》。至正三年(一三四三年),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脱脱任都总裁官;同年,修《至正新格》;五年十月,三史全部修成。这两项措施是新政中“文治”的重要内容。脱脱在短短的四年中采取的这些政策,对于纠正伯颜擅权时期“变乱祖宗成宪”的倒行逆施,克服由此而造成的社会危机,是有一定作用的,故“更化”政策推行后,“中外翕然称为贤相”<sup>③</sup>。

至正四年(一三四四年)脱脱以疾辞去相位。七年,马札儿台被劾,贬徙甘肃,脱脱力请俱行,马札儿台病死于甘州,脱脱被召还京师。八年,复为中书右丞相。这时,元朝的统治已病入膏肓,纵然脱脱有一番抱负,也无计可施了。关于元末农民大起义前夕的元朝政治状况,将在本书第七章中阐述。

### 第三节 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 一 统治集团的腐朽

以蒙古贵族为核心的元朝统治集团,他们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治机构,凭借着手中的权力,贪婪地掠夺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元朝皇帝是全

---

① 《庚申外史》。

② 同上。

③ 《元史》卷一三八,《脱脱传》。

国最大的地主,他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保护者,又是封建国家机器的最高操纵者。由于元朝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而也拥有最多的财富。元代皇室和宫廷的挥霍浪费是十分惊人的。皇帝的腐朽很快影响到军队和吏治的败坏,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迅速腐朽化,构成了元朝政治的特点;同时,也是导致元代阶级矛盾急遽尖锐化和元朝速亡的重要原因。

元朝皇帝崇信喇嘛教,每年用于佛事的费用,日甚一日,其挥霍程度为前代所不及。元成宗大德七年(一三〇三年),时人郑介夫上一纲二十目,其《僧道》目称:“今国家财富,半入西番”<sup>①</sup>;时人张养浩于至大三年(一三一〇年)所上《时政书》中也说:“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sup>②</sup>。说明当时佛事浪费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文宗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年)正月,中书省又说,佛事岁费,较旧时又有增多<sup>③</sup>。清代学者赵翼在统计了元朝佛事的巨大浪费数字后指出:延祐五年(一三一八年)各寺作佛事日用羊万头,“此供养之费,虽官俸兵饷不及也”;佛事“土木之费,虽离宫别馆不过也”;寺院“财产之富,虽藩王国戚不及也”<sup>④</sup>。

元朝宫廷的费用也十分惊人,浪费日益严重,如元文宗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年)中政院臣说:“皇后日用所需钞十万锭,币五万匹,绵五千斤”<sup>⑤</sup>。后至元元年(一三三五年),御史台指出:“国朝初用宦官不过数人,今内府执事不下千余,乞依旧制裁减冗滥,广仁爱之心,省靡费之患”<sup>⑥</sup>。奢华惊人的宴会,是元朝蒙古统治集团所一向爱好的,而这种宴会,到了顺帝初年,颇为频繁<sup>⑦</sup>。甚至到了元末农民战争期间,即至正二十年(一三六〇年)天寿节时,尽管大

① 《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郑介夫上一纲二十目》。

② 张养浩:《时政书》,《归田类稿》卷二。

③ 《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④ 赵翼:《元时崇奉释教之滥》,《陔余丛考》卷一八。

⑤ 《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⑥ 《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

⑦ 苏天爵:《灾异建白十事》,《滋溪文稿》卷二六。

都大饥,人民已到了“父子有相食者”的地步,而元朝统治集团却照例狂宴于庙堂之上<sup>①</sup>。

上述宫廷内的挥霍浪费是与元朝皇帝对诸王、公主、后妃、勋臣的巨额赏赐有密切联系的。元朝皇帝为了显示他的权威,固然用优厚的赏赐作排场,但更重要的目的是企图用巩固贵族、官僚集团之间的团结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以贵族弘吉剌氏为例,一二三六年时一次赏赐就有济宁路及济、兖、单三州,巨野、郓城、金乡、虞城、砀山、丰县、肥城、任城、鱼台、沛县、单父、嘉祥、磁阳、宁阳、曲阜、泗水十六县作为其分邑;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又赐福建汀州路长汀、宁化、清流、武平、上杭、连城六县。至大元年、二年(一三〇八年、一三〇九年)又有很多增赐。其五户丝、金钞之数,以一二三六年赐济宁路三万户为例,每年有丝二千二百多斤,钞一千六百锭<sup>②</sup>。对诸王的赏赐数量更多。这种毫无节制的滥赏,造成元朝政府沉重财政负担,所以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年)正月时中书省就提出“朝廷赏赉不宜滥及罔功”<sup>③</sup>;七月,监察御史也惊呼财政支出较岁入多出数倍<sup>④</sup>;八月,中书省不得不采取措施,减少恩赏<sup>⑤</sup>。然而,尽管财政十分拮据,赏赐却始终没有停止过。文宗就前后将平江官田赏赐给权臣燕铁木儿、平章黑驴、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笃麟帖木儿、鲁国大长公主等。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曾赐给宗王、贵族大量田地,伯颜前后共得赐田达两万顷之多。这些皇亲、勋臣并不以获得大量赏赐而满足,他们在地方上则更加贪残,以忽必烈之孙、威顺王宽彻普化为例,“文宗天历初,赐宽彻普化金银各五十两,币三十匹,仍镇湖广,而宽彻普化纵怯薛等官侵夺民利,民颇患苦

① 《元史》卷一九六,《丁好礼传》。

② 《元史》卷一一八,《特薛禅传》。

③ 《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④ 《元史》卷三一,《明宗纪》一。

⑤ 《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之”<sup>①</sup>。因此,这种赏赐的后果,一是加速政府的财政危机,二是使这批皇亲国戚、贵族勋臣成为寄生虫。

皇帝和贵族的腐化,引起了连锁反应,元朝的地方官府和官吏也急遽地暴露出各种腐朽性。早在元贞年间,时人就指出了世祖忽必烈时期的如下“时弊”：“官吏奸贪,盗贼窃发,士鲜知耻,民不聊生,号令朝出而夕更,簿书斗量而车载。庠序不立,人材无自出之由;律令不修,官府无常守之法。舍真儒、用苛吏,弃大本而求小功,空中国而事外夷,取虚名而获实祸”<sup>②</sup>。其中官吏贪赃则愈演愈烈。到元朝末年时,“官贪吏污”竟发展成“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日曰‘追节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sup>③</sup>。在这种贪官污吏控制下的官府其名声自然是“赃污狼藉”极了,老百姓作诗嘲曰:“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sup>④</sup>。甚至连元顺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系狱之囚,冤抑莫释;在位之士,奸恶犹存”<sup>⑤</sup>。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随着元朝统治集团的日益腐朽,元朝军队也急遽腐朽,丧失战斗力。元武宗时,全国统一已三十余年,“承平日久,将骄卒惰,帅领不得其人,军马安置不当”<sup>⑥</sup>的情况出现了。这些将帅,多半是“累世承袭”的将家之子,“诸将沿禄,军士多失训练”,于是军纪愈益败坏,天历时,就有“所至抄掠”的记载<sup>⑦</sup>,甚至出现“兵白昼挥刀戟走市,怖人夺资货”,“纵

① 《元史》卷一一七,《宽彻普化传》。

② 刘壎:《元贞陈言》,《隐居通议》卷三一。

③ 《草木子》卷四下,《杂俎篇》。

④ 《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⑤ 《宪台通纪续集》《作新风宪制》。见《永乐大典》卷二六〇九。

⑥ 《元史》卷九九,《兵志》二,《镇戍》。

⑦ 邵亨贞:《汪从善行状》,《野处集》卷三。

火焚庐舍,横甚,自郡守以下皆畏噤不敢治”<sup>①</sup>的现象。这种现象愈演愈烈,泰定帝时,许有壬上《正始十事》,其中提到当时军队的败坏:“卒以日惰,将日以钝。将帅袭其父祖旧部,例皆膏粱乳臭之子,声色是务,朘剥是习,至有不能挽弓者”<sup>②</sup>。元末明初人叶子奇把元朝军队的腐败归纳为:“元朝自平南宋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佚,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之不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sup>③</sup>果然,到元末兵起时,这支军队,“将帅因败为功,指虚为实,大小相谩,上下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赏则同。是以有覆军之将、残民之将、怯懦之将、贪婪之将,曾无惩戒,所经之处,鸡犬一空,货财俱尽”<sup>④</sup>。这样的军队当然是不堪一击的。

元朝的统治,由于统治集团和各级官吏的腐败,大大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发展。到了元朝末年时,这种矛盾终于进一步激化。朱元璋说:“近睹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求,罪以情免,台宪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sup>⑤</sup>。他把元朝整个统治集团的腐败做了生动的概括。

## 二 对人民的控制和防范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sup>⑥</sup>。尽管元朝的国家机器日益腐朽,但它对人民的控制和防范却始终没有放松过,始终行使着镇压、剥削被压迫阶级的职能。

---

① 宋濂:《吴先生碑》,《宋学士文集》卷六三。

② 许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

③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④ 《元史》卷一八六,《张桢传》。

⑤ 吴宽:《平吴录》。

⑥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八页。

元朝政府为了达到对人民进行控制和防范的目的,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组织,从法律到种种法令,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政府原来规定“催差办集自有里正主首,其社长专使劝课”,后来将社长、里正、坊正和主首等统统用来充当监督、防范和压制人民反抗的鹰犬。为防止这些人出力不勤,元朝政府又对他们作了种种责罚的规定。下列史实可为证明:

元政府禁止百姓“起集买卖”,为的是恐集场“妨农滋盗”,“生事不便”。延祐六年(公元一三一九)明文规定:“起意聚众立集场唱词”,“为首犯人决四十七下,禁治不严亲民州县正官各决一十七下,当该社长、主首邻佑人等决二十七下”<sup>①</sup>。

元政府规定,印造伪钞,“坊里正、主首、社长失于觉察,并巡军兵各决四十七下”<sup>②</sup>。

元政府对民间“祈赛神社、扶鸾祷圣、夜聚明散等事”也是怕得要死,于是下令禁治,对“若有违犯之人,许诸人告发到官。为首正赛者笞决五十七下,为从者各减一等。坊里正、主首、社长有失铃束,知而不行首告者,减为从者罪一等”<sup>③</sup>。

元代老百姓习学枪棒,更是犯了元朝统治者的大忌,他们深怕由此导致“风俗咨悍,狂妄之端,或自此生”,所以下令禁治,如果发现社长知情故纵,则要处以“减犯人罪二等”的责罚<sup>④</sup>。

元代“警迹人”,按元政府的规定,系交地方由老百姓监督其行为。如果其中有人符合了元朝统治者所规定的“改恶从善”的要求,则可以除籍,但需由主首、邻佑保申方可<sup>⑤</sup>。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元代的里、社确实充当了统治

① 《元典章》卷五七,《禁罢集场》。

② 《元典章》卷二〇,《住罢银钞铜钱使中统钞》。

③ 参见《元典章》卷五七,《祈赛神社》。

④ 《元典章》卷五七,《禁治社众习学枪棒》。

⑤ 见《元典章新集》,《刑部》《盗贼通例》。

阶级用以防范和压制人民反抗的工具。

另外,元朝政府又采取多种措施,对人民进行军事镇压。

对全国诸要冲之地,设兵镇戍,是元朝统治者进行军事镇压的最重要的方法。早在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蒙古统治者以武力征服四方,就往往采用此法。等到忽必烈统一全国以后,乃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对河洛、山东一带的“天下腹心”之地,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对于江、淮以南直到南海之地,则名藩列郡,又各以汉军及新附等军戍守<sup>①</sup>。至于那些在统治者看来是特别重要的地方,更是派重兵驻守。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年)二月,分兵戍守江南,自归州(今湖北秭归南)以及江阴至三海口(长江口)一线上,戍所就有二十八所之多<sup>②</sup>,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年)十一月,元朝统治者因扬州、建康、镇江三城,跨据大江,人民繁会,竟置七万户府。又因杭州系行省诸司府库所在,置四万户府。对于濒海沿江的要害地区的水军驻所则由原来的十所增加为二十二所,将钱塘江海口的战舰由原来的二十艘增加到百艘、海船二十艘<sup>③</sup>。

在派兵镇戍全国诸要冲的同时,元朝统治者又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屯田,所谓“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无疑,这是维持当时庞大的镇戍军给养的一个重要措施。元朝屯田的规模,较前代有所扩大和发展,特别是和林等边远地区的屯田是如此。因此形成了当时“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的到处屯兵耕地的局面<sup>④</sup>。

除以镇戍及屯田镇压各族人民外,元朝统治者又千方百计解除各族人民的武装,大肆搜刮民间兵器。元朝政府禁止汉人持有兵器,对汉人、南人民户

---

① 参见《元史》卷九九,《兵志》二。

② 《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

③ 《元史》卷九九,《兵志》二。

④ 以上均见《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



所有的铁尺、铁骨朵及带刀子的拄杖,一律加以没收<sup>①</sup>。甚至连农家从事生产劳动的必用之物——农具铁禾叉,也要加以禁治,原因是“恐因别生事端”,真是可笑到了极点<sup>②</sup>。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年),经刑部议定,凡民间各处庙宇中供神用的鞭、简、枪、刀、弓箭等真军器以及锣鼓、斧、钺仪仗等物,一律加以禁止,而只准用“土木纸彩等假物代之,以寓事神之意,如有违犯之人,捉拿断罪”<sup>③</sup>。元朝政府规定,铠甲、弓箭不能私自隐藏,违者严惩,至元五年规定:甲私有全副者处死;不成副决杖五十七下,徒一年;零散甲片,不堪穿吊御敌者笞三十七下。枪或刀弩私有十件者处死;五件以上杖九十七下,徒三年;四件以下杖七十七下,徒二年;不堪使用杖五十七下。弓箭私有十副者处死(每副弓一张,箭三十只);五副以上杖九十七下,徒三年;四副以下杖七十七下,徒二年;不成副杖五十七下<sup>④</sup>。

为了防制汉族人民的武力反抗,元朝统治者曾三令五申禁止汉人、南人拿弓箭及军器。如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年)规定,“除弓人外,别个汉儿人每弓箭军器不交执把”<sup>⑤</sup>。到了至大三年(一三一〇年)七月,御史台又奏称:“但有姓的汉儿、蛮子,弓箭、军器禁了者,拏的人依在前体例,要罪过者”<sup>⑥</sup>。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年)更规定“汉儿人不得悬带弓箭围猎”,违者办罪<sup>⑦</sup>。

元朝政府不仅禁止一般汉人、南人持有军器,而且对为其统治服务的汉族官吏,以及直接充当其军事镇压的工具的汉族士兵,也是百般防范,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年)五月,分汉地及江南所拘弓箭兵器为三等,下等的销毁,中等的赐近居蒙古人,上等的贮于库,归当地行省、行院、行台执掌,如无行省、行

① 《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元典章》卷三五,《禁递铺铁尺手枪》。

② 《通制条格》卷二七,《禁约军器》。

③ 《通制条格》卷二七,《供神军器》;《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

④ 《元典章》卷三五,《隐藏军器罪名》;另可参见《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

⑤ 《元典章》卷三五,《禁治弓箭弹弓》。

⑥ 《通制条格》卷二七,《兵仗应给不应给》。

⑦ 《元典章》卷三八,《汉儿人不得悬带弓箭围猎》。

院、行台的地方,则归达鲁花赤、畏兀、回回居职的执掌,“汉人、新附人虽居职者无有所予”<sup>①</sup>。至元二十三年江西行省规定,新附弓手的兵器,平时存放库中,“遇有盗贼生发”而需用武器时,遂视情况缓急而逐渐关拨,一等到军事行动停止,所持兵器仍旧还库存放,“仍令本处达鲁花赤提调施行”,兵士不能继续持有武器<sup>②</sup>。到了元仁宗皇庆年间,对新附军人的军器管理,基本上仍是采用这种办法<sup>③</sup>。

元朝政府不仅禁止汉人、南人持有军器,而且对色目人的军器,有时亦加以拘禁。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年)有一僧官任速,系河西色目僧人,于襄阳路房州普济寺安身,该僧有环刀一口、弓箭一把、红油枪一条。这些军器也被拘禁<sup>④</sup>。按照元朝政府的规定,并无拘禁色目人军器的体例,但是此河西色目僧官任速的军器却仍被拘禁了,理由是:“剃发僧人,修祝为善,执把弓箭、环刀、军器,若不拘禁,虑恐因而别生事端”<sup>⑤</sup>。其实这些所谓“理由”的前面语句都是借口,只有最后一句“虑恐因而别生事端”才是问题的实质。由此说明一个问题:在元代,尽管是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待遇各不相同,但一旦元朝统治者认为谁将对它不利时,即使是平日规定可以拥有军器的色目人,到时候亦得将其军器拘禁,这说明了在阶级利益的面前,民族差别并无多大意义。

元朝政府千方百计对各族人民的军事镇压,并没有能压服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有元一代各族人民对元朝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进行了彼伏此起的不断起义和反抗,直至元朝的最后灭亡,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

① 《元史》卷一三,《世祖纪》一〇,又可参见《元典章》卷三五,《达鲁花赤提调军器库》。

② 《元典章》卷三五,《拘收弓手军器》。

③ 《元典章》卷三五,《拘收新附军人军器》。

④ 《元典章》卷三五,《拘禁僧人弓箭》。

⑤ 同上。

### 三 劳动人民的苦况

在封建国家机器的严格防范和控制下,在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下,元代劳动人民的苦况是罄竹难书的。

元代的土地占有状况表明,诸王贵族、官僚、寺院、私家地主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的耕地,土地掠夺和兼并在元朝建立过程中和元朝建立后始终在进行中。如元朝统一江南后,带兵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sup>①</sup>,福建“那里的官人每、富户有势的人每,将百姓每田地占着,教百姓每佃户不教当杂泛差役”<sup>②</sup>。可见,自耕农丧失土地而沦为佃户的现象相当普遍。余下的一些自耕农,是繁重赋税和差役的主要承担人。文宗天历年间(一三二八至一三三〇年),苛捐杂税就比至元和大德时增加了二十倍<sup>③</sup>。顺帝时,有些破产的农民,虽然已是“田入他户”,但仍需照样纳税,没法之下,只得“逃之四方”<sup>④</sup>。即使是遇到严重灾荒年代,统治阶级的官吏依然如虎似狼,颗粒必征<sup>⑤</sup>。除赋税外,元代自耕农的力役负担也极为沉重。有田的地主富户,本当负担力役,但他们千方百计设法逃避,而将它转加于农民身上,结果使“闾左之民”“破产无算”<sup>⑥</sup>。元末力役名目繁多,除统治者大兴土木等需人民去服役外,严冬腊月,还要去筑河堤,致使“手足血流肌肉裂”<sup>⑦</sup>,不胜其苦。可见,元代自耕农的境遇是每况愈下,尽管他们日夜辛勤耕织,但是,繁重的赋税,沉重的差役,高利贷的剥削等,使他们落得“囊中无钞瓮无粟”,被逼卖儿鬻女。

① 《元史》卷九九,《兵志》二,《镇戍》。

② 《通制条格》卷二,《官豪影占》。

③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④ 杨翮:《唐县尹生祠记》,《佩玉斋类稿》卷二。

⑤ 余阙:《送樊时中赴都水庸田使序》,《青阳集》卷四。

⑥ 余阙:《宪使董公均役之记》,《青阳集》卷九。

⑦ 廼贤:《新乡媪》,《金台集》卷一。

元代佃农的状况甚为悲惨。租种官田的佃农,租额不断增加,以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年)江南湖广的情况为例,原先租额是每壹拾亩地纳三石谷,但后来“每壹拾亩添作陆石”,“如今本道按摊不花监司”,“添做拾分取要”<sup>①</sup>。所以,在此时就有因缴不起官租而被迫卖儿鬻女的现象<sup>②</sup>。泰定、文宗之际,福建一带的职田租额,每亩竟有高达三石米之多的,佃农无法,只得“破产偿之”<sup>③</sup>;而且职田的官粮是“不论丰歉,多是全征”<sup>④</sup>的,这就使得官田佃户遇到灾荒年代,更是无法活命。元顺帝在至元六年(一三四〇年)和至正七年(一三四七年)所下的诏书中,也一再承认“职田扰民”和“病民为甚”<sup>⑤</sup>的事实。

元代租种私家地主土地的佃农,其境遇并不比官田佃户为好。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年)的资料表明,地主对地客(即佃户)可任意科派,“其害甚于官司差发,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为婢使,或为妻妾”。峡州路(治今湖北宜昌)的地主,“辄敢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不立年份,与买卖驱口无异”,有些狡猾的地主,将荒远田地,“夹带佃户典卖,称是‘随田地客’,公行立契外,另行私立文约”。更有甚者,江南“佃户男女婚姻,主户常行拦当,需求钞资布帛礼数,方许成亲。其贫寒之人,力有不及,以致男女怨旷失时,淫奔伤俗”<sup>⑥</sup>。元末穷苦农民(包括佃农)的境况,以朱元璋早年时的家境为例,即可知一斑。他在《皇陵碑》中追忆说,他父子备尝农业艰辛,朝夕彷徨,至正四年(一三四四年)天灾流行,父、母、长兄相继死亡,仲兄与他遭到田主凌辱,无力殡葬亲人,在邻居帮助下才算草草了结丧事,兄弟二人在家无法度日,只得分手,各自谋生。再如黄溥《闲中今古录》记载,元末浙江黄岩地

① 《通制条格》卷一三,《俸禄职田》。

②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三,《检田吏》。

③ 苏天爵:《齐履谦神道碑》,《滋溪文稿》卷九。

④ 《元典章》卷一五,《职田佃户子粒》;《通制条格》卷一三,《俸禄职田》。

⑤ 《宪台通纪续集》《作新风宪制》、《公田折价》,均见《永乐大典》卷二六〇九。

⑥ 均见《元典章》卷五七,《禁主户典卖佃户老小》。

区,贵贱等分甚严,佃农见到地主,连当面施礼作揖都不敢,压迫之重可见!甚至佃农的生命都毫无保障。元律规定,地主打死佃客,仅“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sup>①</sup>即算了事。当时虽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样做可能“启权豪兼并之家妄杀无辜佃客之门,垂历代杀人无赦之禁”,因而主张“理合讲究定例”,但最后仍未被统治者所采纳,所谓理由是:“地主毆杀佃客,其情轻重不同,难以一体定拟”<sup>②</sup>。元律还规定:主人误伤佃妇致死,只需挨“七十七下,依例追烧埋银五十两给主”就算完事<sup>③</sup>。可见,元代佃客的生命如同草芥,地主打死佃客根本毋须“杀人偿命”,相反,还可得到法律的宽恕,所谓“其轻重不同”和“误伤佃妇致死”等,均是为地主阶级中的杀人犯开脱罪责的遁辞。

驱口是元代的一个特殊阶层。在北方称“驱口”,在南方作“奴婢”,名不同而实则一。其来源大体有:初为战俘和掳掠所得,后为贩卖人口、官家籍没和贫富分化所致,包括蒙古平民因贫困而沦为奴婢的人在内。《元典章》载,色目人在江淮迤南地面“将南人男女,以转房乞养为名”,贱价“诱致收养”,然后到迤北“货卖作驱”,据当时差遭到江西的监察御史的估计,“不一二年,良人半为他人之驱矣”<sup>④</sup>。可见程度之严重。这一阶层的境况极苦,地位极低,“与牛马无异”;他们的财产,主人可任意侵占<sup>⑤</sup>。主人可以将他们任意转卖,如上饶人何和尚的母亲,在丙子(一二七六年)战乱中失散沦为奴婢后,十二年中被主人转卖了三次,历尽艰苦,最后方被其子寻归<sup>⑥</sup>。整个元代,奴婢的生命毫无保障,据《元史·刑法志》载:“诸故杀无罪奴婢,杖八十七,因醉杀之者,减一等。诸毆死拟放良奴婢者,杖七十七。”“诸良人以斗毆杀人奴,

① 《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

② 参见《元典章》卷四二,《主户打死佃客》。

③ 《元典章》卷四二,《主误伤佃妇致死》。

④ 《元典章》卷五七,《典雇男女》。

⑤ 陶宗仪:《辍耕录》卷一七,《奴婢》。

⑥ 赵文:《何和尚寻母并序》,见查慎行:《西江志》卷一二〇,《艺文·诗》。

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诸良人戏杀他人奴者,杖七十七,征烧埋银五十两。”<sup>①</sup>总之,主人和“良人”杀了奴婢,均不需偿命,而仅是打几个板子就可了事。

逃亡是奴婢反抗主人的一种方式,可是元律规定,这种逃亡的奴婢一旦被其主人捉住后,主人就可将他们打死,至于凶手本身,仅挨七十七下就可无事<sup>②</sup>。元律又规定:“诸奴殴詈其主,主殴伤奴致死者,免罪”<sup>③</sup>。这就是说,元代奴婢们只能听凭其主人的压迫和剥削,不能反抗,如有“殴詈其主”的反抗行为,而遭其主殴伤致死的,其主人可以“免罪”而逍遥法外。在此规定下,不知有多少奴婢,惨死于其主的毒打之下!《元典章》载,有馱口因遭其主人打骂,从而反抗,于夜间用斧“砍伤本使”,结果该馱口被判“处死”。理由是“理同谋杀他人定罪。旧例:谋杀人已伤者绞”<sup>④</sup>。元代法律又规定,“奴婢有罪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若有愆罪决罚致死者勿论”<sup>⑤</sup>。乍看起来,这似乎是对主人残杀奴婢的行为有所惩戒,但实际上,奴婢占有者们据此可任意处死奴婢,届时只要凭着“若有愆罪决罚致死者勿论”的规定,就可逍遥法外。

元代负责驿站供役的站户,其处境甚苦。早在忽必烈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年)六月,临洮、巩昌(今甘肃陇西)等地的站户,就因“供役繁重”而“质卖子女”以供役<sup>⑥</sup>。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年)三月甘肃永昌路又出现站户饥乏,卖儿鬻女的现象<sup>⑦</sup>。元贞元年(一二九五年),哈尔滨地界的狗站,“站

① 均见《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

② 参见《元典章》卷四二,《杀放良奴》。

③ 《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

④ 参见《元典章》卷四一,《驱奴砍伤本使》。

⑤ 《元典章》卷四二,《殴死有罪驱》。

⑥ 《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

⑦ 《元史》卷一六,《世祖纪》一三。

狗多死”“转致损乏，站户苦之”<sup>①</sup>。武宗至大四年（一三一一年）二月，河西地面的色目站户，因供役繁重，加之灾荒而“破家荡业”，“致将亲属男女，于权豪势要富实之家典卖驱使”，“其间情苦，不可胜言”<sup>②</sup>。文宗至顺元年（一三三〇年）辽阳行省水达达路水灾，致使末鲁孙一十五狗驿，狗多饿死<sup>③</sup>，无疑也给站户带来灾难。到了至正七年（一三四七年）七月，元顺帝在其所颁圣旨中供认：“比年诸衙门给驿泛滥，以致站户屡金屡亡”<sup>④</sup>。这些记载表明，整个元代站户的境遇，自始至终都是惨苦的。

元代盐利为政府所垄断，但从事制盐的灶户的境况却并不佳，早在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年）十二月，就有灶户贫乏靠赈济勉强度日的<sup>⑤</sup>。再以元末两浙三十四所盐场灶户的境遇为例，“火丁用工之时，正当炎暑之月，昼夜不休，才值阴雨，束手彷徨，贫穷小户，余无生理”，加之官府“又复差充他役，各场元金灶户一万七千有余，后因水旱疫病，流移死亡，止存七千有余。”<sup>⑥</sup>损失了一大半，可见其处境之艰苦。此外，元代还有一些人户，他们的处境同样悲惨。如担当运粮的车户、船户，他们往往“昼夜奔驰犹不能给”，坝夫也是“肩背成疮，憔悴如鬼，甚可哀也！”<sup>⑦</sup>。

综上所述，广大劳动人民遭受的剥削和压迫是极其沉重的。特别是农民，他们只有很少土地，甚至完全没有土地，他们是繁重赋税、各种差役的主要负担者，租种地主土地则要向地主缴纳沉重的地租，他们终年勤劳而不得温饱，处于卖儿鬻女、抛家弃业的境地，遇到灾荒年代，更是成批死亡或逃亡，经常出现“人相食”、“父子相食”的悲惨情景。

① 《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页一〇。

② 《元典章》卷五七，《站户消乏转卖亲属》。

③ 《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

④ 《宪台通纪续集》《作新风宪制》，见《永乐大典》卷二六〇九，页一七。

⑤ 《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

⑥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

⑦ 《元史》卷一八三，《王思诚传》。



## 第四节 元朝的民族压迫

### 一 民族分化政策

蒙古统治者为了始终保持其最高统治权力,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在推行阶级压迫的同时,又推行了民族压迫政策。民族分化政策是民族压迫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民族分化政策并非开始于元朝。金朝女真统治者任用掌管兵权、钱谷官吏,即规定了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的四等级顺序<sup>①</sup>。控制元朝政权的蒙古贵族,他们在吸收前朝推行民族分化政策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民族和被征服的先后,把全国各族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在任用官吏、法律地位、科举名额和待遇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等方面都有种种不平等规定。这种人分四等的制度,是元朝法定的等级制度。其有关规定分散于各具体政策中,如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年)夏四月,中书省、御史台建言,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参以色目、汉人。成宗从其议<sup>②</sup>。武宗至大二年(一三〇九年)四月圣旨规定,各地达鲁花赤之职需委付蒙古人担任,若无,则于有根脚色目人内选用<sup>③</sup>。仁宗皇庆二年(一三一三年)所定科举条例,在考试程式、录取名额及发榜办法等方面,对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均做了不平等的规定<sup>④</sup>。

第一等蒙古人为元朝的“国姓”,蒙古统治者称之为“自家骨肉”。据拉施

---

①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七三,海天书店一九三九年本,第二册,页三九六。

② 《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

③ 《元典章》卷九,《吏部三》,《有姓达鲁花赤革去》。

④ 《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

都丁《史集·部族志》记载,蒙古人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与成吉思汗皇室(属乞颜氏)出于共同祖先的尼鲁温蒙古人,有泰赤乌、兀鲁、忙兀、札只刺(札答兰)等二十余部;一是被称为迭列列斤的蒙古人(一般的蒙古人),有兀良哈、弘吉刺、伯牙兀等十余部<sup>①</sup>。此外,札刺亦儿、塔塔儿、蔑儿乞、斡亦刺、八剌忽、克烈等部,元代也被视为蒙古人。陶宗仪《辍耕录》载蒙古氏族七十二种<sup>②</sup>,内有重复、误入及漏列者,钱大昕《元史氏族表》即指出其中的十八种系相互重出。

第二等为色目人。《辍耕录》称有三十一种,如钦察、唐兀、阿速、秃八、康里、畏吾儿、回回、乃蛮、乞失迷儿等<sup>③</sup>。然其中亦有同名重出或异译并存之误。大德八年规定,除汉儿、高丽、蛮子外,俱系色目人<sup>④</sup>。

第三等为汉人,又称汉儿、乞塔、札忽歹,概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较早为蒙古征服的云南、四川两省人,高丽人也属于这一等。据《辍耕录》载,汉人有八种,即: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朮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sup>⑤</sup>。

第四等为南人,又称蛮子、囊加歹、新附人,指最后为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内(元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和河南行省南部)各族。汉、南人绝大部分都是汉族,元代蒙古统治者根据被征服的先后将其分为两等,利用汉人压制南人,以便分而治之。

四等人的政治待遇及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蒙古人居最高统治地位,享有特殊权益;色目人中的上层分子是被蒙古统治者利用为统治全国各族人民的得力助手,所以色目人在政治上及社会地位上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南

---

① 尼鲁温诸部参见《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页一七八、一八〇、一八四、一九〇等;迭列列斤诸部见同书,页一五三、一五六、一七五等。

② 《辍耕录》卷一,《氏族》,页一二。

③ 《辍耕录》卷一,《氏族》,页一三。

④ 《元典章》卷四九,《刑部一一》,《女直作贼刺字》。

⑤ 《辍耕录》卷一,《氏族》。关于元代汉人译名参见陈寅恪:《元代汉人译名考》,《国学论丛》卷二,第一号,一九二九年。

人;汉人除了少数官僚地主投靠蒙古统治者而被笼络利用外,其余广大人民与南人同样是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南人在四等人中处于最末一等,他们的地位更不如汉人,连充任官吏的南人在与汉人出身的官吏发生争执时,也要忍气吞声。蒙古、色目贵族利用民族压迫政策欺凌汉人、南人,广大汉人、南人劳动人民更处于最受压迫和剥削的情况之下<sup>①</sup>。

蒙古统治者实行民族分化和民族压迫的政策,目的只是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地位,丝毫没有给广大蒙族劳动人民带来好处。元代蒙古平民和汉、南人中的劳动人民一样是受压迫受剥削的,贫苦的蒙古人甚至被贩卖到异乡和海外做奴隶。早在忽必烈至元年间,即有被当做商品,从泉州港贩卖到“回回田地”和“忻都(今印度。——引者)田地”<sup>②</sup>去的。大德七年(一三〇三年)元政府明文规定,对不畏公法将蒙古人口贩入番邦博易的人要严行治罪,并命令市舶司官员,对出洋船只开航之际,要用心检搜,发现“如有将带蒙古人口,随即拘留,发付所在官司解省”<sup>③</sup>。这样严厉的规定正说明了当时贩卖蒙古人口到海外的事态之严重。延祐七年(一三二〇年)的情况表明,有回回、汉人、南人典买蒙古子女为驱的现实,以致在至治改元诏内有“诏书到日,分付所在官司应付口粮,收养听候,具数开申中书省定夺”<sup>④</sup>的规定。

色目人虽是第二等人,但他们中间的劳动人民,当然也不会从民族分化政策中获得什么好处。至大四年(一三一一年)二月,河西地面的色目人站户因经受不住繁重的负担,加之天灾人祸而破家荡业,“致将亲属男女于权豪势要富实人家典买驱使,不能完聚”<sup>⑤</sup>。

元朝的汉人、南人中间的广大劳动人民,备受蒙古、色目统治阶级以及本

① 分别参见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② 《通制条格》卷二七,《蒙古男女过海》。

③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杂禁》,《禁下番人口等物》。

④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禁典雇》,《禁典买蒙古子女》。

⑤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禁诱略》,《站户消乏转卖亲属》。

民族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是苦难最深重的人。忽必烈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年),色目人在江淮迤南一带,“将南人男女以转房乞养为名”,贱价“诱致收养”,然后到迤北“货卖作驱”。据当时被派往江西的监察御史的看法,“不一、二年,良人半为他人之驱矣!”<sup>①</sup>说明程度之严重。延祐年间兴和驿卒佟锁住向元朝官吏张养浩诉说的一段经历,就是元代被掠卖到北方做奴的南人的斑斑血泪史。他自称:本江西泰和人,七岁时候与群儿在里中玩耍,被过路骑兵抢掠带往兴和,初被卖于刘家,居不数月,又被卖往更北的草地做牧奴,主人是蒙古人,给他取了个蒙古名叫察罕,发给他皮衣一袭,交给他二千余头羊,令他每日放牧,且告诫他说,“羊有瘠者、伤者、逸者、无故物故者,必挞汝!”开头放牧之时,往返数十里,既怕迷路,又怕丢失羊只,担惊受怕,年纪又小,其惨状不难想象。后见同伴牧奴中还有十数个和他同命运的南方良家子,也是被贩卖去的。十六岁那年,因羊群发生死伤,自知难免受责,乃决意南逃,一路上忍饥挨饿,好不容易到了兴和充当驿卒。后又赖张养浩之力,始得回乡<sup>②</sup>。像佟锁住这样悲惨经历的汉人、南人为数甚多。

## 二 政治上的防制

元朝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在政治上实行多方面的防制。即使是对于作为他们统治全国各族人民有力支柱的汉族封建统治阶级,也是处处防范,给予他们有限的参加政权的机会。《元史·百官志》说,元朝的中央或地方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sup>③</sup>。虽然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但确实反映了一般的情况。

元朝中央统治机构中,总揽全国政务的中书省,掌军事的枢密院,司黜陟

---

①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禁典雇》,《典雇男女》。

② 张养浩:《驿卒佟锁住传》,《归田类稿》卷一一。

③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

监察的御史台,这三个部门的重要正官,非蒙古人不授。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一职,由太子担任。右、左丞相是统六官,率百司最高行政官,中书令缺,“则总省事,佐天子,理万机”<sup>①</sup>。汉人任此右、左丞相的,只有忽必烈时的史天泽和妥懽帖睦尔即位后的贺惟一。史天泽曾率领汉族地主武装为蒙古统治者“躬擐甲胄,跋履山川”,攻占了不少土地,因而成为“元勋宿望”,得到蒙古统治者的信任;贺惟一任中书左丞相前,元朝蒙古统治者即特赐他蒙古姓氏,改其名曰太平,说明他亦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充分信任。枢密院的最高官员是枢密院使,亦由皇太子兼领此职,《辍耕录》称“惟皇太子立,必兼中书令、枢密使”<sup>②</sup>。而掌实权的知枢密院事及同知枢密院事,终元之世,无一汉人担任,“以兵籍系军机重务,汉人不阅其数”<sup>③</sup>。当然汉人没有资格任此要职了。御史台的最高官员为御史大夫,这一权力也从未落入汉族地主官僚之手,所谓“台端非国姓不以授”,只有汉人贺惟一于至正六年拜御史大夫的一个例外,还是蒙古统治者专为他赐了蒙古姓而改其名才担任此职的<sup>④</sup>。各道廉访司也必择蒙古人为使,蒙古人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补充,其次才参以色目、汉人。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年)四月,元朝最高统治集团曾对此做了明文规定<sup>⑤</sup>。元文宗图帖睦尔时,曾下诏御史台,“凡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各一人”<sup>⑥</sup>。即使是如此,汉人能充任此职的,也仅及六分之一。至于地方统治机构路、府、州、县,均设有唯蒙古人、色目人才能担任的达鲁花赤执掌实际权力。至元二年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sup>⑦</sup>。元朝统治者曾三令五申严禁和革罢汉人、南人、女

①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

②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二,《皇太子署牒》。

③ 《元史》卷九八,《兵志》一。

④ 见《元史》卷一四〇,《太平传》。

⑤ 见《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

⑥ 《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

⑦ 《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真、契丹人充任达鲁花赤,至元五年、六年、十六年都有禁令下达,大德八年(一三〇四年)三月,元成宗铁穆耳下诏:“诸王、驸马所分郡邑,达鲁花赤唯用蒙古人,三年依例迁代,其汉人、女真、契丹名为蒙古者皆罢之”<sup>①</sup>。大德十一年江南行台发下福建廉访分司的一个文件说:“近据江西道申察,知建昌路南城达鲁花赤伯颜系是南人,问得本人姓黄祖太,所招情词即系违制,拟合革罢”<sup>②</sup>。即是地方执行元朝最高统治者诏令的实例之一。至大二年(一三〇九年),元朝统治者又重申:“各投下多是汉儿、契丹、女真做蒙古人的名字充达鲁花赤,今后委付蒙古人者,若无呵,于有根脚色目人内选用,钦此!”<sup>③</sup>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年),元朝政府又再次规定,“有姓汉儿达鲁花赤追夺宣敕,永不叙用”<sup>④</sup>。可见,元朝蒙古统治者,对于各级地方统治机构和各投下的掌实权的达鲁花赤一职,是严禁汉人、南人充当的。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例外。当遇地处南方,条件艰苦,蒙古人不愿和不敢去赴任达鲁花赤时,蒙古统治者就让汉人去充当了。至元二十五年十月,湖广省就遇到这种情况,“左、右江口溪洞蛮僚,置四总管府,统州、县、洞百六十,而所调官畏惮瘴疠,多不敢赴,请以汉人为达鲁花赤,军官为民职,杂土人用之。”“就拟夹谷三合等七十四人以闻”<sup>⑤</sup>,蒙古统治者也就同意了。

元廷的宿卫都是蒙古贵族及近幸之属,是蒙古最高统治者的亲信,他们出仕,不需循资援例,而可“待以不次”<sup>⑥</sup>,只要中禁一纸命令,便可躐等升迁,破格任用,中书仅是奉行制敕而已<sup>⑦</sup>。这些人尽管“生来一字都不识”<sup>⑧</sup>,但却位

① 《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

② 《元典章》卷九,《吏部·投下》《革罢南人达鲁花赤》。

③ 《元典章》卷九,《吏部·投下》《有姓达鲁花赤革去》。

④ 《元典章》卷九,《吏部·投下》《有姓达鲁花赤追夺不叙》。

⑤ 《元史》卷一五,《世祖纪》一二。

⑥ 《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

⑦ 姚燧:《送李茂卿序》,《牧庵集》卷四。

⑧ 朱思本:《观猎诗》,《贞一斋诗文稿》。

置省台要职。但由宿卫入仕之途,决非汉人,南人所能通达,因元朝蒙古统治者禁汉人、南人充当宿卫;即使有诸汉人、南人投充宿卫,总宿卫官加以收纳了,亦要遭到蒙古统治者的治罪<sup>①</sup>。

自唐宋以来,汉族地主知识分子一向是以科举作为参加政权的主要途径,故儒多不屑为吏,一心专攻科举业务。元朝统一中国后,罢废科举,闭塞了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入仕之途。直到元仁宗皇庆二年(一三一三年)科举才始恢复。但蒙古统治者在考选人才上又制造了种种民族不平等:在考试科目方面,规定蒙古、色目人仅考二场,而汉人、南人则需考三场。元制又规定:如“蒙古、色目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sup>②</sup>;在发榜方面,则蒙古、色目为一榜,而汉人、南人为另一榜;在录取名额方面也有许多不合理的规定:分明是汉人、南人参加考试的人数要比蒙古、色目人应试的人数为多,但四种人录取的名额却一样,本书第四章科举制度一节已有详述。汉儒入仕之难引起许多士大夫的不满,时人陈高在其《感兴诗》中哀叹道:“如何穷巷士,埋首书卷间,年年去射策,临老犹儒冠!”<sup>③</sup>加上朱思本所说的“儒生心事良独苦,皓首穷经何所补?胸中经国皆远谋,献纳何由达明主?”<sup>④</sup>这些确实是当时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境遇的写照。

### 三 民族压迫在法律上的反映

在元朝的法律条文中,民族压迫颇为突出,这是元朝法律的特点。军事政治的法令中民族压迫固然显著,民事法令条文中民族压迫也丝毫不加掩饰,反映在汉人和南人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而蒙古、色目人在与汉人、南人的冲突中,即使犯了罪,也能得到法律的明文保护。

---

① 见《元史》卷一〇二,《刑法志》一。

② 《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

③ 陈高:《感兴诗》,《不系舟渔集》卷三。

④ 朱思本:《观猎诗》,《贞一斋诗文稿》。



早在至元九年(一二七二年)五月,蒙古统治者就颁布了“禁止汉人聚众与蒙古人斗殴”的禁令<sup>①</sup>,以后又规定,“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违者严行断罪<sup>②</sup>。法律又规定,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只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就可了事<sup>③</sup>。蒙古人砍伤他人奴隶,知罪愿休和者听<sup>④</sup>。当时的元朝统治者,就是以这些“因争及乘醉”等字样,轻轻开脱了蒙古人犯杀人罪应得的惩处。法律又规定:蒙古人扎死汉人,只需打五十七下,征烧埋银,但是,“汉儿人殴死蒙古人”,则要处死,并“断付正犯人家产,余人并征烧埋银”<sup>⑤</sup>。同样是犯下一条命案,但因作案人所属的民族不同,其所应得之惩处竟如此悬殊!由此可见,“杀人者死”的法令,实际上仅是对汉人适用而已。不仅如此,元朝统治者规定:“蒙古人居官犯法,论罪既定,必择蒙古官断之,行杖亦如之。诸四怯薛及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盗、诈伪,从大宗正府治之”<sup>⑥</sup>。蒙古当官的犯了法,要选择蒙古官吏来断罪、行杖,其结果,当然免不了官官相护。

按元律规定,凡盗窃犯(已得财者)均要刺字,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强盗初犯刺项,并充警迹人,官司拘检关防一如旧法。“其蒙古人有犯及妇人犯者不在刺字之例”<sup>⑦</sup>。

元朝的法律虽然为蒙古、色目人规定了许多特权,但是真正利用法律到处横行不法的只是少数蒙古色目贵族,广大善良的蒙古、色目劳动人民与汉族劳动人民一样,同样过着非人的生活。

---

①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通制条格》卷二七,《汉人殴蒙古人》。

② 《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元典章》卷四四,《刑部六》,《蒙古人打汉人不得还》。

③ 《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

④ 同上。

⑤ 《元典章》卷四二,《刑部》《诸杀》。

⑥ 《元史》卷一〇二,《刑法志》一。

⑦ 《元典章》卷四九,《刑部》一一,《强窃盗贼通例》。

此外,有元一代,即使同为统治阶级内部,但因各人所属的民族不同,其子孙在荫叙上所受之待遇亦异,如大德四年(一三〇〇年)八月十八日,中书省奉圣旨,就规定,“色目人比汉儿人高一等定夺”。也就是“色目人比汉人优一等受荫”<sup>①</sup>。

## 第五节 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 一 元朝前期的人民反抗斗争(一二七一至一二九四年)

从元朝建立到忽必烈去世为止,二十三年间各族人民的反元斗争起伏此起,一直没有间断。在这一时期内,人民武装斗争大致可划分为两个时期:从元朝建立到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年)为第一阶段;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年)到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年)为第二阶段。

#### 灭宋前后的人民抗元斗争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加紧了对南宋的进攻,襄樊战役后,灭宋战争全面展开。为了适应军事行动的需要,元朝政府对北方各族劳动人民加紧剥削和压迫,驱使他们承担沉重的劳役和缴纳各种苛捐杂税。以河南一带为例,由于“军兴转输烦重”,连同军匠诸户在内,也要缴纳赋税,“权助财用”<sup>②</sup>。因此就必然激起北方各族劳动人民的反抗。与此同时,在南方,南下的元军在许多地方大肆屠杀和掳掠。“诸将市功,且利俘获,往往滥及无辜,或强籍新民以为奴隶”<sup>③</sup>。这种行径也理所当然地激起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起义群众“相煽以动,大或数万,小或千数,在在为群”<sup>④</sup>。这些就是这一阶段的斗争形势。

① 《通制条格》卷六,《荫例》。

② 参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③ 《元史》卷一七〇,《雷膺传》。

④ 姚燧:《贾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一。

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年)十一月,据元将董文用说:山东益都、彰德一带“妖人继发”,所在按察司、达鲁花赤及社长不能禁止,宜用连坐之法对付造反的人民。忽必烈采纳其意见,下诏推行之。同月,在京师也出现了“盗诈者众”的局面,致使忽必烈敕命“峻立治法”<sup>①</sup>。

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二月,洪福于淮西镇巢军起兵反元,杀元戍军将领阿塔赤及其所统军士。这次武装起义完全是由于阿塔赤所统阿速军的横暴,使当地人民不堪忍受而引起的。洪福本是降元的宋将,起义发生后,元朝政府利用其原来上司——淮西制置使夏贵,使之亲自出马,至城下招降,最后洪福被元将阿朮斩于军中<sup>②</sup>。

同年四月,南宋抗元将领张世杰从二王入福州,继续在福建境内抵抗元军。他联合畬族女英雄许夫人所率领的畬军以及汀州、漳州农民领袖陈吊眼所统率的起义畬军,共同进行抗元斗争<sup>③</sup>。这不仅扩大了反元队伍,而且使福建的抗元斗争为之一振,士气旺盛,致使元廷枢密院于是年六月上报,为江西都元帅宋都带求援<sup>④</sup>。

是年,河南许、蔡间还有李三率领的一支武装力量,人数众多,活跃在两河间。后为开封府尹陈祐镇压<sup>⑤</sup>。

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年)四月,福建汀州长汀人黄广德举行起义,自称天下都大元帅,刻都帅印,又立为天从广德皇帝,设铜将军、铁将军等名号。同年五月,南剑州沙县人谢五十也举行起义,自称擎天将军。不久均被元军镇压<sup>⑥</sup>。

① 《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② 参见《元史》卷九,《世祖纪》六;卷一三二,《杭忽思传》、《昂吉儿传》。

③ 参见《宋史》卷四五一,《张世杰传》。

④ 见《元史》卷九,《世祖纪》六。

⑤ 王恽:《陈公神道碑》,《秋涧集》卷五四。

⑥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江西》,《元文类》卷四一。

同年九月,舒民张德兴起兵响应文天祥抗元,攻破兴国(今湖北阳新)、德安诸郡,回据蕲州(今湖北蕲春)司空山。元廷派淮西宣慰使昂吉儿前往镇压,结果张德兴被杀,其三个儿子亦被捕,起义失败<sup>①</sup>。正当张德兴据司空山起义之际,鄂州属县人傅高亦起兵响应,击败元郑万户军,使之溺水死。但这支起义军经不住元朝留守鄂州的贾居贞的软硬兼施和分化瓦解,内部“上下猜沮”,人心离散,加上贾居贞的武装镇压,傅高只得逃往江西武宁一带;在该地,他又遭贾居贞传檄追捕,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改姓易名返回家乡,最后被元军捕获并惨遭杀害<sup>②</sup>。

与此同时,湖广一带的雷、琼、全、永(今湖南零陵)和潭州(今湖南长沙)属县文才喻、周隆、张虎、罗飞等起兵响应文天祥抗元,其中尤以罗、张、周三人为最强。他们“屠杀长吏”,聚民为兵<sup>③</sup>,规模“大者众数万,小者不下数千”。元廷发兵征讨,文才喻等被元将阿里海牙镇压<sup>④</sup>;罗飞率领的起义军围攻永州凡七个月,但始终未能攻克,后被元广南西道宣慰使史格击败<sup>⑤</sup>;至元十四年十二月,元潭州行省攻占起义军的据点祁阳县,罗飞被俘杀,起义告于失败<sup>⑥</sup>。

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年)六月,处州(今浙江丽水)张三八、章焱、季文龙等在青田、龙泉等七县发动起义。时季文龙、章焱起兵于青田,杀元官赵知府,季文龙自署为两浙安抚使,据处州天庆观。元处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赵贲亨率众围攻处州,起义军被迫弃城退出。章焱又集合二万人再攻处州,结果仍被元军战败,季文龙溺水而亡。另一支起义军是龙泉县张三八统率的,拥有二万

① 《元史》卷一三二,《昂吉儿传》;卷九,《世祖纪》六。

② 姚燧:《贾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一;《元史》卷一五三,《贾居贞传》。

③ 姚燧:《颍州万户邸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三。

④ 均见《元史》卷一二八,《阿里海牙传》。

⑤ 《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泽传》。

⑥ 《元史》卷九,《世祖纪》六。

人马,杀庆元县达鲁花赤也速台儿,但亦屡败于赵贲亨所统的元军。既而衢州陈千二聚众二万人,遂昌叶丙六亦聚众三千人相助。然均被赵贲亨镇压下去<sup>①</sup>。

至元十五年十一月,福建建宁政和县人黄华,组织盐夫,联络建宁、括苍及畚族许夫人领导的畚军,发动了汉、畚两族联合的反元斗争<sup>②</sup>。当时仅黄华统率的一支起义武装就有三万人,他们号称“头陀军”,扰乱元军占领的建宁等地。元朝最高统治集团调集了大批蒙、汉军队,于至元十七年由管军万户完者都统率前往镇压。完者都对黄华施行“剿”“抚”两手策略:一面以大兵压境,一面又诱以利禄,许以充任“副元帅”。这一招果然奏效,黄华暂时为完者都压服,并充任元朝的“征蛮副元帅”,曾参与对陈吊眼的镇压<sup>③</sup>。

此外,至元十五年还有江西李梓发据南安反元,江西参知政事贾居贞先对其群众进行分化瓦解,使李梓发陷于孤立,最后李梓发全家自焚而死,斗争归于失败<sup>④</sup>。另有定昌路(今四川米易西北)总管谷纳也起兵反元,一时响应者颇多,他们毁桥梁,取官府仓粟,夺取驿站马匹及屯田牛只。直到至元十七年二月,元将答里不罕以云南行省军攻定昌路,谷纳被擒并遭杀害<sup>⑤</sup>。

至元十六年十一月,梧州人吴法受举行起义,他鼓动藤州、德庆府、泷水(今广东罗定)一带范围内的瑶民起来造反。后其父为元朝政府杀害<sup>⑥</sup>。

同年,在江浙的饶州(今江西波阳)也爆发了反元起义。起义队伍从饶州出发,进攻江西都昌。这支队伍立即遭到元江西宣慰使张弘略的残酷镇压,起义据点被捣毁,起义领袖惨遭杀害,队伍瓦解<sup>⑦</sup>。

① 《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卷一五一,《赵贲亨传》。

② 《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

③ 《元史》卷一三一,《完者都传》。

④ 《元史》卷一五三,《贾居贞传》;《宋史》卷四七,《瀛国公本纪》。

⑤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元文类》卷四一;《元史》卷一一,《世祖纪》八。

⑥ 《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

⑦ 《元史》卷一四七,《张弘略传》。

至元十七年(一二八〇年)春,在江西都昌爆发了杜万一起义<sup>①</sup>。杜万一又名杜可用,江西南康都昌人。他以白莲会形式组织、发动群众,号称杜圣人,改元万乘,自称天王,以谭天麟为副天王,都昌西山寺僧为国师。<sup>②</sup>“有众万数”,并以曹某为相。<sup>③</sup>当这支起义队伍还未及向周围地区发展的时候,就被方招讨率领的元军化装成商人和农民,乘船先往偷袭,将起义镇压了下去;杜万一及其相曹某被捕,并遭残杀于龙兴(今江西南昌)<sup>④</sup>。由于杜万一起义,遭致了元朝最高统治集团于至元十八年三月第一次下令对白莲会、五公符、推背图等“一切左道乱正之术”统加禁止<sup>⑤</sup>。

福建地区在元军南下时抵抗甚烈。元统一后,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仍不断发生,其中陈吊眼所率领的队伍就是规模最大的起义。前已述及,在南宋末年,陈吊眼曾率领畬军配合南宋抗战将领张世杰共同作战。后来,他的这支势力一直存在于汀州、漳州地区,“七年未平”<sup>⑥</sup>。至元十七年八月十五日夜,他率众攻入漳州城,“杀招讨傅全及其一家,官军死者十八、九,[万户府知事]阚文兴力战死”<sup>⑦</sup>。起义队伍很快发展至十万人,“连五十余寨,扼险自固”<sup>⑧</sup>。元朝政府为对付这一起义,曾调集了四省的军队,对陈吊眼进行围攻<sup>⑨</sup>。至元十九年三月,陈吊眼中了元军的诡计,被擒杀,起义归于失败<sup>⑩</sup>。但其势力还残存了相当一段时间,直到元成宗元贞三年(一二九七年),元廷尚下令将陈

---

① 关于杜万一起义的时间,可参见丁国范:《关于杜万一起义的年代》一文,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六期。

②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元文类》卷四一。

③ 姚燧:《贾公神道碑》,见《元文类》卷六一。

④ 同上。

⑤ 《通制条格》卷二八,《禁书》;《元典章》卷三二,《禁断推背图等》。

⑥ 《元史》卷一三一,《完者都传》。

⑦ 揭傒斯:《双节庙碑》,《揭文安公全集》卷七;《元史》卷二〇〇,《列女传》。

⑧ 《元史》卷一六二,《高兴传》。

⑨ 《元史》卷一三五,《塔里赤传》。

⑩ 《元史》卷一三一,《完者都传》;卷一六二,《高兴传》。

吊眼等余部安插在漳州等地屯田,“与军人相参耕种”<sup>①</sup>。

与陈吊眼起义的同时,陈吊眼之叔陈桂龙也于至元十七年八月在漳州起义,他们据山砦,拒官军。当时一同起义的还有陈三官、罗半天、陈大妇等人。陈桂龙的队伍有一万多人<sup>②</sup>。至元十九年四月,陈桂龙等降于元军,被送往京师。其部属吴满、张飞在和元军奋战的过程中被杀<sup>③</sup>。至元二十年六月,元朝政府将陈桂龙远流至北方憨答孙地<sup>④</sup>。此外,至元十七年在江西上犹县还有吴富五、钟召二、李达淑等的相继起义。当地的元朝官吏只知用兵和搜刮百姓,从这以后的二十余年,起义接连不断,“更无宁日”<sup>⑤</sup>。

元朝统治者进入僮族地区时,和进入其他地区一样,曾遭到当地各族人民的反抗。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年),镇安州(今广西那坡)镇抚岑毅为反抗元朝统治者征索差发等残酷剥削,发动起义。他在给特磨道(今云南广南)农士贵的书信中说:“设有达达军马来起差税,吾与尔皆一家之人,围聚战杀,实不愿作大元百姓”<sup>⑥</sup>。他发兵攻杀顺安知州李显祖,夺其妻子家财。后被元军压服。

同年,在福建南剑州还有丘细春发动的反元起义,他“行镇国开国大王”,并改元昌泰<sup>⑦</sup>。浙东处州有平八起义,“鸠众五千,掠遂昌”<sup>⑧</sup>。徽州祁门有王万十、王信二起义,“啸聚二千余人”<sup>⑨</sup>。等等。但这些起义的规模一般较小,力量较弱,时间较短。

①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

②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元文类》卷四一。

③ 《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

④ 同上。

⑤ 黄文杰:《上犹县治记》。见查慎行:《西江志》卷一六一,《艺文》。

⑥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元文类》卷四一。

⑦ 同上。

⑧ 陆文圭:《吕侯墓志铭》,《墙东类稿》卷一二。

⑨ 汪克宽:《陈君墓碣铭》,《环谷集》卷八。



至元十九年的南方也不平静,是年冬,江东的芜湖、宣城、徽州和南陵等地都有起义发生,“宣、徽尤甚,皆僭号署官,掠郡县,烧府库,杀县长吏”,“应者日众”。起义队伍的势力曾一度到达浙江境内的昌化一带。进攻宣城的起义队伍曾屡败元朝官军,使之处于崩溃的边缘。攻打徽州的起义队伍曾击败元两万户军。南陵的起义领导人曾称天王,率军攻打宣城,打得元军不能支撑。时江浙行省以重兵镇压,但未能取胜。后从建康调去管军万户张珪所统的精锐部队,才把起义镇压下去<sup>①</sup>。同年,还有乌蒙(今云南昭通)人民起义。元廷命那怀、火鲁思迷率蒙古、汉人新附军去镇压<sup>②</sup>。

#### 世祖至元后期的各地起义

忽必烈灭南宋后,接着又发动了频繁的对外战争,征调大批粮食和民夫,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苦难。在此期间,国内又发生海都、乃颜等诸王叛乱,忽必烈为应付国内外战争的庞大财政支出,乃先后任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理财,对百姓大肆搜刮,“害民特甚”,导致“民不聊生,自杀者相属”<sup>③</sup>。当时江南人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最重,加之赋役严重不均,“富者有田无役而益富,贫者无田加役而益贫”<sup>④</sup>,各族人民在元廷及其各级官吏的重重压榨之下,走投无路,只得铤而走险,被迫进行起义。从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年)起,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的次数较前一阶段大为增加,据元朝政府的官方统计,仅至元二十年这一年,江南人民“相挺而起”的大小起义,“凡二百余所”<sup>⑤</sup>。到了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更激增为“四百余处”<sup>⑥</sup>。这一阶段所发生的起义,其规模较大的也比前一阶段为多,其中,起义人数在十万人以上的就

① 虞集:《张公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一八。

② 《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

③ 《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

④ 吴履:《赣县均役记》,载乾隆《赣州府志》卷四二,《艺文·记》。

⑤ 《元史》卷一七三,《崔彧传》。

⑥ 《元史》卷一五,《世祖纪》一二。

有多次。这些史实表明本阶段的起义形势,较之第一阶段有了很大的发展。

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年)是各族人民反元起义激增的一年。是年三月,在广州新会一带,有林桂芳、赵良钤等领导的起义,他们建国号为罗平国,年号延康,但很快被元军镇压下去<sup>①</sup>。

元代福建地区的百姓,“困苦者多”,当地的官吏“贪图贿赂,习以成风”,他们“擅科横敛,无所不至”,以致“政坏民残”,激起了当地各族人民的不断起义和反抗<sup>②</sup>。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年)八月,黄华再次起兵反元,参加起义的群众达十余万人之多,他们“剪发文面,号‘头陀军’”<sup>③</sup>,据政和县,称宋祥兴五年,进攻崇安、浦城等县,围建宁府<sup>④</sup>。是年冬,起义队伍号称二十万<sup>⑤</sup>。元朝政府命史弼、高兴、刘二拔都(刘国杰)等将领率军前往,与福建军会合,对黄华起义军进行镇压。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年)正月,黄华兵败自杀<sup>⑥</sup>。

黄华再次起兵反元的影响是巨大的,就在至元二十年的十二月,浙东有吴提刑,居青田之鸬鹚,起而响应黄华起义,亦“用宋祥兴年号,铸两浙安抚司印,声振闽、粤”<sup>⑦</sup>,后被元军镇压。

正当黄华在福建再次起兵反元之时,在广东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欧南喜、黎德起义。这次起义首先由盐贩陈良臣等发动,他们发动东莞、香山、惠州一带的盐贩万人进行起义,但很快就被镇压,陈良臣被杀<sup>⑧</sup>。此后不久,至元二十年九月,欧南喜、黎德就发动了规模更大的起义<sup>⑨</sup>。欧南喜,又称欧将军,他继

① 《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

② 参见王恽:《特选行省官事状》,《秋涧集》卷九二。

③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元文类》卷四一。

④ 《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

⑤ 苏天爵:《赵伯成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一五。

⑥ 《元史》卷一三,《世祖纪》一〇;卷一六二,《刘国杰传》。

⑦ 陆文圭:《吕侯墓志铭》,见《墙东类稿》卷一二。

⑧ 《元史》卷一九三,《合刺普华传》;欧阳玄:《高昌偃氏家传》,《圭斋集》卷一一。

⑨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元文类》卷四一。

陈良臣之后组织起义,设丞相、招讨等官署,自称王于清远,众号十万,起义群众达十万人之多,曾一度遣马帅、陆帅、徐相率军进攻广州,但为元军击败,马、陆、徐三个统兵将领也被元军斩杀;欧南喜乃走新会,与黎德合军。时黎德“已集船至七千(“千”,原文作“十”,误。——引者)艘,众号二十万”,其别将吴林有船八百艘,声势浩大<sup>①</sup>。当时广东“增城县蔡大老、钟大老、唐大老皆应之”<sup>②</sup>。欧南喜、黎德等的起义持续了一年多,到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年)十一月,欧、黎及其都督、丞相等二十四人被元军俘获而惨遭杀害,黎德之弟黎浩及其招讨吴兴等人则被槛送京师,起义基本归于失败,然其余波直到至元二十二年二月才完全消失<sup>③</sup>。

正当欧南喜、黎德的起义在广东持续发展的时候,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年)二月,在广西宾州(今广西宾阳东北),发生了黄大成等人的反元起义。当时梧州、韶州、衡州的百姓“相挺而起”。但很快遭到元湖南宣慰使撒里蛮的武力进剿<sup>④</sup>。同年,浙东台州仙居县民王仙人,倡言“五星期斗,天崩地陷,合有圣人出”<sup>⑤</sup>,与南溪人陈再一共同起义,但很快就以失败告终。

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年),四川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广子广王,树立反元旗帜,从者甚众,未几被元军镇压<sup>⑥</sup>。

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年)七月,江浙省婺州永康县(今浙江永康)人陈巽四等聚集群众,于普济寺内造衣甲、军器,图谋举行反元起义<sup>⑦</sup>。这一举动立即遭到元朝统治者的镇压,是年八月,陈巽四等被杀害<sup>⑧</sup>。

① 《元史》卷一九三,《合剌普华传》;姚燧:《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三。

②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元文类》卷四一。

③ 《元史》卷一三,《世祖纪》一〇;姚燧:《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三。

④ 《元史》卷一三,《世祖纪》一〇。

⑤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元文类》卷四一。

⑥ 《元史》卷一三,《世祖纪》一〇。

⑦ 《通制条格》卷一九,《捕亡·防盗》。

⑧ 《元史》卷一四,《世祖纪》一一。

同年,在江浙行省的安仁(今江西鹰潭西北)有蔡福一的反元斗争,被镇守饶州的元将齐秉节镇压<sup>①</sup>;在宣政院辖境,还有陈骨族六彪及其子合彪的起义,他们联合毡单族、条竹族,攻打脱思麻路(即朵思麻,今青海东部),未几兵败<sup>②</sup>。

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年)时元朝统治者统治江南已经十年,但江南人民的起义斗争“迄今未靖”<sup>③</sup>。在福建地区,由于元朝“官吏贪残”,山区各族人民往往起而反抗<sup>④</sup>。是年冬,汀州(今福建长汀)畬民钟明亮起兵反元<sup>⑤</sup>,是为这一阶段声势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反元起义。他“拥众十万,声摇数郡,江、闽、广交病焉”<sup>⑥</sup>。起义军活跃于今福建、江西、广东三省的交界地带,游动于汀州、漳州、邵武、赣州、宁都、南安、建昌、南丰、循州(今广东龙川)、梅州(今广东梅县)等地,有力地推动了福建、江西、广东等地的起义斗争。如至元二十五年(一二八八年)夏四月,广东有董贤举等七人“皆称大老,聚众反”,活动于吉、赣、瑞、抚、龙兴、南安、韶、雄、汀诸郡,元统治者“连岁击之不能平”。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正月,福建畬民丘大老集众千人攻长泰县。同年十一月,漳州陈机察以八千众攻龙岩,执元千户张武义<sup>⑦</sup>。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年),丘元起义于建昌,“与明亮犄角”,相互配合呼应,集众千余人攻掠南丰等地。这一年,福建也是“盗贼蜂起”。五月,有泉州南安的陈七师起义;十二月,有兴化、仙游的朱三十五起义<sup>⑧</sup>。此外,在今广东、福建、江西境内,还

① 《元史》卷一六五,《齐秉节传》。

②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元文类》卷四一。

③ 《元史》卷一四,《世祖纪》一一。

④ 《元史》卷一六七,《王恽传》。

⑤ 钟明亮是畬族,陆文圭:《故武德将军吴侯墓志铭》,《墙东类稿》卷一二可为证。其起义年月,陈高华:《元代前期和中期各族人民的起义》一文考证甚详,兹采其说,见《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二辑,页二九五注<sup>⑦</sup>。

⑥ 刘埙:《李参政平寇碑》,见乾隆《南丰县志》卷三四,《艺文》三。

⑦ 均见《元史》卷一五,《世祖纪》一二。

⑧ 均见《元史》卷一六,《世祖纪》一三。

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其他起义。由此可见,钟明亮起义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当时的元朝官僚承认钟明亮比福建的黄华还要厉害,“未可视为寻常草寇”,元军对他“东击则西走,西击则东轶”,“围攻则兵力不敷”<sup>①</sup>。元朝政府虽然动用了江淮、福建二省和江西行枢密院的兵力,对他“并力攻捕”,甚至施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但还是无法将他镇压下去。为取得军事上的主动,钟明亮在至元二十六年五月和二十七年二月,曾两次向元军假降,但一旦形势有利,立即重新起义。当时的地主文人对此颇为慨叹:“上烦庙堂应接,诸省奔赴,竭数载之力,仅得明亮至军前一面。而诈降无实,傲睨反复,气凌威烁,未尝获一交锋决胜,明亮竟得偃然保首领以歿”<sup>②</sup>。约于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年),钟明亮不幸病死<sup>③</sup>,起义群众在失去领袖的情况下,仍“藉其虚声余烈,尚能统御所部,不即溃降”<sup>④</sup>。但各支起义军之间由于缺乏配合,元军乘机进攻,三省交界地区的起义斗争从至元二十七年起走向低潮,到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年),持续数年轰轰烈烈的钟明亮起义,终于完全失败了<sup>⑤</sup>。

在钟明亮起义期间,浙东地区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元起义。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二月,台州宁海人杨镇龙起兵反元,据玉山县二十五都,称大兴国皇帝,设右、左丞相等官职,年号安定。起义军声势浩大,有兵十二万,以七万之众攻东阳、义乌,余攻嵊县、新昌、天台、永康。拥有二印:一是“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一是“护国护民威权法令奉命之印”。元宗王瓮吉剌与浙东宣慰使史弼共同发兵对杨镇龙进行武力镇压,当杨镇龙攻克东阳县后不久,即被

① 王恽:《论草寇钟明亮事状》,《秋涧集》卷九二。

② 刘埙:《汀寇钟明亮事略》,见乾隆《南丰县志》卷三五上,《艺文·记》。

③ 钟明亮卒年史书未载。据《元史》卷一六《世祖纪》载至元二十七年三月,起义领袖丘元被元军擒杀。又据刘埙:《李参政平寇碑》称:“自丘元败而明亮孤,不数月,贼悉平。”由此可知,钟明亮当死于至元二十七年三月之后。

④ 刘埙:《汀寇钟明亮事略》,见乾隆《南丰县志》卷三五上,《艺文·记》。

⑤ 刘埙:《大乾梦录》,《隐居通议》卷三〇,称:“至元辛卯(一二九一年——引者)汀寇钟明亮平后,民始渐安。”可证。

元军擒杀<sup>①</sup>。但余众直到次年三月仍在浙东一带活动<sup>②</sup>。此外,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在婺州(今浙江金华)有叶万五起义,他“以众万人”攻打武义县,杀千户一人,遭到元江淮行省平章不邻吉带的武力镇压<sup>③</sup>。次年五月,婺州、处州还有吕重二、杨元六等起义,被元浙东宣慰使史弼擒杀;十二月,处州青田有刘甲、刘乙等集众万余人攻打温州平阳,这些起义,均很快被镇压了下去<sup>④</sup>。

黄圣许,又作黄胜许,僮族人,元湖广上思州(今广西上思南)知州,于至元二十九年(一二九二年)闰六月起兵反元,聚众二万,断道路,攻邕州(今广西南宁)等地。元统治者以武力镇压与招降的两手策略,企图使他屈服,但始终未能如愿。黄圣许及其族人的这一反元斗争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元英宗至治年间,前后长达三十多年。元廷为了镇压僮族人民,只得派军在上浪、忠州诸处开屯耕种,在该地屯种水田五百四十五顷,以做长期镇戍的打算<sup>⑤</sup>。

至元后期的各族人民起义次数十分频繁,规模大小不等,而多数的起义已不再用恢复宋朝为号召,而把斗争矛头指向元朝的封建统治和当地的地主阶级。因此,至元后期的农民起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斗争性质。

## 二 元朝中期各族人民武装起义(一二九五年至一三三二年)

元世祖忽必烈去世后,到元宁宗懿璘质班时止,短短三十七年间,元朝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元朝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进一步加剧,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这一时期内,各地少数民族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甚至连蒙古族人民也不断发生暴动。各民族人民的武装反抗,构成了这一时期反元斗争的特点。

①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浙东》,《元文类》卷四一。

② 《元史》卷一六,《世祖纪》一三。

③ 《元史》卷一五,《世祖纪》一二。

④ 《元史》卷一六,《世祖纪》一三。

⑤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元文类》卷四一;《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六。

中原和东南地区的人民起义虽不如至元年间规模大,但具有明显的反对封建赋税和徭役剥削性质,因为元朝对中原尤其是东南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搜刮。仁宗延祐初,课额“比国初已倍五十矣”<sup>①</sup>,文宗天历年间,苛捐杂税较之“至元、大德之数,盖增二十倍矣”<sup>②</sup>,商税较至元七年所定之额,“盍不啻百倍云”<sup>③</sup>。因而农民起义仍不断发生。现将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分述如下:

元成宗元贞元年(一二九五年),“时盗贼群起,山东居多”,平阴县女子刘金莲,以神怪鼓动群众,所到之处官府为其建立神堂,百姓“皆奔走奉事之”。元山东西道廉访使陈天祥见金莲势大,深恐其“仿汉张角、晋孙恩之为”,遂下令将她捕系而杖于市,其势渐被平息<sup>④</sup>。

同年,在江西赣州,有刘贵起兵反元,据当地元朝官府所得的名册称,当时在籍的起义群众有十万之多。元江西左丞董士选率兵前往镇压,刘贵被董士选部将王英擒获<sup>⑤</sup>。

元贞二年(一二九六年)五月,吐蕃人起兵反元,攻掠阶州(今甘肃武都西北)一带,元廷遣脱脱会合诸王铁木儿不花等前往镇压<sup>⑥</sup>。

同年七月,江西赣州兴国县笼坑人刘六十(名季)起兵反元,自称刘王,刻“汉高祖广新之帝”并行王二印,设朝殿,开行省,置丞相、左右丞、将军、军头等官,宣言“止杀官中人”,与张大老联合起兵,起义群众达一万余人。元朝统治者派兵镇压,主将们多畏惮起义军兵威,“观望退缩不肯战”,而官吏又乘机侵扰良民。后元廷派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前往,以分化瓦解和残酷镇压相结合的手段,费了很大气力,才于同年十月将起义镇压了下去,刘六十被杀<sup>⑦</sup>。

① 《元史》卷二〇五,《铁木迭儿传》。

②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③ 《元史》卷九四《食货》《商税》。

④ 《元史》卷一六八,《陈天祥传》。

⑤ 《元史》卷一八一,《元明善传》,卷一八八,《王英传》。

⑥ 《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

⑦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元文类》卷四一。《元史》卷一五六,《董士选传》。



与刘六十起义的同时,在广西爆发了陈飞、雷通、蓝青、谢发等人的反元起义,他们攻打昭、梧、藤、容等州,结果被元湖广左丞八都马辛镇压<sup>①</sup>。

成宗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年)十月,浙江温州路陈空崖以坐禅说法等方式,称说天兵下降,号召群众,公开树立旗号,称罗平国正治元年。很快就被统治者镇压了下去。陈空崖等四个为首的领导人被杀,且“断没媳妇、孩儿、家产”;其余二十九人被分别责打一百七、九十七、八十七、七十七、四十七、三十七下<sup>②</sup>。

元代的东北各族,也屡有反元斗争。当时的骨嵬<sup>③</sup>人(住今俄罗斯库页岛),曾与吉烈迷联合起事。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年)五月,骨嵬人瓦英,乘吉烈迷所造船渡海起事,为元兵所败。同年七月,骨嵬人王不廉古渡海至拂里海,又为元军所败。大德二年,又有吉烈迷人百户盖分、不忽里,率众至骨嵬,与之联合起事。大德九年,骨嵬人攻南木合等,元军追之不及。到至大元年(一三〇八年)后,骨嵬人才逐渐停止了时断时续的反元斗争<sup>④</sup>。

大德四年(一三〇〇年),广西民高仙道以“左道”鼓动群众,平民信崇者以数千计。此事很快被元朝政府发现,结果高仙道等数人被杀<sup>⑤</sup>。高仙道自称是白莲教徒<sup>⑥</sup>,他以“左道惑众”的这一史实表明,大德四年前后的广西,白莲会已在该地活动了。

大德五年(一三〇一年),河南段丑厮以宗教作号召,“诈称神异,妄造妖言,虚说兵马”,鼓动群众进行反元。他“贯穿数州,恣行煽惑,无人盘诘。”但终于被元朝政府发觉,将为首及信从并知情不首者并行处斩,妻子

① 《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

② 《元典章》卷四一,《伪写国号妖说天兵》。

③ 《元文类》卷四一《招捕》作“嵬骨”,误,今改,下同。

④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元文类》卷四一。

⑤ 《元史》卷一三七,《察罕传》。

⑥ 果满:《庐山复教集》卷上称,“广西之高仙道,斯徒即非本教念佛之人,而妄称白莲道。”可为证。

籍没人官<sup>①</sup>。段丑厮等于是年五月被杀<sup>②</sup>。

大德五年,元廷发五省军二万,以前荆湖占城行省左丞刘深等为统帅,出征八百媳妇地区。当刘深率军由顺元<sup>③</sup>进入云南时,不仅向当地彝族等少数民族要索粮饷,且征发各族民夫,迫使他们担负繁重的徭役,跋涉于谿谷之间。刘深军进入云南后,云南的元朝官吏又胁迫各族人民“供馈”。云、贵等地各族人民不堪如此沉重的压迫,在“身死行阵,妻子为虏”<sup>④</sup>的威胁下,遂被迫举行起义。雍真葛蛮(今贵州贵定境)土官宋隆济是这支起义军的首领。这支起义军在他率领下攻占贵州等地,杀死元朝官吏,焚毁官廨。使元朝统治者的军队常常受挫。同时,由于元朝统治者又向水西彝族人民勒索金、币、马匹,彝族人民无力负担,也在水西土官之妻蛇节的领导下进行起义,与宋隆济起义军联合,进行反抗元朝的斗争。元朝统治者调遣大批军队前往镇压。于是乌撒(今贵州威宁)、乌蒙(今云南昭通)、东川(今云南会泽)、芒部(今云南镇雄)、武定(今云南武定)、威楚(今贵州楚雄)、普安(今云南普安)等地人民,纷纷响应,起而反元,直到大德七年(一三〇三年)三月,起义领袖蛇节被元朝统治者俘杀,不久,宋隆济亦被害,起义军才被镇压下去<sup>⑤</sup>。

早在元世祖至元五年(一二六八年)元朝统治者派爱鲁随从云南王攻打金齿<sup>⑥</sup>时,就遭到万余傣族人民的顽强抵抗<sup>⑦</sup>。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年),元朝统治者以金齿“其地民户刚狠”,增派了增戍的军队,在原来三千

① 《元典章》卷四一,《妖言虚说兵马》;卷二三,《社长不管余事》。

② 《元史》卷二〇,《成宗纪》三。

③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称:“八番、顺元诸蛮,又名一奚不薛。”按“一奚不薛”,彝语“水西”之意,在今贵州西北部,元时为彝族聚居区。

④ 《元史》卷二〇,《成宗纪》三。

⑤ 《元史》卷一六二,《刘国杰传》;《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宋隆济》、《招捕·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元文类》卷四一。

⑥ 元代对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傣族的称呼。

⑦ 《元史》卷一二二,《爱鲁传》。

汉军、新附军戍守的基础上,又增调二千探马赤、蒙古军,以加强对金齿人民的镇压<sup>①</sup>。元贞元年(一二九五年),云南行省又以“金齿叛服不常”为由,向元朝政府乞调兵六千,前往镇压<sup>②</sup>。可见傣族人民一直在进行武装抵抗。大德五年(一三〇一年)八月,傣族人民乘元军“征缅师还”之机,于途中进行拦截,打死了许多官兵。同时,他们又效法周围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不输税赋,贼杀官吏”。元朝统治者乃派兵前往镇压<sup>③</sup>。

大德七年(一三〇三年)四月,广西藤州大任洞人黄德宁起兵反元,“造妖言”,称皇帝,设丞相、六部尚书、六按尚书等官;迎立李龙神(万顷)为帝,发“晓民榜”。在此以前黄德宁与其父黄璋信曾举行过反元斗争,故元朝政府“谓其三代为寇,六次叛伏。”后黄德宁被擒杀<sup>④</sup>。大德十年,元政府“以其地所遗田土,续置藤州屯田”<sup>⑤</sup>,这一反元斗争完全失败。

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年)左江来安路(今广西田阳)总管洞兵万户岑雄反元,杀其侄岑世杰,元湖广行省派宣慰使忽都鲁铁木而前往招降,岑雄令其子世兴降元<sup>⑥</sup>。

元武宗至大元年(一三〇八年)七月,思州(今贵州凤冈)地区苗民起事,在公俄(今贵州石阡东)、白泥(今贵州余庆)一带活动。<sup>⑦</sup>

元仁宗皇庆元年(一三一二年),在中书省境内的沧州(今河北沧州)等处,爆发了阿失歹儿、睹海、塔海等人的起义。他们将田主许大射死,遭到元朝政府的追捕,于是他们在南抵黄河、北至大宁的范围内,来往拒敌,并杀死元朝“官兵”,甚至将元军的宽彻大王也射死。同年十一月,阿失歹儿、睹海、塔海

① 《元史》卷九九,《兵志》二。

② 《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

③ 《元史》卷二〇,《成宗纪》三。

④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广西两江》,《元文类》卷四一。

⑤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

⑥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岑氏》,《元文类》卷四一;《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

⑦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思播》,《元文类》卷四一。

均被元军擒获,并惨遭杀害<sup>①</sup>。这一起义虽然归于失败,但它是发生在元朝的腹里地区,且能“来往拒敌,杀伤射死官兵”,因而暴露了元朝统治的脆弱性。

元代黎族人民主要居住在海北海南,即今海南岛及雷州半岛。当时黎族人民的反元斗争也很激烈。元仁宗皇庆二年(一三一三年),琼州黎民王奴欧等起义,奴欧自称“平章元帅”,“立国设官”。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年)十二月,又有黎民百余人暴动,入横州永淳县,杀达鲁花赤。英宗至治元年(一三二一年)九月和二年七月,海北海南黎民连续起义,他们火烧和劫夺监狱,释放被囚同胞<sup>②</sup>。

居住在广西、广东、湖南三省交界地带山区的瑶族人民,在元朝也进行过多次反元起义。元仁宗延祐元年(一三一四年),沅州(今湖南芷江)瑶民胡老鼠反元,就是其中的一次<sup>③</sup>。

元仁宗延祐年间,元廷在江西等地推行“经理法”,地方官吏乘机敲骨剥民。赣州地区“由昵匝马丁经理田粮,与郡县横加酷暴”,信丰一县,“撤民庐千九百区,夷骨扬墓”<sup>④</sup>,造成“民不堪命,赣为甚,宁都又甚”<sup>⑤</sup>的局面。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年)四月,蔡五九在宁都州举兵反元,自称“洞主”,复称“蔡王”,义军“张汉高旗,造战棚、炮架、攻具,其势甚张”,他们杀宁都州赵同知,围宁都州,烧四关,一度攻入福建。元廷于同年九月令江浙、江西两省会兵至江西石城县,对义军进行武装镇压,蔡五九终因兵力悬殊,兵败被杀<sup>⑥</sup>。

延祐二年,广西静江古县瑶族人民,起而焚烧官府的文库档案,释放被关禁的狱囚,掀起反抗元朝政府的斗争,直到延祐四年,这股势力才消失下去<sup>⑦</sup>。

① 《通制条格》卷二〇,《获贼》;《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

②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海北海南》,《元文类》卷四一。

③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湖北》,《元文类》卷四一。

④ 《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

⑤ 刘岳申:《孙君墓志铭》,《申斋集》卷九。

⑥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江西》,《元文类》卷四一。

⑦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广西两江》,《元文类》卷四一。

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年)三月,广东德庆路瑶族人民亦起而反元,元朝政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乃利用瑶族山主对瑶民实行分化政策,瓦解了这次起义<sup>①</sup>。

蔡五九起义后的第三年,即延祐五年(一三一八年)冬十月,在江西宁都附近的雩都又发生了刘景周领导的抗交“刮田新租”的斗争。刘景周本是雩都县里胥,因元朝官府“征刮田新租”,才起而反抗。元廷被迫“敕免征新租”<sup>②</sup>。

延祐年间在岭北连续发生了两起反抗斗争。延祐五年(一三一八年),在岭北戍守的士兵,因贫苦而起来反抗,“岭北戍士多贫者,岁凶相挺为变”<sup>③</sup>;次年七月,“晋王也孙铁木儿所部民,经剽掠灾伤,为盗者众”,元仁宗命扎鲁忽赤囊加带前往,与晋王府内史共同审录参加的人,对他们严加镇压<sup>④</sup>。

延祐七年(一三二〇年)左江来安路总管岑世兴(岑雄子)起兵反元。次年二月,起义军杀怀德知州,夺州印,又攻那带县。后岑世兴降元<sup>⑤</sup>。

延祐七年(一三二〇年)发生了圆明和尚反元事件。圆明和尚姓白,名唐兀台,这年六月十三日夜,与苏子荣等五十余人聚集于奉元路盩厔县,即位为皇帝。原拟七月五日攻奉元路举事,不料六月二十九日为人告密,元朝政府乃派军追捕,结果圆明和尚于八月九日被奉元路达鲁花赤伯颜擒杀<sup>⑥</sup>。

元英宗至治元年(一三二一年),孔提谷充儿等七族番民反元。据吐蕃宣慰司称:有孔提谷充儿等“七族番贼”伏击并杀伤元朝官军;同年又发生了八郎朵公等“生番”抢夺元朝站马二百余匹的事件<sup>⑦</sup>。

①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广东》,《元文类》卷四一。

② 《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

③ 《元史》卷一七七,《张思明传》。

④ 《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

⑤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岑氏》,《元文类》卷四一。

⑥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圆明和尚》,《元文类》卷四一。

⑦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西番》,《元文类》卷四一。

至治二年(一三二二年),在广东发生了瑶民冯岳护攻打新会县的斗争<sup>①</sup>。

至治三年(一三二三年),爆发了参卜郎诸族的起义,这是元朝藏族人民中一次较激烈、时间较长久的起义。他们开始仅是“劫杀使臣”,后来发展到杀伤元朝士兵<sup>②</sup>。元朝统治者先后命镇西武靖王搠思班、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囊加台等前往镇压,直到泰定帝二年(一三二五年),才将这一起义镇压了下去<sup>③</sup>。

泰定二年(一三二五年)六月,河南息州人赵丑厮、郭菩萨倡言“弥勒佛当有天下”。元朝政府闻讯后惊恐万状,如临大敌,命宗正府、刑部、枢密院、御史台及河南行省杂鞫。同年十二月,郭菩萨等被杀,余众被杖流<sup>④</sup>。

泰定帝统治年间,湖广行省境内的苗族人民亦有过多次反元斗争,其中泰定二年(一三二五年)十月,有播州凯黎苗统率诸寨苗族等人民起义<sup>⑤</sup>。泰定四年(一三二七年)又有苗人祭伯秧反元。元廷命湖广行省捕捉<sup>⑥</sup>。

泰定帝致和元年(一三二八年)五月,广西普宁县僧人陈庆安起义,建号改元<sup>⑦</sup>。

元文宗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年)九月,居住在岚、管、临三州(均在今山西北部)的诸王八剌马、忽都火者等部曲,“乘乱为寇”,元廷遣省、台、宗正府官前往,督促地方有关机构镇压<sup>⑧</sup>。这是继延祐六年漠北晋王部民起而反抗之后的又一次斗争,表明了元朝社会的矛盾正在进一步深化,元朝蒙古统治者的后院也燃起了熊熊烈火。

---

①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广东》,《元文类》卷四一。

② 《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

③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④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⑤ 同上。

⑥ 《元史》卷三〇,《泰定帝纪》二。

⑦ 同上。

⑧ 《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元文宗至顺元年(一三三〇年)广西境内的瑶族人民又纷纷举行起义,先后进攻修仁、荔浦、永淳等县及横州等地,致使元朝统治者调集了各行省官兵二万人,前往镇压<sup>①</sup>。

同年,在海南爆发了黎族人民起义,起义的首领是黎民王官福,他率军攻打乾宁(今海南省琼山)界。至顺二年,元总兵谭汝楫与其子谭惠与起义军交战,谭惠被起义军打死。三年,起义军又攻乾宁西山界,被谭汝楫与别将拜住击败。四年,起义军又攻北关,统将被元军诛杀,王官福乃率五万人大举进攻,最后被元将谭汝楫击败<sup>②</sup>。这次起义前后持续了四年之久,参加的群众达五万之多,是这一阶段规模较大的一次少数民族起义。

正当王官福率领海南黎民举行大规模起义的时候,至顺二年(一三三一年)九月,又爆发了由王周领导的海南黎民暴动,参加的群众达二万人之多,致使元朝统治者调集了广东、福建的兵力,由湖广行省左丞移剌四奴统一指挥,前往镇压<sup>③</sup>。紧接王周领导的黎民暴动之后,至顺三年(一三三二年)海南地区万安军(今海南岛万宁)黎民王奴罗聚集了五万多人,发动了又一次较大规模的黎民反元斗争,进攻陵水县(今海南岛万宁西南)<sup>④</sup>。海南地区在短短数年之内,连续发生三次规模较大的起义,表明这一地区的矛盾已十分尖锐。

### 三 顺帝前期的各地起义(一三三三年至一三五〇年)

从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即位(一三三三年),到元末全国农民战争爆发(一三五一年),前后十八年,在这十八年内,权臣擅权,吏治败坏,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宫廷挥霍浪费,赏赐之滥惊人,加上土地兼并,赋役不均,灾荒频仍,造成

① 《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

② 雍正《广东通志》卷五七,《岭蛮》。

③ 《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

④ 《元史》卷三六,《文宗纪》五。



广大劳动人民卖儿鬻女,父子相食的悲惨情景屡屡发生,元代社会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逐步趋于激化。“山雨欲来风满楼”。元代社会正处于农民大起义的前夜。兹将本阶段各族人民起义分述于下:

这一阶段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较前一阶段更为频繁。元顺帝元统元年(一三三三年)十二月,广西爆发瑶民起义,攻下湖南道州,将千户郭震击毙。次年三月,广西瑶民又起,攻杀同知元帅吉列思,夺取库物。元统二年三月,庆远府的起义瑶民攻打全州,致使元朝统治者派了二万人马前往镇压。同年九月,起义瑶民攻下贺州,元朝统治者调了河南、江浙、江西、湖广诸军及八番义从军,由广西宣慰使都元帅章伯颜率领前往镇压<sup>①</sup>。

元统三年(一三三五年)山东陈马骡及新李起而暴动,其原因是由于“官吏贪污所致”<sup>②</sup>。后为山东廉访使答里麻镇压。

后至元三年(一三三七年)正月,广州增城县民朱光卿举行起义,石昆山、钟大明率众响应,称“大金国”,改元“赤符”。同年四月,归善县民聂秀卿、谭景山等私造军器,以宗教色彩为号召,拜戴甲为定光佛,与朱光卿相结合,进行起义。元朝统治者命江西行省左丞沙的前往镇压。是年七月,朱光卿、石昆山、钟大明先后被捕,起义基本失败<sup>③</sup>,但过了三年,朱光卿的余部再次起义,“攻增城益急”,还射伤元广东肃政廉访使颜浩<sup>④</sup>。与朱光卿起义的同时,至元三年(一三三七年)二月,河南汝宁信阳州爆发了棒胡起义。他以“烧香”为号召,攻破归德府鹿邑,焚陈州,屯营于杏冈。元统治者命河南行省左丞庆童领兵前去镇压。起义坚持了一年多,至次年四月,棒胡被元统治者所杀,起义归于失败<sup>⑤</sup>。朱光卿、棒胡起义是元顺帝前期两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对元廷震动

① 均见《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

② 《元史》卷一四四,《答里麻传》。

③ 《元史》卷三九,《顺帝纪》二。

④ 乾隆《吉安府志》卷四五,《忠节》。

⑤ 《元史》卷三九,《顺帝纪》二。

很大,右丞相伯颜预感到元朝统治受到了威胁,因而疯狂地提出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荒谬主张<sup>①</sup>。

与朱光卿、棒胡起义的同时,四川合州大足县人韩法师亦起而反元,自称“南朝赵王”。但很快被元朝统治者镇压下去。后至元三年五月,西番人民亦起而反抗,杀镇西王子党兀班。元朝政府乃立行宣政院,专事镇压<sup>②</sup>。

元末南方的福建人民,曾进行了长期的起义。后至元四年(一三三八年)六月,漳州路南胜县畬民李志甫<sup>③</sup>举行起义,围攻漳州城,击败守将搠思监,元朝统治者虽然在一开始就命令江浙行省平章别不花总浙、闽、江西、广东军马前往镇压,但在较长时期内未能达到其绞杀起义之目的<sup>④</sup>。直到后至元六年三月,李志甫才被漳州败类陈君用所袭杀,同年五月,李志甫的部下郑子箕又被漳州龙岩尉黄佐才俘获,起义乃暂遭挫折<sup>⑤</sup>。

后至元四年六月,与福建李志甫起义的同时,在江西有彭莹玉及其徒周子旺的反元起义,有五千余人的队伍,周子旺称“周王”,改国号,但很快即被镇压。彭莹玉在起义暂遭挫折之后,逃匿于淮西一带民家,当地老百姓千方百计对他进行保护,“虽有司严捕,卒不能获。”<sup>⑥</sup>彭莹玉在后来至正十一年爆发的全国性的元末农民大起义中,成了南方红巾军中早期的著名领导人。

元末的河北、山东、河南一带,形势特别紧张。后至元五年(一三三九年)十一月,河南开封杞县人范孟起而反元,他以假传圣旨方式,杀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月禄帖木儿、左丞劫烈、廉访使完者不花等。很快范孟自己也被元统治者

① 权衡:《庚申外史》。

② 《元史》卷三九,《顺帝纪》二。

③ 陈志方:《罗公墓志铭》(见嘉庆《漳州府志》卷三〇)有“南胜畬贼李志甫”语,故知其为畬族。

④ 《元史》卷三九,《顺帝纪》二。

⑤ 《元史》卷四〇,《顺帝纪》三。

⑥ 《元史》卷三九,《顺帝纪》二;权衡:《庚申外史》。

捕获而杀害<sup>①</sup>。范孟这一戏剧性的行动,充分显示了当时元朝统治者的腐朽与无能。到了至正元年(一三四一年)十二月,山东、燕南人民到处起义骚动,达三百余处之多<sup>②</sup>,足见民情沸腾!

至正元年(一三四一年)四月,湖南道州人蒋丙举行起义,攻掠县城<sup>③</sup>,到至正三年九月,这一起义的领导人唐大二、蒋仁五不幸落入元政府之手而被杀于京师,但起义并未因之中断,由蒋丙继续领导起义,他自号“顺天王”,并攻破连、桂二州。至正四年,控于元朝统治者之手的靖州和浔州,均分别受到瑶民的攻击<sup>④</sup>。同年十一月,在道州还爆发了何仁甫起义,表明了道州地区在这一年的矛盾已经激化。是年十二月,云南还爆发了车里寒赛的反元起义,元顺帝命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脱脱木儿将其镇压下去<sup>⑤</sup>。

至正二年(一三四二年)七月,广西庆远路(今广西宜山)爆发了莫八起义,聚众攻下南丹、左右两江等处,被元将脱脱赤颜镇压<sup>⑥</sup>。

元顺帝即位以后,东北各族由于不堪忍受元朝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与压迫,纷纷举行起义。至正三年(一三四三年)二月,辽阳有“吾者野人”起义。至正六年(一三四六年)四月,辽阳为捕捉海东青,供元朝统治者纵乐,“吾者野人”及水达达不堪烦扰,乃群起暴动,元朝统治者派武力前往镇压,但结果万户买住反为起义者所杀元朝统治者又续派火儿忽答等前往镇压<sup>⑦</sup>。此外,东北地区在至正八年(一三四八年)三四月间,还连续发生了三次反元斗争:这年三月,辽东锁火奴自称“大金子孙”,起而反元,但很快被元朝统治者镇压。同月稍后,辽阳兀颜拔鲁欢也自称“大金子孙”,“受玉帝符文”,起而反元,也为元

① 《元史》卷四〇,《顺帝纪》三。

② 《元史》卷四〇,《顺帝纪》三;又《元史》卷一八三,《王思诚传》。

③ 《元史》卷四〇,《顺帝纪》三。

④ 均见《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

⑤ 《元史》卷四〇,《顺帝纪》三。

⑥ 同上。

⑦ 《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

军所杀。同年四月,辽阳董哈刺起而反元,也被元统治者所擒杀<sup>①</sup>。这一阶段东北地区如此频繁的起义,是以前各个阶段所未有过的,可见这一地区的社会矛盾已较过去尖锐了。

至正四年(一三四四年)秋七月,山东私盐贩子郭火你赤举行起义,他西上太行,由陵川入壶关,驰骋今山东、山西、河北等地,杀元兵马指挥,后又回到益都,元朝统治者对他无可奈何<sup>②</sup>。

至正六年(一三四六年)六月,福建汀州连城县人罗天麟、陈积万起兵反元,攻克长汀县,元福建元帅府经历真宝、万户廉和尚等进行讨伐。同年八月初一日,元廷又命江浙行省右丞忽都不花、江西行省右丞秃鲁统军合讨罗天麟,这实际上是三省联合对他进行镇压。直到同年闰十月,起义军内部出了叛徒罗德用,将罗天麟、陈积万加以杀害,以首级送官,这支起义军方被镇压下去<sup>③</sup>。

同年六月,著名的湖广瑶民起义领袖吴天保起兵靖州,攻下黔阳(今湖南黔阳西南)。在他整个的起义过程中,曾五次率众攻打沅州(今湖南芷江),三次打下武冈。当他在至正七年九月打下武冈之时,势力曾延及宝庆,并杀湖广行省右丞沙的于军中。同年十一月,吴天保攻克靖州(今湖南靖县)。至正八年十一月,吴天保又率领六万人马攻打全州。势力之盛,可见一斑。至正九年正月,道州又为瑶民攻克。这年七月,元朝统治者玩弄诡计,下诏赦湖广瑶民“诬误者”,企图以此分化瑶民起义,但吴天保并未上圈套,而是于同年十二月,打下了辰州(今湖南沅陵)<sup>④</sup>。到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前夕,吴天保降元,起义失败。

至正七年(一三四七年)四月,“通州盗贼蜂起”,监察御史惊呼:“通州密迩京城,而盗贼蜂起,宜增兵讨之,以杜其源”<sup>⑤</sup>。由此可见,元朝的心脏地带

① 《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卷四一至四二,《顺帝纪》四至五。

⑤ 《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

也是不安定的。同年九月,蒙古八邻部内哈剌那海、秃鲁和伯爆发起义,断岭北驿道<sup>①</sup>。这一史实表明,元朝蒙古统治者的后院,从上一阶段到现在,已经很不稳定了。

这一阶段西北各族人民,也纷纷举行起义,仅至正七年(一三四七年)十月发生了“凡二百余所”的起义,起义者攻下哈剌火州,夺取供元朝皇帝享用的葡萄酒,并将使臣杀死<sup>②</sup>。

至正九年(一三四九年)冀宁(今山西太原)平遥等县曹七七反元,元廷命刑部郎中八十、兵马指挥沙不丁率兵镇压<sup>③</sup>。

有元一代各族人民前仆后继的起义斗争,由于力量的悬殊和起义者本身存在的弱点,虽然都失败了,但是表明了社会矛盾正在日益激化,一场更大规模的全国性农民战争,不可避免地即将到来。

---

① 《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

② 同上。

③ 《元史》卷四二,《顺帝纪》五。